

彭述之 口述

中文本編撰者：

程映湘

法文本譯者：

高達樂、程映湘



北大圖書 21101004075887

彭述之回憶錄

中國第二次革命和托派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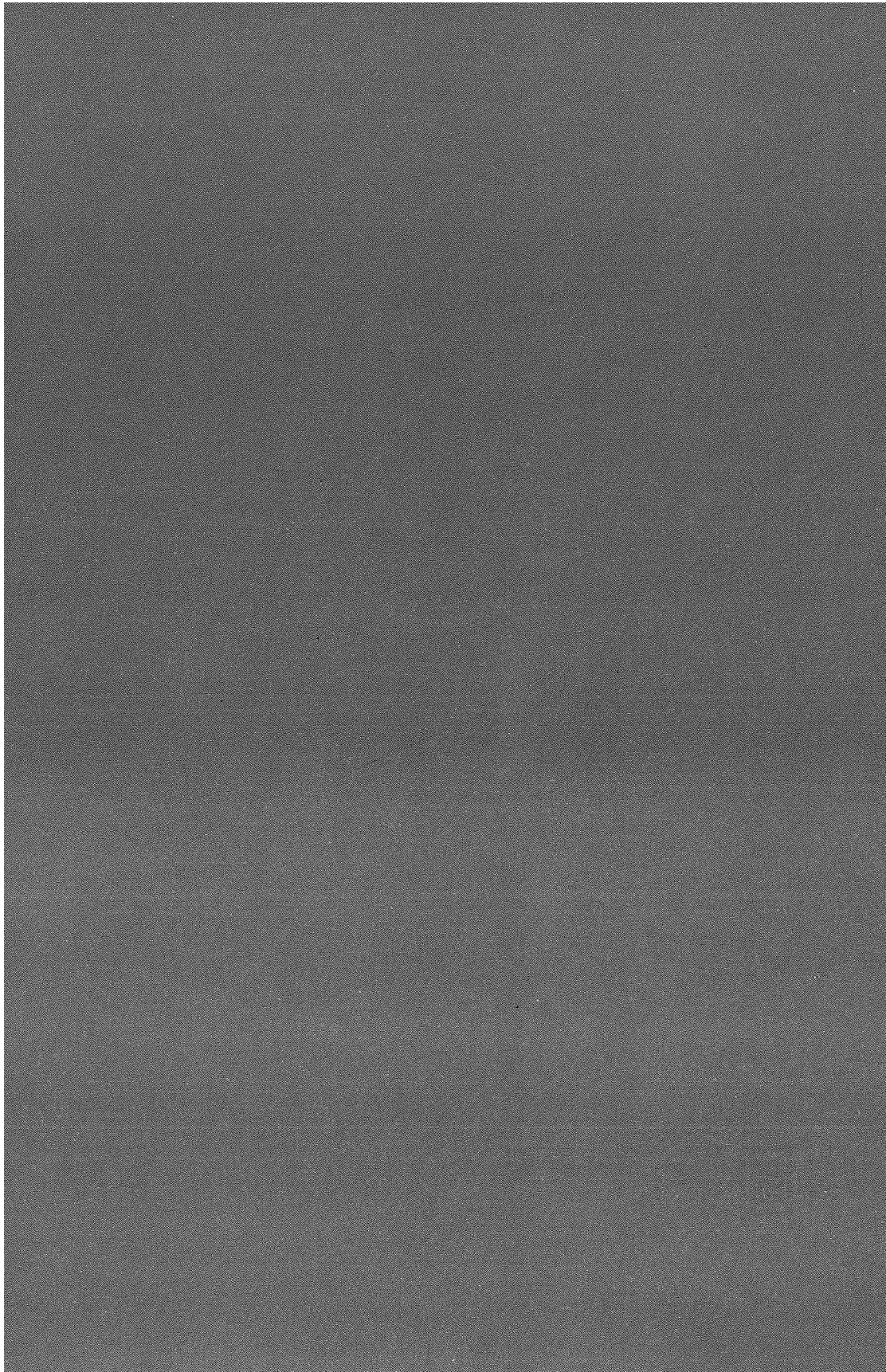
共產主義在中國起飛（1920 — 1924）

第二次革命（1925 —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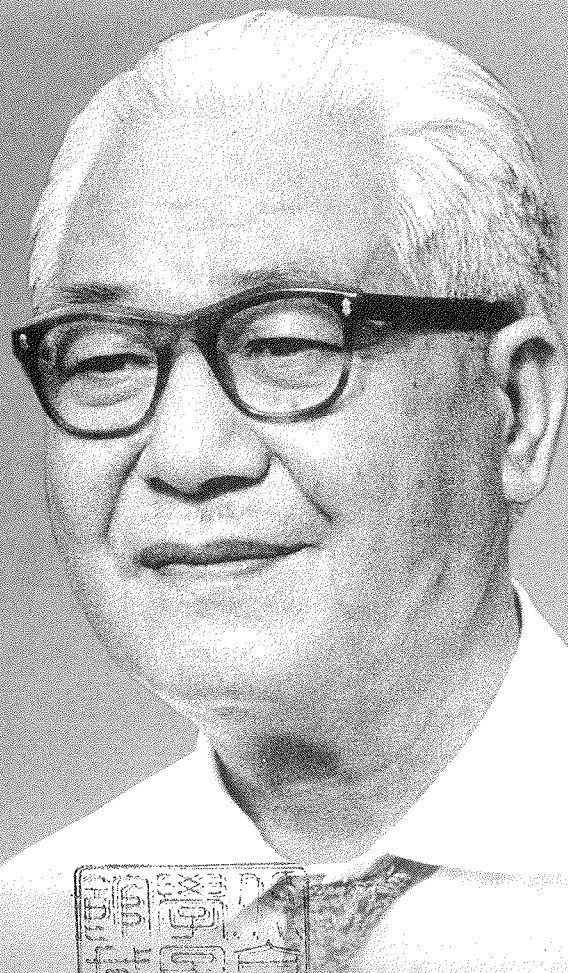
中國托派運動（1929 — 1983）

下卷

天地圖書



K821.1
949(下)



彭述之 口述

中文本編撰者：

程映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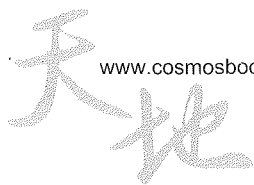
法文本譯者：

高達樂、程映湘

彭述之回憶錄

中國第二次革命和托派運動

下卷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彭述之回憶錄（下卷：中國第二次革命和托派運動）

口述 彭述之

編撰（中） 程映湘

譯者（法） 高達樂、程映湘

責任編輯 顏純鈞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09-115 號

智群商業中心 15 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地庫／1 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字樓 A 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 2016

ISBN：978-988-8257-11-9

目錄 (下卷)

| | | |
|---------|--|-----|
| 前言 | 程映湘、高達樂 | 4 |
| 第一五章 | 中共中央的重組，中央宣傳部的創建 | 7 |
| 第一六章 | 陳獨秀的「失蹤」與中央委員會北京特別會議 | 63 |
| 第一七章 | 蔣介石的「3月20日政變」， 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意見的衝突 | 95 |
| 第一八章 |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開始（1926年6月至1927年初） | 137 |
| 第一九章 | 上海暴動（1927年春） | 183 |
| 第二〇章 | 從南京到武漢：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209 |
| 第二一章 | 河南之行：馮玉祥和軍隊，武漢中共中央 特別會議（1927年6月21日） | 237 |
| 第二二章 | 我在中共北方區委的經驗（1927年7月末至12月） | 253 |
| 第二三章 |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共領導層的墮落 | 269 |
| 第二四章 | 中國托派運動的起始（1929年至1930年） | 291 |
| 第二五章 | 被捕·審判·監獄（1932到1937年） | 331 |
| 第二六章 | 托派運動重整旗鼓 | 357 |
| 第二七章 | 在日本鐵蹄下的上海 | 393 |
| 第二八章 | 和平後，托派運動的再生·蔣介石政權的崩潰 中共的軍事勝利·我走上流亡的道路 | 405 |
| 後記 | 高達樂、程映湘 | 425 |
| 彭述之著作選列 | | 448 |
| 鳴謝 | | 449 |

前言

《彭述之回憶錄》下卷前半部是根據他親身經歷，描述中國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的醞釀和爆發的事跡，以及它失敗的悲劇。

彭述之是這次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由於他與陳獨秀同心合力，從理論到實踐，高速地把一個弱小的共產黨轉變成一個真正工人階級的強有力的革命政黨。可是，他不但是這次革命的重要人物，而且成為革命失敗的首要政治犧牲者，在這一段可歌可悲、鮮為人知的史事裏顯示出來。

這一卷（同上卷一樣）是根據程映湘和高達樂與彭述之長談記錄，首先在法國（巴黎）（1969年到1971年），後來在美國（洛杉磯）（1975年到1982年之間）編寫完成的，其中包括許多彭述之手寫的草稿，尤其是關於蔣介石發動1926年3月20日政變，他在廣州完成特別使命的手稿。

下卷後半部的著作是在彭述之1983年11月18日逝世之後完成的，未經他本人親自逐句審查，中文稿由程映湘寫成，法文稿由高達樂與程映湘合作編寫。

下卷後半部的內容是敘述彭述之與中共中央和第三國際的決裂，使他成為左派反對派，成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主要領袖之一（陳獨秀也是）。

托派運動在中國大陸歷時二十年之久（1929-1949年）。其中包括南京監獄五年（1932-1937年）。在此期間，陳獨秀與彭述之在獄中發生思想上的嚴重分歧，以致私人關係破裂。

在這一段時期，彭述之不但要抵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他們攫取中央的領導權，直至1935-1936年，由毛澤東把中共領導權霸佔為止），莫斯科指使的斯大林派的迫害和陰謀詭計，同時，他還要應付另外兩條陣線上的戰鬥：對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以及國民黨法西斯般的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中國走上和平之路。可是好景不常，蔣介石發動國共內戰，正在托派重整旗鼓之際，國民黨政權腐敗崩潰，中共軍隊長驅直入大小城市，勝利在即，彭述之和托派同志們深知緊隨斯大林政策的中共把托派視為死敵，決不容忍他們的存在，因此，他選擇流亡之路，走向世界，走向奮鬥之路，回憶錄到此為止。

程映湘、高達樂

2014年

第一五章

中共中央的重組，中央
宣傳部的創建

中共成立初期，嚴格遵守和體現由列寧為了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不斷更新而構思的民主集中制。他每年召開布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在前後的代表大會之間行使領導職務。雖然中共初期嚴格遵守黨中央委員會每年一度的更新，但涉及全國領導的結構和任務方面，還沒有明確的規定。

在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時，一個「三人委員會」（三頭馬車）在中共中央實現：陳獨秀（書記）、張國燾（組織）、李達（宣傳）；由比較靈活，不拘形式，重視宣傳，而非活動分子的小集團圍繞着這個「三人委員會」。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1922年7月間召開），選舉的領導有五位：陳獨秀、張國燾、李守常、蔡和森、高君宇。實際上，中共常務領導是由五人之中的三位執行，即陳獨秀（總書記）、張國燾（工人運動），和蔡和森（出版）；李守常忙於北方重要職務；高君宇基本上是參與《嚮導》的編輯部。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在1923年6月召開，通過了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新路線，即中共黨員大批參加國民黨。它撤銷了張國燾的領導職務；而另一方面，讓最熱中於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支助者，特別是瞿秋白和毛澤東，進入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包括陳獨秀、蔡和森、李守常、譚平山、瞿秋白、毛澤東，而王荷波、羅章龍為候補委員。李守常和譚平山，前者在北京，後者在廣州，都在國民黨內負責第一手職務，當然中共領導的具體參與極有限。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實際上只有居留上海的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和毛澤東。

「中央」這個名詞也由此而來。在當時是指黨的全國領導，但由於它的輪廓不清楚，而產生模糊不清，有伸縮性的涵義。不但在建黨初期如此，即使以後長期中共領導結構更為牢固，更為有階層性，「中央」指的不但是中央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甚至黨中央執委書

記處。「中央」一詞的濫用，到達登峰造極的，就是指定「文化大革命的中央小集團」為「中央」（1966年），以至成為毛澤東在他統治的最後時期獨佔的「中央」。

根據我當時對於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後了解的情況，不但中央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且差不多沒有結構性的存在，比如像地址，而且內部組織也沒有實質的結構形式。「中央」會議的召開，有時在某人住處，有時在另一人住處；比較經常是在蔡和森或瞿秋白的住處。

《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委員會沒有正式成立，而《嚮導》至少在形式上沒有編輯委員會。陳獨秀是主持人，而蔡和森是編輯部的秘書，在他周圍有數位同志給予經常的合作，其中特別是高君宇、羅章龍、陳惟仁、劉仁靜和任卓宣。除了高君宇常住上海，任卓宣是巴黎的通訊員，其他三位都常住北京。

當人們就今觀察「中央」職務分配，得到的也是模糊不清的感覺。的確，在蔡和森和瞿秋白之間，黨刊物出版方面實際上有一定的分工。瞿秋白是《新青年》編輯的主持人，而蔡和森是《嚮導》出版的總辦。《嚮導》的出版佔據蔡和森差不多全部時間，而《新青年》因是季刊，對瞿秋白來說，留有充裕時間來和莫斯科特派人員和代表進行經常的聯繫。在組織方面，雖然指名託付毛澤東處理，但他全部精力投入在上海國民黨的職務，當然在黨組織上就無能為力了。

中共黨「中央」在它最初幾年內，能夠保持繼續性和穩定，無疑的是由於陳獨秀的個人威信。作為黨總書記，他監督宣傳部門，同時又是黨出版刊物最勤奮的供稿人；他與省城和國外幹部和黨員維持聯繫，他就是黨四面八方轉盤的軸心。在多種壓力下，他也不能把所有的任務完滿實現。在這種情況中，如果有一種較重要的事件發生，陳獨秀召集同志，盡可能解決問題。可是不能想像每次中央會議必有記錄存檔，這就是我從莫斯科剛回國時所能知曉的有關「中央」的情形。這種情形使我

擔憂，不得不思考「中央」整體行政職權的問題。由於我已經加入裏面，更為如此。

在 1925 年 2 月初，在第四屆中央初次常務委員會上，我就開門見山地提出這個問題，會上有陳獨秀、蔡和森和剛從廣東返滬的瞿秋白，唯一缺席的是，還在北方即將回上海的張國燾。

首先對「中央」行使職務，說了一些話之後，我即時提出幾點建議，使得它更合理和更嚴格化，而我是以老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原則作為規範。我建議的第一個規則是避免職務的重疊。最顯著的例子是毛澤東，由「中央」指定負責黨的「組織」，同時他在上海國民黨的宣傳部負責「宣傳」部的職務，由於在國民黨內授予他的職務的要求，結果他很少時間參與中共黨「中央」的會議，更難直接參加黨的「組織」部範圍內的工作。我的第二點建議，有關「中央」具體存在。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中央」的固定駐地，以及一個秘書處，來處理集合通訊，文件檔案，並完成一些實際任務（如印刷、中委內部聯繫等）。我的第三個建議，是在中央常委同志間建立某種分工合作，即創立兩個區別分明的部門：宣傳和組織。我特別強調馬上成立一個組織處，保持與國內各地支部和團體經常聯繫，對它們的活動加以整合梳理。同時它必須能夠解決日常的組織問題。在遇到超越日常活動範圍，並涉及重要政治問題時，當然，必須提到常委會或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商討解決。在中央「宣傳」方面，依我看來，不僅限於按時出版黨的刊物，但也要擔負對革命積極分子的訓練任務，而且必須完成對更廣大公眾的宣傳工作。在日常任務內包括有系統地收集不可或缺的資料，以便同志們對某現實問題或總體性的政治問題，寫作論文時能及時在場作參考用。

這些只是常識性的建議，今天來看極為平常，而無需特別贅言。尤其有鑒於在「社會主義」國家高度官僚化的共黨結構的複雜性，「中央」的同志，通過這些建議，認為是明智的，立刻指定兩部門的負責人。授

予張國燾成立「組織」部的任務，而我則擔負「宣傳」部的職責，陳獨秀以總書記名份監督一切。

宣傳方面隨即開始，我集合蔡和森和瞿秋白在宣傳委員會，鄭超麟本來已屬於黨報的編輯室，由我贊助正式指定為宣傳書記處的負責人。他的確是一位有力的合作者，除了他無比的翻譯（俄、法、德、英）文件的能力，他也以明晰的中文，印成可依據的文章。我們同時添了一位專門作日常採集資料、剪報諸事的同志。因此，在 1925 年初，可說中央宣傳部門已存在一個在一定範圍內完全自主的機構。

當然必須指出，在宣傳方面已慢了一步，是受益於特別情況：在此之前已存在一個由蔡和森、鄭超麟和我組成的非正式班子，而且已經歷了六個月的考驗。但是，我們所居住的房子已經不夠用了。尤其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來安置各方面的需要。這間屋子另有一個更嚴重的缺點，就是它為多方面所知曉，連對我們最嫉恨的國民黨極右派人士都有所知。我們馬上在市內找尋一個比較寬大的屋子。在 1925 年 2 月初，我們離開租界，搬到閘北福山路仁原里一間二層樓房內；樓下全部作為宣傳部各處集體使用，其他空餘房間在我們之間分配。蔡和森、向警予夫婦住在二樓，我住在一樓，鄭超麟住在一樓亭子間；上面二樓的亭子間由我們僱的傭人住，專管這個小團體的膳食和清潔。

就在這裏，中央宣傳部一直留到 1927 年，它成為上海春季暴動的中心。

工人運動昂起頭來

黨政治路線自全國四次代表大會前後的重整，中止其力量全部注入國民黨，轉而集中於工人運動，使之產生新的活力。這一條政治路線很快產生效果。

正當 1923 年二·七槍殺鐵路工人慘案的二週年紀念，我們採取了兩

個步驟。一是由中國鐵路總工會剛恢復組織以後，在鄭州，它的發生地召集紀念大會；另一是由黨宣傳部出版《嚮導》「二·七」專刊，這時我已擔任《嚮導》總編輯。1924年「二·七」一週年，河南的同志在鄭州召開秘密會議，目的是重組由吳佩孚軍隊解散的鐵路總工會。特別是在1923年2月被捕的鐵路工會領袖釋放之後，鐵路工會已在十多條鐵路線上重新成立工會支部。正在這個工會恢復活動的出發點，由我黨支持鼓勵，鐵路全國總工會（北方）的原來領袖和幹部，發起召集這次在鄭州的全國會議，表徵兩年前被北方軍閥扼殺的工會的起死回生。

關於第二個步驟，其動機是為了澄清我們對這首次重大工人鬥爭的立場，並且面對正在展示的工人運動的新形勢，作出重新評價。因為我不止一次聽到對於1923年2月運動領袖的嚴厲批判和尖刻責備，很多來自不曾遭到這一悲劇直接後果的同志。

《嚮導》「二·七」專刊專為評論和分析這一事件有三篇文章，次序如下：（1）「二·七」鬥爭的意義與教訓（述之）、（2）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工人力量（獨秀）、（3）1923年的「二·七」與1925年的「二·七」（秋白）。

在第一篇文中，我直截了當地認為，1923年的「二·七」鬥爭是中國革命無產階級偉大的跨入（歷史）舞台；我特別指出，由於他們在鬥爭中凝聚的戰鬥示範和堅決一致，他們的大義為民，以及在湖北、上海等地激起工人階級的團結信心，京漢鐵路工人無比鮮明表現了中國年輕的無產階級卓越的革命氣質，預示了在未來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而繼之，它成為世界革命洪流的一條支流。

根據這一線索，雖然它失敗了，我極為熱心地為它辯護，對事後責備鐵路工會領袖沒有及時阻止在路工間充滿「原始野蠻力量」的過激舉動，沒有與敵對勢力達成妥協，即與湖北軍閥蕭耀南達成妥協。提起列寧和普列哈諾夫對於1905年彼得格勒暴動的爭議，我重敘列寧的辯言，

說在階級鬥爭發展的某一階段，暴力不可避免，運動領導唯一正確的政策，是以革命進攻向前進，而不是向後退和投降，即使代價是血……正由於鐵路工人在各種敵人（帝國主義、軍閥、他們的間諜和守門犬）的聯盟的特別殘酷的壓迫下，由於雙方鬥爭的極為緊張嚴重，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昂着頭，戰鬥到底。而且無論如何，他們對肉體殘忍的「清除」，是由蕭耀南之流預謀了的，正因此，運動的領袖再沒有理由將基層最後一戰的決心加以扼止……。

我並沒有忘記這一英勇鬥爭的有限性和失敗的原因，主要如下：（1）沒有充份加強工會支部下層群眾的訓練和組織，幫助他們排除不能自制的原始性的盲動，令他們在鎮壓後失去方向；（2）中國共產黨還在形成階段，在工人黨和工人群眾之間的真正聯繫頗少；（3）當時工人對吳佩孚誇耀的所謂「工人保護法」的幻想，使這軍閥的醜惡面目模糊不清。

獨秀的文章比較短，但由於觀點清楚，對中國工人階級判斷的堅決，特別精彩；它是不一為二的革命階段，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而是一個最近歷史事件多次驗證的實在；不管它結果是勝利或失敗，正如 1923 年「二·七」鬥爭所顯示，它堅決不退後，不與敵人妥協。

它不但在心理上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從來拒絕受賄（受惠），它又是客觀上有決定性的革命力量，因為它掌握國家經濟有活力的部門的操作：交通（連軍隊調動在內）、礦產等等。它的動態關係整個社會，國民革命沒有它的參與絕不能實現。

獨秀的結論是說，由於這些原因，國民革命的敵人們，對它特別重擊猛攻，絕不惜於對工人運動和維護它的政黨加以無情的鎮壓。

甚至瞿秋白，雖然是黨內右傾的主要人物，也完全改變了立場，在寫 1923 年「二·七」紀念文中，強調工人階級參與的重要性，在過去是如此，而且在未來國民革命中依然有超越的作用。

《嚮導》這一期「二·七」紀念專刊表徵了黨的新的中央小組對戰

略方針這個最關鍵問題上取得一致，這給予全心全意為啟動工人運動而深入工人鬥爭的同志是無比的鼓舞，吹響了未來鬥爭的號角。的確，正值《嚮導》「二·七」專刊剛出版之際，在上海小沙渡的紗廠裏新的戰鬥發生了。

在2月初，日本 Naga Wata Kaisha（內外棉株式會社，又稱：內外棉紗廠）經營的第八紗廠，突然解僱一批成年工，由未成年女孩、養成工代替。紗廠工人立即反彈；他們與被解僱工人一致全部停工。他們的榜樣引致屬於這公司在小沙渡設的十多間紗廠差不多全體男女工停工。1925年2月9日，有二萬工人罷工。12日，罷工潮波及小沙渡、曹家渡其他日本紗廠，波及滬西郊區、楊樹浦；上海日本紡織工業四萬男女工人參與罷工。

這次的爆發明顯是自發性的，表面上是由於日本紗廠老闆的武斷和不公道激起。他們的專斷和不人道的作風，老早就引起男女工人們的怨恨。但是，表面是有誤導性的，事實上這一罷工潮——特別是小沙渡，是成立地下「工人俱樂部」以來，同志們多月來耐心工作的成果。「工人俱樂部」已團聚了數以百計的活動分子在各紗廠內。其中有剛加入共青團或共黨的同志，特別是劉華，堅毅地，日以繼夜地與新的工人同志站在一起，這一「自發性」的行動，只是表現他們階級覺悟的成熟。

這一「聯合罷工」，有這樣的聲勢和強勁，是有兩個系列的事實為線索：（1）上海日本紗廠老闆的霸權和過度剝削；（2）這一罷工在政治上和組織有所預先準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乘歐洲競爭者暫時退出中國，同時中國紡織工業一度興起，日本資本家在中國紡織方面得以佔據第一位。但日本棉紡業遠遠超過中國工業家辦的企業，更強大和更有效率。雖然中國紡織業有70到80間廠家，而日本資本有四十家，但日本紗廠僱用了全部勞力的一半。這些紗廠規模很大，設備最新穎，而獨佔資本式的經營，比

如，Naga Wata Kaisha 在日本、上海、青島都有紗廠，僅僅在上海就擁有十五家棉織廠，其中十一家集中在小沙渡，還有十二家日本紗廠分散在上海九區，小沙渡事實上是上海日本紡織業的一大中心。

日本工廠的工資與中國工廠的工資相差不遠，都是非常低廉，少得可憐。工資最低的是童工，每日不到十個銅元，最高的成年工資也不過每月十五、十六元。機器二十四小時運轉，工作每日分兩班（日班與夜班），十二小時一班。但日廠老闆並不滿意，找到藉口克扣工資，稱所謂「積蓄金」，而工人根本無從找到償還，為了預防糾紛，廠方建立一種制度：「養成工」，派「招募員」到鄉下，搜尋十二至十四歲的孩童，或以拐騙，或給孩子父母少許金錢，把這些召來孩童擠在不如豬棚的小屋裏，每間二、三十人，供應最低限度的食物，只夠恢復勞力。這樣做成年人一樣的長時間的勞工，而等到他們的效率達到水平，就直接代替成年勞工，後者也馬上被辭退，毫不猶疑。

在廠房內，工頭有權懲罰「犯錯」的工人，甚至可以動用體刑。這就是在日本紗廠工人平時遭受的「制度」，可以想像一種反逆情勢，在這成千被羞辱的工人心裏不斷積累和膨脹。可是，每次這種反抗爆發，總是最兇猛的手段壓制下來，而今天，情形有基本的變化。

「工人俱樂部」的存在，和在各紗廠活動分子組成的聯繫，像蜘蛛網一樣，把消息很快在成千上萬的工人之間傳遞，在 Naga Wata Kaisha 第八廠的罷工一爆發，「工人俱樂部」即動員發動屬於這一公司的其他紗廠。劉華親自到「中央」報告形勢，我們立刻決定劉華、李立三和鄧中夏三位同志（鄧中夏剛從鄭州回到上海），在罷工紗廠當場與「工人俱樂部」的活動分子一起成立一個雛形的「罷工委員會」，來保證運動的協調。另一方面，我們讓「罷工委員會」支配我們的同志，特別是上海大學的同志；因為李立三和鄧中夏不便在小沙渡經常出場。

2月9日，日本 Naga Wata Kaisha 第八紗廠「聯合罷工」爆發後，

我們的目標，也是「罷工委員會」的目標，是使這一罷工擴展到小沙渡所有日本紗廠、罷工工人代表從一工廠到另一工廠、號召工人一致行動起來、在四十八小時內，讓小沙渡所有日本紗廠全部罷工，必須把運動組織起來，向廠方提出要求。

小沙渡地屬上海公共租界，每當罷工工人召集大會，租界市政府（工部局），與日本紗廠主暗中有約，橫蠻地打散集合的工人。在這情況下，罷工委員會招呼罷工工人到蘇州河對岸，即在中國地界集合，由當場形成的罷工糾察隊保護大會，罷工工人開始是成千成百地來到會場，很快就是上萬人集在會場了。這些會每天開，「工人俱樂部」的活動分子講話，解說這一行動的意義，而且利用這一機會號召所有工人組織各廠的工會。於是，罷工工人各自集合到本廠，商議這一建議，不到一星期，在小沙渡十多間紗廠裏建立了工會。在廠間有工會小組開始活動，罷工糾察隊不但行使保護會議的任務，而且在每一工廠事實上執行工會領導的作用，而正是通過這些工會的名義才向日本廠家提出集體的要求。從小沙渡，罷工潮波及到曹家渡和楊樹浦。1925年2月中，這一工潮蔓延到上海日本棉織業的80-90%。

面臨工人力量這一示威行動，日本廠主措手不及，無法對工人行使直接的威嚇和鎮壓，尤其由於公共租界的警察在法律上無權干預在中國地區集合的罷工工人。日本的工商界為驚恐所震撼，Naga Wata Kaisha總公司派了由總經理率領的一個小組，到上海探求解決的線索，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啟動軍事和外交的手段，在黃浦江邊集合戰艦，採取威嚇的姿態。它由日本駐北京大使館通知段祺瑞政府，即令上海中國地帶的當局對罷工工人實行鎮壓。可是奉天軍隊佔領上海時日很短，不能掌握局勢，也不能施行法令；再說，段祺瑞在馮玉祥的將軍們嚴密的監視下，也不能為所欲為。如果日本人員在上海登陸也會激起英美大國態度更強硬，它不得不謹慎處理，只能發發恐嚇語言，向上海中國地界當局施加

壓力，禁止罷工工人集合開會。即在這一方面也受遏制，罷工工人在人數上大大超過中國的警察和憲兵，向他們宣佈愛國精神，使他們不得不心有所動，不但不去干預工人群眾，反而以旁觀者自居。日本帝國主義，多方謀術受阻，在上海它控制的報刊上撐起布爾什維克黨支持的「紅色鼓動」大旗，以便在外借喻公開散佈恐懼不安。英美帝國主義者反應軟弱，絕對避免被牽入這一泥沼，失去他們有益的陣營（或地盤）。最後，日本紗廠老闆退一步，卻不理紗廠罷工工會提出的要求，而另外提出一個反面的解決方案，當然僵下來了；作為最後一張底牌，他們要求上海總商會作為仲介人，並作了一些次要的讓步。

我們當然了解到罷工工人不能再長久堅持，而他們已在實際上爭得組織工會的權利，並可直接與廠方交涉。因此，我們向罷工委員會建議，接受由上海總商會仲裁得出的妥協條件，如下：（1）正式禁止對工人的體罰；（2）根據工作勤奮為準，增加工資；（3）沒有理由不可解僱；（4）廠方退還欠工人的積蓄金（這只是虛文，從來沒有實行）。這一合約由廠方和工會在1925年2月25日簽字，終止了這一日本紗廠才維持五天有餘的大罷工。

在整個罷工期間，黨居留上海的中央常務委員每天召集會議，傾聽罷工委員會同志的報告，或是劉華或李立三或鄧中夏，他們告知運動進行狀況，以便大家根據實際情形作出應對路線。這些會議很短促，沒有漫長的論說，因為必須在問題出現過程中簡短地迎刃而解。事實上，在黨第四次大會前成立的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已不存在：項得龍已去北方參加2月初在鄭州召開的鐵路工會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李啟漢去了香港，以增強南方工人運動。因此，這次是由罷工委員會與黨中央直接聯繫。雖然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人員曾在小沙渡上陣（可能被看作罷工的外界的人物空降的假象），但根據運動的總方向而由這些「中央」會議得出的決議，是由罷工委員會的同志傳達給罷工工人，得到全部罷工工人

的支持和推行，只是在這種名義下我們可認為在政治上和實際上領導了這一次罷工，尤其是劉華已成為小沙渡工人眾望所歸的領袖，而且李立三也在召集中國地界罷工工人大會，被接受為他們中的一員。

如此深入參與一場氣勢浩蕩的工人鬥爭，完全符合我們在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新的政治方針。我們因此獲得了重大的成果，這是第一次在罷工的過程中，我們在上海創建真正的聯合工人的工會，而且將傳佈於各區工廠，在鬥爭的火焰中泛起數百工人戰士和幹部：他們是上海革命無產階級的骨幹，準備未來浩大的戰鬥。這一場罷工在組織上和紀律上，對 1925 年 4 月間在青島日本紗廠的罷工起了示範作用，尤其它成為 1925 年五卅運動的導火線。

對我個人來說，看到我們堅持不懈地爭取以工人運動為主軸的方針，在事實上得到初步的實現，是又驚又喜，特別覺察到工人階級真實力量的體現的強大，可是，經過多年來不斷艱苦奮鬥，和近數月來的過度辛勞，我已精疲力竭，一個嚴寒的日子，我不慎洗了一個冷水澡，於是發燒日夜不止，令我疲弱不堪，在日本紗廠罷工的高潮時，我還多少能夠參加「中央」所有的會議，完成我的任務，但我的精力一日比一日低落。在高燒還沒有轉化成肺炎而必須住院之前，我還有機會連絡我黨與日本共黨從東京派來的同志，表示日黨對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獨霸資本案與我們立場一致。

這位日本同志就是我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多次遇到的 Sano Manabu，他到虹口區一家旅店下榻，就是上海北面經常有日本籍人士居住的地區，我帶病來看他，馬上他告知日本情況，已有經濟衰落跡象，尤其在紡織業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場罷工大大加深局勢嚴重，在日本工業界引起嚴重的不安，因為它是在日本紡織工業特別不利的綜合形勢下爆發的。

他說，Naga Wata Kaisha 是屬 Sanyo（三洋）集團的財霸（Zaibazi）

之一，是屬於日本最強大集團之一，至於日本共產黨，很願意與中央討論，來達到一個共同鬥爭的確定方針，我也告訴他，最近罷工發展及我黨分析目前情勢，認為對工人鼓動有利，因為中國和日本紗廠目前競爭很嚴重，而日本資方不能隨意關閉工廠，反而極力剝削中國勞工，甚至吞併效率低的中國人辦的紗廠（已經有兩個中營紗廠被日本公司吞併）。Sano Manabu 以國際主義觀點來作答，我們非常接近。為了繼續我們互相交換意見，更加豐富各自見解，我邀請他在《嚮導》寫文章。數日後，他把應允之文交我，題目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工人」（在《嚮導》1925年2月28日一零四期發表），文中嚴厲指斥日帝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的侵略，對中國無產者過度剝削，像在它的殖民地（朝鮮、台灣）一樣，也同樣對日本本國的無產階級過度剝削一樣。他觀察到正在上海日本紗廠發生的罷工運動的嶄新意義，它不但表現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深度，而且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環節。他強調中國工人階級，為了抵抗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只有走向真正的階級鬥爭才能走向勝利，而這次的罷工是未來戰鬥的前奏。他說，要把罷工組織好就需創建工人工會，因此希望中國工人有鑒於這次罷工經驗，不錯過良機建立起長期性的戰士的工會（這也是我們的意願）。最後他認為中國和日本的無產者應該連絡和團結一致，因為都屬於同樣的被剝削階級，如果在目前考慮在日本發動一個同樣的，支持中國罷工工人的運動還不成熟，但必須加強直接聯繫，這是日本共產黨政治上支持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一次行動，是遠遠不可忽視的。可惜，我不久就因病進醫院治療，不再有機會同 Sano Manabu 同志繼續聯繫，而他也可能在我們晤面之後不久離開上海。

1925年3月初，在精力竭盡狀況下，我被送到寶隆醫院，不但我的喉管炎變成氣管炎，另外，在莫斯科歸來頸上生的有肺結核的小瘤，突然腫起來，而且發生潰爛。寶隆醫院是德國人開的，一般是接納上海的

「窮人」；醫院建在兩條路角上，它的窗戶開向跑馬場，向着南京路，新世界劇場就在附近。

我被安置在一間三等房，內有十多個床位，住院每日只需三十個銅板，的確是很少，就是在當時也太便宜。正因此，不但是醫生就連看護也對病人不屑一顧，每日飯食難飽，為了避免因飯食不足而餓死，我即請一位醫院侍候小夥子，每天中午到隣近飯店買一碗含有蔬菜和少許肉粒的湯補充營養。總算把我從氣管炎的惡勢下拯救出來，醫生為了慎重起見，認為要醫治頸上的瘤，即以 X 光，再以外科手術根除之。這樣一來，便成為長久醫治，使我不得不住院幾個月……。

住院初期，疾病重擊之下，多少天我在昏迷不清的狀態裏渡過。在徘徊於生死之間朦朧地帶，我不能覺察世界上發生的任何有意識的事件，即連孫中山去世（1925 年 3 月）在我空洞的心靈意識屏幕上，也沒有留下痕跡。1925 年 3 月到 4 月間，我便處於這種迷糊不醒的境界，到 5 月初才慢慢甦醒過來……。

在神志漸漸甦醒之際，雖然體力仍很弱，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一切事物。我極痛心地意識到我這時抱病在床，衰弱癱瘓，而外面時間在加速行進步伐，尤其是在大街上，在工人境界裏，我了解到我掉進自己的疏忽，我的清教徒式的作風的陷阱。否則，我如果比較靈活選擇一個水準較高的醫院（我並不缺少資金），我的病可能恢復快得多……。那麼，在等待痊癒出院時，我只得閱讀從國外翻譯的小說來消遣，像狄更斯、亞杜馬（小仲馬）或雨果的小說等（在醫院圖書館可找到），一旦我有足夠精力關心政治新聞，我便急切投入報刊閱讀。好在病房侍候小夥子樂意給我去買上海出的每日大報。

鄭超麟每兩日來醫院，如果有特別事件，每天來訪，告知當時新聞和黨務。他靠近我低聲說話，在病房是無人注意我們，也許這是進德國醫院的優越條件；它的行政機構並不特別關心病人的政治輪廓，不像上

海其他英美或中國醫院。如此我才知道全國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已於1925年5月初在廣州召開。這個會議是在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決定的，當時的考慮是由三大工人組織出面召開。這三大組織已經有相當堅實的基礎，鐵路工人全國總工會，安源煤礦工人工會，香港海員工會。這三個組織是當時中國戰鬥工會的棟樑。

記得1922年5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的勞動書記處，自1923年2月7日罷工鎮壓後就不存在了。上海1925年2月日本紗廠罷工時成立的工會無疑地充份加強新生的工人運動，再次，在廣東中共黨委直接影響下，廣州工人集團聯合會開始成形，參加勞工大會的組織。對這次大會召開始末雖不作詳細敘述，就可首先注視到的是由大會參加代表們通過的政治決議，基本上符合我黨1925年1月結束的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方針，特別是強調在國民革命中工人階級的作用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關於經濟要求和組織方面的決議，是根據有些比較有工會經驗的蘇聯同志的協助所作出的方案。這次大會將值得大大提起的是出現了中國工會運動真正的全國領導，選進全國總工會的中央執行委員二十五人中，有二十人是在中國工人運動中成為全國領袖的中共黨員。其中首先可提的是蘇兆徵和林偉民，香港海員工會領袖。劉華、李立三、鄧中夏代表上海工人運動，項英和劉海波代表武漢的工人運動，劉少奇和郭亮代表湖南工人運動，還有劉文松是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書記等等。林偉民，原來是國民黨員正要加入共黨，被選為全國總工會中央委員主席，鄧中夏為書記，李森（李啟漢）負責組織，正是這個班子在1925年6月底省港（香港、廣州）總罷工的發動和組織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

1925年4月末5月初，上海形勢加速演變，這是我特別注視的焦點，自從日本紗廠罷工以來，這些工廠的工人的戰鬥精神不斷上昇，不但在上海而且在青島。由於上海的示範，青島數家日本棉織廠工人在4月19日發動聯合罷工，其動機與上海罷工工人相同：過度剝削、虐待、體罰

等等，青島的罷工集合數千工人，罷工堅持二十多天，終於獲得組織工會權利並逼迫日本廠主作一些讓步。青島紗廠工人這一新的勝利使得日本帝國主義怒不可遏，決心報復。這一罷工潮剛結束，日本廠主發動進攻：它否認昨日與紗廠工會簽定的妥協條件，不斷生事搗亂。在青島它用軍閥張宗昌的軍隊來擊毀紗廠工人的工會場址，不分皂白槍殺團聚的一群工人，造成八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日帝這一強暴行徑，由其在青島的幫兇執行，同時在小沙渡日本紗廠也主動反擊，他們的打手攻擊工人活動分子，並聲言要懲罰工會成員等，目的是殲滅工會組織。

1925年5月15日，在Naga Wata Kaisha（內外棉株式會社）第七廠，日本工頭對着剛被解僱而要求團結權利的工會分子直接開槍。其中一工人顧正紅被擊當場死亡。全廠工人激動起來，重整旗鼓，又開始罷工，日本帝國主義得到公共租界當局的支持，決心打斷工人組織的腰腿。可是他們沒有想到這一措施會撲空；工會支部份佈在所有日本紗廠內，而工人們無比堅決地和他們最兇殘的外國僱主作合法的鬥爭。

當然我黨完全站在工人那邊，極盡全力去支持他們。於是我黨以及共青團的活動分子，包括上海大學及其他大中學校的多數團員，他們分小隊上街，向大眾解釋這個事件的原因和意義，以便取得他們的同情和支助，他們就這樣贏得一般勞動者、工匠和小商人的理解，而且還得到某些資產階級分子的理解，因為不但受到日本廠家的競爭，而且從1925年6月2日起，他們在公共租界頒佈的法令下，必須增納新聞紙稅，港口稅和股票市場註冊金。這場罷工潮不僅是為了顧正紅的被槍殺，同時抗議公共租界當局霸道的By-Laws（法規）。

工人與學生既然表現堅決，以團結運動來對抗新的帝國主義攻勢，公共租界當局顯出大棒頭來，以軍警攻打和逮捕在平民區街頭作宣傳或散傳單的同志，把他們投入監獄，交給公共租界法庭審判。但是，數以百計的年輕同志繼續不斷地不顧風雨走上街頭，相反地，他們的人數愈

來愈多，氣氛益發緊張。

南京路的槍殺和上海全面總罷工

1925年5月30日，時在下午，如往常我躺在病房床上，突然間我聽到窗外跑馬場那邊從南京路傳來陣陣的槍聲。幾位年青看護衝進病房，神情激動，喊道：「印度警察 siks（印捕）向老閘捕房聚集的群眾開槍！」然後衝出房間。回房時又帶來其他消息：有很多群眾傷亡；「商人自衛隊的國際縱隊」（主要由英美人和日人組合），全身武裝，手持機關槍，在街上示威，向任何可疑的人物射擊……，恐怖，道地白色恐怖籠罩了上海最熱鬧的地區。

第二天鄭超麟把我用黃包車載到黨中央執委召集的特別會議時，才對這一事件更清楚了解。自從進醫院後這是我第一次出席會議，這次會議明顯的要對當前嚴重局勢提出一條應對路線，應對上海帝國主義者聯合反擊新生工人運動和激進青年的路線。現在帝國主義者不顧一切，竟然動武把任何企圖集會和有民族要求的行動，壓倒在血泊中。我們在閘北一角下車，走進一個弄堂底一間一樓一底的小屋，這裏是上海工人運動幹部的秘密聯絡處，張國燾和其妻楊子烈，1925年3月間從北方回滬，就在這裏住宿。我們的中央執委全部出席：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和我，再加上李立三。李對昨日發生的事變做熱線報道。

由此我知道5月30日早晨有數百學生在新世界劇院附近示威，公共租界警察行動抓了上百學生。下午三時半左右，數千人群集合在老閘捕房，要求釋放監禁在捕房內的同志，因而堵塞了南京路的交通。一個英國警官發出一槍，接着是在崗位上的印度警察們開槍。這場槍擊案的結果是十三人死亡，其中有一位上海大學的佼佼者何秉宜，多人受傷，加上又一次逮捕，受難者主要是中國青年人，有學生，還有傭工和練習工。這場帝國主義在城市中心地帶的暴行，令全上海各區居民人心激盪。

針對局勢的爆炸性，我們必須當即採取對策。我們是否能夠發動和組織一次大規模的運動，來引導血腥鎮壓所引發的民眾憤怒浪潮？這是我們思考的一大問題，因此，我們的基本考慮是在上海各不同社會團體間，當時力量對比作出評價。我們意識到在上海不存在一個工人運動的中心組織，我們只有依靠我們自身的力量（黨團分子）以及小沙渡和楊樹浦紗廠的影響，再有南洋煙草公司的工人，和最近獲取的英美煙草公司及市區鐵道工人間的影響。我們知道有數萬小沙渡日本紗廠工人，特別堅決地準備投入戰鬥。在這火熱的氣氛下，連為數眾多的商賈也有意參加罷工運動，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認為已有相當的槓桿容我們擔起發動全市層面一個總體行動，在這一點我們之間沒有不同意見，於是我們通過一項決議，在學生界，商界和勞動界三大層面發動總罷工，我們設想這運動有秩序無誤地發動起來，我們有理由相信一旦發動，這一場總罷工就會很快促引一個真正的上海全市工會聯合會的誕生。這正是我們極需達到的主要目標之一。

會議完後我不得不返回醫院，但自此我熱切追隨來日所有新事件的發展。鄭超麟，身為消息傳遞者，相當活動，左來右往，對我有很大幫助。他每日帶來在市區最新消息，詳細告訴我總罷工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這樣一件巨大的行動，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和決定性力量匯合一起，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帝國主義者在完成了5月30日南京路的槍殺之後更加猖狂。他們的「商人自衛隊」全副武裝，在熱鬧市區，對路人和居民亂發槍彈，施行恐嚇。英國、美國、日本的軍艦緊擠在黃浦江上，帶機槍的海員不但在公共租界內橫行霸道，甚至衝進中國地帶，用槍亂射民眾，造成破壞和打傷路人。英國海員衝進上海大學，趕走學生，佔領校舍，肆無忌憚，沒收所有的檔案文件……，在上海其他大學也發生同樣的事件……，在南京路上形成一條保險帶，在新世界周圍發佈戒嚴令。

面臨帝國主義大力施壓，工人學生積極分子並不退卻，一群一群的宣傳員像潮水一樣不斷湧上街頭，散佈傳單，高聲演說，對着槍擊與追捕，呼籲群眾組織起來，對在我們自己國家內肆虐的帝國主義者作全面的對抗。

五卅慘案的經過我並不想在這裏詳述，而是試着透視對這一事件鮮為人知的內在線索，以及由這巨大震動凸顯出覺醒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較量。

爭取上海小商人，手工業者甚至某些企業家群體的同情和了解還是相當容易的事。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兇暴，他們的民族尊嚴受到深深傷害而引起了憤懣；但要想說服他們加入聯合一致的抗議和示威行動，要他們停止所有經濟活動，是一件困難的事。這一行動最大的障礙，來自強大的上海華人總商會。這一組織操縱了除外國集團以外的市區內，和商會上所有經濟的來龍去脈，由商賈和買辦的大資產階級控制左右的總商會，在共和國成立以來不止一次背叛出賣民族國家的利益。但如要使全市總罷工有實效，非有它的參與或至少友善的中立不可。在上海馬路聯合會的急進商人（其中最有力量的是一些多少同情我黨的出版商，例如泰東書局老闆趙南公）的壓力下，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們才答應參加上海馬路聯合會在天后宮、上海總商會會址召集的大會，日期是 1925 年 5 月 31 日，會上立即提出發起全面罷市的口號。然而，可預期的事出現了；總商會主席虞洽卿沒有出席，其他在座的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找種種藉口避開對此作決定。然而，有相當可觀數目的商賈是自願參加行動。他們的最有口才的代表人趙南公的熱烈發言，相當有力地令大會參加者的對抗決心越加堅強。同時，在會場外集合的一二千工人學生，聽見我黨的呼籲，表達他們的要求，總罷工令立即發動，不可延緩。所以是在場內大多數商人（聲稱不達目的不離會場），及場外馬路上的示威工人學生群，兩種壓力下，總商會領導層才勉強下令，發動全上海總罷市。自

1925年6月1日開始，罷市正式開始是6月3日，包括各大銀行，是空前的。至於罷課方面，與罷市同時展開到所有大中學校，甚至是在上海教會學校中，以親西洋著稱的聖約翰大學也罷課了。

在工人方面，情況比較複雜。當時並無一個有權威性的統一組織來發動這樣大規模的罷工。的確，在大部份日本紗廠罷工運動已開始，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也罷了工，但這行動有一定限度，可是，對於分佈在上百家企業的成千上萬的勞動者，我們毫無把握，斟酌之餘，還是有可能發起一個「上海工會聯合總會」，由已組成的工會做發起單位，共有十五個工會，主要在紡織業，為達此目的，工會的活動分子，加上學界的積極分子，組織小組，走向工廠，電車停車廠、發電廠等等……。這一嘗試動員工人行動起來的遊說活動得到超越意想的反應，正由於全市罷市罷課已經開始，因此，1925年6月初數日內，全面總罷工在上海經濟界實現了。

工人罷工是自發性的，沒有一個中心機構正式發出號召，現在最緊迫的是到處組成企業工會，把罷工行動推向前，不能退下來。當時面臨困難是在當時罷工工人中，找不到能夠寫決議或公告的，即能夠擔任宣傳和其他工會書信聯絡的起碼任務的工人同志。最後，還是由我們學生同志，尤其是上海大學的同志，日以繼夜地動員起來，到工廠去完成這類任務，幫助罷工工人組織起來，不到一星期，在上海有一百八十到二百家企業工廠成立工會，由這些工會正式選出代表參加上海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一個有代表性的真正工人組織，即由這工會聯合會選舉的執行委員會作為領導。李立三和劉華被選為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上海工會聯合會組織上海的罷工行動，同其他五卅運動的組織站在同一戰線上。

上海出現一個工人階級的運動給它以新的活力，更加堅強，也給工、商、學三大主力的聯盟予以合法性，由我黨通過新成立的總工會及上海

學生聯合會的鼓動，再由於上海馬路聯合會的加入，於是宣佈成立工商學聯合委員會，這樣首次出現一個運動統一的「指揮部」，至於上海總商會，完全處於局外，毫無聯繫。

帝國主義者對上海民眾極度鄙視，認為可以依靠軍事力量壓制下去；在租界宣佈戒嚴令，在黃浦江上集合戰艦，由數千全副武裝的海軍防守上海，準備發動戰爭，警備力量和「商人自衛隊」分佈全市，不斷製造事件，不斷發生槍擊和逮捕，佔領市內大中學校等等……。6月初民間受害者人數不斷增加，但這一切都無法阻止這一運動，仰起頭來，挺起腰來向鎮壓和壓迫的力量猛進，上海全市變成一大戰場，大批民眾與帝國主義者面對面在各種形式下碰撞。

6月10日左右，除了小部份中國企業以外，上海經濟各緊要部門全被罷工癱瘓了。罷工潮波及到外國公司的僱員和外國私人僱傭工，運動的指揮部下令全面封鎖埋伏着帝國主義軍警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工會組織糾察隊分佈在蘇州河沿岸，盡力阻擋由中國地帶的物資輸入帝國主義者盤據的地域。上海外國報紙發出對輿論的警號，稱（供應外籍人口）的生活必需品，如牛奶、牛肉、新鮮蔬果等開始短缺，西方貴婦人不得不做家事粗工，因中國老媽已棄職而去……。一場偉大的、一致的、不可征服的民眾運動發出盛大的光輝，可懼的敵人一瞬間形勢不穩。

在運動的高峰期，全國工、商、學連絡委員會向敵對方面，也即上海公共租界當局與上海各國公使團發出十七條建議以平息民憤。這些建議明確地提出「即時」的要求：「解除戒嚴令，撤退外國武裝海軍，解散商人自衛隊的國際縱隊，恢復大中學校的正常狀態，釋放所有被捕民眾，懲罰開槍射擊的負責人，罷免公共租界市政廳總書記，對鎮壓犧牲者發放撫恤金，廢除增加公共租界新聞紙稅，港口稅」等法令；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性，長久性的要求，如廢除外國領事司法權，保障言論、集會、出版、工人建立工會和罷工的自由，在外國工廠內建立中國勞動者

保護法規；永遠撤退駐在上海的外國軍隊（主要是英國和日本的軍隊）。

就在這個時刻，不可避免地，上海總商會插手進來。它窺視時機對運動立加阻扼，因為這一運動震撼了中國大陸各階級和它的外國夥伴。藉上海本地居民和租界的外籍老闆糾紛的「仲裁者」之名義，上海總商會刪掉十七條建議，代之以它炮製的「十三條」建議，用些把戲便忽略了不僅是有時機性的要求，而尤其是「十七條」中最基本的要求：工人有權建立工會，有權罷工，而代之以「工人有工作的自由」；至於撤退上海進駐的英日軍隊，廢除領事司法權則銷聲匿跡，代之以「恢復已有條約（即不平等條約）簽定之原來狀況，重設混合法庭……。」

上海大資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確是特別警覺。它完全意識到總罷工的繼續和伸展，會無可挽救地損害它的利益。它已開始約束和準備背叛運動。首先，它縮小行動範圍，把抗議罷工只限於英國人；然後，它主張由法律上解決，最後，它決定單方面在1925年6月23日中止罷市。起初，多數的小企業主和店主人不贊成這一決定，但為了不致於破產，他們不得不漸漸追隨大老闆們的步伐。6月末罷市已差不多完全停下來了。

從此，上海民眾的這一大運動戛然而止，走向下坡路。上海總商會不以破壞總罷市為滿足，更要破壞工人罷工。雖然它不敢直接干預，但它插手支持罷工工人的捐助金錢袋（從四面八方捐助寄向上海，存放各大銀行），它暗地裏把應該交給罷工工人的捐助金放在自己袋裏。從7月開始，罷工工人越來越感到難以支持下去。正逢這時，總商會主席，聲名狼藉的大買辦虞洽卿，赴北京和日帝的忠實奴才段祺瑞商議，怎樣打碎已成為龐然大物的五卅運動，狡猾的老狼向上海大老闆的代言人獻議以下計策：「把顧正紅案與五卅南京路槍殺案分別處理，後者只關英國方面。」當然這只是日本主子給段的進言，使得他們能以最少的抵償贖罪；得到北京政府首腦的「明智」的獻策。回到上海後，虞洽卿向日

方提出解決紗廠罷工的妥協方案，日本紗廠廠主當然樂意接受，承認對顧正紅槍殺案負全部責任，提出給予顧家屬撫恤金一萬元；同時，日方廠主承認已經成立的工會，這一安撫姿態消除了紡織工人部份的罷工動機，即削弱了上海罷工運動中最有戰鬥力的一支力量。另一方面，租界市政府以斷電威脅中國紗廠，因為中國紗廠在繼續生產，外國企業卻繼續罷工。

1925年8月中，在中共中央執委會的一次會議上，我們對這次罷工鬥爭做出評價，工人罷工繼續引起很尖銳的問題，特別幾十萬工人的生活能維持多久？我們沒有任何幻想，一次總罷工會馬上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爭取到民族獨立。而且我們明顯意識到如果我們要想像為未來鬥爭保持力量，除了在各方面全部恢復生產活動，無其他選擇。在1925年8月底，上海表面上恢復過去的形象，也就是5月30日以前的形象。

在中國大資產階級可恥的背叛之後，這一上海社會各階級的偌大的統一陣線，這一民眾的大昇華，留下來甚麼？運動過程中社會各種同盟者的態度如何？上海總商會的翻臉是可預知的，因為它受到運動的逼迫勉強加入，但是它的背叛，確對組成上海眾多的中間階層的中小商人，直接影響極大。後者是因為對帝國主義粗暴鎮壓激發的真正愛國熱情所動而參加罷市行動，現在卻被總商會甩開；他們為罷市持久每日俱增的不穩定情況失去方向而憂慮。說實在，他們和大資產階級利害關係相連，因此與之復合。1925年6月底，上海馬路聯合會脫離統一陣線，脫離上海工學商連絡委員會。至於學界，自運動啟始，是對統一陣線前線供應最堅決的戰鬥隊伍的陣營，在大中學校全體罷課秩序井然，影響及聖約翰大學因對美人校長的行為反抗而群體離校，可是當運動向兩極分化時，一邊是急進的工人階級隊伍，另一邊是上海資產階級的右翼，學生運動也分裂成二：它的右派，在運動上升期間只是極少數，附從總商會的指令，而急進派則與罷工工人團結一致，上海學生聯合會繼續與上海工會

聯合會緊密合作。7月開始放暑假，大部份學生回到省份或鄉村，只剩下少數學生，已經成為革命分子，與罷工工人合成一體，只有上海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成為反帝運動的最後堡壘。於是，以無比光彩顯現出一幅：空前激烈的中國政治和社會鬥爭經歷階級分化的圖景。

不同於任何過去的群眾運動，一個嶄新的震撼性的新事物出現了，就是在鬥爭中工人階級建立自己工會組織的活生生的事實，全上海工會聯合會，在短短數月間已成為不能忽視的力量；它已成為反帝運動的實質上的領導。它具體地實現了我們六個月前的想像。它不但是覺醒的工人階級的思考的腦袋，在工會成立後它踏實地駐足於每家工廠，每個工房，總工會每一個號令，都受到上海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分子嚴格自覺的遵守。從此，它不僅成為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最懼怕最憎恨的名稱，而且也是大資產階級最憎恨的不除不快的敵人。

起先他們收買上海秘密會社的打手，侵襲工會聯合會會址未遂，上海大資產階級通過它的代表虞洽卿，借用佔據上海中國地界的奉天派系軍隊，突擊在閘北上海工會會址，而由此終止了合法的工會活動。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軍閥和帝國主義三重聯盟的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但不久我們看到禁止上海工會聯合會這一舉措撲了空，正由於野蠻的鎮壓和摧殘，工會聯合會的活躍和戰鬥力更加發揮和增強。

省港大罷工

南京路槍殺案一旦發生，全國各地傳佈，6月初開始在大小城市爆發了一浪又一浪的群眾抗議行動，比如在廣州6月1日開始，北京6月2日，隨後在天津、青島、南京有部份的罷市，然後在長沙、武漢、重慶等城市，這一抗議行動是閃電式的，甚至在數日內，國內國外報紙都來不及記錄全國這個大波動的全部消息。但是大部份的群眾示威立即遭到當地軍閥的快速鎮壓，特別是在武漢、在長沙、在青島。湖北督軍蕭

耀南，湖南的軍事首領趙恆惕，山東的督軍張宗昌不惜以殘酷軍力把運動推入血泊裏。

廣州的形勢比較複雜，6月1日的示威沒有立即發生效果。由於雲南省兩將領，楊希憫、劉震寰串通，受到英帝國主義明顯支持的陳炯明和陳廉伯的軍隊，策劃推翻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政治形勢在南方又緊張起來。南京路五卅慘案正發生在他們發動軍事政變之際。意識到「五卅」在廣東不可避免的反響，加上英帝的催促，他們加速政變準備步驟，廣州的氣息又為高壓電波震盪，就像去年秋季，在「廣東商人自衛隊」政變的前夜那樣。在廣州政府首席的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明知如果不即時反應，是不能維持下去的。我黨自然是主張即起堅決對抗。結果，在中心決策方面是由鮑羅廷，而特別是根據加倫將軍的軍事策劃，廣州政府才決定肅清盤據廣東省內劉、楊的勢力。武裝衝突發生時短促，尤其因為發動了黃埔軍校的青年軍官和廣東的工人組織，輕易解決了反叛的士兵，劉震寰和楊希憫兩叛將即時逃遁，因此，其他那些廣東省內反革命的小土霸不得不放棄推翻廣州政府的野心，劉、楊事變即此在1925年6月12日結束，值此勝利之際，莊嚴宣佈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

擺脫了最後的叛逆餘孽，廣州似乎可以自由地給予上海「五卅」發起一個團結支持運動，實際上，真正的主軸在香港，在英帝的基地上，那裏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在勞動，而且，在這島上有服從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黃色」工會，和由黃色工會指使的所謂「香港工會聯合會」。唯一真正工人組織是1922年香港海員罷工時誕生的海員工會，這工會的主要領袖是蘇兆徵和林偉民。蘇兆徵在1924年底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即在他當時到北方參加「國民會議促進協會」之際，為了在島上發動工人支持上海工人的運動，中國全國工人聯合會6月初派去幾位負責人，即李啟漢、鄧中夏、黃平。李啟漢，由於過去參加上海海員工作的經驗，改名李森，成為一個重要的活動分子，當香港海員工會的負責人與「香

港工會聯合會」的領袖討論時，後者不直接反對支持上海工人的團結罷工，但盡力推延作決定，要等到香港海員工會發動了香港機器工會及其他小型工會施加壓力，才迫使所謂「香港工會聯合會」放鬆了手，發出島上工人總罷工的命令。

香港工人總罷工在 1925 年 6 月 19 日開始，兩日內成立全面性罷工。罷工工人重新提出上海罷工的十七條要求，再加上在島上他們自己的要求。香港政府對罷工工人極盡恐嚇鎮壓之能事，使他們不能生活下去，不能離開香港，殖民地當局立即停止向廣州去的火車行駛，香港工人沒有因此氣餒，成群結隊徒步或乘坐舢板陸續向廣州去。幾天內，十多萬香港工人離開棲居地，回到祖國，這個華麗和興隆的島嶼一下子成為死港。

在廣州附近，在珠江對岸有一小島，名沙面，是外交團的工作場所和人員棲居地，相等於北京的外國公使館區。外交團的中國僱員和侍役，也全部離開他們的外國主人而集合在廣州。6 月 23 日，香港和沙面的罷工工人集合在一起，召集二十萬人的示威和市內遊行。隊伍緊密，沿着珠江河岸，在面對沙面的沙基路上前進。在連接沙基路沙面的橋上密集英法的兵士警察，忽然開動機關槍，直射示威的群眾，幾分鐘內，五十多中國勞動者倒下喪生，在這一天戰役中，在層層的屍體中，還有數百的受傷者，這就是有名的「沙基慘案」，其嚴重性和反響超過上海南京路五卅槍殺案。

全廣東省人心沸騰，運動激化，快速伸展。在廣東海港城市，支持的團結力量如煙火般蔓延，在「全國工會聯合會」的督促和支助下，罷工工人每五十人選舉一代表，召集全體會議，選舉一個罷工委員會來指導這一龐大運動。罷工工人迫使廣州國民政府全力支持，大家都知道廣州政府全靠與黃埔軍校官兵有默契的廣東勞動群眾堅毅勇敢的鬥爭，才能在 6 月 12 日壓倒劉、楊叛軍。而且，國民政府有充份理由痛恨英國帝

國主義，並企圖使運動對它有利。因此，它表示樂意給罷工工人以政治和物質上的援助，特別是當時實際上的財政部長廖仲愷表示，有意竭盡全力；罷工工人每日收到五千到六千元的支助金，他們住宿在學校及被禁和接收後變成大臥房的賭場，和鴉片館裏。蘇兆徵主管的罷工委員會處理所有香港和沙面罷工工人的事務，組織兩千人左右的糾察隊，保持香港全面封鎖。它訓練半武裝的小團體，並設立法庭審判罷工委員會禁止的條例（主要是偷販者）的違反者，它對直接有關勞動者利益的事務高度控制。它的存在對廣州政府來說含有雙重政權的性質；它已經是蘇維埃的胎盤，就是這一罷工委員會在未來一年內堅強地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五卅」在政治軍事勢力較量中的餘波

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南方開啟了工人鬥爭和民眾反帝運動一個新的前景；運動首先發展的上海，自1925年秋天，工會聯合會轉向地下活動起，前途反而顯得灰暗。然而，五卅運動不斷向人心深層進展，在社會政治層面，甚至在軍事力量（由北向南）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我們暫且不提1925年8月末開始震動廣州政府的危機，以及北方政治軍事上將形成的變化，我們只回頭說罷工終結後上海的情況，尤其是「五卅」爆發後，在國民黨內及上海地區軍事勢力較量中的餘波和中共發生的蛻變。

上海國民黨機構的官員職員對工人運動從來沒有興趣，特別是1924年秋天以來發展的工人運動，反而是疑慮或者是敵視的，正如他們對待1924年9月南洋煙草公司工人罷工，或者對待1925年2月小沙渡紗廠工人罷工那樣，在五卅運動初始，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還鼓掌支持，但其穩重的評論是淡淡的。當運動在中共鼓勵下激進起來，其方向和組織完全超過他們的想像，那時反動勢力聯合起來打起「紅色」陰謀要把上海「布爾什維克化」的恐嚇大旗。於是，國民黨內最能意識到

他們的階級利益的人們，感受到不可抑制的恐怖，其中戴季陶是一位特別敏感的「思想主導」，在性格上比較軟弱，搖擺不定。他是國民黨領導班子裏直覺感性最快的一人。因此當他追隨注視五卅運動的起伏波動後，把他的思考寫在一本小冊子裏，於 1925 年 7 月發表《國民革命與國民黨》，這可以說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到工人階級直接起來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犯的刺激，政治覺悟的嚴肅的理性的解釋。戴季陶講到「國民革命」這一命題，只是為了指責五卅運動，公開地指責中國共產黨在此起的作用。戴季陶認為：既然中國國家人民最終目的是從外國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必須排除國家內部任何糾紛，就是說廢除「階級鬥爭」，那麼，怎樣解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方面實際上存在的矛盾？以「慈善愛心」，工人必須爭取資本家的「人情理解」，使得「階級鬥爭」失去目標，以「慈善愛心」代替「階級鬥爭」溝通之後，戴季陶認識到中共在運動過程中贏得的人心以及國民黨在上海參加者中間影響無關輕重。於是他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問題。他大膽地指斥中共黨和青年團成員在國民黨內作派系工作來減弱國民黨，阻止國民黨人積極參加工人運動，並且，利用國民黨的機構發展和增強中共的隊伍等等，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他主張國民黨重新成為一個統一、和諧的政黨（在意識形態上，也在政治上）。換句話說，全由「民族」資產階級控制的政黨，而中共黨員自然地被排除出來。這本小冊子包括中國資產階級綱領的主要論題，正合時際，把最近事變引起迷茫方向的老國民黨們的士氣振作起來，它在國民黨領導集團內作出重大影響，很可能在心理準備上，促成蔣介石在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政變。

戴季陶摔進養鴨湖中的大石塊，必然激起中共方面即時反應。陳獨秀已經由戴本人在單獨面談時告知小冊子內容，並且嚴厲地批評過。這小冊子發表出來後，在上海傳閱時，獨秀在《嚮導》1925 年 9 月 18 日與 21 日發表一封長信：「給戴季陶的公開信」，這是我黨準備正式的答

覆。為了避免掉進戴季陶設計的陷阱，即關於中國文明失落或孫中山主張內涵的「帝國主義」等空洞的設想……獨秀嚴格地指出理論與事實上，這本小冊子包含的嚴重錯誤，並聲稱國民黨右派有聲望的領袖送給中共的這類餐食，這不是第一次。

戴季陶提倡的中國「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不可調協論，陳獨秀對之以兩者互補的論點，認為戴季陶的想法是屬於公式化邏輯，而兩者之互相補充是由於國家在帝國主義半殖民的羈絆下，社會各力量交接的實質關係所必然發生的情況。他重新提出這個戴季陶有意避開的基本問題：今日中國哪個社會力量是真正革命的力量？最近的經驗有顯例：比如廣東商人自衛團叛亂被鎮壓，五卅運動，省港海員封鎖，海港罷工潮都充份顯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戰鬥性，堅決為民族解放起來鬥爭；同時，代表資產階級的商人買辦和大地主階級則同帝國主義者結成同盟，幫助他們來鎮壓民眾運動。

如果聽從戴季陶的明哲勸說，放棄階級鬥爭，勸告資本家們對工人表示慈善之心，地主們不再剝削他們的僱農，帝國主義者變得寬大，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簡直是荒唐之至！

當然，戴季陶要求國民黨主見的純潔性，回到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原旨，是無可爭議的。但陳獨秀提醒他，要做到這點，國民黨必須成為一個獨一階級的政黨，而這一階級只能是資產階級，可是這個階級卻不能站起來挑戰帝國主義和軍閥。而在目前，不管戴季陶願不願意，國民黨仍然是一個「統一陣線」的政黨，其中有多個社會階級的代表，必然反映不同政治見解和不同的利益，在國民黨內共產黨員的參與，是否有損於它的和諧與團結？不是。最顯明的真實是，共產黨員的積極活動使大批工人農民擁入國民黨，大大增強了人民大眾裏國民黨的聲望。中共黨或青年團從來沒有阻止國民黨員在工人運動中活動，除非是在國民黨名義下的「工賊」（黃色工會）專門破壞工人組織，這些事件可惜時常發生，

至於戴季陶不堂皇的指斥，說中共黨員有意在國民黨領袖之間——蔣介石和許崇智之間製造糾紛，獨秀乾脆地否認，而提醒他，中共曾嘗試在兩位國民黨軍事領袖間作協調努力，可惜完全失敗。

這樣一篇中肯的反駁，應該是可以充份地駁倒戴季陶的論點。而戴也不在這個平面上加以反擊，而且對陳獨秀的信不予任何答覆。但是，這裏存在一個陰影，就是對國民黨階級屬性分析中的內在弱點，即事實上，國民黨已是一個真正的中國資產階級政黨，可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的官方定性綱領，陳獨秀不能向前走一步。

我是在出病院時（1925年9月中）才知道戴季陶和陳獨秀的爭論，同時也是上海總工會場所被奉天系軍隊封閉的時日，病剛痊癒，我急不及待恢復工作，尤其是掌握最近發生事例的意義和往後指向，因此，我即就上海總工會封閉事件寫一篇短文，登在1925年10月5日的《嚮導》上。我解釋總工會被封閉的原因，是由於它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已成為上海工人階級真正的總司令部。它完全癱瘓了帝國主義獨霸經濟活動，變成一個可畏的力量和它們的死敵，逼着它們要把它扼殺。因此，我們堅信這個組織起來戰鬥的工人階級是民族解放最後完成的保證，並且，上海總工會是這一戰鬥的活腦袋，其次，我覺得在上海無產階級的情況，同蘇聯革命前夕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有相似點。中國數一工業大都市，又是工人基地，上海在一個偉大的場景中伸長了它的足跡。這一場景是追隨1917年2月和10月的俄國走過到邏輯終點的路程；軍事起義，這篇文章的結論可能是太膽大一點，但當時同志間沒有遭到異議，好像得到廣大的讚許。

五卅運動的參與分子和領袖們也許沒有預測到的後果之一是直隸系，在浙江督軍孫傳芳的率領下向上海地區進攻，企圖把這地區從奉天系軍閥手中爭取過來。

我們曾看到奉天軍閥怎樣野蠻兇殘地鎮壓天津和青島的民眾運動，

怎樣僱用散兵來破壞和封閉上海總工會的合法組織。因此，不但激起工人農民的痛恨和怒火，而且是一部份城市居民的怨恨，尤其在上海，已經佔據山東，從天津到江蘇，奉天系軍閥以為可以順風逐浪前進，沿着京浦鐵路作軍事進攻；他們試着佔領安徽，直接威脅直隸系盤據區域（江西，浙江，安徽和湖北）。另一方面，英美帝國主義，為了平息他們在中國的軍閥盟友和資產階級的不滿，又重新攤出一張牌來，即舉行增加中國海關稅收會議，實行 1922 年華盛頓會議的諾言，即中國海關稅收增加 2.5%，這樣一箭雙鵰，就將五卅運動中發出「關稅自主」的大眾呼聲淹沒了。的確，奸猾的孫傳芳存心利用奉天系佔領軍在上海極度不得人心，同時急切地再度爭取到與外國帝國主義者談判圓桌上優先地位，在 1925 年 10 月 10 日，即時發動對奉天系軍隊的「討伐」戰；他以多麼偽善的面目指責奉天系軍人可恥地壓迫愛國人士，摧殘行動起來合法自衛的工人，並且向帝國主義壓力讓步。孫傳芳的軍隊進入中國地帶，直驅而入，沒遭遇奉天系軍人的任何抵抗，後者已事先退出上海中國地帶向北京進發，因為已得到消息，直隸系的首腦吳佩孚已在武漢成立大本營，並同北方的國民軍簽完協定，把對奉天系不利的戰線大大拉長了。

直隸系新主人在上海駐守的最初數日，特別留意避免觸動一般居民的情緒，居民們事實上對他的進駐冷漠處之。新當權者還依靠輿論對奉天系舊主人的敵視，而「不動口唇」地讚許一度熱情滿溢的愛國運動，可是，一旦我黨聯同工人群眾一起組織遊行示威，要求上海總工會的恢復合法性和重建，於是，假面具就掉下來，被撕破了。馬上城裏到處貼上佈告，正式禁止公共集會和馬路上遊行示威，在新舊主人之間的唯一區別是，舊主人是由日本帝國主義支持，而新主人則由英國帝國主義支持；而其對群眾運動鎮壓方式比較精巧一點，但更為詭譎陰險，正是如此，我們的同志劉華在 1925 年 12 月倒在孫傳芳劊子手設的陷阱裏被謀殺。

中共的增長危機

五卅運動爆發最驚人的後果，無疑是中共黨和青年團加入人數跳躍式的增長，特別在上海工人圈子中，尤其在隣近城市（南通，嘉定，蘇州等……）。

五卅前夕，已經看到加入中共和共青團的人數有明顯上升，主要分別在兩個領域：（1）工人領域，在小沙渡日本紗廠同盟罷工之後；（2）大學領域，從上海大學起，軸轉式發展，當時估計增加五百名新黨員，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以前黨員以知識分子學生居多，而自1925年春季開始，成了相反的趨向：在黨員中工人分子明顯佔了多數，雖然黨的規模還是很小，但它的潛力不斷增長，從5月30日開始，罷工運動最盛期，加入中共的積極分子踴躍到黨組織滿溢的程度，上海黨委員會的簡陋的結構過度膨脹而致爆裂。它的書記韓白華被新的任務壓倒了，不久由王一飛代替，卻仍留在黨委中。新加入的黨員有多少？沒有人能說出一個確實的數字，王一飛給我們的數字（1925年末）是一萬人，可是，不到一年以前，一個小學的課堂裏就可以容納上海黨員的全體會議。

這一連綿不斷中共黨員激增，是通過上海工會聯合會的來源。這工會聯合會在極短暫時間內創建了分佈於上海經濟活動主要領域，在市內大型企業有堅實基礎，由幾十萬工人支持的上百個支部，即使它的合法活動受到禁止也不削弱它的活力。它的積極分子，既然失去工會組織的合法存在，反而增加地下活動。經過壯大的五卅運動的磨練，成千上百的工會戰鬥員，接受中共和工會領導的指引，把他們的精力轉向比較更有經濟性和政治性的干預活動，提出增加工資要求和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包括外國資本家企業和本國民族資本企業。事實上，在過去，工人還沒有組織起來之前，這類工人行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這些工人積極分子，雖然他們的工會組織首當其衝遭到鎮壓，仍然對自身力量抱有信

心，並不氣餒。而事實上，組織上並沒有受到實質上的障礙或倒退，正是這些特殊情況的吻合，而使我黨空前快速發展並且根本改變它的社會組成因素，同時揭示它結構上的脆弱，以及它極度缺乏政治活動家和組織人才。

首先，在上海市區，中共黨委內部有分工：王一飛一書記；韓白華一組織；謝文進一宣傳；黨委遠遠不能勝任，在黨員突增情況下，引起的多種需求。王一飛是蘇俄回國，熟習俄語的同志；他一到上海，我就交託他翻譯季諾維埃夫的《布爾什維克黨史》；他在「五卅」前夕完成譯稿由我校正，立即由上海書局發表。他過份的善良，在一個黨的激動和發展時期，不能克服缺少權威的缺點，在「五卅」後大批入黨潮給淹沒。從1926年1月起，王一飛由羅亦農代替（留滬期間參加一個軍事調查委員會），當國民軍開始北伐，從廣州出發，他離滬去武漢，創立和領導兩湖（湖北，湖南）幹部學校。至於謝文進，三十來歲，是滬西工人運動最有魄力的同志之一，是一位忠實寬大的革命家，在上海作宣傳工作為期甚短，1926年初到南京領導南京市黨委（1927年春我到南京時還任此職）。

上海黨組織要到1926年初，才有了明顯的改善：是成立了一個完整的黨地區（江浙）委員會，包括三省：江蘇、浙江、安徽，應「中央」的召喚，羅亦農和尹寬即時從北京到上海加強和督促上海黨領導。另一方面，剛從莫斯科回國同志中，受到考驗的有江壽華和陳碧蘭，進入江浙皖區委。由此，自1926年春開始形成一個地區領導，直到1927年春暴動期間。這些地區委員會由五人組成：羅亦農（書記），尹寬（宣傳），汪壽華（工人運動），韓白華（1926年夏由趙世炎代替）（組織），陳碧蘭（婦女運動）。羅亦農是自我1924年8月離開莫斯科回國起，仍留蘇俄，代替我在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團書記職務，直到他1925年夏回國，是大家認為最能協調區委的適合人選。雖然在群眾大會上他沒有善辯口

才，但在較小型的會議，他能以堅決的態度說服人，尤其是黨內同志，有效率的組織家。他還長於一種周旋的伎倆，而不掉進權謀的泥沼，因他為人外向型，比較坦率。

這個小團體的同志是我在未來歲月裏日日相處的同志，因為以「中央」經常代表的名義，我出席所有區委的會議，羅亦農、尹寬、韓白華，然後趙世炎，都是我在莫斯科留學的同伴，就是在我的讀者中也是相當熟悉的人物。其他兩位區委的同志，陳碧蘭和汪壽華對我也不完全陌生，但當時還沒有機會真正認識他們。我在下面會敘述我和陳碧蘭的相遇，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這裏，我只記述一下，汪壽華，他是上海工人運動在慘遭扼殺前，最後一位真實的領袖。他的原名是何今亮，本來是上海培養準備赴莫斯科的一批同志之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時改名為何松齡，不知為何原因，他沒有在 1921 年春同我們起程去蘇聯。數月後，當他抵達拉地伏斯托克準備轉莫斯科時，他被蘇聯黨留下接待來到俄國東部的華人以及在當地與華僑聯絡工作。直到 1925 年夏，同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中共黨員同時回國。這一批黨員包括李富春，蔡暢，陳碧蘭，馬志運，郭隆真等。那時五卅運動已經發生，何松齡回到上海後，立即參加上海總工會聯合會，但沒有重要職務。1925 年秋，上海總工會被禁，李立三和劉華都受到上海當局的嚴密監視，何松齡被指定擔任上海總工會首領，並改名為汪壽華，以這個姓名他擔起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尤其是在 1927 年春工人起義的整個時期，除了他在江浙皖區委的服務外，由於他在總工會的地位緊要，他也經常出席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他屬於我在上海最熟悉的人物之一。像多半浙江人，他身材中等，眉目清秀，在修長深奧的眼睫裏稍帶女性的色彩。他說上海方言沒有外地口音。除了具有作大量工作的能耐，他還有一種稀有的品質；不像他的前任同志李立三，把發生的事變只當作一些資料，籠統地印象主義式地接收。他在他主管的領域內一般性的現象裏會尖銳地發覺，特殊

或新的成份，並且作出謹慎和明確的分析。唉！可惜同劉華一樣，一年半之後，他也被上海帝國主義者與蔣介石聯盟服務的杜月笙的青幫，卑劣地暗殺了。

從全國範圍來說，1925年秋到1926年春，黨組織情況表現得相當零亂，自從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來，正式負擔中共組織部工作的是張國燾，他是1925年3月初來到上海。他來看我時，我已經病倒，在我住院以前是陳獨秀召他回上海請他嚴肅地擔起這份工作；尤其是當黨的影響日益擴大，使這一任務更為迫切。但是張國燾還未來得及走開一步時，「五卅」大風暴來臨，把黨的全部力量都捲進去。以他工人運動起始時領導者之一的資格（1921-1922），他代表中共「中央」同上海工人運動建立聯繫，在這一職位上，他的確參加運動，起了最積極的作用，但他不能給予運動以實在和先進的衝擊力，尤其是切合於運動的政治方向。當上海工會聯合會建立了自己的領導機構，中共「中央」不再直接干預它的決策；而由江浙皖區委聯絡工作，張國燾就感到不稱職了。

然而，「五卅」爆發後，有成千上萬的工人不斷擁向中國共產黨，組建的問題變得特別尖銳。當時，陳獨秀力勸張國燾把組織部趕快建立起來，以便克服在中央這一層面的癱瘓。既然無法避開這一任務，張國燾不得已才租了一間屋子，招聘一位同志張學良（與張作霖兒子，同姓名不同人）做秘書，形式上成為組織部的機構，但實際上，他是不知所措，不能梳出一個頭緒來。當然，中共影響的迅速增長，需要特殊的組織才能。他不去直截了當地解決問題，而是採取「不聞不問」的策略，在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上，他從來不把他負責的事務報告給大家，而是找些瑣碎的問題，無關重要的瑣事……有兩三次，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有意請他為《嚮導》寫一篇文章，我看到他正在單獨打「骨牌」，有點奇怪。我問他的秘書怎麼回事？張學良正經答說張國燾來到辦公室甚麼都不

做，而且不常來。他不讀報紙，只是草草看一下。他在屋裏來回踱步，或者坐下來玩「骨牌」，正像霧中的鬼魂，他感到很不自在；找到藉口就一溜而去，或去北方（比如鄭州）走一趟，或去南方是他喜歡去的地方。他碰上蔣介石 1926 年 3 月 20 日政變的機會去廣州，自薦去做調查，在那裏，他能詢訪國民黨知名人士，覺得比較自在。他不只去北京，路經上海時，參加一兩次「中央」會議，但再也沒有擔負起指定的任務；因此，中共中央組織部沒有真正的活動，一直到 1926 年秋，周恩來不能再留在廣州，被招到上海來整治一下中央組織部，雖然他忙着其他的活動，周恩來總算建起一個起碼的結構，但他再沒有必需的時間，將它有系統地鞏固起來；因為 1927 年春新的革命風潮不斷瘋狂地震撼了全黨同志，而使周恩來深深地捲入工人起義的行動中。

至於黨的秘書處，起初是為了配合「中央」各部門的活動和擔負每日的工作（文件檔案、通信等等），但因沒有物色到人選而沒有成立。直到 1925 年底，王若飛當時從北方返滬，接受這一任務。他自己嚴格準時地，把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中央委會的所有會議記錄下來，並加上兩位同志協助，特別是技術工作（印刷和油印等）。

中央機構唯一比較勝任的是宣傳部，但它也有嚴重的缺點。我本來有計劃翻譯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列寧、托洛茨基的著作，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這些書籍資料當時在中國非常缺少。為了實現這樣的計劃，必須集合從莫斯科或歐洲回來的十多位同志，全心一意地在一個時間內完成這一任務。可惜的是，所有從莫斯科或歐洲回來的同志，立刻被派到各省去擔任職務，那裏領導幹部特別短缺（比如，陳延年、趙世炎、王一飛、尹寬等……），或者被蘇俄顧問團大量需要的翻譯工作吸收了（比如張太雷、黃平、和其他多位同志，去為廣州的鮑羅廷和他屬下人員服務，或者為河南的國民軍裏面的蘇俄顧問工作）。這樣，為加強「中央」來工作的同志就所剩無幾了，不論是宣傳部或是組織部。

黨的週報《嚮導》

當我 1924 年秋到上海時維持在三千份左右，繼續破浪前進，1925 年 5 月以後變成中國最有讀者的週刊。各地要求訂閱之多，使我們不得不把每期的紙版寄到廣州、長沙和北京，以便當地同志印發四萬到五萬份在各地區分發。當廣州國民政府在 1926 年夏開始北伐時，《嚮導》的發行仍然繼續增加。雖然全部傳佈份數難以估計，但每期很可能不在二十萬份以下。

這個年輕氣壯的黨在經濟來源方面怎樣渡過來的？明顯的是它還是黨員人數很少，而且他們缺少資源，來養活組織，正如其他大多數共產國際各國支部一樣。尤其是東方和遠東的兄弟黨特別窮困。中國共產黨主要靠蘇維埃黨的支持，蘇黨在列寧在世時，認為這一支持是它一份國際主義的神聖任務之一。在黨四次代表大會時期，莫斯科支持的這筆款是每月三千元左右，為全黨支付費用，包括留在中央到省地的「常務」同志的薪金，出版費用以及旅行之需。一位「中央」的常務同志或黨區委書記每月領三十元，相當紡織專門工的工資，但低於當時的熟練工人的工資。地方上黨的常務幹部得到每月二十元，再下去是十五元，等於一個粗工的工資。全日幹活的同志們很難維持生活，計算一下，除了《嚮導》、《新青年》出版費用，同志的旅行費用外，還有些省委（如湖南）需要支助，這三千元（一千美金）微薄之數，無論如何不能對付黨全國性的最起碼的開支，北京和廣東的黨委，由於北方和南方政治軍事形勢有利而強大起來，找到額外的經費來發展黨在這些地區的影響。

當然，中共領導領取這樣微薄的經費，結果大大限制它的活動範圍，而不得不到處省吃儉用，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省這筆難得的費用，陳獨秀在初期自己擔當管理的責任，然後交託給任作民，還是緊緊審視經費，因此常聽到有些同志抱怨說，獨秀向同志施行威權制或甚至是家長制。

我還記得每次宣傳部為了些最基本的費用，如房租、薪金、資料等等，要錢時，我們的同志鄭超麟皺起眉，抓抓頭，才準備去找任作民同志，還預備了一份細心擬好的賬單，因為後者慣於他的職務，像藥劑師配方那樣的精細。五卅運動之後發生一個小小的奇蹟，並不是出在黨的常務人員或正常經費方面，而是在出版方面，我們原來出版物是送到外面印刷所完成印刷，在薄弱的經費裏抽出來照付的，可是，1925年秋開始，一個中等規模的印刷廠，在上海建立完全可以滿足我們出版的需要，這是陳獨秀的同鄉（安徽），仰慕他的陳廉生送的四萬元。

陳廉生是上海華籍人士中最大地主，在當時擁有從南京路到靜安寺路（朝向滬西）全部已建或未建的房產和地皮，其中有一所他本人的主要居所，門口有兩座巨大石獅的華麗花園洋房，是上海人家喻戶曉的場所。

他原來是一位紈袴子弟，曾在歐洲，尤其是法國居留過，而且領受到西歐文化薰陶。他很崇拜陳獨秀，並不嫌他是知名的共產主義者，而且並無私交。某日，他竟然通過「同鄉」邀請陳獨秀到他上海著名的寓所。出於好奇心，陳獨秀應了邀請，但從未想到向這樣的人物作任何經濟上的支助。但是，有一位同鄉的確熟悉陳廉生的作風，向他提起陳獨秀政治任務需求很大，陳廉生不動聲色地交給陳獨秀一筆四萬元款，純為捐獻，雖然對他來說只是輕而又微，而確是一個標誌。他每月地產收入可作千萬計。他本性好賭，全心全意玩股票，賭金子。在「五卅」前夕，他失去幾百萬元；政治上，他把底牌向左擺，特別在「五卅」之後。

關於黨組織在各省份的特別津貼，我只提到兩個特別例子：一是北方鐵路總工會，一是廣東省委。

當鐵路總工會 1925 年 2 月重建之時，北方中共有二十位黨員全心全意地做工會活動工作，可以算是職業革命家，但鐵路總工會根本沒有物質資源來進行活動。剛從莫斯科回來的李守常，恢復他原來北方黨區委

書記的職位。他向在北京蘇聯正式代表加拉罕要求配一筆特別款項，來發動北方工人運動，鐵路總工會得到每月兩千元的款項，可以保持總工會的常務委員，拿到比中共常務委員更高的工資，有的同志因時而定，走了方便，比如藉口做地下工作而玩妓女……但總的來說，這筆經常款項，顯然增強北方工會運動干預的能力。

在廣東，自從陳延年被選為書記開始黨本身活動（這一活動由於國民黨內中共黨員積極參與而鬆弛下來），莫斯科的全權代表，鮑羅廷撥一筆款給廣東黨委作經費，陳延年可以通過張太雷（他自 1925 年春起實際上成為鮑羅廷的私人秘書），根據需要，繼續地取得款項，在中共和國民黨合作的庇蔭下，在廣東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也挺立起來，特別是農民運動在東江已經組織成熟，可以動員許多同志做整日工作，常務黨員比城市黨員薪金較低，至於其他農運費用，則由蘇聯政府付給國民黨的全部費用中抽出來的津貼。

令人感到意外和驚奇的是，在蘇聯給我黨的援助和給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支持之間，中共常務委員和國民黨的專職幹部之間，有天壤之別。蔣介石 1925 年秋去蘇聯訪問的圓滿成功有下列事實證明：如果蘇聯運往廣州的軍火達到極大數量，無可計算，其他領域內莫斯科財政上的支助是我們知道的：黃埔軍校每月收到三十萬元補助，國民黨自身每月收到六十萬元，作為發展群眾運動必需的支助金。另外，為廣州政府服務的蘇聯數十位軍事顧問的預算，雖然不為人知，但必然很可觀。這方面的薪金和經費，是直接由鮑羅廷經管，他所支配的財政力量是無盡的……。

過目一下國民黨全職人員的薪金，包括我黨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同志，以及在軍隊裏的同志，從最下層說起，一個小秘書專門做剪報或其他簡單工作，拿四十元錢，中層秘書月薪金五十到八十元，高層幹部或中央執行委會委員，每月可得二百元以上，在黨內無形中建立一種自然規律：黨內優秀的活動分子，革命覺悟比較堅強的，選擇為黨盡力，寧願過清

教徒似的生活，而多數其他黨員，習慣於不太操勞的，安逸的生活，便傾向於在國民黨內找到工作，賺到比中共黨內高幾倍的薪金。但是，這些黨員有義務交出黨費，是他們得到國民黨機關薪金的百分之幾。可以提及的有趣的事，是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的同志一旦來到上海，看到我們大家生活窮困，一無所有，便慷慨地邀請我們進餐館大飽一餐，滿足一下，像是苦行僧飽嘗禁果。

1925年9月，終於從長住醫院中解放出來，回到原來住處，生活好似恢復往常，但我還沒有痊癒，還沒有足夠精力來完成我份內的任務，必須時常躺下來，長時間的努力後力氣竭盡。正因此，我所有可能參加1925年10月初的中共全體會議，就是在9月底10月初，十多天內，發生了一件我完全沒有意料的苦惱的事。這件事本來是我人生中一個節，不值得特別提到，要不是因為原來是在老黨裏的一員，後來進入敵人的陣營的張國燾在他的自傳的一章裏「彭述之的羅曼史」，加以描述，說是在中共領導層的糾紛和緊張氣氛的緣由，從那時就已經形成！遠遠早於1927年中，在黨內權力鬥爭撕破了黨的團結，正當反革命開始昂起頭來，準備把新生的革命力量扼殺在血泊中。

在他的「自傳」中，張國燾宣稱，彭述之，一個年輕的書生，有些才智，但野心勃勃，行為輕率，攪亂了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妻和諧的生活，使後者的心思偏向他……。這件事變成一件真正頭痛的事，提出在「中央」討論，引起負責同志間對彭述之發生反感。而且這事件差點使他丟掉中央常委的地位。因為張國燾，受瞿秋白之託，到陳獨秀那裏去告狀，公開要求把彭述之降到下層，因他不能擔任黨予以之責任。可是，陳獨秀排除這一要求，認為這只是一個人之間的私事。他還嚴厲地批評瞿秋白傲慢，寫文章模稜兩可，而認為彭述之發表的文章中，思路清晰堅決。自此，瞿秋白開始深深厭惡陳獨秀，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家長」（老夫子），意即專制君主。這個故事，根據張國燾的敘述，達到登峰造極

的意境：在一段文字中他說彭述之很清楚他敵對方面的暗中活動，立即散佈謠言把陳獨秀當做斯大林，而中央的反對派是三頭馬車，由張國燾自己，瞿秋白和蔡和森，等於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因為當時在俄國聯共雙方鬥爭正熱火中。當然彭述之必然支持中國的斯大林到底，如此在張國燾的筆下顯現出一副場景，由半真半假，純粹謊言，和低級的造謠污衊編織成、反映出來的。最後說來，只不過是他的思想境界的層次。暫且不談，最有意思的是暴露，已經在那裏伸張的陰謀，是瞿秋白，由張國燾協助在中央同志之間，利用彭述之和向警予之間的事件，來從事分隔離間的陰謀。我當時完全蒙在鼓裏，連由我「散發」的謠言也一無所知，原因很簡單，對於聯共內部發生的鬥爭我全然無知；唯一同莫斯科代表經常聯絡的只有瞿秋白一人，張國燾這一段閒話暴露了瞿秋白不可告人的深謀暗算，在 1925 年秋就已開始了！這的確令人吃驚。

「浪漫史」的情況

現在我把所謂「彭述之浪漫史」的情況如實說吧。1925 年五卅慘案前夕，蔡和森病倒，患了喘氣的氣管炎，馬上送到寶隆醫院。經過幾天，又遷到另一條件較好的醫院。出院後，他去北京西山療養，把他妻子留在上海，留在宣傳部以及我們住宿的屋子裏。當我回到住所，我們經常在這屋子裏生活的只有三人，向警予，鄭超麟和我。向警予住在第二樓，鄭超麟和我住在樓下，我們照常一起用餐，但各做各的事。我也沒特別注意到向警予，因為在我心裏從來沒有把蔡和森和向警予區別開來，雖然我尊重他們倆夫妻，只有同志間的感情，但我從來沒有更深層地認識他們。而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方式太過清教徒，過份嚴峻，在私人關係上有點受不了。比如用餐時不說閒話，見面時難有笑容，如有對話也是百分之百政治，其他一切對他們都無興趣，無關他們純革命意識。因此，

我和他們只有工作關係而無所謂友情。1925年9月底，一個黃昏晚餐過後，忽然見到向警予走進我的房間，用急促的話語說出一番真情話，這一突來使我驚愕不已。在慌亂中，我只懂得她長久以來對我發生感情，不斷觀察我，思念我，在她心中佔有甚麼位置……從慌亂中定下神，我很溫和地對她說，我雖然受到她慷慨的感動，但沒有感情上共鳴，既然我從來沒有對他們夫妻倆對事物直覺共鳴，也從來沒有受到她的女性的吸引，她總是以聖女姿態出現，全部奉獻給革命。她這一番感情的爆炸把我震住了。自此，她經常來我這裏，試着與我結成愛侶，我繼續抵制，想使她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處境，這只能是她個人的心事，而萬萬不能在她、蔡和森和我之間發生三角關係。但她越來越變得固執，我的抵抗越來越困難。事實上，我剛從長期病中未全部恢復，身體還很虛弱，更難以應付她的進攻。這不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狼狽，我回到上海不久曾受到施存統妻王一知的青睞，但我毫無一失地解脫了。但現在，在向警予火熱的追逐下，我的抵抗力量竭盡了，我開始做出相應的答覆……。

1925年10月初，蔡和森從北京回來，向警予如實地把這事告訴他，很誠實地告訴他這件事是出於她的主動，但她仍然愛他，只是她目前陷在矛盾情緒的亂麻裏，一下子不能同他恢復正常關係。有一天，和森同我決定我們同向警予三人一起做一次談話，我對他們表示抱歉，並盡力勸服向警予和蔡和森重新建立互相了解和感情，不要繼續三人之間的混亂不安的情景。表面上，和森好像很滿意對這事有個明確的結局，自動地提出做牽線人給我找一個愛人，特別堅持要同向警予一起，介紹兩三位在一間體育學校教書的女同志。向警予則仍然在矛盾的圈子裏打轉。

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會召開的前夕，我們的「中央」決定派蔡和森為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問題是向警予是否和他同去莫斯科。我建議她陪和森同去，和森要徵求中央的意見，在一次中央常委的會議上，出席的有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蔡和森和我；向警予以特別身份參加。

因為這次會要做出決定，她是否去莫斯科。她在會上發言，她堅持要坦白地在全部中央常委面前陳述她的問題。她承認在感情上仍然搖擺在和森和我之間，但她要求中央派她去莫斯科；因為既然彭述之的意見是如此。這麼突然，特地提出這份超過政治以外的方式令我吃驚。陳獨秀，他個人一向認為這類事件是家常的，一般性，像吃住等一類問題，所以在這方面處理方式是自由，沒有虛偽的。他是我們之間最不受拘束的一個。他說：「警予同志，聽我說：這件事很容易解決，你要想怎麼做都可以，如果你想去莫斯科，我們就派你去。」瞿秋白一聲乾笑，不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張國燾默不做聲。至於我，我重複我的意見：向警予陪蔡和森同去莫斯科。這樣這個故事終算有了結局，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在 1925 年 11 月間離開上海赴莫斯科。

如果這件事對參與人有適當的解決，但它表露了向警予的人物特點，如果不知道她的身世和受到的教育，是不能解釋她的行為。實在說，這件我被牽引進去的事件，是這對夫妻的變動不已的生活中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這是一位纖細得像小姑娘，身體平板的婦人，但面貌清秀，她一口長沙口音，有點矯作的話（國語）。她出生於一個世代地主家庭，住於維吾區，是湖南一個僻遠的地區，離我出生地不遠。她的童年是在沉重的封建家長統治的氣氛中過去的。她有運氣被送到長沙一所女子學校，是辛亥革命後相當有名氣的學校，專門為大家閨秀供給一種半封建半改良（梁啟超式）的教育，使她們完成做「賢妻良母」，即傳統社會的理想模式的婦女。而且在中學畢業時，她也是一個特殊例子：她同一批湖南年青人一起參加「勤工儉學」去法國，這個團體有蔡和森、他的妹妹蔡暢、李富春、李立三、陳毅等，她可能在蒙塔基的工廠做過工，蔡和森卻從未進工廠，因他身體不好，只有他的母親和妹妹去做工。1922 年同蔡和森結合，他們倆同時回國，根據所有跟他們有過同宿過的同志們

的印象，這是一對很奇怪的夫妻，成日長夜他們不和同住同食的人們搭話，全不關注周圍一切事物。當時，一般女同志穿着相當隨便，但並不忽視打扮和漂亮，和其他的婦女一樣。可是，向警予的確是鶴立雞群，她仍舊穿鄉下手工製成的棉布襪，在城市裏是稀有的。一般婦女都穿機織西式線襪，在一般商店廉價可買到，但她不得不屈就同志的獻意，避免太惹人注意，引起好奇。在我認識她的時候，她的穿着比較尋常，但令旁觀者注目的是她的個性，包含她那時代中國現代女性的種種矛盾。她的表現帶有最嚴格的「賢妻良母」，最頑固的印記，同時又深深地受到五四運動和旅居西歐的薰陶，使她解除舊中國意識形態的約束，精神上差不多完全解放的女性，和長年傳統教育積累的自動反應之間的差距之大，簡直不可能超越。一般同志看到她嚴肅外表和過份清教徒的作風，給她一個好心的綽號「革命的祖母」；實際上她不到三十歲，在聖母式冰冷的外表形象下燃燒着特別火熱的激情，有時衝破出來。自從她同蔡和森結合以來，我不是唯一牽進她的愛情戲劇的男人，她自己告訴我比較新近的「羅曼史」，是同毛澤東和張國燾。和後者的關係很短暫，而不很嚴重，但與毛澤東，向警予的情感是到達極度，令蔡和森非常激動，想到跳河自殺。可是她時常受到盲目衝動的襲擊，像衝破水閘的洪水不能遏止。她表面的嚴肅是一種防衛，使她害怕而想竭力控制住衝動。

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武漢。1927年夏天，在中共五次大會期間，她在莫斯科已經住了一年半。開始她還同蔡和森在一起，後來她愛上了一位東方大學的蒙古學生，和蔡和森分離。因此，他們分別各自回國，蔡和森不久找到一位女伴，就是剛離開李立三的妻子。剛回到中國後，向警予本來試着與蔡和森恢復關係，但這次，蔡和森好像苦酒滿溢，拒絕了。於是她獨自一人，在中共五次大會後留在武漢繼續活動（戰鬥）。幾個月後，她在漢口法租界被反革命集團逮捕。臨刑時，她表示最高的尊嚴和勇氣，向劊子手叫響革命口號以對抗；最後槍擊下倒下了。她是

中國幾千年壓迫下社會的犧牲品和叛逆者，面向一個全新自由社會，她成了永久的戰鬥烈士和革命的女英雄。

一位富吸引力的女性

大概是在 1925 年 10 月 20 日左右，受到向警予邀請（她是上海婦女運動的負責人），我參加一次中共和青年團所有女同志出席的會議，召開地點是在沈澤民（沈雁冰弟）家裏，參加者有五十多位。本來我準備做一個關於當場政治形勢的報告，在這裏我第一次見到從莫斯科回國，又在河南工作兩個月才到上海的陳碧蘭。這是一位二十二至二十三歲的年輕女士。她身穿白襯衫、黑裙，披上一件羊毛衫，黑漆皮鞋，這不張揚的優雅衣着，把她區別於其他女同志。大而亮的眼睛，高直的有點尖的鼻樑，完整的唇間露出有點突出的白牙，看來很有趣。她的確是一位富吸引力的女性，整個的人充溢着精神活潑，生靈喜悅。更令我神往的是她那不緊張和柔軟的步伐，全然從中國，最進步的女性在內，完全解放出來，而更接近一位西方女性。在會議開始之前，我們隨便談到河南的情況。她說話自由，不拘不束。向警予約她去她家，把她至今負責的職務交託給陳碧蘭，然後去莫斯科。換句話說，陳碧蘭繼承了向警予在民國日報副刊「婦女」的編輯責任，而且也擔任國民黨上海婦女部的執行委員。

到上海沒有好幾天，陳碧蘭選擇曹家渡工人區，通過中共江浙皖區委工人運動部的聯絡，同紡織女工生活在一起。在那邊做完畢時，她常來我這裏，把剛寫完的要給《民國日報》婦女欄發表的文章給我看，問我的意見，我經常是做些小的改變的建議。過不久，王一飛請她進區委擔負婦女運動部門。從此，我們時常見面。因我繼續參加中共江浙皖區委的會議，並同王一飛有緊密聯繫，不知不覺地，陳碧蘭和我之間更趨親近，互相了解，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多年了。於是，沒有甚麼障礙讓我

們不一起生活。1925年12月底，我們邀請了幾位較接近的同志到餐館。在晚餐中間，我們簡單地宣告我們自此一生連在一起。這樣沒有更多禮讚就結伴了。在那個時代，除了少數例外要多少正式結婚以外，我們大部份同志很少注意形式。

雖然年輕，陳碧蘭已經是一個氣勢相當不凡的人物，黨內不少同志廣為知曉。她特別出名的是在1922年秋領導湖北師範女校學生對保守的學校當局一場真正的反抗運動。

從家庭出身說，她屬於湖北陳家氏族，是在舊官制度內有相當勢力的氏族，世世代代書香之家，參加各級考試。她的父親卻是留日醫科學生，在日本同情孫中山的革命黨，甚至剪掉他的辮子，回國引來很多困擾。因還是滿清執政，辛亥革命前夕，她家在她出生時就給她和一個同年的男孩訂婚，一個漢口的上等社會的後裔。依據「門當戶對」的原則，她當初受的是傳統儒教的教育，在陳氏家族的私塾裏，在孩童時代，就因眼見一些不公正的事故，尤其是對女性。比如她有一位孀母，在未婚夫已死去後同他「結婚」，成了「未亡人」，服從對夫婿貞節而榮耀家族，而她自己終於瘋癲而終生……

湖北女子師範學校是當時全湖北唯一為女生設立的中學。她進入這所學校後，很快地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而且更接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在一位急進的教師的督促下（這位教師就是上海共產小組的發起人之一李漢俊，從上海回到武漢），她在1922年春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她與學校同班的四位最激進的同學，成功地在校內發動一場罷課，來抗議那位保守的校長解除她們的激進教師的教職。秋季開課時，這位校長通知這五位運動帶頭的學生家長，學校不再接收她們了。陳碧蘭和其他四位決定不理這一宣告，而發動組織一個最堅硬的抗議運動，最終獲得其他班大多數的同學支持，逼得校長辭職。這個事件在湖北全省傳播開來，震動了上層社會，使得湖北省軍事當局（督軍），準備逮捕女

學生領袖，嚴重處罰，但是沒有辦到；由於學生支持團結行動，以及開明人士團體多方面干預，以致使她們可以逃避可悲的後果，在戰鬥的暴風雨中，陳碧蘭公開解除與未婚夫的婚約。這是她人生一個雙重轉捩關頭：她截斷了中國一切舊社會的羈絆，不再回頭。

陳碧蘭 1922 年秋加入中共，於 1923 年不得不離開湖北，決心繼續在異地為自由奮鬥。短期逗留上海，與中共中央同志接觸，特別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婦和瞿秋白。然後經過北京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留一年（1924 至 1925 年），由中共黨方徵求回國工作。回國後，她在河南兩個月左右，參加全國鐵路工人聯合領導的活動，也在中共王若飛指揮下活動；當時她有機會接觸和河南國民軍合作的蘇聯代表團的分子（在下一章內我們回頭來說）。正因為她積極參與開封與鄭州鼓動群眾的工作，而被軍事當局（國民軍）驅逐出河南省，才回到上海。自此以後，她一直和我共同承受顛簸的命運，從中共黨內到開除黨籍，走向反對派，奮力創立新革命運動，以至被鎮壓，逃亡……

廣州的危機——中共和國民黨合作重新考驗

1925 年秋日到臨，春夏之交掀起的民眾大風暴已息止；但它衝擊整個中國社會的波浪，還不斷擴散和重複。

我黨面臨一個入黨人數激增的尖銳問題，同時面臨與國民黨保持有機聯繫的困難。事實上，自從孫中山逝世（1925 年 3 月），尤其在廣州於 1925 年 7 月 1 日成立國民政府以後，情勢在國民黨內變得複雜，我們越來越不得不重新思考，直至今日中共與國民黨關係的整個戰略。

雖然中國國民黨總體上說，是遵守（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這個黨是多成份的，各種社會基礎的成份參差不齊，裏面包括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與大地主、小商人及手工業者結盟，同時也有少數農民和工人分子；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強大民眾運動的震盪，激起內部政治趨

向的兩極化。

在 1925 年 6 月，劉震寰和楊希憫叛軍被鎮壓之後，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的確，表徵國民黨有決心在英帝國主義侵略下團結，和應付省港大罷工掀起的革命高潮。這個政府有三位主要人物：汪精衛（主席）、胡漢民（外交部長）、廖仲愷（廣州省政府財政部長，是實際上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至於蔣介石，他的權力的來源基地是黃埔軍官學校。然而，他們代表不同社會力量 and 不同利益，使他們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在統一廣東的民間和軍事權力的問題上，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胡漢民和許崇智，與廣東省最出色的買辦資產階級結盟，也與本省的準封建式大地主有緊密關係。他們在周圍集合廣東軍隊裏最落後的勢力和國民黨內敵視和中共合作的右派分子。汪精衛當時體現激進的民族主義，得到國民黨「左派」主要領袖廖仲愷的支持。蔣介石接近這兩位領袖，但有時在國民黨和廣州國民政府內，兩大趨向之間表現遲疑和搖擺。

第一個衝突發生在許崇智率領的廣東省軍隊的歸屬問題。因許已在實際上自認為國民政府的大頭領。然而，在他指揮下的軍隊參差不齊，而兵士軍餉各地迥異，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因此，大肆舞弊；賭場和鴉片館，雖然是國民政府禁止的，受到許崇智的軍官們的指使，照常開業，仍然興隆。苛捐雜稅像石頭一樣壓在勞動民眾的頭上，廖仲愷和他的同伴們多次試着改變這一險惡的局勢。但是，這個制度罪惡的樞紐，像捲在一起的多條毒蛇，是處於這個軍隊最上層。在它同謀的線網裏，在許崇智，胡漢民這幫人和決心要懲治廣東軍隊的廖仲愷之間。存在分裂的紅底線，得到汪精衛甚至蔣介石的支持。廖仲愷還得到一位「大戰略家」鮑羅廷的支持。正當鮑羅廷籌劃進攻廣東軍的戰略，許崇智和他的總指揮部也並不終止活動；他們正在計謀一個新的改變，來推翻在廣州政府的「左派」領袖，而代之以許崇智、胡漢民的班子，以及他們國民黨右派的友朋。他們的人力有限，是想依靠香港大量支持，同時與蟻

伏在廣東東江地區老巢的陳炯明聯絡。

1925年8月，在一位廣東軍軍官家人搜查的文件中，發現這一政變的策謀。逼上梁山，陰謀政變者只有鋌而走險，選擇極端方策，由胡依繩（胡漢民的叔伯弟兄）策動的挺險隊，在1925年8月25日突擊廖仲愷，當場擊斃。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的暴死，把黨內危機宣佈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此時，汪精衛和蔣介石，在自身生命危急之時，並受到鮑羅廷的極力支持，才下決心解除胡漢民、許崇智一幫在廣州的權勢。一個由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執委會，名義上許崇智也參與，經常座席來處理這個案件。另外設立特別法庭申訴和裁判這一可恥的謀殺案的嫌疑犯。數日內，的確逮捕了胡以繩的同謀三人，而胡已逃離，於是證明胡漢民不可迴避的罪狀，而受到當局嚴密監視。但由於罪案的主謀逃去無蹤，這案子變成一個懸案，整個國民黨為此狼狽不堪。許崇智圈子被這一謀殺牽連，使他失勢，這一危機全面動搖了國民黨。

在鮑羅廷的謀使下，稱為「緊急措施」的方針下，在廖仲愷被謀殺後，發出了一連串的行動方略。其中，主要的是在東江發動一次討伐陳炯明的戰爭，掃除他在東江的基地。由誰來指揮這一討伐呢？在廣州蔣介石仍是黃埔軍校的統率，是主要的力量，其次是何應欽，也統領一個特別兵團，有軍官和士兵。鮑羅廷對蔣介石和黃埔軍校教官學生更為信任，1925年8月24日，蔣介石被任命為廣東衛戍區總司令，同時仍是黃埔軍校的最高領袖。在這個事變中，他成為廣東的軍事總裁。兩天後，廣州國民政府宣告重組所有忠實於他的軍隊為國民革命軍，其中第一軍（廣東）由蔣介石率領，第二軍（湖南）由譚延闓率領，第三軍（雲南）由朱培德率領，第四軍（廣西）由李濟琛率領，第五軍（福建）由李福林率領。這是第一次廣州政府完成軍隊的統一，也同時解除許崇智在廣東的勢力。許崇智避難於上海，1925年9月1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執委會公佈以下幾項決定：（1）整頓財務，宋子文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是由

鮑羅廷推薦，（2）胡漢民被解除外交部長的職務；他被派到蘇聯代表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作為懲罰），（3）發動討伐東江陳炯明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肅清鄧本殷（許崇智的軍官和陳炯明同夥）在瓊州附近廣東南部的勢力。

這第二次廣東東江之討伐戰役的重擊力量的靠山，是由黃埔軍校士官組成，由蔣介石統領，而他的靠山是加倫將軍；作為軍事戰略家，更依賴在東江興起的農民運動的大動員，特別在海豐和陸豐，從1925年9月末開始，這一征討戰役很快使陳炯明的軍力失勢，被驅逐出廣東（11月中），同時朱培德率領的第三軍在廣東南部擊敗鄧本殷的部隊。這樣一來廣東全省才完全在廣州政府旗幟下統一。這一番廣州危機的解決的最大受益者是蔣介石，在奇蹟式的轉化之間，他積起了一大筆軍事資本，同時仍然保持國民黨「左派領袖」的聲譽。

廣州政府終於克服差點使它沉淪的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靠莫斯科軍事上和物質上的支持，靠革命力量的參與。然而，國民黨內深刻的爭執仍然存在，且不斷加強，正值預定在1926年1月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大會，集中於討論同共產黨和蘇聯聯盟的問題。

胡漢民和許崇智既然被排除廣州政府之外，國民黨右派組織起來，最老一代領袖在上海和北京成立軸心，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張繼、謝持、居正、林森、鄒魯，他們全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是監察委員會成員。他們在上海贏得一些國民黨上層幹部的同情，如孫科（孫中山之子）、葉楚傖（國民日報總編輯）等等。1925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他們齊集在北京，在孫中山遺體安臥的青雲山寺院內；在西山地區內，他們成立了一個與廣州國民黨領導對峙的機構。以「西山會議」聞名的這項集會，發表會議通過的宣言和決議案，嚴厲斥責汪精衛和廣州政府所代表的「左翼」，已背棄孫中山的訓導。他們呼籲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全會，其主要目標是通過決議，驅逐共產黨員出國民黨，解除

鮑羅廷在廣州政府顧問的職務，驅逐出廣州，恢復胡漢民的原職。他們的計謀是「聯合蔣介石，打倒汪精衛」，他們還不準備同蘇聯決裂。

這些右派分子，對共產黨員絕對敵視，卻在廣州有不少暗中支持者；不但在廣州政府內，而且在軍隊中，雖然經過最近多次討伐清除「反革命分子」，這種傳染菌在革命陣地核心的黃埔軍校已經很明顯。黃埔軍校，自從開創以來，一直是最有活力的青年共產黨員的陣地，他們集合在「青年軍人聯合會」裏，這個團體在屢次破除廣東反動派陰謀的征伐行動中起了很出色的作用。但是這個「青年軍人聯合會」已成為右派分子嫉恨和仇恨的眼中釘；而右派也在暗中建立了他們的組織：「孫文學會」，戴季陶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國民黨》在廣州一出版後，它立刻被這個團體接受為研究孫中山學說的基本文件。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謀合，而完全反映了相當普遍的精神，連國民黨的「左派」內部也有。

一件偶然事件，在當時沒有特別關注。而回想起來，像閃光一現。1925年7月中廖仲愷去世之前一個月左右，獨秀接見一位四川的同志，吳玉章；吳交給他一封信，是最近收到的廖仲愷的一封信，請他仔細看看。吳玉章是同盟會在日本的創建人之一，四川出生，他積極參加在他本省1911年的暴動，他在中共成立之後即加入，自從國民黨重組，他主持四川省國民黨的結構改革；廖仲愷也許還記得他是老同盟會，但不知他已成為共產黨員，因此廖寫信時把他當做國民黨老同志看待。我不記得這封信的詳細內容（只是在1925年8月底我離開醫院時才看到），但我清楚記得廖仲愷在信開頭就要吳玉章注意，在中國工人運動迅速發展和共產黨員在中國影響大增，表示他的恐懼不安，認為國民黨會慢慢地被中共蠶食。他認為國民黨內忠實於「總理」遺訓的全體黨員集合起來，是時候了。

廖仲愷承認自己是在廣州成立的孫文學會的積極支助者。當時中共中央為上海正在展開的事變全國性發展罩住了，沒有特別注意這封信，

連作為任何討論的題目都沒有過。回顧起來，它是很有意義的，因它暴露一位最出色的國民黨左派領袖的精神狀態，已經深受對中共恐懼意識所驅，在思索怎樣抑制它。但他也理解國民黨還深重依靠蘇聯的支持，以他的聰明和狡猾，他已經在設想一個反共的戰略。不用說他的恐懼不妥和腹中計謀與汪精衛是一致的。至於對蔣介石來說，根本就不成問題，事實上，正是他，在廖仲愷去世後，真正在支助孫文學會，使它成為一個政治工具，加強已經爭得的軍事權力。

* * *

1925年五卅後，中國共產黨得民心飛速增長，在帝國主義陣營和國內反動派之間引起恐慌，而且引起國民黨內反共右派勢力激增，這就是中共所面臨的情況。我們在甚麼程度上充份意識到國民黨內力量的分化？以及廣州危機爆發，短期和長期性的後果是甚麼？這個問題，我們還不能回答。當然，我們大家都焦急地關注廖仲愷被謀殺的悲劇，然後是危機的解決；即清除廣州國民黨最保守的一翼，對我們來說似乎比較妥當，可是我們對於國民黨核心，誰是我們的同盟者，誰是敵人（當前的或可能的），力量的對比，沒有確切的情報。我們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洞察蔣介石或汪精衛的不可測的面孔，認清他們的意向……只有一點是我們可以確信的，鮑羅廷已盡其全力來粉碎「國民黨右派」，來全力支助由不可測知的蔣介石和汪精衛體現的「左派」。的確，我們只是模糊地知悉孫文學會的存在，它宣揚戴季陶的論點，我們稱之為新右派，但是，我們的出版物、報紙，仍然不動聲色地，大為讚揚過這個左派及它的著名領袖：汪精衛和蔣介石。他們似乎已成國民黨走向激進的最大希望。然而，在我們心底深處，在上海一群負責同志間，我們感到非常不安，但又不能清楚地解釋。

獨秀自己常常表示苦惱（在私人說話時），他相信如果我們的同志繼續留在國民黨內，我們會遇到越來越嚴重的困難；但是他看不到解決

的途徑，只要莫斯科，通過鮑羅廷，全力支持蔣介石和汪精衛。蔡和森對當前與國民黨合作的形式也頗有保留，至於我呢，我從未對這個黨存有信心，也從來沒有寫過一句稱讚孫中山學說，或誇讚他本人的一文一字，而是相反的，還沒有完全掌握廣州局勢發展的意義；我表示一種憂慮，認為局勢裏包含着一些險情，我們必須警覺，有所準備，只有瞿秋白毫無保留地支持莫斯科的政策，在國民黨的範圍內維持中共與國民黨的有機合作，在黨中央執委會內，對現存情況下繼續同國民黨合作，這問題沒有嚴肅的討論。在獨秀和我的私人談話中得到同意，先讓在國民黨內的同志退出此黨，以便建立兩黨在黨外的合作。

1925年10月15日左右，中共中央委員會全會在北京召開，我出病院不久，還沒有足夠精力直赴北京，因此沒有出席，但我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執委會。在中央全會召開前的會議之前，我同獨秀有過多次私下談話，我們達到對一些大問題完全一致的結論。連瞿秋白，雖然傾右，在革命局勢的壓力下，有些猜疑，可是在他發表於《嚮導》文章中所表現的，並不怎麼反對我們的意見。這次執委會議事的程序，主要是戴季陶發表《綱領小冊子》之事件和國民黨內的變化，這是我們一件絞盡腦汁的事項。因此，我可以斷言：陳獨秀在北京中共中央全會的建議（中共號召退出國民黨）是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立場，而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

因此，在這次北京中共中央全會上，獨秀即時做出建議讓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採取黨與黨之間的合作政策，他的理由是這一「退出」可以避免自從我們採取這國共合作政策後接連不斷發生的騷擾事件。這個理由在我看來，有點蹊蹺，從原則上來說，發生的問題是共產黨員同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有何關連？獨秀的建議立刻得到會上多數參與者的反對，連沃爾丁斯基和加拉罕在內，連李守常也發言表示，同意保持現時國共合作的模式。在北方，實際上，共產黨員已經和國民黨的「左派」

建立密切合作的關係（左派人物顧孟餘、于右任、李石曾等）。據李守常說這一合作關係已有豐富結果，如果突然分離可能發生不良後患，這是一種務實的行動方式，並不基於全面階級分析。獨秀本人認為他自己的見解是正確的，但遇到一個強有力的反對也就沒有堅持下去。他的建議被全會推翻了，討論中止了，基本問題未獲解決。

在廣州，鮑羅廷全部集中於實現他的使命，大張旗鼓動員全部力量來支持由汪精衛和蔣介石形成的國民黨「左派」，宣稱中共的全部活動，不論性質如何，必須從屬於唯一的事業的急切要求，加強和鞏固國民黨「左派」成為中國革命獨一無二的成功道路。

在上海，對這個問題的分歧依然存在，除了瞿秋白與鮑羅廷意見完全一致外，獨秀對這一方針總感到不自在，而我則堅決反對，連張國燾有時也表示仇視國民黨，但說不出所以然。這時已是 1925 年 11 月底，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已接近，陳獨秀當時想出一個辦法，在鮑羅廷決定加於我們的狹小範圍以外，開拓我們行動的界限——「既然我們不得不留在國民黨內」，他這樣想「我們不一定只支持汪精衛和蔣介石代表的這一派，我們可以伸展統一行動到其他國民黨分子，除西山派系之外（根本無法妥協）。」更明確地說，獨秀認為我們應該集合國民黨內的「溫和派」，他們在上海、北京都有些人在「爭取他們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成為汪精衛和蔣介石領導的「左派」盟友，這一結盟，可以解除我們的孤立，使我們不致於單獨地面對在廣州統治的左派，由沃爾丁斯基開綠燈，獨秀召集一個聯席會議，即中共「中央」和上海國民黨「溫和派」人士，葉楚滄、孫科、邵元沖。中共中央由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代表。中共方面終於說服這三位國民黨「溫和派」與西山派分手，接受參加在廣州將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唯一顧慮是機會主義的）。這一計謀最後也沒有很大意義，或改變國民黨內和中共一國民黨的力量對比，但它證實了在鮑羅廷（仇視這

一類的妥協) 和中共中央某些同志之間的分歧。可惜，雖然我們發表反對和保留意見，鮑羅廷的既定方針實施到底，預示直向我們衝來的風暴的降臨。

第一六章

陳獨秀的「失蹤」與中央
委員會北京特別會議

三·一八慘案，馮玉祥與其國民軍

約在 1926 年 1 月末，陳獨秀在中央常務委員會辦事處留下了一張便條說：「我現在必須休養。我的職務請述之同志暫時代理。」當中央交通處的負責同志石瓊，拿着這張便條給我看時，我不免有些吃驚。因為幾天前我見到獨秀時，他雖說感到身體不很舒適，卻沒有提到需要休養。他的便條也沒說出必須休養的原因。我當時即請石瓊到獨秀的住所去看他（他的住所只有石瓊知道）。他說：「我已去過，老頭子已離開那裏。」（老頭子是黨內對獨秀的稱號）這就使我更為驚異，擔憂出了意外事件。我只好找瞿秋白商量怎樣處理，因當時留在上海的中央常務委員，只有秋白和我，蔡和森早已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大會第六屆全會，張國燾已去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商量的結果是：在各大報上登一啟事「請實庵（獨秀不常用的假名）當即告知你的行止。」

這個啟事登了好幾天，但沒有得到獨秀的回音。這便在黨內引起了極大的驚慌。大家都擔心他的安全，各地黨部函電中央詢問他的消息。一時黨內遍傳「老頭子失蹤了！」陳延年，獨秀的長子為此特來上海一行。

在這種緊急的情形下，我和瞿秋白商議，在北京召開一個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以便李大釗和加拉罕參加，同時電邀鮑羅廷、張國燾和譚平山直往北京，參與此會，以便討論陳獨秀突然離開職務及其善後問題。

當我和瞿秋白抵達北京時，李大釗告訴我們，他接到上海電報，說獨秀並無任何危險，只是因患病住醫院治療。他恐怕醫院不安全，故未說明治病和醫院地址，以免同志去看他，發生意外。我們當然十分諒解這一特殊情況。尤其當時獨秀為了同高君曼分離屬私事不願公開，也是

可以理解的原因。

因此我們決定把這一次預定召開的討論「陳獨秀隱退」的會議，改為討論當前的政治軍事局勢會議。因為自 1925 年 10 月「反奉戰爭」爆發後所形成的北方局勢已有很大變化，很值得討論。同時，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在廣州開完，其結果也值得加以檢討。我們這樣決定之後，在南方同志未到北京之前，便於次日和瞿秋白一同去訪問加拉罕。

訪問加拉罕這位著名的蘇聯駐華外交家，對我說是第一次。當時他在北京外交界享有極大的聲譽，使得英、美、法、日等列強的公使黯然無光。而且蘇俄早已聲明放棄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在實際行動上積極支持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這使東郊民巷的帝國主義外交官側目以視，深懷嫉妒。

在過去幾年中，凡是在北京的時髦政客、軍人、左傾大學教授、國民黨左派領袖、共產黨領袖和幹部，以及學生和工人代表等，都出入於蘇聯大使館，訪問加拉罕。尤其是蘇聯派遣軍事政治顧問在國民軍中工作，即在馮玉祥 1924 年 10 月倒戈反奉之後，這便更加引起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的外交使節敵視這位蘇俄大使，咸欲除之而甘心。一年以後，即 1927 年 4 月 6 日，張作霖之敢於破壞國際外交公法，侵犯蘇聯大使館，逮捕李大釗等二十餘人及劫奪文件等，正是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外交人員在幕後陰謀策劃的結果。

第一次見面時的加拉罕，給我的印象是，儀表堂堂，身材魁梧，臉部有托洛茨基式的鬍鬚，但比托洛茨基漂亮。因托的下唇很短，好似鬍子把嘴唇吃掉了。加拉罕作為一位職業外交家，的確極具吸引力。但是他對待我們只是以同志相待，毫無官僚架子，仍然保持革命家的原來面目；態度誠懇，說話爽直。但有一件事給了我一個頗為深刻的疑點：那就是，在加拉罕辦公室的石灰底的牆壁上，單獨懸掛着斯大林的照相。對我們來說，有些格格不入。當時我不能了解為甚麼要掛斯大林像。因

為記得我居留莫斯科期間（1921-1924），凡是公共場所，大會堂和辦公室所懸掛的照相，都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從來沒有斯大林的相片。我那時以為加拉罕特別崇拜斯大林，但不能理解。這個疑問，幾年後才獲得解釋，原來斯大林在 1925-1926 年間已排除了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月革命領袖，篡奪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黨權和蘇維埃政權，因而要把他的「權威」擴展到駐在各國的蘇聯外交機關去。他的照相便是他的「權威」的象徵。可是，加拉罕，正像其他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和外交家一樣，後來亦犧牲於斯大林的「權威」底下。

約在訪問加拉罕兩三日後，鮑羅廷和張國燾亦趕到北京，譚平山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重任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部長，工作極忙，不能參加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我和鮑羅廷見面談話也是第一次。我覺得他和加拉罕很不同，個子高大，比加拉罕胖些。他的態度陰沉，說話愛兜圈子，似乎染有很深的官僚習氣。我那時以為他常同國民黨上層領袖來往，或者受了那些官僚們的影響。這種想法，後來事實證明太過簡單，實際上鮑羅廷是一位玩弄外交手腕和官僚式的典型人物。

中共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

這次中央特別會議於 2 月中在北京召開，共兩天。參加會議的除了中央委員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和我外，便是加拉罕和鮑羅廷，會議議事日程是：

- 一、國內的政治局勢，特別是廣東和北方的政治情況；
- 二、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題；
- 三、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駐在地問題；這個問題是由鮑羅廷提出的。

關於第一點，主要是大家交換消息和意見。關於國內局勢，我做了一個一般性的報告。主要是概述 1925 年 10 月開始的「反奉戰爭」以來政治局勢的演化。我特別指出當時直系軍閥和奉系軍閥聯合對抗國民軍

的嚴重性。但我着重的還是上海工人運動繼續發展的情況。關於廣東的情形，我請鮑羅廷報告，北方的情形請李大釗和加拉罕報告。

鮑羅廷在對廣東局勢的報告中，認為廣東自 1925 年 7 月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正式成立，逐步掃除了廣州附近的張國楨和魏邦平的叛軍，以及隨後完全壓平東江陳炯明和南路鄧本殷等反革命武裝勢力後，廣東已實現統一，因而國民政府的勢力大為擴張，它的基礎已經穩固。同時，國民黨最有影響的右派領袖胡漢民和許崇智，已被迫離開廣東，這便給了廣東國民黨右派以重大打擊。

鮑羅廷對於剛在廣東開過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大會（1926 年 1 月），報告得極為詳細。他說，在這次大會上，國民黨左派已取得完全的勝利，因為不僅大會的決議案和宣言表示了堅決的革命精神，並公開指斥了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反革命活動，譴責了戴季陶（右傾反共）思想，開除了一些右派領袖……，當他講到高潮時，對於汪精衛和蔣介石給予很高評價。他認為汪精衛在大會上所發表的意見，差不多和我們的立場達到了一致，他是最有價值的國民黨左派的領袖，蔣介石在政治上大體和汪精衛相同；雖然他具有擴張自己勢力和個人權位的野心，但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是堅決的。因此，在他看來，擺在廣東的中心問題，是盡速舉行北伐，把南方的國民革命軍的勢力擴展到揚子江流域，和北方的國民軍匯合起來，完成中國的統一和獨立。為了實現這一巨大的任務，他主張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應遷移至廣東，以便推動北伐的進行。

關於北方局勢，李大釗的報告着重於工人和學生運動的發展，以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生長。他說：自 1924 年 10 月馮玉祥、胡景翼和孫岳共同起來反對吳佩孚，推倒曹錕，成立國民軍以後，特別是「五卅」慘案爆發後，北京與河南等地的工人和學生運動迅速發展；尤其是學生方面，北京各大學和中等學校的學生，已完全組織起來，成立學生

會，能夠動員幾萬人。守常認為北京學生運動不僅恢復「五四」運動最高潮時的規模，而且其組織更為穩固，更具有戰鬥性，在過去一年中，北京幾次大規模示威和遊行，都是學生會領導發動的。尤其是學生的思想普遍左傾，一般擁護國民革命，其中一部份熱烈地追求社會主義思想。因而我們的黨和青年團的組織發展非常之快。

在這次中央委員會結束後，李大釗曾召集了北京市全體黨員，請瞿秋白、張國燾和我出席講話，並由我報告上海的工人運動和黨的發展情形。這次會議是在北京大學第三院禮堂舉行，出席黨員約四百餘人。據青年團負責人報告，北京市團員約比黨員多一倍。這就是說北京市黨員和青年團團員合共已有一千二、三百人。當我一年前，即1924年8月從蘇聯回來路過北京時，那裏的黨員和團員合起來不過幾打人，由此可見北京黨員和團員增長的速度了。

在工人運動方面，首先是鐵路工人，不但恢復了「二七」慘案（1923年2月7日）以前的工會組織，並且有新的發展。和北京相連接的平漢鐵路，京綏鐵路，京津和京奉鐵路等工會，都重新組織起來，並已統一於全國鐵路總工會之下。北京現代的產業很少，但已有些中小企業工人都組織了工會；就連許多手工業工人，也開始有了工會的組織。這是北京前所未有的現象。在天津，以前極少工會組織，但自去年（1925年）12月20日，國民軍趕走奉系軍閥李景林，國民軍第三軍佔領天津後，工會的發展如雨後春筍一般，不到一個月組成了三萬餘工人的工會，統一於天津總工會的領導之下，唐山五萬餘礦工和其他產業工人，差不多也恢復了工會組織。此外，河南的農民運動發展極快，農民協會內的農民已有十餘萬人。即在順直省（現今的河北省）某些地區，如玉田和順義等縣，亦已開始發生了農民的群眾運動，正在和當地的地主豪紳進行鬥爭，甚至提出土地減租的要求。

李大釗報告中特別指出：在北京廣大群眾鬥爭中最突出而含有重大

意義的，是去年（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北京十餘萬學生和工人反對段祺瑞政府的大示威遊行；11月28日，學生和工人包圍政府機關，要求段祺瑞辭職，攻打章士釗、梁鴻志、李恩浩等安福系，親自到部長的住宅。29日學生和工人復在天安門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決議推倒段祺瑞政府，改組政府為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懲辦賣國賊。這一事件表明北京群眾運動已進入一個新的高潮，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可能和上海工人學生運動並駕齊驅。

加拉罕的發言限於一般軍事和政治局勢。他的主要意見是：自從馮玉祥、胡景翼和孫岳等直系將領起而推倒他的首領曹錕，進駐北京，改革國民軍，北方整個局勢起了重大變化，形成和以往軍閥混戰全然不同的局面。就是說，現在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北京和北方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如天津、唐山等都已控制在同情國民革命的國民軍之手。假如北方的國民軍和南方的國民革命軍能夠會合起來，很有可能推翻舊式的軍閥統治，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但加拉罕也承認下列事實：自郭松齡倒戈失敗（1925年12月24日），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奉系軍閥張作霖，正在英日帝國主義的陰謀指使之下聯合起來，準備進攻國民軍，企圖佔領北京和天津；但國民軍得到革命精神的鼓勵和群眾的支持，可能抵抗。但他認為只有國民革命軍迅速舉行北伐，和國民軍聯合起來才能最終摧毀奉直軍閥的反動勢力。因此他的結論和鮑羅廷一樣，即主張廣東國民政府急速進行北伐，以挽救當前的危局。因而會議轉到集中討論北伐的路線問題。

應當舉行北伐，在當時大家的意見沒有甚麼不同。直系軍閥吳佩孚脫離「反奉戰爭」的聯合陣線，反而同奉系軍閥聯合反攻國民軍。這不僅對國民軍的生存是一種最嚴重的威脅；而且對於北方的群眾運動，將會予以致命的打擊，正是站在這一觀點上，我們贊成廣東國民政府舉行北伐來援救國民軍，但用甚麼政綱來進行北伐，還沒有開始討論。鮑羅

廷卻突然提出了將來北伐軍所應遵循的路向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鮑羅廷發表了冗長的意見。

他舉起一本關於太平天國歷史，一本厚厚的書，向我們沉重地宣告：「這次北伐必須從洪秀全的太平運動失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他強調地指出，「太平革命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太平佔領武漢後，不應向南京和上海發展，而應該直搗北京，佔領首都。假如是這樣，洪秀全可能一舉而摧毀滿清王朝，在北京建立他的革命政權，以後逐步向東南發展，達到完全勝利。但太平軍從廣西經過湖南達到武漢後，即揮軍東下，直取南京，並向上海方面進展。這便同上海的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堡壘發生了正面的衝突，以致最後為西方列強所扶植的淮軍（李鴻章統率）和湘軍（曾國藩指揮），以及帝國主義直接組織的『義勇軍』（由戈登將軍指揮）聯合進攻所摧毀。」

根據這個最實際的歷史教訓，鮑羅廷主張北伐軍應當從廣東通過湖南到武漢，然後沿着京漢鐵路線直趨北京。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同上海強大的帝國主義堡壘發生直接衝突，同時又可與北方的國民軍互相聯絡，首先消滅直奉兩系軍閥的勢力，然後，再進而解決南京和上海的問題。這將是未來勝利的最大保證。

對於鮑羅廷的主張，我保持懷疑，認為是片面性。我當時所持的主要理由是：20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的情形大不相同。其中最基本的不同點在於：當太平天國運動發生時，上海及其周圍的城市完全沒有現代化的工業和工人階級，而現在那裏不但成為大工商業中心，而且擁有一個數量相當龐大的工人群眾，而且這個龐大的工人群眾在「五卅」運動中幾乎全部組織起來了。而且在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鬥爭中，顯示了他們的巨大威力，成了全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假如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向這方面（南京和上海）推進，一定能獲得廣大工人群眾的有力支持。不但可以抵抗帝國主義的壓力，而且可能癱瘓帝國主義在中國的

這個堡壘——上海租界，以此達成民族的獨立。因此，我認為北伐軍應當向兩個方向推進，一方面沿着粵漢鐵路線前進，攻打武漢，佔領華中工商業中心，再向北進，和北方的國民軍匯合；另一方面，從江西、安徽和浙江進攻南京和上海，以便獲得上海方面廣大工人群眾的支持，佔領中國這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消除帝國主義在華的基地。我這個意見，雖然是我一人提出，當時出席的中央委員都表示同意，即加拉罕亦未加反對，但鮑羅廷還在堅持他的主張。所以這次會議對於未來北伐軍所應遵循的路線，並未做出最後的結論，留待將來再行討論。北伐路線問題將在 1926 年夏在廣州確定。

會議討論到中央駐址的遷徙問題。這個問題是鮑羅廷提出的。他強調說：為了推進北伐，為了鞏固北伐軍的後方基地，為了動員群眾支持北伐，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必須遷往廣州。但首先表示不同意的是加拉罕。在他看來，中央委員會應當遷移北京。因為北京是中國傳統的首都，現在又在國民軍左傾的將領控制之下（當時北京的警備司令為鹿鐘麟，號稱國民軍第一軍中的左派軍事領袖）；同時，北京的學生和工人運動，以及天津和唐山等地的工人群眾組織（工會）正在蓬勃地生長。如果中央委員會移駐北京，將會推動整個北方的群眾運動，首先是加強國民軍的左傾，這就間接加強北伐的勢力……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除李大釗贊成加拉罕的意見外，都主張中央委員會仍留在上海，因我們覺得上海是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心，我們黨在這個中心已建立了強固的基礎。同時，上海交通最為便利，可以兼顧華中、華南、華北。如果中央委員會遷移至廣州或北京，勢必偏處一方，不能顧及全國的運動。此外，我個人認為奉直兩系軍閥正在聯合準備進攻國民軍，北方的局勢極為危險，北京有重被奉系或直系軍閥佔領之可能。因此，我認為加拉罕的建議是最不妥當的。由於我們多數中央委員的堅持，中央委員會的遷移問題，便自然獲得解決，即繼續留在上海。

這次中央委員會的北京特別會議，無論對於當時的政治局勢或北伐問題，都沒有作出正式的決議。事實上這是我們中央委員會一部份委員同加拉罕和鮑羅廷交換意見的會談。但從這次會談中，可以看出鮑羅廷和加拉罕所代表的傾向：他們把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寄託在南方的國民黨和北方的國民軍之上，而完全忽視了這兩者所代表的階級性質。尤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鮑羅廷對於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的廣東局勢，表示極度樂觀，因此強調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應遷移廣州，以便推動北伐。加拉罕對於北方的情形，雖不像鮑羅廷那樣樂觀，但他相信國民軍的革命精神可以抵抗奉直兩系軍閥的聯合進攻，因而主張我黨的中央委員會移駐北京，以便加強國民軍的「左傾」。但恰在這次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開過一月之後，北京便發生了「三一八慘案」，廣州則發生了蔣介石的「3月20日政變」。假如我們當時聽從加拉罕或鮑羅廷的主張，將我們的中央委員會遷移至北京或廣州，那勢必陷於異常狼狽，甚至極度危險的境地。李大釗正是因為「三一八慘案」後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迫害而逃入蘇聯大使館避難，以致一年之後死於張作霖之手。

莫斯科在中國活動的三個中心

有關我黨中央長期駐地的爭執，反映了鮑羅廷和加拉罕之間存在的權力競爭，同時讓我們發覺蘇聯在中國保有三個實力中心，圍繞着三位主要人物：加拉罕，鮑羅廷和魏金斯基。他們各有一個地區據地。所以對於他們的行動範圍，他們的個別作用和職務加以敘述是有必要的。

加拉罕以駐華大使的資格代表蘇聯政府從事外交任務，但實際上，他也擔負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任務。自1923年他抵達北京後，曾不斷地同各種各派的「左派」軍人和政客，大學教授，以及國民黨左派領袖接觸，企圖給他們以影響。自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直系將領起而反叛他們的上司曹錕、吳佩孚，佔領北京，成立國民軍後，加拉罕更以全力

影響和推動國民軍，使之和南方的國民黨接近，站在反對北方軍閥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奉系軍閥及其主子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凡是蘇聯派遣顧問至國民軍中工作，和蘇聯給予馮玉祥一切物質上的援助（如軍火等）都是由他主持的。他對於北方的鐵路工人運動，亦曾做過重要的貢獻，對於中共北方區的黨務工作，他也提供了不少的意見。李大釗差不多經常和他商討有關北方的政治、軍事和群眾運動等問題，以及我黨和國民黨的工作方針。從這方面說，加拉罕亦兼任了共產國際代表的任務。

鮑羅廷在廣東，名義上是蘇聯特派到國民黨政府以及孫中山的顧問，但實際上他也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因而他擁有龐大的權力。不但蘇聯派遣到廣東國民黨及其政府和軍隊中工作的一切政治和軍事顧問，要受他的控制，蘇聯對國民黨政府的大量物質援助（軍火、金錢等），也由此主持。就是廣東的工農運動和共黨黨部亦直接在他的指揮之下。根據我們知悉的蘇聯制度，鮑羅廷在形式上是隸屬於加拉罕，也必須向加拉罕報告一切開支，而且不得不通過北京大使館把廣東的所有郵件和文稿傳送到莫斯科。

至於魏金斯基，名義上和實際上都是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他的任務僅是傳遞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訓令，並把後者的意見或請求轉給共產國際，以及向國際報告有關中共活動的情形。他的書信直通莫斯科，僅留一副本給加拉罕的檔案。他對於加拉罕在北方的一切政治軍事活動，和鮑羅廷在廣東援助國民黨及其政府的活動，都不過問。事實上即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也無法過問，所以對於加拉罕在國民軍中的工作計劃和鮑羅廷在國民黨政府及軍隊中的計劃和活動，如此隱密，實在知道得很少。

關於蘇聯援助馮玉祥軍隊的計劃和目的及其實際情形，我們中央委員會從未得到國際的通知或國際代表的報道，只是模糊地聽說有些蘇聯顧問在那裏工作。迄至這次中央委員會北京特別會議開完後，我才得到

一個機會和蘇聯大使館的武官談話，從他的報告中第一次得悉蘇聯派遣了大批顧問在馮玉祥軍隊中工作，並供給了大量的軍火。其目的在於轉變馮玉祥及其軍隊為一種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武裝勢力，為國民革命服務，對這種情形，我當時曾產生一種感想，認為蘇聯共黨對援助馮玉祥軍隊這種有關中國整個革命運動的重要措施，事先既毫不徵求我黨的意見，事後又不把情形告訴我們，只是命令我們共黨在宣傳上支持馮玉祥和國民軍，未免太蔑視我黨的意見了。

由上述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蘇聯代表指導中國革命運動有三個中心：北方的加拉罕，廣東的鮑羅廷和上海的魏金斯基。其中以魏金斯基的權力為最小，因為他不但沒有加拉罕和鮑羅廷所代表的蘇聯國家和蘇聯共產黨的威望，手頭擁有龐大的物質力量（如顧問，軍火和金錢等），而且要受到蘇共中央直接派遣的代表的監視。自「五卅事件」後，蘇共不斷派遣代表來上海。這些代表們間或亦和魏金斯基參加我們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會議。但他們的態度很有些神秘。他們的真實姓名和他們在俄國的地位，從未告訴過我們。

有一次，我們在魏金斯基在老靶子的寓所開會，碰上一位「無名氏」的俄人，自稱來中國有一調查任務，他亦多少是監視魏氏。過後，我忽然感到一種懷疑，猜想他必定是那封上海來信（1927年）三位作者之一，其中控訴魏金斯基在中國犯的「嚴重錯誤」。

1925年秋，在中央同魏金斯基一次正常的會議上，會議是在公共租界卡德路一位俄人居所召開。這位蘇聯同志，年近五十多歲，自稱是共產國際派來的，用假名，看來不是純俄人，而是含有黃種的混血兒。這位共產國際的同志，非常自傲，用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魏氏。而後者在他面前特別謹慎。當獨秀報告上海情況時，他更是以明顯的鄙視對待下屬的方式來處理……。

魏金斯基在他們面前似乎居於屬下，顯得更加小心謹慎，就他的性

格說，是謹慎而溫和的。在政治上，他缺乏獨立的觀察能力，對於新發生的事變及其所引起的重要問題，他都不能形成自己的意見，只是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訓令。因而在國際訓令之外的重要問題，尤其關於實際的策略問題，他並無成見；寧可說，他是常常同意我們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多數人的意見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具有較大的自由，不像廣東中共的省黨部，深受鮑羅廷的束縛。例如，對國民黨的態度，我們的中央機關報告仍然遵守共產國際的路線從事宣傳。但在實際上，我們是無視國民黨的，我們把全部力量集中在發展工人運動上，特別放在上海工人運動上。在工人群眾中，我們從來不用國民黨的代表名義發言，宣傳三民主義，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但在鮑羅廷指揮下，中共廣東省黨部則相反；一切工作都圍繞於國民黨的周圍，一切活動甚至在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活動都用國民黨的名義，直接執行國民黨的命令，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便最露骨地表現共產黨完全居於國民黨的附屬地位，表現共產黨人是國民黨在工農群眾中的代理人。

這裏我舉一個例子顯現廣東的情況。1925年，有一大批年輕的中共黨員從莫斯科回國，最初到上海，一般是接受中央指派去各省的工作崗位，而廣東省委經常要求我們派人去廣州。起初我們以為要加強我們自己在廣東的組織，但是，每次有新的同志來到廣州，立即由鮑羅廷截去強迫他參加國民黨的機構，或在軍隊的政治部，或去政府機關工作，或者為已參與廣州軍隊或政府的蘇聯顧問做翻譯……。對這種把我們最優秀分子調轉他們的目的，而為國民黨服務，令我們深深不以為然。這種現象不斷發生，陳獨秀不耐煩了，寫信給陳延年，他的長子又是廣東中共省委書記，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人並不是國民黨的苦力！」這句話傳到鮑羅廷的耳朵裏，以最直截了當的反辯說：「對，為了革命，共產黨人應當做國民黨的苦力！」這句話成為「歷史性」。它反映了當時已經成為蘇聯和共產國際最高統率的斯大林，極盡心力造成的災害的深度。

我們代表中共中央四位同志（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彭述之）和兩位蘇聯代表（加拉罕、鮑羅廷）的特別會議結束後，守常趁着我們留在北京的機會召集市區活動分子會議，邀請我們報道上海發生的事件。此外，守常還想讓我們正式會見北方的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同時他願介紹給我們幾位首都激進知識界的首要人物。他問我對於他組織這些活動有何意見？當然，對於國民黨領袖和其他時髦人物我並不特別感興趣，但亦不覺得有不便之處，相反地讓我們更能了解北京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決定在回滬之前，在首都逗留數日。

當我們涉足於北京那一刻，我就有一種奇怪的輕鬆感覺。的確，在上海我們必須經常遵循地下（秘密）工作的規則。可是，我們來來往往開會等活動並不需要過份的謹慎，來到北京，我感到在市內到處行走幾乎完全自由，甚至在守常經常陪伴和導示之下，他似乎不太注意安全的問題，而他正是北方中共而且也是國民黨第一號領袖。他帶我們到城南公園去散步，他還請我們到天安門附近小街口一家不顯眼的小館子去嚐到北京原味的羊肉火鍋，而這家小館子又是數十年來京區顯赫人物最珍惜的地點。人們在此處可以長時間閒談……，守常介紹給我們北大最聞名的急進派教授——陳啟秀，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這位又有學問又有語言天才的紅色教授，是大家傾慕的，因他在課室裏大大引用他熟悉的日文、法文、英文或德文的著作。由於他的名望，加拉罕個人推薦被邀請到莫斯科作研究。他是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請我們到他的豪華住宅用晚餐。這是一所半北京庭院，半二樓洋房的住宅。他的談吐爽快，又相當謙虛的神情，使我產生好感。他向我提到加拉罕的一個計劃，是建立一所中俄大學，經費由蘇維埃政府得到庚子賠款，變成中國文化事業的基金，像清華大學建立的基金那樣，加拉罕想把這件事交給他做主。陳啟秀對這件事非常熱心，想把我說服日後再來北京，當此事具體化了，跟他一起來幹。

我們因此感到能夠見到首都激進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而不致於落到當局的陷阱裏。原因是權勢方面由於政治軍事力量不穩定，所蘊含的曖昧關係，北京衛戍區首領當然是馮玉祥的下屬，但是政府是由段祺瑞和他的一夥人控制，都又沒有軍事力量而不得不依靠國民軍。它駐在市內的軍隊也有所顧忌，不敢妄為。最近數月內，北京學生可以不需經過批准，集合八千上萬的群眾，而且這類示威是經常舉行的。每次示威時，軍隊派出士兵們的正式任務是「保護」群眾隊伍，而事實上可能是監視活動，避免事故；原則上這些士兵的出現不存在鎮壓的意義。總之，這種相對緩和的氣氛，有利於各種各類的政治會議，也有利於我們的運動在北京擴展。

在北方首都居留的國民黨領袖，在名義上差不多都是國民黨的左翼。除了李大釗，事實上是他們的首領，都另有所屬。因他同時是中共在北方的第一號人物。這一撮人裏當時有于右任、徐謙、李石曾、顧孟餘、王勵齋、丁惟汾。我們代表中共中央在國民黨北京辦事處一起開了一個會議，出席的只有四位：于右任、李石曾、顧孟餘和王勵齋。徐謙不在，也許去了莫斯科，丁惟汾是一位老同盟會員，不起積極作用。

這次的會議本來是圍繞在北方雙方建設性合作這一主題詳細交換意見。可是，最終說來，它僅是以客套性的閒談的方式出現，並不是一次嚴肅的政治討論，或是因為這幾位國民黨「左派」領袖不願坦白說話，或是因為他們實在無話可說；他們的演說是那樣無意義，竟然完全從我記憶裏消失。但從他們對小事件或對某些資訊字裏行間的問話裏，繪出每位人物的形態。除了于右任和王勵齋，已經上了年紀（六十有餘）是國民黨的「長者」，已不太活動，我不去多說；他們倆表現倦意，尤其是王勵齋，沉默寡言。至於李石曾和顧孟餘是著名人物，而且在一個時期的重要事件上還會起不能忽視的次等作用。不僅如此，他們是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搖身一變為職業政客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把他們的肖像加

進一套已很豐富的人物素描，不管是革命家或反革命分子，殉道者或叛徒，在多難的中國廣大的歷史畫廊裏不是多餘的吧！

李石曾是一位將近五十歲的乾癟的小個子，但他舉止強裝成一位法國式的紳士。他對人傲氣十足；說話時，必昂起頭表示有些蔑視，或者是顯示他高貴的身份。如果細聽他的言說，就會發現一般是空洞的，添上一些激進的或無政府主義式的，但已經陳舊的套語。這是一件著名的事實，在廿世紀初，李石曾在法國讀書時，接受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而且同吳稚暉一起在巴黎創辦「新世紀」的中文刊物，成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刊物宣傳反對任何國家形式。這種信仰並沒有阻礙他們加入同盟會，而後者主張推翻滿清，然後在清朝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共和政府。當時李石曾和吳稚暉大聲宣言，他們只為革命效勞。他們的箴言是「不做官」、「不要錢」；這種漂亮話語給予他們「清白無染」的盛譽。辛亥革命失敗後，李石曾脫離孫中山的政黨，他仍然在茗茶飲酒之間，嘮叨述說無政府主義行動的軼事，過着安逸的生活。事實上，他官家出生，沒有錢的問題。

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李石曾到廣州支持孫中山政府，立即加入國民黨。他避免公開發言，但私下在政權的帳幕裏，他總愛表示是真正的激進派，因此得到國民黨左派領袖的美譽。不久，不貪污，一塵不染的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會讓我們大吃一驚。

我們在北京見面一年之後，1927年2月間，李石曾負責周旋於張作霖（奉天首腦，日本的附庸）和蔣介石（正在磨尖刀子向上海革命無產者揭開殺戮）之間；他自稱為「中間調解人物」，主張北方與南方緩解調和，即在奉天系軍閥和國民黨的反革命派之間調和，一致消滅共產黨的反戈。

至於他「不做官」，「不要錢」的美譽，一兩件小事就已經揭穿令人看到刺眼的劇幕。雖然他在國民黨政府內從未有明顯的職位，但他是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長年的委員。以此名義，他受薪之實不比政府最高官員更差。說到「不要錢」，最強的表现是在1930年代轟動一時的新聞，北京故宮盜竊文物事件中，他是此案的主要策劃人，他的同謀是故宮的主持人，易培基，也是國民黨左派領袖。他們以換取獨一無二的故宮寶物，用仿製的假文物代替，把稀有文物偷運往法國販賣，直到由馬賽海關發現，抓住中國偷運犯……。

如果說李石曾極力仿效法國式的紳士派，那麼顧孟餘是學上了日爾曼式的博士的大學教授，年約四十歲。他擺出一副堅定冷靜，思念深刻無限的派頭。他曾在德國修學數年，腦子裏充溢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流行的改良主義思想。他認韋納·宋伯（Werner Sombart）為精神導師。在北京大學他有一教職，回國後，他把一些混雜的觀念攪在一起，寫成一篇有關馬克思學派的學術論文，發表在《新青年》馬克思思想專刊（1919年5月）內。頓時，他變成馬克思思想的專家，又是一位時髦的左派教授。1924年他加入國民黨，正像許多其他人物，他常在學生召集的大會出現，高喊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口號……，很快被認為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之一，而且，他經常出入北京蘇聯大使館（我在北京逗留的短短幾天裏，竟然在蘇聯大使館碰到他兩次，完全是偶然的）。因此，他在共產黨人和激進學生隊伍中，享有革命知識分子的明星的感覺。本來他可能為這麼多榮譽付出代價：1926年「三一八」事件發生後，段祺瑞政府對他下通緝令。他向南方逃避，抵達廣州時正巧是蔣介石向共產黨人下招降令（1926年5月）奪下廣州政權所有機構的領導權。顧孟餘被邀入席，沒有任何表示保留，而即指定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年之後，1927年5月，他到了武漢，投靠汪精衛，在武漢的國民黨也擔任同樣的職務。他成為汪精衛的親信、幕後的戰略參謀。以此他是汪精衛和馮玉祥為了發動反共攻勢的秘密會議裏的中堅分子。同樣地，他隨從馮玉祥到徐州，同蔣介石商討一個南京和武漢（蔣

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合作計劃,目的是摧毀全中國的革命運動。這一些有利於反革命的陰謀舉動,最終暴露出這位「馬克思主義靈魂者」、國民黨左派領袖醜惡的偽幣販賣者面目。

李大釗趁我們來到北方首都之際召集一次全市活動分子大會,讓他們對上海最近政治社會演變有所知曉。令我們驚異的是,我們就安然在北京大學第三樓理工學院的大禮堂進行會議,有四百多人參加,全是共黨黨員及少數共青團的活動分子。李大釗主持會議,立即要我講上海黨內情況和工人運動,然後請剛從德國回來的夏秀峰(原是北京高等工業學校的學生,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講德國的局勢,尤其是德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

這次會議本身並沒有特別意義,但它使我們領悟到北京我們運動生動的脈搏。我還記得1924年8月,我從莫斯科路經北京時,只有數十位同志,黨和青年團都在內,而今天他們已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人數,青年團佔多數約三分之二。這一擴張表現北方共產運動的活力和驚人的成長。

這個運動的負責人,就是北京中共市委,其書記劉伯莊,和其他委員趙世炎、陳喬年、陳為人和何孟雄。趙世炎和陳喬年同時是中共北方局成員,書記是李守常。實際上說,中共北方局的涵義比較抽象,覆蓋一個太廣闊的幅面,包括黃河以北的省份:河北、河南、山西和山東,也包括東北三省以及內蒙古。具體來說,工人運動正在河北、河南、開灤煤礦,在唐山,在天津,也在北京市區內發展。北京市委完全控制,而由強大的北京學生聯合會組成的學生運動,是北京最重要的力量。在北京國民黨的所有活動自然由中共北京市委推動,組合並納入群眾運動之中。如果學生運動,甚至國民黨能夠組織公開示威或半合法的行動,中共機構是完全秘密的(地下的),卻仍舊不斷同群眾組織保持經常的聯繫。當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鎮壓革命運動時,中共這一基本

形勢因此避免被完全摧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北京中共市委成員，我已經在莫斯科居留時期和北方中共改組時介紹過劉伯莊、陳喬年和趙世炎。這次，尤其是趙世炎、陳喬年忙於宣傳工作，沒有時間多談……，我也沒見到何孟雄，但卻同陳為人多交談一些。他是湖南人，也是餘養里的成員，但他沒有直接從莫斯科回國（1922年秋），而在哈爾濱滯留數月，跟蘇聯同志一起在中東鐵路上工作。高個子，面圓清秀，常帶笑意，他熱情接待我，要我去他家見見他妻子，但可惜沒有時間，使他失望了。從1923年開始，他同《嚮導》合作，經常寄來稿件。

馮玉祥、莫斯科、中國共產黨

加拉罕多次着重指出，而我本人也從未低估的北方政治軍事上顯要的事實，就是國民軍的出現。它原本是屬於直系軍隊的一部份，經過重新組合，在馮玉祥的指揮下，得到莫斯科的支持，甚至於呈現幾乎革命的形象。到底它的優勢在哪裏？在黃河以北革命演變中的實際重量？它的首領們，尤其是最高指揮——馮玉祥屬於哪種政治軍事的形勢版圖？……這些是我們當然要問的重大問題。正當我出訪北京時有一個特別機遇，使我掀開遮掩的帷幕一角，看到膽戰心驚的情景；為了支持國民軍，莫斯科對它發出的軍事和財政援助，通過幾道消息，特別是由碧蘭證實了的（她在1925年夏，從莫斯科返國後在河南居留兩月）。我知道已經有六十位蘇聯顧問在國民軍第三軍（由岳維峻統率，代替去世的胡景翼）中工作，碧蘭不但證實他們到了開封、鄭州，而且形容他們具體的生活狀況。因她在開封，為了逃避河南軍方對她在市內工人群眾裏做政治宣傳的追蹤，到他們的總部住了一個星期。正是在這個總部，設立在原來帝王的行宮內，住着一位蘇聯首席顧問；周圍有五、六位參謀，還有四十到五十位軍事顧問，全部住在大花園一所大宅內。裏面全面現

代化設備，也有網球場，游泳池……岳維峻和他的屬下的士官們，都是這位首席顧問住所的常客。有些顧問被指派協助在河南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飛同志所監顧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但是他們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國民軍第二軍訓練軍官和完善隊伍。我知道這一巨大隊伍的支持費用全部由蘇聯政府負擔，但我全不知悉莫斯科對整個國民軍，尤其是馮玉祥統率的第一軍，以及維持北京治安的第三軍，在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正巧在這時我遇到一位北京蘇聯大使館的武官，這一件籠罩在陰影中的真相突然大白。我向他直接問到關於國民軍的事；它的軍隊數目、運作和軍器等等。他很坦然地，根據數字告訴我，武裝槍械有多少，給馮玉祥軍隊有多少顧問，經常維修費，甚至士兵軍餉，都完全由蘇聯政府支付。他說自 1925 年春季計算，大概共有六百萬盧布花在軍事各種費用上，實際上，賬目記在大使館內，那裏就是滿足這些招募兵大量花費的錢庫真相六百萬盧布！

這個數字在我耳朵裏震響，開始是金元的叮噠聲，然後是鋼鐵的敲擊聲和戰爭的囂張。我不能壓制心中的驚愕，為甚麼蘇聯武官認為可以把他的政府給予馮玉祥軍隊的大量支持的詳情告我？也許他覺得既然我是中共中央成員之一，告我情況是正常的，也許他已經告知李守常真相。總之，他只給我技術性的消息，而並不涉及政治性的一面。其實與他無關，由於這項消息的重大，卻令我吃了悶棍，震驚不已。過後思索一下：聯共政府既然採取對中國整個革命運動有嚴重性的措施，而沒有事先徵求我黨的意見，也沒有讓我們得到明確的信息，同時要求我們支持馮玉祥和國民軍。他們這樣做，豈不是明顯地鄙視我們！但我毫無渠道表示抗議，甚至對守常也不能，因他也從未提到這件事，唯一的是獨秀，在我回上海時即告知真相。當我把同蘇聯大使館武官交談扼要告訴他之後，我說：「蘇聯對馮玉祥有這麼龐大的支持，我們還蒙在鼓裏！我的印象

是蘇聯在中國有幾個領導，而我黨實在無足輕重！」獨秀沒有表示，只是沉默，意識到我們是無力以對。

將賭注放在馮玉祥和他的國民軍身上，莫斯科，很明顯地想重複同國民黨及它「左派」的軍事領袖蔣介石完成的經驗。不過，自從 1924 年 10 月北京政變以來，馮玉祥所有的政治計謀對任何清醒的人只能引起最大的疑慮，而且我黨在他奪取政權後，不斷公開警告。獨秀筆下曾有政論如下：「剛發生的北京政變，顯示帝國主義拋棄吳佩孚代表已經用舊了的工具，而採用馮玉祥代表新的工具。新的代理人比較馴服，比較更受『輿論』的支持。最近北京英美人士多為宣耀『基督將軍』率領的軍隊的良好秩序，也高唱年青的基督教徒和政治人物，像王正廷……正努力號召人們向馮玉祥靠攏。這一切只不過是為這位新代理人上台做招搖。」他的結束語：只有不斷地對所有帝國主義者和所有軍閥堅決鬥爭，才能保全國家的和平和穩定。

陳獨秀對馮玉祥這一意見，也是我們一致的意見。這個意見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基本上它是正確的。因為在馮玉祥向他上司曹錕、吳佩孚倒戈政變這一舉動裏，就證明他是一位新的軍閥。他往後的舉動更加強我的判斷。正當他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議全國和平妥協事宜的同時，他已經與張作霖安排好交託段祺瑞成立臨時政府，因此擺在孫中山面前的是既成事實，而當段祺瑞組織「善後會議」來抵制孫中山的要求，召開一個「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成立統一全國的臨時政府時，馮玉祥保持沉默，而實際上是支持段祺瑞。因此他讓孫中山處於極為尷尬之地，然後使他絕望，病情嚴重化，以致於到死亡。馮玉祥因而暴露他的奸猾性格，以及他真正的意向：代替他的上司吳佩孚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佔領一個仲介人的位置，爭取國外盟友，即英美帝國主義者的信任。但他還沒有變成他們新的工具，主要原因是在中國政治棋盤上起決定作用的英帝國主義，仍然不願丟棄它長期訓練成的忠實代理人吳佩孚。確

知馮玉祥系是親美的，它更不願意在一個未經考驗的新代理人身上下注。

正是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在 1925 年春，張作霖在北方發動軍事攻勢來對付國民軍。也正在這個時刻，蘇聯政府通過它在北京的大使，乘機與馮玉祥會晤，而馮玉祥當時處境之危困，因而不得不嚴肅考慮莫斯科的支持，莫斯科的盤算是：未足的軍事支持可以充實馮玉祥的軍隊，更好地對抗奉系軍事力量，同時減少對俄國東部邊境的威脅。同時加強保衛它在中東鐵路的權益。這全是多種特殊情況的匯合逼迫，馮玉祥接受同蘇俄的聯盟。具體地說，由蘇聯政府供給他維持生命不可缺少的援助，使馮玉祥變成本來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理想代理人，而成為莫斯科暫時的盟友。

雖然馮玉祥獲得蘇聯戰爭物質和專家的充裕投入，但在政治交換條件下不作任何讓步。由於他極重視士兵們對他個人的忠誠，所以決不容許在他軍中宣傳反帝國軍閥的言論。倒是在五卅運動革命高潮直接衝擊下，再加上奉系軍閥的攻勢逼迫下，他才不得已地容許國民黨左派分子及少數共產黨人，在他的勢力範圍內，而絕不是在他軍隊裏，作有限的政治宣傳，而且讓學生工人們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但是他盡力遏止像 1925 年 11 月 28、29 日，北京市民表示堅決抵制段祺瑞政府的真正革命示威：馮玉祥對段政府表示擁護支持。

然而，1925 年 11 月 28、29 日的示威運動，不僅是北方革命運動，而且是整個國民革命的命運臨到緊要關頭。這一示威運動形成了黃河以北一連串緊跟着的政治和軍事演變的鏈鎖中心。

事實上，同時發生的是直系發動反奉系的新的內戰（1925 年 10 月底），直系將領孫傳芳從奉系手中奪取長江流域的戰略地位的兩個城市，南京和上海。原因是奉系當局對五卅運動鎮壓極不得民心，而被迫退出。當吳佩孚直系首領，捲土重來到武漢，率領他的軍隊來向北「征」時，駐在河北奉系軍中最優秀的部隊發生反叛。叛軍的領袖郭松齡宣佈投向

國民軍，對張作霖系統軍隊倒戈，使他們不得不退回到原來的巢穴。他直衝遼寧，遇到很少奉天僱傭兵的對抗，於是向後潰退。郭松齡節節勝利，他的軍隊行進無阻，衝過山海關，深入滿洲廣闊的境地。就在此時此刻，北京爆發了民眾示威，要打倒和張作霖及日本帝國主義連在一起的著名漢奸段祺瑞。1925年11月28、29日的真實意義是：由於北方中共和群眾組織的大動員，結成全國性的行動，目的是把軍閥之間的內戰轉變成一個大幅度的國民革命，直接目標是掃除段祺瑞可恥的政權，張作霖和他的軍隊被郭松齡的叛軍包圍，沒有日本的直接干預是不能脫困的。而北京衛戍區的統率是呂宗齡，國民軍馮玉祥的下屬，只要馮本人做一姿勢，段祺瑞臨時政府就會像紙牌坍塌一樣，而可展現北方全副新的政治前景，但必須斬釘截鐵，快速進行，以致敵人沒有反動的時間，本來很可想像國民軍，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橫掃所有北方省份的軍閥，從河南到熱河，從河北到山西，同郭松齡叛軍配合一起，把日帝和其傀儡張作霖驅逐到東北三省境外。如果在北方有這樣的變局，對廣州北伐進行大有幫助，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對抗駐在長江流域，由英美帝國物質援助的直系軍閥（以及西南系統）。

在北方有蘇聯使節的催促，又有中共和國民黨人的祈求，馮玉祥進駐張家口後，佯裝對北京的情況不了解，卻在暗地裏給北京衛戍區司令指示堅決禁止任何集會，全力支持段祺瑞搖搖欲墜的政府。這裏他毫不猶疑地表現了他從心底如何敵視真正的國民革命。

正因此人民群眾受到第一回挫折；他們沉默了，而段祺瑞仍然在位。郭松齡單獨率領軍隊，越來越深入敵人的陣營，但全無國民軍的支持，即使如此，他的部隊奮力攻打奉天軍隊進駐的城市；攻下荊州、營口，最後達到張作霖親自指揮的優秀部隊駐軍的瀋陽城下，這位東北霸王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就在此刻（1925年12月21日）派到滿洲，軍備充實的日本軍隊發動攻勢，來代替潰敗的奉天部隊；正是日本軍隊在戰

場上直接橫暴的干預，致使郭松齡的部隊遭到痛擊。而郭松齡被捕，被處死，使這一英武的事跡變成為悲慘的失敗。

奉天系的險境過去後，日帝趁勝利之機，促成直系與張作霖結盟（1925年12月末），一致向國民軍開戰；昨日的聯盟者登時換了陣營。

國民軍第三軍剛開進天津城裏，趕走了奉系將軍李景林，第三軍的司令員孫岳因此變成了河北省省長。但同時，國民軍將領間的權爭發作，撕破三軍間的聯合一致。1926年1月初，馮玉祥不滿於孫岳得利，也不願把他的完整的軍事力量投入戰爭，辭去他在段祺瑞政府內的職位，而把他在國民軍中的權力交託給他的親信張三江。此外，他宣稱自此以後由他統率所有軍隊，再不用「國民軍」的稱號。他聲明即將出國一行。

1926年1、2月之間，當國民軍第二軍漸失河南陣地在轉入山西，陷入直系軍隊的炮火中，而國民軍第三軍在天津海港大沽，受到由日本艦隊掩護下奉系海軍大砲襲擊時，馮玉祥在社會主義的蒙古接洽並收穫從蘇聯大批運來的軍火，來裝備他駐在西北邊境的軍隊（在綏遠、甘肅、察哈爾）以及留在北京的衛戍軍，以防段祺瑞同奉系盟軍不斷謀劃的政變。

至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北方最近局勢的變化，感到越來越不安。我們對於在直奉兩系軍閥烽火交接之下的馮玉祥和國民軍，不得不調整立場。我們不能不對他們予以明確的政治支持。但是，對於莫斯科正在用盡吸引絕技，要把馮玉祥爭取過來，我們全然不知。我們直截了當地批評國民軍首領們的可疑行為。我也許是其中表示立場最明顯的一個。在1926年1月14日，我黨中央機關報《嚮導》，我曾寫道：（三）此次反奉唯一武力，本以國民軍為中堅，而國民軍的首領馮玉祥始終採取猶豫態度。自江浙戰爭至現在，馮玉祥並沒明確的政治宣言，對民眾表明他的態度。而在行動上，馮玉祥始終只顧他個人的軍事計劃，始終按兵不動，以致失去許多機會。如果馮玉祥在郭軍反戈之時，與國民軍

二三軍一致行動，急速結束李景林，結束張宗昌，進而以全力助郭，則奉張雖有日本帝國主義之幫助，亦未必能幸免。至少郭松齡不致一敗至此。如郭松齡不敗，則直系自不敢遽然與奉張妥協。而反奉戰爭，未嘗不能達到最後目的。¹

我離滬去北京之前，在另一篇文章（1926年2月初）登在《嚮導》裏²，更進一步發揮這個想法。雖然我重複對受到北方最落後的武力的攻擊之下的國民軍表示團結支持，但我提示國民軍的將領們患一種不治之症；他們軍閥的特徵，在目前他們還起積極的作用，但在任何時候，他們都有可能恢復正統軍閥的面目。我還提到馮玉祥和岳維峻是「大野心家」，深受封建習俗的烙印，而他們的軍隊裏充滿土匪幫夥之類的大兵。這一類的警告表示我們對他們不存幻想，雖然我們不得不給予政治上的支持。

北京「三·一八慘案」（1926年）

在北京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加拉罕和李大釗對北方局勢樂觀估計，然後我從駐京蘇聯大使館那裏，發現莫斯科對馮玉祥大量軍火供應：這些事實令我感到深深不安。但是當我離開北方之際，還沒有預計到我黨運動所處的危險境地，以及蘇聯同志對北方政治情勢之分析是如何錯誤。唉！唉！我們在北京會晤到一月之後，一件非常嚴重的事變證實了莫斯科和它在華使節的錯誤盤算、盲目的樂觀，及對馮玉祥和軍隊統領的忠誠和鬥志的過份信心。這件事變，就是1926年3月18日由段祺瑞下令，對北京政府前廣大愛國示威群眾的血腥槍殺。

「三一八慘案」的起因，要追溯到日本帝國主義奪取天津的嘗試（3

1 〈所謂反奉戰爭之結束與民眾目前之責任〉，（述之）《嚮導》第一百四十二期（1926年1月14日）。

2 〈民眾應急起向吳佩孚下總攻擊〉，（述之）《嚮導》第一百四十四期（1926年2月3日）。

月初)；它用艦隊掩護奉天炮火，轟打天津港口的大沽炮台。佔領天津市內的國民軍不得不埋下地雷以對抗從海外進襲的侵略者。北京公使館，對日本侵略行動未予任何抗議表示，卻對天津港口封鎖不滿，向段祺瑞政府下最後通牒（1926年3月16日）。強求在四十八小時內解除封鎖，否則「採取直接行動以開放海港」（這最後通牒是根據滿清政府和八國聯軍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

這一個對中國國家主權的新的侵犯，必然在全國而尤其在北京激起一片激烈的抗議。1926年3月18日，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響應他們組織的呼聲，擁向天安門聚集全國的人民大會。他們指斥帝國主義的強行霸道，要求北京政府否決北京公使團的最後通牒，並且宣告廢除辛丑條款。大隊遊行隊伍通過市內街道，走到政府官宅前面，根據他們要求，請政府作出正式聲明。陰險的段祺瑞下令衛兵開槍亂射在政府廣場密集的大眾。幾分鐘內，一批一批的人群，為濃密子彈擊中，倒在血泊中；即時有四、五十人死亡，近二百人受傷。趁大家驚慌無助的情景下，段祺瑞次日即對國民黨及中共最著名的領袖，如李大釗、陳啟修、顧孟餘、李石曾下逮捕令，罪行是「利用共產主義的教條，煽動民眾推翻政府……」。

令人吃驚的是這一突擊式的槍殺，發生在首都市區的正中心，在國民一軍組成的衛戍軍嚴密防守下發生的。而新的司令員李鳴鐘是最近由馮玉祥指定的，以代替派往河北戰爭前線的呂宗林。

難道段祺瑞這樣做，並未得到衛戍軍司令的同意？槍殺事件發生時國民軍的士兵們在哪裏？可疑的人物自然是李鳴鐘，放手讓段祺瑞執行這一恐怖的冷血罪行。後來的見證證實了這個疑點。3月17日，在示威遊行的前夕，李鳴鐘派了他總部的人，李太汾，向北京學生會活動分子做如下保證：「你們的示威遊行不會有危險，因為政府已撤去守衛，而是由國民軍擔負對你們的保護。」但是，次日，竟沒有看到一個國民

軍士兵，而猛然碰到段祺瑞的守衛兵，向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如果對李鳴鐘在槍殺無辜市民事件中有份，還有猶豫的話，另一事實即可消除它。1926年3月19日，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們的逮捕令剛下來時，李鳴鐘即派衛戍區的士兵到他們住宅去搜索並進行逮捕。

既然可以確定北京衛戍司令在「三一八」血腥鎮壓有責，也就可以提出馮玉祥在這次槍殺事件中的責任。既已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辭呈，形式上他可以推卸全部責任。但他是國民軍第一軍首領，而此軍一部份組成北京衛戍區，李鳴鐘到底是聽命於他，還是自作主張？馮玉祥對列強1926年3月16日最後通牒反應如何？然後，在北京「三一八」槍殺案發生後，他說了些甚麼話？

這兩項事件，馮玉祥始終表示沉默。對列強的無理，他的軍總部沒有發表任何抗議，甚至沒有中間人發表意見。至於對「三一八慘案」，他也始終沒有對段祺瑞發表公開譴責，可以斷言的是他還沒有出國，甚至還沒有離開在綏遠的居住地³，因此他完全可以公開表示立場。掩護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傀儡段祺瑞的罪行。他讓大家至少懂得李鳴鐘的行為，或者事先獲得他的了解，或者事後獲得他的讚許。

中共北方局委員會，是清楚洞察的。根據各方面的實情對照，馬上得出透徹的結論：國民軍第一軍是直接與這一罪行有牽涉。因此決定斷絕因同此事的合作關係，但保留和解的可能，萬一此軍部決心掃除段祺瑞於政府之外，並懲罰「三一八」槍殺的主謀者。

可惜我黨在北方已不能對行動和決定作主。事實上，莫斯科更加決心不顧一切支持馮玉祥。至於某些共黨負責同志，像李大釗、范洪傑等，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已躲避在蘇聯大使館內而不再能自由行動。而

3 見 Wilbur330 頁及《馮玉祥日記》11.5，「三一八事件」發生時，馮玉祥在平地關（Pingdiguan），綏遠；3月22日抵蒙古的 Ourga，他聲稱只從報紙上看到這一事件的消息，是在3月26日。

且很快被蘇聯同志，尤其是加拉罕說服完全放棄他們對國民軍及它的總司令馮玉祥的正當的敵視。北方共產黨人的抗議活動就此沉寂下來。

這裏必須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蘇聯政府駐在國民黨的全權代表鮑羅廷本人，在 1926 年 2 月間我們在北京召開的特別會議後，並沒有回返廣州。他逕自經包頭到喀爾汗同馮玉祥細談，用比過去更充實的援助換取他同國民黨及廣州政府的緊密合作。而且邀請他去莫斯科一行。這個建議正中其懷，因為國民軍第二、三軍在河南和直隸潰敗之後，他的軍勢地位也已減弱。正在北京發生「三一八」槍殺市民時，馮玉祥正準備去莫斯科，路過社會主義的蒙古的烏爾加，在那裏舉行同鮑羅廷再度會晤，並有國民黨左派的徐謙、顧孟餘等參加。他們也是要躲避段祺瑞的通緝。就在這裏，鮑羅廷同馮玉祥了結「共同經營」最後的細節，並開辦一個國民軍幹部的訓練學校。在 3 月 20 日政變之後，加上蔣介石一度催促，鮑羅廷並不認為有必須趕回廣州的急迫性。他是遲到 4 月 2 日才離開烏爾加，回到廣州時已是 4 月尾了。馮玉祥 1926 年 5 月 9 日抵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當做中國「國民革命」最佳領袖之一，享足特殊待遇。就像三年前蔣介石在莫斯科享受的待遇一樣。

鮑羅廷和馮玉祥，在中國西北邊境與社會主義蒙古交界處的極為秘密的晤談，我們在上海黨內負責同志全無所知，只了解莫斯科將籌碼放在馮玉祥身上，不管他對「三一八血案」的沉默（同謀者的），也不顧國民軍在河南和直隸的戰敗，我們不得已放棄公開指斥馮玉祥，反而為他辯護。反抗他的敵人，也正是我們最可懼的敵人，我們清楚認識到這些挫敗中展現在北方對群眾運動鎮壓和反動時期。可是，當我總結這些挫敗，尤其是在「三一八血案」國民軍的軍事潰敗，我顯露出對馮玉祥及其軍隊極度疑慮。（〈國民軍失敗後民眾應有之覺悟與責任〉〔述之〕《嚮導》147 期，1926 年 5 月 27 日）。雖然我承認國民軍大部份的挫敗可歸結於它的敵人受到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但也由國民軍自身的作為所

致。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含糊，在軍中失去統一和紀律，對反動派加給馮玉祥的罪狀，我從心底呼叫出來——誣衊。

我們需知道，這種誣衊國民軍馮玉祥為赤化的空氣，便是馮玉祥的態度所以保守，所以消極之根本原因。因為馮玉祥本來不是甚麼革命者，本來怕革命。不過因為他的地位站在反動軍閥張吳的敵面，同時又因為年來民眾革命潮流的高漲，革命勢力的擴大，逼着他不能不接近革命的勢力，接近廣州政府和國民黨左派領袖，接受革命的口號（自然是小限度的），去抵抗反動軍閥與帝國主義。所以馮玉祥之態度與趨向，完全視環境為轉移。如果民眾革命勢力高漲，馮玉祥可以左傾，如果反動的空氣濃厚，馮玉祥遂要右傾而消極（但是同時革命若發展為某一高度的，馮玉祥也許右傾而反動）。因此，反動派誣國民軍，誣馮玉祥為赤化，民眾應為之辯明，為之制裁反動派。我這篇文章裏這一段話雖然有些轉彎抹角，但是誠心誠意表示對馮玉祥，這位可疑的盟友，對我們的革命可能造成潛在的危險。（〈國民軍失敗後民眾應有之覺悟與責任〉，〔述之〕《嚮導》147期〔1926年5月27日〕）

當然，在莫斯科開始起奏的交響樂中，這種觀點是一個錯調，不諧音。在那裏的主調是要塑造一個神話：馮玉祥是「農民的兒子」，是革命忠誠的戰將！在他莫斯科居留的日子裏（從1926年5月到8月），人們把他捧上天。在此期間，有一位由斯大林指派的人物，名叫Dusmanov，專為他服務和保護。烏士馬諾夫是「完成他意識形態教育」的導師，接受到這麼貴重的禮物（大砲，和槍等，來裝備他的軍隊），又得到盛大的招待。馮玉祥自然興高采烈，在蘇聯首都為他召集的大會上大聲高呼：「世界革命萬歲！無產階級萬歲！列寧主義萬歲！……」正像他的前驅者蔣介石在1923年秋季一樣。

正值馮玉祥在1926年4月間走上莫斯科的路途時，在北京以及整個北方的局勢對於革命力量來說急遽下落。「三一八血案」是群眾運動也

是國民軍的軍事運氣走下坡路的標記。三日後，天津落在原來當地霸主李景林手中。在北京，國民軍第一軍一度嘗試奪回政權流產後，被吳佩孚河南軍逼迫，又受到沿京津和京奉鐵路奉天系軍隊緊跟，毫無退路，只得退出北京，重新會合在南口，位於北京西北長城的關口，而再退到社會主義的蒙古邊境的省份裏。

軍閥的捲土重來，特別是奉系軍閥——革命的最兇暴的敵人，揭開了對一般群眾運動，尤其是對中共（雖然組織上還沒有受損而在地下活動）一個低沉的時期，「三一八槍殺案」是未來血腥鎮壓的前奏，也是在北京蘇聯大使館內避難的同志們（其中有李大釗）悲慘命運的枷鎖。一年之後（1927年4月6日），北京的新主子，張作霖派三百武裝軍人包圍蘇聯大使館，進行不可預測的侵襲，完全無視對領事權訂立的國際公法，而得到駐京公使團的讚許和協助。

在這突擊侵襲蘇聯使館的過程裏，大批存放在使館裏的檔案文件被搜去，由使館保護的所有中共黨人被俘，於1927年4月28日全被無恥地殺死。

李大釗最後的形象

1927年5月初，我得到李大釗殉難消息的那一天，正巧是我黨在武漢開五次大會的日子。這巨大的損失令我和許多同志們深感憂傷。同時，劇烈的事變給予我們深重的打擊；而尤其我個人受到瞿秋白發動的誣陷運動，而再不能有時間靜思這一謀殺案，並對李大釗致輓詞。現在我趁結束這一章的機會，重新找回和整合他在1926年2月，我們在北京道別時最後的形象，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人的形象。我絕沒想到這就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我不必重複李大釗在中共創立時佔有的重要地位，以及他的性格處世（我在莫斯科時觀察到的），最富有各種優秀品質。我要想追憶的不

但是他是 1919 年五四運動主導者之一，是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之一，中國共產黨運動的創立者之一，而且更是一位有天然高貴的本質，對權力的誘惑和榮譽的追求完全一塵不染的人。

在 20 年代革命時期，在世時很難形容在中國他的信譽和道德權威的領域。然而，就是在普通人們之間習稱「南陳北李」（陳獨秀在南方，李大釗在北方），用電報密碼似地形容共產黨。這也是忠實地反映李大釗在共產運動中全國性的重要地位。在北京以及中國北方地區，一致認為他是革命最偉大的領袖之一。不但是在激進知識分子群體裏如此，而且在勞動群眾裏也如此。當然，他更受到革命青年們的愛戴和崇拜，不但如此，甚至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對敵，像胡適和其他北大的教授，改良派或保守派政客，也不得不讚賞他「高貴的心境，高尚的道德品格，豪爽慷慨，為絕大多數人不惜犧牲自我」。

雖然他有如此魅力，待人處世卻又是如此簡樸，對自己又自然地謙虛，但毫無清教徒的習氣。在這次北京短短重見的時光裏，在他身旁度過的時日裏，感到無比的喜悅，嘗到人生偶然給予的一切：斷斷續續的談話，或是道地北京可口的菜餚……，這些時刻的舒心和夢想，他端莊的儀表，飽滿的精神，取之不盡的善良寬大……就是無比的盛宴，但是當我發現他和家屬在北平民區的住所，和他大世家的面貌那麼不襯時，我感到驚愕。

有天他請我到他家小憩。我跟隨他穿過曲折小胡同，走進一個狹小的院子，是這一區大眾住宅同樣的院子，在院子的裏面有一間低矮的小屋子，中間是起居室，兩旁有小寢室，也就是廂房，中間的起居室裏放着幾張椅子和一張桌子，非常簡單，上面堆着一些書籍。我很自然地要求他介紹妻子見見，他哈哈一笑說：「我的妻子是個鄉下人，她從來不見外人，不必要去找她。」我也不好堅持下去……我了解到並不是他拒絕讓我見他的妻子，而是對她的尊重。我們在他住所閒談後就出外去餐

館用晚餐，由此我發覺像李大釗這樣一位知識廣博，心底仁慈，又無限善良的人，並不以居住條件狹窄和平凡，幾乎是貧困的程度為意，而感到局促，而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

他活在世上如此坦然，而對着死亡，即使是暴力的死亡也如此坦然。

關於李大釗和他的同志們，在 1927 年 4 月 28 日黎明時被絞刑處死，北京報紙發表一項消息：「在執刑時，李大釗表示非常安靜，在他臉上看不到任何動態，就像他精神上已『視死如歸』。」

是的，當時李大釗感到他已盡其所有為革命能盡之力，而面對敵人舉起死亡的武器時，他好像舒了一口氣，卸下一個包袱；他感到完全「坦然自若」。是的，他對待死亡是寧靜的，是「視死如歸」。這就是李大釗對死亡的基本態度。在他已經把生命那麼慷慨、莊嚴地獻給中國以至世界受壓迫的人們的解放後，他自己終於離開人世。

第一七章

蔣介石的「3月20日
政變」，中共中央委員會
與共產國際代表
鮑羅廷意見的衝突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舉行政變，藉口共產黨陰謀暴動，調遣軍隊，宣佈戒嚴，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總部，和蘇俄顧問團住宅，並逮捕了李芝龍等五十餘共產黨黨員——這一消息，在上海中外報刊上傳出後，上海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和國際代表，都陷於異常的驚愕狀態中；因這次政變，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事先沒有獲得有關於它的醞釀的任何消息，甚至徵兆。雖然，我們已熟知國民黨右派，即當時的西山會議派所代表的，在上海和北京等城市與帝國主義和軍閥進行陰謀活動，拚命鼓吹反共、反俄及反國民黨左派（那時主要是反汪精衛）。但我們以為自胡漢民和許崇智等右派離開廣州後，左派可以控制時局，即對蔣介石，我們雖認為他有中派的傾向和個人野心，但不曾懷疑他會於此時發動反共的政變。

而且，如前章所說的，當中央委員會一個月前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時，鮑羅廷曾從廣州趕往參加，在他所做關於廣東局勢的報告中，不但沒有提到蔣介石有發動反共政變的任何意向或跡象，反而認為自國民黨左派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26年1月）取得勝利之後，廣東的局勢是更加可以樂觀了。所以這次北京會議沒有討論廣東的一般情形，只是考慮應否立即舉行北伐，及北伐軍所應遵循的路向問題。差不多同時，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的長子，於2月中旬，即政變前的一月，曾到過上海，就他所報告關於廣東的情形，國民黨內部的派別關係，以及汪精衛和蔣介石對共產黨和蘇俄顧問的態度等，也沒有提到蔣介石有任何反共陰謀的跡象。

總而言之，我們的黨和國際代表，對於蔣介石這次政變的陰謀策劃，不但事先毫無所知，而且一般地對他還抱着某種信任。換句話說，我們對他抱着幻想的希望。因此，蔣介石的3月20日政變，對於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對於共產國際的代表和蘇聯共黨的代表，都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以致大家陷於驚慌失措中！

但另一方面，在3月20日政變的突然打擊之下，整個黨，從上至下都對蔣介石發生了極大的反感和憤激，好像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產生某種程度的覺悟。例如，為討論廣州3月20日事變所召集的上海全體幹部會議上，當我代表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關於該事變的情形後，全體同志都激動起來，表示極大的憤慨。在發言當中，有些同志主張黨應立刻發表宣言，宣佈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罪狀；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必須舉行一個群眾大會，將廣州的「3月20日政變」和北京「三一八慘案」（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屠殺請願和示威的群眾）聯繫起來，進行廣大的示威和抗議。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已從同志中叫喊了出來。最後，會議一致決定：要求中央對蔣介石的反動行為，採取堅決的立場和有效的辦法，並對國民黨的態度及今後國共合作的政策重新予以考慮。此種情緒和傾向，在其他各地區的黨部和黨員群眾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出來。

但我們中央常務委員會（那時只有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和我）對3月20日政變採取極其謹慎的態度，除了3月末派張國燾去廣州調查情形外，在一個頗長的時間內沒有能做出正式的決定，因對廣州事變的真相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對蔣介石的真實態度，還不甚明瞭。同時，魏金斯基已回莫斯科，鮑羅廷又不在廣州，留在上海的其他國際代表，因沒有得到國際的正式訓令，都不敢有所主張，一直拖延到4月下旬，接到廣東省委的詳細報告後，我們常委才正式決定對於3月20日政變的立場，以及對該事變所產生的新局勢的應付方案：

這個方案指出：蔣介石既已公然發動反共反俄和反國民黨左派的政變，監禁了海軍局副局長李芝龍，逮捕了國民革命第一軍擔任政治工作的全體共產黨黨員，繳收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總部糾察隊和俄國顧問團衛隊的武裝，迫走了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企圖奪取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黨、政、軍大權，建立個人獨裁——這一切反動行為和企圖，對於革命事業是極度危險的，因而決定採取如下的幾種具體措施，以資

對抗蔣介石的反動企圖。

一、盡力團結一切國民黨左派，使其成為一種真實的力量，以便在國民黨內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

二、在物資上和人力方面，盡可能加強國民黨左派的第二軍和第三軍及其他的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對抗蔣介石。

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葉為共產黨黨員，其所領部隊為一團，約二千人）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以及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成為基本的革命武裝力量。

為了實施上面的方案，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張國燾，譚平山（他們均為中委，並已在廣州）和我，以及國際代表鮑羅廷，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委員周恩來和張太雷，並指定我以特委書記資格前往廣州，與鮑羅廷和廣東省委商討上述的計劃和其他所應採取的措施。

我和我的妻子陳碧蘭同行（她當時為上海區區委委員，受命前往廣州，協助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的江浙工人代表團的工作）。我們於1926年4月尾抵達廣州。這正是「五一節」的前夕，因此，我們得以參加這次的五一勞動紀念大會，從它當中觀察一下三月政變的影響。

紀念大會在廣州近郊的體育運動場舉行，參加的群眾約二十萬人（主要是工人），會場的東西南北各建立一個演說台，但沒有一個著名的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領袖上台演講，就是上台演講的人也盡力避免提到當前的時事，即三月政變所造成的局勢，只說些紀念五一的老生常談而已。會場旗幟上所寫的標語口號，看不出關於當前時局的任何主張和群眾的迫切要求。這一切，當然是我們的廣東省委事先安排的，為的是避免「刺激」蔣介石及其黨徒。在群眾方面，人們雖然擠來擠去，但很少有人現出興奮或熱情的面容，更少有人到演說台前去聽講。群眾一般的表情是沉悶而黯淡的。這無誤地反映了3月20日政變的陰霾，還沉重地籠罩在

天空！

我們抵達廣州的當天，雖然曾和陳延年接觸，但他準備五一紀念大會，十分忙碌，沒有功夫多談。所以第一個和我談到三月政變的是張國燾（因我們被安排在他所住的同一所房子裏）。他向我輕描淡寫地敘述了蔣介石發動政變的經過情形，不加任何評斷。我則將中央對這次事變的最後決議告訴他。他對中央的決議不置可否，但向我建議：「你最好去見見老蔣，我們一起和他談談。」我反問說：「我們和他談甚麼呢？我認為，我們自己應當首先討論我們黨對蔣介石的基本立場，即討論中央對於三月事變的決議。」他對我這個意見表示沉默，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從這次談話中，我已感覺到張國燾對蔣介石不但沒有任何反感，而且對他還抱着幻想，企圖和後者謀取妥協。他這種態度，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黨成立的初期（頭兩年），張國燾曾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書記。由於許多幹部的努力，確曾做出了極可觀的成績。因而在黨內獲得了好評。1922年夏，當馬林提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張國燾是那些堅決反對者之一。甚至在第三次黨大會上通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時，他還主張工人黨員不要加入國民黨。因此，他又被稱為左派，但自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工人運動遭到嚴重打擊之後，特別是1924年初，國民黨正式改組，張國燾被選為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委員後，他的左傾立場便逐漸改變了。他不但對工人運動表示冷淡，而且對黨內部的工作也不感興趣。例如，第四次黨大會後，他被選為中央組織部書記，但他對於這個極關重要的任務，不僅從未負起責任，寧可說是怠工的。他甚至對於一般的政治問題也不大感興趣。所以每當中央討論政治問題時，他極少發表意見，更不用說作政治論文。他最感興趣的是到各地方去跑跑，特別是跑廣州，和國民黨的軍政要人交際，這種傾向，便決定了他往後的方向和命運。他這次對發動三月政變的蔣介石所表示的

態度，雖然是在鮑羅廷和其他俄國顧問的影響之下，但同時亦由於他自己的根本傾向使然。

約在和張國燾談話的次日，我訪問了鮑羅廷。他是先我們一天從海參崴抵達廣州的⁴。他住一座堂皇的大廈，門口守衛森嚴，儼然一座大官署。人們稱之為「鮑公館」，來此訪問的要人川流不息。不但我們廣東黨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譚平山、周恩來等，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廣東農民協會的領袖們，如蘇兆徵、鄧中夏及彭湃等，經常來此請教。就是國民黨的領袖，如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闓等，也時常來此和他會談。因而在過去兩年中，「鮑公館」便成了廣州的「政治中心」。因鮑羅廷不但代表俄國十月革命、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威望，而且他手裏握有龐大的物質力量，如蘇聯的軍火，軍事顧問和金錢等。雖然鮑羅廷在俄國革命中，不曾起過任何重要的作用，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沒有值得提起的任何貢獻（在十月革命後，他才以僑民的資格從美國回到俄國來），但由於他所代表的「威望」和手頭所支配的「物質力量」，他個人的「威望」和「力量」也就很快地形成起來了。就政治上說，鮑羅廷離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很遠，因他完全缺乏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但他善於外交詞令，尤其長於詭辯，具有縱橫捭闔的手腕，玩弄 Maneuver（運作）的才能。憑藉這些能力，鮑羅廷便得以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完滿地執行了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政策。

我這次訪問鮑羅廷，原來希望和他詳細地交換關於三月事變的意見。但當我把我們中央委員會關於該事變的決議告訴他時，他和張國燾一樣，避免對該決議表示意見，卻建議我去訪問蔣介石，和後者交換意見。我告訴他，當 1923 年秋蔣訪問莫斯科時，我和他時有接觸，頗為熟識，但我覺得於此時去見他，是極不相宜的。這樣，我和鮑羅廷的談話便無

4 鮑羅廷參加了我們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後，曾赴外蒙古和馮玉祥長談。他原擬同馮玉祥一起赴莫斯科，因三月政變後，蔣介石急電請他南返，所以轉道海參崴抵廣州。

法繼續下去。我只好請他於次日參加我們的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以便正式討論三月政變的問題。

在第一次特委會上，我報告了中央常委對於三月事變的看法和對蔣介石的態度後，首先發言的是鮑羅廷。他說話極為冗長，其主要的內容是強調廣東局勢的異常危險。他詳敘吳鐵城，剛才被撤職的廣州憲兵司令，伍朝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和古應芬，以前廣東省省長等所代表的右派勢力，潛伏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尤其是各地方政府、軍隊、憲兵、警察及某些社會團體中（如商會、機器工會和學生團體等）是如何的強大。李福林所指揮的第五軍，完全站在右派方面，李濟琛的第四軍極不可靠，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學生軍，無須說是受蔣指揮的。中央銀行發生擠兌，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再加上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威脅，在此種極度嚴重的危險局勢下，我們的迫切任務，是在尋求一條適當的出路，以便解脫當前的危險。至於甚麼是「迫切的出路」，鮑羅廷完全沒有指出，關於我們中央常委的決議是否可行，他故意避開，不置一辭。

鮑羅廷發言後，除了我對他所強調的廣東危險局勢，提出一些詢問外，其他參加會議的人，均默不作聲。於是，這次會議便毫無結果而散。

這次特委會議後，我和國民革命第二軍軍長譚延闓舉行了一次談話。這是由第二軍的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李富春所安排的（李當時曾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參加談話的還有張國燾。譚在清末為君主立憲派，辛亥革命後，他做過湖南省督軍，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他轉向孫中山，加入了國民黨。在國民黨改組大會上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隨後被選為政治局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在三月事件前，他接近汪精衛和共產黨，所以被稱為「左派」，實際上，他是最圓通的老官僚。由於他當時所領導的第二軍，是人數最多的一支軍隊，且受程潛所指揮的一部份軍隊所支持（約兩個師，隨後成為國民革命第六軍），在三月事變後，譚又被

4月16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推選為政治委員會主席，代替了汪精衛。因此，他在當時所佔的地位極為重要。

譚從李富春知道，我是代表中共中央來廣州應付三月事變所造成的局勢的。故他說話極為謹慎，也可以說極為圓滑。他對於三月事變盡力避免提及，只說些無關重要的事情，當我問他怎樣改善當前的緊張局勢時，他說：「希望共產黨和鮑顧問提出適當的辦法，局勢自會緩和而獲得解決的。」譚延闓所表示的這種態度，可說是極盡圓滑之能事了。但李富春隨後告訴我，譚在三月事變剛發生時，開始是憤慨的。他認為蔣介石的行為，不但極端專斷，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主張應設法予以制裁。但由於汪精衛的出走，鮑羅廷又不在這裏，以致無法團結左派，便弄得毫無辦法。在這種情形下，譚也就消極下來了。但第二軍的將領，特別是下級軍官，對蔣介石十分敵視，要求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聯合起來給他以制裁。差不多同時，第三軍的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共產黨黨員，亦告訴我，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的立場是左的。他對蔣介石的3月20日事變，極表不滿，希望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團結一致，予以懲罰。

經過特委第二次會後，我從鮑羅廷所發表的意見中，已經感到他對於我們中央的決議是堅決反對的。他之強調廣東右派勢力的強大和當前局勢的危險，顯然在暗示：如果實行我們中央的決議，只有增加危險，引起國民黨右派更壞的新的政變。雖然他還沒有說出他的結論，我已猜到他決心要向蔣介石讓步，和他謀取妥協了。同時，在張太雷和我私人的談話中（張為鮑羅廷的主要翻譯員，後者和國民黨要人的談話，都得經過他翻譯），得悉鮑羅廷回廣州後，即和蔣介石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企圖「說服」他，挽回他的反共傾向，爭取他和共產黨「重新合作」⁵，

5 當鮑羅廷和蔣介石某次談話時，後者問前者：「何時中國才能實現共產主義？」前者的答覆是：「至少在八十年以後」，這便是鮑羅廷「說服」蔣介石，爭取，「重新合作」的論據之一！

所以在鮑羅廷看來，我們中央的決議，正是他這種「重新合作」計劃的大障礙，必須設法打消它。

當我召集特委第二次會議來繼續討論關於三月事件的問題時，首先發言的又是鮑羅廷。但他發言的全部內容，不過把他在上次會議上所強調的「廣東局勢的危險情形」重複一遍而已。我除了舉出一些事實，以反駁他所說的局勢危險係過於誇張外，並要求他對於我們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表示意見或批評。他說：「如果依照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進行，那就不僅要和蔣介石完全決裂，而且要走到共產黨完全退出國民黨。」因此，他反問我：「你是否主張立刻退出國民黨？」我的回答是：「不是立刻退出國民黨，但我們應當立刻準備退出國民黨，以謀黨外合作！」鮑羅廷聽了我這個意見，沉思了一會說：「那麼，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一個最重大的問題，是我們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不但我們自己要特別認真考慮，而且必須徵求國民黨左派領袖們的意見。」因此，他建議，我們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們開一個談話會，以便交換意見，然後再行討論。

最後鮑羅廷說：「現在離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開會期（5月15日）已迫近，對蔣介石所擬就的『黨務整理案』，我們應當考慮我們的立場，以便下次會議討論和決定。」

這次特委會議上和上次會議一樣，發言的都是鮑羅廷和我，除了周恩來表示「鮑顧問和述之同志的意見，都值得考慮」外，其他參加的委員，如譚平山，張國燾，陳延年和張太雷，都是沉默的。周恩來這次所表示的「兩可意見」或「折衷立場」，恰好反映了他的整個性格。他實際上是贊成鮑羅廷的妥協主張，但不明顯地反對我——中央代表——的意見。他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永遠不會形成自己的意見，更不會為自己的意見而鬥爭。在黨內鬥爭中，他總是支持強有力的方面，但並不露骨地或明顯地反對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特性，他在往後黨內一系列的鬥

爭中，總是「站得住的」，故人們稱他為「不倒翁」。但他具有出色的組織和行政才能和工作的積極性，無論那一派得勢都需要他。他也自願地為任何得勢的或新起的一派服務。這便決定了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中的「發跡史」。

在特委會第二次會議後的第二天或第三天，鮑羅廷安排了我們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們的談話會，這次會談是在廣州城外的白雲山寺院裏舉行的，所以被稱為「白雲山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在我們方面是鮑羅廷、譚平山、張國燾、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和我，在國民黨方面是譚延闓、宋子文、何香凝和甘乃光。這四個「左派領袖」，除譚延闓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佔着重要地位外，其餘三人都是無足輕重的。

就宋子文說，他雖然擔任當時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但他獲得這個職位，並非因為他在國民黨內做過甚麼革命活動，或發表過甚麼左傾的主張，主要是由於他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兄弟和鮑羅廷的大力推薦。就他的政治傾向來說，根本談不上「左派」；他是一個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者（因他曾留學美國）。此種民主主義者，一到中國，往往成為資產階級利益的支持者。所以當蔣介石趕走了汪精衛，建立其個人的軍事獨裁後，宋子文同樣充當後者的財政部長，盡量搜刮金錢以來維持這個反動透頂的軍事獨裁。何香凝是廖仲愷的寡妻，她憑着這一資格，以及她在辛亥革命前曾經參加同盟會的資格，在國民黨中享有虛浮的聲望，但在實際的政治上，她不能起任何作用，她只把廖仲愷的左傾詞句和着眼淚，不時加以重複而已。甘乃光係廖仲愷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故被稱為國民黨的左派，但他不久以前，才從學校出來，談不上國民黨內佔有甚麼重要的地位，或能起甚麼重要的作用。他只在某些青年國民黨員和學生中，做過一些活動而已。

會議開始，由鮑羅廷說明這次談話的目的，是在於國共兩黨領袖對當前局勢及會後兩黨合作的方式交換意見，以便謀取真誠合作，解除當

前的困難。他接着分析自三月事變所引起的緊張情形，對於革命怎樣不利。在這種情形下，國共兩黨的領袖們，應當採取積極負責的態度，重新謀取兩黨的團結與合作，以便發展革命運動，進行北伐，完成中國的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最後他指出國共兩黨合作的方式有二：一、共產黨員仍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同以前一樣地合作；二、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他特別請大家對此發表意見。

鮑羅廷說話後，我們方面的同志沒有誰願意首先發言。因為大家知道，這是鮑羅廷想藉此次談話來試探這些國民黨左派領袖的意向。而我更懂得，這是他想利用這些左派領袖的意向，來阻止我所表示的主張：「共產黨員應立刻準備退出國民黨，以黨外合作代替黨內合作。」譚延闓、宋子文與何香凝，對鮑羅廷所提出的問題不表示任何正面的意見，譚裝做疲倦欲睡的樣子（據說，這是他對重大問題避免發表意見的慣技），勉強地說：他希望鮑顧問設法消除各方面的矛盾，謀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以便鞏固國民革命的陣營。何香凝對蔣介石3月20日的行為，表示了憤慨。她說：「假如總理（孫中山）還活着，廖先生（廖仲愷）不遭人暗算，像3月20日那樣的不幸事件，是不會發生的。」關於國共合作的方式問題，她希望鮑顧問根據實際情形做合理的決定。至於宋子文，則默不做聲，好像他對於鮑羅廷所提出的問題不感興趣似的，只有甘乃光大發其議論。他譴責了蔣介石在3月20日舉行的政變，認為這是破壞了總理的聯俄聯共政策，對於革命勢力的團結與合作，發生了很壞的影響，應當設法加以補救。他主張國共兩黨應和從前一樣繼續合作。因而他反對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因為這樣，國民黨的左派將更加孤立而被削弱，黨將被右派所把持，這對於革命是極不利的。但甘乃光這種左派的調子，並不妨礙他一個月後，在蔣介石所改組和把持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當了農民部的部長。像這樣的會談，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也沒有甚麼意義。但它對於鮑羅廷卻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論據」。那便是：

國民黨左派領袖們都反對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反對改變黨內合作為黨外合作。

約在白雲山會議的翌日，鮑羅廷要求我和他做一次個人的談話。我答允了他。在這次談話中，鮑羅廷首先描述了法蘭西大革命的發展過程，尤其對於 1792 和 1793 年間的反革命活動與革命危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之必然與必要。他描述得更為詳細而生動。接着，他指出，我們現時面對着的局勢，和法國 1792-1793 年的情形極相類似，因而我們需要一個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只有這樣的獨裁，才能打破反革命的活動，消除國民黨右派的新政變的陰謀，把革命推上前進。

要建立這樣的革命獨裁，我們自己首先就要排除一切感情上的障礙，冷靜地考察事實，究竟誰可以擔任這個獨裁的任務。他承認蔣介石有許多缺點，但在現時的國民黨領袖當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因此，他認為要打開當前極度危險的僵局，我們不得不對蔣介石做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自 3 月 20 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不要反對他的「整理黨務案」，並支持他盡速地進行北伐。將來北伐軍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

我當時回答鮑羅廷的大意是：我同意他關於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專政是歷史的必然與必要。但此時廣東的情形，與羅貝士比爾專政時代的情形大有差異，首先是蔣介石與羅貝士比爾完全不同，羅貝士比爾的專政是鎮壓反革命，推動革命向前發展。蔣介石的三月政變卻是打擊我們，打擊革命的左派。而且他還提出「整理黨務案」來排除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所佔有的地位和影響，來束縛我們以後的活動。像這樣的人，假如我們把他當羅貝士比爾看待，承認他在三月政變中所攫取的一切權力，承認他的「黨務整理案」，並幫助他建立個人獨裁，以此進行北伐，我深深地感到，這對於革命是十分危險的。就我個人說，我很

難想像他這個意見是正確的。因此，我們的談話弄得不歡而散。

我從這次和鮑羅廷的個人談話中，已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不但反對我們中央的決議，反對我們黨抑制和準備反攻蔣介石的政策，而且恰好相反，他堅決主張向蔣讓步，即承認他在三月政變中所攫取的一切權利，無條件地接受他的「整理黨務案」，幫助他建立個人獨裁，以此去進行北伐。這在事實上等於向蔣介石投降。同時，我亦明白，鮑羅廷這種向蔣投降的政策，是直接受到莫斯科的訓令，或至少得到那邊的同意或批准的。否則，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在我們黨對蔣的基本態度上，他絕不會，也不敢如此堅持他的意見，以推翻我們中央的主張的。

我對於鮑羅廷所表示的對蔣妥協的立場，雖已感到十分困惱，但還想做最後的努力，召集第三次特委會議來討論和決定我們黨的政策，但當第三次特委會在周恩來往所召開時，鮑羅廷託辭不出席，只請張太雷代他向我們的會議聲明：他的意見，在前兩次會議上已經表示過了。現在的問題僅在於我們是否同意他的主張。實際上，他除了和我個人談話時，明白表示過他的意見外，在上兩次會議上他說的話都是含糊其詞，不着邊際。由於鮑羅廷拒不出席，我們的會議便無法進行討論。因為問題是在於國際代表鮑羅廷的主張和我們中常會的決議的對立。

正當會議陷於無法進行討論的僵局時，北方區委員會（該區委以李大釗為首，負責指導黃河以北各省的活動，故其地位最為重要），新近派來參加特委會議的趙世炎，起而提議說：「我們應當信任鮑羅廷同志（意思指他是國際代表），接受他的意見，由他負責去執行。」當時參加會議的其他委員，都表示贊成趙的建議，在這種情形下，我除了表示不同意，並保留個人意見外，再不能說甚麼。特委會議於3月20日政變及其所產生新局勢的政策之討論，便如此離奇地結束了。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3月20日政變後，對蔣介石所採取的反對政策，在國際代表鮑羅廷玩弄詭計和壓力之下，便轉變為向蔣投降的政策了！

這裏特別值得解釋的是：何以趙世炎對鮑羅廷的主張提出這樣無條件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何以其他的委員們，都無異議贊成趙的建議？解答了這些問題，也就大部份解釋了何以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的革命中，從頭到尾，沒有經過重大的爭論或抵抗，便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政策。

就趙世炎個人說，他是那些最忠誠和英勇的革命戰士之一，他和周恩來一樣，具有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又是一個出色的鼓動家。他以前在北京的學生群眾和以後在上海的工人群眾中，都以組織和鼓動才能著名。他是後來上海三月暴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之一，但他和周恩來一樣，缺乏理論的基礎。他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但不能深入而形成自己的獨立見解。在他看來，國際的指導是不會錯的，而鮑羅廷便是國際的化身。這便是他提議，「應當信任鮑羅廷同志，接受他的主張，由他去負責執行」的根源。但一年以後，趙世炎正是在他絕對相信的鮑羅廷所促成的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下，成為最受磨折的犧牲者（趙於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被槍斃前，已被拷打失去了知覺）。

陳延年的特性是：他對革命的絕對忠誠，和對工作的十分嚴肅。他將他的全部精力和時間都貢獻於革命（他那時已年過三十，尚未和任何女性接觸過，完全過僧院式的生活）。他擔任廣東省委書記不到兩年，由於他工作的特別積極和自我犧牲精神，已在黨員群眾中取得很大的信任，大大地擴大了黨的基礎。就政治上說，陳延年比之周恩來和趙世炎，都較能深入，能多少形成自己的獨立見解。但在鮑羅廷的強大思想影響和控制之下，他在政治上便無法獲得獨立的發展。因而他在一切的重大問題上，都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跟着鮑羅廷走。他這次堅決擁護鮑羅廷的妥協政策，他主觀上認為這是必須的，但一年以後，他和趙世炎一樣（他兩人同時被捕），成了這個政策的犧牲者。

譚平山，是1920年秋廣東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始人之一，自

1923年中共第三次大會起，他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24年初，在國民黨改組的第一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因此，他成為廣東共產黨和國民黨著名領袖，享有很大的聲望。但他之獲得這一聲望，主要是由於為人忠實，對工作認真，特別在私人生活方面異常樸素。他是所謂「實幹苦幹」的人物，如就政治方面說，他不但不及陳延年，即比之周恩來亦有遜色。這便是他在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都得聽命鮑羅廷的原因。

張太雷則是另一種革命家的類型。他具表面的才華，善於鼓動，但因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養，他表現在政治上往往是虛誇的。由於在頗長的時間內，兼任鮑羅廷的翻譯，因而受後者的思想影響很深，這便決定了他當時的政治態度。在1927年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清共後，張太雷任廣東省委書記，從擁護鮑羅廷所代表的極右機會主義，轉到羅門拉子（Lominadze）所代表的極左冒險主義，負責領導了1927年12月的廣州暴動，因此犧牲了性命。

這裏應當指出，除了張國燾那時是自覺地或自動地願和蔣介石謀取妥協外，其餘的人，無論是陳延年、譚平山、趙世炎、張太雷，甚至周恩來，他們對經過三月事變的教訓後，對蔣介石都是不信任的，反感的，甚至歧視的。這從我和他們的私人談話中反映了出來。他們贊成鮑羅廷的妥協政策，認為這只是一種純粹的策略（tactics）或手段（means），當往後事變的發展對我們有利時（如鮑羅廷所謂「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宣傳），我們要轉過來反對蔣介石，和他做清算的。他們沒有想到，投降政策這條繩子一經套在頸項上，只有愈來愈緊，一直要到氣絕身亡，才會被鬆下來呢！

在特委第三次會議後廣東省委召開了一次幹部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在廣東工作一切重要幹部，而且有參加全國第三次工人代表會議的各省代表。在這次會議上，鮑羅廷做了一個歷數小時的冗長報告，

解釋三月事變所形成的局勢，和共產黨所應採取的政策。他強調維持國共合作（即在國民黨內合作）的絕對必要，為了這一合作，我們黨不得不接受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盡力支持他領導北伐。對鮑羅廷的報告，除了張國燾發言表示附和，陳延年藉口時間不夠，沒有任何討論，便算是被通過了。

在鮑羅廷玩弄詭計和壓力之下，中國共產黨不但毫無抵抗接受了三月事變所造成的局勢，承認了蔣介石所擅自攫取的一切權力，並進而接受他的「整理黨務案」。這個「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懷疑和批評總理（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共產黨員不得「當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委員不得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應將其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冊交國民黨中央黨部保存」、
「共產國際對於中共之訓令，須交國共合組的聯席會議通過」等等。根據這些規定，共產黨人在思想上必須服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服從列寧所謂的「中國式的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的反動幻想」；在政治上遵守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在組織上，共產黨人完全被排除於國民黨的最高指導機關中央黨部之外，但須服從其紀律。這樣，共產黨人便已正式降為國民黨的附屬物，在國民黨內再也不能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了。這正是從1924年1月國民黨正式改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來，謝持、張繼、胡漢民及其他右派，所不斷提出限制共產黨的主張，特別是「五卅事變」後，戴季陶所發揮的種種反共思想，現在由蔣介石集其大成而加以實現了。

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在1926年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後；他即着手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排除了一切共產黨人，而代之以所謂純粹國民黨黨員。於是蔣介石完全壟斷了國民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同時以蔣介石的助手陳果夫代理中央黨部組織部部長，立即改組各省市的黨部，攫取各地方黨部的黨權，隨後蔣介石又自任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擁有最高的權力。於是，國民黨的委員制，一變而成為個人獨裁制。在6月4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上決定舉行北伐時，蔣介石又自任北伐軍總司令，廢止了原來的軍事委員會，他從此具有指揮一切軍隊的全權。這樣，廣東一切黨、政、軍大權完全操在蔣介石的掌握中。鮑羅廷所要建立的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恰好成了它的反面，而是一種邦那巴特的反革命的軍事獨裁。

不錯，蔣介石為了換取鮑羅廷奉送給他的軍事獨裁的禮物，也曾給右派施行輕微的打擊，以此表示他「重新向左」的姿態。例如：監禁吳鐵城、拒絕與胡漢民⁶合作反共、送走伍朝樞和古應芬等。但這一切，都不過是蔣介石暫時應付鮑羅廷和欺騙共產黨人的一種手法而已。往後的事實證明：當蔣介石舉行新的反革命政變時（1927年4月12日），這些被監禁，被拒絕和被驅逐的右派領袖，又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反共的合作者。

說到這裏，便發生了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假使中國共產黨，不是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代表鮑羅廷的壓力之下，接受其妥協投降的政策，而依照其自己的決議去處理「3月20日政變」，抑制蔣介石的獨裁企圖，是否如鮑羅廷所估計，會引起「右派更壞的政變」，或蔣介石的更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群眾的勢力？這是一個值得特別檢討而具有重大教訓意義的問題。

實際上，鮑羅廷所強調的反革命右派，如吳鐵城、伍朝樞、古應芬，

6 胡漢民和鮑羅廷同時（4月末）從蘇聯回到廣州。他於1925年8月因廖仲愷被刺案件的嫌疑而被送到莫斯科。在那裏，他以國民黨領袖的資格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六屆全會，並在會議上演說，強調「國民黨的口號是擁護群眾，即工農聯合奪取政權」，最後高呼：「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萬歲，世界革命勝利萬歲，世界一切共產黨萬歲」。但當他剛抵廣州時，即與吳鐵城、伍朝樞和古應芬等相結合，向蔣介石建議「徹底反共，驅逐鮑羅廷」，並希圖取代汪精衛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的地位。但蔣這時還需要利用鮑羅廷以取得蘇聯和共產黨的支持，進行北伐；同時更不願胡繼承汪的地位，站在他的頭上，因而拒絕與後者合作反共。

乃至胡漢民所代表的力量，在當時的廣東已不能起任何決定的作用，因為他們的基本力量和可能盟友，自廣州商團被擊敗，陳炯明在東江和鄧本殷在南路的軍事力量被肅清之後，他們可靠的武裝力量，只留下李福林的第五軍和某些地方的國防部隊，所有這些力量合起來，他們還不足以發動一次新的政變，因而所謂「新的政變」，歸根究底在蔣介石。

蔣介石，可以說當時國民黨右派最具有實力的中心，但他本身並不是沒有弱點的。就軍事上說，他所能直接指揮的只有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學生軍、第二軍和第三軍，以及程潛所指揮的隊伍。程在那時還是反蔣的，第四軍軍長李濟琛雖然反共，但他和蔣之間存在着嚴重的衝突，主要是前者不願後者的權力擴大，完全受其指揮。李福林和蔣的衝突更超過李濟琛，因為李福林除了與吳鐵城、伍朝樞、古應芬和胡漢民等連成一氣外，他的第五軍是廣東系軍隊存留下來的唯一的一支軍隊，因而他具有排斥客籍軍隊，自行統治廣東的野心。他不願任何人，尤其不願蔣介石直接指揮他的軍隊，干涉他在自己軍隊中的行為（包括任意剋扣軍餉、搜刮人民等）。即使蔣所直接指揮的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學生軍來說，也並不完全可靠；因第一軍中最能作戰的下級軍官，有不少是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同情共黨的鄧演達，當時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兼教育部長，在學生中極有威信，以致被蔣監視。尤其是共產黨人所組織的「青年軍人俱樂部」的影響和勢力，遠超過了蔣所控制的「孫文主義學會」。

另一方面，在廣東，特別是廣州的工人群眾，除了少數的機器工人受右派的機器工會的影響外，幾乎全體組織了起來，圍繞在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周圍，並組織了自己的武裝糾察隊（約二千餘人）。而廣東東部的海、陸、豐等縣以及西部廣陵等縣的農民，已組織了強有力農民協會，全省農民協會會員六十餘萬人，並擁有自己的武裝，特別是廣陵區的農民，那時正和當地豪紳地主的保衛團進行猛烈的鬥爭，表現了頑強的戰鬥精

神，還有葉挺所指揮的軍隊，雖然人數不多，但戰鬥力極強。

至於廣東以外，那時蔣介石還沒有可靠的支持力量。北方的馮玉祥（馮當時已去莫斯科），湖南的唐生智和廣西的李宗仁，他們雖擁有很大的軍事力量，並已傾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和蔣介石還沒有直接的聯繫，而且他們當時傾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多半是希望經過國民黨從蘇聯取得物質的援助（如軍火及軍事專家等），以便擴充自己的勢力。因而對蔣介石企圖把持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及指揮一切軍事力量的獨裁傾向，與其說他們是支持他，毋寧說是反對的。當然，蔣介石反共反俄的「3月20日政變」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資產階級政客中，特別在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中，已引起了熱烈的同情，準備給他以支持，但這些資產階級的政客和西山會議派分子，不但在一般群眾中（連小資產階級在內）沒有任何基礎，而且由於他們和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苟且關係，早已為群眾所不齒。假如蔣介石此時公然和他們結合一起來反共反俄，更要立刻揭開了他的革命假面具，而陷於和吳佩孚、張作霖及孫傳芳等的同樣地位，而成為革命的對象，根本談不到甚麼「北伐」了。這正是蔣介石極不願意的；因為他的主要目的是假革命之名，利用蘇聯的援助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群眾的支持，進行北伐，取北方吳、張、孫等軍閥的地位而代之，以便直接和帝國主義妥協，再回頭來摧毀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

另一方面，共產黨不但在廣東的群眾中具有強大的基礎，即在廣東以外的一切工人，學生及一部份農民和下層小資產及群眾運動中，共產黨人亦成為實際鬥爭的組織者和指揮者。換句話說，廣東以外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都是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進行的。此外，廣東以外全國各大城市國民黨的大多數黨員群眾亦或多或少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

從上面關於蔣介石的力量和共黨可能動員的反蔣力量的分析和對照

之下，即使我們黨採取堅決的抑蔣政策，即聯合當時廣東一切反蔣的軍事力量和群眾力量，以壓制蔣的反動企圖，拒絕他的「整理黨務案」，他還是不敢，而且不能立刻舉行新的政變，假如蔣真發動一次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群眾的新進攻，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群眾勢力和尚在反蔣的國民黨左派軍事力量聯合反抗之下，即令蔣的勢力不被完全摧毀，至少也會被大大地削弱。

事實上，蔣在3月20日舉行的政變，雖然我們黨和國民黨左派在當時絲毫未予抵抗，但他自己已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所以，他在3月23日發表「自責的聲明」，請求汪精衛復職，同時，他寫信給鮑羅廷，要他急速南返，為他調整局勢，並釋放了被捕的第一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人。這一切無可爭辯地證明：蔣介石已深刻地感到，他在3月20日的舉動「太過激進」，因而形成了僵局，試圖稍往後退，以便緩和局勢。當然，他這種「後退」，是企圖爭取時間，以鞏固其已得的陣地，然後再圖進攻，但在蔣已陷於困境而往後退的這種情形下，假如我們黨採取較堅決的政策，極可能迫使他再往後退，以此爭取時間，重新佈置我們的陣地，準備從事進一步的鬥爭，但鮑羅廷的政策，不但沒有「迫使蔣更往後退，以此爭取時間，重新佈置我們的陣地，準備從事新的鬥爭」，反而幫助蔣在「鞏固其已得的陣地上」，建立其邦那巴特的軍事獨裁，將中共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群眾放在這個軍事獨裁的羈絆之下，作為他下一次進攻的犧牲品。

當然，這裏必須指出，在三月政變後，中共中央對蔣所採取的政策，不但遠不充份，而且其中有些是不正確的。例如，該政策決定的第二項：「盡力團結一切國民黨左派，使其成為一種真實力量以對待蔣介石，並孤立他」！這裏顯然包含一些幻想，如果從階級的觀點說，更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廣東的國民黨左派（全國的國民黨左派差不多一樣），除了幾個口頭上表示左傾，或表示願和共黨合作的領袖外，並沒有真正的群眾

或大量的左派國民黨黨員跟在他們後面。那時所謂左派國民黨黨員，實際上就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以及他們所影響的一些學生、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如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因而「團結一切國民黨左派，使其成為一種真實的力量」，在實際上並沒有這種可能，僅是一種幻想。至於所謂「左派領袖」，如汪精衛、譚延闓、朱培德、宋子文，乃至甘乃光之流，從階級的觀點說，他們和蔣介石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他們之反蔣，僅是同一階級內部各集團間暫時的利害衝突而已。當然，共產黨可以，而且應該和必須利用這種衝突來抑制蔣介石，來孤立他。但這是有限度的，由於同一理由，「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黨左派的第二軍和第三軍……」如不把這些軍隊的士兵和下級軍官與工農群眾聯繫起來，是不能發生甚麼革命的作用的。因為這些軍隊的上級將領多是出身於地主或中產階級，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是無法和工農的利益調和的。擴充葉挺的軍隊，尤其擴充工農的武裝，雖然十分正確，但怎樣去擴充這類的武裝，即通過何種方式去武裝工農——對於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還遠未考慮到。我們當時所考慮的只是由俄國運來的槍械分出五千枝來擴充葉挺的隊伍和武裝工農，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很難實現的。即使實現了，其數量亦太少。因而可以說，當時中共中央所決定的上述政策，還是被拘束於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即被限制於和左派國民黨合作的範圍內。僅僅因為遭到蔣介石三月政變的突然打擊的教訓，我們才把這一政策稍加修改，因而，成為一種含有許多矛盾和不徹底的政策。

但中共中央這種不徹底的反蔣政策，比起鮑羅廷所代表的投降政策是大不相同的。尤其在精神方面，我們黨已開始察覺到蔣介石所代表的傾向，對於革命是極度危險的，必須予以抵抗和抑制。為此，我們必須準備建立自己的武裝，即武裝工農群眾去應付將來任何國民黨右派（包括蔣介石）的反動政變。同時，我們更感到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內

合作的政策，有立刻加以改變之必要。這表明我們黨在事變的嚴重打擊之下，已學得一點教訓，開始改變過去的錯誤政策。這是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來，在政治上，在思想上的一个轉捩點。假如從這個轉捩點出發，再進一步將引起三月政變的根源及由此發生的事件予以全面而徹底的分析 and 檢討，我們有可能對當時的局勢達到一個更正確的理解，而得出更為正確的政策。

事實上，當時的全部情形已經很明顯，自 1925 年「五卅事件」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由於它的英勇奮鬥和犧牲精神，已成了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旗手。這不僅給了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而且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極大恐慌。雖然共產黨的政策，完全限於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範圍內，但由於它所組織和領導的廣大而強有力的工農群眾運動，已使資產階級深深地感到威脅。因而促進了後者的「階級覺悟」。戴季陶所發表的反共思想，正是這種「階級覺悟」最明顯的反映。這種反共思想，不但成了當時一切國民黨右派反共的有力武器，而且深刻地傳染到了國民黨的「左派」。例如，廖仲愷便是最明顯的例子⁷，並在「左派」的領導層中找到強有力的支持者——這便是蔣介石。

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改組後的積極活動和努力工作，已

7 廖仲愷曾經被稱為國民黨左派的真正領袖，由於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兼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所以又被稱為最具實力的左派領袖。但當他在 1925 年 8 月 20 日被暗殺前，曾寫了一封信給吳玉章，信中的大意是：現時共黨勢力發展迅速，已大大地超過了國民黨，且在國民黨內處於優勢。如不及時加以預防，國民黨將為共產黨所蠶食。因而他主張真正的國民黨員必須團結起來，挽救黨的危機。他說，他之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便是為此。廖希望吳和他攜手合作，以便達成這個救黨的重大任務。廖那時還不知道吳已加入共產黨。他認為吳既是老同盟會的幹部，參加過辛亥革命，在當時又為四川國民黨省黨部的主要負責者，因而認定他是最可靠而有力量的真正國民黨領袖。故視他為心腹，把他自己心中的憂慮和計劃告訴他。但吳收到廖的信後，立即交給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請其注意。廖給吳的信，正是反映了國民黨「左派」防共的真正意向，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但由於廖隨即被胡漢民等右派暗殺，我們中央委會對這封信沒有加以任何討論，便把它擱下來。吳玉章這一舉動，證明是忠於共產黨的，因而在國民黨反動後，他一直留在黨裏。他現時是中共中央委員，人民大學校長，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以前常代表中共對中蘇關係發表談話。

在該黨的中央黨部和各地方黨部取得了重要的地位。特別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門中都取得了完全的或部份的指導權。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馮菊波工人部秘書，毛澤東任宣傳部副部長，劉伯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雖然，這些共產黨人放棄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將自己限制於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和執行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政策；但在蔣介石及其擁護者看來，他們還是大大地侵犯了國民黨的「主權」。

此外，共產黨員以政治委員的資格參加國民黨的軍隊工作，雖然這種工作是完全避免在兵士和下級軍官中進行任何共產主義的宣傳和組織，只是為了加強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力量，但在蔣介石所代表的將軍們的眼中，這是共產黨人侵犯了他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軍隊指揮權。

就蔣介石個人說：他自充任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在俄國顧問和共產黨的全力支持下，壓平了劉震寰和楊希閔的叛亂，並在討伐陳炯明和鄧本殷的戰役中，取得完全勝利及由此而統一廣東後，他已自視為廣東的主人，孫中山的唯一繼承者。但當時站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最高領袖地位，而又為俄國顧問和共產黨所支持的是汪精衛（汪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並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這是蔣介石所異常嫉妒而不能容忍的。

以上這些情形綜合起來，便是蔣介石舉行三月政變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換句話，蔣介石的三月政變，在客觀上是代表資產階級奪取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領導權，企圖壓服共產黨，使其成為他支配工農群眾的輔助工具。他的「整理黨務案」的目的即在於此。在主觀上，他企圖取汪精衛地位而代之，以滿足其支配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以及廣東全部軍事力量的野心。

假如我們黨當時能夠從上面的分析和結論出發，而且事實已清楚地表明，我們應當從上面的分析和結論出發。那麼，中國共產黨在蔣介石

3月20日政變後所應採取的政策，首先就是退出國民黨，從黨內合作改為黨外合作，因為只有如此，共產黨才能使自己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和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政策及其紀律的重重束縛下解脫出來，獲得完全的獨立，重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代表工農群眾的利益，把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的運動聯繫起來，向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

「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為黨外合作」的觀念，自戴季陶發表反共思想後，便已在我們黨內某些黨員及一部份領袖中發生，並成為相當有力的要求。例如，在1925年10月召開中央全體會議上，陳獨秀便已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建議，僅因為國際代表魏金斯基堅持，共產黨員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他當然是根據莫斯科的指示），以便和左派密切合作以反對右派，才使陳的建議沒有獲得通過，但在三月政變之後特別是蔣介石（以前被認為左派領袖之一的），不以他在三月政變中所攫得的權力為滿足，還要進一步提出「整理黨務案」來剝奪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所應享的權利，並給以種種嚴厲的束縛後，這便無可爭論地表明：共產黨再留在國民黨內，除了甘受束縛和為它在工農群眾中起欺騙作用，即掩飾它的反動政策外，再沒有別的意義了。因此，我當時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以此抗拒蔣介石的「黨務整理案」。假如我們當時宣佈「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則蔣介石的黨務整理案，不但等於無的放矢，完全失去了它束縛共產黨人的企圖，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在國民黨內部引起極大的混亂和衝突。首先是蔣介石和汪精衛派中間爭取黨權、政權和軍事領導的衝突。這樣，共產黨便可利用此種衝突來削弱蔣介石的勢力。同時，將我們的政策轉向鞏固和發展工農群眾的力量一方面去。

當然，在我們宣佈「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同時，應當聲明：我們共產黨願繼續和一切願意進行革命的國民黨人合作。在這樣的聲明之下，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和國民黨左派簽訂某種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的臨時協定。如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共同協定等。但在這類的共同行動中，我們可以，而且必須保持完全的批評自由，實行列寧的指示，「不用害怕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攜手打擊敵人。但在一個絕對的條件之下：不混亂組織，分途進軍，共同打擊，不隱瞞利益的衝突，警戒同盟者和警戒敵人一樣。」（“Need not fear to inflict blows upon the enemy hand in han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bourgeois democracy under the absolute provision: not to amalgamate organizations; to march separately and strike in unity; not to conceal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 to watch its allies as much as its enemy.”）

在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取得獨立的條件之下，我們即可準備乘時提出蘇維埃，或工農兵代表會議作為聯合工農兵及一切城市貧民的最高組織形式。事實上，當時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已是一個工人蘇維埃的雛形。它擁有自己的武裝和法庭。它所指揮的武裝糾察隊，不僅在各海口檢查敵貨，而且有時巡邏街道。它的法庭自行審理工人中發生的糾紛，並辦有很多工人學校，以教育工人的子弟。所有這些都表明：省港罷工委員會已執行蘇維埃的某些機能了。另一方面，在東江海、陸、豐等縣的農民協會，都自己處理農民中間的民事案件：自辦學校，並擁有武裝以反抗地主的壓迫，執行了農民蘇維埃的某些作用。如果共產黨號召工人、農民和兵士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在當時工農群眾運動高漲的情形下，是很可能實現的。工農兵代表會議一經成立，不但賦予工農兵的聯盟以最高、最廣泛和最有力的組織形式，把城市和鄉村的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群眾團結於它的周圍，並對武裝工農給了一個鎖鑰，可以藉此有效地打開解決這個問題的門戶。

同時，在當時廣東農民運動開始擴大發展的情況下，已提出了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即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問題。我那時參加了「廣

東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幾次會議⁸。據海、陸、豐等縣農民協會的報告，許多鄉村的農民已表示不願交租予地主，而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他們。因為我們黨的政策完全遷就國民黨的「二五減租」，才抑制了農民渴求土地的要求。事實上，所謂二五減租，因國民黨故意拖延，根本沒有實行，不過用做欺騙農民的一種詭計而已。假如我們黨當時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土地及土地不夠的農民，即實行孫中山允許的『耕者有其田』的諾言。我們不但一定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堅決支持，迅速地發展農民的武裝勢力，在農村中形成最強大的革命力量，而且可以大大地影響國民黨軍隊的下層兵士，因為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都是破產或失去土地的農民，一旦給他們獲得土地的希望，他們便自然地站到革命方面。這樣，便從根本上消滅了，至少削弱了反動軍官的基地，因而也就大大地減少了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威脅。

在工農代表會議和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這個革命政綱的號召之下，不但在廣東會掀起一個革命的新高潮，而且將影響到全國各地。有可能形成全國範圍的蘇維埃和土地革命運動。這正是俄國布爾什維克藉以走向十月勝利道路的政策。但當時鮑羅廷所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政策，亦即孟什維克的政策，恰好截斷了這條道路。他強迫中共繼續被束縛在國民黨內，並接受蔣介石剝奪共產黨一切權利的「整理黨務案」，幫助他建立軍事獨裁。這便替蔣介石 1927 年 4 月 12 日的另一次反革命政變鋪平了道路。說到這裏，也許有人，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者，會起而爭辯說，如果當時中共號召組織蘇維埃和進行土地革命，不但會從根上阻礙國民黨政府的北伐運動，而且勢必激起國民黨右派和左派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舉行新的反革命政變，以此進一步打擊，甚至摧毀共產黨及其所領

8 「廣東農民運動委員會」，是中共廣東省黨部專為研究和指導廣東省農民運動的機構，由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主持。當時參加這個委員會的還有俄國的 Tarkhanob；他是一個季諾維也夫分子，曾做過蘇俄少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我在莫斯科和他曾有一面之識。

導的工農群眾的力量。

是的，共產黨採取組織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的政策，勢必打斷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但即使共產黨不採取這種革命的政策，對於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也應竭力加以阻止。當時陳獨秀和我便有這樣的觀念。因為此種北伐只是代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的利益，即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是蔣介石企圖利用北伐奪取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的地位，以便和帝國主義直接妥協，反過來摧毀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造成更有利於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的反動統治，往後北伐的結果，恰好證明了蔣介石這一企圖。

至於工農群眾所需要的「北伐」，不僅要討伐北方的反動軍閥，徹底消滅它們，而且要摧毀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在當時最自覺地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便是蔣介石及其黨徒。而且這種反革命勢力，因為它戴着革命的假面具，更能欺騙群眾，因而更加危險，需要首先摧毀它。否則，革命不可免地要遭慘敗。這是一切革命的經驗，首先是 1848 年德奧革命失敗的經驗所啓示了的。

在共產黨獨立推行革命政策的情形下，廣東國民黨右派和左派聯合起來反共，這是很難避免的。問題在於共產黨能否動員和團結廣大的工農群眾，以及能否影響國民黨軍隊的兵士和下級軍官來抵抗，並打退國民黨的反革命進攻。假如共產黨堅決號召組織工農兵會議和土地革命，那就不但能夠動員和團結廣大的工農群眾，而且能夠分化國民黨的軍隊，團結革命的士兵和下級軍官於自己的周圍。同時，國民黨內部一定發生分化，其中出身於下層小資產階級的分，將傾向於革命或同情於工農群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有可能擊破國民黨一切反動派的進攻而獲得勝利。如果共產黨在廣東取得勝利，再進而舉行北伐，那時的北伐才能成為革命的北伐，北伐的勝利才能符合工農群眾的利益，即消滅一切軍閥和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勢力，驅逐帝國主義，達成國家的完全獨立與

統一，解決土地和國內弱小民族問題，以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即使退一步說，就是共產黨在廣東被國民黨的左右兩派聯合打敗了，它那時在廣東以外各省還保有廣大的工農群眾力量，革命還可以繼續向前發展。無論如何，這種失敗與往後蔣介石領導北伐軍到達上海，和汪精衛領導的「左派國民黨」在武漢，分工合作地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其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遭到摧殘，這便徹底暴露了國民黨各派，尤其是它的「左派」的革命假象；使它們再也不能拿革命的招牌去欺騙群眾了。更重要的是，廣東以外的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將從廣東的失敗獲得最現實的教訓，做為全國繼續進行革命的方針。在這樣的方針指示下，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往前發展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面關於蔣介石「三月政變」意義及其趨向，中共中央和國際代表鮑羅廷對於蔣的政策的分歧，以及一般地對於國民黨政策的分歧，最後，中共中央在鮑羅廷的壓力之下接受了對蔣的投降政策，這一系列的追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蔣介石的「三月政變」，乃是中國第二次革命過程中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它對於整個革命的演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和影響：一方面，它表示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感到中共所領導的強大的工農革命勢力的威脅。第一次實行政變來打擊共產黨，並以「黨務整理案」進一步來束縛它，使它成為欺騙工農群眾的簡單工具，以便徹底實現他的反革命企圖。

二、另一方面，中共在「三月政變」的突擊之下，已開始覺悟到蔣介石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傾向之嚴重威脅，決心把當時尚在反蔣的國民黨左派及其影響下的軍隊，和工農群眾的革命勢力聯合起來，抵抗他，抑制他，準備進行反攻，並擬退出國民黨，走上獨立領導工農革命的道路。雖然當時中共的政策還含有許多缺點和不徹底，但假如不遭到

鮑羅廷的壓制，依照它自己的經驗和思想邏輯，可能發展成為革命的路線。

三、鮑羅廷所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政策，不但完全推翻了中共中央的反蔣政策，而且迫使它承認蔣在三月政變中所攫取的一切權力，接受他的「黨務整理案」，幫助他建立軍事獨裁，以全力支持他所需要和領導的北伐，這便替蔣介石下一次反革命政變準備最有利的條件。

四、如果從共產國際強迫中共加入國民黨，即把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放在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的圈套內——這條前所未聞的機會主義路線來看，蔣介石所舉行的「三月政變」及其所提出的「黨務整理案」，已最清楚地暴露了這條路線的完全破產。但共產國際不但沒有從這樣的破產中吸取教訓，改變其政策，讓中共退出國民黨而擺脫其圈套，反而更強調「國共合作」之必要，迫使它繼續留在國民黨的圈套內，並接受蔣介石的「黨務整理案」來加緊這個圈套的束縛。這就表明共產國際決心依照它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邏輯進行到底，不容許中國共產黨擺脫這條機會主義路線的圈套。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悲劇。

蔣介石的「黨務整理案」，在1926年5月18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正式通過，並在報刊上發表後，一切反動派都認為蔣已壓服了共產黨，興高采烈地在各方面活躍起來。而一般革命分子和工農群眾則深感不安，到處流露不滿和悲觀的情緒，廣州的情形變得愈來愈陰暗，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共產黨的領袖和幹部，特別是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的共產黨人，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北伐」上。如譚平山、林伯渠和毛澤東等，都準備離開廣州，到長江流域去迎接北伐軍的到來。就是不得不留在廣東的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也把希望放在北伐的前途上。我為了想知道蘇俄軍事顧問對於北伐的意見，曾訪問了加倫將軍。

加倫（Galen）原名 Vassili Blusher。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內戰中曾任

過軍長，建立過輝煌的戰績。他自 1924 年初抵廣州擔任國民黨的軍事顧問後，曾幫助國民黨政府建立或改組各種軍事機構和改組軍隊，做了很大的貢獻。尤其在討伐陳炯明和鄧本殷的戰役中，他在戰略和戰術方面的貢獻更大。因而加倫將軍的名字為當時一般人所稱道。

就他的外表看，加倫不像一個軍人，而像一個文雅的學者。但他的態度單純，說話直爽。雖然他避免討論政治問題，但關於軍事方面的情形，卻侃侃而談。當我問他：「你對於蔣介石怎樣看法？」，他的答覆是：「他是一個蹩腳的軍人」。這是加倫在過去兩年中，根據蔣介石在軍事上或作戰時的表現時所得出來的評語。當我問他關於北伐的軍事計劃和前途時，他拿着一條棍子指着牆壁上掛的軍用地圖所標誌的三條紅線給我看，並說明那些軍隊沿着第一道紅線向湖南、湖北進攻，那些軍隊沿着第二道紅線向江西、安徽進伐，甚麼軍隊向福建，浙江前進。他並從軍事的觀點上，把吳佩孚和孫傳芳率領的北方軍隊，和南方的北伐軍，雙方的優點與缺點，加以比較和評價。他的結論是「只要北伐軍得到工農群眾的支持，勝利是有把握的」。

加倫將軍對於北伐勝利的估計，後來是被事實驗證了的。但由於鮑羅廷在政治上所推行的機會主義政策，這個軍事勝利的果實完全落在蔣介石和汪精衛所代表的國民黨的懷抱裏。後來這種反革命勝利的悲劇，是當時把全部希望寄託於「北伐」的共產黨人所絕未料到的。至於加倫將軍個人後來的悲慘結局（被斯大林秘密處死），雖然和中國革命的失敗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亦是它的間接的後果之一，因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慘敗，促進了蘇聯特爾米多（Thermidor）的勝利，加速完成了斯大林的官僚獨裁，以致整代的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軍事將領，都成為這個獨裁的犧牲者。

關於我這次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鮑羅廷商討應付蔣介石的政策，所遭到的困難、阻礙、失敗和困惱的經過情

形，我的妻子陳碧蘭在她的回憶錄中，做了如下的概述，可以做為本章的結語：

自述之代表中央常委的意見，來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鮑羅廷商討應付蔣介石「三月政變」的政策發生激烈的衝突後，不但鮑羅廷對他採取敵視的態度，即一向尊敬和親近述之的陳延年也完全改變了。他除了對述之表示冷淡外，並於無形中大大地限制了他的權利與活動。述之除了在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中，代表中共致辭，和毛澤東請他到他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講外，陳延年所召集的許多幹部會議，都沒有請述之去參加和講話，甚至有幹部會議自動邀請述之去演講時，陳延年總是事先對他說：「你最好不要提及三民主義」，因為他知道述之對三民主義是採取批評態度的，唯恐因此引起同志們對三民主義的懷疑和批評，以致影響「國共合作」的政策。

尤其令我驚異的是：當廣東省委特別召開廣州全體幹部會議來討論我黨對蔣介石的三月政變的政策時，陳延年除了事先安排鮑羅廷作報告，張國燾演說外，竟沒有替中央委員會的特派員彭述之安排講話的時間！在這次會議上，鮑羅廷做了一個冗長的報告，歷數小時之久，重三覆四地強調國共合作的絕對必要和支持北伐的決定意義，尋找各種各式的歪曲理由或論據，為蔣介石的「三月政變」和他的「整理黨務案」解釋和辯護，企圖以此消除同志們對「三月政變」的憤慨和對「整理黨務案」的反感，以便接受他所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政策。至於張國燾所發表的意見，不過重複鮑羅廷的某些話語，同意他所提出的關於接受蔣的「整理黨務案」和支持他的領導北伐的建議罷了。

在張國燾演說後，陳延年以時間不夠為理由，要求會議對

鮑羅廷的報告進行表決。在大多數的舉手表決之下，這次會議沒有任何討論，便算結束了。

在這次專為討論我黨應付蔣介石的政策之會議上，陳延年只安排張國燾演說，而不請述之講話，顯然是出於鮑羅廷的授意或暗示。因鮑羅廷害怕述之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他所代表的中央的反蔣政策，引起出席會議的同志們對他所代表的意見表示懷疑，發生嚴重的爭論，因而示意陳延年採取這種不合理的手段來阻止述之的發言。照理，述之既是中央的特派員，即令他和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意見不同，也應該請他發表意見，讓同志知道他所代表的意見，而加以討論。但陳延年在鮑羅廷的授意之下，採取這樣的手法來解決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這使我深深地感到：廣東省委在鮑羅廷的影響之下，已開始官僚化了！

由於上面說的情形，述之感到中央派他來廣州的使命已完全失敗。尤其是陳延年對他採取的不合作態度，他更感到在廣州已不能做任何有意義的工作。因而陷於十分煩悶的境地，有時大半天沉默着，一聲不響。他這種表情，對於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但當他往後遭到困難、打擊和失敗時，總是如此。

鮑羅廷為了執行他所代表的莫斯科的政策，以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北伐，感到述之留在廣州，對於他是一個障礙。因而對陳延年說：假如彭述之不離開廣州，我很難進行工作。陳延年在鮑羅廷這種示意之下，立即寫信給陳獨秀，要求中央把述之調回上海，以避免和鮑羅廷發生衝突（陳延年給獨秀的信，是我們回到上海才看到的），當我們看到中央調述之回上海的信時，就我個人說，倒是一件愉快的事。因為自從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開過後，我在這裏不但無事可做，而且覺得太沉悶，我深深覺得廣州黨內的氣氛和工作態度，已染上了國民黨的官

僚主義的某些習氣。我很難適應它。同時，我在上海的職務也不宜擔擱太久。對速之方面說，他覺得上海調他回去的信，好像給他解除了一個沉重的負擔。於是我們帶着沉重而又似乎輕鬆的複雜心情，於1926年6月初回到了上海。

【附錄】

1. 中共官方歷史家偽造歷史的範例

我在前面關於「蔣介石的3月20日政變」一章中，對於當時中共中央所決定的反蔣政策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所執行的妥協投降政策，根據我親身經歷的事實，做了頗為詳細的敘述。但現時中共官方的歷史家們，為了替當時斯大林所操控的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辯護，特別是為要發明毛澤東的主張之一貫正確，竟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偽造歷史。為了恢復歷史的真相，獲得教訓，這便迫使我不得不進一步引證文件和事實來揭穿這種偽造。

例如《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作者何幹之，在敘述了蔣介石1926年「3月20日政變」和5月18日國民黨中央委員全會通過的「整理黨務案」之後，做出了如下的評論：

蔣介石這些陰謀活動，是利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弱點的。在3月20日事件後，毛澤東等同志曾經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叛行為加以反擊，採取進攻的策略來打退反動陰謀，……當時進攻的政策是可能勝利的，因為蔣介石在廣東國民革命各軍中是孤立的。他所統率的軍隊只佔少數，所有民眾運動完全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如果黨採取針鋒相對的政策，蔣介石的反共陰謀是可以打退的。但是陳獨秀機

會主義者卻拒絕這樣做，總是強調聯合，不敢進行鬥爭，認為革命已經轉入低潮，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不能夠壓倒蔣介石。而蔣介石不但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並且整個資產階級都站在他的一面，為了使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之內，應當採取讓步政策。……6月4日陳獨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公開信，竭力替蔣介石洗刷罪惡。陳獨秀說：「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為」……

陳獨秀這種妥協讓步的政策，更助長了蔣介石的反革命野心。（《中國現代革命史》78-79頁）

何幹之前面這一大段「評論」，恰好把當時的歷史事實顛倒過來。即把鮑羅廷所代表的共產國際的「妥協讓步」政策加之於陳獨秀。而將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反蔣政策，歸之於毛澤東。關於鮑羅廷所堅持和實行的「妥協讓步政策」和當時中共中央的反蔣政策，如我在前一章所敘述的，本已足夠推翻何幹之的虛構和偽造。但為了更精確地和不爭論地證明他的偽造，讓我徵引當時廣州蘇俄顧問的一個文件來做見證吧。

這個文件就是〈Stepanov's Report to a Meeting of the Soviet Group at Canton〉，是Stepanov在1926年5月初廣州蘇俄顧問團會議上所做報告和答覆問題（其他顧問所提出的）的記錄。在該記錄中，Stepanov在批評中共中央委員代表的意見時，有如下的話：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CT (Peng Shu-Chih) said that Chiang is an individualist who does not rely on the masses. He said that, if Chiang should be opposed by the Communists and the KMT Left Wing at Canton, he (Chiang) is to be alienated and isolated.

However, und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in Canton, Chiang will not be alienated. The northern militarists, the students, and the merchants all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him, and he himself realigned it. He is definitely not an ordinary militarist but a militarist with revolutionary interests... He is filled with revolutionary ideas far superior to the other militarists.

No one can guarantee that Chiang will always be one of us, but we must utilize him for the caus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Chiang has the peculiar characteristic of not depending on the masse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CT has referred to Chiang in the manner of hero-worship [referred to Chiang's desire to become a hero]. In China today, we must not scorn such a peculiarity.....we should do our utmost to alienate him from the Right Wing and persuade him to join the work of the KMT Left. I am absolutely not afraid of Chiang's peculiar character, but we must try to remedy it in time."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by Wilbur and How, pages 264-265 - My Emphasizes.)

Stepanov 是當時國民革命第一軍的顧問，在俄國顧問團中居於政治領袖地位。他和鮑羅廷密切合作，代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立場，以領導俄國的顧問團；因而他所表示的意見和鮑羅廷的是完全一致的。但 Stepanov 在上面的一段話中關於我的意見的引述，乃是由於鮑羅廷的轉述。因而他引述我的意見，不但不完全，而且也不準確。但其中有一點是大致不錯的，即：“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KCT (Peng Shu-Chih) said that if Chiang should be opposed by commu-

nists and KMT Left Wing at Canton, he would be alienated and isolated.”由 Stepanov 這幾句話便無爭論證明：我當時所代表的，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絕不是「妥協讓步政策」，而是主張“Chiang should be opposed by communists and KMT left wing at Canton”；而堅持「妥協讓步政策」的，正是代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政策的俄國顧問團政治領袖 Stepanov。因為他堅持：“We must utilize him (Chiang) for the caus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We should do our utmost to alienate him from Right Wing and persuade him to join the work of the KMT Left.”

說「蔣介石不但有強大的力量，並且整個資產階級站在他的一方面。為了使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內，應當採取妥協讓步政策」的，絕不是「陳獨秀機會主義者」，而是代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路線的 Stepanov。因為他肯定：“Chiang will not be alienated. The northern militarists, the students, and the merchants all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him, and he himself realizes it. He is definitely not an ordinary militarist but a militarist with revolutionary interests..... He is filled with revolutionary ideas for superior to the other militarists.”因此，「為了使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之內」，Stepanov 不但主張對蔣介石「採取妥協讓步政策」，而且力言：“We should do our utmost to alienate him from the Right Wing and persuade him to join the work of the KMT Left.”

Stepanov 主張對蔣介石「應當採取讓步政策」的建議，在他的另一個文件中說得更明顯而露骨，就是他在「3月20日政變」後不久（約在3月末或4月初），在俄國顧問團會議上所做的關於該事變的報告。其結論是：

Chiang, a man of intelligence and ambition, will surely not resort

to such a course. He claims he has learned an invaluable lesson from the incident of March Twentieth. His action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Left but was investigated by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f the Right. If we could inject into him a small dose of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surround him with the brave influence of the Left, we would ensure against repetition of the March Twentieth Incident. We are now creating conditions unfavorable to the occurrence of another such incident. We are trying to make Chiang cooperate with us again by satisfying his desire for glory and enabling him to achieve greater power and strength than he now enjoys.

Such is the general outline of our plan to utilize Chiang's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aus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t is permissible to make a few concessions to Chiang's political demands as the price we pay.

Stepanov 上面所描述的 “The general outline of our plan” 正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三月政變」後對蔣介石的「妥協讓步政策」的綱領，他所謂 “To make a few concessions to Chiang's political demands”，便是鮑羅廷後來接受蔣的「黨務整理案」，幫助他建立軍事獨裁和以全力支持他北伐，以此去 “Satisfying his desire for glory and enabling him to achieve greater power and strength than he now enjoys.” 但這個 “concessions” 的政策，不但沒有 “ensure against repetition of the March Twentieth Incident”，而且導致更大的和更殘酷的 “incident”，那就是 1927 年 4 月 12 日的政變。由此不可爭論地證明：何幹之把 Stepanov 和鮑羅廷所代表的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妥協讓步政策」，歸之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者，是何等荒謬和顛倒是非！

至於何幹之說：「3月20日事件後，毛澤東等同志曾經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叛行為加以反擊，採取進攻的政策打退反動的陰謀」，他在這裏沒有舉出任何文件或證據，完全憑空虛構。假使真如何幹之所說，毛澤東在「3月20日事件後」有甚麼反蔣主張，他至少要向我表示他的這種「主張」，因為他十分知道我是代表中央委員會到廣州處理「3月20日事件」的。那時毛澤東曾到我的住所訪問過兩次。第一次訪問我時，帶着他寫的分析中國農民內部各階層的文章，準備登在國民黨農民部出版的《中國農民》雜誌上；要求我對他的文章表示意見或批評⁹。但他沒有提及任何政治問題，更不用說沒有提到反對蔣介石的「主張」了。第二次是請我到他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去演講。這一次，他除了同我的妻子碧蘭和我談一些閒話外，也絕沒有提到他的「反蔣主張」或其他的政治問題。此外，當鮑羅廷在廣東省委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專門報告關於「3月20日政變」和應付蔣介石的政策時，毛澤東是這次會議的參

9 毛澤東分析中國農民內部各階層的文章頗為奇特。他按照農民耕種土地的畝數多少來劃分他們的階層。例如耕種二畝地的農民算做一個階層，耕種四畝的算做另一階層。如此依照二畝遞次增加的比例，把農民分為無數的階層，我當時提醒他說，按照耕地的多少來劃分農民內部的階層，正同以前英國有人按照工人每月得多少先令來劃分工人工內部階層是一樣的。依照列寧的意見，應當按照農民所耕種的土地（不管是自己的或租來的）能否維持其生活為標準來區分農民的階層。例如一個農民所耕種的土地僅夠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便稱為中農，有多餘的稱為富農，不足的為貧農。毛聽了我對他的文章的批評，沒有甚麼表示，似乎是默認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美國新聞記者 Edge Snow 敘述生平，提到蔣介石 1926 年 3 月舉行他的第一次政變時，除了說 "Aft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Left and Right Wing Kuomintang and 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Kuomintang Communist Solidarity"，他沒有說他當時有甚麼反蔣主張或不同意陳獨秀的「讓步政策」。因為他自己完全知道，對蔣介石的「妥協讓步」是在鮑羅廷主持下執行的。胡喬木在他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是中共官方審查的黨史，已譯成各種外國文出版），說到蔣介石「1926年3月20日組織了反共的陰謀事變」時，除了污蔑「陳獨秀卻向蔣介石的這種進攻做了機會主義的讓步，滿足了蔣介石在軍隊中和國民黨領導機關中，限制共產黨活動的反動要求」外（《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第15、16頁），沒有一個字提到毛澤東的反蔣主張。假如毛澤東在「3月20日事件後」，「曾經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動行為加以反擊，採取進攻的政策來打退反動陰謀」真是事實，那麼，胡喬木在他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中，一定要大書特書加以頌揚的；但胡喬木沒有這樣做。這便從反面證明：毛澤東在三月政變後的「反蔣主張」，那時還沒有發明哩！

加者之一。但他對於鮑羅廷所主張的對蔣的「妥協讓步政策」，不但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寧可說是贊成或默認的。

在當時向我表示反對蔣介石的三月政變和他的「黨務整理案」的，只有惲代英。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委員、共產黨著名的宣傳演說家、最忠實而富於犧牲精神的革命戰士，幾年以後死於蔣介石之手。他當時任黃埔軍校教官，並任該校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因此他代表該支部的同志來向我表示意見。他說，該支部的同志們對於蔣介石 3 月 20 日的反動行為極為憤慨；尤其反對他的「黨務整理案」。因該案中有一條規定：凡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包括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都需將其名冊送交國民黨中央黨部存檔。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非常危險，將來國民黨可以隨時按名冊逮捕我們的同志。因而他們要求黨拒絕蔣的「黨務整理案」。雖然惲代英和黃埔軍校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着重在反對「黨務整理案」對他們的直接威脅的條文上，但由此表明他們對於國民黨和蔣介石是絕不信任的。他們的基本精神是反對蔣介石的「三月政變」及其全部「黨務整理案」。而毛澤東和我談話時，卻絲毫沒有表示像惲代英所代表的這種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精神。

現時中共的歷史家，如何幹之等，既已虛構事實來描繪毛澤東「在 3 月 20 日事件後」，曾主張對蔣介石「採取進攻政策」，以此和「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的「妥協讓步政策」相對照，並順便「證明」毛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的主張一貫是正確的。因此，我覺得把毛澤東在「3 月 20 日事件」前頗長的時期內，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態度以及他的實際行為，加以概括地敘述，是必要的。

毛澤東在中共成立後的初期（1921-1923），曾擔負湖南省委的指導工作（省委書記），確做出了可觀的成績。但在 1923 年，共產國際正式決定中共加入國民黨後，他對於共產黨的工作便已表示不感興趣，而專門從事於國民黨的活動了。最顯著的事實是：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

年6月)曾選毛為中央委員，並決定他離開湖南省委，到中央常務委員會負責組織工作，但他根本不曾做過這一工作，而把全部時間放在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尤其當他在國民黨改組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走得更遠。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他那時甚至主張取消共產黨。因他認為共產黨既已加入國民黨，則它的存在便是多餘的。所以從這時起，他完全不參加共產黨內的任何工作，除了一個短期內，他因養病在湖南鄉下做過農民運動外，他的全部活動都在國民黨內。從1925年夏到1926年3月，這是中國第二次的高潮時期，他都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宣傳工作。那時汪精衛為宣傳部長，毛任秘書，隨後任宣傳部副部長，並主編國民黨的機關雜誌《政治週刊》。他在這個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無須說，完全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政治主張的。

正由於毛澤東曾一度主張取消共產黨，並在實際上拋棄了共產黨的工作，而專從事於國民黨的活動。所以當時一般共產黨員都認為他所代表的傾向是最右的。因而在1924年1月舉行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及1927年5月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毛不但沒有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失去了參加大會的代表資格。現時中共的歷史家們無法改變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所表現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記錄，為了榮耀他們的「毛主席」，只好虛構事實來偽造歷史了。

何幹之斷言陳獨秀在3月20事件後，實行「妥協退讓政策」的唯一證據，是下面幾句話：「6月4日陳獨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公開信，竭力替蔣洗刷罪惡。陳獨秀說：『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為。』是的，陳獨秀寫給蔣介石的那封公開信中，確實說了這樣的話，但絕不能由此證明對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是陳獨秀原來的主張。事實是，如前面所指出的，陳在國際代表鮑羅廷的壓力之下，迫不得已放棄了他的反蔣政策，而接受了國際的「妥

協退讓政策」；並由於駐在上海的國際代表的壓力，為了執行國際所指出的「必須謀取與蔣介石重新合作」的路線，他又被迫寫信給蔣介石，試圖彌縫雙方的裂痕，以緩和局勢。無須說，陳寫給蔣的這封公開信，對於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影響都是很壞的。對陳獨秀個人說，這表現他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往往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這也正是他的最大缺點之一。關於這方面，我在論陳獨秀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問題所表示的態度之前後極端矛盾，已有解釋。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陳獨秀寫信給蔣介石「替蔣介石洗刷罪惡」，正是奉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關於這點，我們只需引出下面一段新聞就足夠證明：

Reuter's telegraphic agency...recently issued the statement that in Canton, Chiang Kai-Shek,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revolutionary troops...had carried a coup d'Etat. But this LYINGREPORT (emphasis in original) had soon to be denied...he Kuomintang is not a tiny group with a few members, but is a mass party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and the revolutionary Canton troops and the revolutionary Canton government are found on this basis. It is of course. Impossible there to carry out a coup d'Etat overnight.

上面這段新聞發表於1926年4月8日共產國際的機關報「國際通訊」上。它斷言“Chiang Kai-Shek,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revolutionary troops, had carried out a coup d'Etat. But this Lying Report had soon to be denied.”這還不是「竭力替蔣介石洗刷罪惡嗎？」陳獨秀寫給蔣介石的公開信，不過是重複近兩月前「國際通訊」所發表的同一意見而已。

最後，讓我們引證中共較早時期的歷史家華崗關於「三月政變」政

策的評論，與何幹之的評論對照一下吧，華崗在他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提到當時中共對於蔣介石的妥協政策時，他評論說：「當時為避免革命的分裂，革命的讓步有時是不得已的必需，因為馬列主義者並不根本排斥妥協……而且革命任務的實現，只有在人們不限於一味前進，而同時還想方法鞏固自己已經奪到的陣地，把自己的力量重新安排一下，使之適合於已經改變的環境，充實自己的後方……所以在當時的環境下，共產黨的任務，不在於假做頑強，而在於咬緊牙關的切實準備力量，以迎接革命戰爭之到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391頁）。且不管華崗上面這一段評論如何錯誤，但有一個要點是明顯的。那就是：他不但沒有將「三月政變後」對蔣介石「妥協退讓政策」諉之於陳獨秀，而且為這種政策辯護，認為「馬列主義者並不根本排斥妥協」，「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共產黨的任務不在於假做頑強」。因為他十分知道當時中共的妥協政策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進行的。這就無可爭論地證明，何幹之把共產國際的妥協政策加在陳獨秀身上，是完全虛偽的了。

由前面的全部敘述和批評，我們可清楚地看到，現時中共歷史家偽造歷史是如何演化的：華崗在1936年寫他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時，認為3月20日事件後，對蔣介石的「妥協讓步政策」是出之於共產國際，是「不得已的必需」，胡喬木在1951年寫他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時，把共產國際的妥協政策歸之於陳獨秀，認為他「向蔣介石的進攻做了機會主義的讓步」。再過六年，即到1957年何幹之發表他的《中國現代革命史》時，不但把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妥協讓步政策」歸之於「陳獨秀機會主義者」，而且憑空加上了「毛澤東等同志曾經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叛行動加以反擊，採取進攻的政策打退反動陰謀」。這便是斯大林主義學校訓練出來，歷史家偽造歷史的典型例子之一。

第一八章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
革命軍北伐的開始
(1926年6月至1927年初)**

我在廣州作為中共特使的餘波

回到上海的次日，我逕自前往地處鬧北的中央地下機關；像往常一樣，見到獨秀在等着我。還來不及對他打招呼，他就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默默地交給我。這是陳延年給他最近的信，我不記得信裏詳細內容，但寫信的動機之突然和嚴重令我吃驚。信中雖然沒有提到鮑羅廷和我之間的衝突，延年卻鄭重聲言一個「事實」，即如果述之同志還繼續留在廣州，鮑羅廷同志也不能繼續完成他的工作，而他對解除共黨與國民黨的糾纏不清之事故，也無能為力……。由這封信我開始了解，獨秀是要讓我知道，不是他要把我調回上海，而是鮑羅廷的堅決意向，要除去我留在廣州成為他眼中的大障礙。因此，獨秀也不必向我解釋，我的調回是同我去廣州之使命目的，完全自相矛盾，並與原來同中央要我留居廣州相當長時期的決定，也有矛盾。

我馬上向他簡略地追述，我同鮑羅廷會談的周折以及在廣州的其他活動。他承認已從某國際駐上海的國際代表（同廣州方面有聯繫的）代理，直接從鮑羅廷那裏得知一些消息。獨秀熟知我的性格，認為無論如何，我同鮑羅廷的「合作」只能作罷。聽了我的話語，獨秀保持沉默，正在思索廣州局勢的變化，尤其是3月20日政變的「結局」，很使他受到震動。然後告訴我國際代表對我中央的建議，我們對國民黨執委會最近的全會決議，必須表示明顯的「調協」立場。而這一共產黨忠誠的表示由兩個文件組成，其中一封是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的正式信件，而另一封是陳獨秀寫給蔣介石的信，為了消除產生廣州3月20日事件的「誤解」；因此，獨秀不得不借助瞿秋白來書寫這兩封信。而瞿秋白正是莫斯科特別訓令的忠實翻譯者。

為了以任何代價求得和蔣介石妥協，這兩個文件的要點完全一樣：就是解脫蔣介石在3月20日政變的責任，同時解除共產黨人在此事件中

的責任（嫌疑），聲稱共產黨人從未對蔣介石有任何敵視；重複聲言共產黨決心繼續同國民黨合作。關於國民黨執委會全會的決議，是專指共產黨人的。那封「黨與黨」之間的信裏的回答，真是不可言喻。「這次（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全會處理國民黨內部事務，而共產黨人不必參入。」

當獨秀講到這兩封「公開信」的時候，它們還在印刷所排印，將在下一期《嚮導》出版。我是在 1926 年 6 月 9 日那一期的《嚮導》上明確看到。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真正恥辱，而且在論證上完全荒唐。我並不掩飾我的判斷，這代表我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所下檄文的空前投降！

兩封公開信的內容，完全符合鮑羅廷指導下的廣東中共省委的立場。這一奇特的形式上的一致性，毫無疑義地顯示，鮑羅廷和上海共產黨國際代表，完全不是自作主張地行使職能，而是遵從和執行莫斯科制定的總政治方針。當然，共產國際的代表，必須通過瞿秋白說服陳獨秀，來寫這兩封信與國民黨「妥協的」「絕對必要的」，為的是「鬆懈對革命未來有爆炸性……，甚至災難性的氛圍」。

1926 年 6 月初這些日子裏，我曾多次在中共中央常委辦公室內同獨秀談論，而瞿秋白很少甚至完全不來這裏。我說到在廣州最近居留的印象，認為在南方的形勢是充滿革命的現象。但是，正當國民黨鼓足「北伐」的步驟，我黨卻被共產國際纏住手足。

我們能夠做些甚麼？難道我們收縮為完成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將領的野心的馴服工具……？我對我們運動的命運深感不妥並脫口而出。獨秀感覺特別敏銳透徹，而且有特殊情緒細緻，對於我的憂慮和可能發生的危險的預感，具有同感。假如我們繼續同樣的行動方針，假如我們繼續讓國民黨和蔣介石予以警惕細緻的監察和控制，我們最壞的絕路，就是我們不能公開指斥這條路線。因為它是國際定下來的路線，而我們對它高貴的革命意向應該全無懷疑。

獨秀自覺地感到，在他參與書寫和發表對國民黨和它的軍事領袖發

出的公開信件時做錯了。他想用甚麼方式來彌補這一過失？有點衝動地，他建議由他私人名義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他和我一起接受的立場，就是共產黨員全部退出國民黨，恢復他們的自由行動的原則作辯護。對這個方案我並不贊同。我對他說，「用你的名義向共產國際寫信是不足夠的，現在有急切必要，在我黨，首先要負責同志展開一場辯論」；我提議召開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除了正常委員外，至少還邀請有戰略重要性地區黨的主要負責人。獨秀很願意接受這個辦法，我們也徵求秋白意見，雖然他無條件地遵隨共產國際，倒也不反對召開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但認為這個會議可以討論蔣介石正在發動北伐過程中，我黨可以做到的具體事務的問題。三人同意，確定這次中央擴大會議召開日期在1926年7月中。

江浙皖區委同志，本來準備召開會議，專為我們同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關係問題，請我就有關我同鮑羅廷和廣東同志們協商和討論做一個報告。自從3月20日政變以來，在廣州到底發生甚麼樣事，他們得到的消息很少。既然在江浙皖區委又回到了我的崗位，所以，我在這裏是最仔細，最詳盡地敘述所有我在廣州採取的步驟，來確定一個對抗蔣介石的政策，也正是上海所有同志所祈望的。區委成員全部出席：羅亦農、尹寬、何松齡、張文公／韓白華，和陳碧蘭。同時也有上海市黨支部（部委）負責人參加會議，還有在國民黨機關裏工作的幹部。

我把全部事實說出來：我與鮑羅廷的不同意見、廣東同志的立場、政治上的關係、對於這次會談失敗的個人估量。當我結束講話時，同志們互相對視，空氣死寂，在他們陰沉的表情裏看不到憤慨和激動，而更壞的，包住怒火，因為他們懂得這個情況特別嚴重。這些同志與廣東的同志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習慣於凡是國際來一訓令，就無思考地，無條件地順從。

可是，當我向他們告知我在廣州不幸的遭遇時，他們已經看到我上

面提到的在《嚮導》發表的兩封信；信中擺在他們面前的既成事實，是我黨向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不可挽回的投降。雖然他們的心靈深深地受到震撼，但他們了解公開反對是無效的。而且我們已經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沼中。「怎麼辦？」——這是他們的回響。他們對蔣介石的敵視不但不減少而是上升。為了表示憤怒，他們通過一個諷刺性的，有點鬧劇式的決議：所有上海在國民黨內有任何職務的同志，自願和公開地脫離國民黨。這個決議象徵着他們對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決定之不明顯抗議。事實上，的確有四位同志，在上海國民黨機構負責職務的，在上海四大日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上公開聲明：為了抗議國民黨採取大大限制共產黨員行動自由的步驟，他們脫離國民黨。這四位簽名聲明的同志是：惲代英、陳碧蘭、張廷進、劉宗鳴。

江浙皖區委通過的決議，以及它在一個實際例子上的應用，不但反映上海同志們的反抗情緒，也反映了我黨內部份幹部和黨員的不滿（除了廣東省黨員外），因他們被迫同蔣介石的國民黨成就一種虛偽的「妥協」。可惜，這種抗議並不能改變我黨的全盤方針。

我也向中共青年團的執委會同志們做了同樣的報告，是在我經常出席的每週一次的會議上。他們很明顯地對廣州 3 月 20 日政變的演化和結局感到震動。而且不贊成共產國際制定的馴服政策。但是他們自覺薄弱，不能提高不同音響來抗議，特別是共產國際在他們心裏完整地保持了巨大的信譽。

中共中央四大第二次全會擴大會議 (1926 年 7 月 12 至 18 日)

國民黨中央執委會 5 月 15 日至 17 日通過的決議案，是鮑羅廷依據對蔣介石「妥協」順從的結果，不久就產生蔣介石預想的效果。他不但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又是國民黨的首領，可以任意指定或廢除

在黨中央機構內的協助者，且對廣州國民政府人員也可以同樣處理。他已經把所有共黨人員排出國民黨的中央機構：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而完全由他身邊的人們來代替。陳果夫，最堅決的反共分子，以後成為蔣介石強大的政治警察的頭頭。他代替譚平山組織部長的職位。顧孟餘，昨日還是北京有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現在投靠蔣介石，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職務……。張靜江，蔣的親信，為蔣代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的主席，以便在光耀的「北伐」旗幟下，可以對軍事行動運用自如。當然，蔣介石是多麼急切地要發動「北伐」，以便征服廣大面積的土地，甚至於全中國。為此，他完全需要莫斯科的道義支持，以及大量物質援助，同時還需要中國共產黨無條件的支持。因為大家知道，只有它才能動員廣大群眾，援助向北行進的國民革命軍。唯一的代價就是一個比較形式上的，而不是實在的諾言：「在國民黨內打倒反革命的右派。」

蔣介石和他的中間偏右派，雖然在國民黨和其軍隊裏，雖然在上層掌握最高權力，但國民黨的黨務整理，即是消除該黨省區機構內的共黨幹部，卻有相當阻力，遠不像上層想像的那樣如意。在許多地區，陳果夫派人接管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當地國民黨的執委會和支部，是直接、差不多全部由共黨黨員組成，且在人民大眾裏享有不可比擬的權威和信譽。這種情況在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在北方……很普遍。不但是國民黨右派領袖，即使是有「左派」聲譽的領袖，都沒有足夠的信用在民眾間爭得大量聽眾。另一方面，大批中共黨員仍然在國民革命軍裏活動，或者做軍官，或是政治委員，或是蔣介石及其他將領們所極需要的蘇聯軍事顧問的翻譯員。這一切，從「國民革命」陣營裏整個及潛在的力量對比來說，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勝點，和蔣介石的「阿奇里斯的腳跟」，要點是存在於北伐的政治觀點和它的總戰略。在初期，觀念上中共和國民黨是分歧的。

發動「北伐」，原則上是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 1926 年 5 月底決定的。6 月初駐在廣東和廣西的國民革命軍，部份隊伍開始向湖南啟動，以聲援被吳佩孚軍隊緊迫的唐生智部隊（剛投向國民革命軍）。這就是，實際上，北伐的（第一幕）開場。我們在《嚮導》1926 年 7 月 7 日對此發表獨秀的評論〈論國民政府之北伐〉（No. 161）。這篇文章明白地反應獨秀和我這一方面，同蔣介石以及其同夥另一方面之間，對於這一全國性的征伐的觀念和戰略的尖銳分歧。

獨秀警告輿論界，尤其是革命群眾：廣州向湖南進軍的「討伐」並不代表一股真正革命力量的擴展，而是國民政府對吳佩孚進攻的自衛措施；這一軍事行動絕不可以與整個國民革命混淆一起，而國民革命必須動員革命群眾，為他們自身解放直接向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戰鬥。獨秀力勸戰士和革命群眾，不抱幻想，不沉溺在「北伐」可能帶來的奇蹟的等待中。同時，他堅持領導這一行動的國民黨，無論如何必須尊重人民，一方面支持北伐，而且保衛自身利益的自由和權利。

獨秀在此指出，同我們的北伐觀念全然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北伐意向是有限制的，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而且更着重指出表明關於尊重公民自由權利的國民黨的決心，到處限制他們的軍隊抵達時，以保衛後方為由，限制工、農、學生組織的活動。

我們「盟友」的反應一觸即發。獨秀馬上收到蔣介石的替身，張靜江的抗議信，責備他又提出已經解決的分歧。於是又一番爭議展開：在「北伐」前進的過程中，在它佔領的地區裏，革命群眾是否有權爭取基本公民自由，並且進行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鬥爭¹⁰？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正是我黨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前夕的政治環境和氣氛。

獨秀同我商量，一致認為這次中央擴大會議，應該把充份時間集中

10 《嚮導》1926 年 8 月 25 日，8 月 22 日「讀者之聲」。

於自3月20日政變，到國民黨5月底執委會全會以來之局勢演變，做出明確的分析，然後重新制定在新的陣地裏，對國民黨應取的方針。我們深知解決辦法不易找到，因為鮑羅廷和我黨在過去兩個月內已經接受條件，繼續保持同國民黨的有機性的聯盟。這是我們想改變這惡劣局勢所做的最後嘗試。我們的中心問題是，要說服同志們趕緊確定一個新的方針：不受國民黨強加於我們的枷鎖來自由會合，來代替目前兩黨的政治同盟。這一主要考慮正是我們發起召開這次中央擴大會議的動機。

瞿秋白，本是我黨中央和上海共產國際代表的聯繫人，對我們確定召開中央擴大會議的目標大有異議（我已經在第八章裏提到，魏金斯基已不是唯一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而是一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其中大多數對我們是陌生人，都以假名做面具）。瞿秋白和這些「抱着神聖使命的同志們」保持經常聯繫，在我們「中央」這個小圈子裏，自然成為他們的代言人，至少是發聲筒。在他們看來（瞿在內），我們提上議事日程的問題，早已在廣州通過鮑羅廷和蔣介石的協定中解決了。唯一留下需要我們討論的是：當北伐軍事行動發生時，我們所應該採取的具體方法，以致我們的活動分子積極動員廣大革命力量，使城鄉民眾有效支持在北方軍閥統治下的省份裏國民革命軍的行進。只有在這些先決條件下，中共才能確定它的行動和鬥爭的綱領……。因此，一開始就清楚地呈現出在「中央」同志間，兩條目標和方針分歧的路向。

✱

✱

✱

這些考慮上的分歧，反映在全會擴大會議的預備會議上；對於政治形勢和政治力量匯集的估量，以及窺見的前途的估計，都發生意見不合。獨秀為「中央」草擬一份政治決議案，做為全會上政治報告的結論。

在此草案中，獨秀設想兩種可能的前途：

一、在革命群眾運動，尤其是我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促動下的民族解放，含有高度無產階級革命的特色，衝破缺口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的

路向；

二、在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率領下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革命，政權一旦到手，便發動一場反革命，來搗毀工人農民的革命運動。

共產國際的「頭腦」，通過瞿秋白，根本不願聽到這兩種前景的假設，而只擬想中國革命到最後階段，必然是無產階級以及其他革命階段的最終勝利，但在目前這一前景是無法想像的；相反地，我們應該全力去實現「民族資本主義」而努力，遵從孫中山的遺訓，而這便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橋樑。事實上，這些「疑問」是將願望當作現實。

很明顯地，我們與那些共產國際同志們的觀點，相距甚遠。我參與這些討論時心裏越來越不安。我坦然承認，基本上我同意獨秀的觀點，但怎樣回答他們的詭辯？我們能夠公開面對他們的立場，毫無顧忌地粉碎他們的辯辭？不行，在這一層面上的討論陷入困境。

大家只得迴避正題，決定簡捷地取消我黨總政治方針的決議案，而在全會還沒有經過任何討論之前，就事先寫成一篇得到共產國際代表踴躍參與的宣言。

這篇宣言於 1926 年 7 月 14 日發表在《嚮導》（No. 163）上，正當中共四大第二次全會開幕之時，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它和我們的根本觀念遙遙相望，尤其對全會的討論無關痛癢。這是一份專為對待公共輿論的應時文件。既然我們已經背上了共產國際機會主義方針的包袱，在宣言裏表面堂皇的政治綱領，已失去真能動員群眾的價值，也不再符合我們深刻的信念。

1926 年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四大第二次全會，在上海一個黨的地下機關內召開，參加者不到二十人。在中央執委會和中央委員會成員中缺席的有：李守常，從此不能再離開北京蘇聯大使館；朱錦棠仍在湖南，蔡和森留在莫斯科，張國燾還留在廣州。除了陳獨秀、瞿秋白和我是中央常務委員會成員，出席的有譚平山，是中央委員；羅亦農，代表江浙

皖區委書記；趙世炎，代表北方區委，參加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勞動大會（1926年5月）不能再回北方。然而，廣東區委主要人物陳延年，不能到上海出席此會，由譚平山代替；還有上海總工會負責人汪壽華、江浙皖區委其他成員，以及中共青年團代表任弼時。

會議開始時，由獨秀代表中央做預期的政治報告，但不是根據稿子而是口頭敘述的，關於軍閥派系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利益衝突的分析，是《嚮導》文章中多次陳述的論調，是大家熟識的。在報告中，雖然獨秀明顯表示對資產階級反革命意向，對中間階層革命傾向的軟弱有所暴露，但在結論中還是擁護和這一資產階級建立臨時性的聯盟，避免它太快速地倒在帝國主義的懷抱裏，而我黨的職責是團結和擴展我們的民眾基礎（尤其是工人和農民的組織）；不但如此，還要通過小資產階級內的激進分子，對大資產階級施加壓力，逼迫它向左移動，並脫離帝國主義陣營。在國民黨內也應採取同樣的策略；同代表中間階層政治傾向的「左翼」聯合，逼使蔣介石所代表的中間派向左轉，反過來打擊它的右派……：這就是我們在國民革命中應該實現的「國民聯合陣線」的政策，展開我們領導的群眾運動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優勢的競爭。怎樣達到目的？回答很簡單，我們必須把全部精力集中於黨的組織；克服目前的弱點（缺乏理論修養、幹部的官職傾向、疏忽基層工作等等）。有一句話不是無的放矢：我們自責存在「左派幼稚病」，特別表現在農民運動中一些過激的標語口號……。

這個政治報告，沒有堅定和連貫性的政治方針，只能非常片面的，簡略甚至扭曲地表達我們對階級和政治力量的分析，而不全然符合我們（獨秀和我）深刻的思索。事實上，裏面是相互矛盾的論點，帶着苦澀味的很難形容的混合物。根本上說，在結論裏，清楚地表現出共產國際代表們的意見得勝了。

可怪的是，獨秀在報告中只是順便提到「北伐」的啟程，從廣州到

湖南，稱之為「保衛戰爭」……，而不是「真正革命的北伐」。然而，在全會議事日程上正巧由瞿秋白提出要徹底討論這一「北伐」問題，首先是我們的「積極參與」，對於此一「北伐」，在廣州國民黨將領，尤其是蔣介石為首，由鮑羅廷和他的夥伴支持的，而從未向我黨徵求意見的。在這一「北伐」中，我們能夠說些甚麼呢？我們面臨既成的事實。

我們（獨秀和我）不能不說出：預感到這一純然軍事性的北伐，在蔣介石最高指揮下，對我們不利，只能把我們帶向一場民族的災禍。雖然沒有消息證實蔣介石數月來和孫傳芳的拉線，但是我們深信蔣介石必定與北方軍閥成立必需的妥協，反過來用武器打擊我們的代表，以及令他最恐懼的革命運動。我們既然已經失去在原則和實際上不同意這一「北伐」，而不得不支持它。可是，我們認為在發動具體支持國民黨的「北伐」之前，我們應該重新確定與國民黨的關係。特別是經過3月20日政變招來的惡化，而更由國民黨5月底的中央執委會全會的決議案證實了的結果。這正是我們計劃未來行動的絆腳石。從這一角度我們才能提出我們同國民黨關係的討論。

我們（獨秀和我）曾擬好一個動議，由主持會議的譚平山立刻唸出，觸發了全會最熱烈的爭議。根據我所能記憶的草案大意如下：在廣州3月20日政變之後，我黨和國民黨延長至今的合作，已經實際上不可能了，而引我們進入盲道。國民黨在5月底決定的「黨務整理案」，更加顯然指出這種形式合作的不可行。我們應該立刻中止同國民黨這種形式的合作，而商議另一種形式的合作，或黨與黨之間的聯合陣線；我們應該特別同國民黨的左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為了和國民黨，特別是與它的左派重新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共產黨員應全部退出國民黨，恢復行動自由。只有通過這樣的措施，重建在國民黨外面，黨與黨之間正常的合作關係，我們才能避免未來我們之間關係破裂的爆發。

動議草案宣讀後，我們在發言中試着解釋採取這一作為的理由。獨

秀提醒他已經在 1925 年 10 月間的全會上，做過相類似的建議（我雖因病沒有出席，但完全同意此建議）。他還提起，自從我們在國民黨組織範圍內工作起已發生過多次糾紛，以及國民黨領袖不斷向我們發出惡毒的攻擊。比如，最近由戴季陶的小冊子引起的反共運動，還有蔣介石通過「孫文學會」發起向黃埔軍校我們同志的有系統的貶責。我在發言中也着重指出，自從國民黨黨務整理案制定以來，我們在其中工作條件越來越惡劣。留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再沒有符合自身原則和革命群眾利益의思想和行動自由。我們受到「聯盟」嚴緊約束而不能動彈，只有「分離」才能讓我們重新確定明確的路向，並且擬定一個同國民黨左派聯合的新方針。實在說，我們對國民黨這個「左派」還抱有幻想。總之，我們的動議草案引起的爭論，是熱烈而又緊鑼密鼓的。

出席的同志們還沒來得及思考和做出反應之前，瞿秋白站起來發表很長的，有條有理的講話，因他知道我們會在全會提出這個「懸案」，他已經有所準備（胸有成竹）。他激烈地站在我們的對立面。他堅決反對我們的動議草案，因為，在他看來，如果走這條路，就是全然違反由鮑羅廷和蔣介石達成的妥協，把我黨帶到與國民黨絕對破裂的境地。他說如果這樣做，我們應擔負對「北伐」有意識破壞的責任，這是不可挽回，且不可原諒的。他用警告的口氣說：通過這樣動議將推翻我們當前方針的基礎，而形成嚴重的問題……。在討論中，他不斷反覆地，比較靈活地堅持這個立場。但是他所有的發言和論據都圍繞着一個中心意念：通過這樣的決定，我們必然有損於展現眼前光明的前景，就是毫無猶豫地參與國民黨和以蔣介石為首領的「北伐」。瞿秋白的發言並未灌在聾人耳裏，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他表達的意見，是上海共產國際代表們的意見，也就是莫斯科官方的指示。

另一位出色的發言人是譚平山，而他是代表在省區負責人間相當普遍的傾向。由於他具有參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自身經驗，發言有根據。

他承認在國民黨架構中，受到警衛的監視，很難進行有效益的活動，甚至成為不可能；但對與該黨分離，且建立與左派黨外聯盟，表示懷疑。他認為自從汪精衛在廣州「失勢」被蔣介石甩去以後，國民黨「左派」只是徒具虛名。實際上國民黨左派裏不存在一個有信譽的領袖人物，來集合黨內和外圍的一股堅實力量。譚平山繼續說：我們在全省國民黨內部面臨的，最難分解的矛盾是國民黨左派，絕大多數，不僅是由共產黨員創建，而且他們往往是國民黨地方支部的創始人。他舉了幾個突出的例子，比如，在江蘇省國民黨主要領袖是一位共產黨人何紹求，全體領導自稱是左派，因多數是共黨黨員或同情者。在湖北或是湖南，國民黨支部差不多全由共產黨員開始組成的：董必武在武漢是國民黨主要領袖，而夏曦，另一位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在長沙的領導。在北方，雖然李大釗在國民黨內佔有主要地位，但是，也有一些非共黨的領袖形成的「光環」，也自稱是它的「左翼」，有：于右任、徐謙、易培基、李石曾、顧孟餘（已成為蔣介石改組後的國民黨宣傳部主持人）。

譚平山自問與國民黨左派聯盟的實際效益；這一聯盟，在他看來，是不穩定的，空洞的。他承認所言完全出於自身經驗，而不是數據理論性的思考，而他不能選擇任何一條不可滿意的出路。他覺得有點迷失方向。但他最後認為留在國民黨內一個時期還是可能的，但任何人都不可幻想不可避免的故障會不斷發生……。譚平山的發言所反映的矛盾，證明他所處的惡劣境地。他原來是國民黨內中共的關鍵人物；他脫離國民黨是為了抗議它對黨內的共產活動分子的鄙視待遇。然而，他仍是廣東中共區委成員，不得不在形式上支持共產國際的立場。

其他同志發言中，值得一提的是湖南中共省委書記李維漢。湖南共黨是有真實基礎的群眾組織，而且在該省農村裏有顯著的發展。李維漢對獨秀和我反問：如果我們全部退出國民黨，湖南國民黨的支部怎麼辦？我們是否將它的命運交託給國民黨機構派下來的人手中，而我們自己退

出戰場？果真如此的話（他堅定地說）國民黨左派就完全垮了；而國民黨的右派分子就可以霸佔湖南省該黨的機構，也就是霸佔我們多年來努力的成果……。他的結論是全力支持瞿秋白的觀點。其次，趙世炎以北方中共區委的名義，也熱烈擁護瞿秋白表達的共產國際的立場。他甚至於帶諷刺性地說：如果我們放棄由共產國際支助確立的這個方針，那就有必要創立一個新的國際——第四國際。當然，大家把這個說法當作笑話，一個粗魯的玩笑，因為第三國際的威望實在太重大，而這個新的國際是不可思議的事。

此次全會其他參與同志，像羅亦農和江浙皖區委負責人等，雖然在心底裏支持我們在組織上與國民黨分手的建議，但他們也不敢斷然明白表示與共產國際分歧的意見。

在討論時，大多數同志看不到在目前有甚麼解決方案。他們恐怕與國民黨的破裂會引起局勢不可預測的急速變化，只好順應既成事實。但他們一致承認留在國民黨內必然會發生嚴重和繁多的問題；認為需要一個過渡時期更好地為同國民黨分裂作好準備。至於獨秀和我，我們認為局勢那樣嚴重，根本沒有時間來容許一個過渡時期。

總之，在兩方截然對立的爭論中，大部份同志的態度是猶豫的，不明確的；既不能完全贊同我們的動議草案，但又不願完全排除它。而對於瞿秋白提出的方案是有保留的。為了解除這個猶豫不定的局面，他們建議我們的動議草案交給下一次共產國際執委會來討論，做出明智的決定。為了打破所有的猜測和猶豫，瞿秋白早已同我們的「特別顧問」商量好而擬定（寫成書稿）一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決議」。他將這個「反草案」，讀了一遍，就要求全會在這決議草案及我們的動議草案之間表決。被迫在兩個顯然矛盾的方針之間做選擇，而又知悉這個「反草案」是經過「老大哥」應允的，在席同志們只得以前絕對多數通過，除了獨秀和我的兩票。我們聲明，雖然遵從全會的決議的施行，我們保

留不同意見的權利。同志們向我們保證「動議草案」定會傳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表現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存在不同意見（當然是極少數）。

這個奇蹟式的決議，似乎可以消除我們留在國民黨內的困難，到底對於我們有甚麼關聯呢？雖然決議中承認的確是國民黨右派，甚至武裝的中間派發動反革命的進攻：3月20日政變、黨務整理案、黃埔軍校的整肅……。對於這一系列我們剛經歷的事件，決議的作者們用特別圓滑的手段，把因果倒置，定性大部份的錯誤是由我黨所犯的，犯在處理國民黨內部的事務上，而這種錯誤又擴伸到群眾運動。最嚴重的錯誤之一是，我們的同志把持國民黨的領導機構，使得它的左派缺乏發展空間成為一個真正的力量；這樣一來，我黨便直接同國民黨「全體」對立起來，而不是右派和左派之紛爭。這好像就是廣東中共省委同志可悲的經驗教訓（這支毒箭目標是譚平山）。

這個決議正式指責我們（獨秀和我，雖沒有指名道姓）在組織上脫離國民黨的建議，把它籠統地和戴季陶，以及其他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建議混淆一起，而他們是為了保持國民黨意識上的純潔，要把中共黨員開除黨外。

那麼這個決議的作者，對於糾正過去和未來的「偏差」有甚麼補救方案？集合小資產階層於國民黨左派周圍，加強它的組織使它有清晰的自我形象，在群眾運動中盡量擴大它的外圍。簡單地說，共產黨員不應該在他們自己的旗幟下活動。而是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下活動，同時並不忘記對全副武裝的中間派（蔣介石和他的夥伴們）聲明表示「積極支持」，因後者實際上掌握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機關的實權。為了使他們與右派疏離，轉而靠近左派，一齊來打倒右派，在這些指示下，要抽象地堅持我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從此只能是純然欺騙性的煙幕。

我們被否決的動議草案又是怎樣處理的呢？我們沒有收到共產國際執委會任何書面回答。只間接得到瞿秋白以上海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

口頭轉來的回音：在蘇聯官方刊物（就是《真理報》）上布哈林有一評論，嚴正批評有些中國同志的錯誤立場，就是主張共產黨員完全退出國民黨；他認為這個錯誤，與蘇聯左派反對派要求莫斯科退出蘇俄委員會¹¹，同樣是災難性錯誤。

這就是我們的動議草案的結局。但是那時我們不知道它的命運另有所屬，對我們是可慰藉的：幾年以後，當中國 1925-1927 年的革命在最後掙扎的時刻，我才得知這個動議草案，曾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激起斯大林 / 布哈林這一派，與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對派之間的熱烈爭執。那時我們看到托洛茨基 1927 年 4 月 3 日的文件〈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在裏面他肯定我們要求退出國民黨而在黨外和它的左派建立同盟，是絕對正確¹²。這一點證明我們的動議草案的確傳到了莫斯科而引起各派熱烈的反響，而我們當時反而蒙在鼓裏，一無所知。

我們的行動方針，大體上由共產國際的代表們籌劃好了。由他們指示我們正當的途徑，而不走歪路。剩下來的任務是，對我們的同志和群眾運動隊伍要「激發革命活力」，盡全力支持向北進展的國民革命軍。我們的「顧問們」，通過瞿秋白語言上的協助，在全會召開之前，已孜孜不倦地寫成了全部完整的指示。這些指示包裝在眾多的決議案裏，涉及所有國民黨名義上所代表和集合的各階級的政治社會活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和婦女運動、軍人運動，連河南紅槍會那樣的秘密會社也包括在內）。這些很難消化的決議案擺在眼前，我們全會的代表不得不生吞硬嚼，沒有經過討論，廣泛地接受了。

11 陳獨秀〈給全黨公開信〉（1929），寫明「蘇俄委員會」與英國 1926 年大罷工的關係。

12 第 146 頁及彭述之序言（第 55 頁），托氏文中有兩個誤點：一）中共中央全會是在 1926 年 7 月召開的，而不是 6 月。二）托氏所指的決議案不是全會通過的決議案，而是我們的「動議草案」被全會否決了的。可是在一篇文件（1926 年 9 月 27 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第 115 頁），托氏的確提到我們的觀點被 7 月間的全會否決……，而且批評莫斯科在中國採取的方針。我們猜想到了某個時候，托洛茨基已不能收到共產國際執委會機構的文件和確切消息。

這些決議案偽裝革命的辭句，使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成了我們雄心和企望遙遠的迴響，除此以外，真正革命的氣息也消失了。相反地，裏面充滿呆板公式，完全符合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這種合作主義擴及到所有國民黨代表的社會階層，決議案裏重複的公式，絕不能讓我們的「同盟者」（即使是靠不住的）害怕。只要稍為翻閱一下內容，就可看出是處心積慮地模糊對立階級和社會團體的界限。

由國家各階級組成的聯合陣線是軸心，而北伐就是圍繞着它進行的。可是這裏自相矛盾。比如，在「工人運動決議案」內聲明，不能為了要保持聯合陣線而忽視工人利益的保衛。但同時要避免「過份的階級鬥爭式」的口號和要求，不致有損與其他社會夥伴的結盟，民族資產階級自然在內。更鼓勵多多建立非政治性的，普通的社團或俱樂部，以便團結工人。又認為不堅持建立工會的原則是明智之舉。換句話說，再不必要重視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革命自覺的組織。

在農村的聯合陣線，由「農民運動決議案」確定的範疇之寬廣，只是排除直接參與北方軍閥戰鬥的地主鄉紳。因此，對未曾明白使用武力鎮壓農民的鄉紳，甚至大地主都是寬大的，必須使之以服和中立；甚至容忍「民團」（由鄉紳「自衛」組成的武裝隊伍）的存在，只要他們不是張牙舞爪的話。相反，為了避免同這些「民團」發生衝突，「決議案」指示農民不要建立永久性的自衛隊；並向中小地主保證他們的利益不會受損，而且認為他們應該支持在國民黨鞭策下的民族解放運動。深知在地主和貧農之間遲早會爆發嚴重衝突，「決議案」特別建議依靠農民社會裏傳統的團體，來做中間人緩和糾紛。在一系列由「決議案」作者提出的要求裏，可以發現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是我們經常提出的）根本不再列出，而被代替的是「由國民政府確定地租的最高限度（不超過收穫的 50% 以上）……」。

同樣的妥協和讓步，貫穿了 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全會通過的其他決

議案。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堅持，變成我黨頸上的繩索，同時切斷了任何符合城鄉勞苦民眾深切祈望的行動綱領的形成。對 1925 年 1 月召開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方針來說，這是一個全面的大倒退。

然而，在活生生的中國社會裏，在群眾運動裏，到底是怎麼回事？真實的生命在上升期，無顧在辦公廳裏初試的工程師，正在用公式描繪一個特定的布爾喬亞革命。

在中共四大二中全会開會期間，一股浪潮掀起上海這個大工業城市的勞動大眾，也在幾個省份的農村裏掀起大浪。上海工人運動抬起頭來，不管社團老闆的衝擊，以及孫傳芳軍方和帝國主義大兵的多種鎮壓，僅在 6 月一個月裏就有一百零七次罷工，有七萬工人參與。在各生產部門，如紡織、鋼鐵工業、船塢、港埠及其他輕工業都受到影響，也涉及公用事業……

1926 年 7 月初到 16 號，新的罷工潮觸及四十個企業，即四萬工人¹³。起初這些罷工潮有不少是由於食品價格暴漲，特別是米價。工人們要求增加微薄的工資，並且要求實現工作條件的改善，根據 1925 年「五卅」事件後工會為廠方達成而從未遵守的條款。但是這種短暫性的罷工，由於廠方派出打手，或者由巡警捕捉工會人員以示嚇詐，而轉成政治性的罷工；尤其是當中國地界——松江的軍方派士兵搜索，並禁止已開始半公開活動（自 1926 年春始）多少受到容忍的總工會負責人員。

上海的工人們，組織在總工會的周圍，受到「五卅」大規模鬥爭的鼓舞，剛好是隆重舉行了它的週年紀念，更為自覺地感受到，他們自己的力量和經濟與政治的權利。除了經濟的要求外，他們尋求市民和工會組織的自由，和恢復上海總工會的合法存在；因為這是唯一代表他們與廠方和政府當局談判的正式機構。總之，1926 年 7 月間這次罷工潮，顯

13 總工會統計資料，見《嚮導》1926 年 7 月 21 日，164 期；施英，〈四論上海的罷工潮〉。

示上海勞動界政治上的成熟和動員群眾的能力。

雖然我黨在罷工潮中不是直接地參入，但汪壽華，它的領袖之一，實際上成為上海總工會的一號人物（在李立三離開，劉華去世以後）。另一方面，趙世炎開始在江浙皖區內負責工人運動，而以此名義參加總工會執委會的會議。因此，我黨不但徹底支持這次罷工運動，而且是裏面的組成部份。

至於農民運動，特別在廣東，也踏上新的路程，在東江和其他地區，由農民協會組織的農民，最近成為地主鄉紳武裝隊伍（民團）暴力攻擊的對象；他們遭到驅逐出本村或肉體被毀滅的威脅。而他們對土地的渴望卻愈益迫切。¹⁴

在湖南，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的新統帥唐生智開進長沙，差不多不發一槍，而只靠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隊伍（其中有些是中共黨員葉挺統領的）會合，尤其是靠城鄉居民的積極合作：他們截斷鐵路路段，阻止吳佩孚軍隊前進，或運輸食糧物資或偵探敵方軍隊的動態。¹⁵當整個湖南省逐漸為國民革命軍佔領時，在城市裏的群眾組織（工人、手工業者、學生）面臨急迫的革命任務，而在鄉村裏農民協會面臨的是，直接參加反北洋軍閥鬥爭的農民的合法要求，首先是取得他們耕種的一分田地的要求。

這個群眾運動勇往直前，特別在上海、廣東和湖南，是召示我們的跡象，前面伸展着更壯大遼闊的浪潮。

嚴肅的革命者覺悟到，首先要提出的議事日程，便是土地革命，是從根剷除維持到今日的農業剝削舊制度。再者，如果將國民黨主持的北伐，轉變成真實的民族和民眾的革命，那麼最能動員全國勞動群眾的口號，必然是「到處組織工人、農民、兵士的蘇維埃（自治組織），使他

14 《嚮導》171期：〈北伐聲中廣東之農民狀況〉。

15 《嚮導》162期：〈北伐聲中之湖南〉。

們能直接干預革命的進展。工會和農民協會必須得到自衛性的武裝，來對應反革命的軍隊和武裝團體」——這是我黨有義務充份實現的唯一的革命政綱。唉！唉！被通過中間人與國民黨簽立的可詛咒的協定，從頭到腳捆綁起來。我黨再也不能實現由蘇維埃革命，即使是1917年2月革命的歷史經驗所考證的第一步驟。我們，共產黨人，再沒有權利做此考慮。既然中國國民革命與國民黨旗幟下北伐的勝利同樣看待，中國共產黨就再也沒有政綱，沒有未來。

我們怎麼會走到這一步？為甚麼一個被「五卅」運動翻騰巨浪振興的革命黨，一年之後，竟然由它中央領導及基層黨員壓倒多數，未經爭論和抗議，在1926年7月中央二次全會上做出這樣災難性的決定？這個問題縈繞着許多黨員的意境。

的確，無可置疑的，以人數來說，我黨在「五卅」前後有驚人的發展，尤其在上海，黨員人數增加十倍，從「五卅」期間的一千左右到「五卅」運動一週年時增至一萬餘。在其他樞紐中心，如廣州、長沙、武漢、甚至在受嚴重鎮壓的北方，我黨黨員人數是直線上升。在上海，以及在江蘇、浙江、湖南、河南等城市工業區裏，黨的基礎是工人運動，由各工會聯合會組成。

根據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報告，工會聯合會集合一百二十二萬會員。另一方面，根據同一資料，有八十萬農民組織在農民協會裏，尤其在廣東和湖南¹⁶，因此，我們可以正當地發出疑問：為甚麼這樣一股充滿活力和革命的力量，不能建立起一個大壩，來對抗在共產國際指引下形成的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的投降政策？

這個問題的解答，必定牽連到中共上層領導和下層黨員的關係、黨

16 見《嚮導》163期（1926年7月12日）〈中國共產黨時局宣言〉；中國總工會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報告（1926年5月）（胡佛存件影印）。

與群眾運動，尤其是遠遠超前的工人運動的關係，以及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它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黨內部職權行使的問題。因為原則上實行的是根據列寧黨的民主集中制。

正是黨員人數的激增反而成為它最大的弱點，並不是新增黨員素質上有問題。相反，這些新增黨員和幹部多屬無產階級成份，即使也有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成份的，他們是經過戰鬥之火提煉過來的。

最好的例子便是我特別熟悉的，上海地區的成千上萬的新黨員。他們將全副精力奉獻給革命，很少有人顧及個人的安危。他們忍受艱苦，不動聲色地接受比普通工人更下等的生活水平。他們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時；星期六，星期日在內。在週末趁工人休息日，或星期內每天，他們等待夜晚工人們離開工廠之時，商議次日的行動。他們的英勇和不顧自身安危，在多次緊張關頭受到考驗。就是在他們組織罷工和示威中體現出來。他們這樣做，完全出於自覺和決心。這種精神貫穿絕大多數共黨黨員，使它真正團結一致。可是他們所缺乏的，卻是方法和時間，來爭取初步革命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使他們具有政治上的取決和判斷。即使對黨的領導來說，當然，他們可以自由討論和解決日常鬥爭的具體問題。但是對於總的方針，以及同其他社會集團聯盟的策略諸問題，他們是有猶豫的，而避免發表意見，傾向於信任「中央」領導的智慧。

人們容易將這種缺陷歸罪於我黨的特別年輕、缺乏革命傳統和經驗。但我個人特別深刻感到的缺點，是由我們領導負責的政治理論訓練工作，實在太差勁。而我們到底受到比較高水平的訓練；我認為我個人對這個缺點應負責，因我是公認這方面比較資深的，又是黨中央宣傳部主持人。可是我曾多次嘗試集合一個班子來編寫革命理論與實踐通俗化的小冊子，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古典著作，而且開始準備黨員訓練學校。但每次我找到一位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時，他立刻消失不見了。原來是被

鮑羅廷或是任何蘇聯顧問的，巨大有力的無形手臂架走了。其目的是當做翻譯員，在國民黨和它的軍隊裏工作。¹⁷

至於我們幾個「中央」的「領導」，中央機關報《嚮導》佔去了我們大部份時間和精力（尤其對我來說）來保證它每期的出版和發行。再加上黨內每天活動以外，差不多沒有時間對一些基本問題做些深入研究和思考。我寫的文章多是根據過去學習中獲取的思想概念，加以及時發揮而已。也許其他同志們的情況也一樣，除了瞿秋白在外，因他把全部時間集中在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來往、翻譯和直誦國際執委會發出的決議和指令。他的工作是把這些文件傳遞給我們，同時將我們的意見傳達給他們，時常是扭曲了的。這就是黨上層領導和下層黨員之間的真實情況。

同樣的公式可應用到我黨與群眾運動的關係上。比如上海總工會，裏面有數百活動分子與負責幹部，大部份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當工人與廠方發生糾紛時，如果我黨認為罷工適時，中共「中央」交託江浙皖區委與黨工會的負責同志，去討論這個問題，做出選擇。汪壽華便是代表總工會的意見，而最後還是由總工會做出最後決定。一般地說，問題不大，因為總工會多數成員是共產黨員和同情者，沒有其他對立的傾向提出異議。至於講到政治方針的問題時，總工會的幹部是自願地交託我黨決定一條正確的路線。

在這種情形下，那麼怎樣實行「民主集中制」呢？自然是「集中遠超過」民主。而當時我黨還沒有受到斯大林官僚代理人的直接控制（這是一年之後的事）。自從建黨以來，黨內一般成員從來沒有機會參與對最重要的問題的，直率和自由的辯論。唯一例外就是 1922-1923 年共產黨人整批加入國民黨的爭論，產生嚴重分歧。但基本上發生在黨內負責

17 這個現象，我已經在第七章裏指出過，但更趨嚴重化。

幹部和工人運動內。即使在此例外事件上，共產國際，以它當時的代表馬林（斯尼夫列特）做中間人，最後還是把它的意志強加於我黨。

由此我們看到「民主集中制」有兩個層面的運行。雖然大多數負責同志，不像老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經歷過真正的自由和熱烈的爭論。他們並不迴避不符合多數的立場，而傾聽批評和意見。因他們不能想像對黨的立場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會受到歧視或懲罰，而認為這是我黨正常運行之途。正由於這種精神的存在，江浙皖區委，雖然知道在鮑羅廷和蔣介石之間已有契約，仍然明目張膽地反抗國民黨由蔣介石一手包羅。也正是這種精神驅使下，陳獨秀和我反對繼續實行我黨同國民黨的有關合作政策。我黨並不是特意偏離民主運行，而是出於慣性使然。

在另一個層面，民主集中制的運行是真正被扼阻，而有利於絕對集中制，即是有關共產國際的訓令。這裏必須提醒的：當時中共黨人，差不多全部，連中央領袖在內，根本不知道在蘇聯黨內發生嚴酷的鬥爭，在共產國際的核心內發生嚴重的分歧。他們還相信共產國際依然是列寧創建的那樣。他們無力公開對抗莫斯科下來的命令。因此，即使是江浙皖區委，對於國民黨黨內合作有深刻歧見的多數同志，也不敢做公開的反對。也正因此，獨秀和我，除了接受 1926 年 7 月中共全會多數的決議外，也毫無選擇。在我們同瞿秋白的爭論，不為下層黨員知曉之際，上面的決議下來，一般黨員就無法進行討論；在沒有抗議和矛盾的情況下，我黨才達到跟隨共產國際機會主義政策的「一致性」。

這種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扼阻，越來越對我們思想的開展，對於我們的公開宣示以及我們的革命家的行為，產生惡劣影響。真實和虛論成為有意或無意的奇怪的混合體、雙重性的言語、再以長輩或軍人口氣寫成的中央二次全會的決議案，變成黨內佔上席的公式……。在以下論述中有太多機會回述這些事物；意識形態的扭曲，直接引到思想的墮落，同時變成了乾枯和貧血的表達。我沉痛地感到我黨精神上的蛻變，而我已

成了它的囚徒，使我在一個時期（兩到三個月），停止在黨報刊上寫出有意義的文章。

對共產國際唯唯是從的瞿秋白，心有所得，揚揚得意。而我們（獨秀和我）就不一樣；我們雖然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但很難認為它是正確的。在字裏行間，在我們寫的文章中，可以發現存在兩種話語：一種是遵從黨內與共產國際的政治決定，是克制的、嚴謹的；另一種，比較自在和自由，因為比較符合我們內心思索，尤其是當我們寫「理論性」的題目，至少表面上不直接觸及我們的公開選擇。一個顯明的例子就是在1926年9月10日《嚮導》上我的一篇文章：「我們的北伐觀」。

正在此刻，我掌握了北伐對民眾革命鬥爭的戰略重要性，也正在此刻，我發現只要湖南工農群眾真正動員，積極支持國民革命軍，便會使它前進無阻，而獲得全勝，直驅到武漢。在這篇文章裏，我承認的確是蔣介石首領的國民黨和將軍們率領軍事行動，可是我不能不對這些軍事領袖以及那些在第十二小時投向「國民革命」的小軍閥們，存有極大的戒心。我認為應該把北伐非神化，恢復它的真實範疇。在一般黨員和革命群眾，在國民革命軍的純軍事行動，與真正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人民革命戰鬥之間，意識上的混淆，加以澄清。為的是減除對於國民革命軍純軍事勝利的幻想。因這種幻想可能癱瘓工農為他們自身政治經濟權利鬥爭的獨立行動。

依照這種心態，我追溯從南向北的多次征戰，一直追溯到太平天國運動，到孫中山沒有成功的嘗試。我指出它們無可置疑的，在政治、社會、經濟上的革命意義，而同時指明它們失敗的主要原因：困於基本上軍事性的策動，而忽視了民眾為保衛自身利益的政治性動員。

我最後向同志們和革命群眾發出熱烈的呼聲，要求他們加以警惕，在給予國民黨的北伐以實際支持的同時，馬上組織和加強他們自己的力量，不但是為了保衛他們的權利和自由，而且是加強對軍事領袖的絕對

權力與名義上，代表國民政府的權威的關係上施加壓力。明顯地說，我要求群眾革命運動，在支持國民革命軍與國民黨繼續北伐同時，確定它自己的政治綱領，加強獨立自主的組織，最後能糾正軍事力量的強勢，為鞏固民主政權，保證民主自由和真實的國民革命的健康發展。

這裏便顯示出，我的戰略計劃的雙重性；我自己在字裏行間畫出的，而同黨的正式路線相矛盾。

這篇文章發表後，我收到不少同志們（和我意見類似的）的讚許和鼓勵。尤其是陳獨秀和上海地區活動負責的同志們。我相信有力地表明他們的內心思考；這種思考也是革命群眾裏激進分子所分擔的。可惜可嘆的是，我不能往前再走一步，走到我批評的邏輯終點，就是對黨的正式路線置疑，建議另一條解決方案，這當然是黨的政策所絕對禁止的方案。

1926年7月北伐發動起，到同年12月在武漢召開中共特別會議期間，有大批同志到上海來見我們，一般是工作分配問題，但也有是商議他們個人的路向。在黨「中央」的辦事處，主要是獨秀和我經常在那裏，而瞿秋白則很少涉足，除非出席「中央委員會常務會議」；張國燾多數時間在外地旅行，偶而也參加「中央」會議，蔡和森仍留在莫斯科。因此中央常務委員會有陳獨秀，瞿秋白和我三人。有時有一、二位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我們的會議，但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從來不來我們黨的機關，而是我們去他們住處，或是在崑山路魏廷斯基的住所，或在卡德路另一個地方。

黨中央委員會的辦事處，是為了「中央」和各地來的同志的聯繫而設。獨秀差不多每日都在那裏。聯繫人是石瓊，先同某一同志在名叫交通處的地點聯繫，然後再通知獨秀與這位同志（已經預先帶有介紹信或文件）晤面。獨秀很少拒絕。在特殊情況下，獨秀也叫我參與。獨秀不參加江浙皖區委的會議與活動，而我則經常出席這些會議，再加上「中

央」的活動，同時我也參加中共青年團及上海黨活動分子的會議。瞿秋白從來不出席黨自身的會議，全副精力集中在與共產國際代表們的連絡。因此，雖然非形式化，實際上「中央」三人之間存在着分工合作。但是，每逢有重要人物來訪或有要事要解決，獨秀會通過石瓊來找我出席。我們之間因此而保持密切的合作。

在同我們晤面的人物中間，值得特別提起的有朱德和邵力子。

1926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朱德來秘密辦事處看我們。他給我的即時印象是他的直率和真誠。他講起他個人的演變，比較後來他講給史沫特萊女士要簡略得多（《康莊的大道》）。在川軍裏作士官之時，他已加入蔡松坡發起的革命同盟組織。然後，在1919年「五四」運動，尤其是陳獨秀的影響下，在中國在歐工讀團的驅使之下，他到德國學習。也是在德國他接受共產主義……。他極為坦白地向我們提出問題，除了工作安排外，他有一件私事要同我們商量，是件給他困擾的事。就是關於他已經離婚了的妻子——賀子華，由他帶到德國而在莫斯科離開他，和一位比較年輕的同志同居。可是她仍然向他要錢。

「我的小小積蓄已經在德國居留期間用完。而現在，她提出要我給她離婚賠償。我怎麼辦呢？」他是那樣地激動和困惱，令我們不知所從。獨秀說：「假如你還有一點錢，就給她一點，不然的話，就算了。」我問：「你離異的妻子是黨員嗎？」他點頭稱是，並說：「在我們經過莫斯科時，她跟上了一個四川人。」「既然是同志，你完全不必照顧她。」我對這位還不認識的女人的苛求很抱不平。朱德好像對我們很信任，所以才這樣率直地說話……

說到工作分配的問題時，我問他是否保持與蔡松坡（我對他一直是敬重的）舊時同伴們的關係。他答道：蔡松坡在四川去世後，他曾回到昆明，而同蔡松坡的舊時同伴朱培德結成密切友誼。我知道朱培德已是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的統率，而此軍已駐在江西，所以我問他，既然

同朱培德有友誼關係，是否可以參與他的司令部？朱德說，他早已寫信給朱培德，說他要回國，而且收到回信，建議立即去他的總部協助軍務。獨秀和我毫無保留地同意這個安排，覺得很滿意。他也感到寬解，很高興得到我們的同意。不久，他去江西，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教官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北伐已經發動，而朱培德的軍隊的確已駐紮在江西。朱德留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完全剛正不阿，而甚至過度慷慨的人物。

至於賀子華，約在 1927 年尾或 1928 年初，我從北京—天津回上海時，在羅亦農住所（他約碧蘭和我用晚餐）第一次見到。當時，羅亦農是黨江浙皖地方委員會書記；他住在公共租界戈登路一間兩層樓的房子。賀子華和她的四川丈夫住在一樓一間廂房，看來她是一個漂亮女人。她請我去她的寓所談話。我剛坐下，她就以抱怨的聲調，說起在這屋子裏所過的不幸的生活。她說是她丈夫名義租這間屋子，但他做的事是純技術性（毫無意義）的工作，由羅亦農監督；雖然她不直說，她事實上是指責羅亦農過着奢侈放蕩的生活。的確，這間屋子裏到處都掛着湖南著名的湘綉，目的全是為了裝飾辦事處，以便做地下工作的掩護。我也正是這樣向賀子華解釋，認為是自然可了解的事，是做地下工作同志們普遍有的現象，而我證明羅亦農絕對不會過一種墮落的生活。她並未被我說服。一年之後，她背叛了黨。她將羅亦農的頭顱賣給敵人。

1926 年秋季，我們（獨秀和我）見到的第二位人物是邵力子。記得 1920 年共產主義小組剛成立時他就加入了。做為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主筆，他為當時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動做了巨大的貢獻。而「覺悟」在「五四」時期以及往後的文化復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整個來說，他給我黨做了不少事，而且是忠實的。1925 年「五卅」運動發生不久之後，他要求「中央」讓他去廣州工作，當時上海同志間有一種普遍傾向，就是離開一切去廣州。他不是單獨例子。比如沈雁冰（後來的茅盾），也

曾要求「中央」准許他離開商務印書館編輯職務，而去廣州定居。還有郭沫若，還不是共產黨員，還有其他黨員……，多是因機而行。但是他們不會久居廣州。

邵力子的情形大不同。他原來是士大夫出身，從前是「舉人」，又是國民黨最早黨員，是汪精衛的老友。在他到廣州不久，蔣介石對他表示支持，特請他以蔣介石「個人」代表名義，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委會第四次全會（1926年11月召開）；這次國民黨是由斯大林以「同情黨」的資格邀請的。邵力子特來上海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他是10月底到的，在與獨秀和我見面時，他表現有點局促。然而，他同獨秀相識已久，是老友了。而同我來說，我們在廣州時常見面，特別在鮑羅廷公館、張太雷寓所——他那時很直爽，很幽默，常同碧蘭開玩笑。現在他表現猶疑，保持距離，說話吞吞吐吐。獨秀對他說：「既然你是以國民黨名義，是以老蔣個人名義；而且是共產國際邀請去赴此會的，我們沒有可說的。」這也是我的意見。於是他告訴我們：「這裏有一個難題，蔣介石的意思是我脫離中共，僅是在莫斯科代表國民黨。他認為這樣比較更合適。」我堅定地說：「這件事是你個人的事，由你自己決定。如果你有意脫離我黨成為國民黨完整黨員，我們當然不能阻礙你。這是我們定下的原則。」獨秀對他說：「述之的意見，是對的。這由你來決定。」然而，由於他們之間長期友情關係，獨秀內心覺得很委曲，但他不能也不願留住他。邵力子答說：「這不是我自願放棄共產主義，而是時勢之需。」這正是蔣介石提出他去莫斯科代表自己的條件。可見蔣氏正在隱隱地對付我們。因此，邵力子以蔣介石個人代表名義，參加共產國際第七屆執委會四中全會；我黨則派譚平山為代表。我們記得，邵力子之前，國民黨在莫斯科的代表是胡漢民，因為參與廖仲愷謀殺案，被排除在國民黨外，現在已在鮑羅廷的掩護下回到廣州。當時，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是蔡和森。

中共武漢特別會議（1926年12月10至12日）

1926年10月間，國民革命軍佔領湖北省和首府武漢，使政局全面改觀。湖北中共省委依然是陳潭秋作書記。上海中共「中央」感到這個省委受到事變的衝擊而不能應對；我們決定在武漢召集兩湖（湖北，湖南）黨委負責人，以及國民革命軍唐生智率領下的第八軍內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一起會議。再者，國民黨中央政治部，由國民黨左派的鄧演達主持，現已遷移到武漢，急待我們之間調協。我們是以中共中央委員會名義召開這個特別會議。獨秀和我是代表中央常委去武漢；瞿秋白留在上海，繼續與共產國際的代表們保持聯繫。會前我們已經通知在這兩省工農運動中黨的負責幹部來參加。

會議在1926年12月10日開始。獨秀同我坐船來到武漢。我們見到李維漢、湖南中共省委書記彭平之，代表湖南農民運動（大家以為他是我的弟弟，而他也一笑置之）。湖北方面有陳潭秋、許白昊，是工人運動的領袖，還有董必武，負責國民黨內的工作。這個會議主要集中在同志們對湖北和湖南局勢的報告。

自從兩三月來，北伐軍隊開入長沙和武漢，我們已經知曉在兩湖工農運動的迅速和有力的發展。但是彭平之關於湖南農民運動的報告使我深為感動。這是一位湖南共黨內最有魄力的年輕活動分子；他詳盡的報告裏，呈現出湖南的農民運動，一團火似地燃燒在平原大地。在極多數農村，是農民自發的行動，而並不是經過我們同志的干預。事實上，我們人數不多，而且組織在比較重要的縣份，由其他地方跟着上去的。在沒有我黨組織的縣城農民協會，只有靠近縣城裏，我黨組織的協助和領導。整體來說，湖南黨省委領導全省的農民運動。

彭平之告訴我們：農民怎樣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集合起來後便追捕「土豪劣紳」，給他們戴高帽子遊行……，但對他們的生命毫不威

脅。證明農民的態度是文明的。可是，地主們一聽說農民在本鄉建立農民協會時，就逃走到縣城，到長沙。這個農民運動沿着穿過湖南的漢粵鐵路進展，緊跟着國民革命軍的前進，而火車已經停止了。這個運動重擊衡州、湘鄉、湘潭，尤其是醴陵、萍鄉、湘陰，不一些時就達到寶慶；7月開始，8月已進入長沙。起初，我黨和共青團已經動員盡可能動員的分子，連同情者在內，令他們積極支持北伐（包括宣傳、偵探、破壞……）；正因為工農群眾這樣動員起來，國民革命軍軍隊才有可能迅速地佔領湖南省及其首府長沙，而不費一戰，或軍事集結之力。這就是我黨在湖南動員和指導群眾努力最明顯的結果。

至於其中在城市裏的工人，他們的組織更加快速。即使手工業者也組織了工會，在長沙的大部份工人及湖南的礦工也組織起來。在城市裏這一工作相當容易，而在鄉村的組織形式有點不同。因農民是比較分散的；我黨竟能把他們集合，通過農民協會分配各種任務。當北方軍隊逃離湖南時，他們遺留下大量武器軍備，立即由工人和農民組織收留。

在這幾個月裏，湖南農民協會曾下指令封存土豪劣紳的財產。但這種「充公」並不是公開的，也沒有實行。湖南的農民非常守紀律，而從來不犯搶劫案件。當時，湖南共黨有近一千黨員（在湖南同志報告裏沒有確切的數字）。

農民協會經常收到在各個村落裏的民團組織的「團訪局」繳來的武器。然而，這些「團訪局」名義上原來是為了防守偷竊，而實際上是地主的代理人；如果一個「不馴服」的農民，不及時給地主付地租錢（利息在內），地主就可以向「團訪局」申訴來追捕農民。可是「團訪局」裏面雖然有少數地痞，大多兵士是農民組成，受到農民組織力量的威懾而投降。地主們原來想利用「團訪局」來鎮壓農民，而當一個地區幾十個農民協會，團結成千上萬的農民時，那些地主便害怕而逃走了；「團訪局」也自然解散了，或落在農民協會掌握中。那時在逃離的地主的田

地周圍，插起竹桿圍起來。在運動後期，農婦們也組織了在農民協會屬下的「婦女會」。許多農婦們，曾經受到丈夫的虐待，來到當地農民協會申訴，那些受到婆婆折磨的媳婦們也同樣來伸冤，由農民協會舉行審判。農村裏經常看到農婦拉着丈夫或婆婆到農民協會告狀，在路上喊叫粗話……；實在是婦女對男性統治的社會的反抗，也正反映農村習俗在深刻變化。各種傳說是無盡無止的。當時湖南農民在省內大部份地區已組成農民協會，團結了三到四百萬人，而且在數月後繼續有更大的擴展。

湖南中共省委領導的組成：李維漢，中共省委書記；易禮容，全省農民協會的主席；郭亮，工人運動的負責人；夏曦，負責國民黨內的工作。夏曦是湖南最早期的同志之一。在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不久，毛澤東負責黨務那個時期，彭平之是省農民協會領導人之一，負責農民幹部訓練的職務，他時常來往於湖南各縣城，對農民運動在各地具體情況比任何人更清楚；正因如此，他才被提出到武漢中央特別會議做報告。

彭平之的「上司」易禮容，是1920年秋我正在長沙見到賀民範，參加毛澤東在內的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時認識的。他在省城開了一個書局，名叫「文化書店」。在湖南農民運動最高潮時，易禮容控制上千萬有組織的農民。革命失敗後，約在1931-1932年，他開始還在地下工人運動中活動，但他找到一條黃色工会的線索，投向國民黨，為了逃命，於是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就在中國第二次大革命的失敗中，消失於歷史舞台。

在湖北，農民運動剛起步，而工人運動卻已大步向前進。中共也剛從地下黨變成合法的政黨，可以動員左派分子、工人農民群眾。在武漢黨特別會議召開之後一兩個月間，已發生一個全新局勢。

在此特別會議（為時兩日），目的是收集湖南與湖北群眾運動的實情消息，會議的差不多全部時間是聽取時局的詳細報告，特別是在湖南，被革命風暴席卷，正如彭平之所敘述的那樣。

不久以前，中國農民運動還只限於海豐和陸豐，是廣東的兩個縣，

而現在它的翻滾浪潮已掩蓋了大半個湖南省。湖南的農民正把竹竿插在大地主田地的周圍。這些農民已經起來，準備用他們自己的手，爭取已逃離的地主們的土地……。

出席這次會議的黨的負責人面臨一件傷腦筋模稜兩可的境地，作為共產黨人，依照俄國經驗，解決方案相當簡單，根據土地革命的綱領，農民協會應該將土地分配給小農和無地農民……，但這個綱領並沒有寫在中共議事目標上面，一旦實行的話，就是同國民黨協議完全矛盾。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只限於二五減租，明白表示承認地主財產權的合法性。但是中共如果不向農民要求讓步，必然同他們衝突。而農民協會實際上已成為「蘇維埃」（各地政權所在）。因為本來是地主安全機關的「團訪局」已解散，他們的「打手」逃走了，鄉村的政權自然地落在農民協會手中。而農協不得不執行以前「團訪局」的行政職務：比如保護村民不被偷竊和搶劫、審判犯案者、在有爭執的農民間仲裁、審問丈夫與婆婆的虐待等等……。還有權禁止維持農民生活食糧的外運出口……。

如果把運動推得更遠些，就有必要將「蘇維埃」的行動範圍推廣到其他社會階層。像小商人、手工業者、兵士們……。他們不能併合在農民協會裏，而要有他們自己的組織。

這些問題，遠不是抽象地向我們共產黨人提出來。而我們卻被禁止提出來解決；我們竟達到一個荒唐的地步，把城市運動和農村運動人為地分隔開。在許多地區，形式上是國民黨黨員，而實質上是多數共產黨員在領導事物。替代北洋軍隊的唐生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部隊；他們對農民時常表示同情，但是我們不能把他們集合在兵士委員會，以便與農民協會或城市工人運動聯繫。他們是孤立的，正像農民同城市工人分離一樣。他們之間唯一鬆散的聯繫，是靠中共活動的影響。

中共的確有時派城市工人到鄉村組織農民。一位出身農村的工人，對鄉下情況當然很熟悉，而且又在城市裏住過一個時期，獲得比農民較

高的文化水平，如果他又是一個共產黨員，便很快成為當地農民協會的領袖。最多最普遍的例子，是由黨派出一位知識分子，一位小學教員，或回鄉的中學生。他自然而然地成為當地農民運動的領導幹部。一般農民多是文盲，他們依靠這些幹部，幫助他們解決日常鬥爭中的任務……。湖南這些情況，在彭平之的報告中都有詳盡描述。

我深感問題嚴重，但同時完全無法做出合理和確切的解決方案。湖南負責同志們固然有同感，但也只是做報告，提問題而不觸及要點。他們因為多是國民黨人，特別了解真實情況而有所感悟。湖南國民黨基本上是左傾的，組成分子大多是開明鄉紳和知識分子，多少受到共黨的影響。而在中共上層只有極少數同志不同時是國民黨員，只有獨秀、和森與我從未加入國民黨。但李守常（李大釗）倒是北方國民黨的重要領袖。雖然我不太知道各省的狀況，但有一點是確實的：在各省多數共產黨人的活動，基本上在國民黨旗幟下進行的。

這次中共特別會議，除了由國民黨指定的綱領外，沒有做出另外的對策，對湖南和湖北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都沒有提出政策上的具體方案；只是定下一些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提議。比如，農民在離開土地的地主的田地裏，插上竹竿（宣稱沒收字樣）時，我們建議保持竹竿以示抗爭，但也就此作罷，而絕對沒有實行土地分配。另一例子，在與土豪劣紳的鬥爭，當農民同地主糾紛激烈時，我們提出由農民組織自衛隊做抵抗，而事實上這種自衛隊已經存在，而我們只是事後稱許而已，也就成了不解決問題的解決方式吧。

武漢的晤會（1926年12月）

湖南與湖北負責人的特別會議開完不久，毛澤東邀我到他的農民運動所（由廣州遷到武昌，現名農民講習所）。當時在政治上，毛澤東似乎同我比較接近。他已知道我同鮑羅廷的糾葛，仍然表示友好。在廣州

時，他曾經來看我兩三次，表示他同意我寫的文章〈誰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裏面的思想。這次，他建議我不是去講土地問題，而是對於自北伐發動以來，整個局勢做出一個政治分析。雖然我着重提到農民運動的發展，但特別講到上海工人運動的演變，是令人樂觀的因素。這次講話本身並沒有特別意義，但是聽眾是數十位農民運動的活動分子。在這裏我有機會見到一位「小同鄉」，姓蕭（出生在我的小村子）。他提醒我他曾寫信到莫斯科（我還在時），表示友誼和敬重。從他那裏我得悉我的老友，歐陽秋璞已經是寶慶縣農民協會的主席，而蕭是裏面的幹部之一。正因此，他被派到武昌接受農民運動幹部的訓練，我也由此知道農民協會的運動，已經擴展到寶慶縣地區，一直到偏遠的我的小村子。

在武漢我被邀請第二次講話的是在兩湖（湖南、湖北）幹部學校，是由剛從莫斯科回來不久的王一飛主持。當羅亦農 1925 年回國時，王一飛曾繼任為旅莫斯科中國共產黨團書記，正像羅亦農在 1924 年繼任我的同一職務一樣。但是，王一飛 1926 年就被召回國，因中共急迫需要人才。起初，我想把他留在宣傳部，來協助俄文翻譯部的工作（他在俄國居留比較長久，俄文很好）。他開始翻譯季諾維也夫的《布爾什維克黨史》……，但運動的發展如此迅速，我們沒法留他下來。他便被派到武漢主持一個時期中共幹部學校，我們（獨秀和我）來到武漢時，這幹部學校已經存在。

由於王一飛的堅持，我應該對時局做一次政治性的講話。換句話說，是對於北伐以來情勢演變的分析。這也是我在農民講習所同樣的題目，而我這次講的內容有些不同；我特別說到中國革命可能繼續俄國革命的途徑……。

最有意義的是我講話之後的討論，這次出席會議的有三、四十人，來自兩湖縣份，多數來自湖北，是些中小幹部。我當時後悔在農民講習所沒有向農民活動分子提出問題（時間不夠），而今天有這一機遇，有

整整一個下午，關於兩湖各地的變化，我提了許多問題，而回答也非常參差不齊。印象最深而記憶猶新的是，全湖北省為加入共黨浪潮席捲，回答問題的多是新加入黨員，差不多都是「左傾分子」，大半是學生或教員，還沒有機會真正加入工人運動或農民協會。他們都說遇見大批「左傾分子」，問同樣的問題：「你有沒有共產黨的聯繫？」、「為甚麼？」、「我想加入共產黨」。這個回答，同一方式，重複十遍、百遍……。

「五卅」後，國民革命軍進駐湖北地區時，湖北中央僅有二百到三百黨員。現在，突然像個氣球似地膨脹，短短幾個月內，在武漢市區內，1927年初，黨員人數達到一萬以上。好像他們把北伐的勝利當做革命的勝利，也就是中共的勝利。然而，當時武漢政府還未成立……；在革命浪潮高漲時，絕大多數的左傾分子，並不看重國民黨，而祈求加入一個新的革命政黨，一個真正代表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政黨；中共便是他們認為的新革命黨。在這成千上萬的新的中共黨員內，的確有真正自願獻身的革命家，但也有完全機會主義分子，正在隨風使舵……。不久，自然有同樣大批的「左傾分子」，在大革命失敗時，匆匆脫離共產黨。

在武昌兩湖幹部學校裏，我另外見到一位小同鄉彭充澤，湖南第一中學的學生。畢業後，他任寶慶著名的愛建學校校長。但我不知道他已加入共黨，為了革命放棄這個可貴的職務。他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同時是一位絕對忠誠的人士。他告訴我賀民範在寶慶開了一家左傾書店，有一個時期曾任寶慶教育局主任。他並證實中共黨和青年團，同農民運動一樣，在湖南有很大進展……。他帶來我年輕的弟弟，道之；因寶慶方面決定送他去莫斯科學習。他那時只有十六、七歲，我帶他回上海，準備他去莫斯科。

在武昌與鄧演達的一席話（1926年12月）

在兩湖幹部學校，我正在向新加入黨員做演講期間，突然接到章伯

鈞來訪。他是鄧演達的親密合作者，而鄧演達是駐在武昌的國民革命軍總部參謀部的政治工作負責人。章伯鈞是來邀請我同鄧演達談話。我問獨秀意見，他說沒有不合適的問題。

由章伯鈞伴同，我被車送到設在原來湖北省督軍府內國民黨中央政治部辦事處。鄧演達是在一個裝飾華麗的大廳裏接見我。在我面前出現的是一位不到四十歲的壯健的，軍人氣息，精力充足的男子。他原是一個屬於比較老一代的軍人，是有名的保定軍校畢業生。孫中山生前，他曾當過他的守衛。然後他去了德國數年，遵循保定軍校對德國軍事技術傳統的尊重（即使在 1918 年德國失敗之後）。在德國他常見到朱德、周恩來及其他共產黨黨員。他也許比周恩來（1924 年）早一點回國，立刻就擔任黃埔軍校的總監。由於他對軍方業務的才能，他的嚴謹和思考精神從而樹立了權威。但他對蔣介石卻不很器重，認為蔣沒有甚麼文化。當北伐在廣州發動時，老蔣走的是中間路線，到南昌建立他的參謀部。鄧演達沒有跟隨他。他經長沙穿過湖南到武漢，在武昌陸軍部裏駐下政治部。因此他是在武漢日常政治軍事任務的領導。

章伯鈞，是在德國和鄧演達相識的，同時也和周恩來等來往。在車裏，他告訴我他是共產黨員（而我全不知道）。他有點書生氣，是一位知識分子，他回國後，鄧演達就請他擔任武漢北伐軍參謀部的政治部高級職務。幾年後，他在上海跟隨鄧演達成為農工黨的領袖之一。1949 年，章伯鈞以民主同盟人士任部長職，但在 1957-1958 年以「右派分子」罪被清除。

我開門見山問鄧演達對時局看法如何？雖然國民黨軍隊得到勝利，他並不特別表示樂觀，他聲言很多問題必須慎重考慮。他反問我怎樣看法。我自然不能把我的看法直言不諱地說出。從一般性的觀察出發，我着重提出一個實質性的問題。我認為是中心問題，即農民問題；這也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正在緊密注視農民運動的伸展，尤其在湖南。但他

沒有指出一條土地政策。他問：「怎麼辦？」同時他着重地說：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如果他們最簡單的要求不能滿足，基本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革命是沒有前途的。他講的時間很長，我也讓他說下去……，但他說得比較抽象，而不指出一個具體的解決辦法。當然他也講到減地租、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城市與鄉村物資交流，以及貧農與失地農民的問題，但他從未提及土地革命的政綱，只是宣稱所有問題必須極嚴肅慎重考慮。我說：最後看來，農民問題可以歸結到土地問題；然而，現在存在的矛盾很多……，國民黨只限於減地租這一項，我認為必須在兩黨之間展開一個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做出一個新的方針。

他用保密的口氣讓我了解在國民黨內有問題（即有分歧）……，而不明確地說出他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地位可說：「我們準備怎麼辦？」然後他直言不諱地宣稱他在德國時曾研究馬克思主義。我問他看哪些書，他說：「我最愛唸的書，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觀論》。它對我有很大用處，它讓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我由此得知他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這樣回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和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是絕對必要的。」他說他完全同意，但他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他有農民主義的偏向。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數目極小；他看不出這樣弱小的工人階級能夠在工業生產方面，以致國民經濟上起決定性的作用。可惜我沒有時間在這個問題上同他徹底地談，他把農民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中心，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沒有提出「誰來領導這個農民革命」這個問題。這就是他創立農民黨的意識形態的來源。毋庸置疑，鄧演達是一位國民黨左派的真正革命家，而且他是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整個夜晚，我們繼續討論。每次我起身告別時，他要我坐下來，表現真正的誠懇和友情。在分手時，他說願意下次能有更長的時間和我談話，他問我是否在武漢還多待些時日？他好像知道我的為人和我的思想，由於閱讀我在《嚮導》發表的文章……。我說：「可惜，我一兩天內要

回上海。」

當我在 1927 年春再來武漢時，鄧演達生重病住院，我到醫院裏去見他。在病床邊自然不能繼續那次中斷的談話，也是在這醫院裏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不久之後，我知道鄧演達嚴斥蔣介石新的反共政變（1927 年 4 月 12 日）。在汪精衛尚未到武漢之前，鄧演達繼續政治上主要作用，但當汪精衛取得武漢政權時，他對汪很失望，脫離汪政府圈子，在汪精衛 1927 年 7 月聯絡蔣介石之前離開武漢，自此以後，他全力以赴地集中創建第三黨，也即農工黨。章伯鈞和其他同伴們繼續予以協助，開辦一份報紙《革命行動》。

由於鄧演達是國民黨左派的顯要人物，他的名字便成為南昌暴動的旗幟，但他並沒有參加這一暴動。1931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引渡到蔣介石的監獄，江陰（南京附近），宋慶齡以做擔保人想營救他，而為蔣介石拒絕。理由很簡單，蔣介石絕對不能容忍像鄧演達那樣有氣魄的人士，而他仍然是在黃埔軍校士官裏最有名望的總監。他是在 1931 年 11 月 29 日在南京附近被槍決的。

在離開武漢前，我將與鄧演達的談話詳細講給獨秀。他同我一樣地受到感動，並告訴我他對這位人物有很高的評價。但是，過了兩天，在 12 月底，我們不得已回上海。

很遺憾的是，在獨秀和我離開武漢後，再沒有同志和鄧演達保持聯繫，建立經常關係，創造一個團結陣線，使他能夠同我們一起，負起中國國民革命前線作戰的使命。

1926 年 12 月底回上海後，獨秀、秋白和我，以中共中央常駐上海的常務委員名義，開了一次會議。獨秀對湖南與湖北的局勢做了報告，我另有補充的報告。對於這個地區工農運動的發展，會議沒有達到一個確切的立場。我們處於困窘的境地，如果我們宣言徹底支持這些運動，

就必然與國民黨合作契約相矛盾。然而，組織起來的工人農民的鬥爭已經擴大到罷工浪潮，觸及到店舖人員，而且農民已在準備沒收土地……，雖然我們就近觀察局勢，獨秀和我還在猶豫，不敢採取激進的結論，還在繼續討論。至於瞿秋白，比我們有更少思考的資源，唯一的資源是去同共產國際的代表商議。

可是大部份的蘇聯代表們，在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屆常務委員會第七次全會擴大會議後，還留在莫斯科，而當時全會的決議案沒有到達上海。只有魏金斯基沒有去莫斯科，而他也沒有具體的辦法向我們建議。正在這焦急等待的時刻，1927年1月3日，爆發了漢口英國海軍槍殺事件，這個事件震動了時間的轉移，大大改變了這個中心地區的局勢，其巨大影響波及全國。

1927年1月3日漢口事件及後果

1927年1月3日，為了慶祝北伐在湖北的勝利，在國民黨旗幟下聚集的活動分子，在漢口公共租界邊沿的一塊空地上召開大會，突然出現一批英國艦隊海員大兵，用長槍無理地攻擊在空地上集合的市民，擊傷一些人士，擊斃一個海員，還追逐示威者和演講員直到中國地區之內。這一挑釁正發生在這個中心地區革命暴風雨的最高潮。三天之後，在另一個城市，九江（江西省），又發生同樣的挑釁事件。巨大的民眾抗議，迫得英國不得不撤退海軍砲兵，並與武漢新政權協議讓它維持公共租界的秩序，就等於轉讓統治權。在九江也有同樣處理。

從歷史的回顧來看，在漢口和九江，1927年1月3日與6日發生的兩個事件的意義在於：中國國民革命已達到頂峰，工人階級自動發起對英帝國主義的反擊，超越共產黨，且不說國民黨的底線。

為了更清楚了解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必須指出在中國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的位置、它們之間的關係、在國民黨以及在中共黨內的情形。

1926年12月間，長駐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帝國主義者，對北伐行進期間，中國共產黨人影響的膨脹，使它變成一場真正的革命，深感震動。在中國內外的西方報紙，充滿了驚恐「赤化」的長篇大論。

起初，英帝國主義試着集合其他有關列強（日本、法國、美國）締結同盟，來對抗這一新革命浪潮，用暴力截斷它激昂的高漲。但是在列強之間，不存在戰略性的同步齊驅。

英帝國主義的利益，集中在中國的中心地帶和南部，本來是想用武力解決。日本帝國主義觀察到的是，革命運動主要對準英國，而日本的利益並不直接受威脅，極不願以全力幫助英國恢復它的勢力範圍。日本的語調可能如下：我們應該重新考慮中國局勢，在某種態度上修改我們的政策：它暗示絕對不必用武力，而且很難直接同革命力量交鋒。

美國的立場又不同。它不願意佔領一個勢力範圍，而且過去也從來沒有過。而正是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被動搖了。美國人認為國民黨北伐的最後勝利，及它在中國的統治不一定是件壞事；他們不以為這是災難性的，反而可以投資而獲得利益。（我在《嚮導》文章中提到）

法國帝國主義者採取更加不同的立場。他們對英帝國主義者沒有特別好感，因此他們採取比較溫和的立場。換句話說，是「等着瞧吧！」

總之，英帝國主義者，在1926年11月到12月間，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組成「聯合陣線」的攻勢沒有結果，12月間，他們宣稱有意採取一條溫和的政策。事實上，在英國政府內存在矛盾。除了執政的保守黨以外，反對派政黨工黨和自由黨，並不表示要用武力鎮壓中國的革命運動，忠實於他們改良主義的傳統；他們只想不讓運動走得太遠，而且知道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存有矛盾。他們想方法企圖分裂這個革命運動。

1927年1月3日漢口事件首先給英帝國主義沉重打擊，但也極大地刺激進駐中國的其他帝國主義者。因為是中國勞苦群眾直接衝入英租界並且接收它：這個事實震動所有帝國主義列強，引起它們對自身在中國

存在的疑問。在中國出版的外國報紙上，傳播了對共產黨人無法證實的流言和毀謗。比如在武漢，西方記者放肆誣衊「共黨把財產和女人集體化」。最惡毒的自然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報紙；目的是恐嚇「同盟者」，逼得他們接受「聯合陣線」來對付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中國人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對英國帝國主義者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後者並不認輸，還準備共同軍事干預。這是體現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者高度的「階級覺悟」和極度的警惕。

在國民黨內，分裂已是既成事實，1926年3月20日政變的餘波尚未澄清，自汪精衛離開廣州去歐洲，國民黨左派還沒找到一個重新集合的新的軸心，國民黨左派分子，尤其是汪精衛周圍分子的主要目標，是恢復3月20日政變前汪精衛所持的權力，尤其是軍事權力。他們之間秘密連絡，比如國民革命軍第二、四、六軍首領都是汪派，其中只有第四軍到達武漢，由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由國民黨左派的鄧演達主持，武漢的國民黨一般對蔣介石表示仇視的立場，要求恢復汪精衛的所有職務。駐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主要是第四軍，而駐在湖南的第八軍，由唐生智率領，是最強的部隊；唐生智結果與第四軍首領聯合反對蔣介石。

蔣介石率領軍隊直驅南昌。起初他直接統率的軍隊極少，但沿途，北軍大批部隊投降，主要是來自江西、安徽、河南的吳佩孚軍，於是蔣軍突然膨脹，直屬蔣介石的部隊向東進，經過福建，還未達浙江，但已看出國民黨兩派，即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鬥爭的輪廓。

在武漢，汪派對工農群眾的高漲情緒多少有妥協，避免用高壓手段，但實際上並不對他們的要求讓步。這是一種相當「自由化」的政策。因此，在兩湖已經發動的群眾，既然沒有受到國民黨明顯的壓制，已經開始了反抗「土豪劣紳」的直接鬥爭。

在蔣介石方面，情形完全不同。的確，從廣州到南昌，每逢他的軍隊進入一個地區，總是得到群眾熱情和有利的支持，同其他國民革命軍

部隊所受到的待遇一樣，但一旦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時，他立刻堅決禁止，而後加以鎮壓。

在同一時期，蔣介石用盡各種手段與北方軍閥秘密會商：當時吳佩孚的軍隊差不多消失殆盡，他的目標主要是馮玉祥系。他通過上海的鈕永建和北方的李石曾等政客為中間人，以致達到一個敵對共產黨的協定。1927年1至2月間，進駐南昌後，蔣介石立即向各方進行談判，據說日本還有秘密使節來到南昌，試探蔣介石和張作霖妥協的可能性（這一消息後來證明是確實的）。

從以上所述的情景下，中共採取甚麼立場呢？在上海中共中央深悟到這一緊張局勢所包含的危險。《嚮導》不會刊出表示我們疑慮的文章。但是這些文章並不確切反映我們的分析和觀點。我常說寫文章時一隻手被綁住了似的。要不然如果我坦率地寫下我的主張，必然和國民黨發生直接衝突。我的文章中只有一小部份寫出我真正的想法，然而存在矛盾：我全力支持由國民黨率領對抗北洋軍閥的「北伐」；另一方面，我又支持工農群眾為保衛他們自身利益而鬥爭的力量。但怎樣和用甚麼方式來保衛呢？我沒有公開說出來，以避免引起同國民黨的紛爭。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局勢。

1927年1月間，國民黨、唐生智、馮玉祥，甚至有些北方軍閥從各方面到上海的特派員，找中共領導的聯繫。其中第一個倡舉的是蔣介石。他到達南昌後發現武漢沒有隨從他的統領；在他周圍聚集的，只是一些投降的軍閥和北方的政客，在上海還沒有動靜。

他的特派員是蔣先雲，是他政府的秘書長；帶了一封蔣介石給陳獨秀的信。我不記得很清楚它的內容，但信的基調是和善的：他請求中共中央同他緊密合作，特別是善意地解決「可避免的」的紛爭和矛盾（含蓄地指出他與武漢方面關係的問題）。信中充滿雙重語言。總之，他好像希望借用中共領導幫他解決，或至少減少面對武漢的困境，因此他不

猶豫地正式表達，他與中共繼續良好關係的意向。這是我的能記憶的信的內容。

蔣先雲每天見到蔣介石；據他說，老蔣好像有煩惱和心事，行為開始在變化，不像以前那樣，對蔣先雲自動地說許多事。身為軍總部秘書長，所有的通告和其他文件的發出，都要由蔣先雲經手，而老蔣對他始終表示友情，而且常說他願意繼續同中共合作。而蔣先雲卻對老蔣在準備的陰謀茫然無知。老蔣變得隱蔽，他集合大批國民黨右派分子，正組成一個戰略上的「智謀團」；而蔣先雲則被排除於他們的絕密會議之外。同時老蔣派蔣先雲，到上海向我們保證他的「真誠」意向，消除我們同他之間的「誤會」……。

蔣先雲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又是富有智慧的人，最後說來，他不太相信老蔣的誠意，對他沒有信心……，但他沒有選擇，是他的特派員，把信帶給我們。他很覺為難，我黨照理應該給他一個答覆，使蔣先雲不是空手回南昌。因此獨秀寫了一封措辭比較外交式空泛的信，願望更好的兩黨合作，使北伐能進行到底，直達北方，最終掃除所有軍閥……；在這一前景下，我們必須盡力解決在國民革命運動內部的矛盾……。這封信也並不說實話，但這是我們所能做到的。

蔣先雲在上海住了兩三天，他對陳獨秀是特別崇敬的，至於同我和碧蘭，他是一位親密的私人朋友，我們從來不懷疑他對我們運動的體會和忠誠，但有個問題是，他怎樣能夠完成他做為老蔣「特派員」的使命……？回到南昌不久，他辭去在蔣介石總軍部秘書長的職務。他當時已窺察到蔣介石的陰謀，而他絕不願意繼續做蔣介石的工具。

從這件事來看，可見蔣介石仍然試着利用中共為工具，以便排除國民黨內部的困難，他在同時積極試着與北方軍閥牽線。實際上，所有國民黨極右派分子，所有敵視國民革命的分子都集合於南昌，當時鮑羅廷預計經陸路從廣州到武漢，他與蔣介石的決裂已成事實，蔣首先撤下鮑

羅廷的所有職務，但是蔣介石給中共的信很久沒有暴露。

蔣先雲剛走了兩天之後，我們接到唐生智的特派員來與中共聯絡，這位特派員就是彭澤湘同志，現正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總參部政治部主任。我們記得 1921 年蘇聯受旱災之害，中國派去的救災代表團之一員是彭澤湘。他當時留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大概是 1924 年回中國，黨派他去河南工作，他曾經是國民軍一個師的政治部主任；碧蘭從莫斯科回國到河南工作時，彭澤湘也在那裏。我跟他在莫斯科很熟識，這是一位聰明文雅，有點政客氣的人物。

1926 年，彭澤湘在楊森軍隊裏工作，他覺察到革命不斷上升，想把全副精力放在黨的工作上。他到上海見我，告訴我他對國民軍中政治顧問的工作厭倦，而願全力為黨工作；他要我轉告中央，以便隨時通知他會談。我即告獨秀，說實在，我們到處都缺少幹部領導事務，很多在省份的同志，勇氣十足但不能對應急速變化的局勢，即使像陳潭秋那樣的老領導，也不能勝任正在擴展的共黨的巨大任務。最有能力的往往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總之，「中央」決定派彭澤湘到武漢，代替陳潭秋繼任湖北中共省委書記職，而陳潭秋也欣然讓位。

可是，唐生智一到武漢，就見到彭澤湘，知道彭澤湘是個多智謀的人，他在國民軍首領如岳維峻等之間周旋，在這方面已集聚不少經驗……。唐同彭經過多次談話，說他同中共齊心一致，完全支持中共，聽從它的命令，如果中共願意接受他的話，他會立即加入……。他的目的是要得到中共的信任，以求像其他國民革命軍首領一樣，獲取蘇聯的軍火和金錢援助。另一方面，他看到中共在湖南有實在的影響，雖然唐生智已經向廣州方面要求支持，鮑羅廷只派了一些顧問，他沒有得到充份的滿足……。他立刻向彭澤湘建議，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彭說他自己是願意的，但要徵求「中央」的意見。

唐生智開始他的軍事生涯時，是湖南軍閥趙恒惕軍中的一個排長，

後來升為師長。唐生智在趙恒惕部隊裏組織叛變，而且組成一支獨立部隊，投靠廣州國民革命政府。由此他榮獲第八軍正式首領的頭銜，由於部份廣州軍隊的支持，他的部隊幾乎沒有開戰就佔領湖南。他的影響發展快捷，他的野心也同樣發揮。

我們觀察到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不準備鎮壓湖南已動員起來的群眾，也避免與中共聯盟的軍隊發生衝突。正由於這種觀察，我們對唐生智懷有相當的信任。我們也考慮到，他穩穩掌握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自認為完全可以替代蔣介石，心懷大志，有意像托洛茨基成為紅軍首領那樣，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大首領。但我們對他不是絕對信任，也就沒有接受他入黨。但是我們表示願意彭澤湘接受擔任第八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我們想可能通過彭澤湘更了解第八軍中的情形，我們雖然不能預測第八軍的演變，但預感到它可能同張發奎和葉挺的第四軍發生衝突。

顯然地，唐生智想方設法要控制湖北和湖南兩省。張發奎有一部份軍隊駐在湖北，另一部份到達河南，靠近九江，為了監視蔣介石的動靜。既然國民黨與中共的合作完全是軍事性的，我黨不得不靠基本上可信任的軍隊。對蔣介石非常不信任的情況下，我們對敵視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比較寄予希望，也就是對國民黨左派的軍隊寄予希望。因此，我們對唐生智也有一些幻想，因為他是國民黨左派組成的一部份。

至於馮玉祥，他當時好似還在莫斯科，也對上海中共發出信號。他寫了一封信給陳獨秀，宣稱他即將參加北伐，表示特別希望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這封信是由上海蘇聯領事館轉交，雖然信是寫給陳獨秀個人，但事實上是給中國共產黨的。

第一九章

上海暴動 (1927 年春)

我對老黨最後的貢獻

武漢特別會議後回到上海，我心裏深感憂慮。黨的發展的確是驚人的，黨員數目增加超乎意料之外。但在政治上卻受到絕對的束縛，毫無解救辦法。明知我的意見很難通過，但自覺地發奮想做些貢獻，因此將全部精力關注整個局勢的發展，做出幾點思考。

首先，我認為帝國主義者已經警覺革命潮流，在長江流域洶湧，尤其是英帝國主義，不惜以武力來制止革命的蔓延。我在《嚮導》寫了幾篇關於英美帝國主義干預中國革命局勢的嘗試，呼籲革命群眾堅決對抗。¹⁸

我認為把中國革命限在國民黨的範疇內，會導致嚴重的危機（獨秀和我過去數次建議退出國民黨而被拒絕），雖然當時完全沒有料想到革命會走向失敗。

在1927年1月到3月間，我連續寫了幾篇文章登在《嚮導》上，是對整個革命上升局勢和它潛藏的危機的觀察和估計，一方面根據列寧的教導，對中國革命的動力做理論性的解釋，另一方面，我分析這一革命的趨向和具體環境。受到越來越嚴重複雜的事件的驅使，我簡直忘記每日從莫斯科，由斯大林及他的夥伴，寄來的指示的羈絆。

當時，黨內有一種傾向，說國民革命就是國民革命，要把它完成後，才可講社會主義革命，是所謂「階段論」。在國民革命這一階段，是依靠國民黨來完成。北伐勝利後，全國可以統一，取消不平等條約，完成國民革命……這是黨內明顯的氣氛。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等組織則極力宣傳說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例子，對中國不適用，中

18 《嚮導》186期（1927年1月31日）〈怎樣答覆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188期（1927年2月16日）〈美國帝國主義提議淞滬中立區的真意〉189期（1927年2月28日）〈請看帝國主義在上海的自衛〉。

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醒獅」，國家主義派的伎倆就是講這一套。這一見解不僅是國家主義派在講，事實上，莫斯科也有這一傾向，只是不明說出來而已。

我是對布爾什維克政治有相當修養的，認為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歷史上無先例。然而，我過去在俄國沒有看到托洛茨基有關不斷革命論的著作，讀到的是他著的《1905年》。只憑直覺，我確認在俄國1917年革命中2月到10月間，並無明顯的階段。同時，我也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給德國社會黨人的信中，初次提到不斷革命（是這一詞的起源）。這些是我隱隱約約知道的事……。但我和瞿秋白不一樣，有人說我剛直，不向國際代表們拉攏，和他們沒有私交，說對就對，不對就不對，從來不遷就。

我接觸較多的是魏金斯基。他態度很好，有友情，也談談閒話。但是關於俄國的鬥爭，他從來不提，也沒談過。因此對俄國狂風暴雨式的斯大林派與反對派的鬥爭一無所知。

1927年3月間我們收到一篇斯大林寫的反托洛茨基的文件，是英文的。我從來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也許是成見，對托洛茨基倒是一向尊敬的。我看了這一文件後，告訴獨秀，有這樣一件東西，我不準備登在《嚮導》或《新青年》上，可用內部書面發表。當時我以全力對應《嚮導》、《新青年》很少寫文，事實上由鄭超麟編。收到斯大林文章那天，剛好沈雁冰來到宣傳部，我就要求他給我翻譯成中文。那時他常來宣傳部，表示商務印書館工作無意義，很厭倦，要想換到黨內工作。我們建議他辦一個通訊，本來準備就緒，他說想去廣州，結果他去了廣州到中央黨部工作。這是我們收到唯一的俄國「爭論」文件，而對俄國黨內鬥爭激烈，完全蒙在鼓裏。也許瞿秋白同國際代表拉攏搞私人關係，多知道一些情形。這從不久他集中攻擊我的小冊子裏顯露出來。他特別指斥我是「不斷革命論者」，而我對俄國黨內情況全無所知。

正逢列寧逝世三週年，我借此機遇在《嚮導》發表一篇文章（述之：〈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嚮導》184期1927年1月21日）。那時還沒有收到斯大林攻擊托洛茨基的文件。我毫無成見還引了一些斯大林字句（抽象的理論還過得去）。我要指出的是中國的所謂「國情」，同十月革命前俄國的「國情」實質上沒有根本不同，從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上說是相類似的。引斯大林文，我反駁列寧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是適得其反……並引列寧的話，「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並無萬里長城的隔閡」，就是說革命是不斷的，而俄國革命就是中國革命的榜樣（我已經在1925年9月關於總工會被封的文章中提到過），這是一貫的思想。我當時用「永續革命」，是翻譯馬克思、恩格斯文中的名詞，而全然不知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內容。

根據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我確認中國革命與以下的基本原則有密切聯繫：

- 一、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 二、中國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導；
- 三、中國革命必須保衛大部份農民的利益；
- 四、無保留地承認國內所有民族之間的平等；
- 五、永續革命。

身為列寧主義者，我們承認今日中國革命是一個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但因為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屬於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這一革命不能限於民族民主的內容，而很快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由於歷史緣故，中國資本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較弱的一環，比革命前的俄國還更弱；它的資產階級也更反動，絕無能力領導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中國工人階級比較強大，尤其是農民群眾同工人們團結一致……；這些政治社會的特殊情況，證明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非常適合中國

的局勢。正像沙皇俄國那樣，中國正處於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聚集和衝突的地區。正由於是世界帝國主義較弱的一環，革命可能在這裏爆發和蔓延……；這是這篇文章的結束語。

在下面幾篇文章裏，我首先提到革命前進所遇到的敵對勢力挑戰的熾熱的問題，國內各種勢力的尖銳緊張衝突，以及找尋解決路徑的急迫性。

一、〈目前革命中的聯合陣線問題〉（《嚮導》185號，1927年1月27日），我認為存在兩條敵對陣線：一邊是革命統一陣線，集合工人、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知識分子，尤其是學生、中小商人、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另一邊是反革命陣線，集合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和日本）、軍閥（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張宗昌）、買辦資產階級、土豪劣紳、國家主義派、研究系，我呼籲革命聯合陣線警悟，不要讓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試着腐化和分裂聯合陣線的團體和分子，而要鞏固它不僅是孫中山革命奮鬥的遺訓，團結蘇聯，而且要求一個建立在結合所有基本自由（輿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組織協會自由，罷工自由）完成民主革命的國民政府。

二、〈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嚮導》190號，1927年3月6日），我指出蔣介石代表的右傾危機公開化。對當時局勢有綜合性的分析：右派試圖抑制革命潮流，同敵人妥協，破壞整個革命。最後提出要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權，不要個人獨裁，即包涵工農政權，排除資產階級，對於政權的基本觀念，現在看來還正確。但已大不同於共產國際政策。

三、〈南北妥協問題〉（《嚮導》191號，1927年3月12日），是根據各通訊社的消息資料，加以分析：李石曾拉線，要蔣介石反共反俄，蔣介石表現明顯化。因此文中責問蔣介石對報章「流言」加以答覆。這是公開攻擊蔣介石對軍閥妥協。此文在外界和黨內都有反映。

四、〈讀了蔣介石2月21日的講話以後〉（《嚮導》192號，1927

年3月18日），蔣介石的軍隊到了南昌，受工農群眾歡迎，但一到後就禁止工會農會的活動，並改組國民黨，排除中共分子，收羅最右的國家主義派，在2月21日的講話中，他公開反共反蘇。此文在揭露蔣介石政治的真相時，觸及共黨綱領性的問題，與共產國際對立。獨秀也寫了一篇批評蔣介石1927年3月7日的演講，（亦在《嚮導》上登載），可以看做我們分工合作的結果，異曲同工。可惜正是三月暴動前夕，在黨內黨外沒能起到相應的反響。

在對蔣介石為主要批評作結論時，我憂心地發現在中國存在兩個不可調和的營壘，一邊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劣紳；另一邊是革命工人、農民、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堅決站在工農方面，進行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戰。

回顧當時的判斷和分析，我覺得大體上是符合當時的革命危機的步驟的。

共產國際第五屆中央執委會第七次全會，及其在中國的反響（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內），瞿秋白的陰謀

共產國際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在11月末、12月初，在莫斯科召開。中國代表團裏，由胡漢民代表國民黨，也由邵力子代表蔣介石；譚平山代表中國共產黨。譚在參加上海擴大會議後不久，就去莫斯科，蔡和森當時還在俄國。不過，譚是主要人物，在會上發言。在這次會議裏，共產國際正式宣稱，蔣介石的國民黨為「同情黨」，就是同國民黨拉得更緊。

在這次全會上，中國革命處於斯大林派與反對派爭論的中心。譚平山作了一個相當長的報告，後來托洛茨基時常引用。但會上有兩個文件值得注意：（1）斯大林的發言，在1926年11月31日。（2）中國革命的決議案。

在斯大林的發言（中國革命的前途）中，他重新確認共產國際長久以來追隨的路線，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但補充對當時到達武漢的北伐軍的分析。基本看法：從廣東出發的北伐軍，每經過一個地區，就帶來民主和自由，特別給工人以自由。因此認為廣州政府是中國未來國民革命政府的雛形。因此，他在決議案裏主張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入這一政府。也正為此理由，他認為中共黨人絕對不能退出國民黨，而相反地，應該繼續在國民黨內部合作。這也就是對獨秀和我要求退出國民黨的答覆。

另一方面，斯大林強調「農民問題」，但與土地改革無關，只提出抽象的口號，「土地國有」，對於要求分地的農民來說完全是抽象的。事實上，斯大林對這問題是猶疑的，說不清楚。當農民要求分地，而他說在目前還只能要求減租減息。由誰來主持呢？還是通過國民政府。他提出組織農民委員會，幫助政府來執行減租減息。當時米夫（Mif）已提出組織農民蘇維埃，斯大林反對，說要組織農民蘇維埃，就先要組織工人蘇維埃——但現在還談不到。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白表示反對組織蘇維埃。這也是斯大林「中國革命前途」發言的要點。

共產國際第五屆中央執委會第七次全會的第二個重要文件，就是「中國革命的決議案」。完全根據斯大林的發言的要點，比較詳細地，零零碎碎地分插進去。決議案裏有句話值得注意（在斯大林發言也提到但不明顯），即是：「中國國民政府應當竭盡全力，使革命前途進入一條非資本主義道路」。這還是抽象的，但後來變成一個公式。

這次共產國際全會正式決定中共加入國民黨政府。我們收到文件是在1927年1月間，拿到常務委員會（獨秀、秋白和我）來討論。我看到文件時覺得還是老一套。我承認國民革命軍到達的地區的確存在自由，但同時蔣介石有一命令在北伐行軍期間，後方禁止罷工……。至於不許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是原來的方針加以肯定而已。只有加入國民革命政府（國民黨政府）確實是一個新的決定。

在決議案未到之前，我們「中共」面臨一個實際問題。江西省有兩個中共黨員，都是原來上海大學的學生，北伐軍到江西時，他們當上縣知事，江西省黨委報告中共，中央不贊成，認為江西省黨委應該明令這兩位黨員退辭此職。這是我們一向的觀念。根據我們的立場，中共黨員在非共黨政府內擔任行政職務，應負政治責任。比如對農民採取甚麼措施，對工人怎樣？在江西除非代替蔣介石的政權，是無所作為，所以認為不妥。後來在湖北也有同類之情形，有幾個縣知事是共黨人。我們在「中央」也反對，連魏金斯基也同意我們，是根據過去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

共產國際的「決議案」指令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政府，對我們說就有問題。像前面例子證實的，我們的理念不能贊同，但又不能公開反對，魏金斯基說：「這決議案還過得去」，關於土地問題，既然決議案還只提出減租減息的口號，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對土地問題作出一個行動上的綱領，受到限制和束縛。最明顯的例子是1927年2月大罷工。當初我們本來（而且公開聲言）要組織工人委員會，也就是說組織工人蘇維埃。但「決議案」既然明白否定組織農民蘇維埃，當然否定組織工人蘇維埃。因此共產國際這條指令，對於上海三月暴動有直接影響。

在斯大林的發言中，國民黨是抽象的概念，而當時真正的國民黨是活生生的具體的。首先有蔣介石的國民黨，而在武漢開始出現一個「左派」的國民黨。但國民黨大權操在蔣介石手中。他自從廣州出軍到南昌，行動上一貫的表現都是反共和壓制農民和工人的。蔣介石的軍隊政策上遠沒有給民眾帶來自由而是高壓。我在〈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一文中提出一個口號：「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專政反對個人獨裁」，就是說民主政治反獨裁。這等於無視莫斯科的指令。

莫斯科共產國際五屆中央執委會五次全會的「中國革命的決議案」一到我們手中，形式上我們不得不接受，本來魏金斯基有不同意見，這

時也同意了。就在此時，瞿秋白看到「決議案」有了把柄可以掌握對彭述之的總攻擊；同時，共產國際駐在上海的三位年青代表，本來同魏金斯基意見不合。他們是從左的，甚至是過左的角度來找尋中共在執行共產國際「正確」的路線時所犯的錯誤。由此他們在給共產國際報告中對魏金斯基發出一系列嚴重的指責。

在上海二月總罷工和三月暴動的過程中，這些國際代表們企圖找到中共沒有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不良現象。比如，有關土地問題，中共黨員在國民黨軍隊裏不做政治工作，只為國民黨做宣傳，自己沒有支部，沒有下層組織，更沒有兵士蘇維埃了……。

中共因同國民黨合作，總是同國民黨人談判商量。比如二月總罷工時，要準備將來建立政府，共黨不能獨立建立政府，必須要同國民黨人談判。當時蔣介石在滬代表是鈕永建，他負各方面的責任。我們準備正式暴動時，上海區委只好同他聯絡，關於未來的政府，中共那時有九人，其一是楊×福（Yang Xuan fu）。

共產國際在滬的三位代表不但攻擊魏金斯基，也攻擊中共中央，這裏就有瞿秋白的一手了。他那時主要攻擊對象是彭述之；魏金斯基倒是一個正派人，不喜歡搞陰謀詭計，寧願向同志做正面批評。瞿秋白同他的關係越來越壞，而同那三位俄國代表們關係最密切；他本來是最右傾的，也偽裝左傾了，來遷就他們說一些偏左的話。而且提供一些意見，甚至偽造一些「材料」，以加強他們對中共領導的反對，加強他們對魏金斯基的攻擊，而魏金斯基只不過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

這些情形是1927年2到3月間發生的，也許更早一點，但共產國際五屆執委會七中全會文件到來後，這些年輕人更膽大了。他們的出發點其實是一個誤會：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正確的。而不看到中共機會主義的表現和政策行不通，正是執行共產國際政策的結果。他們把錯誤的責任先交由魏金斯基負擔，甚至交給鮑羅廷，指斥他們違反共產國際政策，

他們的批評是歪曲和混亂的。比如中共黨人退出國民黨的問題，鮑羅廷在廣州的確提出這個問題，也曾同魏金斯基一起提出過，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式向共產國際提出中共退出國民黨。但這三位國際代表攻擊最厲害的是魏金斯基，在信中說鮑羅廷是國民黨左派的化身，是莫斯科的象徵，不主張調他回去，但主張把魏金斯基調回去。他們報告的結論要點如下：

一、中共執行機會主義政策的全部責任，應由領導機關的右派和共產國際代表來分擔；

二、過去的策略，不能同中共分開；每當中共遲疑不決的時候，想開始找到新的道路，國際代表總是強迫中共走向拉攏詭計，政治欺詐的泥沼中。

他們還指出魏金斯基和鮑羅廷曾犯錯誤。比如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

這證明共產國際內部鬥爭劇烈。實際上指責魏金斯基，又批評鮑羅廷，是要把一切共產國際政策錯誤的責任加在他們身上。至於中共退出國民黨事，魏金斯基從來沒有提出過。也許在廣東俄國顧問團裏傳說鮑羅廷在特別委員會裏提出這一問題……，但基本上是這三位國際代表利用這一偽造事件，尤其是瞿秋白也這樣說，主要是攻擊魏金斯基。他們看到斯大林那樣堅決地說：不能退出國民黨，用此文件來打擊魏金斯基和鮑羅廷，正式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建議把魏金斯基調回莫斯科，另派一位有能力的同志來中國，同時監視鮑羅廷。

關於中國共產黨，三位國際代表的理解真是簡單明瞭，我照原文抄錄如下：「中央委員會實際上由三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代表中派，假如能夠把彭述之和吳廷康（魏金斯基中文名）孤立起來，再加入一些新的人物，那麼老頭子還可以繼續做黨的領袖之一。」這是最後的結論。

他們怎麼會知道彭述之是右派？當然是由於瞿秋白的報告，系統地要排斥彭述之這是很清楚的了。這三人給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的報告日期是1927年3月17日發出的。反映了他們同魏金斯基的分歧鬥爭，加上瞿秋白安排了的反彭述之的勾當。

現在我不得不提到瞿秋白反對彭述之的小冊子，名稱是《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我看到這本小冊子是我在1927年5月初剛到武漢，準備參加中共五次代表大會前夕，我以事實的歷史程式來說。

瞿秋白這本小冊子是在1927年初開始準備，到2至3月間寫成的，當然我完全不知道，我們在《嚮導》寫文章，是分工的。我常常建議每一期的內容，獨秀擔任寫那一篇，我擔任寫某篇，瞿秋白也擔任一篇，魏琴（魏金斯基）有時也寫一篇，其次鄭超麟也常寫文，還有各地報道。但每次要請瞿秋白為《嚮導》寫文章時，他說，他身體不好而「怠工」。從1月起到3月止，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我這個人太老實，毫無猜疑。有時碧蘭偶然見到楊之華，說秋白很忙，在寫一本書。碧蘭比較敏感，說恐怕他在對付我。我說：「為甚麼對付我？我在黨內從來沒有爭地位，是黨選出來才負責工作，也從來沒有對他過不去。」碧蘭說：「聽說他很嫉妒你，他以前是黨裏認為唯一的理論家，自從你回國後，他變成黯然無光，你要當心。」我說：「隨他去對付我吧！」事實上，碧蘭這一猜測證實了，他確實寫了一本專門對付我的小冊子，名為《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這本小冊子的要點我簡略寫在下面：黨內一切政治上，組織上和人事上不上正規的現象，東拉西扯地歸罪於彭述之身上，總稱為彭述之主義，等於孟什維克主義。如果按照彭述之主義幹下去，共產國際往何處去？是走第四國際（俏皮的話）去吧！

一切歸於無根據一些雞零狗碎的謊言推測當做事實，瞿秋白把我變成千秋罪人，而且認為彭述之主義在黨內不是個人的，而有一種力量，

是一個派系。他攻擊的核心是我在 1924 年寫的那篇文章：〈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裏面提出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當然的領導。他說「既然是『當然』就不需要鬥爭了」……其次，他說我一向主張中共黨人退出國民黨，而他強調中共加入國民黨是非常重大和有決定性的政策，只有在國民黨內無產階級才能進行領導，退出就是放棄領導。這些都是我的罪狀，而且似乎已成事實。再有一點是我的「不斷革命論」，是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的劣等的副本，如果依照我的路線來領導中國革命，必然失敗。此外他攻擊我有關 1924 年寫的文章，說革命要有程式，宣傳上要使群眾了解，組織他們形成力量，然後才能奪取政權。他說這是書生的死公式主義。他認為有時不一定要經過這些程式……。他另外又偽造了所謂引我的話，加上弧號，其實是最下流的謊言，滿紙滿張，不根據任何我發表的言論。最後結論：如果中共不把彭述之主義徹底肅清，就沒有前途，應該以布爾什維克主義來代替彭述之主義。

這一切陰謀佔據瞿秋白 1927 年 1 月到 3 月的時日，正值上海三月暴動的前夕。瞿秋白這本小冊子是暗中散發的，正巧碰上那三位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完成，以做輔助，也正逢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將在 1927 年 5 月初召開。

上海二月大罷工

關於上海 1927 年 2 月 19 至 24 日大罷工，它的原因和意義、它的進展、公開宣言和評論，動員了上海有組織工人四十萬人的事件，我們都在《嚮導》（189 期，1927 年 2 月 18 日）上有系統的記載。

北伐軍快到上海，使工人們興奮，同時帝國主義恐嚇鎮壓繼續在鉗制他們的行動，而他們的大本營：總工會，仍然是半公開地存在。李寶章，直系上海衛戍區長官，通過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有傳統關係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右派）談判，向北伐軍投降的方式和條件。蔣介

石的全權代表，鈕永建緊隨談判，向李寶章獻議不要馬上「投降」，而對上海工人運動採取強硬手段，加以鎮壓，以換取北伐軍更有利的回償。因此李寶章對上海工人施行惡毒的鎮壓，並且用金錢支付西山會議派的報紙《江南晚報》（在日本一印刷所印行）。這張報紙的目的是散佈有關共產黨人的謠言和誣衊，並攻擊工人運動。國民黨右派鼓噪的同時，英國帝國主義在黃浦江集合戰艦，耀武揚威要入侵上海中國地區……。

就在此刻，我黨面臨對抗這些惡毒和暴力攻擊的必要。經過總工會商討後決定發動總罷工，由總工會具體執行。我在這幾天罷工日子裏，不但在各地區視察和緊跟罷工行跡，檢驗到一些在發表的文件裏沒有說到的事實真相。

總罷工第一天是 1927 年 2 月 19 日。工人陸續進入罷工潮，不很整齊有序。已經罷工的有碼頭工人、海員、發電工廠員工、煙草廠工人、紡織工、郵局員工，百貨商店店員、印刷工人……；罷工工人近十五萬人。李寶章，上海衛戍區司令啟動白色恐怖，槍殺散發罷工傳單的學生和工人。但第二天，罷工工人卻有增無減，而到第三天，差不多上海全部有組織的工人都罷工，不但是大百貨商店售貨員，而且包括店員和手工業者。這次罷工比兩年前「五卅」運動時更有秩序。因為到處都有工會組織，它們雖然名義上是禁止的，卻秘密活動，而且在各工廠有穩定基礎。連商店店員，銀行職員都有工會組織。據公開的估計，罷工工人總數有四十到五十萬人。但《嚮導》上趙世炎比較確切的數字是三十四萬人，等於上海全部有組織的工人。

到了罷工第三天，就發生一個問題，是否發動（立即）暴動？事先，我們沒有預計總罷工可能引至暴動，我們完全沒有武裝準備；唯一主要聯繫（從去年 11 月起），是由王允公聯繫的在黃浦江上中國海軍一兵艦上的水兵。這個問題是由俄國同志提出來的。是一個少年國際代表團人員（究竟有多少人弄不清楚）；而我經常見到的是魏金斯基（中文又名

吳廷康，筆名魏琴）、其他幾位俄國同志，通過任弼時（當時是中共青年團負責人）向「中央」轉達意見，說既然已經發動總罷工，就必須即刻發動暴動。按照一個機械的公式：總罷工只能是暴動的前奏；總罷工一旦啟動，就應該馬上進行暴動，奪取政權。

我們在「中央」討論這一「建議」，又同江浙皖區委同志討論：用甚麼方式、甚麼力量來完成這樣的任務？比如中國海軍一兵艦如果發砲，陸上又怎麼應對？羅亦農作報告時承認，毫無準備，連一支手槍都沒有，但俄國同志答說：應該奪取敵人的武器，這是第一次我們同國際代表同志發生嚴重意見爭論。瞿秋白當時倒反而左傾起來了。這些討論不是經過正式的中央同俄國同志直接會議，因他們在上海是秘密的，出入不方便，是由任弼時和瞿秋白傳達雙方的意見。獨秀和我找羅亦農商討。他說沒有武器，沒有準備。暴動只純是空想。唯一可能是找些工人去奪取站崗警察的手槍……。這種嘗試不但無濟於事，反而使局勢惡化。尤其是罷工第二天官方鎮壓很可怕。凡是散佈傳單的人，李寶章命令就地處決，用大刀砍掉頭。南市有些看傳單的人就把頭砍下，掛在電桿上；散發恐怖，到處捕人越來越多。比如，在青雲路上海大學學生，就有五十多人突然被捕……。所以我堅持要特別慎重，完全根據常識，不買他們國際代表的賬。我同任弼時講理。我說歷史上並沒有這樣的規律；總罷工必然引起暴動，這是錯誤的理論，是一種冒險，我那時還不知道用「盲動主義」的術語。任弼時提到共產國際的權威，但我回答：國際並沒有明令，而且我們沒有武器。他提醒我這些「同志」聽說在中國海軍裏有同情分子。我答說：的確有兩個兵艦在黃浦江上是同情我們的，但是海軍士兵不能上岸。我還說：動員工人去奪取敵人的武器，只有無謂的犧牲。這就是我同少年國際團代表之一的對話（是在上海向共產國際報告的三人之一）。我們的會談僵住了，各人執着己見。獨秀沒有參加討論。任弼時，比較天真又無經驗，是贊成俄國同志的意見的，而且受到瞿秋

白的懲息；但沒有正式會議，也沒有結論。

結果羅亦農認為既然共產國際有意支持暴動，勉強表示可以嘗試一下，決定由中國海軍在黃浦江的兵艦發砲。這倒容易，是將命令傳達就行；再次在浦東及幾個地區組織小隊工人，在某些警員站崗的地方奪取槍械。雖奪取少量的槍枝，卻沒有結果也沒有甚麼犧牲，因為警察一開槍就逃跑了。海軍開砲對李寶章的確有點威脅，但陸上並沒有對應的軍事行動。

罷工的第四天，中共「中央」，江浙皖區委和中共青年團的同志開會討論對策，我們的結論：四天罷工沒有得到實際的結果，而且罷工工人顯示疲倦，所以決定採取退守政策，自動宣佈罷工結束。正因為中共對總工會享有很高的盛譽，而總工會對工人群眾享有不可爭議的權威，所以中止罷工是很有秩序的。

這次罷工有一插曲，反應群眾對北方軍閥的恐怖手段的緊張情緒。罷工期間，楊樹浦召集上萬人的集會，有一個敵方偵探參加集會，被工人們抓住，公開審判後把他打死。這是第一次在上海發生如此事件。

中國共產黨和總工會對這次罷工發表〈告工人書〉，是獨秀起草的。我另寫一篇〈上海總罷工與西山會議派〉。在〈告工人書〉中我們第一次提出政權問題，要求成立工人委員會，準備奪取政權……。

經過總罷工的經驗，中共中央和江浙皖區委同時感到，上海有發動一場真正暴動的必要。但如果認真在上海暴動，必須確定目標，就是由中國革命軍打倒奉天直隸聯軍……。當時我們還沒有以自己獨立的力量奪取政權的觀念。

上海三月大暴動始末

我這裏不必講到1927年3月暴動進行的具體情況，《華崗大革命史》有詳細記載，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書中也根據華崗的敘述，我是

以親身經歷的見證人的資格提供暴動的組織情況，在群眾行動與武裝隊伍之間的配合。比如，小沙渡工業區是在公共租界，而武裝暴動則限於南市、北市（閘北）、浦東等中國地區，問題是如何動員群眾來支持暴動。

暴動的司令部就在中共宣傳部，也就在我和碧蘭的住家，地處橫濱橋安慎坊，這是革命委員會選擇的一間相當寬大的屋子，後門在閘北，而前門是弄堂在北四川路上。人從後門進來，不會引人注意。獨秀和我是常在的，周恩來是同我們經常接觸和會議的同志，秋白不常來。此外，汪壽華，總工會的主席也經常來做報告，羅亦農是上海區委書記，趙世炎是閘北地區總指揮；這四位同志就成為暴動最高指揮部。

暴動時間決定在1927年3月21日晚。為了所有戰鬥隊發動在同一特定時間，指揮部買了一大批同一牌子的手錶，發給擔任各小隊指揮的人，以便準時出動；而且已決定幾個軍事戰略點，北火車站、龍華火車站、南市是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以便截斷北軍的聯絡。同時，攻擊目標還有直魯軍在南市、北市駐紮據點，我方本來嘗試解除敵人武裝，但因武器缺乏，就要動員集合在公共租界裏的群眾，在滬西小沙渡的數萬工人。

在虹口（上海北部）的暴動隊伍分兩路進行。一個方向是閘北，另一方向是中國地區，是浦東和楊樹浦交界地點。暴動隊伍只備有少數自衛武裝，主要是施行壓力，勇猛前進。就在這一回合中，我們一位最好的同志，小沙渡工人領袖薛利亞，在此時此地犧牲了。

暴動的第二天，南市完全由武裝隊伍佔領了。事實上，敵軍知道北伐軍已經到了龍華，離南市不遠，而市內有倒戈和開槍交戰……北軍匆忙地乘火車，改由小沙渡火車沿線繞道向北火車站開去，然後向吳淞方面撤退。暴動隊伍佔領南市警察總局，以及龍華火車站，沒有經過大的戰鬥。

現在戰鬥圍繞北火車站，北軍沒有完全撤退，因沒有足夠的列車，一部份軍隊困在火車站，有些待在火車沿線的列車上，受到附近聚集在

天通安路內武裝隊伍的襲擊。我同超麟伴隨戰鬥部隊，一直到天亮。隱藏在商務印書館附近弄堂裏的隊伍，不時出來做街巷戰……；不時有槍聲，夾着市民放出的鞭炮聲。北火車站聚集的數百北軍士兵，聽到槍聲和炮火的爆炸聲，都驚嚇住了，完全崩潰了。

沿着商務印書館館址到北火車站那一帶，市民把桌椅都搬出來做障礙物。商務印書館內駐有二百北軍士兵，他們有機關槍、匣子砲，但怕破壞市民房屋，只放空砲。我們的武裝隊伍躲在弄堂裏，組成兩三人小隊，從看不見的地方突然同時開槍，似乎有很多人在多處作戰……。因此，北軍士兵不能出火車站到租界，僵在那裏，這是3月21日晚上情形。

第二天接到各方面的報道，南市和浦東都由暴動隊伍奪下來了。楊樹浦中國地界也佔領了。只有閘北警察局有相當激烈的戰鬥，由趙世炎指揮。警察後來掛白旗投降了。我方受傷很少。最後剩下商務印書館和北火車站。

3月22日清晨，駐在商務印書館的北方軍人本來還在樓上向下面開槍，但子彈打不着牆下我們的隊伍，後來就停止開槍，只有北火車站駐軍還在發空砲，直到下午四、五點鐘，後來也掛出白旗投降了。我們在北火車站立即要我們的武裝隊伍搬開炸彈，避免爆炸……。我同超麟到天通安路任弼時和蕭三的住所，因附近有槍聲，他們還躲在被褥裏面。我要求他們幫我們把各種各樣武器，搬出商務印書館，裝在幾列車上……。當北火車站掛上白旗後，我們四位同志，拿着盒子砲，沿着鐵路，很英勇的去北站繳兵士的槍了。一方面把俘虜安置到商務印書館的院子裏，另一方面他們繳出的軍火放置圖書館那一樓上……，那時周恩來也到了。他比我們內行得多……。

那些俘虜士兵坐在院子裏，垂頭喪氣。我找到一點時間去和他們談話。我說：你們沒有罪，是長官的問題，你們是老百姓，將來回鄉還可以做事……這樣安慰安慰他們。有的說：是啊！我告訴他們我們是共產

黨，要革命是為了老百姓，他們倒高興起來了。我還要求周恩來設法安排他們的飯食……。

原來我們是要等到北伐軍逼近上海時才發動暴動，以配合行動，掃除在上海市區內的北軍。但暴動勝利的次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由白崇禧率領的先鋒隊還沒有到達龍華。對於已俘虜的北軍，我們沒有任何線索，固然對士官不能有任何影響，即使對下層兵員，都是北方土生土長的，也無法通話。

為了準備暴動，中央和江浙皖區委聯手建立了一個特殊機構，由周恩來負責。這個機構稱為「革命委員會」。這裏必須講到周恩來到上海負責黨組織部的由來。1926年3月20日廣州政變後，周恩來還留在廣州一個時期。他同蔣介石本來關係不壞，應付某些事情，蔣還是要通過他。同時周恩來又同何應欽有些聯繫，因他當過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但何應欽帶軍去福建了。周在廣州國民黨範圍內也就無事可做了。然而他還是中共廣東廣西（兩廣）省委委員，中央決定把他調到上海，負責組織事務，本來中央組織部是張國燾負責，他還留在廣州，準備隨北伐軍去武漢，組織部事由張學良維持。這時中共黨員由數千人增加到三、四萬人（根據各地報告），但無人整理，因此黨中央調周恩來到上海負責組織工作。

周恩來到上海是在1927年初（我記得1926年12月間我去武漢時，他還沒有到上海，我們回來時，他已到了）。他確實有極大的組織才能，而且又有頭腦。他來後即建立組織部，由中央書記處負責的王若飛以及三、四位同志，聯合起來組成這個機構，整理各地報告組織情形。周恩來不是中央委員，不參加常務委員會，但實際上他是黨組織部長。他曾經是廣州軍事委員會負責人，有軍事經驗，所以「中央」交託他組織一個「革命委員會」，實際上是訓練同志用武器，準備暴動。「中央」也撥了一筆經費（由北京俄國大使館轉來），可以買到三百支手槍和幾個

盒子砲，挑選幾百工人和知識分子同志，秘密訓練，使用武器。除周恩來是總負責人以外，還有趙世炎參與。趙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其組織才能不亞於周恩來，而且有一手好筆。這些軍事秘密，中央不過問，由負責人安排積極進行，工作緊張，同時測繪了暴動地圖，槍支搬運，都有精細計劃，動員的武裝工人有上千人，是最勇敢最活躍的分子。

這些成千的活動分子、工會成員，奮勇走上了戰鬥之路，完全是由於二月大罷工的終結情況特殊：工人自動有秩序地終止罷工。正因此，罷工工人不但沒受挫折而頹傷，反而精神振奮，自覺到他們的力量，對敵人表現他們的堅毅。而他們的敵人呢？帝國主義者、資產階級、國民黨右派，不僅是右派，連蔣介石在內，都感覺到工人運動的真正力量。他們都更加害怕。蔣介石決心要回擊。本來他的立場已經很明顯，而現在更堅決地集合所有敵視上海革命運動的力量，尤其包括西山會議派系統。

說到西山會議派，必須提到戴季陶和葉楚傖，是西山會議派的發起人，是它的靈魂。但在 1926 年 1 月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前夕，戴季陶本來是著名的極右派，卻表現個性軟弱，並不贊成西山會議派；葉楚傖是民國日報的編輯，也避免同西山會議派的張繼聯繫，原因是張繼同直隸的吳佩孚，而同日本有交往。蔣介石只得通過他的親信張靜江來套用戴季陶的「思想」。此後，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內鞏固它的基礎，是西山會議派慫恿上海衛戍司令李寶章，下令用大刀亂砍那些看罷工傳單的工人和市民，散佈恐怖，殘殺人數有五十到六十人，比「五卅」時期更野蠻。但工人群眾並不因此膽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有力量。

在楊樹浦，罷工工人有上萬人集會；公共租界英人當局由於過去事變的教訓，也不敢亂來。而且在巡警內我們有數十位同志監視對方的行動，他們的辦法只有靠租界裏的軍隊來鎮壓，也就是準備戰爭……。在目前，他們利用李寶章的軍隊在中國地區殘殺工人，同時秘密交換囚犯，

但不能在公共租界裏公開屠殺工人、活動分子以及市民。

的確，自從二月大罷工以來，上海大資產階級是極度恐慌的。小資產階級一般是徬徨的，比較下層的商店僱員反而同情工人，興奮起來，也更加組織起來。事實上，大家對北伐的勝利寄予很大的希望，認為是中國真正的解放，就是廢除外國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約，也就是我們當時發表的宣言裏經常提到的。

* * *

3月22日傍晚，白旗高掛在北火車站上，於是北軍開始全面崩潰，延到3月23日肅清。暴動隊伍已經完全勝利了，那時可注意到的有三個重要方面：

一、上海總工會，在暴動勝利後，取得合法存在。自從1925年9月由官方迫令關閉那時起，它的地下活動，從未停止過。現在它取得公開活動合法性，正式成立在閘北湖州會館。這是上海北區最大的建築物，由我寫了上海總工會的牌子掛在正中間……總工會向社會公開就立即發生兩個現象。首先是上海各區成千上百的工人結隊到這裏慶祝勝利；並且有一小隊中外記者來訪和作報道。我經常到總工會，安排和招待一些新聞記者。我回答問題是簡單講暴動經過情形。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法國人，帶了一位翻譯（是留法中國學生，也是同志），他提出一些關於暴動情形的問題，我也簡要地回答。但後來聽說這位法國人是 Andre Malraux。¹⁹

二、由暴動隊伍已經佔領地區的治安問題，是比較緊急的。糾察隊的組織是由周恩來和趙世炎負責的。本來稱為「行動隊」，這時配有武裝，多是奪取來的。那些手槍、手榴彈、機關槍等等，是把通安路截斷火車奪來的，存放在商務印書館。裏面有數千枝槍，由周恩來數清分

19 據 Andre Malraux 本人稱說，他當時不在中國。他曾是戴高樂的文化部長。

配……。原來我們的武器隊伍不超過上千人，現在立刻把所有會運用武器的工人組成二千多人的糾察隊，一部份駐在湖州會館，保護總工會，其他的分配到各地區維持治安。這些警備方面的安排只限於中國地界：虹口、浦東、吳淞……那裏沒有警察站崗，怕有滋擾。

三、當時的中心問題：暴動取得勝利後，需要建立一個臨時政府。在二月大罷工和三月暴動這個期間，中共與國民黨代表有關未來聯合政府的組成有過商討，而這正是共產國際指令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即將來到上海時應該參與的。中共由羅亦農代表，國民黨是鈕永建和楊杏佛代表。一開始在人選問題上，在中共黨內就有分歧。國民黨已經指定王曉籟、鄭毓秀為臨時政府成員。王曉籟是上海絲廠資本家，鄭毓秀是女律師。瞿秋白反對提名鄭毓秀，並由幾位女同志推選楊之華為上海臨時政府委員。但是區委的羅亦農認為鄭毓秀是國民黨提名的，我們不能反對，怕引起糾紛。這不是「中央」而是區委的意見。獨秀同我的立場是既然是國民黨的「聯合政府」，去爭個席位也不適合……，後來瞿秋白還把這事寫在對付我的小冊子裏，說鄭毓秀是代表紳士階級，而楊之華則代表平民。以至獨秀在武漢公開說，瞿秋白為老婆鬥爭……；弄得楊之華大哭一場，是一個插曲。這是瞿秋白攻擊我以外，在小冊子裏特別提到反對羅亦農的一件事。是由上海臨時政府人選引起的糾紛。

關於臨時政府的建立，我們當初不很清楚，後來才知道蔣介石有命令給白崇禧和鈕永建，說這個臨時政府不可成立，要待他的軍隊到達上海時再說。但只口頭上說要成立臨時政府，還指定一位姓鄧的共黨人（Deng Xiaoxian）為臨時政府秘書長，由他邀請未來政府的委員們……。大概開了一次會，而政府根本成立不起來。沒有正式會議，也沒有正式談判，更談不上政策；所以是癱瘓的。那些被邀請的上海資本家也怠工，不出席會議。所以這一臨時政府完全是空頭的。這證明國民黨由蔣介石直接指使，根本不要中共黨員參加它的政府，是很簡單明顯的了。共產

國際的政策這裏就行不通，是一個最壞的機會主義達到頂點的策略。共產黨已奪得政權，還要國民黨來指定政府人選！

根據一般的革命歷史，比如巴黎公社的歷史，工人勝利後，應由他們成立政府，也由支持革命工人的小資產階級參加……。從歷史觀點來看，當時成立蘇維埃是最好的時機。二月大罷工時就已經提到組織「工人委員會」也就是工人蘇維埃。三月暴動後，加入總工會的工人群眾有八十萬人，比二月罷工期間多一倍。這八十萬人包括產業工人，手工業者，商店僱員，銀行職員……；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也是受壓迫的階層。那時假如採取蘇維埃方式，馬上可以同下層兵士聯合起來。

說到兵士問題，在暴動前數日，由白崇禧率領的北伐東路軍，由杭州進軍到達龍華。到了龍華卻按兵不動，不敢進入城裏。當時上海市工人還派代表邀請他們開進市區。據說白崇禧不願意，但他手下一位師長薛岳卻表示想開進市區。北伐東路軍拒絕進入龍華市區的主要原因，是蔣介石害怕帝國主義者有所反應，而試圖同他們達到妥協，「和平接收」上海，同時他也正在和奉系和山東軍方談判他們的「投降」。當然是由鈕永建通過西山會議派同上海北軍司令畢庶堪談判。可是三月暴動的勝利摧毀了蔣介石「和平接收」上海的妙計。

至於薛岳開進軍隊到南市、北市的結果，兵士們在短短數日內看到工人像潮水一樣湧上街頭，慶祝勝利。我同一位姓李的同志到南市一個群眾集會演說，有上千上萬人。兵士到處受到歡迎，他們深受感染，對革命發生好感。

在薛岳進軍上海兩三天後，我們以總工會的名義發動一個工兵聯歡會。是由工人中選出數百人，在兵士方面也選出數百代表，一齊到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大廳裏集會。代表軍隊的是白崇禧，薛岳也來了；我代表中共參加演說。首先是白崇禧演說；一套官話，說上海有外國租界，應該好好維持秩序，稍有不慎，會同外國人發生糾紛。他連帝國主義這一

名詞都不提。他說完了之後，不僅工人群眾沒有以鼓掌歡迎，連兵士代表的反應也稀稀落落的，我演說的內容：上海工人對打倒了北方軍閥，是「五卅」運動以來革命的一大勝利。當然北伐軍進入長江流域是一大勝利。配合起來，我祝願工人和北伐軍兵士攜手合作，繼續推向最後的勝利……。我講完後掌聲如雷，有數分鐘。這表現有甚麼意義？就是工人兵士們對中國共產黨有熱烈嚮往。如果我們即時將工兵聯歡會組成工兵代表會議，也就是蘇維埃，差不多不成問題的，受到兵士們擁護。當然白崇禧一定是反對的，而薛岳卻不一定反對。這一會議的確有象徵意義的。

前面我已經提到上海臨時政府完全是空頭的，只有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代表，實在情況很快就透露出來。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到了上海，不宣佈成立甚麼聯合政府。他全部的活動就是佈置一個政變。他帶來了一班人員，比如像黃孚，美國留學生，以前是國民黨員搞外交。由他同租界當局勾結（詳情不知）。另一方面通過上海二大流氓頭子黃金榮（同公共租界有聯繫）和杜月笙（法租界當局暗探）。蔣介石本來是黃金榮的徒弟。由他們動員和組織流氓隊伍，準備一個政變來打擊共產黨。我們雖不悉詳情，但有一種預覺不測，想知道為甚麼蔣介石對成立革命政府怠工。

這裏必須提到一件令人驚愕的事件：約在暴動第四或第五天，我們中央三常務委員之一的瞿秋白留了一封信給中央，自己說是在去武漢的船上發的，信內說他暫時請假，也不說明請假的原因。獨秀是每天到中央辦事處，才看到這封信。他大發怒火，就來找我。說瞿秋白既然去漢口，至少應該同中央常務其他委員預先商談。這是甚麼意思呢？我這時回憶起碧蘭從楊之華那裏知道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心裏明白，但我也不能告訴獨秀，只說他這樣做法不對，不經過中央會議討論，逕自去武漢，又不通過中央的決定，而且到武漢去幹甚麼呢？獨秀比我脾氣躁些，憤

怒不止，我雖然比較平靜，也認為他這樣獨自決定去武漢是荒唐，完全不遵守黨最基本的組織原則。於是剩下獨秀同我兩人，在中央常委，來考慮怎樣應付局勢；但討論不出辦法。本來按照共產國際政策，應參加新革命政府，但這個政府形而不存……。正在此刻，3月27日或28日，汪壽華（又稱何松齡）總工會會長，來宣傳部，即暴動的指揮部，那時獨秀也在那裏，汪壽華告訴我們收到杜月笙一封信，請他到家裏去談談。

這裏稍為要談下一項小歷史：自從「五卅」事變發生，上海工人形成一大力量以後，上海的流氓分子，過去是幫助巡警壓迫工人的，開始有些轉變，不但不敢壓迫工人，有時反而幫工人的忙，還有個別分子加入共黨；「五卅」後，在巡警中有數十人加入中共。要知道上海巡捕同流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流氓多屬青幫，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孫。那時他也想買好上海總工會。以前是同李立三聯繫，李離開後，汪壽華還繼續同杜來往，有時杜請他去他家。杜常問他可以幫甚麼忙……；所以汪壽華一點也不懷疑。當他告訴我們有這一約請，我們也回答：你覺得好就去見他。在匆忙之中根本想不到有意外……。

汪壽華原來是1920年上海餘養里準備留俄的黨員之一，結果只去到海參崴……。他是浙江人，靈活能幹。那天，他說我去了回來再報告你們。因此我們就在宣傳部等他，我們也想知道杜月笙想搞些甚麼。他僱了一輛汽車離去。過了幾小時，毫無回來的影子，一直到夜晚，也無蹤跡。總工會那邊也沒有音信，我們自然疑心汪壽華被幹掉了。

獨秀和我兩人感到非常困惱，商談怎麼辦呢？按照莫斯科的路線，是要同蔣介石合作建立政府……；現在明明白白證明行不通了。而且許多跡象也證明蔣介石到上海後的活動，並不是同我們中共打交道，是同所有帝國主義者、政客官僚勾結。當時所有右派政客如吳稚暉、李石曾等都集合到了上海，我們預感已經是危急的生死關頭了。

如果我們要組織（工人）政府，不管國民黨取何立場，也讓小資產

階級代表參加；當然是違反共產國際的政策，根本不予承認的。如果召集工人代表會議，那更要遭到反對。斯大林已說過農民都不要組織蘇維埃，工人更不要組織蘇維埃。可是，根據當時實在情形，我們是很有可能建立工兵蘇維埃；但這條路也不能走，只有挨打了。獨秀和我還考慮另外一條路，就是我們下決心準備武器抵抗蔣介石。當時估計到有甚麼武裝力量可靠。達到上海的北伐軍只有薛岳一師，除此以外，後來白崇禧有點軍隊，但不多。薛岳的態度很好……我們苦苦思索商討……結果兩人同意準備武裝抵抗。我們就找周恩來和羅亦農商量。周恩來懂得一點軍事，對北伐軍每一隊伍都相當熟悉；羅亦農則負上海黨書記職，獨秀和我把我們的意見先說出來，他們也有同樣的見解。這差不多是常識，不需要很高的政治水平，大家認識到已成的僵局，應該以武裝抵制蔣介石的陰謀。我們問周恩來是否熟悉已到上海一帶北伐軍情況，他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們，薛岳同他在廣州時就認識，他認為薛岳的思想是傾左的。周已同薛岳手下一人接觸，知道薛岳已有表示願同共黨合作反蔣。周還說如果蔣介石想用薛岳的部隊來壓迫我們，而我們採取堅定的立場，是可以抵抗的。蔣介石的部隊主要還在杭州，由何應欽率領，有的還在福建。周恩來還提及另一支軍隊已到蘇州無錫，師長是嚴重，從前在黃埔當過軍官，同鄧演達非常接近，思想也類似，是軍人中最左的，又很嚴肅，而且對蔣介石很不滿。假設我們採取抗蔣的立場，他那一師可能站在我們這方面（他只說有可能性），至少不會來鎮壓我們……。羅亦農在軍事方面當然不熟悉；他只估計在上海能重新武裝多少人，增加現有工人武裝。但是，另要武裝新的工人分子，需要經過選擇，也許要找工人中已當過兵的，但一下子很難；同時要盡快訓練打槍等，也要準備……。根據羅亦農的估計、周恩來的觀察，對蔣介石還有3月20日（1926年）的考驗，我們都毫無幻想，都覺得只有準備武裝鬥爭抵抗蔣介石，沒有別的出路。這一切都具體化了，大家同意了。

這時，獨秀提出假如我們準備反蔣介石，這是同莫斯科的路線背道而馳的。而莫斯科還是要同蔣介石合作……。當時我們不知道有新的文件，只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五屆執委會第七次全會的議論，尤其是斯大林的演說，以及同國際代表的談話和討論……。大家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反對蔣介石必然與共產國際發生衝突。獨秀是很敏感的，他提出我們不能這樣做，否則同共產國際破裂。我個人是猶疑的，我覺得形勢太危險，我提出是否在這一點上（反蔣）先發動後再同共產國際商談。不然就是坐以待斃。我的意思是「先斬後奏」，先採取行動，以後再向國際解釋。獨秀說：「這問題太大。」周恩來更加疑慮，羅亦農也覺得不行。我們四人談話以後，獨秀請我趕快去武漢，因在上海不能解決問題，那時連魏金斯基也不在上海。共產國際又派了一位新的代表路易（Roy），直到武漢，還有不少其他的國際代表都到了武漢，鮑羅廷也在那裏，多數中共中央委員也都聚集在武漢。瞿秋白不用說了，張國燾到了武漢，譚平山從莫斯科回來，聽說蔡和森也回來了，都直接去武漢。獨秀說現在沒有辦法的辦法，是在武漢找到國際代表，並和中共同志們討論來做決定。我也只好同意，因為獨秀不能離開上海。於是我立即準備辦船票……。剛巧羅亦農來看我，問我是否可以不乘船，而坐火車先到南京？因那裏發生緊急事件。

第二〇章

從南京到武漢：
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兩湖地區革命力量的挫傷——南京事件、中共南京市委會議、國民革命軍第二、第六軍調查顯現反蔣傾向

南京到底出了甚麼事？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第二、第六軍進駐南京市區，北軍潰兵搶劫市區人民；流氓也乘機蠕動，侵犯到外國人。據說有人被強姦……日本領事館一員被殺死。外國人都搬到兵艦上去，下關的外國兵艦就直接砲轟南京，即謂南京事件。

羅亦農告訴我：南京方面一點消息也沒有，引起黨內的困擾。市黨部沒有報告，局勢似乎相當混亂……，所以區委（江浙皖中共區委，也管南京），請你到南京召集市委會議，也不再延擱時日，如果有可能和二軍、六軍內的同志講話，了解一些情形，如有急事，也當場處理好了。並且通知薛文錦（中共南京市委書記）來滬一行，報告真實情況。因此，我退了船票（由石瓊辦理），改乘夜車（3月31日），第二天4月1日早上到南京。

我到了後即到市委黨部找薛文錦。他是同我一起到莫斯科，回國後在上海小沙渡工人俱樂部負責，五卅運動時也在總工會內負責；現在派到南京做市委書記，成立市委員會。我把我的來意告知，當天他召集市委會議。大多同志不相識，只記得一位老同志，侯紹裘，於江蘇省負責國民黨部工作；另有一位女同志，張應春，同碧蘭有來往，負責南京市委婦女運動（後來被槍斃了），還有負責工人運動的同志。我要求薛文錦對南京市的局勢，尤其是國民革命軍二軍和六軍佔領後的情形做一簡要報告。他對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說得很簡單，主要是說南京工作開展得很快，已經在南京幾個大工廠建立支部，黨員也逐漸增加。我也把上海三月暴動以來的變動告訴他們，已經時間很久，到了晚飯時候，薛文錦說如果我知道南京軍事情勢，最好去見李富春。他是二軍政治部主任，薛陪同我到南京青年會址，就是政治部的機關。我同他有接觸是在

1926年的廣州。他很熱情、誠懇，帶有年輕革命家的氣息。到他那裏，他原本報告二、六軍佔領南京的實情，以及帝國主義兵艦炮轟及市內混亂等情形，也簡單告知二、六軍內部情形。他留我晚飯，並請我住在二軍政治部。

當晚李富春見到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二軍正式軍長是譚延闓，已去了武漢），告訴他我到了南京，問他是否想談談。他一口答應交換意見。晚飯後，李伴我去見他。魯滌平住在原督軍府。他是胖胖的，樣子平庸，見面客氣一套。我問他對現在情況有何看法，他也許真是老實，也許是謙虛。他說，我是軍人，對政治外行，不甚了解，不表示意見。可能是真話，也可能是外交。我說：看來武漢同蔣總司令間有很大糾紛和衝突（我是根據武漢3月16日國民黨聯席會議的文件）²⁰，可能引發嚴重的軍事衝突。我問他這樣的故事如果發生，你採取甚麼立場？他答說：我把南京、上海就我所知道的情形已報告祖庵（譚延闓）先生，請他指教。我又問武漢同蔣介石發生嚴重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他也承認有這個可能。他說，如果你們共黨同武漢一致，我是軍人，服從命令（也就是支持武漢反蔣）。我們還說了一些不關重要的話。他很客氣，好像是願意合作，稱我為同志。回到政治部，我就問李富春，魯滌平一般的政治態度，因李當然很熟悉，說：魯滌平是老實軍人，政治上沒有甚麼主張，是聽從譚延闓的指示。

第二天，4月2日，李富春陪我到第六軍（程潛的部隊）。程已去了武漢，代理軍長是唐蟒；政治部主任是林伯渠，也到武漢去了，由李世章代理，也是共黨人員，原北大學生，與唐蟒有親戚關係。李告我六軍中有不少政治委員是共產黨員，也有少數同志擔任下級軍官職，這些具體情形。李富春和李世章一起又問我上海情形。我說：上海碰到最大

20 武漢3月16日聯席會議主要是支持汪精衛復職（軍委主席）。汪從歐洲經過莫斯科回國，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對汪早有幻想，這也是蔣介石1926年3月20日政變原因之一。

危機是政府建不起來，毫無辦法。又談到汪壽華受暗害，蔣介石陰謀似乎準備了一個新的政變。李世章看來不很了解所發生的事情，但李富春在廣州有相當時期，比較老練些，更了解我說的情形的嚴重性，說他們相信蔣反共政變很有可能，也從一些跡象裏看到，成為很大問題。但兩李覺得老蔣現時要搞政變，情勢大不同；他沒有很多直接指揮的軍隊，但承認情勢的確嚴重，提議由南京中共市委和二、六軍內的幹部舉行會議，一起討論這個問題。他們即同薛文錦商量，召集會議，在金陵大學理化院一教室內開會，有數十上百人。教室大，坐滿了，多數是軍隊裏的幹部。

我報告關於上海三月暴動事件，不重複報上可看到的。我也講到中央遭遇的困難。尤其是汪壽華被騙去遭暗殺的事故……。各種情況證明蔣介石陰謀政變，非常嚴重。我本來是要直赴武漢，但上海區委託我來南京商談（參加會議的除了一位俄國軍事顧問外，我記得有蕭勁光）。我說，中共有意準備武裝應付蔣介石的政變陰謀。我報告後，大家討論，形成一個共同意見，認為蔣介石如像「3月20日」（1926年）再來一個政變，是不能容忍的。大家認為中共有意動員武裝反抗，是絕對必要。

至於那位俄國顧問，經過翻譯把我的報告轉告他，他從軍事觀點來看問題。他對上海到南京的軍情清楚。他知道薛岳和嚴重兩人不滿蔣介石。只有一支在龍潭（南京附近）的軍隊，是劉峙部隊，忠於蔣介石的。二、六軍是反蔣的，假設中共決定軍事行動對付蔣介石，薛岳同嚴重就是不站在我們方面，也會保持中立，但有可能站到我們方面。至於劉峙的部隊是容易解決的：由二、六軍派部隊去就行了。所以情形不很嚴重……。他是以軍事專家來分析情勢。這和周恩來的見解很相符合。

他們大家問我是否代表中央，下一命令他們立即準備軍事行動，先解決龍潭的劉峙部隊，再派兵到上海，這把我倒難住了。我說這樣重大的事情，我個人不能下命令，就是上海中央也不能冒然決定。因為這樣

是同共產國際路線衝突。我們必須先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正為此事我去武漢同國際代表討論決策。參加會議的幹部們也不敢有異議。他們不管國際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只說讓我去武漢商議，他們等候中央的命令。

我當時也有這樣的感想：情勢急迫，不知蔣介石甚麼時候下手，特別覺得困擾。正逢有一艘二、六軍的運輸船去武漢，要我同船去。船上相當舒服，有管理的同志，可是行得很慢。日間同志們常找我談話。到了4月10日傍晚才到武漢。次日通知交通處，是最可靠的同志，再由他通知瞿秋白，盡快召集國際代表和中央委員們開會，聽取報告及討論上海發生的嚴重問題和決策。因瞿秋白通知需要時間，到4月14日才召集會議。這時蔣介石在上海政變（4月12日）已經發動，情勢更顯得嚴峻。

這是在武漢第一次召集「中央」，主要參加同志有譚平山，瞿秋白，張國燾和我，國際代表鮑羅廷和路易。由於上海蔣介石政變，雖然由我做報告，關於三月暴動，已成過去事了，不必詳細述說經過，只是比較扼要地講到蔣政變前上海的情勢和南京的近況，以及我同獨秀提出準備武裝對抗蔣介石，也因他先發制人而成了現實問題。我特別提到駐南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軍是站在反蔣方面的；至於駐上海薛岳和嚴重的部隊，不知現在怎樣，所以最後我提議在武漢應該動員所有左派人員，並命令在南京的第二、六軍發動攻勢，討伐蔣介石。我說完了話，大家發言。譚平山首先發言，說廣州來電報（當日下午），李濟琛有叛變行動，主要是對付共產黨，可見是和蔣介石預先同謀，步調一致。譚平山主張調動軍隊向廣州出發，保衛革命後方，否則更危險。隨後是鮑羅廷發言，給我印象深刻。他習慣發言很長，他說如果要調動軍隊，幫助二、六軍去對抗蔣介石，我們的軍事力量不夠。現在北軍大批軍隊集中在河南，雖然上海局勢嚴重，但是我們還是應該動員所有軍事力量來對付河南的張作霖駐軍。而且在陝西方面，閻錫山也在反戈，所以我們應先向北進軍，繼續北伐，打到北京，再反過來對付蔣介石。他還補充說：

即使北伐這一着失敗，還可以向西北方面進展，向甘肅、新疆方面發展，得到蘇聯的支助比較容易。這就是鮑羅廷的西北發展論。

最後是路易發言，他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武漢，是革命的根據地，如果不加以鞏固，北伐不能向各方面進展。他說兩湖（湖南、湖北）情勢嚴重，必須用全力加深兩湖工農運動，讓革命深化。他也提到土地問題很嚴重；如果能把土地革命推向前，獲得群眾的擁護支持，鞏固武漢政權，再看情形酌量……。

因此，在會議上得出四種不同意見，對蔣介石政變的討論無結果，說要重新考慮。那時汪精衛已到武漢。這個問題認為要同國民黨方面商議，同時快要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所以已經通過上海蘇聯領事館打電報給獨秀，要他趕來參加，全部問題歸結到中共第五次大會來討論、決定。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會議，反映領袖們的態度。我個人的意見很清楚，是要動員武漢方面的軍事力量來討伐蔣介石。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

大會的前奏：陳獨秀是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前幾天到武漢；他在蔣介石政變前夕離開上海，在船上才知道這一政變發生。在見面時，他提到和汪精衛的聯合宣言……他說上海右派勢力很強，他已經知道蔣介石積極準備政變，向蘇聯大使館請示，警告蔣快要動手。蘇聯使館人員答說：莫斯科有電報來，說如果真有這樣的事發生，上海工人的武裝必須都藏起來。羅亦農聽見了，大發脾氣，把電報撕去……。總之，自我離開後，上海的情勢更為險惡，這是獨秀到武漢後的初步反應。但他也是在船上才得知上海蔣介石的政變。

我剛到武漢沒幾天，瞿秋白通過「交通」把他寫的小冊子送給我看。我發現這本小冊子主要的攻擊對象就是彭述之，非常驚異，第一次知道實在有這回事。小冊子題目是「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個晚上把

它看完，覺得他實在荒唐。他本是中央常務委員之一，離滬前也不事先告知，在赴武漢船上才寫信「請假」，卻已完成這個小冊子，既未經「中央」討論，卻私自來武漢散發。

除了一些生澀半學院式的，所謂理論性的，重疊反覆的，脫離事實的講解，這篇稿子充滿了對我個人已發表的文稿和發言的斷章取義，加以渲染，而且謊言誣衊連篇，羅織成所謂「彭述之主義」的「罪行」，必要整肅之。而最可怕的是作者原來是一位「中共」的同志，不久之前還經常聚在一起開會的同志，從來沒有說一句表示不同意見的話，直到他突然不告而別，袋裏就裝着這本小冊子，直赴武漢，在把這本小冊子交給我之前，他已經把它暗中散發給一些同志，尤其已到武漢，將要參加中共五次大會的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雖然我是瞿秋白突擊的主要對象，是他的眼中釘，但有一部份惡毒批評的目標是黨的首領陳獨秀，不是指名道姓的批評而已。我才明白他的陰謀是不但要摧毀我，而也是打擊陳獨秀。

然而瞿秋白不僅是散發他的小冊子，並且和李立三、蔡和森立即秘密成立三人小組，以便在幕後操縱中共五次大會的策劃和進行。這些行徑不久就在中共五次大會一開場就暴露出來。

我知道譚平山沒有參加這個小組，至於張國燾，當時是武漢黨委書記，也不在內。

說到張國燾，本來自 1926 年 3 月 20 日蔣介石政變後一直留在廣州，1926 年未跟隨北伐軍來到武漢。那時武漢黨書記原來是彭澤湘（代替陳潭秋），但彭澤湘被唐生智請去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於是張國燾自薦擔任了武漢書記職。他因此就得意起來，整天同各方要人接頭拉攏，忙不過來。整天夾着一隻皮包，但並不是真正做書記應做的工作，而是政客式的交際。因此對於中共五次代表大會的佈置程序完全交給瞿秋白、李立三和蔡和森在幕後佈置。他們偶然也開一個純形式性

的會議，讓獨秀參加，但把我完全撇開，而我當時還是中央常務委員，但從來沒有被邀參加會議。瞿秋白當然是主導人，他們連五次大會每日討論甚麼問題的程序，和主席團人選都事先決定好了。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而獨秀也都不知道。

在中共五次大會前後，獨秀和我住在同一間三層樓房內。是唐生智軍隊沒收的，通過彭澤湘給我們住的，蔡和森也住在那裏。獨秀當然看了瞿秋白的小冊子，但保持沉默，平時他很幽默，常開玩笑，但現在完全不同，他懂得秋白在搞鬼，但不知怎麼應付。因他不清楚黨的組織原則……；連我是直接受攻擊的人，也沒有甚麼反應，也不行。

總之，中共五次大會的籌備全由三人小組組織秘密包辦，獨秀偶然參加，是形式上敷衍，而把我完全孤立起來。只有一次會議，討論土地問題，他們請我參加。出席會議的有獨秀、和森、秋白，目的是為了通過一個土地問題的決議案，說來說去，是根據國民黨 1927 年 3 月 16 日聯席會議的土地問題決議案，裏面提到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中小地主除外，尤其是要保衛軍官家屬的土地（說得好聽些是兵士的土地）。我的意見是應該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對這問題，獨秀當時表示軟弱點，說要等到北伐軍打倒北方（繼續北伐）後再解決土地問題。最後大家說要尊重國民黨（汪精衛）他們的主張，當時農民已經開始要求土地……，在這次會議上，不知為甚麼事故，獨秀突然發怒，衝出來說秋白是為了老婆鬥爭……。這就是我唯一參加中共五次大會以前的「中央」會議。

這裏要說到剛從莫斯科回國的蔡和森，也完全變了。過去是清教徒，人還誠實，一直到我和向警予事發生後，他對我也不介避，態度還好，因為他知道向警予。1925 年 12 月他去莫斯科，住了一年半才回來。我這次在武漢見到的蔡和森，宛若兩人。他表現輕浮，無聊的話多，有時突然狂笑……。我後來想他是在莫斯科染了斯大林時代的風氣，當時只覺得他完全變了。瞿秋白就竭力拉攏他，兩人打成一片。他們之間說些

甚麼，我們當然不知道。至於李立三，自「五卅」總工會封閉後還幹到1925年10月間才離開上海，到河南，在廣州參加1926年5月間第三次勞動大會，還是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這是瞿秋白拉攏他的原因。我們比較熟悉他的性格，本來就帶點流氓氣，投機看勢力，所以他參加瞿秋白的小組織也不是偶然的。

譚平山也看到秋白的小冊子。秋白要拉攏他，他不理會（這是路易告訴我的）。譚平山對陳獨秀個人忠實，對我不但是同志，而且有友情，心裏厭惡陰謀家，所以對我特別表示好感，有同情安慰的意思。

張國燾可能洞察瞿秋白的計謀，同他保持距離，而實際上已有衝突。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實情

這次代表大會從1927年4月27日啟幕到5月6日閉幕，是在漢口一個小學內召開的；大禮堂可容納一百到兩百人，倒是中共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的會議，過去都是秘密的，而這次有國民黨的領袖來演講。這次大會比第四次代表大會完全不同。由於革命的發展，這時已增加到六萬黨員。事實上還不止，因有些地方沒有記錄；青年團員人數相等，也許更多一些。中共的規模還不是一個大黨，但已成為一種勢力，而最重要的是它把成千上萬的工農群眾組織起來，是真正的群眾黨，同國民黨相比更是明顯；國民黨沒有甚麼群眾。這次會議是革命時代最後一次大會，也包含一些有象徵性的事物，比如大禮堂講台後牆掛了兩大像：孫中山和列寧，下面貼的標語「三民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這些都是瞿秋白的小組織佈置的，不像是中共黨的大會氣象，大家看了很刺目。

第一天是開幕典禮，由陳獨秀致開幕辭後，即請來賓汪精衛等演講。陪他來的是徐謙，當時是武漢最紅的人物，因他代表馮玉祥，又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從廣州來到武漢，大家認為是最左，反蔣介石也最厲害，尤其在國民黨3月16日聯席會議上。所以汪精衛並不同譚延闓一起來，

而同徐謙來參加中共大會，是另有涵義的。

汪精衛演說的內容我很難記憶，還是那一老套：國民黨（左派）應該同共黨更密切合作；他代表國民黨來真誠同中共合作，把革命推向勝利……。這一套爛調，說了一個多鐘頭，東拉西扯，完全是外交，虛假的，當然中共代表們熱烈鼓掌，尤其是李立三之流，因為他們真正相信汪的誠意。至於我呢，我從來對他沒有甚麼幻想，對國民黨左派一向如此。當時只是冷靜觀看……「中共」方面不知誰做代表向汪精衛恭維捧場……這就是大會開幕典禮。

第二天主要的節目是共產國際代表的演說：路易是共產國際全權代表，更是這次大會政治上的「首位領導」，而鮑羅廷只是蘇聯國家的代表。他的發言是大會開始第一個正式演講。他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一會後一直留在莫斯科，參加起草「殖民地決議案」。這次共產國際指定他來指導中國革命，首先就是指導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他的講話很長，其中有一段是代表共產國際的方針，由伊羅生書中引出一段值得參考：「國民黨內階級分化加強它的左翼和共產黨的聯合。大資產階級脫離國民黨使它變成一個由工業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也包括某些資產階級）組成的革命的聯合體……·中國革命繼續在各階級聯盟的基礎上進行，而還不能接受無產階級獨一無二的領導……·國民黨的領袖們參加（中共五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典禮，而且宣佈他們決心鞏固和共產黨的結盟。」²¹

這裏路易並沒有提到蔣介石4月12日政變，而全部集中在當時的「新局勢」是有利於加強同國民黨左派的合作……。他講完以後，像瞿秋白他們簡單地表示贊成，沒人敢說與他意見不同的話。當路易講完，在第三或第四位發言後，我站起來說話。我不正面評批他的意見。但是着重

21 Marold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dford, 2nd Revised Edition 1961, p.218.

指出上海事變，即蔣介石 4 月 12 日的政變，對整個局勢有極大影響，並且追溯到 1926 年 3 月 20 日政變；認為 1927 年 4 月 12 日的政變，乃是前一次政變邏輯發展的結果。因為我們的黨對蔣介石第一次政變採取了極端妥協的政策，不但沒有對他採取任何抵抗行動，反而完全承認了他在政變中攫取的一切權力，接受他的「黨務整理案」，讓他建立軍事獨裁，並且以全力支持他北伐；在北伐過程中，對他所表現的反共，壓迫工農運動（我舉了一些事實，蔣在江西國民黨改組時壓制左派，禁止農民運動，屠殺贛州工會的會長……）的行徑盡量容忍，因而不曾採取任何有效的辦法制止他的新政變。同第一次政變一樣，第二次政變也沒有遭到我們方面任何抵抗而自由無阻，這是政策的錯誤……（暗指共產國際，但不明白說出）。因此，我要求大會首先對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進行徹底的討論，以便從中得出教訓，做為會後的政治方針。

在我發言後停會休息時間內，在學校禮堂外的操場上，路易跟在後面來同我第一次私人接觸，同我握手，說些恭維話。他說「你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可是我要求嚴肅討論過去以及「四·一二政變」這一點，他表示緘默，從來沒有提出來討論。只說，你的演講和其他的講辭都已電送到莫斯科。為甚麼在大會上沒有討論呢？當時我不知道底細，後來才知道路易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不要翻舊賬，只顧未來」；因此我所建議要討論的問題無形中取消。後來我才知道斯大林在 1927 年 4 月 21 日有一提綱，後譯成中文，裏面有一句話：過去通過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意思是不需要討論。路易當然已接到電報，把斯大林的演說和提綱交給他。而我一無所知，還奇怪為甚麼不討論這個問題……。結果就把路易的演說的結論當做提綱，決定大會的政策。換句話說：過去的是過去，因為是斯大林負責任，不用討論，只談今天的問題，就是怎樣合法地和汪精衛的國民黨謀取合作……。所以這次大會開了將近十天，說來說去，還是怎樣保持同國民黨左派政府合作。

至於農民問題，討論的目標是怎樣制止「農民過火」。當時湖南農民群眾已經舉起要求土地的口號，有很多湖南地主逃到漢口向國民政府請願，形成一個沉重的壓力……。所以一切問題都集中到一個問題：如何設法緩和農村的衝突，也就是土地問題。而工人問題相對地沒有那樣嚴重。但是當武漢公司職員罷工時，也發生緊張情緒。而這次大會對這一切都不能討論。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認可它和國民黨 1927 年 3 月 16 日聯席會議上提出的建議：中共派出兩位黨員參加武漢聯合政府；即由譚平山任農政部部长，蘇兆徵任勞工部部长。事實上，他們已經參加國民政府，現由大會追認而已，名義上是希望這兩位共黨部長保護工農利益，而實際上是使國民黨左派滿意，也就是怎樣抑制工農活動的「過火」。

路易演說後兩、三天，陳獨秀做黨活動的報告，包括從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來整個局勢的發展：從五卅運動到北伐，和北伐開始後北方工農運動的進展，以及最近的三月上海暴動，做了一個相當詳細的歷史性的分析，並提到黨在兩年半內擴大到全國範圍，人數有大幅增長，也提到上海 4 月 12 日蔣介石政變，就他離滬前所知道的情形，同我在 4 月 14 日在武漢開的中共擴大會議上說的大體上相同。他說當前的問題是如何同武漢政府合作，在某些問題上做若干讓步。比如在土地問題上，應該接受國民黨左派的條件。總而言之，獨秀的報告還是根據共產國際，也即路易的立場，而且報告事先和路易、瞿秋白、蔡和森等討論過的（我當然沒有參與），是帶妥協性的。後來就根據路易的演說和獨秀的報告，做了兩個正式決議案（政治決議案和土地問題決議案）也沒有好好地討論，匆匆地做好決議案，加以通過。明顯的是符合於斯大林 4 月 21 日關於中國問題的演講、強調與國民黨左派合作；武漢是革命的中心，而和共產國際五屆執委會第七次全會全力支持蔣介石的決定，背道而馳。

這裏必須說一下獨秀的報告裏表現思想上的不平衡。有時特別敏感，有時存有偏見。比如他和汪精衛 1927 年 4 月 4 日聯合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所表達的也不是他平時一貫的主張。他到了武漢後，盡可能和國民黨左派謀取合作，對汪派不採取防衛，對蔣介石政變的教訓也沒有分析。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整整開了十天，到快要結束時，有幾件事要提到。首先關於選舉領導機構問題。大會主席團是由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加上陳獨秀組成，完全由這前三位操縱，是由這三人小組織提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名單。我是被排斥在外，但當時我同獨秀住在一起。他開會回來對我說，秋白反對把我和羅亦農的名字排在下一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內，可是遭到路易的阻擋。秋白說我們兩人對上海事變要負責任。路易反駁說：這個你不能說，彭述之是老的中央委員，不能由他一人擔起過去的責任，羅亦農也不能對上海蔣介石政變個人負責，所以不能把他們兩人的名字取消。秋白不做聲了，還讓我和羅亦農的名字放在下一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內。

大會結束之前兩天，路易來找我，想和我談談一些問題。我到他漢口辦公處，在一座很堂皇的大廈內一寓所。這座大廈原來是一家外國大公司的辦事處沒收下來的。他徵求我對一個問題的意見。他說：現在有許多反對陳獨秀做總書記。我就反問他，是甚麼人呢？有甚麼理由呢？逼得他不得不直說：反對陳獨秀做總書記的就是瞿秋白。關於這個問題，他們有一次談話。秋白說，獨秀犯的錯誤太多，不能再做總書記。路易反問他：誰來做呢？秋白不做聲。路易追問：是不是張國燾？秋白不做聲。路易又問：是不是譚平山呢？秋白也搖頭不應。路易馬上懂得是指他自己，但不能明說。於是他對秋白說，既然沒有別人可做，還是由獨秀繼任吧！路易對秋白不信任，覺得他不誠實，親自對我表示很不以秋白的作法為然。大概這也就是他後來堅持獨秀繼任總書記，秋白也不敢

反對。我在莫斯科就認識路易，私人關係還好。

在黨五次大會期間，我個人接觸的關係很多。其中有北京的代表團特別來找我，劉伯莊，陳喬年，何資深是代表團重要人員。他們對我說感到大會氣氛很壞，他們也已看到瞿秋白攻擊我的小冊子。覺得黨現在變了。這種作風是過去從來沒有的。極感不滿。他們於是問我的意見。我答說：我也沒有辦法，你們親眼看到，也知道情形，你們也看到獨秀的處境。他們說：你應該表示意見，尤其應該對瞿秋白的誣讎加以反駁。我說：我是準備發表意見，但我看沒有甚麼大用處。過兩天後，我在大會上聲明要對瞿秋白的小冊子做答覆。首先從事實上來看，完全是偽造；他引證的事不符合事實，引用我的話也是同我說的相反，提到過去犯的錯誤，我也應該解釋。我剛說到這裏，李立三在主席團裏突然有人站起來截斷我的發言，說我們現在不是討論私人問題，是討論重要政治問題和政策問題，阻止我說下去。他們主席團幾個人都同意把我壓下去。那時在台下有鄭超麟，王若飛等大聲抗議，還有幾位湖北同志都表示抗議，認為太不合理，太荒唐……，可是另外有一名甘為瞿秋白做小卒子的上海青年團代表劉昌群，用可惡的態度反彭述之主義。

劉昌群，這個現象值得一提。他原是上海中共青年團執委會一員，我經常出席他們的會議。過去對我巴結得令人討厭，連他父親（是老同盟會員）也帶來見我。劉是共青團代表來參加大會的，他反映當時武漢一種情況，黨內的一種傾向，完全不看真實情況，不顧政治思想，只看力量，哪些人要倒台了，哪些人要掌權了，就附和誰。劉後來被捕，馬上叛變了，投降國民黨。

中共五次代表大會的結束和選舉領導機構

除了兩個決議案，「政治決議案」和「土地問題決議案」匆匆通過外，主要程序就是選舉領導機構人員。原來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中央執行委員

會是七人，候補二人，是很嚴謹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全然不同：大會最後一天，由主席團提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名單，正式中央委員有二十九人，候補委員有十一或十二人，共四十人左右。當然黨員人數的增漲是擴充中央領導的理由之一……，被選入中委的新人有李立三、鄧中夏、羅章龍、以及劉伯莊等人……。中央領導機構有所改變，從中央執行委員會組成一個十餘人的政治局，而在這上面是常務委員會（另組書記處，執行日常事務），就是三層領導機制，直到現在中共延用的由來。常務委員會有五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張國燾，是黨最高的執行機構，在選舉政治局時，雖然路易堅持羅亦農和我加入，但由於瞿秋白小組的操縱，我們沒有被選。政治局除常務委員會五人外，另加上譚平山、李維漢、周恩來、蘇兆徵等，後來加上張太雷。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的政治局和常務委員會人選的過程裏，立即發生人事問題。張國燾本來是武漢黨委書記，被選進常務委員會，當然不能再兼任此職。由誰來繼任呢？武漢湖北省委書記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武漢是「革命中心」。大概是張國燾提出羅章龍，已是中央委員，又是北方鐵路工會負責人，北方工人運動報紙的主編。馬上有人反對，主要是李立三。然後擁護瞿秋白方面的人提出張太雷。他一向做鮑羅廷翻譯，有人反對，說他不夠嚴肅。另外有人提出趙世炎，是上海最積極領導罷工的領袖，在滬眾人皆知，有被蔣方捕捉的危險，應該調一調。但結果還是瞿秋白提名的張太雷被通過為武漢黨委書記。我當時的印象是大家以為革命勝利了，要抓地盤，這裏是張國燾派和瞿秋白派兩方面爭取武漢的地盤。

然後是湖南省委書記的問題。黨省委書記本來是李維漢，但他做了政治局成員之一，照理應該另派書記到湖南。那時認為湖南黨支部是最有力量的。獨秀提出我去湖南接任黨支部書記職。瞿秋白，李立三反對。李維漢自己說：他雖然是政治局一員，還是可以回長沙兼任黨委書記

職……·因為他熟悉湖南情勢……·這樣就把我派到北方區委做書記。當年4月間李大釗和二十餘共產黨黨員在北京蘇聯使館被捕處以絞刑。北京形勢危險。中央就派我去代替李守常，瞿秋白，李立三等的詭計是很清楚的，認為北方最反動，把我送去那裏是死路一條。這也表現他們爭權爭地盤的情景。

毛澤東在當時的情況怎樣呢？他根本沒有選入中央委員會，他連大會的代表都不是（要有一個地區選他為代表，武漢沒有人選他），照理湖南黨委應該選他，但當李維漢代替他為湖南省委書記後，就把他排除了。自此以後，毛澤東對李維漢是一直厭惡的，而李維漢也是一個十足的陰謀家。

總而言之，這次會上討論了很長時間，黨的上層感到政權差不多已經在握，各人各派為了爭取地盤，不惜用盡腦筋，主要是瞿秋白派和張國燾派角鬥不已，尤其為了攫取兩湖的地盤。可見黨已墮落了。這第五次代表大會就是共產墮落的象徵和實證。

在黃埔軍校講演「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中共五次代表大會閉幕後，我本來被指定去北方，執行北方區委書記職，首先到河南，但是河南正是國民革命軍和張作霖軍交戰的地區，交通阻斷，我就一直留在武漢，有一個多月。

碧蘭和我原來住在獨秀同一所房子內。有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也在這裏開會……·蔡和森也住在那裏，但他對我態度惡劣，連一句話都不說。譚平山知道這種情形，請我搬到他那裏去住。他是國民黨政府的農政部長，在漢口有一所三樓三底的中國式的屋子，是他私人寓所，除秘書和守衛以外，沒有他人。我們接受他的邀請，大會完數日後就從獨秀住處搬去，感到相當自由，心情也舒暢一些。同譚平山經常有友誼的交談和接觸，同時第一次見到碧蘭的父親，他在農政部擔任一個秘書職務。他

看到碧蘭快要生產，就特別到他故鄉黃陂找一位姑媽來幫忙，照應生活上諸事，日常生活大有改善。

大概是5月10日過後的一天，施存統派了他妻子鍾復光和另一位女同志來找我，邀請我到黃埔軍校（分校）（鄧演達一到武漢就建立起來）舉辦一個特別講座，演講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全由我自己支配時間，由軍校負責我從漢口住所到武昌軍校的交通。我考慮一下後就接受了。那時黃埔軍官學校的教務長是譚代英，施存統除了教職外，還有重要職務。

我講話的主題應該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我花費了相當時間思考一些提綱。既然必須講革命當前的現實問題，就不能不提到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也就不能迴避說到武漢政府的處境。而我當時對武漢政府看得很清楚，已不存在任何幻想，這倒是一個大難題。

經過兩星期緊張收集材料，花了很大的功夫，重新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帝國主義侵略與軍閥戰爭對社會的影響，並分析社會各階層……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中國革命的前景，目前革命根本戰略問題，聯合政府問題，我整天整夜地工作，每隔一天去演講，我講了八、九次，每次二小時以上，聽講的軍校學生是經過選擇文化程度較高的，有三、四百人（軍校學生總共上千人），記得還有女學生，如謝冰瑩（即後來寫「從軍日記」的冰心）。這次，鄧演達是在醫院裏見到，沒有機會談話。

我演講碰到最困難的問題是怎樣形容武漢的國民黨和它的政府。正如我上面已說過，我覺得國民黨左派，即汪精衛派沒有前途。但是既然共產國際和中共仍堅持要和它合作到底，支持武漢政府，希望它能解決革命的重大問題……我也只好採取他們的定義：國民黨（左派）是由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組成的。我雖無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公開反對，尤其是在黃埔軍校學生面前……，而只能承認武漢國民黨政府代表工、

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我雖然按照這一路線走，但着重提出三要點（這是我私人意見，不是黨一般的意見）：

一、只有當工人起來領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時，革命才有希望。這個論點並不直接觸犯國民黨左派，但它感到不是滋味，很是討厭。

二、在革命演變到一個相當水平，它從民主主義階段走向「非資本主義」（根據共產國際的官樣術語）的前景，換句話說，走向社會主義的階段。這是我引用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事實上，依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論點，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尾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必須經過相當時間才能達到成熟階段，走向社會主義。但是列寧有一個簡單的解答，落後國家並不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充份發展而走向社會主義，而是通過蘇維埃制度。我是引列寧的話用在中國的例子，證明有可能通過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在這些演講中，我極力對革命「不斷」性的過程鼓足氣勢。

三、我特別強調土地革命，說得很多。為甚麼呢？因為在中共五次代表大會以後，國民黨左派實際上已走向反動。那時在國民黨左派（由汪精衛代表）和中共（主要是陳獨秀，有時譚平山、鮑羅廷參加）的聯席會議上，國民黨要求中共壓制兩湖農民運動的「過火」行動，說他們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鄉下地痞，胡作亂為……。這種威脅的氣氛非常濃厚，逼得中共接受這一要求。於是通過由李立三主持的工人運動委員會（李立三又是武漢政府勞工部秘書長）下命令抑制工人「過火」行動；又通過由瞿秋白主持的農民運動委員會發指示要抑制農民「過火」行動，當時毛澤東被選為全國農民協會的臨時主席，秘書任旭，也發令給各地農民協會，防止「過火」（雖然毛後來加以否認）。譚平山在武漢政府的農政部當然也發出給兩湖各縣政府同樣的指令。抑制「過火」行動成為武漢當時最普遍的口號，滿城叫囂，從上至下，從國共聯席會議到政府農、工部門，到工人和農民組織，責令執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得不為農民運動做辯護。在我演講的書稿裏有好幾段的評述。我講農民運動發展歷史有三個階段：第一是反抗苛捐雜稅運動，這種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反對軍閥和貪官污吏的剝削，是比較政治性的。第二個階段是抗租減息運動，這種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反對地主階級和重利盤剝的商業資本的剝削，是經濟性的，並且是階級性的。第三是奪取武裝，奪取政權，要求土地的運動，現在便到了這個運動的開端，這是農民運動之最後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從湖南農民運動表現出來。現在湖南的農民已經起來奪取武裝奪取政權了。已經要求根本解決土地問題了。湖北也有同樣的情形，這種現象證明中國革命確是到了一個最深入的階段了，農民革命的階段，土地革命階段了。……這是真正的「農民革命」，是真正徹底掃蕩鄉村一切封建與宗法的殘餘勢力的革命。是根本掃除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鄉村剝削基礎的革命。所以目前這個農民革命可以代表整個的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質。這是我對當時農民革命的真實歷史作綜合的嘗試。

當然我承認在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有些行為並不符合一般農民的要求。比如一些貧農發動「平產主義的行動，不僅要分土地，還要把地主家的金錢、傢具、存穀都要分掉……；這種情形是有的，但不普遍，並不符合農民革命的基本要求，但有某種歷史根源。我最後說：首先是土地國有化，以後再分給無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農民，這也是按照俄國土地革命的經驗。

這裏我說到建立農民政權，先要解決農民武裝問題：農民不先奪取地主階級的武裝，是說不上政權的，更說不到解決土地問題。但是有些「革命黨人」說，農民如果有武裝一定要鬧亂子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反對地主階級的……，但是革命黨是否怕農民反對地主階級呢？可是他們都忘記了，從前以至現在，地主階級有武裝的地方是專門在那裏屠殺農民呢！我們可以說，反對農民武裝的人，客觀上即是代表地主階級反

對農民，主張地主階級屠殺農民的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181-182頁）。這些要點的陳述當然有很重要意義。

我也談到軍隊問題，革命軍隊主要操在國民黨手中。經過蔣介石和李濟琛的政變而現時又有許克祥、夏斗寅等的叛變，國民革命軍內演變情況複雜……。這個問題太現實，我不得不謹慎處理，不能提出我的主張和具體辦法，認為是革命的一個大危機。

但是這個危機是怎樣來的呢？這是因為革命軍隊的構成分子，已不適合於革命的深入，不適合於農民革命的階段，現時革命的構成分子，在兵士方面除少數是來自鄉村的真正農民外，其餘大多數是流氓無產階級，是久經失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在軍官方面又很多是中小地主階級出身，甚至是土豪劣紳出身。流氓無產階級，我們已經說過，是沒有確定的階級意識，是很容易受上級軍官們的鼓動的；至於地主階級出身的軍官，見到農民要政權，要土地，根本危害他們的階級利益，於是便不能忍耐了，便要鼓動士兵來反對農民，屠殺農民了……；所以這班地主階級的軍官先生們，有一共同的意見和口號，便是：「農民搗亂後方」，要打仗需先「解決農民」。他們在兵士中是如此宣傳，對政府是如此條呈，因此形成了近來革命政權的搖動狀態，革命的大危機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186-187頁），當時中共對國民革命軍的組成毫無分析，我這是第一次嘗試。我的結論是重新的改變革命軍隊的結構，有兩層辦法：（1）在現有的軍隊中，盡量增加革命農民和工人的分子；（2）解除地主（尤其是土豪劣紳）出身的軍官的職務。這樣使國民革命軍變成真正為工農利益服務的革命軍隊。

的確，當時兩湖工農群眾已經差不多都組織起來。但軍隊還受國民黨控制，在工人、農民和兵士之間，有一座不能逾越的高牆，阻礙他們聯結起來，對抗反動的軍官……，這正是革命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已抓住這一要點，但受制於黨的政策，我只能提出問題，而不能建議

實際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黃埔軍校的演講裏，我把土地革命定為核心問題，而走向非資本主義的路線，成為革命的前景：這是我當時的見解，但是實際上如何實現？我明顯看到國民黨裏完全辦不到，雖然我已經有工農兵蘇維埃的觀念，但無形之中還是受莫斯科政策的束縛，依靠國民黨左派。所以把問題提出來，但不能具體解決，含糊其詞，這是我演講中的一個缺點，必須反省的。

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是由於工人和兵士蘇維埃同農民蘇維埃聯結起來，才使反動軍隊內的兵士倒過來完成革命……。如果只是講農民武裝，也只能有局部行動，爭取鄉村政權，也是局部性的，不能解決基本問題。所以從歷史觀點來看，只有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才能真正解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在黃埔軍校講座終結後，施存統要求我把演講的草稿交給他，準備發表。我答說，我自己來整理，因為裏面有許多經濟方面和工農運動的資料，預備寫出來，費了些時日，完成後送到長江書店，準備出版。廣告已登出，一下子有數千訂戶，紙版也已準備好，當時共黨領導機關知道了，大概是瞿秋白或者是蔡和森（當時是黨宣傳部長）要求看底稿，結果把稿件壓下來，沒有付印……。如果當時印出來的話，一定是有影響的。

我的立場雖然與黨和莫斯科政策有差別，但不太明顯，所以才被中共宣傳部壓下來，暫不出版。一年以後（1928年5月15日），終於由上海中國共產黨出版部出版，名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但同時出版瞿秋白的《中國革命中爭論問題》，當然又另當別論了。

湖南事變（夏斗寅和許克祥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內的叛變）

1927年5月17日、21日事變之前數日，武昌有一個群眾大會；參

加的主要是黃埔軍校的幹部和學生，以及北伐各軍（葉挺軍在內）派出的許多代表，共有四、五千人。上台演講的國共領袖是汪精衛、陳獨秀、彭述之。這種群眾大會是帶象徵意義的，但演講內容是空洞的，口號式的；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打倒北洋軍閥」那一套。陳獨秀私人談話是很有風度的，但在這樣的大會上就很難應付。汪精衛，我是第一次晤面，由留法學生李鶴琴介紹。

當我還住在獨秀那座屋子裏時，獨秀和我倒很親密，常常一起談天。當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三人小組人員（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都敵視他。他很孤立，個人很苦悶，對革命有點失望悲觀。我離開他住處後，在軍校演講很忙，相見很少。

許克祥和夏斗寅的叛變

1927年5月17日，國民革命軍在湖南長江上游駐軍一師的統率，夏斗寅，發表宣言公開反共，向武漢進逼。在他背後有一個四川小軍閥楊森（投向國民黨方面）的支撐。這個叛變在湖北引起巨大的轟動。各地土豪劣紳群起響應，因他是代表這一階層，一時湖北鄉村政權動搖，國民黨怎麼辦？汪精衛是反對夏斗寅這一舉動的，但不能有所作為；在武漢他能夠調動的只有張發奎的第四軍，其他都是雜軍。這時共黨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即由葉挺率領的一支軍隊，再加上黃埔軍校分校學生為主力軍和其他軍隊配合，在幾天內打垮了夏斗寅軍，其潰敗的部隊逃到湖南東部。雖然夏斗寅的威脅已被摧毀，但在湖北境內數十縣區內的土豪劣紳，竟然肆無忌憚，武裝進攻農民協會，施行屠殺農民協會會長、會員、共產黨以至國民黨人，殘暴不堪（伊羅生書中所描述的情形就是根據當時湖北農民協會的報告）。經過土豪劣紳瘋狂迫害各地農民協會之後，農村鬥爭尖銳化，農民運動也有反攻……，但是武漢政府並不積極保護農民協會……。夏斗寅的叛變很可能與南京的蔣介石有聯繫，響

應他 4 月 12 日政變（和李濟琛在廣州 4 月 14 日的政變），反映武漢局勢嚴重。

許克祥的叛變又是一回事了。他本來是唐生智第八軍的部下。第八軍軍事力量龐大，有十萬八萬大兵，但其主要部隊已從湖南調到河南對付張作霖，留在長沙不過是幾千人，在湖南數十縣份也有駐軍。許克祥發動政變，顯然是蔣介石勾結唐部下軍人（何鍵）促成的。

許克祥在 5 月 21 日發動政變之前，湖南省中共黨部是李維漢從武漢回到長沙，繼任黨書記。據說黨方面似乎已知道許克祥準備叛變，後來又聽說唐生智軍已打下河南，到了鄭州，認為唐生智絕對不讓許克祥發動政變……。事實已擺在面前，還看不清，不願承認，還有幻想。

當時中國共產黨是湖南最大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就黨員人數來說，除上海，武漢、廣州以外，長沙的黨部是最大的黨。長沙城內外工會組織有五十萬人，連店員、手工業者都組織起來，長沙周圍的縣份，像醴陵、瀏陽等地，農民差不多全組織在農民協會裏。他們一部份武裝是從地主豪紳那裏奪取來的。這一切形成龐大的勢力。

在許克祥政變前夜，長沙黨方面的確知悉許將有軍事行動。但李維漢等領導同志決定不抵抗，以免犧牲。於是分配給負責同志每人一百，二百元錢，都逃出長沙。剩下數人表面上維持黨部（在長沙城外）。許克祥發動政變時，毫無遇到抵抗，因此許克祥軍隊長驅直進，一下子把長沙所有共黨機關、工會、農民協會，連學校內的共黨組織一掃而盡，被捕的人士就地槍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長沙共黨以及工農組織被消毀了。據說有些長沙黨部的負責人曾經發出通告，要求周圍各地農民協會動員來援救長沙的同志，各地農協果然動員數萬人來支持長沙的革命群眾，但是許克祥把長沙城門關閉，在城牆上用機關槍掃射從鄉村跑來的武裝隊伍，造成很多死傷，沒有結果，又失去了領導，這些援救隊伍只好回到鄉下。

許克祥的長沙政變可以稱為中國第二次大革命中第三次大政變（第一次是上海蔣介石4月12日政變，第二次是廣州李濟琛4月14日政變），對兩湖革命運動可說是一個致命打擊，也決定了兩湖革命前途。

在這次許克祥政變中，共黨犧牲了許多同志，最著名的是郭亮，湖南總工會會長、易禮容，湖南農民協會會長……。

李維漢逃到了武漢，本來中央有人對他有批評，尤其是從湖南來的同志。對這樣一個臨陣脫逃的負責人本來應該處罰，但瞿秋白把他拉到政治局，李維漢從此擔任組織部部長職。

武漢政府，國民黨左派以及中國共產黨採取甚麼措施來應付許克祥長沙政變形成的局勢？中共事實上是癱瘓的，請國民黨左派來處理這個問題，要求討伐許克祥，可是許克祥是唐生智的部下，問題又牽涉到唐生智。唐當時還在河南，在敵前應戰，汪精衛軍事上完全依靠唐生智，所以有人說汪是唐的小老婆，汪要看唐的態度反應如何。我上面已說過唐這人非常狡猾。他從河南在武漢報紙上發表意見，說些漂亮話，但沒提具體辦法。鮑羅廷找汪精衛商量，獨秀也參加，希望汪調動部隊開往長沙，平服許克祥的叛變力量，恢復長沙原來狀況，可是汪無軍隊可派。於是他們提出一個辦法：先派一個代表團到長沙去調查，有了結果再行處理。最妙的是，這個代表團包括鮑羅廷，譚平山，陳公博（或者鄧演達也在內）。我是從譚平山那裏知道有這件事。當代表團到達湖南邊界，許克祥來個電報（汪已有電報預先告許），說如果代表團來到長沙，他就立即逮捕。這真是對武漢政府的諷刺，變成笑柄。既然汪毫無辦法，就請示唐生智，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力量。

唐生智把河南的事情安排好了，回到長沙，經過所謂「調查」，做了一個報告給武漢政府，說許克祥的政變是由於農民運動過火行動激起來的。有許多軍人家屬受到農民協會的壓迫，但是許克祥在發動政變前未事先報告上級長官，違反了紀律。因此給他記過處分，但許克祥仍留

原職，維持長沙的秩序，意即讓他繼續反革命的工作，把整個湖南革命運動，尤其在農村，一掃而盡。這就是過去要求加入中共的唐生智的決定，當然汪精衛收到了報告後，無言可對。於是許克祥一步一步地把湖南各地農民協會打垮；在數月間在湖南造成一個真正的白色恐怖，普遍於鄉村。當然那些土豪劣紳也重新組織他們的武裝來屠殺農民，究竟殺了多少？真是天曉得，湖南農民運動領袖多數逃不出被追殺的羅網。比如我的好友歐陽秋璞，當時是寶慶農民協會會長，許克祥政變後，他逃到另一縣份，在湘西神州一帶，那裏的土豪劣紳想盡方法探知，最終把他逮捕送回寶慶槍斃。這是一個明顯例子。因此大部農民運動活動分子都倒在血泊中犧牲了，只剩下湖北的工農運動，也已殘破不堪了，許克祥政變的後果是中共和工農群眾的華中基地從此也失去了，對中國革命有重大意義。

除了黃埔軍校演講外，我在武漢停留期間，私人接觸的人士很多。這裏先談一下與往昔寶慶中學同班生重逢的故事。

蘇瑞章是長沙書店的會計主任，有一天約我說寶慶中學老同學想見我。到書店的屋頂露台上，見到原寶慶中學同班生：夏秀峯、唐佐和陳常，現在都是共產黨員。他們三位都在唐生智軍內彭澤湘手下做政治工作。夏秀峯是德國留學生，我在 1926 年 2 月到北京開中央特別會議期間見到。蘇瑞章是我在寶慶中學比較接近的同班生。唐佐卻是同班生中一個小集團的領袖。當時我是反對袁世凱廿一條賣國條約的活動分子。他對我十分冷漠，很不友善。陳常雖屬唐佐的小集團，態度比較好，……。我們已經闊別十年有餘，唐佐在唐山工學院畢業，陳常家窮，沒有進大學，現在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的談話都沒有很大意思，我私想他們看到共黨有影響，而且可以到軍隊裏工作，拿薪金，似乎有點投機。果然，革命失敗後他們都離開共黨了。唐佐後來做易培基部下。易培基本來是國民黨左派，後來很反動，上任北京故宮博物館館長，與李石曾同

夥盜竊故宮寶物，運到法國，在馬賽海關查出，變成一大案件。後來故宮寶物由法國政府沒收。

我和毛澤東、彭湃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27年5月尾。毛澤東請我和碧蘭去他家午餐，他那時同楊開慧、岳母和孩子住在一起。彭湃和他妻子也住在武昌一間屋子裏，大概是臨時性的。我們在他家留了很長時間，但對當前局勢沒有多談。因為正是許克祥在長沙反共政變以後，武漢的情形也相當緊張，大家很明瞭局勢惡劣，至於怎麼樣對付，也沒有談及。當時彭湃也是黨中央委員，毛澤東不是，對上層情形隔膜，只是對局勢憂慮不滿。毛澤東感到情勢危險，要求碧蘭介紹給他一個可靠的親戚朋友，萬一武漢發生像湖南那樣的事件，可以躲避一下……，因為他有一家人，他很擔心，問碧蘭有沒有住租界的可靠親戚。碧蘭想來想去，發現有一位在漢口租界一洋行做事的堂伯或堂叔，可以介紹給他。毛很着急，自己起草介紹信，由碧蘭簽名，可見當時毛澤東對局勢的看法很不樂觀，準備逃跑。彭湃也表現頹喪，而且擔心他的妻子，只有二十來歲，是廣東人，沒有到過外埠。彭湃說他自己一旦發生事故可以逃避，但他妻子不一定能帶得走。他問碧蘭是否可安排，碧蘭也很困難，因已快臨生育的時期，自己以後怎樣都不知道，所以很難擔負這個責任。彭湃看到這情形也就不勉強，而且毛、彭都知道我不久要離開武漢到北方去代替李守常……，這裏反映中共高級幹部對武漢局勢的悲觀，是一般的看法，並不是為個人憂慮。

兩天後，譚平山對我說：情形越來越壞，他住的地方是一目標，住在漢口中國地界，很不安全，建議我們最好到法租界找一所住所。因為他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是武漢政府一員，對局勢很熟悉。所以我們很快就搬到法租界，那時是6月初，搬了家沒過幾天我就準備啟程去北方。

在未成行前，我向獨秀告別時，他告訴我莫斯科電報打來一個特別

訓令，內容很奇怪，中央還沒有討論這個問題。我問他為何奇怪？他說訓令有五條，要我們執行，我們中央明後天要討論，但其中有一條我們就辦不到，是要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改組，由我們舉出工人來代替老中央委員。他說這根本是荒唐，因為國民黨不是我們的黨。我當時買了火車票，忙着要去河南（鄭州）也沒有時間和他討論此事。

此外，獨秀又告訴我中央要我在臨行時，同汪精衛見一次面。這事由譚平山替我安排。次日譚平山陪我到國民黨政府首席委員汪精衛的辦公廳。譚平山告訴他：述之同志去北方代理李大釗的職務，國民黨在北京有一支部，問汪精衛是否有意見由我帶去，汪精衛態度非常冷淡，說他沒有甚麼意見，要我到了北京同國民黨人接觸後再同他聯繫。晤面大概十分鐘左右，我覺得毫無意思。我說那好了，我到北京後再聯繫吧！他的面孔，在我告辭時呈現青灰色。

第二章

河南之行：馮玉祥和軍隊，
武漢中共中央特別會議
(1927年6月21日)

本來我從武漢去北方可選擇水路，經上海由海上到天津，或走陸路坐火車經河南到北京。結果是走陸路。為甚麼呢？因張發奎軍隊5月底已差不多肅清在河南的張作霖軍隊，已趕到黃河以北，以為這支軍隊將直驅北京。因此中央決定我去河南再直達北京。萬一戰事嚴重，我可轉經山西到北京。那時閻錫山已投降國民黨，聲明贊成北伐。我是聽黨的報告，不知詳情，決定去河南。

從漢口到鄭州，火車不正常，是軍事狀態，停車次數很多，但也無嚴重事故。大約是1927年6月4日到鄭州，首先要找到劉伯堅，是馮玉祥軍隊中政治部主任。他是陪伴馮玉祥在莫斯科居留，回來沒兩天，住在鄭州青年會總會，成為馮軍政治部辦事處。我是下午到達，他請我下宿在青年會，以便詳告情形。當晚就長談馮玉祥在莫斯科的經過；在那裏馮玉祥即請他回國後擔任他軍中政治部主任。他當時要請示共產國際，沒有正式任職。

劉伯堅，四川人，1919-1920年原是法國勤工儉學生。1923年由陳獨秀決定在法國中共黨員去莫斯科學習，比陳延年較後一點，同王若飛一起來莫斯科，在那裏留了三、四年。碧蘭在莫斯科時，他是負責人之一。他法文說得不錯，中文也寫得流暢，舊書讀了不少……；人比較老練，有三十歲以上，會應付人。所以當馮玉祥1926年到了莫斯科，第三國際和中共就派他同馮接觸。他與馮玉祥關係很好，馮賞識他，看重他，所以請他回來擔任他軍中政治部主任。

劉伯堅對我說：莫斯科方面對馮玉祥有很大的信賴。馮派了許多軍官到俄國學習。馮自己又表示如何熱心研究列寧主義、共產主義，還請劉伯堅特為他講解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科目，真是無所不談。馮玉祥表現得很左，正像蔣介石1923年在莫斯科的表現一模一樣，但蔣沒有那麼多時間，而馮在莫斯科住了將近一年。又請了一位俄國顧問，幫助他整頓軍隊，至於俄國的物質援助更是龐大。

1926年初馮玉祥軍隊被張作霖打敗了，首先退到北京以北重要關口——南口，又退到綏遠、內蒙古一帶。軍隊要重新整理武裝。俄國經過外蒙古運送大批馬匹，武裝、大砲、機關槍、來福槍等，數以萬計。劉伯堅告訴我這些事，指明馮軍武裝整軍完全靠莫斯科。

馮玉祥回國是經過外蒙古、綏遠，避免通過山西同閻錫山軍衝突。當馮軍已到了西安，集中在潼關，是在張發奎軍進佔河南肅清張作霖軍隊以前。馮軍到了潼關也不再向東進，冷眼觀看張發奎軍同北軍交戰，當時北軍張學良配有日本以及白俄武裝。張發奎軍雖然打了勝仗，趕走了張學良軍，但犧牲很大。張發奎的秘書，我們的同志，蔣先雲，就是在這一場戰役中犧牲的，而其他死難者共產同志還很多。張發奎軍號稱為鐵軍。

劉伯堅和我談了一整晚，差不多沒有睡覺。劉伯堅特別稱頌馮玉祥的為人，很樸實，不像普通軍閥。馮提到他的生平：十五歲時當勤務兵，一步一步升級……在他家裏不許兒子穿好衣好鞋。有一次他的兒子買了一雙漂亮的新皮鞋，馮玉祥當着武官的面教訓他一頓，好像面臨審判一樣。這證明他私生活很嚴肅，不像一般軍閥那樣奢侈浪費。劉伯堅還說了許多話，證明馮玉祥很可靠，所以莫斯科信任他，對他期望很大。當然劉伯堅自己對馮玉祥也存有很大的幻想。當晚我見到他的妻子王淑貞，介紹說是西安名門貴族出身，但她倒是身材矮小，麻子臉，是在西安由馮總司令主持結婚典禮，很覺受寵若驚。

在劉伯堅政治部裏時，有一位俄國顧問來見我。他的翻譯官正是我在蘇聯暑假期間和我同住了一個鄉村小學，正想翻譯《獨秀文存》的那個俄人。他見到我時狂熱擁抱，介紹俄國顧問，沒有談多久。一般說他那時相當樂觀，說國民軍現已打到河南了……。他也問了一些武漢的情形，我簡單說武漢情勢不很樂觀。當然他也知道（許克祥事件……）

第二天，于樹德來訪我。他是老共產黨員，是李守常在日本辛亥革

命後留學時代最好友人，稱為「小弟弟」。後來在北方做國民黨工作。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是候補中央委員，1926年1月大會後為正式國民黨中央委員，由北方國民黨和中共派他到河南做紅槍會的聯絡工作。

據說當時在河南有幾十萬農民組織在紅槍會內，于樹德擔負這一工作的主要責任。他告訴我在青年會裏人來人往太雜亂了，請我住到他那裏，在鄭州過去外國人住的區域，很安靜。他開汽車帶我到他家，我住了一兩天就到開封去。他告訴我紅槍會中的情形。多數是農民，也有流氓，但如果組織起來，是一個巨大的力量。他還有一些同志助手，在一起做這聯絡工作。

開封是中共河南黨部所在地，自張作霖軍隊撤離後（1927年5月末），還相當平靜，看不出軍事行動的任何痕跡。我在開封住了三天，當時省委書記是比較年輕的幹部，報告說工作要展開，但沒有人手，主要在開封、鄭州，其他縣份有小組織。至於鐵路工會（粵漢，京漢路）被北軍來侵時破壞了，需要重新組織起來，但沒人來幹，要求我寫信給中央派人協助。當然，他也說到紅槍會，但沒有甚麼農民協會組織，因為黨部太弱。所以我所要談的是怎樣以現有的力量，加強各地組織，最好擬一計劃，在那些地方推動工作，但還是紙上談兵，因實在情形是戰爭剛剛結束，河南黨部、鐵路工會，以及俄顧問團的人員都離開了。黨部很蕭條。當時我立即答應寫信到武漢要求中央派人到河南。我又回到鄭州劉伯堅的政治部。

在武漢的同志們對北方形勢抱着很多幻想，但事實上我不能再往北行，因黃河以北仍是由張作霖軍隊佔有，此路不通。我同伯堅商量是否能通過陝西，再經山西到北京。伯堅說我單獨一人去，無人指路，是很危險的，我不應該這樣冒險。於是我決定回武漢。

在未動身前，有一位莫斯科回國學生，是劉伯堅政治部工作人員，蔡振德，匆匆忙忙地來告訴我一個消息：同他接近的那一師內的兩個共

產黨員，被馮玉祥軍方扣留起來，未知是否是馮下的命令，但這是一個不良的徵象……我臨行時批評劉伯堅對馮玉祥過份幻想，而這個消息表現馮可能對付共黨。我勸他自動辭職為妥。我真對他潑了一盆冷水，他很頹喪。他也承認這幾天來情勢不妙，但他說要見到馮玉祥再看行止，而我仍堅持他自動辭職為上策。

我回到武漢，特別約獨秀談話，報告在河南所見所聞的情況：從劉伯堅口中透露出莫斯科對馮玉祥的期望是多麼高，另一方面我臨走前馮軍扣留中共黨員的消息，表現馮玉祥已準備對付共黨，那只是一個開始。我也勸說劉伯堅辭去馮軍政治部職務……我認為河南情勢非常危險。而且河南的黨很弱，沒有幹部，要求中央討論如何援助。記得我未離武漢去河南之前，不但在國民黨，連在共黨內也存在一種氣氛，都把希望寄託在馮玉祥身上。尤其是當蔣介石、李濟琛、許克祥等叛變後，這種氣氛特別濃厚。

獨秀告訴我，在我去河南一星期來，武漢的情形愈來愈壞。首先是關於莫斯科的訓令（在我去河南臨行前未弄清楚的）。這訓令有五條：

(1) 加速土地改革，但是從下至上，不再提到由國民黨政府來發動，因已失望了。(2) 堅持軍官土地不要沒收，軍官將領中不可靠的分子加以排除；(3) 另外組織由兩萬共黨黨員和五萬工農出身分子的新軍隊；(4) 由工農分子來代替國民黨內不可靠的老黨員；(5) 要組織一個革命法庭，由國民黨有威望知名人士來審判反動軍官。

獨秀說：這個訓令問題太重大，必須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討論，即是有路易、鮑羅廷等國際代表參加。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有一私人代表，是黨五次大會後從莫斯科特派來中國代表斯大林個人的。大家都叫他駝背法爾克（譯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看了這個訓令後，面面相覷，沒有人自願無條件接受。問題是怎樣在目前情況下實行這樣的訓令。比如重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排斥老黨員，根本不能想像，

沒有人覺得行得通的。至於排除國民黨的「反動」將領，誰來幹呢？當然還是請國民黨政府或軍事委員會來執行！我們共黨能提出這樣的條件嗎？這是超乎常情的，不但做不到，連提都提不出來。再說組織兩萬共黨黨員及五萬工農的新軍，即使在人數方面還可能辦到，但武裝槍砲從哪兒來？是否可以向汪政府要求把槍械來武裝共黨和五萬工農分子？這等於說政權已在我們手中了！再者組織軍事法庭同改組國民黨中央是同樣行不通的。會議上就問駝背法爾克怎樣看。他也承認在目前情勢下行不通，可見斯大林用國際名義斷然下了命令，是荒唐到頂點。結果怎麼辦呢？大家決定做如下答覆：這一訓令在現時實際情形下提不出來，只有等待將來有機會再說（根據1927年6月15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電文）。差不多同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開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開會日期是5月23至30日，而斯大林的訓令則於6月1日電報打到武漢。但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還沒有收到大會的文件，也不知內容，後來才知道斯大林有演說，還有決議案，再後來才知道在這次大會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正面最後一次交鋒。斯大林還是強調堅決反對托的建議——在中國成立蘇維埃，認為這就是推翻國民黨，也就是推翻一個革命的政黨，而且武漢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要推翻它就是反革命——這一主張就是破壞革命。托洛茨基當時做反面批駁，認為斯大林對武漢的這一政策，共產國際執委會不能負責，是走向滅亡的道路。托在會議上第一次向中國工農群眾呼籲，要求組織工農兵蘇維埃（這些文件後來收集到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內），當時在中國完全不知道。只有一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決議案的節要，是送給中共政治局的，我當時也沒看到，但後來發現斯大林的訓令同這次共產國際執委會全會決議案的節要不同。總之，中共中央及國際代表都不知怎樣應付這一訓令，這樣就決定拖延執行。正在此刻就發生一件有意義的事件：路易居然把斯大林的訓令拿給汪精衛看。

路易為甚麼把斯大林的訓令拿給汪精衛看？這等於告密，是不可理解的。我前面已說過，路易與鮑羅廷有不同意見：鮑羅廷是反對土地革命的（而路易是力主土地革命的），恐怕引起國民黨左派正面衝突，這不是莫斯科的政策。而路易在5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在這個問題上經常與鮑羅廷發生糾紛（當時我不知道），路易希望加強汪派國民黨，但自從許克祥叛變後，他對一般國民黨軍人不信任，只有對張發奎存有希望，認為他有力量又是革命的軍隊。的確，張發奎是國民革命中最反蔣的一支軍隊，而共黨葉挺的隊伍是由張發奎指揮的。路易當時有一計劃，把張發奎的軍隊擴充形成主要力量……他認為汪精衛還是比較可靠的國民黨左派領袖。當時武漢國民黨內譚延闓是明確地被稱為右派，程潛也如此，都是有實力的人物。汪精衛表面最虛偽，總是兩個面孔。所以路易以為如果汪精衛能站在共黨方面，即同意莫斯科的訓令，來擴充張發奎的軍隊，就有希望了。正因此，他主張與汪精衛開誠佈公，把「訓令」給他看，希望他同意……。汪精衛問他是否可以給他一個副本，就有了證據，他立刻下決心準備「清共」。鮑羅廷知悉此事非常反對，即把事件報告莫斯科，不久來電報把路易調回去，就是撤銷他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代表職務。不久就回莫斯科，此後沒有消息。

獨秀又告訴我，汪精衛準備去河南與馮玉祥談判。過一兩天後，汪就到鄭州去了。這種情形下，我問獨秀怎麼辦？當然獨秀也很擔心。他說情形既然如此，連國際代表也這樣束手無策……。我提議召開中央委員會特別全會，考慮整個武漢局勢，當然要同政府代表討論這個問題。獨秀答說召開中委全會倒沒問題，大多數同志都留在武漢，尤其是國際代表。但如果提出一個政治方向，他看來很難。如果按照中共第五次大會的決定，實現它的路線，那就是用主力拉攏汪精衛政府和他這一派，遷就它的政策。它說農民過火，我們也跟着說農民過火，要抑制，但農民照樣過火，我們也無法抑制。現在國民黨自己動手壓制，就有許克祥

的叛變來證明。獨秀當時對此是悲觀的，想不出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他又告訴我，他曾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到中共的前途。他認為在這種局勢下，我們只有兩條道路的選擇：一則完全接受國民黨的方針，放棄我們自己的立場，另一則是我們共黨退出國民黨，重新考慮我們的獨立路線。但是政治局對這兩條路線都不贊同，認為都辦不到。他們問鮑羅廷。鮑答說在莫斯科方面也是辦不到的。現在只有拖下去，看汪精衛和馮玉祥會議後有何結果，再來考慮一切問題。

我說是否應該把黨重新振作起來。我看到武漢一般黨員幹部都很頹喪，不像在上海「五卅」後普遍的革命振奮精神，每一幹部黨員都拚命在群眾裏工作；而現在武漢的多數黨員完全喪失以前革命的精神和態度，許多同志把國民黨內的工作當做職業，得到較高的薪金，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已全然消失，每個黨員都消極頹喪。我親眼看到很多事實，是過去從來沒有的……。獨秀也有同感，認為連上層領袖也差不多如此。他接着說要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政治上要有大改變。我認為他說得對，很同意他的意見。這是在武漢我最後一次同他認真的重要談話。以後沒有很多機會，只是偶而隨便說說而已。

汪精衛、馮玉祥鄭州會談

汪精衛到鄭州會晤馮玉祥是在 1927 年 6 月 12 至 13 日（正式會議日期）前後。這次汪派重要軍政領袖都到齊了：除汪本人外，有譚延闓、顧孟餘、程潛、張發奎、唐生智、鄧演達、孫科。還有加倫將軍都參加了。顯然是一次重大會議，但會前沒有散佈消息，事後也無外人知曉，全是秘密性的。究竟談些甚麼，只能推測。至少我們知道汪精衛已下決心對付中共，正在同馮玉祥商量，同時爭取馮玉祥同情武漢方面來對付蔣介石……。正式會議（6 月 12 至 13 日）只是官樣文章。在這以前，5 月中旬，南京蔣政府已任命馮玉祥為國民政府委員，消息在報紙上發表，可

見馮玉祥又同南京蔣介石聯繫，後來證實他派了重要的部下李鳴鐘到南京接頭，馮同蔣才成立正式關係。

鄧演達是參加這次會議的人物之一。他是在武漢公認為一貫左派。他可能是通過周恩來（黃埔軍校關係密切）透露消息，警告中共要當心汪馮會談對中共很不利。總之，以上所述是根據獨秀告知的。

在更秘密的私人談話中，汪精衛自然把武漢的情形詳告馮玉祥。這是不久以後馮玉祥自己透露出來的。馮到徐州見到蔣介石打電報給汪精衛、譚延闓、宋慶齡、孫科。電報中說，他在鄭州會議期間曾聽說武漢局勢是如何惡劣：工人如何威脅廠長，店員威脅老闆，農民怎樣要挾侮辱地主；前線軍人家屬如何在鄉下被農民迫害（這是土豪劣紳的口號）。所以說，根據汪精衛等的報告，完全同意你們的辦法，採取根本解決：當這樣危急時，以快刀斬亂麻來應付，意即「清共」……。這裏充份反映了鄭州會議中汪精衛對馮玉祥會談的真實內容。後來有很多引證，但當時我們一無所知，除了鄧演達的警告之外。

馮玉祥的策略是首先對付中共，然後再來對付蔣介石。在這次同汪精衛鄭州會談的事件中，證明他非常狡猾、虛偽，利用他的地位要做武漢和南京的仲裁人。在河南戰事時，他在那裏袖手觀戰，他的軍隊開始駐在潼關，按兵不動，後來到洛陽，也這樣保存實力。5月末河南北伐軍打下來了。可能由他主動找汪精衛，同時又同蔣介石打交道。鄭州會議後，汪為了買好馮，把整個張發奎和唐生智部份軍隊佔領下來的河南地盤送給馮玉祥，成立河南省政府，請馮作主席，並且答應把國民黨派到河南人員撤回武漢。在幾天內劉伯堅回到武漢，就是馮把河南中共人員也送回武漢。

緊鑼密鼓，6月19日，馮玉祥到徐州，逗留數日，同蔣介石會晤，這也是事先佈置好的。同去的兩位，一是汪精衛最親信的顧孟餘，另一位是徐謙，是馮玉祥過去親近的人，有教會關係。至於蔣介石方面參與

人物，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知悉，有胡漢民等人。這個會議也完全是秘密的，但不久透露出來：馮玉祥願意真誠地同國民革命軍合作，廢除這種軍閥制度，同時抵制共產主義，還有其他秘密協定條文……（不久也公開發表）。

經過汪精衛與馮玉祥的鄭州會議，和馮玉祥與蔣介石的徐州會議，在武漢以前暗地策劃的反共陰謀，現在變成更露骨更嚴重了。當時在中共黨內和國際代表大家都弄得驚惶失措。當時，我有機會去看劉少奇，正好項英也在他家裏。劉少奇當時實際上是全國總工會的主持人，而蘇兆徵則是名義上的主席，而出頭接洽事務的是劉少奇；項英當時是武漢糾察隊隊長。我們相對覷視，不知從何說起。劉少奇還是1926年5月間在廣州見面後第一次再見。除了私人問候外，大家默然無言相對。當然劉少奇比我知道的事要多，說情形很壞，但也不知應怎樣應付，等候中央委員會會議來籌劃……。尤其是項英的糾察隊，國民黨要壓制，雖然他不發牢騷，但覺得很困難。他們都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知道不久要開中委會全會，情勢愈來愈緊張，於是，獨秀才決定召開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

中央委員會全會很倉促地在6月21日在武昌召集。出席的有在武漢的中委委員，還有青年團負責人及武漢重要幹部，但會議是秘密的，沒有國際代表參加。由獨秀做報告，說情形非常嚴重，在現時局勢下，中共應該對國民黨採取讓步，否則大家可想像的事變必然發生，引起的後果，就是說國民黨將嚴厲對待我們……。他說完後，瞿秋白接着發言，意思是他事先同國際代表（鮑羅廷）有談話，認為局勢很危險，必須對國民黨採取讓步，至少是臨時的，否則會引起極大的變動。瞿秋白還擬定了一個決議案，是同國際代表商議又徵得政治局同意的，決議案只有十一點，包括認為兩湖工農運動走得太遠不能控制；要向國民黨表示中共的態度和立場，主要是承認國民黨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

聯盟，並確定國民黨在此聯盟中的領導地位，意即服從國民黨。另一要點是關於共黨黨員參加國民黨政府的資格問題。不僅在中央政府，還有省政府（如董必武是湖北省政府要員）。共黨黨員並非以中共黨員資格，而是以國民黨黨員資格參加的。在現時情況下，共黨人員應該設法退出國民黨政府內的職位。第三點是最重要的（依我看來），即工農武裝糾察隊應設法解決，說些漂亮話；國民黨是武裝工農……，但是為了避免衝突，工農武裝糾察隊應該處於國民黨管理訓練之下。其次工農要求要按照國民黨政府法令及國民黨歷次會議的決議案，這樣就不致於過火了……。因此，這個決議案目的是使國民黨政府滿意，不再疑慮中共另有陰謀而是誠心誠意地接受國民黨的領導。總而言之，這個決議案是對國民黨的最後投降書。提案由瞿秋白讀後，參加會議的同志們瞠目相視，說不出話來。大家好像認識清楚非投降不可。只有中共青年團的書記任弼時發言，說這樣還談甚麼革命，共黨一切聽命於國民黨，甚麼事都沒人來做……。他話說得很長，很激昂。他的背景就是接近共產國際青年團代表，思想一向比較左。那時我和任弼時很少接觸，不同以前。任弼時發言後，陳獨秀發脾氣說，依你來看，應該怎麼辦？我們是否有力量與國民黨武裝鬥爭呢？我也不再發言，我比任何人更清楚，我認為是要完了，也不再說話了。我知道發言無用，我的立場早已清楚。這個決議案提案就此無人反對表決了。但沒有公開發表，而另外寫了一個文件，交給汪派，表明共黨態度。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後隨着召開的。我沒有參加。據說有八省勞工代表三百萬工會會員（不知這個數字是否可靠），是帶全國性的會議。他們還請汪精衛來演講，他還是老調：「國民黨政府盡力之所及來保護勞工利益」。但我要補充一句，在暗地裏已準備屠殺工人，在這次勞動大會上，俄國總工會代表羅索夫斯基也出席發言，說了許多激昂的話。不過是空洞的，也有大

半工會辦事處（與赤色工會國際有聯繫）代表出席。當時在武漢的外國代表多得很：法國的多里沃，俄國的米夫，美共代表布勞德（Earl Browder）等等。

中共中央6月21日會議的決議付諸實行（會議只開了一個下午），有兩件事表現出來：（1）大概在6月28日左右，武漢湖北省總工會發表正式聲明：為了避免當前局勢變遷，尤其是反動派造謠工人兵士搗亂，聲明準備把本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解除，把軍械等武器交給武漢警備司令，希望政府保護工人。（2）6月30日，譚平山和蘇兆徵有正式文書，名義上是請假，事實上是辭職。譚平山聲明擔任農政部長以來，不能有所貢獻，不能把農民運動引導上正軌，身體又欠佳，不能勝任，所以請假。蘇兆徵也寫了同樣性質的聲明，要求停止他勞工部的職務。這兩件事意味中共自己解除武裝，消除國民黨忌恨，退出政府。不但是譚平山、蘇兆徵，還有省政府共黨人員都也退職。

由此中共完全屈服於國民黨左派政府，也就是屈服於斯大林所謂的「革命中心」，完全解除自己的武裝，等待國民黨左派和武漢政府來處理，就是坐以待斃，再也無話可說了。

那時中共中央本來已決定我去北京，準備啟程。最後見到獨秀，他唉聲嘆氣說：「完了。」我問他怎麼辦。他說他準備辭總書記職……。整個黨等待國民黨政府處置輕鬆一點，不致於像蔣介石那樣的殘酷屠殺。

這裏必須補充一句，在未辭職前，獨秀在政治局曾有兩次提議：認為國共合作繼續不下去，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但是受到莫斯科的拒絕：即通過共產國際代表打電報徵詢莫斯科，遭受斷然拒絕，所以沒有出路不得不辭總書記職。我離開後，獨秀正式辭職，由瞿秋白來代理，如願以償。後來由瞿秋白主持「八七會議」，開啟瞿秋白執中共書記職時代。

現在不得不說到我們的私人生活。我們，碧蘭和我，都太不注意自己的安危。幾年來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黨的工作，當然黨給我們一點生活

費，但我們根本沒有錢的觀念，生活艱苦。到了武漢，5月以後，尤其是長沙許克祥事變以後，很多同志，如毛澤東等已考慮要安置家屬，我們當時完全沒有為自己設想，把唯一的安全地點和關係介紹給毛澤東，絲毫沒有考慮自身安全問題。同志們都準備逃難，躲避，而我們卻根本沒有這一觀念。碧蘭將臨生產，不能擔任黨的工作，也不拿黨的生活費。我還繼續以中央委員名義每個月拿五十元，勉強交房租等費用，非常清苦；而且本來長江書店準備出我的小冊子（《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支出七百元稿費，我也沒去取，準備以後需要再說。我離開武漢後，碧蘭去取了一百元為了生孩子。總之，我沒有安排家事就離開武漢，心裏很不安，但總認為這是革命家的命運。的確，碧蘭即遭到很多困難和危險。

7月初，我離開武漢，乘船經上海到天津。

離開武漢時，汪精衛政府還沒有正式清黨，約一星期後到了上海，從報紙上看到汪精衛在7月15日正式發表聲明國民黨政府清共；要共黨黨員退出國民黨，如果查出不退出的話，要遭受處分。在各級政府機關內也清除中共成員，而同時口頭上仍然聲稱保護共黨人身體自由。當然，這是虛偽的。我知道武漢完了。

我到上海唯一地址是黨的交通處（是武漢交通處認為安全可靠的）。我通過交通處找到黨的上海區委，那時由王若飛負責。他五次大會後立即回上海，即時從武漢到上海的還有陳延年。

本來羅亦農是到武漢參加中共五次大會的上海代表，而陳延年是中共廣東省委參加五次大會的主要代表。照理應該留在武漢，但在中共五次大會召開以前一兩天，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三人秘密會議，決定馬上派陳延年到上海去，藉口上海局勢嚴重。羅亦農已在武漢，而陳延年是廣東省委書記，有相當威望，公認為是最有犧牲精神的同志。事實上這裏有陰謀：廣州有一代表團來參加中共五次大會，瞿秋白就怕延年

留在武漢會影響這個代表團。延年是有魄力的人，不是弱者。我猜想他們為了對付獨秀和我，不得不把延年派走，不讓他參加中共五次大會，這是顯然的事實。我來上海之前，區委主要人物：陳延年是書記，趙世炎負責組織部，王若飛也參加區委工作，大概是負責宣傳（中共中央已搬到武漢，上海只有區委）。

我見到王若飛，他面色陰沉悲慘，好幾分鐘說不出話來。我一看知道已發生了事情。過一會後，王若飛才啟口道出一個最沉痛的消息：陳延年和趙世炎已被槍斃。事故發生在我到滬以前不久。事情經過如下：他們兩人住在北四川路底一間弄堂房子裏，不知如何蔣介石的特務找到了線索，也許是由於趙世炎是上海暴動時期最活躍的人物，以工會和黨部領導資格到處演說（《嚮導》裏都是他對上海事變的報道），情形最熟悉，敵人也最注意他。羅亦農雖然最著名，但不容易找到。羅亦農到了武漢後，陳延年和趙世炎盡全力把上海被摧毀的組織整理起來，因為中共在上海雖受沉重打擊，但還有重大潛在勢力；有數十萬工會成員，有上萬黨員，也有數以千萬計的團員，被殺害的還在少數。所以他們很快就把黨組織振作起來。當然在滬最活躍的是趙世炎，王若飛到後也很活躍。但延年剛到不久，對上海情形不熟悉，連上海話都不懂，不是很活動，但由於趙世炎的關係，可能被敵人找到線索，有特務跟蹤，知他住在哪裏。當時趙有妻女和岳母，其妻是夏之栩，碧蘭過去的同學，在武漢鬧學潮五人之一。延年沒有家眷，住在趙家裏。國民黨的特務發現趙住家後，一個晚上將陳延年、趙世炎逮捕（7月初），通過公共租界，送到蔣介石的龍華司令部。據王若飛告訴我，他兩人受酷刑非常之慘，但他們是最堅強的革命家，受刑拷打到死去活來也絕不屈服。最後已快死了，就槍決了。我私人同他們自莫斯科時代起就有深切關係，當然悲痛萬分，一時不能有所表示。到了第二天，才恢復平靜。

王若飛告知上海情形：除了延年和世炎兩人犧牲以外，還有一位秘

書也被捕，也許也槍決了。王若飛本人算是保住了，而這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他從蘇聯回國後不久就擔任中央秘書處秘書長，所以對上海情況很熟悉。他很快把打斷的關係重新聯接起來，提選一些幹部組織一個領導機關。我到滬時，他已開始着手組成新的區委，克服重重困難。黨還有雄厚基礎，有了領導機關就可繼續工作。同時已建立一個秘密情報機構，主要是保衛黨自身。他們挑選了一些同志，經過秘密訓練，來保護黨的機關，抵抗敵人，探取敵人情報，也有武裝，是防禦性的。這個特務機構究竟有多少人員，我也不知道，也不好過問。擔任這一機構的負責人是顧順章，就是上海三月武裝暴動勝利後的糾察隊隊長。他原來是電車工人（法租界），同流氓有關係，精明靈活，很能活動。他加入黨後，參加黨的訓練班，我就是訓練班講課時認識他。在二月罷工潮後和三月暴動期間，他聯絡工人群眾和同情中共的流氓分子，而成了上海秘密工作的中堅分子。王若飛建立這一情報機構，自然就指定顧順章來領導和訓練人員。可惜他並不能保護陳延年和趙世炎，也許是因為剛開始，力量和經驗都欠缺。

有一件事當時是不能公開說的，但現在倒可一提。這個特務隊幹了一次綁票，就是綁顧維鈞（北方政府外交部長）的妻子；她是新加坡一個糖業（茶葉也在內）大資本家的女兒，財產有數千萬。綁架得到三十萬元，當時是很大的數目。王若飛把這事告我後，我沉思片刻，對他說：這樣的事是不能做的，如果暴露出來，對中共聲望必然有很大的損傷。我提起過去俄國也有這樣的舉動；我研究俄國革命秘史，知道發生這類的事，如綁架、搶銀行；而布爾什維克黨當時反對馬克思主義者採用這種方式找錢。我說不應該這樣做。王若飛聽了，說這事應加以考慮，但已經幹了一次，將來也不再做了。

從王若飛對上海中共活動，從重新建立區委，到下屬組織和工運情況詳細告知來看，在上海蔣介石反動政變並沒有打擊到基層，各部委還

繼續存在。雖然有不少工人黨員消極脫離，但最優良，最勇敢的工人分子還是留在黨內，在工人中秘密活動。上海總工會雖被禁了，但也秘密存在，有時還發表宣言，寄發到武漢。

上海區委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黨委，繼續同各地聯繫，除南京以外（南京黨遭遇最慘，整個組織垮了）。其他無錫、蘇州、杭州、蕪湖等城市的組織還秘密存在，同區委聯繫。雖然有所削弱，然而還有一個相當廣大的基礎。不但在工人中活動，甚至在農民，如江陰、嘉定等縣，還有基礎，甚至有若干發展，可見蔣介石的勢力還未能深入農村。

當時如果武漢中共領導不是那樣糟糕，而具有真正革命的政策，要恢復過來不是很難的；這是我的看法。上海4月12日蔣介石政變，屠殺了數百人，但黨本來有數萬人。政變後，黨在上海還有一萬多人，事實上，三月暴動勝利後來不及徵收黨員，後來更無法統計，但大體上所有部委組織都沒有完全破壞，因歷史原因和雄厚基礎，而能繼續秘密存在。這裏可補充一句：廣東李濟琛1927年4月14日政變後，廣東組織還繼續存在。

我在上海留了三、四天，除王若飛和交通處石瓊外，沒有接觸其他同志，也不住在黨的機關裏，是住旅館。那裏情勢相當嚴重……。於是我動身去北方，首先到天津。

第二章

我在中共北方區委的經驗
(1927年7月末至12月)

北京蘇聯大使館慘案之後

1927年7月末，我從上海經海路到達天津。那時中共北方區委已從北京移到天津。正是由於在1927年4月6日在北京發生嚴重事故，那天，張作霖駐北京的軍隊，得到東交民巷帝國主義者的默許，進攻蘇聯俄國大使館，抄去大量文件檔案，還逮捕了二十多名共產黨黨員，裏面有李大釗。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同志們受絞刑犧牲，正是中共第五次大會開幕第二天。而北京區委的負責人：陳喬年、劉伯堅、何資琛正在武漢參加中共第五次大會。會後他們立即回北京處理殘局。北京城內白色恐怖給組織方面破壞很大；經過考慮，他們決定把北方區委搬到天津，暫時可避開危險風勢。

我到了天津就直接到法租界北方區委辦事處。那時區委成員是劉伯堅、陳惟仁、李季達，還有兩位秘書：李芬和韓惠芝（女）。現在我要追述這幾位同志的事蹟。劉伯堅，四川人，是「五四」後加入「勤工儉學」留法學生，1924年末回國到北方擔任北京市中共地委書記。陳惟仁，湖南人，是和我同時去俄國留學，但很早就回國（1922年），一直在東北工作，後來轉到北京，參加中共北方區委。李季達，四川人，是劉伯堅在法國勤工儉學同學，後轉到莫斯科，「五卅」後回國，派到天津，擔任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活動。李芬（歷史有記載，見王實味《野百合花》）早期是北大學生，寶慶人。韓惠芝，河北保定人，保定師範畢業生，在「五卅」前後加入共黨。

中共北方區委是最大的一個區域的組織。除河北省以外，還包括山東、山西和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而在北京成立新的市委，繼續存在，還有發展。我到了區委不久，希望到北京了解那裏的情形。

8月中旬我來到北京，因對當地情形不熟悉，由李芬陪我去。那時市委書記是李渤海，山東人，世家出身，在北京的親戚朋友做官的很多；

以前是在北京市國民黨左派內活動。李大釗事變發生後，他參加北方區委，當區委移到天津，他就擔任北京中共市委書記。看來他很聰明，活動力強，真是四面八方走得通，所以當我到北京時，黨組織已恢復正常。據他告知，那時黨團成員合起來有兩千人以上，完全是秘密的。有工人、學生、政府公務員的支部，都繼續存在，還有活動，情形似乎比上海好得多。這是由於張作霖雖然極端反動，但他對付共黨的技術還不及蔣介石高明，而蔣的確是受過莫斯科訓練的。我當時感到北京的氣氛好像比上海輕鬆多些。因此我還能出席某些支部會議，而且同黨外人士接觸。

李渤海帶我去參加的第一個支部會議，是北京大學的支部，有二、三百黨員，一向是共黨的堡壘，當然這次不能像前兩年那樣把全部黨員召集一起，而是由各小組派書記或負責同志十來人，在北大一個課室開會，其中有陳其昌，似乎是支部書記。他們要我講南方情形。當時已有南昌暴動，秋收暴動也已開始。我做了相當長的報告。主要是將我離開武漢前後的局勢詳告。我也問北京大學的情形。他們說還無大變動。校長是蔣夢麟，北大支部及各小組繼續存在，但不像以前那樣活動。這次會後，過一兩天，李渤海帶我到燕京大學，在北京郊外，氣氛完全不同。我並未召集燕大全部黨員。據說黨團同志有二百餘人，連校工也有不少加入黨，校長司徒雷登對學生採取放任主義，讓他們自由活動，在這種氣氛下，燕大的同志們說話毫無拘束……。我同李渤海在學生宿舍內住了一晚，燕大好像變成共黨的勢力範圍。張作霖還不敢去侵犯。從燕京大學可遙望清華大學。我沒有去。雖然黨團同志人數較少，但也很活躍。

回到北京城內，由李渤海召集一個政府機關（教育部，內政部等），工作人員中的中共黨員特別支部會議。我記得是在天安門城牆上同他們見面，裏面還有一位邵陽中學的同學，在內政部做事。據他們告知各部門內部沒有很大變動。

李渤海還特別為我約了北大兩位左派教授，第一位是高耀山……，

第二位是陳翰笙。我要特別說一下，他後來同我有聯繫。他是北大教授中最左傾的，是無錫人，在長沙美國人辦的雅禮大學堂畢業，所以湖南情形比較熟悉。後來他到美國和德國留學，回來後，就到北京大學當教授（政治經濟學方面），再後來他在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科學院（南京），擔任農村經濟部主任。他表示對我同情，見了我不久去蘇聯。高耀山不久被張作霖槍斃，因他是著名的左派（我後來在報紙上看到）。

在北京一個多星期的觀察，沒有特殊的感覺，北京城內沒有甚麼大工業，工人支部很少。一般說，一切外表上還很正常，街上也沒有特別緊張情況。黨在各地區組織也還保存。因為張作霖以為把李大釗處死，北京共黨失去了頭腦就必然潰散了。而且他不具備鎮壓的技巧，所以和上海的氣氛不能比了。

我回到天津，已經是8月末了，我們開始討論北方工作計劃。同時又要注視南方的發展。

南昌暴動後，賀龍、葉挺的軍隊退到潮州汕頭。這一暴動差不多結束。至於秋收暴動，也快完了。我們沒有直接的上海報道，只靠北方當地消息。那時國民黨方面的消息比較多：武漢清黨以後，雖然南京和武漢兩方竭力謀取統一，但據登載的消息說，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間衝突依舊；唐生智繼續向東征，把軍隊開到安徽和江西。又說張發奎的軍隊想奪取李濟琛的地盤……，因此國民黨在肅清了中共以後，自己內部的衝突倒緊張起來。這是南方一般的情形。

在北方，由於蔣介石和馮玉祥聯繫，要繼續北伐。張作霖對中共的鉗制似乎鬆了一點，對我們來說看起來安定了一些。我們想根據這個客觀局勢來佈置工作。最主要的事是如何把天津、山東、山西和東北三省的工作聯接起來。尤其是唐山，有最大的礦山，擁有五萬以上的礦工，一向工人運動是由中共組織領導，這是一個工作的中心。同時在天津，一度組成的工會因李守常事變而瓦解，但仍然保持不少工人關係。但最

大的問題是缺少幹部，困難重重。比如無法派人到山東，到東三省也不成，到山西、綏遠更談不上，至多可以派人到唐山，其他各地主要靠通信聯絡。所以工作開展不容易。而且張作霖的威脅仍然存在。不過不像南方那樣嚴重。我們擬定了一些工作計劃，這裏不詳說。

當我們正在整理天津就近的工作及唐山的工作，當頭碰上一個打擊，即是李季達的被捕。他是天津市委書記，是一個最忠實的革命家，工作不要命的，不聲不響地幹，到工人區到處跑。是9月末一天報告他被捕，很快就槍斃。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在天津工作有好幾年了，對市區最熟悉。他被軍閥槍殺後，必須找到適當的人選來處理天津的組織。結果，找到于方舟，本來在國民黨左派內工作，但從來沒有在共黨內工作過。我們只好選他來擔任天津中共書記。他是天津人，可是也不能勝任。

李季達事變沒過幾天，上海來信，裏面是一個決議案，由瞿秋白領導的政治局的名義發出的，內容是要北方區委準備在北京、天津發起一個暴動。因他們已得到報告（在我來到之前），說北方組織還相當健全，因此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他們在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失敗後，把視線轉移到北方……。我們在北方區委為了這個決議案討論了好幾次，覺得很難了解這一決定。難道我們要在北方奪取政權嗎？而且我們已經知道秋收暴動的結局。我當時對黨中央的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我認為這種暴動政策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北京雖然有二千多黨員，工人群眾組織也沒有解散，但是公開禁止的。天津的總工會老早就被禁了，群眾也沒有任何廣泛的運動。在天津以北的玉田，稍為有點農民運動……。到底暴動是為甚麼呢？我們在北方區委討論這個決議案，都說不出理由來。連于方舟，本來有一點盲動主義傾向，投機式的人物，別的地方暴動他是贊成的，而在天津就不行了。自李季達被捕槍殺後，天津一切關係還待恢復，所以沒有一個贊成中央政治局的命令。但怎麼應答呢？

當時我們面臨一個更尖銳的實際問題，經過一次革命大失敗後，向兩極發展：大批黨員公開登報脫離，尤其在武漢；同時又有成群的黨團員消極自動退出。另有一部份黨員，從憤恨做出發點，仇恨國民黨，仇恨汪精衛，認為莫斯科要奪取政權的訓令是一條出路。當時黨內有不少這一類從憤恨出發，從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支持暴動，最出色的代表就是蔡和森。他在武漢汪精衛政變之後，就瘋狂地宣揚暴動，這樣來報復。毛澤東當時也屬於這一類人。

說起北方地區，我們對它的環境看得很清楚，繼續工作下去是有可能的，而且還能有某些發展……。但暴動是要有武器的，哪兒去找？天津有些同志提出，在洋油箱內放紙砲來嚇嚇敵人……，這是無意識的話。

要答覆「中央」的命令，我當時很為難，準備寫一封信。我離開上海時，黨中央還沒有回到上海，是我到天津不久，武漢黨部經過「八七會議」後又移回到上海。我還不知道「八七會議」的經過（事實上陳獨秀被除去書記職，由瞿秋白繼任）。我寫了一個報告，把北方情況扼要告知，說在現時情況下在北方舉行暴動，可能性很小。但如果準備將來在北方暴動，則可以接受，看情形酌定。這是敷衍他們的。事實上，我們根本反對在北京、天津發起暴動。可是那時在黨內已經不能說真話，我這封信是代表區委寫給中央的。不料「中央」馬上採取另一着嚴重措施。數日後，可能是10月初，上海派了三人到天津：蔡和森、王荷波、張昆弟。他們帶來上海「中央」（政治局）新的決議案，北方區委應改組成為北方政治局，組成分子是王荷波、蔡和森、張昆弟、彭述之、朱錦棠，並指定北方局要駐在北京；北方局之下，建立一個順直省委（順天，直隸兩省），可設在天津。人選可介紹一下。蔡和森不去說，王荷波是津浦鐵路之一領袖，曾同陳獨秀一起到莫斯科，參加赤色工會國際大會（見第四章）；他是一個很忠實的人，但政治上比較弱。張昆弟是法國勤工儉學生，回來後在北京擔任工人運動，過去碧蘭在北京時很熟；

人很忠實，很積極，但沒有甚麼頭腦，但同王荷波不同，是比較有知識。再說到朱錦棠，從 1922 年開始，當劉少奇、李立三到湖南安源煤礦時，朱錦棠是最活躍的礦工領袖，於當時工會佔重要地位；1925 年初第四次黨大會上，同李維漢一起代表湖南省黨委，選為中央委員。1926 年初安源工人運動遭受很大的打擊，連劉少奇都不能存在。朱錦棠更是人人皆知，不能留在安源，就被黨送到北京，在黨部管理一個小印刷所，完全改變以前的活動性質；他的生活方式也就完全不同了，變成一個小官僚。比如，在北京的同志，李大釗在內，沒有人穿狐皮袍子（是北京官僚最高等服裝）。他一個人穿這樣的袍子，所以同志笑他，說他當官了，但仍然提拔他到北方區委。這是大革命失敗後，莫斯科來的訓令：過去老黨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所以發令要「提拔工人」，到黨各地領導層來代替原來領導，用人工栽培的方式來選拔工人出身的同志。

這是第一次瞿秋白把這個莫斯科的訓令引用到中共黨內，首先在北方區，指定王荷波為北方政治局書記（而不是蔡和森），同時剝奪了彭述之的職位；而且，在順直省委指定由朱錦棠做書記，我留在天津，名義上是幫助朱錦棠，再加上于方舟。在北京，王荷波，蔡和森到張昆弟主持北方政治局，一方面免得北方局受我的干擾，王荷波可以由蔡和森當做工具，任意擺佈。這樣的安排可看出瞿秋白的陰謀，剝奪我在北方區委的職權，目的是要蔡和森在天津、北京，立刻準備暴動。這是北方黨組織最大的變動。

北方區委原來成員劉伯堅和陳惟仁怎樣安排呢？劉伯堅被調往上海，後來又調到武漢的長江局。羅亦農為書記，管理兩湖、江西、四川一大區域。陳惟仁調到山東為省委書記；他同韓惠芝結合一起去山東。至於留在天津的李芬，她不久回到寶慶家鄉。她的父親是中學校長，她同另一北大同志一起回去，不久被捕槍斃。後來在延安王實味把她的身世寫在《野百合花》裏。

正在北方區委改組為北方政治局時期，碧蘭帶了新生的小女來到天津。她形容憔悴。她是單獨地從武漢到上海，從上海到天津，帶了幾件行李，由一位交通處同志陪來，我才知道她在武漢的遭遇。

原來是碧蘭為毛澤東弟弟毛澤民做擔保人，在她住的同一屋子裏租了一間房，但毛澤民突然被捕，女房東就將碧蘭監視不許出門，這樣延長了二、三個星期，毛澤民被釋放後才容許她離開這房子。為了逃避恐怖，她帶了小女回到黃陂父親的家鄉，住了兩個月，但武漢的恐怖氣氛又蔓延到鄉下，她不能再停留。同時我有信給她，要求她趕快帶小女到天津來。她原來的直接關係是任作民，但他已被派駐異地。她找不到黨部，只好住在一位堂叔家裏，在報上用假名登廣告。當時武漢有個半流氓半知識分子，冒充任作民約碧蘭到漢陽龜天寺會面，地點相當遠。碧蘭正預備動身，突然感到不妙，如果去的話，很可能被綁架或被捕，極為危險。幸好鄭超麟知道碧蘭登報用的假名，結果才找到黨的關係。那時羅亦農是長江局書記，才把她送到上海，再由王若飛負責送到天津。我們分離四個月後才重聚，碧蘭已是精疲力竭。

中共「中央」為了準備在廣州和北方暴動，在上海召集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在1927年11月9、10兩日召開。我還是中央委員，蔡和森和我分道而行；我去上海前給了我一個地址。到滬後，我住在旅館（永安酒樓），寫了條子到那地址。「中央」派了潘家晨來接待我。潘原是瞿秋白俄國專修班後期的同學，去過蘇俄，現在變成瞿秋白的私人「秘書」，他不把自己家的地址告訴我，逕自把我帶到開會的地點。因此我同上海黨部任何人無法接觸。我很想見見獨秀，也不可能。可見他們當時利用危急情勢，做出那種佈置，更加孤立我。

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開會的確切地點，我全然不知，並不是全體中央委員在一起，而是分成幾組來開的，很是特別。在我這一組，除了瞿秋白是中央書記外，另有三位同志：張國燾、李立三和我。瞿秋白聲明

是分組討論，但沒有明說有多少和哪些同志參加會議。他只提出兩個決議案，政治決議案；還有是處分譚平山的決議案，以及批評張國燾和李立三的決議案……。

當時事實上，賀龍和葉挺的隊伍完全潰敗，秋收暴動也結束了。但是政治決議案仍舊說，自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以來，中國革命局勢仍不斷高漲，應該繼續進行。這裏面還有一套理論，說中國革命是不斷發展，也就是不斷革命論；過去在蘇聯是最犯忌的，是最危險的托洛茨基主義，而這是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公然標榜出來放到政治決議案內！然而這個決議案並沒有事先交給我們閱讀，讓我們有考慮的時間，而是會議開始了，瞿秋白從口袋裏抽出來一張文件，給我們輪流傳看。它把革命失敗說成革命高漲，而且是不斷性的進展……，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來看，但無法討論。瞿秋白根本也無意討論，希望大家通過就算了。我發言簡單；我說革命不斷發展，很難解釋；你在小冊子裏不是批評我，認為不斷革命論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現在為甚麼把這理論用在決議案裏呢？他支吾其辭，說現在情形完全不同……；牛頭不對馬嘴地做出荒唐的回答。我也不願同他爭論，覺得毫無意思。李立三和張國燾也發言，李立三贊成決議案，張國燾在一些細節上提出一些問題，瞿秋白也東扯西拉地做答覆；我為了避免麻煩，也不多說，既然沒有反對，這個政治決議案也就通過了。

第二天討論譚平山等問題的決議案，同樣事先不交給我們看，會議上臨時拿出來，大家輪流看看。裏面指責譚平山所犯的錯誤，似乎從盤古開天闢地時就已開始了。把過去武漢時代譚平山一切行動都擺出來了，都成了他的罪惡。比如他怎樣壓制農民的所謂「過火行動」，沒有執行黨的政策這大套……；事實上譚平山當時完全執行瞿秋白領導的農民委員會的通告。在武漢後期，指責譚平山如何同鄧演達勾結有意組織第三黨。這指責的來源我當然不知，但我知道鄧演達是國民黨方面最左的領

袖。其次說到南昌暴動，指責譚平山完全沒有服從黨而獨行其事。這是以他同賀龍談話的內容引為根據。又說譚平山怎樣同張發奎勾結，以致賀龍軍退到潮汕，而譚平山自己離開了，也未向黨作報告，事實上是反黨……。這樣一連串的罪狀羅織起來的結論，是要嚴重處分譚平山（認了罪大惡極），應該開除他的黨籍。我在發言裏說，決議案指責譚平山種種罪行，我不知道詳情事實，但我有一種感覺：譚平山是中共最初建立時的老黨員，是廣東小組的創始人之一，數年來都是廣東中共負責人之一，歷任中央委員。譚平山在國民黨擔任組織部到農政部的職務都是通過黨的決定，至於他參加南昌暴動，我不知實情。但有一點要注意，像這樣黨的領袖，又是在黨五次大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應該按照俄國黨的傳統以及中共的一貫作風，請他出席中央會議，對於黨譴責他的錯誤，讓他有機會解釋，然後按照情形來抉擇處分。我這個提案，沒有人附和。張國燾和李立三都不做聲。瞿秋白說這是原來政治局已經決定了的，不過這裏只是提出來討論而已，意思說不必經過我們的表決贊成與否。那種專橫無理的態度可稱到了極點。平時我是要爆發起來的，但是這次也無法討論。

然後討論張國燾和李立三的問題。李立三事先寫了一個關於南昌暴動經過的報告，但我也沒有看到。張國燾也準備寫一篇報告，來解釋南昌暴動事件內對他的指責，就是根本沒有執行黨的政策，像沒收土地問題，在農村中組織農民的問題，甚至提到他們為甚麼不從贛州直接到廣東，而轉了一個大彎經過福建到潮汕……。張國燾發言辯護，說他不能個人來負責，是由黨決定，在隊伍裏有個特別委員會，大家參加，也有不少中央委員；張國燾之外，還有李立三，高語罕等，是經過大家討論決定路線。而當時路經地區當然沒有提出土地問題。他的聲辯有相當理由。瞿秋白將張國燾在中央委員會停職，李立三給一個警告，這就是他決定給個人的處分。這也就是這次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1927年11月

9至10日)我所知道的實在情形。(張國燾回憶錄內不提及這次會議，Wilbur在China Quarterly《中國季刊》的一期中，把張國燾和李立三的報告翻譯出來)

這次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完結後，我在上海見不到任何同志。由潘家農給我買了車票，回到天津。要知道過去潘在莫斯科和在武漢很巴結我的，而現在變成瞿秋白的私家狗，對我態度很壞。這也是黨墮落的一個反映。

我回到天津不久，有一位俄國代表，用假名而事實上就是羅密那茨(Bessd Lominadze)，由斯大林派到中國來指導暴動的，還帶了一個翻譯。蔡和森、張昆弟、王荷波都從北京趕來。為了保護羅密那茨的安全，在召集會議時，我同碧蘭帶了小女，在天津最堂皇的大旅館的頭等房間住下來，做為家眷來掩護……。在會議上，羅密那茨表示在北方有可能直接行動，但詞句很含糊，說得籠統抽象，認為北方情勢有利……，這一類的廢話。他們把我當做異己，當面不說真話，他私人對我也不表示友好，無言以對。至於他同蔡和森說些甚麼，我也不得而知。事實上，他是來中國北方視察，同時與蔡和森策謀加緊準備暴動……。當時我不知底細，是根據後來事實推測的。參加會議的除北方局人員外，還有于方舟等十來個幹部。我心裏感到這會議毫無意義，但覺得很奇特，以後才有分曉。

羅密那茨像陰魂一樣顯現了一下，就此去上海。一切策劃都背着我們，連朱錦棠也蒙在鼓裏。他們知道在天津暴動不可能。此後，蔡和森、張昆弟、王荷波趕回北京，加緊暴動準備，雷厲風行。把市內所有的黨團員嚴密組織起來，實際情形我們都不知曉。但有一件事暴露出來，他們在北京出了一份內部公報，公然登載暴動的計劃和時間。這份公報寄到天津，我們才知道蔡和森等果真在進行暴動準備。我看了這份內部公報，把暴動計劃都公開出來，我就同朱錦棠談這事。我說暴動這樣極為

秘密的行動，竟然寫在黨內公報上，如果落在敵人手裏，怎麼辦呢？不是自我告密嗎？這樣的常識朱錦棠和于方舟當然是有的，於是我起草了一封信，用朱錦棠的名義寄給王荷波，批評這樣的舉動太危險了。如果敵人知道真是危險萬分。當時北京也有同志反對，也說這等於向警察告發。

蔡和森回信辯解說，我們準備奪取政權，當然是一種公開行動，而不是秘密的，真是荒唐到頂點，而且他和張昆弟、王荷波三人在北京成立一個「革命政府委員會」，拉攏了一大批前清做大官的人士及國民黨分子，將來暴動成功後成立政府。裏面有胡鄂公；是他告訴我有些北京政客投機親近中共，由李渤海與胡鄂公聯絡拉攏這些人士。胡鄂公從前是曹錕推選的國會議員。現在這些官僚已沒有職務，在北京做寓公。這樣操作的名單做為未來革命政府成員。這也就是蔡和森暴動前的步驟。至於武裝，根本是完全沒有的。只是由北京區特別幹部會議，從各支部挑選最積極分子，來組織和領導這一暴動。在廣州暴動以前，12月某日，蔡和森令王荷波出席和主持區會議，有一次在北京大學開會，據說有六十多人參加。蔡和森和張昆弟都不出席，只有王荷波主持，開會不久，軍警包圍，把參加會的幹部一律逮捕，李渤海也在內。過了幾天，除李渤海以外，統統槍斃（用機關槍）。李渤海因在北京親屬朋友有相當勢力，由親屬關係保出來，所以沒有槍斃，以後他也不幹了！

事變發生後，蔡和森匆匆忙忙地跑到天津。那一副形象，狼狽不堪，但穿的是北方大官僚的袍子。他的老婆（李立三前妻）穿得像娼妓一樣，身上帶了一大堆首飾。我們問他，他說有人告密，無話可說。他另外同朱錦棠私人談話，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上海，做了一個報告，說本來準備得很好，但在北京黨內有人告密，告密的人同彭述之有關係，獨秀聽了大發脾氣，連周恩來也生氣反對（這是獨秀後來告訴我的）。在這次事變後，我們就搬了家。

這裏我必須對蔡和森的行動做一結論：他到上海做了關於北京暴動的報告，主是要誣衊我，但不能解決北京六十多位同志被槍斃這一事件的責任問題。事變之後，蔡和森和張昆弟都逃走了。北京黨再沒有負責人。這一悲慘局勢是怎麼造成的？連上海瞿秋白也感到情勢嚴重，要派人到北京調查。結果派了劉少奇專門去北京調查這一慘案。他調查後，做了一個詳細報告，證實在進行暴動的過程中，事實上毫無準備，也提到黨內部公報把暴動的時日都明寫出來……。根據這一報告，上海「中央」就對蔡和森有一審問，結果蔡和森最後承認（從文件中透露出來）說他自己是一個「沒有常識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後來蔡被瞿秋白派到香港，在那裏被捕引渡到廣州槍斃，是在 1930 年尾，也是廣州暴動失敗以後。

劉少奇到北京時，我已離開天津，是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有這個調查和報告。

關於黨中央委員會 1927 年 11 月 9 至 10 日特別會議，這裏也必須加以補充。我說過有兩個政治決議案，第二個決議案是對南昌暴動和兩湖秋收暴動的失敗負責者的處分（包括譚平山被處罰的決議案），但要認清的是在第一個政治決議案裏面，完全沒有提到南昌暴動和兩湖秋收暴動失敗的檢討。只是說革命繼續高漲，這正是瞿秋白繼承斯大林的方法和作風：凡是失敗的就不去說它，不吸取教訓。只是說「現在怎麼辦？」「八七會議」告全體同志書裏沒有一句話提到武漢失敗是斯大林直接領導的結果。只是說中共中央，特別是陳獨秀和譚平山應負責任。是執行了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政策，違反共產國際的正確政策。這變成一個公式。所以「八七會議」得到的結論：要轉變，從機會主義轉變到武裝暴動。中央委員會 11 月 9 至 10 日召開的特別會議，本應該檢討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失敗的經驗與教訓。事實很明顯，它們的失敗是由於這種政策本身是一種冒險主義（那時稱為盲動主義）注定要失敗的。但會議的政治

決議案，卻沒有一句話提到這兩次暴動的失敗意義，只是說革命繼續高漲……；所以這個決議案成為未來廣州暴動和北京暴動的一個根據。

我已經說過南昌暴動失敗的負責人（按照當時「中央」的邏輯）主要是譚平山，為他羅織了許多罪狀，開除他的黨籍。第二位是張國燾，開除他的中央委員的資格，但我忘記提到秋收暴動也有兩位負責人。一位是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他是主持湖南佈置暴動者；另一位是毛澤東，是參加「八七會議」，被選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候補，由「中央」派到湖南的特派員，是暴動最主要的指揮者。秋收暴動失敗後，中央委員會 11 月全會，就指責毛澤東以特派員資格犯了許多錯誤，要負責任，並開除他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彭公達則留黨察看。但是「八七會議」後陳獨秀撤銷總書記職，是受譴責最厲害的人。

最後我要說的是朱錦棠的事，是我在天津最後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曾說過朱錦棠在政治上無能，專負技術上的職務，自從黨北方區委改組，順直省成立省委，他做書記，我就把原來技術方面的事務交給他，主要是財政，保管一筆款項。我最初到天津，負責北方區委，在財政方面，即錢的保管與使用，是由兩位秘書負責。她們用錢，小費用不需問我，比較大的開支問我，要我簽字，以後做報告。自從我把錢交給朱錦棠，他不把款項交給李芬，反而放在自己的保險箱裏，由他妻子管理，而妻子又不是同志；為了這事李芬提出了批評。她是湖南人，脾氣很直率，看得不對，有話直說，又是老黨員，保持革命家的風度。她當着我和碧蘭的面批評朱錦棠，應按照以前的辦法，像過去同志一樣，避免一個書記可自由支配金錢。朱錦棠也不作聲，也不辯白，不了了之。仍舊如前一樣，由妻子管理，私人用錢。我們知道他很要享受，但同我們一起很不方便。藉口情勢不好，他提議應分開住。照理李芬是秘書，應該住在他那裏，但朱錦棠要李芬同我們住在一起。因此李芬同我們一起租了一層房子，最壞的是朱不將他住處告訴我們，只是他來我們這裏。他

的生活保持秘密，不久李芬離開天津回到寶慶，我們不久也離開。這裏我要說的是朱錦棠的下落，那時剩下的款子，還有相當數目，至少有一萬以上。朱錦棠被中央調到上海，給了他一筆款，要他在北京路開一個木器舖做掩飾，即各地同志來滬先到他那裏，再通過「交通」去聯絡。但朱錦棠很聰明，知道這事危險，他偷偷地把舖子頂掉了，得到一大筆款子，從此失蹤。

王荷波和朱錦棠兩位，都是中共「中央」當時所謂「提拔工人」政策的具體例子。王荷波變成蔡和森盲動的工具而犧牲了。朱錦棠到了北京已經腐化，也不能再生，結果是這樣可恥的下場。他們都是中共新領導瞿秋白玩弄陰謀對付異己的結果。

在北京事變發生後，順直省委的于方舟還準備在玉田發動農民暴動。朱錦棠那時推我去，于方舟立即反對，說我是南方人，不方便。他自告奮勇，同一位姓張的，熟悉農民運動的同志一起去玉田。他們剛到了玉田邊界，就被張學良的軍警逮捕，就地槍決。這件慘案發生後，我覺得留在天津無用武之地，告訴朱錦棠準備回上海。終於在 1927 年 12 月 20 日左右啟程，同碧蘭和小女回抵上海。

第二三章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共 領導層的墮落

我與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破裂、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共上層的腐化墮落

從天津抵滬後，瞿秋白把我們一家三口安置在法租界同孚路一樓一底的石庫門屋內；這是第一道黨交通機關，上面前樓住的是黃平：廣州暴動（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中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部長，失敗後逃到上海。還有陳庚，也是直接指導廣州暴動的，住在樓上。負責「交通」的張寶泉和妻子住在亭子間：他也是去過莫斯科的留學生。我們一家三人就在樓梯下面一個空間放一張床，四面通風。在嚴寒天氣當然不很好受。我常到前樓同黃平談談。同時聽說對面另一弄堂裏是趙世炎妻夏之栩的住處，由張寶泉帶了碧蘭和小女到夏家裏，取得友情和溫暖。

我從黃平和陳庚那裏知悉，廣州暴動的詳細情形。暴動發生時廣東省委書記是張太雷。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暴動。從1927年11月起開始準備。11月中旬張發奎軍隊開抵廣東。那時廣東政權在李濟手裏，但李濟人不在廣州，由黃兆雄代理。張發奎原是廣東本地人，又屬汪精衛派，蓄意奪取廣東，於是同李濟—黃兆雄的勢力發生衝突，成內戰局勢。紐曼到了廣州，一方面監視張太雷，另一方面利用張發奎和李濟兩派矛盾，加緊準備暴動。原是預定在12月15日發動，但李濟、黃兆雄軍閥早已開始注視中共的秘密活動。在12月初已開始逮捕黨人；中共方面不得不把暴動的日期提早到12月11日。

暴動是根據甚麼力量呢？黃兆雄部下有一個教導團，團長是葉劍英，組成分子是黃埔軍校一部份學生，及其他左派分子。事實上完全由中共支配。此外，還有赤衛隊，是省港罷工糾察隊解散後留在廣州改組，又增加一些工人幹部組成的。再者廣州四郊農民也有直接參加暴動的武裝隊伍，約有二、三千人。本來李濟在4月14日政變的主要對象，是要解散工人糾察隊，並利用黃色機器工會來打擊鎮壓，對於共產黨尚容

忍。而共產黨的潛勢力仍大體存在。在海陸豐的農民運動還在繼續發展。廣州暴動會合了上萬人參加。張太雷任海陸軍總司令，葉挺也是指揮暴動的司令員。暴動開始時相當順利。廣州由李濟琛、黃兆雄軍中的教導團佔領，立即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名單中的主席是蘇兆徵，海陸軍長是張太雷，外交部長是黃平……他們都未經選舉而指定的。政府於是發佈命令：沒收大資本家銀行財產，沒收土地給農民，沒收資本家的房產給工人等等。但這僅是一紙空文，因為在廣東省珠江南岸就有李福林駐軍，而張發奎軍叛變，從各方面包圍廣州，同時海軍發砲轟炸，英美兵艦也開砲。經過三日激戰，於12月13日，暴動被壓下去了。張太雷在戰鬥中被敵人打死了。還有一位俄國領事也遭難。葉挺、葉劍英、紐曼等人都逃走了。至於武裝工農隊伍和群眾被屠殺的，據日本一位新聞記者考察詳情報告，那時報上多有記載（連國民黨也報載消息），約有五千五百多人。黃平敘述細節真實悽絕悲慘，陳庚更加以補充，最令人傷心的是張太雷之死。

我們住在同孚路和黃平談了許多事，大家很頹喪。過了兩天，陳喬年、汪澤凱、劉伯堅都知道我們到了上海，來看我們，見到生活情況，氣憤不平。尤其是汪澤凱，特別憤慨，要向「中央」抗議。當時陳喬年參加上海黨部，擔負組織工作，汪澤凱剛從漢口抵滬，他同劉伯堅原是長江局委員，書記是羅亦農。武漢情勢恐怖，長江局已不能存在。所以他們都來上海。劉伯堅先到，負責中共全國救濟會主任，有筆經費，援助受難同志。他們都感到中央有意虧待我們一家人。

新年過年那天，我們去第二道交通處，即石瓊那裏。他們請我們吃年飯，才見到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瞿還虛偽地稱讚小女，大家說些敷衍話，周恩來的態度比較近人情些。

這次新年聚餐後，黃平和陳庚都搬走了，我們想搬到樓上去住，正在年初，張寶泉跑來告訴我們：這個地方很有問題，我自己是準備犧牲，

不過你們不應該住下去，必須設法離開。黃平，陳庚既已搬走，瞿秋白想借刀殺人，讓我們無故犧牲。幸運的是過兩天後，劉伯堅來看我們，說我們住的地點很不妥當，而且又不是人過的生活。他的救濟會有一所房子，三層樓，要我們立刻搬去，在霞飛路。我們搬去僅數日後，這一道交通處被破壞，正如張寶泉預言的，他本人犧牲了。想起來毛骨悚然。這一着也表明瞿秋白處心積慮要置我們全家於死地，陰險到了頂點。

劉伯堅對我們友誼深切，對瞿秋白加於我們的虐待極為憤慨。碧蘭特別痛心，他還來安慰。兩三星期後，又有一樁新事件發生。陳喬年住在劉伯堅住所隔一兩間樓以外的屋裏，他妻史靜儀是碧蘭過去武漢戰友，我們之間經常來往。一個晚上，軍警來到他住的地方，把他同其他數位同志（都是上海幹部）一起逮捕，不久槍斃了。這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劉伯堅也恐慌起來，以防萬一，決定搬家，搬到靜安寺路霞飛路之間一座兩樓兩底的房子，我們住樓下。那時救濟會除劉伯堅以外，還有三位同志，他們常來打麻雀牌，似乎無事可為。我們的生活暫時安定下來。「中央」給三十元，除飯錢和煙以外，沒有餘錢。小女頭上生瘡，每天去醫院，乘車沒錢，抱着走去……

在1928年1月到4月間住在劉伯堅家裏，我有機會見到一些同志。我首先設法找到陳獨秀。見面後，他大發牢騷，表示很痛苦；說他忠誠地服從國際，結果革命失敗的責任都加在他身上。他也提到當汪精衛在武漢還未發動清共以前，鮑羅廷等決定把他和譚平山送到莫斯科。譚平山不願意，結果去了南昌參加暴動。獨秀也拒絕去莫斯科，而回到上海，是在7月間離開武漢的。當他後來看到〈八七會議告同志書〉時，獨秀罵瞿秋白幹出來的，氣憤不已。後來我們說到南昌暴動和兩湖秋收暴動時期，他當時已不參加「中央」會議，只是看到文件。有一兩次，他見到「中央」說是新革命的高潮，所以要繼續暴動……他寫信給「中央」，說這是夢話，革命失敗了，應該重新整頓黨來抵禦，同我在北京

表示的立場一樣。他問我在北京的情形，我全告知，他才告訴我，北京慘案發生後蔡和森回來做報告，說在北京黨內有人叛變告密，而告密者同我有關係，應該由彭述之負責任。獨秀告訴我他自己立即提出抗議，連周恩來也反對這種說法，我們兩人既無權又無職，也沒有辦法，只是批評黨「中央」而已。

1928年2至3月間，有人告訴我（大概是石瓊）張國燾住的地方，在跑馬廳東面一條街上，三樓三底，有一大批同志在那裏。除了張國燾，還有許白昊、李立三、張太雷妻王一之。他們日常生活是整天打牌，沒有任何職務。我也去那裏兩三次。當時張國燾想同我親近，談談私話。1927年11月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把他中央職務撤去；但他親身參加南昌暴動，再加廣州暴動失敗……他知道的事很多。他對我說，瞿秋白的領導實在不像話，不能再繼續下去。他問我是否贊成「老頭子」再出馬來主持黨。我說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僅牽涉瞿秋白個人，而是同莫斯科有直接關係的，你比我知道得更多……。第二個問題是廣州暴動失敗後，黨的方針沒有基本改變，還是繼續盲動政策。我們能提出甚麼政策來反對瞿秋白呢？張國燾也承認有這一層困難。要我同獨秀談談，以後大家再討論。可見當時他同獨秀也沒有接觸。他有一批同志，想組織反對派，我答應同獨秀談，但認為獨秀是不會願意再出馬的。的確，獨秀聽了我的話，回說，這沒有意思，是辦不到的。當時在上海不滿瞿秋白路線的氣氛很濃厚，但沒有人完全知道他實在是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

1928年春季某一天，碧蘭和我去見老朋友羅亦農，他原來是武漢長江局書記，局裏有陳喬年，劉伯堅和汪澤凱。當時武漢「中央」自7月尾8月初又轉回上海。在秋收暴動失敗後，武漢的恐怖氣氛日益加深，長江局不能開展，而且失敗後，每天有成千成百的中共黨員登報聲明脫離共黨，像施存統、鍾復光就是例子。尤其是廣西桂系胡景翼的軍隊到了武漢，胡軍司令官陶鈞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李漢俊（湖北省政府前教

育廳廳長)被捕槍斃。另外還有著名的國民黨左派詹大悲——老同盟會，參加湖北省政府，同情中共，是有骨氣的人士，也同李漢俊同時被槍殺了。碧蘭的一位堂妹，陳慕蘭，是湖北師範同學，也在那時被捕槍斃，臨行時的悲慘情形不可形容……。這些都是羅亦農親自告訴我的實事。到廣州暴動時，武漢的鎮壓更嚴厲，劉伯堅後來也親自告訴我們，真是毛骨悚然。長江局不能再存在，所以撤退到上海，羅亦農也就負責共黨上海書記。

他住的是一間三樓三底的房子，位於近卡德路、戈登路旁邊的一條弄堂裏，相當寬大。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在下面客廳裏以及樓上小客室、臥室內壁上都掛上許多湘綉，是最名貴的裝飾品；普通中等階層人家不可能擁有這樣的奢侈品。我們看了之後，羅亦農還很得意地說：這些是在武漢居住時買的，為了掩護……。這是我們過去不能想像的變化。在樓下右廂房內住的是賀子華（朱德的前妻，在莫斯科離開朱德），現在與一位在莫斯科相遇的前法國勤工儉學的四川人同居，據說他能做一手好菜。

賀子華的確是一位漂亮女子，大概三十歲左右，人靈活會說話。她見到碧蘭同我來看羅亦農，趁碧蘭抱着小女和羅亦農的妻子一起聊天（羅妻是碧蘭在湖北師範時代的老同學和鬧風潮的同志，曾擔任武漢婦女部的書記），就拉我到她屋子裏去坐。她對我拉拉雜雜地說了很多閒話，主要是說羅亦農現在生活腐化，不像共黨的領袖。只要看看那些掛着的湘繡就可見他們的奢侈了。她為甚麼對我說這一套話？當然她認為我還是黨裏的老領袖，可以在我面前嚴厲批評羅亦農，但我則是聽聽而已。因我了解她從前同朱德在四川生活豪華，到德國也是經常跳交際舞那一套……，而現在在黨裏變成無足輕重的女人，她的丈夫也毫無地位。而且羅亦農也不會重視她，非常嫉妒，這也就是引致後來最大的悲劇。一年之後，她自動向國民黨上海機關告密羅亦農，她的條件是要給她數

萬元，並保送她出洋，這樣出賣羅亦農。當然國民黨很仇視羅亦農，認為他是1927年3月暴動的領袖人物，1929年春把他逮捕處死。所以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羅亦農。中共派了一些特務偵查，通過一位女同志，知道是賀子華告密的；她已經搬了家，後來王一飛妻知道她的地址。但她告密的只有羅亦農。另外有一位同志吳方也去過羅亦農住的機關，但賀子華告訴警務人員他不是共黨人，這樣確定是她幹的。黨派特務打死了她的丈夫，賀子華躲在牀下，打槍射擊她的面部，遭到破損。當時黨由瞿秋白負責，完全以私人關係，而不警覺注意到這樣危險的人物，而引致這樣的慘劇。

第二位見到的老同志、老朋友是鄭超麟，是我以前在黨宣傳部秘書，幾年住在一起，關係很密切。那時他住在兆豐花園附近一座三層樓漂亮洋房，事實上是中共宣傳部的機關。瞿秋白是總書記又兼宣傳部長。鄭超麟仍像過去一樣做宣傳部的秘書，妻是劉靜真。他們住二樓，屋內佈置相當考究，完全是上海式的歐化。第三樓住一對年輕夫婦，是福建人，燕京大學畢業不久，是來幫助宣傳工作，尤其是英文翻譯。瞿秋白常到這裏來，是個很安全的地點。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同碧蘭去三樓看這兩位年輕同志時，碧蘭下樓要照顧小女，我留下來，隨便談談。他們竟然向我大發牢騷，特別是攻擊鄭妻劉靜真。劉的工作是剪報，但不常做，每天睡到十二時，吃了午飯後，就去兆豐公園遊玩。他們說以前他們以為中央的工作很緊張，現在發現黨的領導層不像共黨人，暗示已墮落腐化。他們倆的生活費很低，但看到鄭妻用的雪花膏是巴黎或美國的產品，他們只知道我是老黨的領袖，而他們抱着理想入黨，滿腔不滿就爆出來。我也無意間發現老同志的轉變。

我們同鄭超麟談些日常普通的話。他對我們私人態度還是同過去一樣，還是熱情。但他對我有點畏懼，而同碧蘭倒是很親切的。他說他只是宣傳部的秘書，對瞿秋白沒有甚麼批評。過去在武漢張太雷黨宣傳部

工作過，但對武漢情形知道得不多，因他很早就離開了。所以談話限於上海，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情。

我們住在劉伯堅家，也就是救濟會機關裏。辦事人中有兩位是我過去在上海大學的學生，劉峻山和一姓羅的，五卅後他們到江西工作。劉峻山曾是江西省委書記，到了上海就在救濟會工作。他們白天出去跑跑，晚上都在這裏晚餐，有時整晚打麻將牌。有一位安徽人總是贏錢，而劉伯堅老是輸錢。碧蘭懂得打牌，知道他們作弄劉伯堅，以為他有錢，後來他輸得沒有辦法，連馮玉祥送他的皮袍也賣到永安公司，得到七百元（那時是一大數目）來還賭債。

革命失敗後，中共轉入地下，打牌是為了掩飾。我在天津時，我們開會也拿了一副麻雀牌。在桌上放一點錢做樣子，玩後給娘姨一點賞錢。完全是偽裝，但後來弄假成真，變成一種風氣。比如我去過張國燾那裏兩三次，他們總是坐在那兒打牌，除張以外，還有李立三、許白昊、王一之，而且是真正用錢賭博，是真正一種墮落的象徵。

沒有人拿起書來看看，研究研究，至少探討革命為甚麼失敗，反省過去的經驗……只有一個人看書，是王一之，老是拿着李後主的詞來念。因張太雷犧牲後，她很傷感痛苦，是可原諒的。王一之原來是施復亮妻，同張太雷戀愛，張丟下原妻和子女，施復亮則神經失常……張太雷也是一朝風流人物。

這些同志的生活怎麼着落的？錢從那裏來呢？過去「中央」用錢極少。我剛到滬時，每月經費僅三千元，還要支持湖南的工作。當然黨「中央」人員薪金三十元，部委二十元，大家同等。一般黨員都是破皮鞋，到吳淞路買舊西裝，三、五元一件。生活非常樸素。現在情形完全兩樣。錢從哪裏來呢？全是莫斯科大量津貼。有多少？除了瞿秋白外，我們無人確知。黨已不按照原來一律平等給薪金，再加上住房和衣着等也大有相差。

黨內薪金分配完全由瞿秋白做主。他本人認為忠實可信的同志，就盡量給好房子住，並有裝璜做掩護。如果是他不喜歡或對他不滿的同志，就給極少薪金，住壞地方，施以苛待，甚至根本不給工作。變成徹頭徹尾的官僚化。我想他對我的待遇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也還有其他同志遭遇到與我同樣的苛待……

一般高級幹部沒有上進心，生活就消磨在整天打麻將牌，或去看電影消遣。形成一種頹廢墮落的現象。而金錢則從莫斯科大量供給。

1928年春，在這個期間，除了見到一些同志外，我又幹了些甚麼？我個人非常沉悶痛苦，除獨秀外，沒有人可以真正談心。劉伯堅固然對我們始終友好，但我看他的生活也不太順眼……我在鄭超麟那裏找到俄國人著的西方革命史一大部，還有一些其他書籍。這時我已經比較冷靜下來，開始研究西方的革命，特別是法國的數次革命（從1789年始）、1848年德奧革命，以及英國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等等……。那時讀歷史同過去全然不同。經過一個革命失敗後，再來看歷史，好像是一個新的歷史，我似乎在這些革命中也佔了一個角色，追隨着那些革命如何開始又如何倒退……。真正體驗了西方革命的過程，而且把西方革命的經驗，同近幾年來中國革命經驗來對照，覺得特別有心得。西方革命的經驗，幫助我了解親身經歷的革命失敗，這是一大收穫。我也不再頹喪了，而是以研究探索來回顧一切。

我一有功夫就看書，碧蘭完全自己照顧小女，負擔很重，不能另有工作。雖然飯食由劉伯堅的傭人供應。小女只有八個月，屋子裏都是大人。我那時注意孩子的心理。那時每天有人來打牌，門上沒有鈴，只有一個銅環，傭人或別人去開門，小女聽見就蹦蹦跳跳起來。劉峻山喜歡小孩，就抱起來玩玩，所以一聽見打門，小女就高興起來。生活是如此單調，不很正常。而碧蘭很辛苦，沒有時間看書。我個人有書看，把瞿秋白對我們虐待也淡忘了。

但是上海的白色恐怖不斷襲來，繼續有同志被捕。許白昊也被捕犧牲了，還有龍大道，莫斯科留學生。還有一些我們不知名字的上海幹部，經常有被捕，一被捕就槍斃。也有很多國民黨認為不很重要的同志就關起來。

1928年4月間有一天，李維漢跑到我們的住所。他這人平時寡言，碧蘭說他是陰謀家，連他笑起來都會令人感到不安。他坐下來沒有幾分鐘，隨便問問日常，是敷衍的，然後從口袋裏拿出兩張船票和三十元，說明是中央現在決定派我到香港去工作。我問做甚麼工作呢？他說沒有指定我的工作，但一到了香港，那裏有人會分配我工作。他還拿出一個香港交通處的地址，放在桌子上，說我可以經過那交通處找到那裏的負責人接頭，就可分配工作。我問他那裏的負責人是誰呢？他也說不出來，只說到了那裏就知道。我就發脾氣，說你們現在中央決定工作就是這樣嗎？（碧蘭在旁抱着小女）。你們派我去香港工作，甚至不請我出席你們中央政治局跟我談談，也不商量做甚麼樣的工作，甚至連香港負責人是誰也不告訴我，我做甚麼工作也沒有規定。我問你從前派你到湖南是怎麼樣的？那時中央是甚麼態度？你記不記得四次大會後派你到湖南做省委書記，我們跟你討論問題，湖南工作計劃怎樣……現在你們派去廣東工作，但不請我參加討論，你知道廣東的情形很嚴重。廣州事變以後，是怎樣情形？這是怎麼回事。你能不能解釋，為甚麼不請我參加中央會議討論南方問題、香港工作問題？其次，我要告訴你，你給船票和三十元，就這樣讓我去香港，如果交通處找不到，發生問題怎麼辦呢？三十塊錢在香港住旅館和吃飯有幾天？你總知道現時情勢到處嚴重，任何機關都可以隨時發生事故，尤其交通處，上海不久以前就有張寶泉交通處被破壞的例子；香港交通處有問題，我帶了三十元，到香港去做叫化子！我又沒有回來的船票！我把李維漢嚴斥一頓，連碧蘭都想不到我那時特別堅決，兇猛。我說你把這種情形告訴中央，我抗議這種辦法。你把錢

和船票拿回去。李維漢面紅耳赤，實在說不過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拿了船票和錢，垂頭走出門去。這是我同瞿秋白的中央最後的破裂。我要求他們給我一個答覆，當然以後無下文。

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我從北方回來以後，我在中共領導工作告一段落，我既然拒絕去香港，這也意味着我在黨內所謂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告一結束。自那一天起，我自己決定不再拿黨的三十元生活費，設法自謀生存，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我把此事告訴獨秀，他也很激憤，說我應該寫信給他們，臭罵一頓，但我沒有寫信，覺得無話可說。我告訴獨秀覺得沒有甚麼意思。

瞿秋白上次陰謀要害我、碧蘭和小女一家人，沒有成功。結果犧牲的是張寶泉，他錯失了目標……。這次，1928年4月間，又來打暗算，把我們全家趕到香港去送死。我懷疑他給的交通處地址是否確實存在。總而言之，他知道我們在香港沒有任何關係，這樣去的話，不是被捕就一定餓死，這種惡毒實在出奇，我深刻地覺得他處心積慮，深謀遠慮，決心要置我全家於死地，所以我也下了決心，同碧蘭商量，無論如何要離開劉伯堅的住處，即不住黨的機關，也不拿黨的生活費，自謀生路。

我們面臨一個大難題，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到社會上找職業，而除了黨內關係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社會關係。老陳的情形還不同，比方他同亞東書局的汪老闆是多年故友，還有一些其他老朋友……。而我在革命過程中和外面社會所有關係都斷絕了。現在怎麼養活全家呢？想同獨秀商量是否可以為亞東書局翻譯一本書出版，可惜亞東書局也倒楣，跟着革命起家，興榮一時，也跟着革命失敗而衰落。

我們時常吟這一句唐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路絕了，突然另有生機出現——我們以前最親密的同志，王若飛，還繼續和獨秀來往，聽到我們的遭遇，很着急，設法給我們找出路。當時我們還沒有見到他，他知道有兩位同志，一位姓范，一位姓李的，在泰

東書局做編輯。泰東書局是賣左派書的。王若飛問老闆是否願接受翻譯的書籍？老闆趙南公是五卅時期各界馬路聯合會領袖之一，當然知道我。兩位同志同他說是彭述之想譯一本書，他願不願意接受。老闆很爽氣，說凡是彭述之譯書，甚麼都可以，一定出版。范李兩位同志就告訴王若飛，轉告獨秀。於是我到四馬路泰東書局去接頭，兩位同志陪我去，他們非常熱情（他們下層同志不知上層內部情形，還是對我像過去一樣看待）。告訴我，說我一決定譯甚麼書，他們就告訴老闆，而且我的翻譯費一定最高，因為老闆很歡迎我。我準備翻譯一部哲學書，即布哈林的歷史唯物論（中文名《唯物史觀》。接頭的結果：五元一千字，按月交稿。這樣一來，生活上就有了把握，不致於餓死。大約是4月底，我託超麟找布哈林書的俄文本。我們離開劉伯堅住所，臨別時，劉送給我們幾斗米，獨秀給我一點錢，可以臨時維持。這樣我已不受黨的束縛。我決定以後不要拿黨的錢了。事實上據說中央已決定停止供給我們的生活費（可靠與否，不知）。這是我和碧蘭生活方式上一個極大的變動，即使多年來以職業革命家的身份參加一些運動，而現在完全以私人身份來找飯吃。

我們搬到北四川路一條弄堂裏，住在一個廣東人屋裏，兩樓兩底。我們住前樓，小女不到一歲，請傭人做飯。屋主人是兩個老太婆（姐妹），是寡婦，有一個兒子在海關做事。我們告訴她們是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譯書人員，但糟的是我們沒有家具，由劉伯堅那裏湊來一點桌椅。房裏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桌，還有小女的籐椅，不成家庭樣子，可以令人懷疑。

從脫離中共中央的管制到拒絕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邀請

5至6月間，獨秀告訴我周恩來拿給他一個電報，是莫斯科打來的，邀請陳獨秀和彭述之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第五次到第六次代表大會四年間只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而在列寧時代是每隔一年或

每年一次代表大會)。獨秀約我到他家裏去討論這個問題。他先問我意見，而我倒問他對電報有何感想。他表示這是一個難題。如果拒絕呢，理由很難說，不拒絕呢，他說他並不喜歡去；「老早他們就要我去莫斯科，我都不想去。」他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參加大會，在出席大會以前，我們必需決定一個態度。他們已經把過去的責任推在你身上，是你的機會主義（八七會議的決議案），你是否承認這一點呢？我雖然沒有指明，當然也被指責為機會主義者。我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過去兩三年來，在最重要的關頭，我們總是提出與國際不同的意見，尤其是關於退出國民黨問題，屢次被拒絕。他們對國民黨政策的後果——現在怎樣？無需多說，即使你陳獨秀承認過去犯機會主義的錯誤，我也不會承認。獨秀回答：那不要管他了，是胡說八道。但我說：到了莫斯科，就不能說是胡說八道，而要加以表明的。我還說：如果你承認對過去負責任的話，你可以留在莫斯科，做第二位片山潛（Katayama），在 LUX 酒店當寓公（片山潛是日本社會黨老領袖，1905 年前後就已在日本組織社會黨，後來受壓迫逃到美國，加入美國社會黨，1917 年俄國革命後，他被請到莫斯科。他那時年紀很大，在 LUX 我常碰到他，獨秀住在 LUX 酒店時也見過他）。

依照我自己的想法，是不願去莫斯科。我不能違背良心，去說莫斯科的政策是始終一貫正確的，而中共中央過去是機會主義，是違反共產國際的政策。這是我要說的真話。我如果去莫斯科，又拒絕悔過，一定會被扣留。因我絕對不會承認過去我們犯了錯誤。我從瞿秋白（他完全是莫斯科的人）的作風透露出來，感到我去莫斯科的結果必然不測。我同獨秀商討了好久，最初獨秀自然有些猶豫，但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拒絕莫斯科的邀請。

那時獨秀同黨的關係：唯一的中央負責人有來往的是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這般人根本不和獨秀見面。周恩來以前我們在中央時曾擔任

臨時軍委會負責人；他的為人和現在中央人員不同，還講人情，所以和獨秀經常有往來；黨有甚麼事要找獨秀全經過周恩來。此外同他關係比較密切的是王若飛，他是「老中央」的秘書。此外很少人和他有接觸。那麼，獨秀的私人生活又是如何？他離開武漢時黨送了他一筆錢。多少不知，後來聽說繼續津貼他。用一個名義，就是「中央」的印刷所，本來是獨秀私人關係捐得四萬元成立，因此就以此名義支持獨秀的生活費。事實上，獨秀不需為生活操心；他過去辛亥以來的老友對他崇拜，他只要開一句口，就由亞東書局汪老闆去找來解決問題……。

我們既然拒絕去莫斯科，這表示我們不但同黨中央決裂，而且也同莫斯科決裂；表示我們不再受莫斯科的支配，也就是自從 1920 年入黨到此時，我們同黨和國際是事實上而不是名義上破裂了。當然黨當時還不敢公然開除我們，而且我既然已自動開始獨立生活，而不再依靠黨，倒給他們解除了一個麻煩。

1928 年 5 月到 1929 年 3 月這十個月期間，我靠翻譯布哈林的《唯物史觀》和波格達諾夫 (Bogdanov) 的《經濟學問答》(用陶伯筆名，泰東書局 1930 出版)，每月拿五十元，生活還過得去。但有一天發生一件事。清晨，剛吃過早飯，我準備開始工作。平時俄文原本放在書桌上，但今早不見了。我們找來找去沒找到，就心慌起來，疑心娘姨拿出去了……於是趕緊準備搬家，因為要是被捕，認為是共黨，就地槍斃。當晚不能搬出去，睡眠不安，第二天碧蘭已經把文件書籍都搬出去了，可是突然那本書出現在小女的籐椅上……我們推測娘姨把書交給房東老太婆，由她交給兒子，兒子懂英文，大概看了一下俄文書，對母親說不要多管事，把書又拿回來了。

我們當然不放心，還是決定搬家。我出去找房子，在北四川路豐樂里找到樓下一層房，就搬進去住。這件事也反映上海白色恐怖情形。房東對房客時有偵察。而國民黨反共氣氛濃厚。有些房東，僅僅疑心房客

是共黨，就會去向國民黨特警告密。這是我們親身經歷的第一次事故，而且還是在租界，可想像在中國地區更加恐怖。

住在豐樂里，沒有甚麼家具，只買了一張竹床，一個梳妝台來掩護一下。這裏的房東比較好些，不像那兩個老太婆經常監視。這時我除了翻譯之外，開始和老同志有點接觸。比如汪澤凱，從莫斯科當國際六次大會代表回來後，沒有工作，也許害怕那些冒險盲動，住在上海；劉伯堅在武漢遭受恐怖，也許拒絕工作，也來上海。通過汪澤凱（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和王獨清來往），我和王獨清為首的創造社人來往。創造社原來創始人之一，郭沫若革命失敗後，已去日本。其編輯部以王獨清為首，還有彭康、馮乃超、李德生等。他們都是日本大學畢業或到過西歐，是高等知識分子，一般文化水準較高。他們約我談政治局勢，提出不少問題，問我的看法。我分析當時的局勢：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已表面激烈化。這些衝突的確是事實，但不等於已經是革命的局面。我認為革命還處於低潮，一般是反動的局勢。他們這些人，除了王獨清以外，都加入共黨，還服從黨的方針。鄭超麟經常出席他們的小組會議。他們都是左派，當時正在同魯迅打筆墨官司（關於普羅文學……），對中共並無反感，採取研究態度，一般是親共的。我們說話是在王獨清住所（北四川路底），彭康也住在那裏。我才接觸到一批親共的文化人，同時和王獨清建立長久的友誼。後來我們同汪澤凱、劉伯堅住在一起時，王獨清也經常來看我們。

回憶當時見到的同志，不得不加以補充。當我們還住在劉伯堅救濟會時，王一飛來看我們。他是我在莫斯科的最老同學之一；碧蘭在莫斯科時，他是黨支部書記。後來在上海軍事委員會工作，我們見面相聚不久，他被瞿秋白派到湖南做省委書記，同去的有任卓宣，擔任宣傳；還有袁大時，擔任組織。三人在長沙都遭逮捕，王一飛被槍斃，殉難了。任卓宣被槍打了沒有死，重傷，夜晚從屍體堆中爬出來，到醫院裏又被

捕，準備再槍決，結果由一位四川軍官保出來，逃到上海，改名葉青，開辦辛懇書店，那時把他當做托派。當我從南京獄中放出來時，他已經投向國民黨，後來曾當過台灣的宣傳部長。至於袁大時，從莫斯科回國後做工人運動的著名人物，在唐山、湖南的水口山、新化的錫礦都是工人組織家。黨裏認為他是鐵漢，堅強吃苦，矮個子但性格很強，能做最艱難的工作。

依照他的個性，被捕後不會投降，但他妻子是湖南官僚的女兒。岳父帶了女兒到獄中哭哭啼啼，要他悔過，免得槍斃。他才心軟屈服保出來了。派他到街上捉人，但他碰到同志裝做不認得，以免同志被捕。雖然有暗探跟隨他，他是有良心的人。後來他對人說，他事實上已不活在人間，只是行屍走肉而已。

陳翰笙的偶遇

我們住在北四川路底，有一天，偶然在街上碰到陳翰笙，他一看見我，高興得很，把我拉到他家裏，也在北四川路底。他說他從莫斯科回來沒有好久，發現妻子離開他了……他在莫斯科住了幾個月，碰到宋慶齡等一批國民黨左派人士。他還接觸了一些中國學生，好像有一種空氣：反對你彭述之很厲害。我問他為甚麼理由反對我呢？他說也沒有甚麼真實理由，主要的是說過去革命失敗你是負主要責任的人。一談到機會主義，就是陳獨秀、彭述之。這我才知道在莫斯科果然有這種情形。後來了解，從莫斯科回來的托派分子，對我和獨秀都很仇視……。

陳翰笙回國後，不能再回北京大學任教職。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王雲五，請他主編一部世界名人集（或叢書），挑選一百位名人（歷史上的和當代的），他覺得這是件有意義的工作，問我是否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著作挑選在內。我問王雲五接受嗎？他說是歷史性的可以接受。我提議他將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反杜

林論、列寧對經驗主義哲學的批判放進去。他要我找人翻譯，我也答應設法。過了幾天，他又來找我，通知亞東書局（我那時古怪，不讓他知道我的住處），告訴我蔡元培當了南京國立研究院院長，找他主辦農業經濟研究所，由他單獨負責。他向蔡元培要求是否可以撥一筆經費，派人調查農村土地分配情形。蔡一口答應。他徵求我的意見，是編百人名著集好呢？還是搞農業經濟研究好呢？同我商量，我說兩者都很好，但你不能兩者兼辦。我個人覺得研究農業經濟比較有實際效果。即調查農民生活情況，包括土地佔有，與地主的關係……很有現實意義。百人名著集，你不必擔任主編，但可以介紹書籍。他覺得我的意見很對……他馬上決定舉辦農業經濟研究所，設在徐家匯，規模相當大的機關，並請我去那裏討論，他問農民以甚麼標準來區別等級，是用土地多寡來區別呢，還是用別的方法？我提到列寧對這個問題很有研究，有英文書本，可以參考。列寧大致是富、中、貧農，是有一定的標準。他認為凡有土地多餘可租給別人，或有大量土地請僱農耕種的是富農；自己有足夠土地可維持生活的是中農；擁有土地不足或沒有土地要租人家的土地的是貧農。我說如果你覺得這個標準可靠，就可以着手進行調查。他完全贊成我引列寧對農民分階層的準繩，所以他後來調查無錫與保定一帶的農村，做了報告（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中引了他的報告）。

從此陳翰笙和我長期保持友誼關係，不斷有來往。我要他介紹一些左派書局出版書，他也很幫忙。他也介紹我見到中國來的美國女記者 Agnes Smedley（阿格尼絲·史沫特萊），曾到過她家裏。他常問我需要幫助與否？他知道我很窮，但我從來不要他給予經濟援助。

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餘波和立三路線

共產國際六次大會開幕前些時日，張國燾來見我，說他就要去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想找獨秀和我聚一次會，談談大家的意見。

於是我約了獨秀，同碧蘭一起到張的住所。他住在公共租界一小亭子間，也按照老規矩，擺一副麻雀牌做樣子。我們告訴他我們不準備去莫斯科出席國際大會。他說他也在猶豫，對於過去一年來國際的做法也相當厭了。尤其是瞿秋白的行為……，所以再三考慮，去莫斯科的情形一定不好。但不去又怎麼辦？獨秀說這個問題需要嚴肅考慮。你既有不滿，去莫斯科一定沒有好結果。張問我們國際的政策錯了，是否有可能改變？獨秀答：以前我同你說過，看來也很難改變。我說那麼你就不要去。張答道：這裏有個實際問題，我現在的生活怎麼辦？如果不去，他們立即停止我微小的生活費，馬上成問題。我說：只要你有決心鬥爭，可想別的办法。他說個人辦法很難。他也知道我已經開始譯書；說：你還可以靠翻譯過活，我就很難。我唯一可靠的能幫助我的朋友是賀龍（在南昌暴動時建立密切的關係），他一定可以想辦法，但他目前去了湘西又要搞遊擊隊，資訊都不通。他也承認家裏本是地主，有點錢，但關係也斷了。他很是苦惱，對黨的盲動政策不滿，處於恐怖之中，但離開黨生活成問題（張國燾說得最露骨），只好留在黨內。這次晤面後我未再見張國燾。

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是在1928年7月17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但我們不知道也在莫斯科差不多同時，舉行了中共第六次大會。當時「中央」是秘密地派代表去參加。這次出席的代表人數有上百人。其中包括經過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以及廣州暴動失敗後從各地流亡到上海的同志；差不多都選到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大會。關於大會詳情，我們當時沒有特別仔細詢問回國的同志。但是這次共產國際和中共六次大會通過了一大批決議案，長篇大論。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共產國際決議案裏將世界革命分成三個時期，而中共決議案又加以重複。就是說全世界革命今日已達到了所謂「第三時期」；是世界性革命成熟時期，也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把這一套理論運用到中國來有重要性。根據它

的論點，中國正是這「第三時期」更能現實地實行革命的場所。除了一些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論說以外，又清算了過去中共政策的錯誤，當然武漢時代的中共領導陳獨秀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毋庸置疑。但是，其後幾次暴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都認為政策上是正確的，不能說是盲動，而是在執行政策時，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錯誤。然而，目前是要準備真正發動一個革命武裝暴動，一個真正工農群眾性的暴動，奪取政權，摧毀國民黨軍閥的政府而代之以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政治決議案共有十條，這就是裏面主要的兩條，還說到由一省或幾省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是完全可能的。

在國際決議案也有同樣的內容。但是自相矛盾，有的地方說革命局勢還未到來，又在另一地方說革命局勢快到來了。在托洛茨基的《中國問題論文集》的緒言中，我在批評這決議案時引了幾句國際決議案關於「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運動論述」有關中共未來路線的話：「在目前，黨必須在群眾中宣傳蘇維埃的觀念，宣傳工農民主專政的觀念，以及革命的武裝暴動到來的必然性。現在就應該鼓動推翻國民黨政府，發動群眾舉行革命示威……，革命未來的增長將向黨提出一個急迫的實際的任務：準備和實行武裝暴動，做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唯一道路」。中共六次大會就是根據這一路線寫成決議案，往後中共執行武裝暴動，尤其是「立三路線」，也緣起於此。

中共六次大會後，中共領導又改組。瞿秋白、張國燾留在莫斯科，成為「國際代表」，連王若飛也留在莫斯科，為國際方面的中共代表，回國擔任領導的是向中發，代替瞿秋白為黨總書記。又是以工人出身的向中發來代替知識分子出身的瞿秋白。新政治局重要人物有李立三、周恩來、李維漢、項英；李立三擔任宣傳，周恩來負責軍事委員會，李維漢負責組織，項英負責工人運動。

向中發是同王荷波、朱錦棠同一類的人物。但他比較誠實，鼓動能

力與朱錦棠相似。說那些簡單的煽動性的話，他有一套。但在黨內朱錦棠、王荷波比向中發資格更老。向中發是北伐軍到了武漢，由許白昊組織工會這一時期才加入中共。他是漢陽漢冶萍礦山內運輸鐵砂的駁船上的工人；這類工人帶濃厚的流氓氣，但他會說話，會鼓動。所以當北伐軍到武漢，他到處宣傳鼓動，工會組成後便做會長，但政治上根本連寫幾句文章都不通的。指定這樣的人物來做總書記，實在是荒唐。原來中共六次大會是由米夫（Mif）來指導的。米夫是東方部部長（表面上是布哈林），據說米夫為了打擊瞿秋白，而向中發是工人出身，即用工人名義打擊知識分子……這樣米夫可以任意擺佈向中發。

向中發做了黨總書記，怎麼辦呢？總要有一個同志來幫他忙。於是擔任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就成了向中發思想上的指導，正像過去在北方局蔡和森指導支配王荷波那樣。李立三實際上成了政治局第一號人物，起草決議案、通告等，均由向中發簽字，或擬向中發的演講稿……李立三和向中發回國後，我們同他們沒有任何聯繫。但有一天，偶然向中發來訪問陳獨秀，恰好我也在場。我才第一次見到他。他大概是因為過去獨秀是總書記，為了禮貌，應酬性地來訪問他。向中發形貌粗大壯健，全是工人模樣。除了應酬之外，我們之間沒有甚麼話可說，不久他就告辭了。李立三當權後，差不多完全操縱政治局，向中發成了他的傀儡，開始他的「立三路線」。

我們同黨中央沒有任何接觸。獨秀偶爾有周恩來去看看他，保持聯繫。他們將碧蘭和我編入北四川路的一個小組內，裏面有沈雁冰的妻子孔德珍。沈雁冰從來不參加小組會議，他住在魯迅同一條弄堂內，經常在三樓，白天不敢下樓……，事實上，小組會議也拘於形式化。

這個時期，李立三控制的中央在上海召集全體黨員到南京路示威，表示黨的存在；黨在上海還有上千黨員。當然這種示威是很危險的，每次要抓人的。我們也到南京路去看看，有些黨員很勇敢，還叫喊口號，

一般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打倒軍閥帝國主義……還是那一老套。當然呼喊「蘇維埃……」這類的口號沒有意義……每次示威，南京路中心交通斷絕，巡警從兩面夾攻，擋住出路，連弄堂進出口都堵住了。就開始抓人，同志們大家都跑進商舖裏裝做買東西，但總有若干人被逮捕。我們很清楚記得有一位在江陰負責的同志，喊得很起勁，一下被抓去了。我們逃到先施公司內才免遭被捕之禍。這一類示威繼續到 1929 年，經常舉行。這也是「立三路線」的一個側影。獨秀說甚麼示威，是示弱。後來越來越少了。

第二四章

中國托派運動的起始 (1929 年至 1930 年)

1929年3月某日，尹寬來約我去看幾位從莫斯科剛回來的留學生，說他們要同我談談。尹寬最近從安徽到上海，原來是安徽中共省委書記，現調回上海。他帶我到他們的住所，在法租界。見到的有三人：王平一、趙濟、徐某。王平一是在五卅運動時期，尹寬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時認識的山東青年團活動分子；趙濟是雲南人……。我很想知道莫斯科的實在情形，自革命失敗後，我差不多沒有再見到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同志，所以我提出問題：中國革命失敗後，莫斯科中國學生間的反應如何……。他們說主要是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同斯大林派的鬥爭。他們已經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因此在這方面說了很多，原原本本地說起1925年開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向反斯大林，與托洛茨基聯盟。當時東方勞動大學與孫中山大學合併，裏面學生鬥爭很激烈，反映蘇聯黨內鬥爭情形。我問雙方意見如何，他們說得不很清楚，但主要是在中國問題上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關於國民黨的問題、關於蔣介石及武漢政府的問題，以及武漢政權反戈後的情勢所引起的爭論。那時我聽得很新鮮……。他們也說到反對派的領導人物，像拉狄克，因他本來是東方勞動大學的校長，後來撤職了。雖然在1927-1928年後托派和左派反對派，被斯大林派打下去了，但在大學生中，中國同志人數很多，同情托派思想的佔多數，但受壓迫，不敢多說；凡有托派傾向的學生都想回國……。

這些事實對我全都是新的。在1927年革命時期我們知道俄國黨內有鬥爭這麼回事，但從來也不知道對中國問題有甚麼發表的意見，除了斯大林的一個反托文件以外，毫無知曉。現在聽來，原來托洛茨基的意見同我們親身經歷相符合，而且我們當時也有同樣的意見，感到深深震動。王平一問我要不要看托的文件？我說你有麼？他說我帶來兩份主要的文件，是偷帶回來的。我很高興，請他拿出來。這兩個文件已經譯成中文：（1）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途；（2）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第一個文件有註說明這是托氏對共產國際綱領批評的一部份（關於中國問題）。我當然對整個文件有興趣，可惜這只是裏面的一部份，後來收集在《列寧死後的第三國際》（英文本）內。

回到家已經很晚。那時我們住在北四川路底的黃陝路。晚餐後到書房內看了一整夜，一口氣看完。這是第一次知道托氏對中國問題的意見。這第一個文件對中國革命的失敗，一直到廣州暴動，做了一個理論的分析，以及教訓和結論。關於他所分析的資產階級問題、國民黨問題、上海事變、武漢事變等，我倒不十分感到特別，因為他那些批評和指責正是我們親身經歷的，我們事實上了解得更多。但我當時有一個印象，就是對於廣州暴動的分析同我們有些不同。我們認為那是一種盲動主義。托氏分析這一盲動主義，卻含有很重大的歷史教訓。因為廣州暴動建立了一個蘇維埃。雖然不是群眾性，而是由上面指定的。但它公佈了一些法令，沒收了一些大產業、銀行；沒收大資產階級的住屋分配給平民。這些法令預示未來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前途，意謂第三次革命必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他認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再不能起革命的作用。在這以前我沒有想到這一着，所以那時印象比較深，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是一個新的啟示，而且覺得他的理論分析很深刻。這兩個文件都是托氏在流放土耳其斯坦，阿馬·阿塔寫的。

第二個文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國問題〉。我讀了之後，最大的啟示是它指出一條道路。在沒看到這個文件以前，獨秀同我都一致認為革命失敗了再來暴動是不合乎常識，是盲動，而應該採取防衛政策來保護黨和群眾組織；這種看法已經存在，但用甚麼口號以及甚麼政治防禦路線呢？當時我們還沒有具體答案。

當然，獨秀和我也提出要自由的口號：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是籠統的，但要有一個總的方向和政治口號，我們沒有想到。而托洛茨基提出來了，要將一切民主自由的要求（言論、集會、結社、罷工、信仰）

統一起來為一個總的口號：立憲會議（我們稱為國民會議），立憲會議的口號是根據俄國 1905 年革命的經驗，認為在中國革命基本任務（土地改革、民族獨立……）沒有解決，應該同一般民主自由的要求聯繫起來，而以國民會議做主幹，這個國民會議應該是平等、秘密普選、全權的。他認為現在中國不是革命的時期，現在是革命失敗後到未來革命之間的中間時期，期限是不可預知的。我們處在這個時期應該有一個政治的過渡綱領，這就是他運用這一過渡性的政治路線，來抵制和代替斯大林所操縱的共產國際那大套繼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路線。

看了這文件，的確特別佩服托洛茨基的看法，是我們自己沒有想到的。整晚坐在那裏看了以後再翻閱，又思考問題，簡直睡不着，沒有上牀。天亮了，我用了早餐，告訴碧蘭我讀了這兩個文件，要馬上去找獨秀，把這兩個文件交給他去看，去研究。

我到獨秀家裏，告訴他和莫斯科回國學生的談話情形，並簡略敘述俄國黨內鬥爭經過，並出示兩個文件，認為是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最重要的文件（至少是我們所知道的）。他問我已經看了這兩文件嗎？我說整晚沒睡來研究，它對中國革命失敗，有一個理論的分析，不但對盲動政策的分析基本上同我們一樣，並且還進一步指出廣州暴動顯示第三次革命的前途。我要求他看完了後，我們一起討論。第二天獨秀到我家裏，陳述他看了文件後的感想和觀念。他說關於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完全同意托氏的批評，而且對有些問題我們過去已經感覺到，不過托氏更有系統地做了理論分析。至於以後的路線問題，托氏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最有價值，因它能概括其他民主鬥爭。他特別着重這一點，認為有這樣一個基本過渡政策可以代替目前的盲動路線。關於前途的問題，他說還要考慮，因為托氏說中國第三次革命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他個人認為值得考慮。我們討論之後，覺得應把這兩文件交給上海一些幹部同志們傳閱。我認為應該在中共黨內要準備組織左派反對派；獨秀同意說要發動

一個思想鬥爭，沒有組織不行。但需要一個準備時間，就是把這兩文件交給可能接觸的同志看了後，大家再來討論以後怎麼辦。這是我們兩人談話的結果。

把這兩文件交給上海同志傳閱的任務竟全落在我身上。因獨秀當時同其他共黨人很少直接聯繫。我將這兩文件首先交給汪澤凱，再又交給劉伯莊；尹寬已看過，又傳到鄭超麟，後來由他們轉交給其他上海黨內的幹部：馬玉夫、蔡振德、屠仰之等。馬玉夫是法國勤工儉學生；他在黨內做工人運動，佔有重要地位，尤其同上海四大報館（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的印刷工人的支部負責聯絡，出席支部會議。屠仰之是印刷工人支部的書記，是印刷工人中的領袖，在五卅運動中出頭，有些文化。

約一個月之後，當多數老同志已讀到托氏兩文件，並加以認真研究思考之後，我向獨秀提議把這些同志集合一起，開一個談話會，在基本同意托洛茨基文件的意見和立場上，來討論怎樣展開一個左派反對派的鬥爭。由我召集談話會，在劉伯莊家裏。這是4月底5月初某日。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劉伯莊、汪澤凱、鄭超麟、尹寬、碧蘭和我。我提出三個問題：1) 革命失敗的根因是機會主義，2) 革命失敗後國際執行盲動政策（到目前為止）；3) 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討論中大家都很興奮，提出許多問題。這些老同志與過去大不相同，以前是對革命失望消極，看了托氏文件後，引起許多問題。但也引起一個嚴重的爭論；是由於獨秀對第三次革命前途問題，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很懷疑慮。他認為既然民主任務尚未解決，未來的革命還是要從民主革命導引，不能說一直走到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點上引起爭論。但我說這是將來的問題，以後可以從長討論。而目前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團結起來，做些甚麼事。當時我發現尹寬有很多意見，態度很積極。我們決定要成立一個中心，選出左派反對派的執行委員會：獨秀、我和尹寬，準備編小組，根據居住的地

點安排。那時我們都在黨內，參加黨的活動，比如我們在華陸路的小組有四、五人，其他同志都有小組；鄭超麟還在黨宣傳部工作。

我們決定在黨內發動爭論，批評黨的政策，傳播托洛茨基的兩篇文章，又從王平一那裏收到其他托氏有關中國問題的文件，收集了印出來（後來收集到托著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裏面）。

自從 1929 年 3 月中我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文件，5 月初我們開始在黨內組織左派反對派；另一方面展開黨外活動，比較有限，除了王獨清一批不是黨員外，其他多數是莫斯科回國的同志。通過王平一、趙濟接觸後，知道他們只有六、七人。他們的領袖是劉英：武漢革命時代當過學生會會長。趙濟介紹劉英同我們執委會三人（獨秀、尹寬和我）談話。據劉英說，他們已經成立組織，是 1928 年秋回國一批留俄學生，其中主要有史塘、陸淵、李特，區芳、梁幹喬，出版一個小刊物《我們的話》（與托洛茨基過去在巴黎出的刊物同名）。我們同劉英、王平一、趙濟討論是否可以同這一批人聯合起來，而且我們也已經成立組織，在黨內開始工作。但劉英給了我們一個奇怪的回答：是否他參加我們的執委會，這本來沒有問題，但他在尚未同我們交換政治意見，把一些問題弄清楚之前提出要加入我們的執委會，我們認為不妥當，產生對他不良印象，尤其獨秀有點反感，在沒有開始討論問題前就提條件，要做領袖，令我們不能馬上信任，還想觀察一下，由尹寬來聯絡。後來尹寬經過王平一，趙濟他們又直接找到區芳，原來他居留香港，那時剛到上海，他是《我們的話》正式負責人。

我們見到他就談合作的問題，區芳告訴我們：他們已在 1929 年初舉行會議正式成立執行委員會，由史塘在上海擔任書記，陸淵擔任宣傳，區芳則在香港組織南方委員會；他在太古船塢做工，有幾千工人，裏面還有老黨工人同志，還有支部。另外在北方也有一個北方委員會，好像有規模……，但是我們發現，區芳說話有點誇大。比如他說在東江農民

中也有支持者……。我們細細一問，他說不出所以然來。根據我們直覺觀察，也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但知道他們的確在上海、香港有小組織。負責《我們的話》，表示他們是正統組織，獨秀和我如果願意加入的話，他們可以考慮接受……。由於這種態度，我們不再繼續談判聯合性的組織。

1929年8月間，左派反對派在黨內有若干進展。首先是在四大報館印刷工人，經過馬玉夫，又有鄭超麟去談話。我也同屠仰之談話，這一支部有二十七至二十八人，有相當文化水準，經過一段時間，這一黨支部完全被我們爭取到左派反對派裏，而且這些印刷工人同志，都是在五卅運動前後加入黨的，是經過鬥爭的，在當時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此外，我們在滬東也爭取到一些同志，像過去我在北大見到的學生陳其昌，那時他在滬東黨部工作。

當時我們除了在中共黨內成立左派反對派，沒有其他組織名稱。《我們的話》則不同，主要是莫斯科回國學生，成立獨立的小組織，不能對黨內幹部有直接影響，唯一較實際的工作是區芳在太古船塢，影響一些黨內老工人同志。

我同獨秀商量在黨內展開公開的思想鬥爭，不僅是組織反對派，並且在思想上批評黨中央的路線，商量結果，由獨秀寫一封給中央的公開信，我也寫一份意見書。這是在1929年8月間。

我的意見書裏我首先說，黨現在路線完全不符合於客觀局勢，應改變盲動主義政策，否則只有繼續犧牲，非常危險。而且這一路線同過去黨的失敗有關，所以我要求黨應該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最後提議應把托洛茨基批評中國革命政策的重要文件，由黨散發給所有黨員作為討論的參考資料。獨秀的公開信內容同我意見書很相似，但寫法和我不同。

我的意見書交給黨中央，是通過泰東書局的兩位編輯同志：董鐵肩

和范香谷。那時我們從華陸路搬到昆明路（楊樹浦附近）。泰東書局印刷廠也在昆明路，董鐵肩常來看我們，來取我的譯稿。他看了我的意見書，很高興，自告奮勇，抄了幾份，再轉到黨中央。後來范香谷也自動加入左派反對派。

1929年8月1日，中共發動南京路的示威遊行，動員一千多黨員，結果英租界巡捕捕捉示威群眾。我在黨支部會議裏對此事件發表意見時，有一位江蘇省委代表王克全來參加會議。我就比較有系統地批評黨的盲動主義，不僅是不顧客觀局勢發動政治示威，而且把任何經濟性罷工轉變成政治性罷工，同時擴大遊擊戰爭……。由於這樣激烈的批評，王克全把我的發言報告中央。因此在1929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和江蘇省委為我召開一個聯席會議，有三位同志出席：惲代英（中央宣傳部代表李立三）、趙雲（後來改名為康生）（組織部李維漢的代表）、王克全（江蘇省委代表）。共有三次會議。第一次由惲代英主持，他提出要解決我同汪澤凱的問題。我馬上抗議，我說我們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我要求把我們的意見公開在全黨討論，要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王克全強調現時局勢緊張，不能把我們的問題交給全黨討論。我就駁他說，列寧在訂立布列斯托條約以及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正是俄國局勢嚴重危急之時，但有政治問題還是交給全黨討論。駁得他們不能答覆。惲代英後來對我說，現在有幾個問題要討論，徵求我的意見，並不是要用組織方式來解決我們的問題。他問我對於機會主義的態度、對於中央問題、關於反對派的立場等問題有何意見？

我說了我的意見。但他們大肆宣傳打擊獨秀的機會主義。因獨秀有信給中央，說它的政策是誤國政策。這詞句有點過份。他們抓住這一點，在黨內到處打擊獨秀的「機會主義」。我說獨秀的基本意見是對的，他一共寫了三封信給中央，為甚麼你們不公佈出來，只抓住最後一封信裏的一句話；獨秀身為總書記，他執行了（共產國際）機會主義政策，他

也要負責。但黨最機會主義的時期是武漢政府執政時期。如果將目前中央政治局人物個別來說（李立三、瞿秋白、向中發、李維漢、周恩來），在武漢時期，他們的表現如何？那時瞿秋白是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負責人，所有禁止農民過火行動的通告，要求各地黨部農民協會服從合法政府都是瞿秋白簽字，後來把所有責任推在譚平山身上，而譚在武漢政府任農政部長職位上，不過是執行瞿秋白簽下的命令而已。瞿秋白在 1927 年 5 月 5 日馬克思生日做了一個公開演講，登在漢口的《民國日報》上。他說馬克思主義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完全相符合，一直到最後的社會主義階段。這不是機會主義又是甚麼呢？可是他後來又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又指出李立三在武漢政府時期是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負責人，又是武漢政府勞工部秘書，發出通告禁止工人行動過火，由他簽名，雷厲風行……。

至於李維漢，他在許克祥叛變（1927 年 5 月 21 日）時是湖南省中共省委書記，當瀏陽醴陵上萬農民要來保衛長沙的工人群眾，他下命令要他們撤退，結果長沙中共黨人潰散受鎮壓，而他自己躲藏起來，一個多月沒有報告中央。再說到向中發，他是黨的總書記，在武漢時期他幹些甚麼？他是湖北總工會會長，他執行了所有抑制工人過火行動的命令，甚至於把糾察隊的武裝自動交給國民黨，自己解除武裝。他曾在 1928 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承認，在武漢時代做了工賊的工作（布哈林在這次大會結論裏面提到向中發承認這個錯誤）。我說要談機會主義，這些同志有甚麼資格來反對陳獨秀？我的意思是整個黨為了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都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問題是現在是否改正了？陳獨秀已經發表意見，改正了。但黨仍然繼續原來的路線，沒有承認過去的錯誤。這裏我提到一些當時黨的重要政策，黨認為富農還是革命的，認為國民黨的政府是地主買辦階級的政府，不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換句話說，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這都是繼承過去的思想路線。我在這次發言中盡量

暴露它。

在第三次發言中，我說反對派是一個國際性的路線。不僅在中國存在。國際反對派不但有托洛茨基反對派，有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有湯姆斯基立科夫的右派反對派，有布哈林的反對派。我說你們要談反對派，必須把文件拿出來，公佈給全黨，讓每一位黨員來研究討論，否則抽象的反對派不存在。所以我不能表示意見。最後渾代英提出紀律問題，說黨應該保持紀律。我回答說：我是最贊成布爾什維克黨的紀律，一個革命黨沒有紀律根本談不上革命。但紀律是要自覺的，而不是官僚化的紀律。我引了列寧的話來反駁他們。在這第三次發言後，沒有人反駁，最後我提出幾條意見：重新審查黨的政治路線，要發表獨秀的政治意見，要公佈反對派的所有文件，停止對於黨員一切機械性紀律的鉗制，恢復布爾什維克的民主制度。這是我在黨內做反對派運動最詳細，最厲害的一次表示。在場的黨代表們沒有話說，每人都很尷尬，尤其是渾代英，他到底是有良心的人。個人來說，他很狼狽。最後，他說把我的意見交給中央。他們有一個人來做記錄，我說我自己也做一個記錄交給中央（對他們的記錄不甚信任）。最後我說我有一個政治意見書，寫好了後同記錄一起交給中央。這是我同他們面對面最激烈的鬥爭；他們沒有別法應付，只好用開除黨籍來解決我的問題。

1929年9月間，碧蘭想找職業，由王獨清介紹一位姓蘇的同志，他開了一間中學：浦江中學，在赫德路，請碧蘭去教書。開學後，碧蘭就住在學校裏，由我帶着小女，由女傭照顧；碧蘭星期六回來，星期日再回去。那個學校裏除了校長和庶務長不是共產黨員外，其他教員都是黨員。碧蘭在那裏見到一批人，首先是吳季嚴（獨秀的外甥），過去是我在上海大學的學生，從莫斯科回來；那時擔任黨機關報「布爾什維克」主編。吳季嚴並不是浦江中學教員，只是來此看朋友，偶然見到碧蘭。她告訴吳一些左派反對派的情形。他也對黨路線不滿，而且認識一大批

莫斯科回國學生，多少受到托洛茨基思想影響。他同碧蘭談了許多，且聽說陳彭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張，很想來見我。碧蘭帶他來家裏，我同他談了一次話，他就贊成我們的意見和組織左派反對派，他又影響了那一批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彭桂秋、彭桂生、杜畏之……。因他是他們的領袖，不但是老黨員，而且很用功，嚴肅冷靜思想，水準比較高；於是左派反對派又增加了一些生力軍。差不多同時，汪澤凱接觸到一批從湖南醴陵逃到上海的同志，像劉毅，安源礦工工會領袖之一。由於秋收暴動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湖南，共黨人都不能留在醴陵，一批逃亡上海，他們對黨的盲動政策極為不滿，於是接受左派反對派的主張，並且加入組織。這時，我們的組織發展到六十至七十人。

1929年9月末，劉仁靜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他本來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之一，但在北京同其他領袖爭吵，受了打擊；後來到上海共青團工作，也不得意。他來找我，問我是否可以派他到莫斯科學習。我徵詢獨秀，獨秀說，好了，送他到莫斯科去吧！因老陳看不起這個人，劉仁靜到了莫斯科，進了列寧研究院；這是給國外（西歐，美國）比較有修養的幹部專修的高等學院。他在那裏讀了四年，在莫斯科時已經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加入某種反對派組織，抱着這種思想，他請求回國，途經西歐，利用這一機會去土耳其斯坦，訪問托洛茨基。托氏見到一個中國人支持他的思想，當然很高興，和他長談，並且專為中國左派反對派起草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託劉仁靜帶回中國，做為左派反對派的綱領。

劉到了上海，通過一位同志要求見我。我們當然歡迎他。碧蘭過去同他關係也不錯，就把他從旅館帶到我們家裏，做了好飯菜來招待他。他告訴我們莫斯科的情況更多更具體，但大體上和以前莫斯科回來同志們說的相類似；關於見到托洛茨基的經過，他倒沒有多說，只是把托的文件拿出來。他最得意的是形容托的容貌，說他老是穿件羊毛衣，打紅

領帶，所以他回來也穿羊毛衣，打紅領帶。他知道托收到過《我們的話》的信，而他不太知道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實際情形。劉也是回中國後才知道我和獨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劉還沒有見到獨秀）。

關於黨內左派反對派和《我們的話》的合作問題，我告訴他我們只見到一位負責人，區芳，感到他說話不誠實，但我認為這沒有關係，我們應該討論大家對托洛茨基文件內意見；如果大家同意裏面的基本見解，合成一個統一的組織，不要各自單獨來幹。劉仁靜說：如果你們要同他們談，最好先加入《我們的話》的組織，到了裏面再同他們談判。這時差不多由我一人應付他，我就說：這不是加入他們組織的問題，因我們也有了組織；自己已有相當成員，也有支部，不是個別加入而是同他們的組織合併的問題。我問他：你自己有沒有加入《我們的話》呢？是不是代表那組織呢？他答說：還沒有，是準備加入，但看到《我們的話》裏面有些情形他並不贊成，我問是甚麼方面，他說還是關於組織方面。我說：你既然不贊成他有組織方面的有些情形，就要討論，而你還是個人，而我們既是團體，更加應該預先和他們討論（我們現已有六、七十人）。他說：只要你同獨秀加入他們的組織，就可以從裏面去分化他們。我就有點發脾氣，說：這是甚麼話！你說應該大家合作，但我們還沒有達到合作就先到他們組織裏面去分化，你這種說法很不對。你說他們組織上有些不對的地方，我們不要討論這個問題，政治上討論有了結果後，我們應該重新建立一個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如果這一點不弄清楚，你要我們到裏面去分化。這還算甚麼？我告訴你這種意見要當心。我教訓他一頓，後來我同獨秀討論這事，獨秀嘆氣說：這個人呀，還是沒有長進。

我問獨秀想不想見到劉仁靜。他說：我沒有興趣。自從那次我批評劉仁靜以後，他就懂得我不是可以隨便搬弄的。同時我發覺他有一種傾向：他自從在土耳其斯坦見了托洛茨基回國後，他自認是代表托（他對我不敢這樣說，不過後來我知道他對別人說他是代表托洛茨基），而且

態度也和從前不同。在未去莫斯科以前還表示虛心老實，現在則自以為了不起，要領導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甚至要求我同獨秀參加另一組織，來搬弄我們。我也感到失望，也就不去睬他。這樣一來，我們沒有直接關係，也就不能繼續同《我們的話》討論（連王平一、趙濟，雖然有關係，但站在批評立場也不加入他們的組織）。至於劉仁靜，本來同《我們的話》有直接聯絡，也還沒加入。他本來想兩面拉攏，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來把持組織。因我拒絕他的建議，失望了。最後他還是加入《我們的話》。這是以後的事了。

我們那時已經開始辦刊物《無產者》，是用鉛印。獨秀從同鄉那裏找到一小筆錢，可以印發文件。這正是1929年10月間，我們的意見書傳達到黨中央，有了反響。我們同黨中央的關係緊張起來。他們開始要問共產國際，尤其是獨秀的問題……。我們在老黨裏有很深的關係，所以他們要考慮怎樣對待我們。在1929年10月間，黨中央（李立三、周恩來、項英、向中發）寫了一封信給獨秀說：中央指定他一個工作，是在中央編輯部將有關托洛茨基的文件編輯起來。給他這樣一個「特別任務」。獨秀從武漢來到上海，雖然不再做總書記，但仍是中央委員（我也同樣，五次大會選出來的），但從來沒有交給他任何工作，不過經過周恩來，交給他一些文件讓他表示意見，而這時突然給他這樣的工作，獨秀當然拒絕了。

1929年11月間，獨秀同我聯名寫信給中央，還是批評黨的政策。當然他們不答覆。這時，他們準備開除我們。首先對付陳獨秀，有一信問他願不願意接受黨中央指定的工作，如果拒絕，他的黨籍成問題，當然獨秀的脾氣是不買賬的，所以11月間，他們假借這一名義開除他的黨籍，當然同時指責他是托派反對派。

獨秀被開除黨籍後，黨中央又開始對付我。1929年12月上旬，通過一個交通（從前上大學生）通知我去一個地方，要同我正式說話，是

在霞飛路中段，一個弄堂裏面，原來是楊賢江的私人住室。楊是「五四」新文化人物中有點名氣的青年人物，是商務印書館青年刊物《中學生》主編，可能已經入黨，在他家中央派了兩人，一是惲代英，那時是中央宣傳部的秘書長，另一個是趙雲（後來的康生），可能是組織部的秘書。

在這次談話中，他們說收到我們的意見書，要求在黨內討論托洛茨基的思想，這是絕對不可能。惲代英是我長期出席共青團中委會時期常見面的同志，負責共青團宣傳部工作，編《中國青年》。此時他很難為情，所以他不多說話。他心裏明白，是有良心的人。而發言最多的是趙雲。他原是我在上海大學教課的聽課學生，革命失敗後不知怎樣把他提拔起來，在中央擔任組織方面的工作（組織部李維漢負責）。他似乎地位相當重要，他倒是大發議論，說了一大套。我把他教訓一頓。我問他：你懂得些甚麼東西？你說托洛茨基主義，甚麼是托洛茨基主義？甚麼是斯大林主義？過去革命的失敗你知不知道？失敗後，中央實行盲動主義，犧牲了多少同志，你也應該知道吧！南昌暴動有幾萬軍隊到哪裏去了？廣州暴動死了多少人？你知不知道？我說你應該懂得這些情形，我們提出要改變黨的路線……。惲代英很為難，默不做聲，趙雲也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因此，這次談話不歡而散，毫無結果。但是我就被開除黨籍。後來在《紅旗》報上登載。並在同一《紅旗》上登出一批被開除的老黨員：陳碧蘭、鄭超麟、汪澤凱、李季、高浩軍、馬玉夫等。

獨秀被開除黨籍後就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我知道我也將被開除黨籍。於是同獨秀、尹寬商量，準備發表一篇政治宣言。我們的共同宣言，起初是我同尹寬討論起草，獨秀看了後，補充意見。這一宣言是中國左派反對派的第一個歷史文件。這是有系統地從斯大林在俄國實行的政策，用官僚集權制代替了民主集中制，以及對中國前期革命中的機會主義政策及失敗後執行冒險主義政策和黨的官僚主義化，有一個全盤性的批判，並提出改變的辦法，在此不重複敘述。簽名

的有八十一位幹部領袖，第一次正式向社會宣佈同斯大林主義的共黨決裂，公開進行鬥爭。在當時中國社會引起相當震動，連胡適之都發表評論，說我們簽名是按照姓的筆劃多少，而不按黨內領袖資格，說是很特別……。

當然國民黨方面也利用我們的宣言，不用去說。後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發生震動，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陳獨秀的名聲。他原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一貫是中共首要領袖，現在站在托洛茨基反對派立場，來公開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共中央。而在國際上認為陳獨秀是中國的列寧，有很高的聲望，所有國外共黨都知道他。而且中國發生了一場大革命，中共是一大黨，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左派反對派運動就必然震撼了各國共黨支部。這是蘇聯以外各國共產黨所經歷的一件歷史性事件。並且中國左派反對派發表了一個有系統的宣言，更顯示它的重要性。

現在我要談到我們成立「無產者」社時，反對派裏面分成幾個派別。主要的是《我們的話》（我上面已經提到）是回國的莫斯科留學生成立的，在上海、北京、香港都有小組織。1929年2月開了一個全國性的會議，正式成立《我們的話》。我們本來想同他們談判合併的問題，結果因和劉英、區芳會面無結果作罷。然後有劉仁靜晤面，提出要獨秀同我參加《我們的話》去分化他們的組織，也沒有繼續談下去。

這裏必須提到王凡西，他在派別重組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1929年秋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在這以前，1926年到北京進北大，1926年秋到廣東，北伐軍中找差事不果，又回北大修業。1927年4至5月間離開北大到武漢，革命失敗後，送到莫斯科，留到1929秋回國。回來後，在周恩來當中央組織部長時期，把他以實習名義分配到上海一個地區工作，但中央發現他在莫斯科時就是反對派，所以開除他。開除後，他同《我們的話》接頭，算是其成員之一。他同北京《我們的話》的一員宋逢春（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學生）關係好，就利用這一關係，把北京《我們的

話》十幾個人拉過來，同劉仁靜在上海拉來幾個人，實現劉仁靜的計劃，即分裂《我們的話》。

正是 1929 年末 1930 年初，他們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十月」社。出刊物「十月」第一期就專門批評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說是「一個可恥的文件」，正因這是一個歷史性文件，是獨秀寫得很精彩的文件，在黨內有影響，他們以之為挑戰的題材。獨秀看到這篇東西大發怒火，說這還有甚麼幹頭，不想幹了。我花了一個下午同他談，說你不應該認為劉仁靜侮辱你就不想幹了。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你的責任……。我說來說去勸服他，而且這種辱罵是不可容許的，我們還要繼續鬥爭……。陳獨秀才恢復精神。

劉仁靜又在《嚮導》裏找出獨秀的文章來批評，說獨秀是機會主義；同中共中央的攻擊一樣。中共中央就利用他的攻擊說，你們看，反對派自己內部都攻擊陳獨秀是機會主義；客觀上幫助中共中央破壞反對派，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然而劉仁靜不可能成為中共中央的工具，因他在中共黨內過去名譽太壞，中央不屑利用他為工具。他只是不斷寫信給托洛茨基，攻擊《我們的話》，而主要是攻擊陳獨秀，說他是投機分子。劉仁靜的動機是可笑的，完全從個人出發，他甚至在回國後曾對許德衍（五四時代重要領袖之一，現在是南開大學教授）說，他在中國代表托洛茨基。這是許德衍的一位學生告訴我的。許通過這學生要見我，被我拒絕了。這是我當時的怪僻，革命失敗後，對一般知識分子不信任，甚麼人都不願見。事實上，劉仁靜自從見到托洛茨基之後，自認為是反對派的唯一領袖，但是當他知道陳獨秀，彭述之都在反對派內，由於獨秀的歷史地位，他要當主要領袖很難，所以他提議要獨秀和我加入《我們的話》，把它當做正統反對派組織，可以操縱，我拒絕了。結果劉仁靜還是從裏面分裂出來，成立「十月」小組，為的是打垮陳獨秀。王凡西在他的影響下，協助他，但王在黨內沒有地位，影響有限。這就是「十

月」社在 1930 年內專幹的事。

另外還有一個托洛茨基派反對派的小組織，「戰鬥」社。是由劉英召集王伯平（王平一）、趙濟等七、八位莫斯科回國的學生成立，由他領導的組織；是人數最少的，也出了一個刊物《戰鬥》。他們主要攻擊《我們的話》和「十月」。

我們「無產者」社受到最露骨的攻擊來自「十月」社。我們不太理會他們。但黨中央利用他們對獨秀的攻擊，對黨內一些幹部施壓力。比如對所謂「調和派」何孟雄，本來是同情我們的，就由此不敢和我們接近，尤其不敢提起我們，甚至口頭上要罵我們……。這一派有三十多人，裏面我們認識林育南（共青團執行委員之一）、李求實、張昆弟……。何孟雄、羅章龍，他的案子後來成為一大事件，下面我會詳說。

1930 年以來，我們和有些幹部雖已被開除黨籍，但仍然繼續做黨內的工作，盡力吸收黨內分子。在八十一位簽名政治意見書的同志，有些不是用真名，隱藏在黨內，沒有被開除，參加支部生活，而且他們能取得黨的公開和秘密文件，用很大的注意力注視黨內的演變。另一方面，我主要的工作是對外展開思想活動、公開反對派的觀點、在社會上起影響，並設法有系統有計劃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著作。因為我們反對派中間有大批懂俄文的人才。

1930 年春夏之交，北伐軍中一位軍長陳銘樞（接近國民黨改組派）出了一大筆款子，開辦了一個書店：神州國光社。他請了一位經理，姓曾的廣東人，認識劉伯垂。劉是老同盟會，與宋教仁一起在日本留學，參加辛亥革命……。劉伯垂在共黨成立初期就加入。他在國民黨內當過中央黨部秘書長，後來在北伐武漢時期當過軍事法庭的法官。人很忠實，對我私人佩服，很有友情，常來看我們，也參加了反對派。那位曾經理對他說：神州國光社有計劃出版社會科學的書，並準備辦一份報紙。他介紹劉伯垂見主編王禮錫。王禮錫自己告訴劉伯垂他原是共產黨員，現

在脫離黨，但表示他們仍要幹革命，而是從思想上做運動。他知道我們（獨秀和我）已建立反對派（我們公開意見書已登載報紙上，成一大新聞），王禮錫問劉伯垂他是否能找到彭述之，因他準備辦一個大型理論性刊物，如果劉能找到彭述之，他願意的話，就請他做主編。於是劉伯垂來看我，告訴我有這件事，問我有何意見，是否願意接受。王禮錫的條件是給主編每月五十元、刊物出版一切費用和印刷都由神州國光社負責。我告訴他，錢倒無所謂，但如果由我主編，每期的稿子由我負責收集，不能修改，如有修改需徵得我的同意，如果另外有人寫稿，也由我看了決定發表。劉伯垂把我的幾個條件寫下來交給王禮錫。王一口答應了，並想見我。我說慢慢來，以後再說，因我當時不想見他……。

這是在革命失敗後一種過份的錯誤態度，是由於我接觸過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作家、大學教授……。在大革命時代統統要找共黨關係，加入共黨，而到革命失敗後，他們是最先跑出去，公開聲明或悄悄脫離共黨。我覺得知識分子實在不可靠，而所以避免同他們來往。最典型的例子是陳翰笙。我在1927年在北京同他見面，他給我很好的印象。1928年在上海北四川路偶然碰到，他很熱情請我去他家。那時商務印書館請他編《世界名人字典》，要我幫忙……。但我從來沒有請他來我家，實在太過份。其他的例子還有不少。這樣就把自己孤立起來，只有反對派幾個同志以外，任何同鄉朋友都絕不來往。這種情形一直延到我被捕之後……，所以外面輿論說彭述之這個人孤僻清高。被捕之後，在南京監獄裏，有時間閱讀馬克思書信、列寧書信，發現他們私人來往，不像我們這樣乾脆，他們同普通社會人士，連自由派人士都有來往，還有通訊。於是我深深反省過去，認為做錯了，從獄中出來後，完全改變態度。

回過來說，王禮錫請我主編雜誌，我從來不見面，不請他來看我，也從不去神州國光社，一切通過劉伯垂。王禮錫似乎倒沒有表示反感，只是不很愉快。我主編的雜誌稱為《動力》，開始從理論上宣傳托洛茨

基派的思想。首先我發動一個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是同斯大林派爭論：中國社會是封建生產制，還是資本主義生產制。這一爭論有很大反響，《動力》印了五千份很快銷完，王禮錫也很高興。我編了三期，還是不願見王禮錫，他當然很不愉快。所以說書店財政有問題，要停止出版《動力》。這完全是我的態度引起來的。不久之後，神州國光社另辦一份刊物：《讀書雜誌》。王禮錫又託劉伯垂來同我談，說這是經理的意見，為了節省經費，由他出面辦《讀書雜誌》，但仍希望我繼續寫稿子，介紹文章和書籍。於是我寫了一篇批評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一文，他又請李季寫了一篇哲學性的文章，把我們來做廣告。第一期發出時，他在上海四個大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整版登廣告，用我的名字來招徠讀者。這一着卻引起意外，他也倒了小霉：陳立夫把他找到南京，扣留起來，對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彭述之是黑名單裏的人，是被搜尋要逮捕的人，連陳獨秀在內，你怎麼給彭述之登廣告！為了此事，陳銘樞特別跑到南京，把王禮錫保釋出來。後來我還是介紹了不少同志在讀書雜誌寫文章、翻譯書，像杜晨元、彭桂秋、吳季嚴……；他們要謀生活。王禮錫雖然始終不愉快，但對我還是表示佩服，說他是後輩，所以後來他編《世界名人辭典》時，還寫信給我，要我寫列寧和托洛茨基小傳，這也是表示他還是對我維持好感。

1930-1933年間，《讀書雜誌》發動一場思想論戰，中心命題就是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斯大林派當時也辦了一個雜誌《新思潮》。兩方面展開一場理論性的大爭論。我當時把材料準備好了，開始有系統地寫一篇文章，可惜由於工作太忙，又要翻譯搞生活。1932年秋遭國民黨逮捕囚禁，只好作罷，沒有完成，把提綱交給同志去寫。這一場論戰結果是托派佔優勢，而斯派不能再反駁，就停止了。

1928年以來，自從中央斷絕我們的生活費之後，我完全靠翻譯謀生，從俄文翻譯出來的書有布哈林的《歷史唯物史觀》、波格達諾夫的《經

濟學問題》、留波夫的《政治經濟學》，以及一俄人著的《西方勞動運動史》。起初由泰東書局出版，後來同其他書店發生聯繫，比如：春秋書店（通過王獨清）、水沫書店（通過陳翰生）。

1930年，我見到中學時的老同學馬世材（馬任之）。他有一個關係，是山東一個小軍閥的兄弟，要想辦書店。那個軍人給了他幾萬塊錢。馬任之到上海找到我，告訴我曾在福建國民黨左派工作過；他有一筆款子，準備辦書店，要我給他做一計劃，並且供應書稿；我當然同意，這就是湖濱書店。除了同志給他譯書外，我也把留波夫的《政治經濟學》給他出版。除此之外，還有亞東書店……。所有新開的書店都同我們反對派有關係，出版了不少社會科學的書籍。那時我是充份自覺地集中力量做這方面的工作，感到從前沒有幾本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書籍傳布，所以共產黨員一般思想水準很低。這是我親自深感到的。因此，當中共專門集中力量在農民暴動的時候，我們反對派則集中力量在復興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把它當做主要任務。1930-1931年期間出版的重要書籍中有《托洛茨基自傳》（有好幾個譯本：新生命書店譯本、春秋書店的譯本，後來還有劉仁靜的譯本），克魯泡特金的《法國大革命史》（*Krotpotkin: La Grande Revolution*; 1893），都是當時有價值的著作，譯成中文。

中共第六次大會後內部的演變

1930-1931年是中共政治和組織上一個大的轉變時期。在政治上，莫斯科的政策完全證明破產。另一方面，內部組織被敵人破壞，呈現混亂、分裂，也有大批人投降國民黨。同時左派反對派對黨政策的批評（有不少文件證實），認為必然引起災禍，組織潰散；這一判斷得到確證，但黨中央不但不接受我們的批評，反而用開除我們的黨籍來答覆我們。

黨的六次大會之後，政治路線上的盲動政策似乎暫時停止，但事實上卻是進一步走向盲動主義，1929年10月26日，莫斯科有信給中共中

央，指示它應執行的政策，現把要點節錄如下：「工人運動的新潮流正在高漲，這是革命新浪潮的發動。中國全國的危機以及革命浪潮另一特點，就是農民戰爭。順着這一支流，將要生長成為全國革命運動，將來最有利的高潮，變軍閥戰爭為革命的內戰。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群眾運動的主要的緊急的口號。」

中共中央就是根據這一指示，於 1930 年初開始雷厲風行，準備武裝暴動來「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

1930 年 5 月到 7 月間，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廣西的白崇禧、李宗仁，以及廣東的張發奎，發動一次對付蔣介石的軍事進攻。而這場內戰是國民黨取得政權後最大的內戰，事實上是在汪精衛派鼓動之下發動的。據稱死傷數十萬人，中共中央就利用機會「變軍閥戰爭為革命的內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做了一個決議，這是一篇很長的文件，從中國到世界局勢、戰略、組織，如何武裝等問題，做了詳細決定。後來名為「立三主義」。這是根據第三國際的所謂「第三時期」的戰略路線，全世界進行，但認為中國是最能實現這一路線的主要國家（因為有農民戰爭）。

這一決議案成為中共全盤戰略，準備武裝暴動，進攻城市全面性動員。這一來黨的組織系統完全改變，把黨、團、工會組織成為一個總的行動委員會，集中在三人指導之下：向忠發、李立三、及袁炳輝（青年團負責人）。在這一組織下，在每一省、每一區、每一縣都有行動委員會。而這行動委員會完全代替了黨、團、工會，直接組織工人鬥爭。要使所有罷工，包括屬於經濟性的罷工，都一律變為政治性罷工，並在各地組織赤衛隊。當時的目標就是要奪取城市。

這個決議案是李立三執筆。他強調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而將農村遊擊戰爭當做配合性的補充，幫助城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這個總路線和組織配合下，中共發動大動員。

正當此時，即 1930 年 6 至 7 月間，桂系白崇禧、李崇仁與張發奎聯軍進攻長沙（是蔣系何鍵駐軍），奪取長沙，直進岳州；何鍵的軍隊又反攻，桂系和廣東聯軍退出長沙……。長沙岳陽一帶變成了空虛地帶。這時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時機進攻長沙和岳州，發動三支軍隊，即著名的「彭德懷統率三軍」。7 月 27 日佔領長沙，成立湖南蘇維埃政府，可是不到十天，8 月 5 日，何鍵軍隊，加上蔣介石增派軍隊，一下子打垮彭軍隊，退出長沙。這是中共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次試驗，也是最後一次試驗。按照李立三的計劃，奪取長沙可直接攻武漢，再取南京……。另一插曲是奪取江西的吉安（南部一縣份），也失敗了。

在奪取長沙之初，莫斯科大肆宣揚。失敗後，托洛茨基一定攻擊，斯大林設法推卻責任。當時，瞿秋白還留在莫斯科，約在 1929 年 7 至 8 月間，周恩來也去莫斯科。後來根據向忠發的供詞，周恩來同李立三有過衝突，原因不知，但很有可能。總之，共產國際就派瞿秋白、周恩來兩人於 8 月間回中國來檢討長沙事件，清算責任在誰。於 9 月間召開三中全會（六大後中共中央第三次全會）。參加這次會的人數算是相當多，有國內的中央委員、聯工會負責人、共青團負責人以及省委代表……。據稱有二十餘人，在上海召開。

這次會議是專為檢討長沙事件，問題是長沙暴動是否違背國際路線，還是執行國際路線。事實上，莫斯科交給瞿秋白、周恩來的任務是把長沙暴動的失敗推到中共中央領導，尤其是李立三身上。但瞿、周到了上海，並不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因為這裏面有問題：中央負責的雖然主要是李立三，但還有向中發，李維漢（那時項英已去蘇區）。同時如果要清算李立三，瞿秋白過去也有聯帶關係；周恩來過去一段時期完全參加。他們為了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責任全推到李立三身上。所以檢討的結果：認為李立三、向中發的中央是執行了國際的路線，而且是有根據的，引的是莫斯科的決議案（即 7 月 23 日中國問題決議案，從莫斯科帶

回來的)。這一決議案的要點值得引出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以及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都曾經認定中國革命浪潮的新的浪潮不可避免的。最近中國的事變完全證實這些決議案的正確。我們暫時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的革命形勢，但是事變的發展趨勢，即使革命不能包括全中國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幾個主要的省份。黨的當前任務是在鬥爭的過程中，準備並且集中力量去迎接最近將來的決定勝負的戰鬥。」

這就是同長沙事變相呼應，中共軍隊退出長沙前的決議案。這次中共中央三中全會是瞿秋白主持的，他同周恩來等認為對長沙的進攻和國際7月23日的決議案沒有衝突。相反地，是依照這一決議案的指示執行的（中共進攻長沙時還沒有得到這一決議案），結論就是如此。但瞿、周加以補充：「在事變中有些錯誤，就是估計局勢迅速緩慢的發展不夠，估計太急切了。所以沒有準備得好，所以失敗了。」還是斯大林的那一套，總是技術上的問題；但即使三中全會這樣的說法，當然不符合莫斯科的意向。

中共黨內的派別鬥爭

中共黨內不同意見除了左派反對派，其主要人物已經被開除了不少，還有兩個重要派系，一是何孟雄所代表的，另一是陳紹禹所代表的。

何孟雄，湖南人，是早期黨員。在北京共黨小組成立後（1921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即加入這小組，從事工人運動，在北京幹部中公認為最忠實的同志。1927-1928年間，他同一些北方同志被調到上海，擔任江蘇省委工作，負責上海一個區的書記職。他是個實幹家，雖是大學生，不偏重理論，而帶有實際主義傾向。他同其他從北方來上海的幹部，都是實際上參加過革命，有相當經驗和常識。所以這一批人在中共第六次大會之後，那種所謂「處於兩個浪潮之間，革命即將到來」的論說。尤其是李立三控制的中央不斷開啟盲動，不斷示威，將每次經濟性罷工轉

變成政治性罷工那一套，看到事實上行不通，表示不滿。但他們有個缺點：不能從整個國際視線來看問題，以為共產國際還是對的，而是中共中央執行人員犯錯誤。

何孟雄本人同左派反對派有過接觸，看到過他們的文件，這是很顯然的。於是更加反對李立三為首的中央。在長沙事變以前，他已開始在實際問題上表示不同意見。比如他認為行動委員會的意見行不通。在三中全會上，他以代表資格參加，首次公開指名攻擊李立三。因此在黨內出現反對派，即何孟雄派，指責黨路線錯誤。這個派系主要成員，不僅是北方來上海的老幹部，還有上海青年團領袖林育南、李求實、還有羅章龍、王克全、張昆弟……。大約有四、五十人，都是黨內的中級幹部，除了在上海留下來的以外，也散佈在各地。可是這個何孟雄派被黨中央壓下去了。因為三中全會新選的政治局有瞿秋白、向中發、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何孟雄的資歷地位當然不及他們。尤其何孟雄相當佩服周恩來，在三中全會上聽到周的發言，被他說服了。

陳紹禹是另一派系的領袖。後來改名為王明。過去在安徽上中學，1925年末1926年初，被送到莫斯科進孫中山大學。開始校長是拉狄克（Radek），而米夫（Pavel Mif），當時只是教授，不久成助理校長。米夫本來是我在東方勞動大學的同學（1923-1924年）。他另在師範班修業，我們時常見面。但我對他從來沒有好印象。東方勞動大學的校長是布魯以多（Broido）。他每星期同太太來看中國學生。米夫緊跟着他，巴結他；因為布魯以多是蘇聯民族委員會副委員長，而斯大林是正委員長。當時羅亦農同他友好，我則討厭他，從來不同他打交道。我覺得他太會逢迎人，不是好人；想不到他竟然做了孫中山大學的副校長。1927年5至6月間他到武漢，陳紹禹就是他帶回中國的。米夫和妻子來見我們（在譚平山家）問我一些關於中共過去歷史和運動的問題……。陳紹禹也跟着來，給他提皮包，做翻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陳紹禹。後來知

道陳是米夫的寵兒。通過陳紹禹在孫中山大學建立一個小組織，同其他派系鬥爭激烈，派系中有俞秀松派，還有托派。

陳紹禹是 1930 年春從莫斯科派回中國，隨行的有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在小組織內還有沈澤民、其妻張琴秋、陳雲。當時米夫已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一手培植這一批年輕人，有計劃地到中國來奪取中共黨領導權。那時李立三當權，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將他們派到上海各區去工作，比方陳紹禹派到滬東區……。據說陳紹禹還受到李立三的懲罰：「留黨察看。」陳紹禹的俄文是最好的，完全看莫斯科風向；任何命令絕對擁護。1930 年 11 月間，莫斯科有正式命令，要清算李立三。陳紹禹馬上擡起頭來，激烈攻擊李立三，公然稱「李立三路線」（而不是黨中央路線），寫了一個小冊子「兩條路線的鬥爭」，攻擊李立三也就是攻擊黨六次大會後的三中全會，同時又攻擊瞿秋白，罵他是調和主義，指斥他曲解了共產國際的路線（因瞿完全把持三中全會），莫斯科的所謂「國際派」的分子仍繼續回國。陳紹禹派就稱為國際派，由陳紹禹在前面進攻，米夫在背後指揮。他們要求另開一次會議來解決「立三路線」，要把黨「布爾什維克化」。

於是莫斯科決定召開四中全會，由米夫親自來上海主持，是在 1931 年 1 月初召開。據說參加這次會的人數不少，但會只開了數小時，由米夫同陳紹禹事先擬了一個決議案，清算李立三，未經討論就拿來通過。於是選舉新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不按慣常規律。中委人選有從來未在黨內工作過的人，另選政治局，除了保留向中發和周恩來以外，李立三被開除出中委，瞿秋白被開除出政治局。所選的政治局人選是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沈澤民……。都是莫斯科回來的陳紹禹派系，在中共內部來了一次「政變」，把黨六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除掉，而將與黨無傳統關係的新人物捧上台來。完全由米夫（代表斯大林）來控制。

這個「政變」一發生，黨內所有中級幹部都非常氣憤，尤其是何孟

雄派，有相當勢力，連過去站在李立三方面的人物（如王克全等）也支持他，成為一大派系，準備成立一個非常委員會，建立新中央同陳紹禹的中央對抗，並要求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來解決問題。鬥爭剛發動，一兩個星期後，即 1931 年 1 月 17 日，何孟雄派系人物，在一次會議上，三十多人全部被上海英國租界巡警逮捕，轉手交給國民黨軍警；其中有二十五人在龍華司令部槍決，裏面除何孟雄外，還有林育南、李求實等人。當時有人說是陳紹禹告密，但沒有證據。我們當時估計很有可能。後來陳紹禹放謠言說是羅章龍告密的。羅章龍也在何孟雄組織非常委員會時，組織了一個派系，基本上與何一致批評「立三路線」，但羅走得更遠些，認為共產國際也有錯誤，不可信任。羅章龍是老黨員，職工運動的老領袖，三中全會後仍是中央委員，當時負責赤色職工會，殘餘的工人幹部同他都有聯繫（北京、天津、河南）。但何孟雄事件發生後，他的組織也是曇花一現；因國民黨對共黨鎮壓是雷厲風行，企圖用全力毀滅這個黨，正是長沙暴動失敗後，中共在蘇區已成立政府，蘇區主要是彭德懷、毛澤東、項英等一批搞軍事的人物，而國民黨則要盡量破壞共黨到處的鬥爭力量。

這裏必須指出：在清算李立三的文件中，稱他是個半托洛茨基主義者，說何孟雄是取消派（也即托派）的暗探，因何孟雄與羅章龍等，大概在三中全會以後曾提出意見，認為應該把陳獨秀、彭述之召回中央負責。所以陳紹禹寫小冊子，指他們是托派暗探。而我們當時並沒有建立新黨，還是中共內的一派，在「四中全會」之後，獨秀同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共中央，檢討這一年來的路線；這就是 1931 年 2 月 15 日無產者社〈告全黨同志書〉。在這份文件中，我們對中共中央做了一個總結，基本上認為「李立三路線」自身不成立，只是斯大林路線的中國翻版。可惜當我們發出這封信時，中共黨組織已經差不多整個遭受浩劫。

現在回顧一下當時情況，正是中共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如果當時

托洛茨基派沒有內部糾紛困擾，用全力影響黨內許多幹部，像何孟雄，羅章龍等老黨員，也許可以避免他們不致於採取過於簡單匆促的步驟，錯失了挽救的機會。可惜由於劉仁靜等在《我們的話》和「十月」寫文章指斥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中共中央就大加利用，大肆宣傳托派機會主義。所以何孟雄（從他的文件中反映出來）總是否認他是取消派，甚至還反對取消派。而實際上他是受我們的影響，但我們不能進一步同他們聯繫。雖然我們之間有些傳統歷史性的關係來往。比如何孟雄同碧蘭過去很熟，在街上碰到碧蘭，何孟雄表現悽然，因他妻子（廖白英，是北方中共第一個女黨員），剛去世，是因為貧窮，病重不能進醫院治療……。他非常悲痛。張昆弟也常見到，同我們友好。這些北方區工人運動幹部，對我們還是有好感。如果我們能夠直接把我們的思路向他們解釋，很可能得到他們的同情和贊助。

除了何孟雄派系受到國民黨殘忍的鎮壓，完全被消滅了，但其他破壞也很厲害，1931年6月間向忠發被捕，隨着是羅綺圓，廣東彭湃等農民運動領袖；楊泡安，廣東省委，是做國民黨工作的。羅章龍、黃平也被捕……。

還有其他幹部分子很多被捕。陳紹禹、沈澤民、張聞天、秦邦憲這班人，雖然篡奪了黨的領導，但中層幹部大部份被捕，黨組織完全解體。尤其是顧順章案件的後果特別嚴重。顧順章是1927年3月21日上海暴動時期，上海工人糾察隊隊長。革命失敗後，王若飛當書記時，中共特務組織上面是周恩來掌管，實際上由顧順章領導。他當然也不滿陳紹禹的領導，跑到漢口在一個雜技團工作，被國民黨人認出來了。1931年4月間在漢口被捕，但馬上投降。把所有中共特務機構都全盤托出來了。因此中共黨員多人被捕。陳紹禹指導的組織全部垮下來了，只有最下層的組織還勉強保留下來。據當時國民黨的統計，被捕後自動投降或被迫投降，或自動聲明脫離的中共黨員有五千多人。除蘇維埃區外，共黨組

織差不多潰散了。

托派組織統一的周折

現在回過頭來看左派反對派活動的情況，除了獨秀和我寫了不少文章，出版「無產者」，但不能直接找到黨內同志來說服他們，而且托派的小組織「十月」社，《我們的話》不斷寫文攻擊我們，多少削弱了我們的力量。

上面曾提到過：在托洛茨基那方面，我們已將八十一位同志簽名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和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譯成英文和俄文寄給他，但沒有直接通信。同時劉仁靜和《我們的話》不斷地寫信給托洛茨基說「陳獨秀派」（不說是「無產者」社）全是些機會主義者，沒有希望。這些資料到了托洛茨基面前，他有一個時期很謹慎，不表示意見。直到1931年1月8日托才正式寫一封信給全體中國左派反對派，信中解釋一些問題，特別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問題，認為這一口號並不錯誤。雖然科學地說是無產階級專政，如果通俗一點說是工農政權，即無產階級與貧農同盟（因為《我們的話》和托有通訊，專門批評我們主張未來革命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老機會主義。劉仁靜他們則主張，只有無產階級專政……）。

說到無產者社（即陳獨秀派），托說他們的綱領已仔細看過，研究過，發覺同他自己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駁斥了「十月」社和《我們的話》的指斥。說到陳獨秀，托洛茨基說他知道過去陳獨秀的確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但他已轉變過來反對斯大林路線，並支持左派反對派的意見，這是一個最大的進步。而且認為陳有很豐富的經驗，年輕人應該向他學習。因此托提議中國左派反對派四個派別，應該立即設法統一起來，否則沒有前途。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向中國幾個托派組織表示意見。

這封信一來，劉仁靜、王凡西（當時又名王文元）等就完全轉變了，贊成統一。因托把「可恥的文件」說成是有價值的文件。本來陳獨秀最仇視劉仁靜等，認為同這班人談甚麼統一呢？但托洛茨基的信收到後，他也一轉而主張馬上統一，盡可能快。而我意見稍有不同，我認為統一的確需要，但不要太匆促；他們不是昨天還罵我們是機會主義者，今天有托來信聽托的命令，一百八十度轉變，這並不是革命家的態度。尤其是王凡西，急於要成立四派協商委員會。我則認為沒有一個短短過渡性時期來考驗各派的分子，可能統一後問題更多。尤其是政治上、組織上要加以嚴肅討論，要弄清楚立場。事實上這班人沒有組織觀念，純是小派系，沒有政治原則。因此我認為可以成立協商委員會，由各組織派代表，首先討論政治問題，避免搞組織陰謀。獨秀說要我參加協商委員會。我說不要，派別人參加，結果是吳季嚴和馬玉夫代表「無產者」社。

「十月」社內部當時發生問題。王凡西同一批人為了一些細小的事，而並不是為了政治問題，把劉仁靜開除了。劉就同其妻另組了一個「明天」社。我看到這種情形，很不以為然，認為毫無原則。結果「十月」社只有王文元（王凡西）為主要代表……。

《我們的話》原來的中央委員會有施叔雲（又名史塘）是書記，陸淵做宣傳，張將負責組織。前兩位在統一期間，不辭而走，只有張將留下來，但也沒參加協商委員會。梁幹喬也被排除了，只有一位從香港來的陳亦謀為代表（王文元的關係）。

最糟的是分化「無產者」社。陳其昌是北大學生，王凡西也曾是，通過陳其昌見到陳獨秀，一見面就恭維他，表示崇拜他。陳獨秀也認為這個年輕人不錯……。這是陳獨秀的一個毛病，喜歡恭維他，而批評就不喜歡。既然劉仁靜開除了，陳獨秀便積極起來……。陳其昌拉攏鄭超麟、何資深，在「無產者」社內成立小組織，同時拉攏馬玉夫，排除彭述之和尹寬。王凡西知道劉仁靜不容易對付，他還沒有見到我，但知

道我同尹寬也不易對付。於是包圍陳獨秀，用他們的人選佈置起來成立統一委員會，把持未來的組織。這是王凡西的計劃，後來也的確實現了。

1931年2月到5月期間，協商委員會扯來扯去，主要是統一大會上代表的人選問題，即按照甚麼比例來選舉。如果按比例來說，「無產者」社人數最多，有一百七、八十人。《我們的話》有上百人，「十月」社有四十人左右，《戰鬥》社有十餘人。而協商委員會就不按比例，而由他們挑選。比方「無產者」社沒有彭述之和尹寬，由陳獨秀和鄭超麟決定。滬東區支部開會抗議，要選我做代表。「十月」社四十人左右，但代表人數超過「無產者」社和《我們的話》。那時我不表示意見，我知道陳獨秀是贊成王凡西他們的，所以不願干涉，我讓他去搞，也懶得同他談。他被他們捧得昏頭昏腦；王凡西、鄭超麟、何資深在背後攻擊我，也順便攻擊尹寬。

既然「無產者」社滬東支部舉我為代表，我覺得應該負責任，所以參加這個統一大會。這是在1931年5月初，在滬東區一位領袖工人同志一幢兩層樓房裏，開了一整天。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王凡西）、梁幹喬、宋進修、宋逢春、羅漢和彭述之……。會議的主持人是王凡西，但沒有一個政綱，也沒有討論組織問題，更沒有討論工作問題。只是把托洛茨基在土耳其起草的提綱修改一下，弄得不三不四，事先也不討論就通過了。然後選舉中央委員，王凡西派佔絕對多數。常務委員會由陳獨秀、鄭超麟、王凡西、陳益謀、李一凡組成，我被選為中央委員，還是《我們的話》和《戰鬥社》的投票。梁幹喬未被選進中委，我本人也沒有發表甚麼意見，只責問為甚麼政治和組織問題方面未擬成決議案，沒有事先討論，只是批評性的。這事實上是由王凡西控制的所謂統一大會。

這次統一大會選舉中央委員和常務委員的，並非根據各個組織人數比例，而是事先安排好的。結果很不公道，比如「無產者」社人數最多，

在內部出力最多的除我本人外，是尹寬，其次是馬玉夫（工人關係最多），他們兩人都未被選為代表，當然我們都未被選為執行委員。再者《我們的話》那些人看到王凡西那樣搞，在會議過程中，有的不參加，有的消極了，中途退出。其次常務委員會選出的五人也引起很多人的反對、不滿。而在中央委員會，王凡西，宋逢春，卜一凡，羅漢都是「十月」社人。

最不滿的是馬玉夫。他自認為最有功勞，而事實上，的確「無產者」社的工人同志都是由他爭取過來的，比如報館工人廿多人，參與有力量的工會，都是由他的工作轉過來的。馬玉夫原是協商委員會的成員，起初王凡西派拉攏他。但他發覺「十月」社不忠實，虛報人數，所以大為不滿，半途退出協商委員會……。他找我和汪澤凱說：這樣的統一沒有意思，就是要統一也要有派系鬥爭，他主張建立一個派系，不管統不統一，繼續同那些人鬥爭。我同汪澤凱拒絕他的要求。我對他說：我個人也不滿意這樣的統一，但認為成立派系要有政治立場，而目前沒有政綱上的異見。大家都承認托洛茨基的草案，所以在政治上來說，我不主張成立派系，在統一後看他們的工作進行如何，採取觀望的態度……。馬玉夫又同陳獨秀去說，說他反對那一類的統一。獨秀脾氣不好，把他大罵一頓，出言很重，又當着兩個同志的面。馬玉夫當然非常反感，常發牢騷，我當時不知底細，還想說服他，要他冷靜一點，耐心點，完全想不到他會背叛；正由於獨秀把他大罵一頓後就準備背叛。

馬玉夫，湖北人，是勤工儉學生，和碧蘭同時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回國後，同志間都認為他誠實苦幹，一直對革命工作很認真，革命失敗後，還在上海工人運動中活動，肯吃苦耐勞，雖然能力不高，大家都很看重他，所以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有背叛的企圖……。我還想說服他，我請陸沈帶他到我家來談，那時我們剛搬進了法租界的花園坊。我耐心同他談，沒有發覺他有甚麼特別徵象。但是碧蘭很敏感。她警告

我：你要當心！你說了許多道理，但馬玉夫的眼睛紅了，我看他這人不正常，有危險性。我還答她說：馬玉夫不會有甚麼危險吧！據碧蘭觀察，在他背叛前一日，即5月下旬一天，他通過我們的弄堂，在門前經過，停下來看門牌……。就在5月23日，他到國民黨軍龍華司令部自投羅網，把托派重要人物，亦即統一大會選舉出來的領導分子的名單和住址全部告密。

在馬玉夫到國民黨告密的當天，有一奇蹟發生了，就在龍華司令部發生；部裏有一位總司令，還有幾位參謀。其中一參謀姓潘，江西人。馬玉夫來投案時，他在場聽到名單中有彭述之。潘參謀有好友潘谷之，福建人，日本同盟會時代的同學。而潘谷之由我的好友馬任之介紹見過我。於是我們之間建立友好關係。他潘參謀常提到我是一個有學識的人士，印象很深，記得我的名字，所以立即通知馬任之，說今晚一點鐘就要開始捕人。

馬任之不敢來我家，他到陸沈那間小學，碰巧碧蘭也帶着小女在陸沈家，見到馬任之匆匆忙忙地跑來。馬說：「啊呀，你在這裏正好，今晚要到你們家捕人，也許現在已經有暗探監視你們的住所。」他不敢直接來我家，「但要趕緊把述之弄出來。」碧蘭說：「我馬上回去。」馬任之說：「你去不好，要另想辦法。」陸沈的妻子自告奮勇：「你們樓下有一間洗衣店，我可以裝做拿衣服去洗……。」陸沈猶疑不決，表示不同意。碧蘭就把小女交給他們照顧，趕快回家；從後門悄悄進來，已是傍晚時分了。我們連家裏剩下的錢和當票都不能拿到，只是多穿了件長衫，我只取出在譯的書和字典，輕輕地從後門走出來。當晚住在陸沈的小學裏。第二天，首先要通知陳獨秀和王凡西等。可惜他們的住址全不知道。但知道獨秀一定會去何資深家，即到他那裏告知將要捕人。當天晚上，王凡西、鄭超麟、卜一凡、陳亦漢都被捕。他們集合在王芝槐（鐵路工人，擔任技術工作）家。獨秀本來也會參加這個集會，但不知何故

沒有去，僥倖未被捕。王芝槐也被捕。

這是一個大破壞，托派常委五人，四位被捕，只有獨秀沒有落網，以及我。最麻煩的問題是怎樣營救被捕的同志。常務委員只留下獨秀一人，他只好來找我，要我參加一臨時機關，又找到一位中央委員宋正修。我提議請吳季嚴（雖不是正式中委）也參加這個臨時領導機關。我的脾氣是責任到身上不得不負，所以承擔這一工作，首先是怎樣營救被捕同志，打聽他們監禁在甚麼地方，其次是穩定組織，避免大家驚慌，發生混亂。

正在此時，尹寬出了毛病。他在托派統一過程中，集合了一些同志成立小組，反對統一，自然反對建立統一機關，引起新的混亂。我們想勸尹寬不要這樣幹，但他在滬西集合了一些同志，要求展開討論局勢，我勸他保持冷靜：開會可能出毛病，他堅持要獨秀，要我參加這個會。我不願意出席，宋正修（上海一書店職員）老好人說：我去試試看，我認為不會有甚麼危險。我勸他也不要，結果除他以外，還有吳季嚴，羅世凡（上海電話廠裝置工人），劉毅……，有上十人去參加尹寬的會議，可是裏面有一個叛徒，俄國回來的，用俄名斯蒂潘諾夫（Stepenov），結果赴會的同志全部被捕。因此從5月末到8月間，組織內部弄得很混亂；許多人灰心或另找出路。再加上《我們的話》的一位負責人，梁幹喬，統一大會上未被選為中央委員，他直接到南京向蔣介石投降（他原來是黃埔軍校老學生），所以左派反對派的統一未竟，而事實上變成瓦解。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這次雖未被捕，但仍未免受到浩劫：我們在花園坊住所一切文件，書籍，家具，衣物等等全部被沒收，是國民黨（通過法租界當局）的野蠻行徑。這裏有一段插話：劉伯垂本來是我和《神州國光》社的聯絡人。巡警來捕人的第二天，他跑到花園坊我們住所，立即被捕。好在他說出《神州國光》社的關係（背景是陳銘樞），他自己說是做生意的，因此被釋放了。第二天下午，王獨清也正在向我家走

來，我們的房東太太，開洗衣店，她知道王獨清是來我家，向他遠遠招手示意不要來。他起初不懂；當他看到兩大卡車把我們住所的物件都裝去，馬上了解了，匆匆離去。

當晚到陸沈家裏，他留我們吃飯，睡一晚上，但第二天就應該離開，說他那裏馬玉夫知道，有危險。他送了五元錢，要我們去住旅館避一避。當然馬上離開他們那裏，到四馬路小旅館住了一晚。那時我們甚麼都沒有，沒有錢怎麼辦？我們就去劉毅家，他還沒有被捕（後來同尹寬一起被捕），在他家裏住了兩三天，我同泰東書店聯繫，還是靠譯書。在新閘路一個弄堂裏租了一個亭子間，要十幾塊租費，我向泰東書店老闆趙南公借點錢和一點家具（桌、椅、床），還租了一個鏡台，搬進去，但連被褥都沒有，買一張白被單舖在床上，下面舖上報紙，到了夜裏，臭蟲整隊來進攻，就把報紙舖在地上，才勉強睡，但仍遭臭蟲襲擊。

白天我們沒有衣服換，晚上洗了，半乾就穿上身。為了應付房東，她看我們的樣子不像下級平民，但甚麼都沒有，真是特別！我們告訴她是從北京剛到上海……；這樣來掩護。同時，小女由前樓一住客招去，看小孩天真，一定說真話，所以盤問她。可是已有母親預備好的故事，小女自然地說她在北京有甚麼甚麼的玩具，都留在那兒了，使得他們不得不相信。

我仍舊繼續幹譯書工作。過了些時，由劉伯垂送稿子，拿到一點錢，才買到最低限度可換洗的布衣服。

「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事變之前，我正在譯書。前樓房客經常跑到曬台上看我們做些甚麼；他是日本紗廠的職員，最懂得共產黨人的行動；他疑心我們是共產黨，所以偵查我們的活動。我們的小房間連窗簾都沒有，用白紙糊起來，當然更引起疑心。房東太太也經常偵查我們，甚至到我們房間裏想開抽屜。碧蘭不得不用盡方法來對付她。我們覺得形勢不妙，猜測到那房客準備告密，設法搬家。趁着房客不在

家，我們搬到離那裏不遠的新開路一個弄堂裏，於是可脫離監視。

這三個月以來，自馬玉夫事件發生後，是我們最困窘，最難熬，最痛苦的時期。雖然各方面關係隔斷了，但還要營救被捕的同志。比如王凡西的姐姐通過書店找我，我還要援救劉毅、吳季嚴（他的哥哥到上海），通知羅世凡家。碧蘭到處跑，太辛勞，搬了不久就小產，睡下來，沒有人做飯，咬起牙齒請傭人，照顧小女和碧蘭……。搬進去的是一間洋房，住後樓，租金相當貴（二十多元），但比較平靜安全。

我們開始和個別同志聯繫，主要是王獨清。他那時也很狼狽，因為同碧遙的關係弄得壞，單獨住在法租界，經常步行到我家吃飯。我們太窮，連香煙都買不起，碧蘭給房東太太做錫箔，每天可賺幾個銅元。以前還有衣服可當，現在甚麼都沒有，連當票都失去了。

「九·一八」到「一·二八」托派組織復活

1931年9月18日，日軍侵佔東三省，即「九·一八」事件，對全國是最大的衝激。由於蔣介石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學生（主要是北京、上海、南京）的抗議示威，派代表到南京請願，要求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樣鼓起一個全國性的反日帝潮流，連國民黨政府也無法制止，蔣介石忙着要應付新的群眾運動。過去那種反共的鎮壓恐怖氣氛，自然多少鬆懈下來。

我們同志，經過組織的破壞，本來有些消極，這時也得到鼓舞，又振作起來，積極起來。那時獨秀還不能在外面露面，只剩我一人，又開始把所有能找到的同志聯繫起來，尤其是同學生與工人有關係的同志，重新建立起支部組織，向各方面活動。不久之後，我們在上海分幾區——法蘭西區、滬西區、楊樹浦區，每區組織委員會，而且10月間出版了一個公開的刊物《熱潮》，在報攤上賣出，影響相當大。我們提出一些口號，批評和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帝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寫文章的只有獨秀

和我，後來吳季嚴從監獄裏被放出來（他的哥哥花了一點錢，把他保出來），也加入，共三人寫文章。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佔上海（中國地界），即「一·二八事件」，上海陳銘樞軍部下十九路軍奮勇抵抗，但蔣介石仍舊採取不抵抗政策，引起的反抗更厲害。上海大學生自己開火車到南京去請願。北京、天津的學生也集合到南京。2月間，南京政府差不多要瓦解了，蔣介石弄得沒有辦法，請蔡元培等聞人來應付，學生們在狂潮席卷下，甚至讓國民黨要人（如邵力子）挨打……。

左派反對派順應潮流，全力出版刊物，以及托派的書和文件，並通過些線索與共黨下層同志接觸。後者看到《熱潮》，還有秘密刊物《火花》，他們知道托派主張抗日，又看到過去的爭論文件，開始了解黨內情況……。由於國民黨採取白色恐怖，尤其是顧順章事件之後，黨中層幹部組織差不多全部破壞，中間脫節，下層幹部也無能為力。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1932年初中共中央成立「蘇維埃區」。陳紹禹到莫斯科受命，秦邦憲到蘇區代理書記職，在上海只剩下一個「聯絡局」。

「九·一八」以來全國反日高潮時，中共採取甚麼立場呢？他們主張由蘇區組織的紅軍來領導抗日，對於上海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行動都表示冷淡，不給予重視（十九路軍的指揮官是蔡廷鍇和蔣光鼐）。然而，共黨在上海還有一部份下級幹部勉強支持，還有數十個支部，通過托派出版的公開刊物《熱潮》和秘密發行的《火花》，他們了解黨內實情，感到無望。於是首先是法蘭西區委員（有五位）要求同我談話，談了兩次，提出許多問題。我把他們說服過來，因此整個法蘭西區中共支部都轉到托派；這些都是富革命性，最善良的積極分子。又通過法蘭西區的幹部，滬東區、楊樹浦區也有三位同志要求同我談話（當然，他們在老黨裏知道我），也爭取到托派來。

那時中共在楊樹浦區有好幾個大支部，都是產業性的（英美煙廠、怡和紗廠、老新兩電力廠），還有比較小的工廠，共有十幾個支部，二百人左右也爭取過來。同時又在滬西區爭取中共支部黨員。一直到1932年10月15日我和獨秀被捕時，可以說是左派反對派最興盛的時期。我們在上海就有三十多個產業支部，都是從中共那裏爭取過來的，而且還領導了幾次經濟性的罷工，相當勝利。因為我們完全改變黨的作風，是按照工人的經濟要求處理罷工行動，因此才有相當收穫。就工人支部和群眾來說，托派事實上在上海代替了中共；「九·一八」事變後，在各地托派也建立了新的支部。比方在南京，多半是教授學生；武漢、北平，重建支部；香港，恢復支部；廣東中山，受托派影響的分子，自動成立組織。這的確是托派成立以來最有工人基礎的時候。當然客觀情勢對我們有利，如果那時沒有被捕事件，我們的確有可能在上海建立新的黨的基礎。可是事情發生了。1932年10月15日，托派的領導機關第二次被捕，比前次規模更大，損失更巨大。

當組織繼續發展時，也是我們個人生活最艱苦不堪時。獨秀埋頭寫文章，不出席會議，那時有四個區委的會議都是由我一人出席，或同吳季嚴一同去參加，並且還出席一些工人大支部的會，討論罷工等行動，比如電力廠罷工、郵政局總罷工，裏面都有我們的支部。這裏必須提到，由於獨秀的關係，找到一點錢，維持幾個區委的小機構，他是盡了最大的力量。至於我自己，忙不過來，把譯書放了下來，生活毫無着落，連吃飯的錢都無法找到，生活重擔又壓在碧蘭身上。但她又不能找職業，當然付不起房租，又從新開路搬到楊樹浦一間地下一層窄小的房子內，這正是我被捕之前。

正在此時，不幸又遭到派系內部對我個人的攻擊，主要來自三人：蔡振德、張特、劉仁靜：

蔡振德，我以前曾提到過。他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就加入托派。回國

後到河南，在馮玉祥軍中做政治工作。當時（1927年）我見到他，後來到上海，在浦東區工作，又見到我，參加托派，是托派政治意見書八十一位簽名者之一。當時有一位留學日本的老同盟會李重山（陝西人）對蔡振德說起，他有三千元，是陝西一些左派軍人交給他幫助革命活動。蔡跑來同我商量，我說最好辦刊物。蔡說，我們同志生活困難，這筆錢可暫時支持我們的生活——是他自己有意運用這筆款，但要我為組織負責任。我答說：我們個人的生活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這樣辦；如果李重山要想貢獻給我們的運動，可以接受，但要由組織來分配。蔡很不滿意我的回答。去同鄭超麟商量，說不應該把錢給組織，而應維持自己的生活。鄭同意他。於是他們在滬東和李重山一起租了一幢房子，就拿這筆錢維持生活。這件事不知怎樣被王獨清知道了。王是認識李重山，本來想向他找點錢辦一個刊物《展望》，結果把這事和汪澤凱說起。汪當然非常反感。蔡知道了就仇恨我，以為是我暴露出來的，他寫了幾萬字攻擊我的小冊子，說我把持組織……，把小冊子交給我，自己就離開了，到陝西去做一份小官差事。實際上，他是對整個托派運動失望了。

第二位要提的是張特，是《我們的話》的中央委員，負責組織工作，受王凡西的排斥，統一後消極，在滬東辦了一所小學。當托派中央領導機構被破壞後，我常見到他，同我在滬東活動，常用他小學地址進行約談，我常鼓勵他恢復活動、負責任、願意幹甚麼就幹甚麼。開始他態度還好，但後來對運動失望了。他本來在廣西有點地位，想要離開托派，要找一個藉口，於是寫了一封信給組織，把我臭罵一頓，跑到廣西，當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行政專員。

第三位劉仁靜，當時還在托派統一組織內，參加支部會議。可是滬東區電力廠、郵政局支部的同志，說他不知所云，所以不歡迎他去講話。而劉仁靜把同志拒絕他去講話的責任推在我身上，寫了幾萬字的小冊子

專門攻擊我，說彭述之把持黨組織……。我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連反駁的時間都沒有。

不久，劉仁靜去了北平，為伊羅生（Harold Isaacs）做翻譯，幫助他收集材料，差不多有兩三年，北平圖書館有豐富的檔案。1934年，伊羅生到挪威去見托洛茨基，劉仁靜交給伊羅生帶給托一份長達數萬字的信件（我身邊有一份英文影印本），裏面最精彩的地方，值得引出：「中國托派有三個傾向和代表人：第一派右派由彭述之代表；第二派是中派，由陳獨秀代表；第三派是左派，由劉仁靜代表。」伊羅生後來有信給上海托派（通過一位美籍同志）說：托洛茨基笑了一笑說：可惜得很，中國只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可見托也不信任劉仁靜。他的話是帶諷刺性的。最可笑的是，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中從來不提我的名字，劉仁靜對此很得意，還告人說：我偏偏不把他（彭述之）的名字放進去——可見他心眼窄狹，太荒唐，不顧歷史事實，我當時是中共黨內公認的領袖之一。

在這本書資料工作完成不久，劉仁靜被捕；大概是在北平被捕，送到南京，他投降進反省院，在院內還教授三民主義。釋放後，抗戰期間，在西北大學當教授，和平後他到上海，看到《求真雜誌》，寫了一封熱烈的信給我。因看到有一相當規模的書店來發行，又看到我們的文章，表示高興，說「你現在又重新擔負起理論的責任了」。他想見我，令我啼笑皆非，不想見他。商量之後碧蘭說：你如果想見他，就去敷衍一下。她約劉仁靜在虹口公園見了一次面。他恭維我，說還願意做托派的事業，並可作為托派的橋樑……；事實上，他是拿陳立夫的錢辦了一個甚麼刊物。最後，中共取得政權後，他找到任弼時，又由任介紹給劉少奇，給他在《人民日報》安排了一份翻譯工作，後來文化大革命時被清算了。《人民日報》曾有一消息，指責劉少奇收容托派和叛徒。

回顧「九·一八」以來的局勢

「九·一八」事件開闢了一個新的局勢，對中共來說是一個轉機，引向新的民族運動的高潮。如果它採取一個正確的防禦政策，不去鄉下專幹遊擊、組織蘇維埃，而是像托洛茨基提出來的方針，來保衛在城市還存在的基層組織，雖然許克祥政變對湖南工農有很大的打擊，但在農村中還保留重要的實力。如果採取防衛策略，國民黨不能繼續用暴力來肅清，中共可能保留大部份的幹部；中共第五次大會時，黨團員有十萬以上，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群眾黨，它已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生了根。南昌起義時，賀龍、葉挺和朱德集合有三萬人；如果不發動南昌暴動，這一支力量也可以保存。如果當時採取退守的政策，等待國民黨方面發生內戰；尤其是「九·一八」事件爆發，共產黨可以完全抬起頭來，成為民族抗戰的領袖。「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是癱瘓了，他南京都不敢去……。

這時興起第三次革命潮流是完全可能的。可惜，共黨在斯大林的指示下，當一個新的革命高潮，即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潮來臨時，它不但不運用時機，反而在城市內被消滅，連整個中央機構都逃避到鄉村去建立蘇維埃政府（蘇區），放過了（錯失了）一個新的歷史良機，只得以全力專事遊擊戰爭。反過來，蔣介石倒能夠剷除中共在城市的力量，用全力進攻共黨在農村的基地，經過一次、二次……五次圍剿，1934年中共只好從江西逃到西北（延安），這就是中共當時政策完全破產的結果。

第二十五章

被捕 · 審判 · 監獄
(1932 到 1937 年)

龍華司令部——南京江寧法院

1932年10月15日下午約三、四點鐘，托派反對派中央常務委員會在吳淞路一個機關內開會。突然我們的屋子被包圍；衝進會場的有三人，一個是英國人，兩個中國人，都用手槍對着我們。參加會的除我以外，還有羅世凡、濮一凡、宋逢春、謝少珊，全部被捕。他們說下了緝捕令，把我們戴上手銬，問我們的姓名；我們都用假名。我們被帶到吳淞路附近的臨時監房。有一件事引起我們注意，就是把我們四人放在一個小監房，而把謝少珊單獨關在另一小監房。謝少珊是我的秘書，濮一凡同我馬上猜到謝有可能已叛變的嫌疑；很擔心陳獨秀和其他同志的住處已經告發。謝少珊不但是技術性秘書，又是交通（聯絡員）。本來是留俄學生（莫斯科孫中山大學），據同志說他很老實……但他知道老陳的住址。奇怪的是碧蘭從來不信任他，拒絕他來我們的住所，所以他從來沒到過我家。這時，我們擔心的是其他同志，尤其是獨秀的住所，只有他知道。

在監房宿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把我放在囚車內載到英租界滬東法院。在囚車內發現獨秀、道之、曾猛、何止靜（兩位做印刷工作）、梁有光、王伯平，連我一起共有十人；他們也都用假名。到滬東法院，第一次檢查審問時，我告獨秀不能再用假名，因為已經被謝少珊告密，用假名沒有意思，用真名可以公開發表意見。同時發覺獨秀已經是半病狀態，所以他沒有參加我們的會……。既然法官知道我們的真名，大家都承認是托派，他就詢問我們為甚麼是托派，同中國共產黨有甚麼不同。我簡單說明我們的主張，最後法官宣佈這一案件不屬於英租界的範疇，是中國的一個政治問題（案件），所以把我們一律移交中國當局。我馬上提議，你們沒有理由把我們交給中國當局，應該正式審問我們到底犯了甚麼罪；直接交給中國當局是完全違背他們自己定的慣例。我們當然知道交給中國當局就更嚴重了。我的抗議毫無效果。於是把我們一起解

到龍華司令部。到了那裏，我們十人分開，把我放在一個公安局秘書處的屋子裏（其他同志不知安置在那裏）。辦公室內有三個衛兵，執着槍看守，是年輕的軍人。有一個秘書在那裏，白天辦公，晚上在辦公室內搭一張行軍床給我睡覺。看守兵三人輪流看守，過了若干時間另調一批。

我在那裏待了四、五天之久，為甚麼理由也不知道。我猜想中國當局在討論是在龍華司令部就地處決我們呢？還是解到南京？不過，那秘書告我說：你們這一案子很大，所有報紙都刊載這個消息，說從來沒有這樣大的案件。他的態度並不怎樣仇視我。我還可以同他閒談，也同看守的兵士閒談。那些兵士，年輕天真。他們說：聽說你們是共產黨，是甚麼主張？我已經公開，當然就解釋甚麼是共產主義。幾天內談了很多，他們也很有興趣。秘書還告訴我他是山西人，從前在北方吳佩孚軍中做過秘書，本來是學生，也聽到談起共產黨，尤其知道李大釗的名氣。我就問他為甚麼離開吳佩孚部隊。他說裏面腐敗透頂，所以他辭職不幹了（現在還是幹這一套，這是我內心的話）。他對我表示一種和善友好的態度，不加敵視；幾天內常把外面的消息（每天報紙上的新聞）繼續告訴我。他也搞不清楚，只聽說傳聞有些人組織一個運動來營救我們。大概我被拘留的第三或第四天，秘書告訴我：你們的案件上面已決定移交給南京方面處理。這案子我們（龍華司令部）也辦不了，過一兩天會把你們解到南京去。

此時，我們被拘留的十人都像我一樣被隔離。我當即考慮到解去南京的必然後果；已有很多先例。雖然何孟雄等一批人都在龍華司令部就地槍決，向忠發被捕後解到南京審問後還是槍斃，楊泡安、羅綺園在龍華也被槍斃了……。我想我們解到南京，也必是向忠發同樣結局，前途不吉。寫了兩封信，給碧蘭和老父母，表示最後告別，辭句自然悽慘。特別是給碧蘭的信中，我說已盡了我的責任，對自己沒有任何遺憾，難過的是你和孩子，希望你冷靜下來，為未來奮鬥……；對父母我表示遺

憾，不能照顧他們，很淒哀。照規矩，這兩封信秘書看過後，我才能寫通訊地址（泰東書局轉）。秘書看了流淚，不做聲，表示難過，說：當然我按照你的囑咐把信寄去。但他還安慰我，說有消息，好像有人要設法援救你們（他沒說出人名），你不必太絕望，請放心……。他又把這情景告訴看守我的士兵，連他們也受了感動，表示難過。我當時感到國民黨的兵士並不全是仇視共產黨人的。這些兵士對我還有幾分尊敬，認真聽我的說話，甚至提到兵士的問題時，並不表示反感；雖沒有公開表態，似乎是暗中同意……。這是龍華司令部四、五天內的情況。一兩天後，就把我解到北火車站。在車站重見其他被捕同志，連獨秀在內；除了兵士外，沒有任何旅客，是一列專車來載我們的。我們都上腳鐐，我和獨秀放在一個車廂內，其他八位同志分在其他車廂，動員軍隊上百人，看守這列專車直赴南京。

獨秀態度凝重，說他已盡了自己的責任，沒有任何惋惜，準備從容就義。但他說有一件事很難過，就是碧蘭帶着一個幼女，他也知道碧蘭另懷孕，特別擔心。我不禁哭起來。但我們決心準備犧牲，毫無猶豫。

到了南京，把我們送到軍事臨時監獄。謝少珊在去南京前已經離開了。在軍事監獄裏，起初把我和獨秀隔離，後來又將我們拘留在一處，典獄長對我們倒很客氣，稱呼我們陳先生、彭先生，並說請我們放心，需要甚麼可照辦。首先問我們要看甚麼書籍，我們當然很有興趣，因在居留期間無事可做。他就給我們找來一部司馬遷的史記，和其他詩集等。我們的看守也是三個兵士，他們告訴我們：典獄長是蔣介石的老表，他不來時，有一個年輕人來照顧，是軍事法庭檢查處的實習生。他說他剛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來這裏實習。他對我們表示尊敬，說不久之前還看到一篇彭先生的文章，是批評胡適之的《讀書雜誌》內。

就是表示他有點淵緣。他還說，你們的案件並不十分嚴重……，你們來到南京後，有許多電報發到南京。他只聽到有這樣的消息，說以後

由看守把報紙交給我們看。當然主要是中央日報。過了兩天，我們看到報紙，陸陸續續地登載消息：各方面有電報給中央政府，給蔣介石，其中最著名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邵力子（從西安打到南京）；胡適之同一批北大教授也有電報，還有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都在報上登出來。電報內容基本上相似：認為陳彭案件同一般共黨案件不同，他們並沒有武裝暴動，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對蔣政府。因此，他們認為陳彭案件不應受軍事法庭審判，而應由民事法庭審理，在發電報之前，似乎他們之間事先商議過，這樣情形就有所改變。

我們在軍事法庭有過兩次檢查。獨秀和我一起見到法官。他自稱是陳先生的學生，過去受到他的影響。除了這一「閒話」外，他按照公式問我姓名籍貫……，但並不問我們案件內容，只說：你們的案件不嚴重，照我看來，要歸江寧民事法庭來審理。請我們放心……。過了一個星期，一個晚上，典獄長跑來說：軍政部何部長（何應欽）要請陳先生去一晤。獨秀只好一個人去，回來告訴我何應欽對他說：你們這一案件由民事審判，現已決定。而且說：陳先生不要擔心，這案件沒有了不起的嚴重；明天你們就要移到江寧法院去。我也不懂，為甚麼何應欽要見獨秀，大概表示不仇視。同時我們聽到一個消息說，胡文勉也關在我們隔壁一間房內。他是紅軍13軍司令，在浙江某地被逮捕。原來他是黃埔軍校教官，也到過莫斯科，曾參加遠東勞動民族大會。他也問候我們，表示現在如常。但後來不知他的下落，可能槍斃了。

我們被轉移到南京江寧法院（南京原是江寧縣的縣城），已是1932年10月尾，把我們十人安排在法院的臨時看守所。看守所所長姓楊，湖南人，他把獨秀和我分配在一列屋子內，有庭院、單獨的三間房；其他同志安置在另一列監房內，數人在一間房。我們剛安定下來，所長從外面叫了一頓西餐，並買了一筒香煙，令我們驚奇。有個看守對我特別友好，說有任何需要，他盡力照辦。通過他，我們發現看守所所長原來在

湖南某一縣當過農民協會會長，是革命失敗後逃出來的共產黨員……。由於對我們的厚待，我們在獄中的生活反而很過得去。

獨秀開玩笑說：這裏的吃住比我們在上海時好得多了；住得寬敞，又吃大餐……。過了幾天一個晚上，江寧法院院長彭望業到監房來看我們。首先說這案件沒有甚麼了不起，又說他自己將要離職準備做律師，已開始在南京成立律師事務所，在上海也另設律師事務所，他願擔任我們的義務律師，只要我們願意接受他的貢獻（即不要任何費用），能夠辦得到的他都盡力為之。我們當然欣然接受，這樣我們可以安定下來，等候法官來提審。

案件變成民事案後，每天大小報紙都有消息登出來：被捕經過、從上海到南京的一切經歷都有詳細記載。不但在中文報紙，即使外文報紙也多少有記載。我們還收到不少律師的信件，自我介紹，要做我們的義務律師。最著名的是章士釗，以及曾經做過北京最高法院院長的某某，也有信自薦。蕪湖一位名律師也如此，再加上彭望業的助手蔣豪士，已在南京掛牌做律師。獨秀和我最後決定接受章士釗的自薦，因他是獨秀的舊識，在日本辦《甲寅雜誌》反袁世凱時代合作過。雖然他在段祺瑞政府內做過司法部長（我們在《嚮導》上有文攻擊過），但現在他不做官而改行為律師。結果我們共有四位義務律師：章士釗、彭望業、彭的助手蔣豪士，以及蕪湖的名律師姓陳的，分別為獨秀和我以及其他坐監同志辯護。

章士釗到南京來看我們，討論辯護程序。依照他的觀察，我們的案子不是江寧法院，而是蘇州法院來審。他說：經過第一次審查後，你們可以自做辯護，當然我是以律師資格來為你們辯護。我們還討論四位律師分別為其他被捕同志辯護之事。

1932年11月到1933年1月這兩三個月間，不斷有許多聞人來監獄看我們。首先是蔡元培，他主要是來看獨秀，因我被關在他同一獄所，

也就一起見面。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他已經有六十歲以上，是一位平靜的學者。說了個把鐘頭，他表示安慰我們，認為我們的案件不會很嚴重，法院可能減輕我們的徒刑……。

他說話不多，看來對獨秀還是有好感，是老朋友的關係。隨後來見我們的是陳公博，南京政府工業部部長（我覺得他的來訪實在掃興）。他原本是中共黨員，現在是神氣十足的官僚，當然在老陳面前還是表現馴服的學生樣子。傅斯年，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領袖，也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後來任台灣大學校長。楊杏佛，那時是中央研究院的秘書長。楊表示代表蔡元培（中央研究院院長），對我們很友好，給了獨秀一筆錢。再者是胡適，確是一位令人喜歡的人士，有學者風度。同他談話時，我問他《中國哲學史》只出版了一部，第二部進行如何？他說：我已寫成稿子，但有許多地方不放心，因為漢代以後，佛教大興……（佛教思想在中國古代起很大的作用），所以還在研究思考，暫時不發表。他雖然知道我有文章批評他的經驗哲學，但並沒有任何敵視，態度很坦然，還表示很友善，證明他有氣派，談笑自若。他的確有很多人喜歡，有點像中共黨裏的周恩來，態度為人、容貌也清秀文雅。還有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以前是北京大學教授，同獨秀很有交情，而且不是國民黨員，表示同情我們。隨之有段錫朋，是老陳北大的學生，五四運動時學生領袖，後來留學德、英兩國，回來一直在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是蔣夢麟，段錫朋是次長。段經常來看我們，表示同情，常問我們需要甚麼，連飲食藥物在內，辦得到的都可設法。他介紹一位姓彭的，江蘇人，教育部幹事之類，要他照顧我們，彭常準備一些菜肉來給我們……。

獨秀和我關在南京江寧法院看守所，眾人皆知；社會人士凡認識我們的都可以來訪問我們。當然有許多是獨秀的關係。和我特別有私人關係的是賀民範；他剛從監獄裏放出來，說到毛澤東的故事（我在回憶錄

上卷第三章內有詳細敘述)。還有一位同學又是老友，孫良公，他也在南京政府教育部任次長以下的職務。同我們最接近的有兩夫婦：潘贊華和其妻潘玉良，還有趙蔚天夫婦。我們在看看守所兩年差兩個月內，他們差不多每週來訪問。潘贊華是在孔祥熙財政部任農業方面的職務，潘玉良是中央大學教授。趙蔚天是老同盟會，留日學生，參加過辛亥革命，革命後對革命黨人失望，覺得他們腐化了；於是他搞一些改良主義的慈善事業。他很崇拜文天祥，說我們是文天祥那類的清高人士、英雄式的革命家。他也在南京政府財政部工作，薪金不錯，常買了食物到我們監獄裏來聚餐，有時買活魚來燒。

其他來訪的人士還有很多，但這裏要講一下潘玉良，是位稀有人物，值得一說。

她人長得並不漂亮，扁扁的大面孔，黝黑的，個子平板，頭髮筆直。她原是南京一個風塵女子；潘贊華是老陳留日同學，民國初期在南京遇見潘玉良，結為夫妻。老陳看到潘玉良的繪畫，覺得很有天才，要潘贊華送她到法國去學畫。那時老陳在安徽有點力量，還搞到一筆官費。潘玉良到法國學畫若干年，回國後有畫展，並當上中央大學繪畫教授，有些學生知悉她的緣來，招到一些麻煩。但是潘玉良倒是一位很樸實認真的女畫家，主要是西洋畫，她帶來給我們看，實在令人欣賞。

江蘇高等法院派人到江寧法院來檢察我們的案件；來的是一位檢察長，帶了一位檢察官和一批書記，把所有「證件」，即托派文件、全部出版物，一大批拿來做為證據。除了照例的問訊外，他問這些文件和出版物是不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當然一口承認是我們的出版物。那位檢察官最後對我說：如果我離開（官家的）地位來說話，我對於你們都是很尊重的。根據你們物質的證件來看，你們的錢不是從莫斯科來的，不像中共，而是自己從腰包裏拿出來的，是真正為了你們的思想和主張，所以我個人很尊敬你們。

至於案件我要按照程式，把已承認的事實和檢察的結果向法院報告。於是檢查了兩次，結果被補同志有王伯平、曾猛、梁有光 and 何仁靜都被釋放。我們十人分隔在幾處，他們的釋放是個別的，我們不知詳情。剩下六人（獨秀、我、道之、濮一凡、宋逢春、羅世凡）等候審判，等的時間很長，要到第二年（1933年）夏天才開始審訊。住在看守所倒很清閒，偶而有新聞記者（中央日報及其他報紙）來訪，打破沉寂。

這個時期，我們在看守所經過一番鬥爭，不得不回顧一下。江寧法院院長彭望業離開後，看守所所長姓楊，湖南人，不久也離開了。新法官同我們毫無聯繫。看守所新來的所長姓王，他接手後，發現常有人送錢給我們。有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唐有寅，是獨秀在辛亥革命時期留日同學；當汪精衛改組國民黨時，他是汪派，想來拉攏我們。在我們被捕前曾見到獨秀。當然我們不會接受同汪派合作。我們被捕後，唐有寅又通過中國銀行內部關係送錢給獨秀。姓王的所長眼看到各方有要人來訪，還有北大教授送錢。他想敲竹槓。

另外，他還有司法部一位次長姓石的親屬關係，膽子更大了。有一天，他下令要姓李的看守把我們的房門鎖起來（我和獨秀各單獨有一房間）；旁邊是看守住的，這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我們覺得很奇怪，就問看守。他告訴我們：姓王的所長眼見我們有錢存在所裏，想敲竹槓，想我們用錢來買「開門錢」；同時姓王的看守長對其他監禁同志羅世凡等也整得很厲害，平時大監房內可以跑來跑去，自由進出，也把他們關起來。我們覺得這很可惡，獨秀更是發脾氣。我呢，我說可想法知道監獄的內幕來控告他舞弊。我們通過看守李安民和另一監房內的道之通信，探知他們所受的待遇，詳告姓王的貪污事實。尤其他手下財政管理人那裏有證據。他的貪污實情完全知道，我即刻寫了一份控告狀，全盤暴露。由所有監禁人士簽名，寄到司法部。於是派人來調查，結果姓王的看守長被撤職留在所裏看管。本來他的監禁有優待性，由於我們的抗議，把

他拘在普通監房——這就是我們在監獄中鬥爭的一幕。後來的新所長對我們十分客氣，囚犯生活也有改善，尤其是伙食之類稍為好些。

在等待審判期間，我們知道監禁時間會相當長久，我和獨秀談起在這期間可以做些甚麼事。那時獨秀是傾向於研究語言問題，想把中國語言用羅馬字來統一，就是統一地方語言。段錫朋來訪時，他們談到這個問題，很有興趣。但是我認為語言問題雖然很有意思，但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問他是否可以寫點歷史性的文章？獨秀說沒有文件參考很難。我說你可以寫回憶錄而且我們有時間可以研究馬克思主義，中文書籍很少，可找日文。的確找到一批日文的馬列書籍，並且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已出版，我們設法找一個英文版本來研究。同時，我提到雖然我們大批同志被捕（我們被捕不久，又有寒君等，還有滬東的一批工人同志是我從中共爭取過來的，都被捕），打擊沉重；上海托派組織還存在，由劉伯莊負責。我即寫了一封信給獄內同志，信給獨秀看過；我主張我們在獄內同志應提供政治意見，幫助外面同志繼續托派運動。獨秀說看書研究他同意，但對於運動表示消極，認為我們在獄中不應以領袖自居來影響外面（因為這些通信也寄到外面）。他在我的信後面做下附註，表面同意，但內心不然。對這封信的反應：羅世凡、濮一凡、道之大體上同意，宋逢春很反感。我後來才知道他在莫斯科時就對陳獨秀、彭述之最仇視，攻擊最激烈，因此這時也一樣對我仇視，從他的信中表現出來。

從1933年末到1934年初，陳銘樞在福建成立獨立政府為止，這一年多時間，我們之間不斷討論問題（我保存了部份文件通信）。我當時寫了一封長信，是帶國際性的政治意見書。獨秀開始不同意，是在蘇聯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請他也寫一個政治綱領，他拒絕了。他說：我們現在不要有甚麼具體的意見，各人寫各人的。當時希特勒上台。我說希特勒當權，將來對蘇聯會發動戰爭。獨秀的意見相反：蘇聯已經墮落，

希特勒用不着反對蘇聯。意思說，蘇聯政權和希特勒政權沒有大不同，不會有衝突；這種傾向當時還相當模糊。

福建陳銘樞組織政府後，有些同志跑到福建去投靠，其中有劉仁靜、劉伯垂等。他們也要王獨清去，但王沒有去。我們之間對這一事變也有不同意見（我是批評劉仁靜的），在南京監獄內發生思想和理論上的爭論，檢討過去，對左派反對派運動也做了一個反思和清算。但主要是我同獨秀之間的爭論，使我們之間的分歧深化。爭論集中在民主主義和國民會議問題上。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直到不斷革命論。這裏我不必詳說，最重要的是我和獨秀的私人關係破壞了。因為思想鬥爭愈來愈尖銳，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

獨秀不是一個冷靜的人，他對我態度的改變就反映到日常生活小事上來，一反過去的關係。比方有關他的小兒子陳哲民（高君曼生的），在南京成舍我報館裏做事，經常來看我們。他同報館的一位女職員戀愛，女的有丈夫，在南昌軍隊裏。丈夫強迫這女子到南昌去，陳哲民一直追到九江，追不到就回來了。他回來後來看獨秀。第一天獨秀還比較和氣，要我批評他的兒子。我接受和孩子談話，他承認有錯，但感情上還不能放棄。我即告知獨秀這個情況。第二次他來看父親，獨秀用腳把他踢出去。孩子痛苦。我就批評獨秀說年輕人做錯事，用不着這樣，可說服他。獨秀反而冒火說：你不要管我家裏的事。我說這是甚麼話，是你請我同他談，不是我要管你的家事。像這種行為，我也不能買賬，不管你是獨秀，不是獨秀。他當然很生氣，這是我們第一次衝突。雖然還在共同用餐，但沒有甚麼可交談。

政治上的衝突也尖銳。我過去在一些問題上多次都能說服他，而現在已不能說服他。而他的偏向走到對我私人生活、日常需要也不再顧到的地步。事實上，一向外面送來的錢都是由他管，現在變得特別小氣，連我剪髮用肥皂的小費用都不給。最惡劣的是他寫信給碧蘭，因碧蘭通

過老友李世章從唐有寅那裏，每月拿到二十或三十元維持她同孩子生活。信上稱碧蘭先生，你不應該接受這筆錢；簡直毫無原則。從那時起，雖然住在一座屋子裏，再也不談心，只用筆討論問題，越說越糟。外面來訪的友人，還是一同見面，但我們私人間再也沒有交情。我這時發現他在思想為人都開始往後退，不想再幹運動。當然這還是一種傾向，他也不明白表露，但實際上他對左派反對派的運動完全失望了。

我們在江寧看守所居留一共有十年十個月，起初半年多，我們之間的關係還相當好。但後來將近一年，關係變成惡劣。我以前就發現獨秀感情用事，但現在完全不顧原則，愈走愈遠。當然那時要想做研究工作根本談不到。獨秀起初看看《俄國革命史》英文本；但他的英文很差，看得不耐煩。我也不怪他，因為要翻字典就看不來了。我的英文也很壞，但我用字典，繼續看下去。我託買的列寧《經驗哲學批判》，對我們是重要，但獨秀就完全無興趣，反而研究一些莫名其妙，嗜好性的東西。他一步一步地脫離思想和運動。

開審、判刑，我的辯訴狀

1933年2至3月間，我們收到法院的起訴狀，列出許多罪狀，主要是違背了民國的「緊急法」，是最嚴重的罪狀，可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收到起訴狀，獨秀和我立即請章士釗來商討怎樣對付。他從上海趕到南京，商量結果是獨秀同我分別寫辯訴狀，而章士釗根據法律及一切事實來準備為我們做辯護。獨秀的辯護狀寫完了給我看，我的也給他看。兩辯訴狀之間有些分歧，獨秀差不多是為自己辯護，說他沒有違反「民國緊急法」。我認為這不夠，認為應該採取進攻的立場，他不同意我的意見，所以我們寫的辯訴狀不同。我說違害國家利益的不是我們，恰巧相反，違背國家利益的是國民黨政府。我例舉許多事實，自「九·一八」、「一·二八」以來，日本侵略中國、佔領滿洲、進攻上海中國

地界；國民黨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抵抗措施，是容忍日本帝國主義，這才是真正危害民族國家基本利益。所以我指出，我們的基本態度是「抗日」，這是進攻性的；再者，我認為一個國家要存在，除了抵抗帝國主義進攻以外，人民要具有民主權利管理國家，也要民主權利來組織抵抗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些基本民主權利就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沒有的話，是民族的危機，必然受到外來侵略。而國民黨政府正是完全剝奪了人民所有這些權利。最後我說，中國民族要抵抗帝國主義，發展成現代化獨立國家，除了工農群眾起來掌握政權，沒有別的道路。換句話說，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挽救中國。這就是我辯訴狀的主要內容，我相信它是很尖銳有力量的辯訴狀。

章士釗看了我們的辯訴狀，聲言：你們發表的意見，我不能沾一詞（就是不能說任何話）。這是你們的立場，我只能按照法律為你們辯護。這兩件辯訴狀（獨秀和我的），寄到法院去。這以前，由潘贊華等給我們油印，發到一些報館去。

1933年8月間正式開審。本來應該是江蘇高等法院主審，即在蘇州審理，但那裏全班人馬（法院主審法官和人員）都轉到南京，借用江寧法院的法庭來審判，沒有把我們解到蘇州去。

審判過程簡單敘述一下：我們被告共有六位，陳獨秀、彭述之、羅世凡、濮一凡、彭道之、宋逢春。法庭組織嚴密，但是南京各機關都有人來旁聽。旁聽裏有特殊地位者，申請後才得到旁聽權利，其中有國民黨機關、大學人士，各地來的新聞記者等，法庭裏擠滿了人，沒有空位，可容百多兩百人。

開審時，四位辯護律師分別為我們辯護。章士釗專為獨秀和我申辯；彭望業、蔣豪士和蕪湖姓陳的律師，為其他四位同志辯護。獨秀自己的申辯是按照他的辯訴狀內容中，比較溫和的，對國民黨政府指斥相當少。我也按照我的辯訴狀，採取進攻的形式，指斥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

義不抵抗、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以致違害民國……。其他同志的辯訴比較簡單。在開庭審判時，值得注意的是旁聽席人群注意傾聽章士釗發言，他是著名的大律師。他為陳獨秀辯護詞中引用了過去陳獨秀與汪精衛的共同宣言（1927年4月），來證明陳獨秀的政治主張與國民黨沒有基本不同，反而認為國民黨不應該懲罰陳獨秀。對我的部份，他認為我的辯訴狀和口頭中辯說得很清楚，不需要他多說了。

在法庭上不能即時判決，要討論後用書面告訴我們。過了兩天，判決書就交給我們（中國沒有陪審制）：陳獨秀，彭述之判決徒刑十三年，其他四位同志各判刑五年。這裏必須特別提出的是：自從1927年革命失敗以來，國民黨搜捕共產黨人數以千計，從來沒有經過審判，就是通過軍事法庭；甚至不經過軍事法庭，就地槍決。這次公開審判是共產黨人案件中第一次，所以轟動了全國；各地報紙，對案件和審判經過情形都有詳細報道。比如我在法庭上的辯訴詞，在《申報》上有節要地登載出來；評述說彭述之非常激烈地攻擊國民黨政府，這是以前完全沒有的事。

審判期間發生一件趣事，有一名金家鳳的人士來獄中拜訪。他是1920年漁洋里俄文班一員，後來沒有去蘇聯，原來他去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事；是甚麼職位，他不告訴我們。來獄中訪問時，表示對我們尊重，尤其對獨秀，常把與我們有關的國民黨內部消息傳給我們。比如中央日報派兩人來訪問我們，第二天他告訴我們其中有一位訪者是個部長（大概是交通部長）；訪問登在報上，特別形容彭述之腳踏皮鞋、傲慢、慷慨而談，報上登出來後，金家鳳就告訴我們是甚麼人寫的。審判後，第二、三天，他又來看我們，告知陳立夫和國民黨中央黨部最高級人員在幕後聽審，注視我們說些甚麼，因此我們知道陳立夫在幕後加強對法官施加壓力。

江蘇高等法院對我們的案件判決後，章士釗同我們討論向最高法院上訴，認為判決徒刑過重，通過辯護，要求減刑。根據江蘇高等法院判

決書，我們的辯訴狀，以及律師的辯護書等，加以檢察後，最後判決陳獨秀，彭述之十三年徒刑改為八年。在江寧看守所居留差不多兩年算做一年，還有七年徒刑。其他四人照舊，沒有減刑，整個案件的審理共有一年十個月之久。

在江寧法院看守所最後棲留期間，有一官員羅文幹（司法部長）來看我們。他是胡適之的好人政府派，又是北大著名教授。他表示對這一判決，他不能干預，但我們可以上訴，將來可以減刑；表示私人同情。而我們已經同律師決定上訴。羅文幹是胡適好友，雖然胡適同獨秀意見思想不同，但對他像兄弟般照顧。獨秀有病，胡還特別關照北京協和醫院大醫生，到南京旅行期間來看他的病，是非常關心他的。

也是在江寧法院看守所最後期間，有兩件事我要提起的：（1）看守所內成立左派反對派小組；（2）彭道之之死。

一、我在看守所做了件事：就是在思想上說服了一位看守長和三位看守。看守長李愛民，湖南人，二十多歲，從來沒有參加任何運動。他同我說話沒有忌諱，說他一般相信共產主義，但不知道是甚麼，因此我和他談起來。至於三位看守，二位是湖南人，其中一人名張國華，新化縣人，另一位姓孫的，都是富有朝氣的青年；第三位是江蘇人，農民出身，四十歲左右。經過我的解說，他們都認為共產主義思想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被我說服後，他們要求我成立組織，經常由我講解各種政治問題，以及世界局勢……。他們開會就在我們住房的一邊，證明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裏也有人接受我們的思想。

二、彭道之之死：道之是在審判不到一個月之後，1934年9月間去世。道之1926年從寶慶到武漢，我正在武漢出席中央特別會議。他是寶慶黨部送他去莫斯科，那時只有十六、七歲，高小畢業已教了一年書。我帶他到上海，隨後送莫斯科，1929年夏同中山大學一批留學生回國。我們那時已經在進行托派運動。他找我，中共中央是李立三主持，他

們不睬他，給他一點經費，讓他回鄉，也不告訴他我在那裏，不能找到我。他回到寶慶，在回家途上碰到一個同鄉姓蔡，也是共產黨員，把道之出賣了，告訴當地國民黨部是彭述之兄弟，剛從莫斯科回來。但在寶慶不能處理，因是彭述之兄弟，又把他解到長沙，從長沙解到南京，交給蘇州江蘇法院，判他數年徒刑，被囚在賀民範同一看守所，1930年被釋放，找到大夏大學學生姓曹的，因是托派，才見到我。當時，他同情托派，但同《我們的話》一起，而對獨秀和我存有偏見，對碧蘭也不滿意。但到了南京看守所，見到碧蘭在申報《自由談》寫文章為她和孩子謀生，他完全變了，同我們恢復感情。被捕時只有二十歲，他非常嚴肅用功，俄文也學得不錯；他翻譯《不斷革命論》的序言，文字精通。可是他太認真研究，不注意衛生，當然監獄裏條件很差，在蘇州時已受到損害，到了江寧法院看守所，胃病發作，要到外面請醫生，是錢的問題。錢由獨秀管，而我同他的關係弄壞了，沒有請醫生，只是由看守所的診治室來診治，到了1934年9月間他不能支持就去世了。這對於我又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道之不僅僅是我的弟弟，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可愛的革命家。他性格堅強，絕對無私，致全力於革命理想。他去世後我精神上特別痛苦，加上同獨秀私人關係破裂連在一起，一兩個月內，不得不咬緊牙根才能繼續下去。

南京模範監獄

道之去世沒過幾天，我們的上訴已有答覆，就是減刑，從十三年減到八年。於是正式執行我們的判決徒刑，搬出江寧法院看守所，轉移到南京模範監獄，這是1934年9月中旬。

到模範監獄時，典獄長起初要把我同獨秀安置住在一起，在一個條件比較好的地方，但獨秀拒絕了，不願同我住在一起。典獄長告訴我，我說無所謂，隨便哪裏都可以。於是我同獨秀就完全分開了。我同濮一

凡，羅世凡，宋逢春住在一列屋子裏。獨秀單獨另外住，我從來沒有去過他那裏；他拒絕見我，表示堅決。

在我們這裏，比其他獄房條件好些，可由我們自己做主，單獨或兩人住一間房。我單獨住一間，羅世凡和濮一凡另住一間，宋逢春也單獨一間。我們隔壁一間獄房住的是牛蘭，是共產國際東方代表（或駐中國代表）。牛蘭是中共用的譯名，真名不知，也不知國籍，有人說是波蘭人。另外還有一位女囚，也是國際代表（不知是否是牛蘭的妻子），關在對面女監。牛蘭的案子鬧得很大，由宋慶齡出面聯繫國際要人挽救，結果還是判了徒刑。

在這模範監獄內居留了差不多三年，再沒有見到陳獨秀。他只要一個人同他見面，就是濮一凡，每星期去見他一次。自此以後，在獄中無法交談，他往後思想發展，完全根據他自己的邏輯。當時他有五十五至五十六歲（1879年生）。

在監內典獄長知道我們不容易應付，對待我們不同於普通囚犯。伙食好些，和牛蘭的待遇一樣，看守用一些特別犯人自願為我們服務，因此生活還過得去。只是同以前江寧法院看守所不同；每天早上有一定的時間起身（七到八時），在院子裏同牛蘭一起跑步。我自己每天還做十五分鐘太極拳，生活有規律化，我也準備了一個研究計劃。

不久，友人同鄉，過去見不到的，到南京來看我，問我需要甚麼。我說別的需要沒有，只要書。隨後，碧蘭來看我，問我要甚麼書，當時她已經由施復亮介紹，認識剛從日本回來的葉波澄，也問我需要甚麼幫助，願盡力為之。碧蘭說日常生活沒有特別需要，但述之想研究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代和古希臘思想、印度佛教的起源，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思想發展史。葉波澄送了幾百元給碧蘭去收集我需要的書。碧蘭到南京模範監獄時帶了一大箱的書。我那時的雄心是研究三大古文明起源地，中國、印度、希臘，加以比較，準備寫一部古代文明起源史。另外再用

辯證法來研究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這是我認為可以做的有意義的工作。

此外，我的小同鄉孫徕工和孫怒潮也來看我。他們過去是邵陽中學的老同學，現在任職於中華書局，編輯大學中文教本。孫怒潮收集的書籍很多，我有需要，他都可以找出來給我用¹，首先他把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數十部送來讓我翻閱。

在模範監獄與過去看守所不同的是，在看守所來訪親朋可留下大半天，而現在有規定：普通囚犯有家人朋友來的，只能通過小孔對話；而我們政治犯不然，在我們囚室邊上有一間「教務室」，是用來給牧師和尚來說教，而這倒是我們接見親朋之處，時間沒有很大限制。管理人員對我們特別客氣，只是訪客不能直接到監房內來。

這裏比較規律化，但還有伸縮性，我們知道普通犯人的待遇差異很大。就在我們附近有十幾間一列的獄房，每一間住六、七人。他們主食是一大桶湯，裏面有點蔬菜，肉簡直見不到。粗米飯、兩樣蔬菜，而我們吃的是監獄內職員的飯菜，因我們是模範監獄唯一的政治犯。

在我受監禁時期，碧蘭的生活也有改善。我被捕時，她非常狼狽，家裏沒有一分錢，最初是施復亮幫助她，每月送她二十元。施復亮是1927年一批最先登報聲明脫離共黨的公眾人士之一。後來去了日本，據說同國民黨改組派有關係。當我們進行左派反對派活動時，他來看我們，一見就哭了一場；說他做錯了，他已看到反對派文件，覺得很對，要求加入反對派。我對他說：慢慢來，你多研究後再說。因我很懂得他，怕他一時衝動，感情用事。但他依然很熱心，介紹給我一批農工黨的同志，即譚平山組織的黨。譚自1927年11月中央會議上被瞿秋白開除黨籍以後，就成立農工黨，裏面的分子和鄧演達有關係，其中有四、五人，是優良的分子。他們問我關於托洛茨基的思想，我把文件給他們看，結果他們加入了左派反對派；其中有一位湖北人姓江的，在濟南山東師範學

校教書。他說服了一批學生加入左派反對派，成立了一個組織。

施復亮當時想幫助我們，因他看到我們剛從花園坊逃出來，一無所有。他介紹我為一個「左派」新刊物寫文章，稿費十元一千字，那時在國內是稀有的。我覺得有點奇怪，就問他刊物的背景，他只好說出來，負責人是蕭淑于，原是國民黨人，同孫科有關係。孫科反蔣，想拉攏一些左派人士，出刊物以便抬高他的地位。我說我絕不能為國民黨刊物寫稿，請他把我已寫好的稿子拿回來。這件事給他一個很大的刺激，從此他更尊敬我們。他說知道我們很窮，暫時送我們二十元錢，是私人送的。我們接受，此後保持友誼關係。我被捕時，他在北京，給碧蘭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並囑咐她每月到一個書店去取二十元錢，是他私人送的。後來碧蘭去青年會任編輯職位後，就中止去取這筆錢。在這個時期，他確實對我們私人幫了很大的忙。

關鍵在於施復亮與陳望道關係很密切。陳望道妻蔡葵是女青年會的幹事，又是該會出版《婦女月刊》的主編，請碧蘭寫文章，又介紹碧蘭到一個女工夜校教書。最後到男青年會出版編輯部工作。吳耀宗當時是青年會的總幹事，又通過陳望道、蔡葵的關係，認識《東方雜誌》婦女欄的編輯金仲華，他當時是中共在上海作家中的紅人。碧蘭經常投稿，稿費相當高。總之，施復亮對碧蘭脫離困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由此碧蘭能參加一些左派作家的團體活動，這就是碧蘭在我監禁時期一些社會活動的情景。

說起獄中生活，基本上比較簡單，成天讀書，引起神經衰弱症，可稱為「監獄病」。最後一年特別痛苦，時常失眠，精神不正常，除了學習英文、日文外（施復亮送給我整套《馬克思全集》日文版，看得很吃力），關於研究計劃，首先廣泛地涉獵中國古代的「子書」——《老子》、《莊子》、《墨子》等，以及希臘古代哲學家的著作（有商務印書館的譯文本）。

準備先從印度佛學着手，我看印度的原始材料很困難，所幸葉波澄替我找到商務印書館日本研究印度思想幾位專家的中文譯本，寫得很不錯。發現印度大約在紀元前五百年左右，完全與中國戰國時代（孔孟諸子）相類似，關於經濟，社會有各種思想派別的分歧：唯物論思想、極端的唯心論，也有折衷主義。

佛陀思想正是那時期印度折衷主義的產物。我集中研究佛陀的歷史根源，寫了一篇文章〈佛教的起源及其社會思想〉，我還準備另寫一篇關於有代表性的印度古代思想家的文章。在古代中國思想家裏，我選了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老子。他是中國古代一位最深刻的思想家、中國第一位辯證法學家，很像希臘的赫拉克里特，觀察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

因此，我就以老子哲學思想為主題，來開始春秋戰國思想的研究，也寫了一文〈老子的辯證哲學及社會思想〉。這兩篇是我寫成完整的長文，其次還有不少手稿和閱讀筆記，準備逐步完成《三個古代文明思想史》。可是精力越來越弱，吃安眠藥也越吃越壞，轉而看比較輕鬆的書，像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以及文學作品。因此，我的寫作計劃未能如意進行，沒有很大的成就，但有一個心得，就是對於古代三大文明起源地（中國、印度、希臘）較為廣泛深刻地了解。對於現代自然科學也閱讀不少書籍資料，極感興趣，也未能按照計劃寫作，深為遺憾。

在獄中有些年輕人來訪。首先是孫怒潮的兒子，在南京中學校唸書，十六、七歲。過去獄外通信本來由彭望業律師轉，案子結束後，這個通道中止了，就由孫怒潮的兒子來訪時，有信件由他轉遞。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小青年，有天才，愛好文學，又有好奇心，也有社會主義思想，但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他直稱他父親「孫怒潮」，他想加入托派運動，還帶了一個同學來訪我。可是在南京無托派組織，因此我勸他們先多讀社會主義的書籍，將來看情形再說。

此外在南京有一個道之小學同學，姓魏，年齡較道之高。道之去莫

斯科時，他進了黃埔軍校，後來當上軍官，「九·一八」事件發生，在北方南口戰爭中，馮玉祥抵抗日帝時受了傷。他有些英雄氣概，很敬佩我，也很注視托派運動。他來看我時，特別提到西班牙革命的情形，他正在研究，而且知道西班牙有一個托派組織，力量相當大……，他受傷之後，就轉到陸軍大學學習。他同情我們的思想，常同他太太來看我，還告訴國民黨方面的消息。

最後要提起的是我的一個表弟，姓田，是母親的堂姪。他的父親是我在外祖母家讀一年私塾時的老師。這位表弟當時是同學，在我離開家鄉之前，辦了一個私塾式的新式小學，教育弟妹們。我離開時請他代替我做教師。他來南京監獄來看我時，是1936年某日，帶來了許多消息。他是從福建來到南京，正在福建國民黨軍宋希濂總司令部下的一個副官，而宋希濂就是瞿秋白在福建被捕時的國民黨軍司令；表弟自然而然地告訴我瞿秋白的故事。據他說，瞿秋白他們一行是1935年（末）從江西蘇區逃出來的；那時毛澤東一行向西行，而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和張良（女）準備回上海。瞿秋白原來是江西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何叔衡是湖南最老的共黨人（同賀民範同時），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任湖南一師範學校校長。鄧子恢後來也很著名，曾在人民政府擔任要職，後來受打擊。張良原是王一飛妻，送到莫斯科後與項英結伴。

瞿秋白等小隊經過福建邊界時，被國民黨軍隊俘虜起來；何叔衡當場被打死，鄧子恢脫逃到山嶺中，瞿秋白和張良被逮捕。張良後來嫁給一個國民黨軍官。至於瞿秋白，在福建拘留期間，宋希濂對他相當優待，單獨住一間屋子，煙酒充份供應，在他那個範圍內可以自由行動。據說宋希濂有意保全他的生命；他給那些軍官刻圖章，表示友善，而且告訴他們他寫了一篇文章。我的表弟沒有親眼看到，但據一些軍官的傳說，在這篇文章裏，他表示不想幹共產運動了。我這時才知道瞿秋白在福建被拘留情形，按照宋希濂本人的意願，是想保瞿秋白的命、釋放他，但

他不能做主，因瞿秋白不是一個普通共黨人，所以要等候南昌蔣政府的命令來解決，當表弟來看我時，瞿秋白還沒有槍斃。不久，在報紙上看到他被槍斃的消息，而且發表了他那篇〈多餘的話〉。

這是一篇「悔過書」，是一種不公開的投降書。裏面說到他的身世，怎樣加入共黨，怎樣反對彭述之，以及李立三在中共三中全會、四中全會解除了他的職位，從此不負政治責任；說他對馬克思主義懂得很少，說自己是文人書生，喜歡文學，一旦釋放，將從事文學方面和翻譯工作，並稱中共黨內已經認為他是個「叛徒」……。當然國民黨就利用這篇文章做反面宣傳。

西安事變在獄中反響， 「八·一三」中日戰爭爆發和提前釋放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獄中同牛蘭的微妙關係。我們同他住一列獄房，每晨在院子裏做運動時，因有看守，不便打招呼，但羅世凡常給他寫條子，向他借書。他有不少英文書籍，《列寧全集》、《馬克思全集》都有一部份；他願意借給我們，對我們態度很好。我們不談政治問題，每當我們經過他身邊時，他經常在看書；雖然他是斯大林忠實的信徒，但對我們不仇視，見面打招呼。

1936年12月，發生一件震動全國的事件：蔣介石到西安視察，被張學良扣留。消息傳來，連我們在監獄裏都受到這氣氛渲染；那些看守們都議論紛紛。尤其是牛蘭，非常興奮，給羅世凡寫條子說：我們不久將被釋放，可以出去了。但是事件發生沒過幾天，蔣介石被釋放了。牛蘭垂頭喪氣，他當然不知道這是莫斯科政策使然，那時他一定有反感。後來據碧蘭告訴我，上海一批在青年會親斯大林派的人士，都很頹喪，不以為然。

1937年7月7日，日機轟炸蘆溝橋是中日戰爭的序幕。8月13日，

日軍正式侵佔上海，不斷有日機到南京偵察，四、五天後，開始轟炸南京，模範監獄遭到轟炸，我們住的對面有幾十間獄房全部炸毀。日機來時，我正在醫療室前的空地上準備打太極拳，聽到飛機在上空嗡嗡之聲；照常典獄長帶領我們到防空洞裏（多半在晚上），如果是白天飛機來轟炸，來不及到防空洞，就緊靠牆壁。但是這次日機轟炸，炸彈正落在對面監房，猛烈非常。記得炸彈掉下時，我幾秒鐘內完全失去知覺，過了少許時間才清醒過來。有些獄房的屋頂被炸了，我們的幾間屋子也有損毀，但我們還是幸運的，炸彈落在對面一列獄房內；究竟炸死多少人，典獄長也不告訴我們。但從此時開始，討論準備釋放政治犯。大概在同時，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等中共領袖已到南京，同國民黨談判重新合作，支持蔣介石抗日。這是我後來知道的，當時蒙在鼓裏。

不久，典獄長來告訴我們，因為中日戰爭爆發了，南京政府有釋放政治犯的意向，你們的案子可能很快有新的決定。典獄長姓趙，據說是中國辦理監獄最佳的人才，所以，請他來負責南京模範監獄；以前的典獄長是貪污的。趙上任一年有餘，滿院子裏栽滿了花，春天到處是花圃，秋天栽菊花，監獄成了花園；他對於監獄裏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據普通犯人說，伙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常有拷打，現在也減少了。裏面的囚犯對他印象好，說他清廉，雖然姓王的看守長相當兇惡，因為有這位典獄長在位，也不得不節制一些，對待犯人也好了些。

關於釋放我們的事，典獄長來過兩次，說要準備釋放。首先釋放的是陳獨秀（8月20後某日），據說是胡適之等人士保釋陳獨秀和彭述之。如果我們被釋放，其他同志沒有問題。但可惜的是獨秀聲言：你們保釋我和彭述之要分開——就是他不願意同彭述之一起釋放。這件事連濮一凡也不以為然，否則我們一起都可以放出來。結果獨秀單獨釋放，當天有批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濮一凡也在那裏（獨秀叫他去最後見見面）。報上有獨秀被釋放的訊息，所以新聞記者要獨秀發表意見，他一句話不

答。濮一凡和羅世凡都說他很對，完全不是政治家的態度，有這樣一個機會，應該公開發表意見：怎樣動員群眾抗日、釋放所有的政治犯、還人民自由、武裝人民……。看到兩位同志表示憤慨，而我呢，比較了解他，冷冷地說，這是他的思想問題，也許他不想再幹了。聽說他出獄後，秦邦憲、葉劍英去見過他，在南京住了幾天，他經過蕪湖到武漢，而沒有去上海。從此他表示與托派分道揚鑣，走自己的道路。他離獄數日後，看守告訴我們，他出去時帶了一個女人，一位胖胖的三十歲左右的女工，姓潘。最後要提的是宋逢春，我們到了模範監獄不久，他通過妹子找到梁幹喬把他保出去，事先沒告訴濮一凡、羅世凡。後來知道他投降了國民黨。

獨秀出獄數日後，典獄長通知濮一凡、羅世凡兩人準備出獄。他們立即懂得要把我留下來，他們很難過。我們這幾年在獄裏生活在一起，關係很不錯。他們似乎從典獄長那裏知悉，是國民黨政府要把我留下來。再者，獨秀臨走時，給他們每人一點錢，並說萬一彭述之被釋放，也留給他五元錢，臨時可做車費。他們是8月底出獄，留下我和牛蘭。典獄長再來看我，說照理沒有理由把我留下來，但我的釋放有麻煩：國民黨中央黨部有命令不找我。那時國民黨黨部主持人是陳立夫，他對我特別仇恨，對我在法庭上的辯訴狀十分厭惡，所以把我扣留下來，準備移送蕪湖監獄。然而典獄長卻反對，他對我說：實在沒有理由，連陳先生都放出去了，你同他是同一個案子。典獄長說要到司法院去交涉（當時司法院長是譚政）申請釋放我，要我放心。典獄長奔走了好幾天，獲得了譚政的同意，也可能得到司法部長羅文幹的同意，也不管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命令（是非法的）了。最後告訴我一清早整理物件，當天就可以出獄。但是我有很多書，獄房已變成一個小圖書館，我央請教務處管理員設法把我的書收藏起來，他用好幾個大網籃把書包好保存。

出獄前有一件小故事：我身上只有五元錢，臨時未及寫信給碧蘭。

這幾天日機常來南京轟炸，孫怒潮及其他友人平時常來看我的都沒有來，我過去也沒想到問他們的地址，因此一旦出獄，沒有任何地方可去，束手無策。就在此時發生了意外的情形。我認識一個犯人，因秘密販賣鴉片煙而被捕，是監獄方面指定他來服侍我的，經常送飯菜來，我有剩下的飯菜也給他當場坐下來吃。他對我有相當好感。他有時同我談起他被捕的事，我勸他不要再做這項「行業」。他說他下了決心，將來被釋放後再不做這樣的事，而做正當生意……。我將要出獄時，他幫我清理書籍等等，我也把一些衣被送給他。他對我說：彭先生你今天出去，一定要在下關住宿一夜，不必住旅館，就在我家過夜。他把地址告訴我，事先設法通知他家裏（但我不太清楚），還要求教務長給我僱一輛黃包車，一直到他家。他家裏有妻子和孩子，還有一個未嫁的妹子，住的地方排場是中等家庭。他的妻子非常熱誠地接待，她有朋友來也熱情表示願幫助我，我說我需要明天去上海的火車票。她說這很容易，即由友人當晚去買。我要還她錢（我身上僅有的五元錢），她拒絕了，說我對她丈夫很好，這是表示謝意，而且如果我給了車費，就一錢不剩，很危險。她託朋友第二天清早用黃包車送我到車站，連車費也是友人付的。我等了一天，晚上才乘上去上海的火車，本來夜車需要 6 至 7 小時，這樣我最後離開了南京。

火車到嘉興，前面一道鐵橋已被炸毀，雖然損失不太大，但火車被迫停下來。不久，日機來炸火車，我們所有乘客，有數百人都分散到田間去躲避，火車被炸毀一部份，幸好沒有炸死人。已是清晨，火車站下來，車站人員說，既然前面鐵橋被炸，火車被炸也有損壞，你們要去上海，不太遠，只要過橋走到另一小車站，打電話到龍華車站，一定有火車來接你們。我們只好背着行李，走了相當遠的路，越過橋，到了嘉興過去的小車站，等了些時，火車載我們到龍華車站，龍華離上海還很遠。我背着一個沉重的箱子，要進上海法租界，可是租界封鎖起來不讓外地

來的人進城；說了好幾個小時，總算讓我同另外幾個人進入法租界。身上剩下五元錢，叫了輛黃包車直到青年會；可是碧蘭不在那裏。又轉到亞東書店，通過趙濟才找到碧蘭和孩子。五年監獄生活自此告一段落。當時南京報紙登載：彭述之是最後釋放的托派，並簡述我的生平。

第二六章

托派運動重整旗鼓

恢復自由，重見上海，發現局勢有極大的改變。首先是國民黨被迫對日帝進攻開始抵抗。全國已興起一大抗日潮流。問題是怎樣應付這一新的局勢。再次是想知道上海的實際情況。

趙濟從亞東書局送我到碧蘭住的地方時，大約告知上海托派組織的一些情形。到家後，碧蘭告訴我她已經失業了：青年會已停職。馬上受到生活問題的困擾。而我剛出獄，一點關係還沒有。碧蘭帶我到施復亮家裏，施介紹我見葉波澄；施那時很關心我們。他已知道碧蘭青年會停職，但請我們不要擔心，說準備同葉波澄商談。葉剛開了一個書店「進化書店」，施是裏面的編輯，準備出一批書，尤其是抗戰的書。他說無論我寫文章或翻譯都好，讓我預支稿費。當然我很樂意接受這一建議。過了不久，他又告訴我葉波澄願意每月支付六十元，勉強可以過活，以後再考慮我寫書或翻譯，不要急，先安排生活。我們不久就從法租界搬到公共租界一個條件比較好的住所（福田村），可以定下心來。施復亮此時的幫助是決定性的。否則我們一定狼狽不堪。

然後，我見到陳其昌。他算是上海托派的一個負責人，但沒有甚麼組織。據他說，上海托派當時只有二十人左右（連技術人員三人在內），沒有甚麼活動，黨員有王獨清、李季、趙濟、碧蘭……，但沒有人做組織工作或向外活動。由此我回想被捕以前的情形，實在大不相同——在那短短的一年多期間，黨員從十人增至三百有餘，在上海有數十個支部，多在大工廠內，而且各地（香港、廣州、山東、北平、武漢……）也有組織。如今只剩下殘餘分子。許多莫斯科回來的知識分子都離開了。劉伯莊、汪澤凱到北平做教授去了，彭桂秋、杜畏之、吳季嚴……也都離開了。我們被捕坐獄這五年來，組織變成這樣殘破，怎麼能做事業——我深深感到困惱。

陳其昌本是北大學生，1927年在北大一個支部做書記，人相當老實，但能力很低；後來在1929年到上海找到我加入托派。他把王凡西介紹給

陳獨秀，同何資琛在「無產者」社裏組成小組對付我。托派被捕同志受審期間，他們把陳獨秀的辯訴狀印出來，而把我的辯訴狀壓下來不發表……。陳其昌最惡劣的行為是當我釋放出來後，大公報有一新聞記者來找我，本來有一個機會讓我發表抗日主張，但陳其昌自己做主把他回掉了。大公報當時是中國最有地位的報紙，而且那記者曾經加入過托派。陳其昌後來又告訴我，令我非常不快；可見他對我的敵視，無條件擁護陳獨秀、王凡西這一派人，就不講道理。而我倒是正常的對待他，主張把組織恢復起來，同各地聯絡建立正式關係。我同他談了兩次話；一次有趙濟在場。我提出應該開一次臨時特別會議，決定抗日主張，選舉一個正式領導機關，辦報紙等建議。他當然也不反對。

回上海有兩三個星期了，有一批同志從南京軍事監獄、蘇州、無錫的監獄釋放出來，有十多位。他們為了生活，有的去武漢，有的去山東，來到上海的有三、四人，其中有劉家良、寒君；後者是過去法租界托派支部書記，和我合作一年有餘，是一位最肯苦幹的同志。

我召集在上海這些同志一起商議重組運動。趙濟最反對陳其昌，說他又無能又要把持一切，應該把他排除；提出由我來整頓組織。我不以為然，說應該按照組織規律。我也不定要有甚麼負責地位，只是提出一些辦法。開始在上海把個別分子聯繫起來，成立支部，影響群眾。這一切算有點頭緒了，面臨重大的政治問題：即對抗戰應採取一個明確的立場。日軍已經佔領了東北，也已進駐北平、天津——這是中國歷史上外國侵略最大的事變。

這裏必須對國民黨蔣介石為甚麼這時決定抵抗日本加以分析。以前我們多數同志都認為蔣介石對日帝採取不抵抗主義，所以現在聽說他要抗戰，還不相信。為了確定我們的政治立場，不得不對他這一改變稍加解釋。就他本人說，蔣介石是中國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的劊子手。他奪取政權後，用全副力量鎮壓共產黨，連托派在內，建立一個最反動

的軍事獨裁。「九·一八」日本奪取東三省，「一·二八」進攻上海，蔣介石毫無抵抗旨意，只想和日本妥協，那時他同日本簽定的一些協定，都是賣國的協定；為甚麼在「八·一三」之後，他突然表示準備軍事抵抗？

原來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一、日本人佔領滿洲以後，繼續侵佔上海，雖然退出去了，還是繼續在北方侵佔熱河，引起局部戰爭（如馮玉祥的抵抗）。但自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正式發動全面進攻，佔領華北、天津；在這種情況下，全國抗日浪潮高漲，這種氣氛也蔓延到國民黨軍隊中，有些下級軍官受兵士壓力，對蔣不滿，要求抵抗。蔣介石迫不得已開了一次廬山會議。在1937年7至8月間，國民黨內有些派系利用機會來反蔣，形成很大壓力，甚至連汪精衛也來投機。

二、另一因素就是西安事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蔣介石被張學良扣留後，莫斯科有命令要中共同蔣談判，派周恩來同蔣直接談判，結果不但保證蔣的生命安全，而且中共自動取消蘇維埃政權、取消紅軍、放棄土地革命；唯一條件是蔣介石負責領導抗日戰爭。中共願意接受他的領導，並且接受三民主義，也就是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蔣介石當然口頭答應，因此中共完全投降蔣介石，變成他的支持者。也因此，蔣沒有內顧之憂，就起來「應戰」（這是他用的字眼），絕不用「抗戰」，正因此，他沒有向日本正式宣戰，而一切對付民眾的壓迫政策依舊；除了釋放了一些政治犯外，他絕不要民眾武裝動員。這時他有一個計劃，當時已不斷透露出來：他的意向是經過同日本一點軍事抵抗後可以謀取妥協。

當時英美方面感到日本要侵吞整個中國，他們也不甘心，所以多少支持蔣介石來抗戰。不過英美，尤其是英國，並不是要用力量支持蔣，只是讓他稍為抵抗一下，然後，設法調和；所以「八·一三」戰爭發動

後，英國還暗地同日本談判，想要日本佔領華北時，不再進攻長江流域。但日本不顧英國的意願，自以為有把握併吞全部中國，所以不買賬，不接受妥協，而成了僵局。這就是蔣介石抗戰的來龍去脈。

中共聲明全力支持蔣介石，在他的領導下抗戰，沒有其他任何條件。那麼托派採取甚麼態度呢？

在這個問題上，托派成員開始發生不同意見，我剛到上海時，問陳其昌，他說不出所以然，按照他的看法，國民黨這樣反動，我們不要支持它，不過我們可以號召群眾。就等於說國民黨拿起武器打日本人，難道不支持它軍事抗日嗎？我說這是不行的，不能對國民黨用消極態度否認它抗日。這裏要說到獨秀，他究竟採取甚麼立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1937年9至10月間我們在上海的報紙上略略看到獨秀有些活動。在武漢青年會演講……，但消息很少。10月間，羅世凡到上海。他同濮一凡8月末從獄裏出來去了武漢，在那裏當然同獨秀接觸，多少知道獨秀的政治與組織的主張。羅世凡對獨秀極為不滿。因為有一些同志來找獨秀，比方從南京軍事監獄釋放出來的兩位山東同志，他們要求獨秀恢復托派組織，獨秀表示暫時不幹，將來再說了。

羅世凡是我寶慶同鄉，曾在金陵大學修業。「九·一八」後他同寒君一起投到左派反對派，人很積極，但性格很急躁，不冷靜，容易爆起來。他看到陳獨秀的行為完全不像一個革命家，完全不要組織，連同志的生活也不關顧。然而羅知道獨秀有錢，在獄中時，中國銀行每月有三百元津貼，有好幾年了，都是由他支配，本來唐有寅的原意是維持被捕人及家屬生活的，這筆款子由陳獨秀管理，我也從來不過問，老陳只把很少的錢給獄中同志，他另託人保管，羅世凡他們都知道，要獨秀拿錢出來暫時支持他們，卻「也無結果」。

從政治方面說，羅世凡說獨秀的意見很簡單，在公開談話中他表示已全力支持國民黨抗戰，但聲明完全是個人行為，而絕不是有組織的。

他甚至表示不代表任何黨派，只代表他個人，就是不代表托派。我本來知道他的變化，這時更加失望了。只好自己來負責幹下去。在9至10月間我研究時局發展，當劉家良，寒君來到上海，我們交換意見，我主張準備一個決議案，召集會議正式通過，成為一個集體的主張。

當時從報紙上看到托洛茨基關於中日戰爭的意見，似乎要支持抗日；不管蔣介石本質如何，要支持他抗戰。我們討論結果寫了一個政治草案，軍事上支持國民黨抗戰，同時反對它的任何妥協意圖（因為英國在拉線，妥協氣氛相當濃厚）。我們認為要有一個抗戰的基本戰略：在抵抗日帝侵略的同時，應該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發揮人民抗戰的意志，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人民應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日帝在華財產沒收，一切不平等條約宣佈取消，以此獲取人民大眾對抗戰的支持。至於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因抗戰而壓低，要有適當改善，應該解決土地問題獲得農民的支持，要宣佈將來抗日兵士有權分得土地。以這樣的政治綱領來對抗蔣介石反動的抗戰綱領。這就是說：我們是支持蔣介石領導的軍事抗戰，同時批評他政治上對日本妥協，反對他壓迫人民的反動政策，要求民主自由，包括武裝自由，由國民會議來代替獨裁；這就是我們的政治綱領。

於是在1937年11月間召集了一個正式會議，主要是一些幹部以及獄中出來的同志參加，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我起草的政治決議案，選舉了幾位執行委員來負責任。彭述之、陳其昌、寒君、羅世凡、趙濟五人，那時他們要我做書記，但我看到陳其昌個人傾向，就告訴趙濟、寒君、羅世凡他們還是讓陳其昌繼續做書記。他的虛榮心很強，又沒有能力，遲早會出問題，但我做書記，他一定會反感，所以我勸同志們讓給他書記位子，我做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上主要的工作，我是負責的。以後再說，這是我回滬後第一個成績。

會議後工作有了安排，就恢復以前出版的《鬥爭》，是手工鉛印，

散發不多，郵寄各機關大學。在滬西的紗廠開始，有女工活動分子，在學生中也開始發生影響，但規模還很小。

我們的私人關係倒有新的發展。通過施復亮、葉波澄、寇松如，尤其是李華卿，他是王獨清的學生，原來是上海藝術大學一位留法畫家姓劉的學生；還有李國棟也是藝大的學生，受托派的影響。李華卿有一個時期去日本留學，同葉波澄很熟。在日本結識了馮淑湖（陶軍原妻；同他離婚時，陶給了她一筆錢到日本留學）。他們在日本結合，回國後，李華卿同施復亮、葉波澄交往很密，也是進化書店一成員；他對我們非常關懷敬重，成為至友。

「托派漢奸」的由來

1938年起始，在中共「斯大林派」報紙上，在武漢和上海登載侮辱我們托派的消息，指名說陳獨秀、彭述之從日本人那裏領薪金，每月三百元，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因此給我們加了一個名號「托派漢奸」。這一「消息」散佈很廣。引起獨秀憤怒，據說周恩來在武漢時，有一次去看獨秀，獨秀對他大發火，說你們的報紙誣蔑我們。周恩來答說：你不要相信這些，不要管他了，你是知道的（意思是陳紹禹當時從蘇聯回來，是他們幹的）。當時有些國民黨左派和第三黨人士表示憤慨。有人說，陳獨秀和彭述之如果要出賣自己，三百元太少了！有人寫文章在武漢的刊物上批評這種造謠誣蔑。在上海報紙上很少看到，是間接從武漢傳來的。

1938年4至5月間，發生一件轟動的事件：李國傑（李鴻章的孫子），前招商局總經理，因為同日本勾結，被（國民黨）政府處決了（事實上是特務暗殺的）。有四家報紙，都是斯大林黨辦的報紙（其中有華美晚報，由滬美國領事館登記的），登載的消息包括「李國傑最親密的友人是彭述之，這人現在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住在上海……」暗示我同李

國傑有密切關係，也是賣國賊，也應該處死。

這個謠言散發開來，我的人身安全馬上受到威脅。因我的住所有斯大林派人知道，必須設法離開，否則斯派會派特務來打死我，然後宣佈是國民黨特務幹的，或者暗示國民黨特務，把我們的住址告訴他們。情勢嚴重，我必須暫避一下；朋友同志方面也沒有安全的地方。倒是樓子春跑來看我，說他有一個關係，是一個錢莊，經理姓劉，他認識錢莊的襄理夏杏芳。夏知道我，在五卅時代他還是錢莊的跑街，參加銀行工會，也參加運動，而且也看到托派南京審判報上的消息，說他很歡迎我到錢莊去躲避，沒人知道，相當安全。於是我離家到志裕錢莊一個後樓夏杏芳的房間裏暫時住下。另一方面進行司法手續，控告這四家報館造謠誣衊。

那時在上海有一位美國托派人士李福仁，是美國密勒氏評論《週刊》的主要編輯，聽說我出獄，要想見我，由劉家良帶去他寓所相晤。當我這事件發生，劉家良同他商量，因華美晚報原來是美國領事館出錢辦的，名義上的經理也是美國人，用假名。李福仁考慮找一位外籍律師來幫忙，主要是控告華美晚報，質問他們有何證據，證明彭述之與李國傑有密切關係。如果沒有證據，必須公開說明更正。同時我寫了同樣內容的信給其他三個中文報刊，經過律師正式起訴，結果華美晚報的經理在他報上登出一個聲明，承認把彭述之和李國傑聯在一起沒有確實根據，只是一種推測，承認是一個錯誤。另一家中文日報，是同情斯大林派的，館長也登載一個同華美晚報相類似的聲明，糾正錯誤的報道。這樣才了結一場「官司」。我在《鬥爭》上寫了一文，暴露斯大林派的卑鄙無恥，雖然這是一個插曲，但其後果倒是有利我們工作的開展。

住在錢莊裏，起居飲食安全都有保障；我發現夏杏芳表面上很沉着寡言，而內心非常熱忱。他很同情我們這種革命家，多年幹革命，吃苦了也不灰心；也知道有許多人已犧牲了，所以對我們特別尊重，無微不

至。也時常請我參加一些社會活動（餐會等等）。1938年下半年我都住在志裕錢莊裏；夏杏芳白天工作，晚上常留在莊內，同我甚麼都談，尤其歷史問題，聽得很仔細。另外有一位年輕跑街何民麟，也介紹給我。何受過中學教育，愛寫詩，晚上還學英文，和我很親近，有事情他奔走幫忙。夏同情托派運動，要看我們的刊物。他問我想辦些甚麼事情，他設法找一點錢幫助我們。我說我們是要出版書籍，如果有可能則辦一個刊物。他個人是襄理一月收入不過八、九十元，有一家人，私人無法資助。於是他想另租一寫字間，做點生意來幫助我們。於是在錢莊附近一大廈內租了一個寫字間。後來，我在志裕錢莊住久了，人來人往很多，特別受注意，於是我後來就住到寫字間去。

志裕錢莊的經理劉伍朝，有六十歲了，也知道我的歷史；是蕭山人。他告訴我蕭山有一位著名的農民領袖葉天底，共黨人，被國民黨槍斃了。而這葉天底是我在漁洋里的同學，青年團員，同我私人關係很好，有詩人氣息，不知為甚麼沒有去莫斯科；五卅運動時在蕭山當農民運動領袖，我到上海時他還來看我。劉伍朝說葉天底字寫得很好，大家把他寫的字當寶貝；他似乎很惋惜，對我也表示很友善。不久，志裕錢莊要我給他們每晚講話。

夏杏芳盡力設法做生意賺錢，他告訴我少數的錢是找得到，問我先要做些甚麼事呢？那時我們的關係很密切，我就直說出來：想出版四部書：（1）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是最大規模的）；（2）約翰生《列寧死後二十年》；（3）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4）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夏說你是不是可以先出版比較小的一本書，我可以設法找到錢。我就告訴他先出版《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南京監獄內，我請羅世凡、濮一凡翻譯，沒有譯完，其餘寄給鄭超麟譯完；稿子已全，現存在亞東書局，可以馬上出版。他一口答應，至於其他要出的書，估計經費，以後再說。

1938年尾，我們的工作逐步開展；在上海不僅恢復原有組織，還有新的發展，其次在溫州、香港、中山有特別的開展。比如溫州有一位名曾猛的托派成員，原來是老共黨員，1926至1927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做技術工作，那時王若飛是中共秘書長，技術機關設在周恩來的住所，革命失敗後去莫斯科讀書，回國後偶然在四馬路碰到碧蘭，聯繫上，同我談話。他告訴我在孫中山大學（莫斯科）已加入托派。他也是我們上海被捕時解到南京的托派之一，在未審判前被釋放，回上海。他妻子在上海開藥房，可能由她保釋，然後他去溫州，繼續爭取托派分子，王國龍等人，有一批青年受他影響。此外還有李國棟，也在溫州活動，所以八一三時期溫州有數十位托派分子。在廣東中山有一位托派王靜波，是卅年代濟南大學學生。他們（共有四人）都是中山縣人，都受了托派影響，畢業後回到中山教書。王靜波特別積極，影響了一大批青年，如阮金兆、鄭致祥、劉乃光、高子良……，從中山到香港、廣州，活躍起來。再者，在廣西有施唐，原來是《我們的話》的成員，因不滿王凡西在托派統一期間，糾纏不清，統一大會之前不辭而去，回到廣西，在廣西大學做教授還傳播托派思想，在學生裏面做思想宣傳。不久廣西大學邀請彭桂秋做教授，因此廣西也有許多學生接受托派思想。在重慶，那時我們沒有聯絡，但有自發的托派組織，我們出版的《鬥爭》有相當影響，於是托派運動開始復興。

1930年初，亞東書店老闆汪叔潛要求我們寫小冊子，他願意出版。過去他很謹慎，因革命失敗後很受打擊。我從南京回滬時，亞東門面冷清得很。現在是抗戰局勢，他也膽大起來。汪叔潛最初出版《新青年》、陳獨秀和胡適的書，在五卅革命時代，全家都加入共黨，子女都是共黨黨員，而且代表中央出版書報。比如《嚮導》週刊……也賺了錢，但革命失敗後，即受打擊。當他提出替我出版小冊子，我一口答應了。由我選擇題目，我一共寫了三個小冊子：（1）《怎樣才能長期抗戰》，分析

戰爭局勢、前途，包括策略，是根據我們的綱領加以發揮。(2)《奧大利革命是怎樣失敗的》。(3)《西班牙革命失敗的教訓》；1939年初已是西班牙革命末期，這本小冊子是我花了不少工夫研究，特別認真寫成的。這三本小冊子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在各地公開銷售，影響很好。比方我們直接知道在廣州以及廣西（桂林）等地，小冊子一到就搶購空了，還寫信給亞東要求續寄。

同時，我們把托洛茨基寫的莫斯科審判案件也在亞東出版，暴露斯大林特別厲害。思想上的影響更助長各地組織的發展。

1939年也是托派建立自己的同情網的時期。這年年初，我住在志裕錢莊，葉波澄知道我認識襄理夏杏芳，要我介紹認識。葉波澄當時有一大筆錢，不但是他自己，還有陶軍託給他管的；他想找機會利用這筆款子。我很樂意介紹他給夏杏芳，告訴他過去是做過官，現在思想左傾……。就在寫字間見面，也就是我暫時住的地方。後來夏杏芳、葉波澄、李華卿經常在這裏碰面，變成好友。1939年春，他們開始從越南運貨到昆明，再到重慶（詳情我不過問），派了楊建中（是在莫斯科辦過救濟物質的）去越南河內做經理。

在同一時期，通過高子良，我又認識李棠，廣東人，開過出口公司；高子良是他的職員。又經過高子良認識姓劉的中山縣人，是新新百貨公司人事部的主任，從前也是托派。由他保薦了幾個同志到新新公司做職員，如鄭致祥、康溪……。另一位中山縣人是羅瑟希，是道亨銀行的襄理。羅有一兄弟是托派，犧牲在潮汕。他很惋惜，對托派有深刻的印象。他能寫詩，寫小說。

王獨清介紹我認識胡山源，也是五卅時期的左派分子。經過胡山源又認識嚴雁賓，上海震旦大學畢業，煙紙大王的兒子，一般同情共產主義。當胡山源把他帶到我家時，他開口就問：你家裏有沒有日本兵？看來好像沒有一個。我答說：這是怎麼說？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八一三之後，他到湖南，想在內地參加抗戰，那時他父親還在世，但中途得父親死耗即趕回上海。當他在長沙時，看到報紙（斯大林派）報道彭述之住在上海虹口區一座大洋房內，由日本兵士保護他。另外還有一些謠言，總之要證明彭述之是大漢奸。他大笑起來說：原來這裏就是那虹口大洋房！可是沒有日本衛兵。於是感嘆地說：唉唉，他們真是卑鄙無恥。後來他辦了一間進修學院，還請我去講課。

這些同情友人關係的逐步建立，基本上是由於我走出南京監獄後，經過深深反省，覺得過去錯了，太孤傲，完全把自己孤立起來。於是決心改變態度，有意識地開放社會關係，凡是觀察到可靠的人士都願意接見。尤其是碧蘭對待人很大方，多數朋友都喜歡她。這樣我們周圍就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同情網，對私人和對事業都有很大的幫助。這裏我提一句：我們的女兒高中畢業，本來說到錢莊找一個職位，但夏杏芳說這個孩子聰明，不要馬上做職業，繼續唸書，學費由他負責；可見他對我們私人的體貼關顧。

這個同情網的建立和我們當革命家的態度有重大關係。這些同情者親近我們自然是根據我們過去的歷史：在革命運動中的鬥爭事實，以及我被捕坐監獄時的表現，也由於碧蘭在長長五年中獨立在社會上奮鬥的艱苦……這些都可以吸引一些同情朋友。但只靠過去的歷史和聲望和對革命家人格的尊重是不夠的，還是抽象的，而最主要的是我們做人的態度，是要接觸後才具體知道。我們做革命家窮是大家知道的天然的事。有些同志常常在同情朋友面前哭窮，是想得到物質上的援助。在這一點上碧蘭和我完全一致的，從來不向同情朋友提及我們私人生活情況。即使沒有錢吃飯，也從來不向同情者開口借錢；甚至有朋友開口願意幫助，只要我們勉強過得去，也不接受。比方，我在南京監獄時，葉波澄想幫助碧蘭，願每月資助她幾十元（因她有兩個孩子）過活，但碧蘭表示她個人有一個職業可以維持，彭述之在獄中生活也無其他需要，除了書以

外。所以葉波澄就託她買了一些書帶給我，令他感到這些革命家很高貴，這正是我們對一般人和同情者的態度。因此他們看到我們不但在政治上有革命家的品德，而且在私人生活上也有高貴的德性。

我們家常有往來友客，平時的菜食很壞，但碧蘭的脾氣，總是把所有最好的菜食待客，為此有時發生誤會。比方李國棟從溫州來，碧蘭招待得好，菜食豐富。他說：你們生活得很好，但劉家良怎樣苦，因劉給他家常菜食，而碧蘭特別為他添菜。但過了幾天，他偶然又來我家，看到桌上是簡陋的飯食，他感動了，說碧蘭待人太好。這些只是小例子，但同友人關係實在很重要，所以同情友人不但在政治上尊敬我們，而且在日常為人上也佩服我們。

再次必須提到革命黨人夫婦關係也至關重要。在革命上升時期，共黨內的夫婦往往是同志，關係比較單純。因大家在工作努力，有前途。革命失敗後，如果夫婦都是共黨革命家，在艱苦情況下，發生不一致，會引起很多痛苦。這樣的例子很多，比方汪澤凱，是留法學生中活動能幹者之一。革命失敗後，他很有正義感，對我們的遭遇很憤慨，反對黨的政策和官僚式的領導，投入托派運動。有一個時期，同住在環龍路一座房子裏，因我譯書每月有 60 至 70 元收入，他也譯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書；那本書很難譯，他很辛苦。他的妻子杜玲是湖北師範碧蘭低一兩班的同學，也到過莫斯科，革命上升時相當活動，而後來也加入托派，但不很積極。同住期間，她經常板起面孔，很少有笑容，想必他們夫妻之間定有摩擦。不久，汪澤凱通過一個關係到北平去當教授，有同志要去看他，他不要他們去他家裏，就無形中脫離了運動，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這方面，碧蘭和我是可驕傲的：我們的個性雖然不同，但在做人的態度上從來沒有這樣的問題。碧蘭從來不抱怨，認為這是我們的命運，抱着宿命論，否則就不能維持到今天。這是我們對同情朋友們的吸引力，

也是做到成功的事。

約在 1938 年 5 至 6 月間，王凡西從武漢來到上海。他從南京監獄出來後（他被關在與我們不同的監獄，也許是軍事監獄）到武漢，轉了許多彎才找到獨秀，就住在獨秀家裏。他告訴我們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表示不滿。他同獨秀談到要幹些甚麼事情；王凡西還想幹托派運動，還想建立一個中心，當然獨秀在見王之前就有表示（羅世凡的話）：不要談組織，各人幹各人的事。王凡西向他提議至少設法出版一個刊物，發表意見；獨秀答說：現在不是我出刊物的時候，我們現在肚子要緊，就此拒絕了。對這兩點，王凡西都不滿。當時獨秀對國民黨「左派」的人士，如陶希聖等人士，甚願往來。連漢口一個像杜月笙一樣的人物也來往；不談政治問題，可以合作，要他們拿錢辦刊物（當然不是托派的），他願意供給文章，甚至介紹王凡西做編輯……。但這些人並不是誠心想同獨秀合作，只是想利用他的地位名聲，結果刊物沒辦成。

再者，獨秀通過李重山認識一位國民軍系統的軍官（師長或旅長之類），在安徽帶兵，到武漢見到陳獨秀，恭維之至，並表示要抗戰，要革命。陳獨秀同他談到，是否需要政治工作人員，那位軍官最初答應，陳就找王凡西，另外還找湖南的何贊琛、汪澤凱等，又想重複第二次革命國共合作時期，中共黨人在國民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那樣，而實際上是做軍官的姨太太，做政治欺騙；可見陳獨秀沒有從第二次革命失敗中得到教訓。而我們在革命失敗後對這點特別警惕。認為沒有正確的立場，在資產階級軍隊中做政治工作，不過是替資產階級軍人服務，欺騙群眾，不需要時一腳踢開，過去的經驗還不夠嗎？陳獨秀想重複國共合作那一套，但又不是政治立場，又不要組織，就完全是投機了；可是他這一計劃也沒有成功。那個軍人不知為甚麼出了毛病，可能上面不信任，也許他自己害怕；但這裏表現出獨秀在重複過去的錯誤。

另有一件事，涉及獨秀與中共的關係。獨秀派了一位托派的老同志

羅漢，到延安同毛澤東談判合作方式。羅漢原來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革命失敗後也送到莫斯科進東方大學，在那裏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回國後成為「十月」社的中央委員，出了事又離開了，到宜興做陶器工業。獨秀出獄後，他到武漢見到獨秀，羅漢過去與中共老一代領袖有聯繫，而且在軍隊裏工作過。比如他同王若飛、周恩來、葉劍英都熟的。但是獨秀派他到延安去見毛澤東這件事，我們（連王凡西在內）都完全不知道。後來羅漢到上海來見我，談起獨秀派他去的整個故事。羅漢到了西安，見到王若飛和林伯渠；他倆都是西安中共辦事處的負責人。

王若飛是羅漢的老友。王若飛告訴他要打電報問延安方面的意向。因為陳獨秀要同毛澤東談判合作的方式，就是回到黨裏來。延安的回電是，獨秀事先要做一個公開聲明，意思就是對托洛茨基主義要有一個批評，甚至攻擊，要悔過……。這麼一來，羅漢就沒有去延安，只好回頭，但沒有直接去武漢。他從西安到南京，會晤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周還談到我在獄裏時碧蘭做些甚麼事情，他們全部知道。而鄧還向我們問好，好似並不仇視我們。

至於王若飛，記得中共六次大會前他曾是江蘇省總書記，他曾寫了一個文件攻擊瞿秋白的中央；這文件由托洛茨基引述，認為同他的意見相接近，也就是證明王那時的意見和我們相同……。王若飛當然希望獨秀同毛澤東合作，因遵義會議後，中共黨領導權全在毛手中，但是毛澤東不答應，因此，羅漢不久從西安到上海，再去重慶，途中經過漢口，把這件事經過情形報告獨秀（實情我也不知）；但這個故事證明，獨秀已不顧原則而完全是個人行動。

另外一件事，發生在 1938 年 4 月間，是張國燾背叛中共而向國民黨投誠。作為中共代表，張利用祭黃嶺的機會，離開了延安，事先私下已和國民黨有聯繫，在西安得到國民黨的幫助，從西安跑到漢口；他很害怕武漢的中共秘密綁架。他見到獨秀，說他已背叛了中共。獨秀表示贊

同，說這樣很好，你自由了，就是張國燾背叛中共，投降國民黨也不在乎！然而我們認為張國燾有理由反斯大林黨和反毛澤東，不但不反對而且會支持他。但他那樣偷偷地投降國民黨，轉過身來反共反毛，我們就不能贊同，就要批評他。當他到了漢口，報紙上有消息，他做了一個公開聲明，聲稱他是為了抗戰……。我在《鬥爭》上寫了一篇文章；我說從斯大林學校裏出來的人是沒有原則的，為了抗戰應該提出抗戰主張，而不能站在國民黨方面來攻擊中共的抗戰政策。同時反映獨秀也毫無原則。

這裏我要說的是有關獨秀的政治問題，從王凡西那裏知道老陳在武漢公開發表的意見，或是在集會上的演講，或是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我們都已知悉，不能不表示態度。他從前是眾人皆知的托派著名領袖，現在在武漢報紙上公開發表他的政治意見。以前我們沒有根據，還不能正式表示一個立場，現在得到這些材料之後，我們在上海托派領導機關「臨時委員會」，通過了由我起草的決議案，由委員會通過，對獨秀自1937年秋到1938年夏這一時期，在武漢公開表示的意見一個總批評（這文件是1938年7月起草的）。文件不長，只指出幾點：

（1）獨秀到武漢後公開聲明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表明他不再是托派，同它脫離關係，變成超黨派（也就是超階級），在各黨派間以中間人自居；（2）關於抗日戰爭，他公開號召要相信（國民黨）政府有抵抗日帝的決心。這恰好對準蔣介石政府大事宣傳的口徑，而對國民黨不加任何批評，變成它的傳聲筒。事實上，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反動政策毫無改變，對農民也沒有任何讓步，姑且不談解決土地問題，這與我們的政綱完全不同；（3）他主張「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該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的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帥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很明顯他完全放棄了托派的立場，即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

這一基本政治立場主張，也就是完全背棄了我們過渡時期的綱領。

八一三抗戰後中共在重慶創辦了《新華日報》，當時發表了一篇文章〈責問陳獨秀〉，文中要獨秀對抗戰表示態度，尤其是對托派公開表示立場。獨秀寫了一封公開信來答覆新華日報的編輯部，裏面有這麼一句話：他宣佈同托派沒有任何關係。這句話當時有重大意義。第一是，新華日報是中共機關報，直接質問陳獨秀對托派如何？而且正是斯大林黨的報紙在各地發動誣衊陳獨秀和彭述之拿日本人的錢，宣傳托派是漢奸……如果獨秀是真正革命家，正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反攻責問中共的誣衊有甚麼根據。其次，應該說到中共對抗日戰爭有一公開宣言（1938年8月21日），其要點是完全支持在國民黨領導下抗戰，服從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取消紅軍。這個政綱完全否定了中共自身，獨秀本來應該批評，但他一句話也沒有。更糟糕的一件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佈恢復共產黨人的國民黨黨籍，其中當然共黨人很多，托派有陳獨秀、彭述之也「恢復黨籍」，在各大報登載，獨秀也沒有表示任何抗議，利用這個機會來攻擊國民黨……。這一點我完全不同，我看了報紙，立即寫信給國民黨中央，根本否認我曾加入國民黨，認為他們恢復我的黨籍沒有實據，很可笑。趙蔚天來我家，還勸我不必了：你有國民黨名義可以活動了。這裏表示獨秀走得多遠，好像忘記了蔣介石殺了多少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現在來恢復我們的國民黨黨籍，獨秀卻默然承認；還有甚麼可說的！

過去在南京監獄裏，我和獨秀的爭論還是理論上的。「八·一三」之後，他到了武漢，是把當時的理論觀念變成實際，而且更有新的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走向墮落。一方面我們批評他，和他鬥爭，另一方面，感到很痛心，很可惜；黨得到像他那樣的歷史人物，對托派是一個奇蹟，本來在抗戰爆發後，可能發生很大的影響和號召力，如今卻是相反，真是可惜，同時更堅決加強同他鬥爭的決心。

至於托派運動，一般來說，在1938-1939年間，實是一個新的復興，

不但各地組織有所發展，而且在思想方面《鬥爭》已恢復了。我寫了許多文章，我一向注重思想，所以準備出幾本書，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在1938年年底已出版。其他三本書托氏的《俄國革命史》、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以及約翰生的《列寧去世後二十年》是我想出版的書。問題是先要人翻譯，需要一個班子合作分擔任務……。至於出版，只能向同情朋友求助；是一大筆款子，單是《俄國革命史》，在國外從來不是托派組織自己出版，而是由大出版公司印刷發行，我也就想試探。有一次同李華卿談起出版事，他很熱心，總是關心我的工作和計劃，我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他。我說這些書的印刷費很巨大，此外翻譯必需供給最低限度的生活費。他很爽氣地答說：「這樣好吧！我同波澄商量一下；我建議同波澄兩人負責出版《俄國革命史》全部紙張和印刷費用等，他要計算一下。過了不久，波澄答應了，他們預計要幾千元現洋。

因物價不斷上漲，他們先買了紙張，囤積起來，一部份將出賣做印刷費。計算很精細，我非常高興，認為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幫助。於是我又同夏杏芳說起這件事，他也很高興。我說問題是要人翻譯，給生活費，他衝口而出說：這方面我想辦法，你們看需要幾個人幹這件事。我們臨時委員會討論，有劉家良、王凡西也到場，他們都積極贊成，尤其王凡西舉雙手贊成；他願擔任翻譯《俄國革命史》一部份。我提議最好把鄭超麟召回上海（他當時住在安徽鄉下），我們立刻寫信要他回上海，擔任《俄國革命史》翻譯。當然他不會拒絕，他比我們早一年被捕，在南京監獄出來後，到上海生活沒有着落，由汪老闆的關係到徽州去小住。鄭和王分擔《俄國革命史》的翻譯。劉家良自告奮勇，翻譯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陳其昌負責譯約翰生的《列寧去世後二十年》。1939年初就開始進行。因怕時勢變化不測，我們趕着時間盡速出版。夏杏芳負責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生活費，《俄國革命史》最先完成，1940年出版，共三冊。劉家良譯完伊羅生《中國革命悲劇》也差不多同時拿去印刷，

只有陳其昌譯的書沒有及時出版，準備下一步來。這是中國托派的最大事件，由自己組織出版這樣大規模的托派書籍，恐怕在國際托派組織內也是少有的。這完全是我們的同情網在這時表現的關鍵性，否則是不可意想到的。

中國時局急轉直下，創辦公開刊物

自「八·一三」抗戰以來，中國局勢簡單來說，是一個城市跟着一個城市被日軍佔領，首先失杭州、南京、武漢、廣州……一直到廣西，整個長江流域，在四川以下，沿海一帶；京漢路粵漢路沿途都全由日軍佔領。1938年國民黨政府，從南京到武漢，最後遷都重慶，但這一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有密切聯繫，尤其是英美。本來英國暗地裏是同日本謀取妥協，甚至利用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從中調解，但日本當時已是東條首相當權，非常強硬，不願討價還價，再加上1938年汪精衛正式同日本勾結。他1938年秋秘密離開重慶，經昆明、河內、香港、北平到東京直接和日本政府談判，建立傀儡政府，形成國民黨內部的大破裂，汪精衛對抗戰失望了，以為不如早一點投降還可得到一個位置。

在英美方面，這時美國起決定作用，它公開支持國民黨政府抗戰，給重慶二千萬美元借款來支援抗戰。那時羅斯福總統上台，不斷聲明不承認日本佔領中國土地，也不承認汪精衛的傀儡政府。

歐洲局勢呈現緊張：西班牙革命完全失敗，佛朗哥建立一個純法西斯的專政，希特勒利用日本佔領中國三分之二領土（大半個中國）的局勢，同日本訂立了軸心同盟協定（軍事同盟），積極準備在歐洲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種情勢下，美英更加要支持重慶，所以蔣介石這時也不說妥協了，把希望寄託在世界範圍內去解決，對於整個局勢改變，那時我在《鬥爭》有文詳細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即在1939年7、8、9月間，我們都看到局

勢急轉，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就準備出版一個公開刊物，來對付大事變的來臨，宣傳我們的綱領和主張。我們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其他地區都由日軍佔領，但是由於公共租界的特殊情況，還有可能把刊物運到別地。尤其是香港，從香港轉運內地。《鬥爭》是一種完全秘密的刊物，不能在報攤上賣，只能由私人散發或用郵寄，影響太微弱，所以我有意辦公開刊物。我同劉家良和王凡西商量，他們也贊成，但又是錢的問題，我被困住了。同情朋友已擔負出版書又擔負私人生活。我和李華卿談辦公開刊物事，他想一想後說這很有意義，可以同葉波澄商量，還問大概要多少錢，我說每期大概要 150 至 160 元印刷費，可印兩三千份。我很躊躇，勸他不要找葉碰釘子。他說葉對我們的事業很關心，百把塊錢是小事，不在乎的，他相信可以辦到。結果葉一口答應。

1939 年 8 月底，我們出版《動向》，在第一期裏就批評斯大林的德蘇協定，認為是希特勒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第二期出版時，世界大戰爆發——1939 年 9 月 3 日英法向希特勒宣佈開戰，因希特勒進攻波蘭（和斯大林同時）；分析二次大戰的趨勢和我們的態度，是根據托洛茨基的《戰爭與第四國際》（1938 年第四國際正式在歐洲成立）。當時《動向》是上海最有影響的一個刊物，可惜辦了五、六期就不能繼續，原因是我們批評斯大林政策，而當時中共在上海還有相當力量，我們受到威脅。

《動向》停刊後又出版《破曉》、《西流》，一期一期出版……，基本上是分析性的文章。有一篇是我批評陳伯達的哲學，也有一篇是對斯大林派誣衊陳獨秀在五四時期作用的反駁，主要方向是有系統地分析世界大戰的前景。我已估計到日本將佔領中國大陸甚至整個東亞，結果是為自己掘墳墓；我斷言希特勒和莫索利尼發動世界大戰是在火山上跳舞。這就是我當時的估計，後來經過考驗，這些分析是對的。

自從 1938 年尾，國民黨準備放棄武漢時，陳獨秀到了重慶，陳其昌自動表示要去見獨秀，去了一兩個月，於是我正式接受書記職位，

名實相符。

這裏我要談到第四國際和中國支部的關係

以前中國托派同第四國際是很疏遠的，除了通過 Frank（法蘭克）間接有接觸外，直接很少通信。1939年1月16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給第四國際做了一個政治報告，後來1940年6月6日還做了一個關於陳獨秀的報告；這只是我們同國際聯繫的表徵。1939年我們準備出《俄國革命史》曾寫信給托洛茨基，要求他做中文版的序言。可是這一序言始終沒有收到，托去世後，由娜塔利亞（托妻）寄來沒有寫完的序言……。

當第四國際於1938年夏正式成立時，我們也無法參加和發表意見，只是贊同而已。1939年間收到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馬上譯成中文。其他托寫的許多文章，也譯成中文，陸續發表在《鬥爭》上或在《動向》發表。

1939年間，正是歐洲大戰開始前後，在第四國際內發生重要事件：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分成多數、少數派，鬥爭非常激烈，一直到引起分裂；我們看到兩派爭論文件，最基本的是蘇聯問題；少數派（以夏克曼為代表）認為大戰爆發後，蘇聯同希特勒分割波蘭，蘇聯已不是一個工人國家，甚至已不是墮落的工人國家，因此蘇聯並不值得保衛；而第四國際的綱領是不管斯大林官僚獨裁如何醜惡，蘇聯的財產制還是十月革命的成果，是社會主義性的，如果帝國主義戰爭來到，我們無條件保衛蘇聯，就是保衛社會主義財產制，同時反抗斯大林獨裁。夏克曼和盤納姆是不同意這個綱領的，認為不實用。托洛茨基寫了許多文章來解釋辯護這一立場，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形成兩個相反的政治傾向，加農（多數派領袖）支持托，夏克曼則是反對托的。

約在1939年10月間，我們同 Frank（法蘭克）討論這些問題。夏

克曼派了一個代表名司坦來（Stanley）來中國，想影響中國支部。我們臨委的人員同法蘭克和司坦來開了一次會議，通過司坦來的報告，更具體知道美國黨內分歧的嚴重。我們表示支持原來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我們要求司坦來和少數派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這是我們第一次參與第四國際內部的政治鬥爭。（托洛茨基著《保衛馬克思主義》有詳細述說）

香港一行·支部改組

1939年秋冬，汪精衛成立親日傀儡政府，到處拉攏不滿蔣介石方面的分子。也確實在國民黨內外拉到一大批人員來支持他，像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物當然入網；也有某些知識分子，比方廣西大學教授胡蘭成。有一位廣西大學的托派學生和他有接觸。他宣稱準備在香港開書店，已得到一筆經費。事實上他是汪精衛派駐香港，拉攏關係，他通過這位托派學生，見到寒君，是香港托派負責人。胡蘭成對他表示友好，自稱同情托派，願出版托派書籍……；胡稱想譯托的《俄國革命史》，英文版，或與同志合譯……（他不知道我們已譯好準備出版）。接觸了一個時候，胡表示很慷慨，在經濟上自動願意幫助；寒君非常高興，並已接受若干錢，當然不多，幾百元港幣，寫信到上海。我們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偶然從報上發現胡蘭成原來是汪精衛派。在討論時，我堅決主張不但不能接受胡蘭成的捐款，還應把已接下的款子馬上退還；而且如果香港支部堅持維持聯繫，要加以處分。經過通信，寒君主張接受胡蘭成的幫助。在臨時委員會上，我仍堅決反對，認為華南地方支部要解散重組，否則暴露出來，「托派漢奸」就成為事實！經過討論，中央臨委會的決議到了香港，寒君抵制，我們就宣佈華南組織解散，重新改組，正式登載於《鬥爭》。這個事先聲明可以保證不會受到災禍。可惜的是除溫州以外，香港也是一大支部，有相當規模的工人支部；在太古船塢

的支部甚至可以領導罷工。但寒君的性格很強，成了僵局。中央臨時委員會要我到香港一行，來解決問題，因為劉家良已同寒君有過衝突，不能影響他。我只好於 1940 年 9 月乘船到香港。

那時香港支部書記是陳國權，大學畢業生，妻子以前到過上海，還參加過訓練班，通過她我找到寒君。本來香港全是寒君負責……。我同寒君談了好幾次話，盡力向他解釋胡蘭成同汪精衛的關係，絕對不能來往，更不能接受他的錢。寒君的確把錢退回給胡，但他告訴我太古船塢有一部份工人同志，還有一位年輕學生（劉秀）堅決支持他。他還引了托洛茨基一句話：為革命，連魔鬼也可以接觸……。我就說情形要弄清楚，如果完全是普通的私人的錢，在一定的情況下可考慮，但胡蘭成完全不同，他是公開的汪精衛在香港的代理人（他後來到南京在汪政府裏當機要秘書）；像這樣的人物是托派絕對不能沾染的。寒君說胡蘭成願意供應托派需要的錢。我答說：他是一個教授，自己不會有很多錢，他的錢顯然是汪精衛的錢，也就是日本人的錢，同這種人發生關係非常危險，如果暴露出來，就不能否認托派是漢奸。

寒君本來同我的關係不錯，他對我保持一般的信仰，但人做錯了事，要面子，用詭辯為自己辯護，還拉攏了一批人來支持自己。有一次我說了他，他甚至掉淚，差不多要昏過去了。我讓他走了，但以為他可以轉變，準備再和他最後談談。他說他個人還是尊重我，但是與他有關係的同志們不能接受上海臨委和我的意見。我說：這樣你們怎麼辦呢？你們勢必要同我們托派破裂；你們沒有前途，尤其在這件有點不名譽的事上。他說，在目前沒有辦法，將來我用事實和行動表現，我們還是會在一起的。他意思就是同我們破裂了。

寒君後來離開我們，並沒有跟着胡蘭成的關係走，還是自己獨立幹。當日美戰爭爆發時，他採取極左立場，也就是失敗主義（王凡西式的）。日本佔領香港後，他狼狽不堪，生活不能維持，病死了；這真是一個悲

劇。他原來是個很有能力的人，如果承認錯誤，不致於走上絕路；一部份跟隨他的人也都消極了；只有劉秀除外。在日軍佔領香港時，劉秀被日人刺了一刀，在屍體中爬出來，逃到廣州，幸免一死。

在香港滯留期間，除了與寒君談話外，還召集同志解釋這一事件和重新改組的必要，同時也談到整個國際的局勢，尤其是日美關係緊張。既然我難得有機會到華南，乘此機遇，即把廣州、中山（由日軍佔領）的有些年輕同志（他們來香港通行無阻），召到香港開一個訓練班，講一些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共有十多位，我們就在跑馬廳的空場上，當晚上大家乘涼的時刻，一堆一堆地坐在草地上，我就在那裏講。那裏人群眾多，警察也不管，不注意我們。這樣延長了兩三個星期，香港同志調了一位中山來的鮑姓女同志，到我租的小房子來照顧我，給我做飯。來看我的朋友有陸氏夫婦、高子良、王靜波、陳培壽；陳國權有時召集他們和我討論政治問題。這些都是南方的幹部，後來有幾位來了上海。

正當日美關係緊張，我偶然在香港街上碰到陳翰笙。他剛從美國回來，他帶我走進一個辦公室，原來是周鯨文（《風暴十年》的作者）主編的雜誌的辦事處。

周鯨文也是留美學生，曾經當過東北大學的校長，對張學良不滿。1949年中共當權，周鯨文是人民大會代表，但後來跑出來又辦雜誌反共……。當時他辦的雜誌是批評蔣介石的。我要求陳翰笙不告訴周我的行蹤。在辦事處偶然碰到陳獨秀的最小兒子陳哲民（他在那裏做技術工作）。他表示對父親很失望，然而對我仍保持熱情態度，還請我去他家裏。他曾到過北京，同一位女大學生結婚，他把周鯨文的雜誌給我看，問我願不願意寫文章，不一定用真名。我看了雜誌，對蔣政府批評還相當真實，不是反動的，我就寫了一篇文章〈箭在弦上的日美戰爭〉。分析即將到來的日美戰爭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在這樣一個公開普

通雜誌，當然不能完全用托派觀點。登載後，陳哲民告訴我這篇文章有很大影響，許多人贊成這一分析。差不多同時，香港改組後的支部也辦了一個雜誌《紅星》，他們也要我寫一篇文章；基本分析同那篇在周鯨文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相似。現將文章內容扼要簡述如下：日美戰爭和抗日戰爭性質會有變化，目前整個中國大陸大部份領土是由日軍佔領，中國民族的任務首先要將日軍清除，從日帝侵略下解放出來才有前途。雖然將來可能受美國的控制和影響，這是將來的問題，不能同抗日戰爭混為一談，所以日美戰爭到來時，我們還是支持國民黨政府繼續抗戰，一方面批評和警告蔣政府投靠美國的危險。

1940年10月初，我從香港回到上海，帶了一位十七、八歲的誠實的年青人，劉乃光；他來上海找工作。

陳獨秀最後的四封信

1938年10月末，日軍逼近，蔣政府決定放棄武漢，陳獨秀到了四川重慶，但沒有和我們直接通信；是通過濮一凡，把我們批評他的文章以及出版的刊物都寄給他。濮一凡當時在雲南，同趙濟夫婦和羅世凡住在昆明。陳獨秀有重要信件，就由他轉來給我。其中最重要的有四封信，裏面只有一封有日期：1940年3月20日（即大戰爆發一年後），其他三封信都沒有日期，大約是在1940年4至5月期間。在這四封信裏，獨秀把他的思想比較系統化發揮，我在後面會詳述。但他另有一信是給第四國際的，也就是給托洛茨基的，也轉給我們；是對上海我們的組織不只批評，而且是誣蔑，說我們是極左派，教派，思想上反對國民黨，反對中共，反對一切，簡單地只要無產階級革命，民族民主革命這些任務全丟掉了。這當然完全不根據事實，迫得我們（主要是我同劉家良合作）來答覆他這封給老托的信，表明我們的立場。事實上那時我們的主張同第四國際不約而同（是內部爭論文件，只在內部公報上印發，獨秀

給老托的信和我們的答覆後來由劉家良收集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小冊子裏）。

那時獨秀的政治處境是矛盾的，一方面公開發表言論脫離托派，同時又寫信給老托……；完全沒有原則。後來濮一凡告訴我們，老托當時已知道獨秀思想的變化，曾親自寫信給獨秀，請他去美國，可能直接同他討論問題。老托是愛惜人才，尤其覺得獨秀很重要，希望他去美國，設法見面，來說服他。我們知道這一消息，當然完全贊成；既然我們不能直接同獨秀通信，最好勸他去美國見老托，也許可以挽救他，而且胡適之那時是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當然樂意協助。後來從濮一凡那裏了解陳獨秀不願去美國見老托，這也表示他的思想同托洛茨基思想相反，但他要面子，表面上還敷衍老托，玩外交，實質上，他的思想已走向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布爾什維克，也反對第四國際；這從他四封信的內容裏可了解到。

當我們收到他給濮一凡、趙濟、羅世凡的三封信時，我們寫了一個答覆（是我起草的），題為「中央臨時委員會給國際的報告——關於陳獨秀問題」。隨後收到獨秀第四封信，又寫了一個正式決議案（〈臨時委員會對陳獨秀來信的決議〉1940年6月間）。

他前三封信裏最主要的思想是：第二次大戰和第一次大戰性質上完全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取殖民地，瓜分世界的鬥爭，但這次大戰不同，是民主主義國家同法西斯國家之間的鬥爭；性質同上次大戰不同：法西斯國家是最反動的，民主主義國家還是進步的，因此列寧在一次大戰時的戰略不適用於這次大戰，因列寧那時主張革命的失敗主義，而這次應該擁護民主主義國家反對法西斯國家的戰爭。正因此，在民主主義國家內（即指英、法、美國還未參戰），不能夠採取反對的立場，是要無條件地支持；甚至於像在印度（英國殖民地），不能要求獨立，否則是破壞民主國家的陣線。這一主張同第四國際的見解

相反，在《第四國際與戰爭》裏面，認為軸心國同協約國在階級性質上是相類似的，是帝國主義的，但統治的形式，法西斯政權同議會制度不同，但它們的基本目標還是要爭奪世界市場；從這點來看和第一次大戰沒有甚麼大不同。所以在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主要的敵人在國內，這是從歷史政治觀點出發；我們也從這一觀點出發來批評獨秀，尤其是以印度為例，應該利用戰爭來掙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決議中引證老托文件內的意見）。

獨秀的第四封信是一篇最後發揮他的思想的長文，主要是談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他認為民主主義是從古希臘起不斷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而無產階級獨裁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它的發展就成為斯大林獨裁，以此推論斯大林思想是從布爾什維主義發展起來的，進一步根本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甚至說列寧、托洛茨基不懂得民主。所以他認為經過六、七年來深思熟慮得到最後結論：他根本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的思想。他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是小資產階級激進思想，同希特勒的納粹思想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斯大林主義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繼續……因此從反列寧、托洛茨基走到反第四國際。最後他寫了一封短信給李季，信中談到布爾什維主義的欺騙性，也根本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的思想，這是一年以後的事（1941年）。

我們根據獨秀的第四封信也寫了一個決議案，題目是：《獨秀對民主與獨裁等問題意見的一個決議》（1941年1月10日）。在這裏我們指出他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他認為斯大林官僚罪惡是無產階級的邏輯發展，十月革命創造的蘇聯制度是違反民主的基本內容；這是他的意見；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但仍希望他及時省悟。這是以組織名義同獨秀鬥爭的最後一次表示，在政治和組織上完全破裂，所以獨秀寫給李季的信中，扼要地說：布爾什維主義就是普魯士主義，就是希特勒主義，沒有本質的不同；我在世一天就要以全力同布

爾什維主義的虛偽和兇暴來作鬥爭。對於這樣最反動的思想，我們再沒有答覆。

與陳獨秀思想鬥爭的主要是我，像劉家良那樣年輕的同志比我走得更遠，我還是比較慎重。對我個人來說，這個鬥爭是極為痛苦的事。本來在南京獄中時就深感痛苦，思想鬥爭有時是非常殘酷。列寧說得很對：是反映一種階級的鬥爭。雖然在理論上我堅持自己的信念，但個人方面來說，我們私人關係實在太深，過去十幾年一起鬥爭的歷史記憶，令我痛苦不堪。獨秀離開我們是很大的歷史性損失，我感到困惱，十分惋惜。

王獨清之死

陳獨秀和托派最後的決裂，是在1940年6月，可根據他給李季的信；不到兩個月後，猛然而來的最大打擊、最大的痛苦莫勝於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8月21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去的兇手暗殺。我們失去了陳獨秀，現在又永遠失去了托洛茨基，打擊異常沉重。最可悲的是老托剛死不到十天後，詩人王獨清，我們的至友，也突然病死了。

自1937年我出獄後，王獨清成為我們生活上最密切的友人。他每星期至少要來看我們一兩次。他同黃碧瑤的關係弄得很壞，連車錢都沒有，從法租界步行到我們在公共租界的住處……

他是王鼎的孫子；王鼎是林則徐時代的大官員，因同情林則徐被免官。他最初留學日本，後來去法國留學多年，是「創造社」的詩人之一，寫了許多著名的詩集和戲劇（楊貴妃、貂蟬、長安少年等）。他自然具有詩人的浪漫性格，但也有濃厚的革命氣質。他從自由派詩人，走向共產主義思想，最後投入托派運動；往後不得不同過去關係密切，像郭沫若、馮乃超等一批創造社的作家詩人分手；沒有勇氣，沒有革命氣質是不可能做到的。

王獨清留學法國時，同加入共產黨的蔡和森、蔡暢、李富春、汪澤

凱等都來往密切。回國後，李富春任江蘇省委書記，蔡和森也在上海；王獨清同蔡暢一度有過戀愛關係。他開始參與托派活動；他不但有革命家的氣質，追求真理，又有天才和寫作的的能力。他在《動向》上寫了幾篇文章，都是很有水準的，尤其是批評羅曼羅蘭小說的文章。

但他的不幸來自與黃碧瑤的關係弄得很糟。當初王獨清是有名詩人，在「創造社」興旺時代，黃碧瑤愛上了他。後來他加入托派，同「創造社」人破裂，生活困難，寫文章都要用假名，稿費不多，但還過得去。抗戰以來，王獨清很窮。黃碧瑤逼他為中華書局編中法字典，及寫歷史性的小冊子，艱苦萬分；結果他們分居。王起初住法租界公寓，但房租太高，終於搬到愚園路三位小姐的家裏，比較便宜。那三位小姐都是在法國學校受過教育，熟悉西歐文化，談到他的作品，很崇拜他。據說有一位小姐戀愛他……。

當我把托洛茨基的噩耗告訴王獨清時，他已經有病在身。他痛哭流涕，極為傷心；而且不能寫稿，房租和生活都無着落。我設法找到一點錢，把房租付了。碧蘭去看他，他臥病在床，是胃潰瘍，病重，必須送醫院，但是沒有錢，結果送到一個難民醫院（通過一位醫生朋友），可惜兩天內他就去世了。他去世後，我們發現我們送他的錢剩下來的還夾在一本書內！我們全家（連孩子們在內）都痛苦不堪；這是我們最親愛的摯友，就這樣倉促之間永遠失去了。

王獨清逝世的日子是 1940 年 8 月 30 日。我們舉行的追悼會在上海公共租界赫德路舉行，由李國棟主持。我寫一副輓聯：「導師方逝，良友隨亡，悲傷莫甚於此日；決戰快臨，勝利不遠，凱旋可預卜他年」以表現真實的感情。我參加追悼會是用陶白（我譯《唯物史觀》的筆名）。隨後，我在《鬥爭》上寫了一篇紀念文，裏面談到當代文學家（魯迅、茅盾、郭沫若……），特別指出王獨清是一位難得的，不畏權勢，擁護真理的革命作家。

王獨清去世後，黃碧瑤良心發現，後悔不已。以前對我們敵視，王去世後，她讓她的兒子來找我們；我們找朋友籌錢辦喪事……。她受到感動，要求同我們來往。我們並不拒絕，恢復關係，甚至幫她兒子在大學畢業後找到職業，並介紹她到暫駐上海的杭州之江大學教書。

陳獨秀脫離托派運動，托洛茨基與王獨清相繼去世，這些打擊太沉重了，令我在兩三個月內振作不起來。

托派內部爭論（1940-1941年）

1940年10月我從香港回到上海。當時日軍正佔領整個北方；而在南方，除了廣州外，廣西南方也佔領了，又進攻柳州，華南大部份由日軍佔領。1940年尾1941年初，汪精衛正式成立南京傀儡政府，一般人產生對抗日戰爭悲觀，首先在國民黨內部大批人投到汪派，一些政客、官僚投向淪陷區汪傀儡政府周圍。

這種悲觀情緒也反映到支援抗戰的托派隊伍裏來。陳其昌就是一個例子。再加上日美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勢下，失望後就走向極左傾向，唱高調。就在我在香港《紅星》上發表文章差不多同時，王凡西在《鬥爭》上寫一文，也是論日美戰爭，同我意見相反。他說日美戰爭（即將爆發），中國轉入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因此，中國對日戰爭的性質自然隨之改變，以前抗日戰爭是進步的，是應該支持的，但日美戰爭一來，我們不能支持國民黨抗戰，即連軍事上的抗日也不應支持，我們應採取甚麼立場呢？採取失敗主義，就是說：敵人在國內，也就是首先要打倒國民黨政府。

這篇文章發表不久，我回上海，托派《鬥爭》雜誌本來有一個編輯委員會，我是主席，其他成員是王凡西、陳其昌、劉家良；鄭超麟來滬後也參加。編委會在我回來之前討論這個問題，王凡西提出他要寫的文章，他們三人都贊成他。我回滬後看到這篇文章，大為驚奇。我說失敗

主義是把蔣政府作為主要敵人，那就是等於支持汪精衛，不管你主觀上怎樣看法，客觀上是如此。劉家良來看我，把《鬥爭》給我看，我也把《紅星》給他看。他看了我的文章，面紅耳赤，因他政治上是敏感的。我說：王凡西的立場如果代表我們托派的話，我們就變成「名副其實」的漢奸，就是汪精衛派，那麼我去華南反對寒君同胡蘭成發生關係是為了甚麼呢？不是開自己的玩笑嗎？我認為這種情形絕對要改變，我要求他立刻嚴肅考慮改變這一立場；否則我認為托派完蛋了。劉答道：這個問題我要慎重地思考。第二天他告訴我完全接受我的意見，並要為這一意見鬥爭。我到編委會正式出席討論這個問題，批評王凡西這一思想，認為非常危險，不容許它繼續發展下去。王凡西還是堅持，因鄭超麟支持他。鄭一開始就主張失敗主義。現在有了王凡西，他倒勝利了。

這裏不得不說一下鄭超麟，他在徽州鄉下就發表意見，說中日戰爭是蔣介石同日本天皇之間的鬥爭，應當採取革命失敗主義；他還把這意見寫信給陳獨秀，而陳就把鄭的意見變成是我們上海組織的意見，寫在他報告第四國際的信中！我們當時認為這是可笑、荒唐、沒有任何影響，也不太注意（連王凡西，陳其昌在內）。鄭超麟到了上海一年多，一直不提他的「失敗主義」，不做聲，但因日美戰爭逼近，王凡西提出失敗主義，陳其昌贊成，樓子春不用說了，連劉家良也贊成……鄭超麟就擡起頭來說：「我老早就說過，現在你們也贊成失敗主義，是很對！」

在這種情勢下，我很困難，我先在常務委員會上提出討論（在常務委員會下有編輯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除我們五人外，還有一位工人同志蔣振東參加；然後又提到組織委員會（內有阿芝、籍雲龍、劉家良等），認為要在托派組織內準備一個爭論。常委要我對未來的日美戰爭中我們的任務寫一個草案，作為根據；另一方面要王凡西起草一對案，發到各地，主要是上海，溫州，香港和廣西。常委和組委是贊成我的草案，但在編委會，王凡西的草案佔多數（鄭超麟把它說成是「四月提綱」，

爭論了好幾次，按照政治鬥爭的邏輯，越爭論就越發展，正確的思想更深刻化，而錯誤的思想也越走得遠。在爭論的過程中，兩方裂痕更深，我們同王凡西、鄭超麟的關係也越來越惡化。

起初我還蒙在鼓裏，後來劉家良告訴我，當他來到上海時，同王凡西接近，感到有一種氣氛，在王凡西、陳其昌和樓子春周圍醞釀着，在我背後說壞話；鄭超麟來滬後更加甚，造些謠言故事……。我一向不猜疑同志，認為大家合作就好了。當時我們同陳獨秀思想鬥爭時，陳其昌是激烈地反對我；王凡西不能反對我，表現調和猶疑，也不公開反對陳獨秀。這是日美戰爭問題討論前的情勢。

王凡西剛到上海時，我要求他參加組織工作，他不願意，當然很危險，只願做翻譯工作。我三次到他家中去請他，因他是統一會議選出的常委之一，而我們人手少，他應該參與。但他拒絕，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們只好組織編輯委員會。我們辦訓練班，請他去演講，我也經常去演講……。王凡西疑神疑鬼，講到半途就匆匆離開了，說有暗探藏在訓練班內。負責人李國棟告訴我他膽小如鼠，根本沒有危險，是在一個商行裏，相當安全的。

劉家良過去受王凡西等的影響，但從經驗和觀察上發現我有膽量，積極負責工作，不辭麻煩。而王凡西卻相反，很膽小，在狹小的圈子裏兜兜轉，說話又靠不住；比如王向他暗示我們是老布爾什維克，沒有出息，已變成革命的絆腳石。劉家良開始也同意他，後來他反悔。

爭論發生後，愈來愈激烈，各地展開討論；同時我寫了一篇長文〈對兩條路線的鬥爭〉，全盤檢討過去思想鬥爭。首先是批評陳獨秀對抗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採取的極右機會主義立場，做一個總結。另一方面對鄭超麟所代表的極左的教派主義加以系統分析。

過去對獨秀的觀點已有詳細批評，這裏不過扼要地指出他的思想不是獨創，而是從第二國際小資產階級黨派一直到托派內的集團（夏克

曼……)等立場的重複；再者我指出他的思想從南京監獄起，到抗日戰爭到世界大戰爆發，是一個歷史的發展，最後退居到他原來的民主主義……。

第二點是關於鄭超麟教派主義。他提出一些論據，甚至說民族解放運動沒有意義，列寧不懂，連托洛茨基也不懂，還引了羅森堡的話（列寧批評過的）。這裏牽涉到基本原則問題，我就盡量援引列寧同羅森堡的爭論，以及列寧對拉狄克等的批評，又引托洛茨基的意見來批判他；這裏涉及列寧與民族問題的檢討，引證文件，寫得很詳細。

在這兩種傾向（極左教派主義和極右機會主義）之間，還存在一種調和主義。第一個代表是陳其昌，他從擁護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轉到鄭超麟的教派主義，反映他的幼稚可笑。第二個代表是王凡西，比較聰明，起初受到我們的壓力，有一個時期是默認我們的立場，連一些批評陳獨秀的決議案他都贊同，但暗中支持陳獨秀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批評我們，說我的文章八股機械（背後說，不敢當面說）；鄭超麟來上海以後，王凡西逐步轉到鄭方面，最後用抗日戰爭要變質的論據來發揮他的失敗主義，這樣來貫穿他的思想過程。當時有阮金兆，是個聰明人，印象主義，看了他的文章，高興地跳起來贊成，也寫了一文支持他。所以我批評他有正確的前提，荒謬的結論。

我這篇文章〈對兩條路線的鬥爭〉，從理論到事實都有根據，現在看來仍有歷史性的意義。後來發到上海和各地同志間討論，上海各支部都有決議案支持我的意見。香港阮金兆也轉變了；劉家良專門批評王凡西的文章也有四、五篇，和王凡西對着爭論。我發現他的政治能力相當強，而且文字也很深入，令王凡西不能招架。劉家良把我文章的內容轉告給法蘭克，他又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陳獨秀。意見大致和我相同，也批評鄭超麟和王凡西；於是王同法蘭克之間有了矛盾，王故意用中文寫信給法蘭克，使他為難，莫名其妙；只好要求劉家良給他翻譯。

劉家良當時三十多歲，本來在北京大學讀書，30年代初和一批北大学生接受托派思想，當我被捕到南京入獄時，他和這一批青年來到上海工作。這一批人不久被捕，裏面有一位燕京大學學生施潮生，在北京時曾寫信給托洛茨基，提出問題，托還答覆他（在托的《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附有此通信），但施被捕後頹廢消極了。劉家良釋放後到香港見到寒君，寒君要搞小組織，反對王凡西……，劉同他發生衝突，來到上海。

王凡西看了我的長文，裏面最忌恨的是我對他的評語：調和主義。他就寫了一封公開信：「專論個人問題」。當時登載出來，他對我最中心的攻擊：我就是斯大林，說我討論問題的方式是斯大林的方式：對於對方意見極為壓制，加以誣衊……。我的答覆比較詳盡，我說他不討論政治問題，半年來對我們的批評不回答，現在「專論個人問題」，把政治爭論轉變成個人的爭吵；我也根據各個問題來批駁他，當然，他是利用反對派一般對斯大林的仇恨，強加在我身上一個框框，迫使我啞口無言，用這種方式來誣陷我。我即刻說明斯大林官僚主義的方法，是壓制黨內鬥爭；一有不同意見就壓制、懲罰，直到開除黨籍……，而在我們的組織裏各種意見的發表絕對自由，即令陳獨秀的意見也公開出來，自由討論，經過充份討論之後才決定方針，完全根據老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方式。我說：「一個人生活在狹小的範圍內，從未見過甚麼大世面，偶然受到一兩個人的擡舉和捧場，便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的梵和林，但當他一旦踏入角鬥場中，親自碰到生平最強烈的批評和打擊時，即怒氣沖沖，憤慨不已，活像三家村婦發起潑來，抓破臉皮，不顧一切，甚麼話都罵出來了」，這正是當時王凡西的寫照。他看了我的信，不能答覆，讓樓子春來轉告我說：他現在身體不舒服，不看我的信。這種態度實在太笨了，不但思想上，連做人也不行。因此他自己孤立起來，不但同志們反對他，連同情者們也不睬他了。最初他們只有四位：鄭超麟、王凡西、

陳其昌、樓子春。

這一場爭論，是在托派內部進行的，經有一年之久，所有爭論文件都發表在內部公報上（後來由劉家良收集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四卷油印本裏）。我認為爭論可以告一段落，要求召開一個會議，提出在1941年8月間召開。但是鄭、王、陳、樓他們極力反對，還要繼續爭論下去。而我堅持日美戰爭越來越近，我們不能等它爆發弄得倉惶失措，而需要有個明確的立場……。劉家良和所有組織委員會的成員同意我，於是召集全國緊急會議，各地都有代表派來。當時我們組織有一兩百人，每十人派一代表。他們四人仍然抵制，鄭超麟和王凡西不願出席，由陳其昌來參加；我們請他們派兩個代表，因為他們雖然人數少，是老同志，我們盡量讓步。鄭王兩位被提名選為中央執委。既然各地同志都已事先討論過我起草的決議案，並正式表達意見，所以這次會議沒有很長的討論，主要是陳獨秀的意見，沒有人贊同，連陳其昌都不敢贊成。所以政治討論相當順利，結果通過日美戰爭決議案。隨後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鄭超麟和王凡西被提名選為中央執委，這樣爭論告一段落，他們四位稱為少數派。但是他們表示不能服從我們的意見，還要求在《鬥爭》上另闢一欄繼續爭論下去。我們認為《鬥爭》是對外的刊物，不合適。他們於是要出公開刊物，即在日美戰爭爆發時，他們出了一個公開刊物，就正式分裂出去。

1941年8月會議結束後，我們對日美戰爭有了一個明顯的方針路線。

第二七章

在日本鐵蹄下的上海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飛機突襲珍珠港。美日戰爭終於爆發，震動全世界，也給重慶的蔣介石帶來了希望，繼續抗日戰爭。美國為了支持中國抗戰，派了一些軍事參謀。而且開闢了滇緬公路（昆明到緬甸，再到印度），運軍火……。

日本的計劃是奪取整個東南亞，所以很快佔領香港和菲律賓。在上海，日軍突然閃電式地佔領英美租界，激發民間恐慌的心態。那時我們住在福田邨，裏面住戶每家都有一點反日的書籍，都在大垃圾箱內燒毀。我們首先面臨一個大問題：我們家裏堆滿了書籍，抗日書不用說了，特別還有許多俄文書。這是在鴻文圖書館發現的（馬列托文集都有）。管理員是一位同志（以前留歐學生，福建人），當然樂意讓我取來用，有幾百本，放在家裏危險，就放在傭人住的閣樓上，堆起來。現在日本已佔領租界，恐怕他們搜查。這麼多的書當然無法燒毀，同碧蘭商量，要設法搬出去，以防萬一。

這裏不得不回溯到一個插曲

1939年、1940年間，夏杏芳來同我商量（當時我們關係密切，無話不談），說志裕錢莊劉經理想退休，要把錢莊頂出去，夏想接過來，但籌資不夠，想由我探問葉波澄有無參股的意向。夏已有紡織業家吳信哉入股，還有其妻的胞兄也加入，只要葉答應參加，就可以了。葉本來有一筆錢想投資商業，保持資金，結果和夏商談具體化之後，就完成夏的願望。由我起名改為金源錢莊。這件事辦成後，夏盡力幫助我們出版書，辦刊物……，同時在生活上也給予若干支持。

現在回過頭來，說到日本佔領租界後，我們堆的書籍怎麼辦？正好金源錢莊在靜安寺路有一個堆棧；而上海有幾萬個堆棧，堆集貨物，不會被搜查。所以我們找夏杏芳，他同意了，打電話給管理人收下。但是怎樣送去呢？這樣危險的事，沒有人敢做，結果碧蘭決定自己來做。我

說這是冒險。她說沒有別的辦法，要冒一次險，如果出事，她絕不會口供。於是她裝扮成一個庸俗的有錢太太，叫了一部車子，她坐在前面，把幾大布袋的書放在車後座，雖然有日軍站崗，看見一個婦人也許不至於搜查，她叫我跟在背後觀望。很是僥倖，那站崗的日本兵士看了看，沒有要她停車，結果安全直達堆棧。碧蘭終於勇敢地度過難關，可說是日本佔領後最可怕的一件事。

日軍初佔領時，還相當有分寸，沒有發生大的恐怖行動，但後來越來越多。愚園路有一炸彈爆發，日軍就封鎖整個地區，成為悲慘世界。北京路和南京路之間也發生一次炸彈案（可能是日本人自己幹的）也完全封鎖起來。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上海成了一個恐怖世界。在這種情形下，不少同志生活成問題，開始疏散到內地。

1942年夏季發生一件嚴重事故。陳其昌本來在金源錢莊做職員，是夏有意幫助我們的同志，工作是名義上的，來維持他全家的生活。他突然被日軍捕去。開始我們不知為何故，後來樓子春告訴我，是因他給重慶電台傳遞消息。這樣一來，問題嚴重，要採取緊急措施。我們知道陳其昌不會口供的，但在嚴刑拷打下也許熬不住。我們全家立即離開福田邨，住到一個旅館裏，由鄰居熟識的醫生朋友每天從菜館叫飯來供應全家；但這不能長久下去，我同朋友們商量準備搬家，另找住所。羅瑟希說他在職的銀行在愚園路有一房產，可暫時住下來。道亨銀行經理已同意了。

我們搬到愚園路四四八號一座很大的花園洋房內，暫時解決住的問題。園裏有足球場、網球場……。羅告訴我們在房產未賣前可以住下去。在那裏認識了董小姐，是道亨銀行經理的女兒，聖約翰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她可能猜想我很像彭述之，但碧蘭裝做無知識的女人，不像陳碧蘭，所以沒有暴露出來。那時有不少友人週末來打網球，聚餐。

這時期胡山源就住在鄰近，對我們很友好。他的妻子，是蘇州人，

也常來訪。她知道我們有錢的朋友不少，想靠我們籌錢給她辦小學，所以對我們很恭維，表示特別熱心我們的事業。她說我們住的這房子將來要賣出去，請我們住他們原來的房子；他們已租了一大屋子來辦學校。我們答應了就搬進去。

這正是敵偽統治時代，我們再不能公開出版刊物。同志走的走了，有的也將離開。日人管制愈來愈嚴密，我們的生活雖然有夏杏芳等支持，但想做點事情。由碧蘭做家庭車衣工，做兒童裝，拿到新新公司去賣，但不久失敗了；同時胡山源說大夏大學有一個中國通史課，教授原是顧敦錄，因病請假，問我願意擔任否？我說我不能把履歷告知大學，有困難。他說因是敵偽統治，大學內情形大變，校長也不管這些。我開始講課，有兩班，從遠古時代開始到近代。我用一假名：陳松濤，講課連手錶都沒有，領到薪金後才買到一個便宜手錶。

講課時，我不用任何馬克思主義術語，但分析觀點是採用社會形式發展史的理論和方法。講了兩三個星期後，比較有修養的學生特別在課後來看我，找來一部大型的歷史著作《中國通史》之類，問是否是我的著作。我否認了，他們也不信。另外有幾位受共產黨影響的學生，尤其是陳景光，他們知道我是馬克思主義者。下課時常到教授休息室來看我，要求到我家裏來拜望我。我起初很謹慎，只讓陳景光和兩三個學生來家裏，稍後些，之江大學從杭州搬到上海，校長姓黃，對胡山源說要請我擔任歷史課，我介紹黃碧遙去教課（她原是中學教員）。

由於在大學教書，通過學生介紹認識一批左派知識分子，如謝山、……，同聖約翰大學一批學生（認識金小姐）來往。他們集合來家裏，由碧蘭主持座談會，討論社會問題。在這批人中有數人加入托派，或成為同情者。在這兩三年間，這也是我們的一些活動和成就。

此外，嚴雁賓辦了一個文學院（夜校），人數不多，二十人左右，專講西方文化發展史，從希臘羅馬到近期，也是由我講課。當然我必須

做相當研究準備，也更忙了。裏面也影響了幾個學生；有一位是在保險公司做事，後來去漢口活動，幫助托派成立支部。

當時我們正處於日軍佔領和壓迫下的敵偽時代，但仍然通過教學接觸青年左派分子，發生同情關係，有些進一步變成同志。

這裏不得不提到陳景光。當他突然發覺我們是托派時，他有一個月不來我們家，後來碧蘭打電話，他來了；坦白地說他從前在潮汕中學時代深受中共影響，對托派很仇視，由原先談話中發現我們的思想是托派，感到很困惱。然後他自己決定，先不說思想，說做人，對我們的為人是五體投地佩服，認為即使是托派，也值得尊重的，所以就徹底同我們討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問題，而且從事實上證明斯派對我們的造謠誣蔑。

另外一位是董守正，聖約翰大學斯派的領袖，老大哥，有很多學識。我們之間有許多爭論，同我談話有無數次，但他人很誠實，最後被我說服了，也加入托派。

除了我教學方面吸引一批青年左派分子以外，碧蘭的態度也吸引人，左派青年見到她，對她有好感，歡喜她的為人。我們兩人合在一起，得到一批年青知識分子同情或投入運動。

1943年初春季節，發生一件意外的事件。有一位楊玉瓊女同志，是澳洲華僑的女兒，在香港時，她很慷慨，父親寄給她錢用，她自己很節省，把錢來幫助同志，因此在港同志們對她印象很好。劉乃光來上海不久，她也被送到上海，她很積極認真，但有些呆板，不精明，又太嚴格。由於魏蓉秋、羅子玲領導小沙渡工人區一間織綢廠罷工爭取改善待遇而被扣押，楊送飯去探望，又被拘押；由於她供出，劉乃光、高子良和李永爵也被捕。

高子良被捕那晚，我在李棠家二樓亭子間住宿（臨時性的），即同高子良同屋。深夜兩三點鐘，樓下敲門很緊急。在敵偽時代晚上燈光限

制，沒有燈光。李棠當然不能不開門；我馬上感到有危險，立刻從二樓到三樓，穿着汗衫短褲，在三樓聽到下面有日本人同警察進門，問高子良在嗎？我知道情勢不對，馬上跑到曬台上，牆很高，只有天井那邊的曬台牆比較低，用手可攀登上去。上了牆頭，底下是一個天井，有四層樓高，一個大黑洞；鄰居的牆頭也有一個曬台，我縱身一跳，達到鄰居的牆角，在那邊曬台上蹲着，靜聽動靜。幾十分鐘後，聽見有人開鐵門出去，即從那邊牆角跳過來，剛到李棠家沒多久，又敲門，我只得再跳過去。原來日本人又來問高子良同李棠的關係，李答是同鄉和職員，不久他們又離去了，我再跳回來，當然完全癱瘓了。那天晚上不能睡，李棠安慰我，把自己的床讓給我睡；我請李棠叫家人到弄堂裏去查看有沒有站崗或可疑的人。他的弟弟很精明，看到弄堂裏都是認識的人，天一亮就叫一輛黃包車，離開李棠家到李華卿家；實在精疲力竭，不能動彈。我後來回想起來，在跳牆時，下面是數十公尺的深淵，翻牆跳過去本來是不可想像的，原來是學生時代用手攀着鐵槓子，翻身打圈子，手腳很有訓練。後來在南京監獄打太極拳也有幫助，因此救了命。否則，如果被捕就完全無救，那時周佛海任上海市長，他一定只給我兩條路：不是處死就是做漢奸。真是千鈞一髮，脫了一大險境。

從李棠家逃出來，狼狽不堪，有兩個急迫問題要解決：一、不能住在華卿家裏；二、設法知道發生事情的真相。阿楊被捕，劉乃光、高子良和李永爵同志是阿楊供出來的。在審判中，阿楊還要供出我同碧蘭的住址，高子良用廣東話制止她，說「妳要有點良心！」從此她就不再做口供。也許良心發現，所以我們的住家日本人沒有來搜查，而且碧蘭已經同孩子們避開了。阿楊說她自己知道有別的地方，但她確認劉乃光是負責人；日本人把他和李永爵用灌水、電灼、毒打等酷刑逼供，但他倆很堅強，從不供說一句，連在場的「包打聽」華探也稱他倆為「硬漢」。我知道這情形後就離開華卿家，住到嚴雁賓的煙店樓上，比較安全。

我設法打聽被捕同志的情況、怎樣營救他們。由於蓉秋在小沙渡工廠做工，認識不少工友，通過他們接觸到一些流氓，認識包打聽，知悉被捕同志的實在情況，說在小沙渡捕房內，要有點錢可以設法營救：小捕房當然舞弊，收了錢，放人可以不再向上報。高子良由李棠保出來；剩下劉乃光、李永爵二人，我同夏杏芳商量，嚴雁賓也很熱心，籌到數百元把他們保釋出來。劉乃光和蓉秋、李永爵和羅子玲經過坐牢後都結成夫婦，可是阿楊出來後沒有人睬她，到處流浪，已經瘋了。我們設法送她進瘋人院，她自己又離開了，寧願露宿街頭，在垃圾堆中找食物，終於死在街邊。這是一個悲劇：她不是有意識的背叛，是經不起考驗，供出同志們，令他們和她決裂。

我們不能馬上回到原住所，嚴雁賓為我們安排去嘉定，我同碧蘭和兩個小男孩（女兒在滬上學，另有安排），住到他父家的大庭園屋子。可是不久後發現他的妻子看到她丈夫對我們這樣地體諒招待，很不以為然，派傭人監視我們，以至引起夫妻之間爭吵。我們很為難，立即決定回上海，認為現在大概危險已過去，回到家裏已經是初夏了，再沒有事變。只是劉家良一家人在上海不能留，全去了溫州。

陳獨秀與世永別

1942年5月末，陳獨秀去世。我是從報上看到消息，知道他最後一段時期的生活，是很可悲的。他到重慶後，找居處很困難，沒有留下來，就住在江津，在重慶和昆明之間的一個小城市，因此比較孤立，去訪問他的友人愈來愈少，只有小潘同他在一起。另外有何資琛，是從武漢跟隨獨秀到重慶，忠心照顧他的同志。何資琛本是中共五次代表大會北方代表團之一員。後派到湖南做書記（正是毛澤東開始搞的時候），父親是地主。但湖南情勢危險，他逃出長沙，1929年到上海，中共中央不信任他，他開始接近我們，加入托派。因家裏有錢寄給他，他在上海做寓

公，妻子也是同志。他後來被國民黨捕去，中日戰爭爆發時他被釋放了，但妻子已另外找人同居了。何資琛對獨秀特別忠實，一心照顧他。但獨秀脾氣很壞，是個任性的人。思想上同我們破裂後，愈走愈遠，完全悲觀失望。因此，連最深交的老友高語罕到江津去看訪他，也不知為甚麼，簡直被他趕走了。他的外甥吳季嚴也不在他身邊，在重慶教書；後來告訴我，去看望他的人士多是「反動分子」，偶而和濮一凡、王凡西通信，晚年門庭冷清清。

陳獨秀的逝世，我心裏當然很難過，看到各種各樣的輿論，覺得有必要對他的生平有個評價。雖然我們最後思想上背道而馳，但我盡可能保持客觀冷靜，寫了一篇〈悼陳獨秀〉。這裏不必細說，只提到幾個要點，我從他的家庭出身講到他在幾個歷史事變中起了偉大的作用。首先是領導五四運動，是其中最權威的思想上的領袖。其次他同李大釗創立共產黨，從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走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意義，代表了一個新興的階級。他在第二次大革命中執行了莫斯科的機會主義政策，但責任不在他，在於斯大林。最後他看了托洛茨基的文件，接受他的意見，同我們一起組織左派反對派，在歷史上代表一個進步的運動。我說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有三位重要人物：（1）康有為，領導清末改良運動，在當時是進步的；（2）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當然比康有為更進步；（3）陳獨秀，領導五四運動到創立共產黨，更高更深一步。總結我說到他被捕後，南京監獄時期是分界嶺，在這以前他不斷向前進，但在獄中第二年開始思想一步一步地轉變。首先表現在和我的爭論……。釋放後，在實際行動上走向機會主義的妥協，想同國民黨妥協、同斯大林黨妥協，後來對於戰爭也回到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思想。最後，對蘇聯的問題，否認其社會主義財產制、反布爾什維克、反對馬克思主義，又轉回到「五四」前的民主主義。從他個人歷史來看，宛若兩人。

我試着解釋這樣一位偉大歷史人物的下場。我說在歷史上有先例：俄國的蒲列哈諾夫是最好的先例：他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工黨，是那個時代（19世紀末）俄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了整代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列寧、托洛茨基都受他的影響。但在1905年他思想就倒退了，尤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倒退得變成社會愛國主義，根本反對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因此，蘇聯奪取政權後他反對十月革命；也是前後宛若兩人。怎樣解釋呢？我認為蒲列哈諾夫雖是俄國人，但他不了解俄國實際情況、歷史的變化方向，而是以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對應具體的事變，結果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至於陳獨秀，他接受布爾什維主義，是根據十月革命的具體事實，但在理論上與蒲列哈諾夫相反，不是一個深刻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上升時期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在革命失敗衰落時期，環境惡劣，實在很難忍受。後來搞左派反對派運動也是很痛苦；物質上的貧乏，還可以抵抗，可是內部的爭吵，小組組織傾向最令人頭痛。獨秀一開始就不能忍耐，尤其是數次叛變，他自己被捕了，長期要坐牢，覺得很艱苦……。再加上全世界革命運動走向低潮，蘇聯的墮落不斷加深；西方德國希特勒上台，跟着是佛朗哥法西斯上漲。這一切使他對整個世界一片悲觀。這些客觀事實，才是使他思想不斷倒退的原因。

最後，我要說到我同他個人的關係：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就我個人說，是和陳獨秀不能分開的，全是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也就是受陳獨秀的影響。後來在共黨內和他一起合作……，革命失敗後嘗到失敗的苦果，一起坐牢。就個人說，我們都遭到同樣的待遇。但獨秀有點不同的，是不理解歷史的客觀變化。他不能逆流前進，原因是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去了解蘇聯問題、世界大戰等，而是以經驗主義來應對；所以前後宛若兩人。我的結論是：他雖然去世了，我們要接受他的經驗和教訓，繼續奮鬥。

這篇〈悼陳獨秀〉文發表後，鄭超麟和王凡西各寫一文，主要是為陳獨秀辯護，攻擊我很厲害。鄭是從思想上為他辯護，說馬克思主義思想有甚麼了不起。比如《不斷革命論》還是個問題……。王凡西的攻擊更奇怪了。由於我文中有一句話「陳獨秀晚節欠佳」，他抓住了這句話，大發議論，說我譏諷他、醜化他；說陳獨秀是一個最偉大的革命家，最偉大的領袖，如果天假以年，有一個新的革命到來時，獨秀會以新的革命家姿態出現。王凡西文中還有許多罵我的話，所以我後來又寫了一文〈活的少數派依附着死的陳獨秀〉（1942年11月），做了一個詳細的答覆。基本觀點是說，對歷史人物要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家的分析，不能用感情來歪曲……。此文發表後，他們再也沒有反應，只好緘默。

另外有一插曲，是陳其昌之死引起的。我認為陳其昌支持抗日戰爭是一件事，但不應該做國民黨的特務工作；不是革命家的身份可容許的（這是我在一封信裏指出的）。除了危險以外，他又是少數派負責任的同志，而少數派是要打倒蔣介石政府；不是自相矛盾嗎？於是少數派又寫文大大攻擊我，說我落井下石。我不得不答覆：對於死者的態度，認為他是一個革命家，我們同情他的遭遇。但他做國民黨特務工作，據說是經濟問題，想多賺一點錢……（根據同他哥哥的通信）。必須分開革命家和對死者的批評。這一鬥爭是件很痛苦的事。

在1942年底1943年初，我們不能出刊物、寫文章；我準備寫一部理論的著作，題名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級論鬥爭的演變」。

我的計劃是想把俄國革命過程中，孟什維克的革命階段論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同時包括列寧的思想的鬥爭做為引子（第一章）；中國第二次革命過程中所體現的，托氏的不斷革命論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的鬥爭（第二章）；蘇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斯大林在1924年就提出「一國社會主義」，是革命階段論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放棄國際主義的鬥爭（第三章）。正好我這篇長文寫完，拿去油印時，

發生劉乃光等被捕，油印機也被破壞了，只剩下原稿；留下的是第三章。前二章由何姓同志拿去，至今無下落。這是我這一時期除了政治鬥爭外，思想上唯一的工作，花了許多精力和時間，很可惜！

1945年5月希特勒自殺不久，德國投降，接着是莫索利里之死，在歐洲戰爭已告結束，剩下的是日本。俄國把重力轉向東方；美國也全力轉向東方，英美飛機直接轟炸上海。6至7月間上海美軍大舉轟炸，相當恐怖。我們的住區是在愚園路，離汪精衛的住宅和特務機關不太遠，飛機轟炸比較尋常，當然很不安全。好友張醫生很是關心，請我們暫時到他本人家裏，在靖江，去避一避。我們帶了兩個小男孩，女兒留在上海原住處，到了靖江，住在一位姓盛的大地主的家裏。他是南京金陵大學畢業生，做了多年的中學校長，寫得很漂亮的字，有知識文化。我的名義是大學教授。他對我很尊重，很熱心，要求我為他的兩個兒子、兒媳、媳婦的妹子及鄰近青年開一個臨時演講班，在花園裏的石案前，為他們講世界大事……。還影響了一個青年，變成托派。我們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經過多年的城市生活，第一次到鄉村，深感另一番情趣。

第二十八章

和平後，
托派運動的再生·
蔣介石政權的崩潰
中共的軍事勝利·
我走上流亡的道路

1945年8月6日、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原子彈，迫令日本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決定無條件投降。於是日美戰爭終止。

宣告和平一兩天內，我就從鄉下趕回到上海，開始佈置恢復我們的活動。碧蘭兩三個星期後才帶孩子回來，我住在李棠家裏。

當時，我們在上海沒有組織，我把所有能接觸到的同志集合起來，討論怎樣恢復組織。首要的工作就是恢復出版。第一件事就是恢復內部油印機構。可惜，所有存放的鉛字和紙張都給「少數派」拿走了。但是他們卻沒有拿走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及伊羅生《中國革命悲劇》的紙版（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還是有危險），由我們保存下來。

多年來我們結識的一些同情者都很熱心。嚴雁賓是其中最熱心的一位。我還住在他家時，他就提出將來和平後要進行出版工作。因此他買了大批鉛字，堆在他那裏。如果我們需要馬上可用。和平後，我們就把這些鉛字搬到阿丁住所，開始小規模印刷。

我另有一個計劃，是出版一個較大型的刊物；同情者們都很熱心，認為可以做到，大家集合起來討論基金問題。1946年3至4月間有了結論，一共籌了十條金子；夏杏芳出得最多，李棠次之，嚴雁賓、羅瑟希、李華卿每人貢獻一條金子，我也積極籌備。那時劉家良等還在溫州滯留，我一個人很難擔當，就寫信到重慶，要求吳季嚴、杜畏之、劉伯莊等友朋寫文章；我自己也準備寫稿。上海李季也寫文章……。

五一勞動節時出版《求真雜誌》，是一個綜合性思想刊物，封面美觀，共印五千份。差不多同時，碧蘭也發動了一批青年（陳景光、謝山、女兒等）出版了一個比較輕鬆的刊物《青年與婦女》，規模小，二千份。兩者同時出版，文章都用筆名，但一看就是托派的觀點。《求真雜誌》引起我和李季等對孔老思想的爭論，很有生氣。《青年與婦女》也辦得很好，吸引許多年輕人，各地有同志來上海；溫州、重慶、香港都有些人來到上海，成立了一個幹部組織，很快地發展活動。

和平後的局勢——略敘

1945年秋，上海及淪陷區人民從日軍佔領下解放出來，歡欣鼓舞，以為新的時代來臨，對國民黨有很大的幻想。這是很自然的，可理解的情形。

國民黨第一個步驟，是派了大批人，成千上萬的人員到「光復區」來接收。第一件事是調查敵偽財產，就是日本人及漢奸的財產；調查清楚後就接收。所謂「接收」，就是把一切日本、漢奸，甚至不是漢奸，只是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的財產統統沒收。他們佔領房屋、車子、金條等，甚至敲詐——這些接收人員一下子成了暴發戶。這種現象我們日常都看得到，敵偽財產變成國民黨官僚特務的私產。據說陳立夫派的人員把虹口最考究的房子圈起來，分配給自己人……。

一般民眾和平後希望生活有所改善。比如工人在四年上海日軍佔領期間，一有要求，立即受到鎮壓。他們以為國民黨政府光復後，應該改善他們的生活；為了加薪，開始罷工，同時要求組織工會。但國民黨政府不容許，一律鎮壓，說要等到在南京政權穩定後再來解決問題。但事實上是拒而不決，農民在敵偽時代稅收很重，希望減輕；蔣介石開空頭支票，事實上毫無下文。整個情況比以前更壞。有人把與日人做買賣的市民當做漢奸，敲詐要錢，否則取消他們市民的權利……；所以在民間傳出「來一群，去一群，狗黨狐群」成為最流行的對句。

國民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對付共產黨，也就是政策問題。在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盡可能佔領「淪陷區」，害怕中共奪取。事實上，中共在鄉村，已趁機佔領一些城市，和平後，這種情勢更不可擋。比方靖江，就是陳毅的新四軍游擊隊佔領……，引起國共衝突。

日本投降次日（8月8日），俄國趁機不費絲毫力量佔領中國東北滿洲，包括旅順、大連；把滿洲日軍所有財產、軍火都沒收，把日本工

廠的機器搬運去俄國，引起反抗的運動。

國民黨政府派軍艦去接收旅順、大連，蘇俄斷然阻止；好似蘇聯要代替日本。因此中蘇，國共衝突更嚴重化。怎麼辦呢？

當初由美國從中調停；1945年9月間，由美國駐華大使請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直接談判。毛當時對蔣存有幻想，以為能和平共處，建立聯合政府。所以在會議上表示擁護蔣介石。但當他一回到延安，看到情形不能改變：蔣介石自以為代表四強之一（英、美、蘇、中、法——還不在內），盛氣凌人，自認是中國大陸唯一主宰，完全不買賬。但問題是在中日戰爭後期，中共有很大發展，變成一個龐大的武裝隊伍。那時蔣介石力量不夠，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尤其是美國害怕再引起內戰，所以在1945年末，派了美國原來的參謀總長馬歇爾，來中國調解國共衝突。

美國第一點是避免在中國發生內戰，認為蔣介石可以多少讓點步，與中共進行和談；第二點是美國已經知道蔣介石政權腐化，尤其在戰爭末期更清楚。在所謂「民主」的旗幟下，將國民黨以外的一些派系，都容納在國民黨政權裏面，做若干改良，同時也讓中共參加，滿足中共一些要求，在這樣的安排下，以合法手段解決中共軍隊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把中共軍隊編入國家軍隊裏。——這也就是馬歇爾被派來中國的重要使命。

1946年1月他正式成立了一個政治協商會議，名義上是各黨各派參與的會議，而實際上是國民黨與中共之間的協商會議。而蔣介石不過是敷衍美國，爭取時間，把軍隊全部送到光復區，準備「剿共」；「協商」的目的是要整編中共軍隊，當然中共不會讓它去整編，這是中共的資本，因此無法進行「協商」，各地國共軍事衝突還是照樣，就成了僵局。到1946年夏季，蔣介石已準備內戰，為了擴充軍勢，只有去徵募農民參軍，弊端百出，有錢的人出點錢可以不當兵，甚至買兵來代替子弟；目的是

準備內戰。

有關我們自己的活動：在 1945 年 9 月後，組織方面，開始只有我同碧蘭，當劉家良回滬（1946 年 4 月），我們成立了一個政治局，並成立一個組織委員會；分區，每一區派代表參加，每區有區委會。這時組織可說才上軌道。我們發表戰後第一個文件，表達我們的政治主張，分析戰後國際和中國的局勢，扼要指出國民黨還是照樣軍事專政，沒有任何改變，而且更加腐化，要改變這一局勢，必須建立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解決當前問題，包括國共兩黨問題在內，特別提出要求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農民經過戰爭急需得到土地，兵士也要分得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收回租界等）；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信仰等完全自由。這個綱領性的宣言，是我們政治主張的基調，我們辦刊物就是根據這個基本立場，從事宣傳。

《求真雜誌》、《青年與婦女》的出版

《求真雜誌》、《青年與婦女》兩刊物的出版，雖然不用托派的名義，但是裏面文章的觀點多是托派的，對於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南京蘇聯大使館特來訂購《求真雜誌》，注視裏面對蘇聯的批評，因知道這一雜誌有相當影響。還有些國民黨人也特別注意。比如孫科，同別發書店（《求真雜誌》的辦事處）經理黃旦甫老同學，關係很深。黃旦甫是大資本家，開襯衫廠，在虹橋有住屋，孫科來上海就要去訪問他。孫科看到這個雜誌，就問黃旦甫，黃說是一位朋友（即李棠）辦的。黃告訴李棠，孫先生很喜歡這個雜誌，還訂了許多份送人，每天都問他雜誌出來沒有。後來孫科派了一人到上海，由黃旦甫介紹給李棠；問李經費如何。李說是一些朋友集合出的。孫科派來的人說，如果經費有問題，孫科有意出錢。李棠來問我，我要他斷然拒絕。李也婉言辭去那位使者。可見國民黨也想找關係來辦雜誌，提高它的聲譽。自己沒有人來辦，想

利用一個有地位的雜誌反映《求真雜誌》引起各方注意。而後來到全國範圍，像昆明、重慶、湖南……；從前失去聯繫的老同志都又恢復聯繫。各地組織也開始重新建立。特別在香港、廣州，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當地同志逃到廣西去避一下，和平後他們都回到香港、廣州等地，看到雜誌很興奮。甚至在較小的地方：中山縣，也活躍起來。在武漢有了新的組織。南京、浙江的溫州、杭州……。托派運動從日本佔領下解放出來，又振興了，完全是通過刊物的出版和發行。甚至劉仁靜在西安大學做教授，和平後到上海寫封信來恭維我，說我又肩起理論的擔子，要求見我，這也是一種反映。其實在《求真雜誌》我寫社論用筆名陳人白；理論性的文章，如〈老子哲學與社會思想〉是第一次登載，用筆名歐伯，發表在《求真雜誌》上，引起和李季的爭論。這是托派公開全國性的出版雜誌，影響很大。與過去戰爭時期小型刊物《熱潮》、《動向》不可相比：這些刊物出版時間很短，散發各地很困難。……

那時，舊的幹部都積極起來，又加上新吸收的年輕分子，有數十人，於是辦了一個訓練班，講托派運動的歷史和發展。在一個小學裏，由我、碧蘭和家良主講。

此外，由《青年與婦女》召開一個討論會，在跑馬廳旁一個中學教室內舉行，可容納數十上百人；每週有一講座，由碧蘭主持，開整個下午。討論會上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提出來：青年與戀愛、宗教問題、哲學問題……等。最初我來做引子，然後大家自由討論，再由我做結論。至於青年與婦女的問題，是由碧蘭主持、做結論。劉乃光負責記錄，最後在《青婦》上發表。討論會繼續一年多，吸引了很多大學生來參加，也擴大了同情網。於是，不但得到同情者的積極幫助，而且重新集合過去離散孤立的老同志和友人，他們有的來到上海；趙濟從昆明來，施復亮、葉波澄也從重慶回滬……。

可是，《求真雜誌》辦到1947年初就停刊了。因有經費問題：李棠

負擔很重，而 1946 年末他的生意不佳，不能支持；其他的經費也用完了。事實上，《求真雜誌》規模太大，費用也大，不能維持。至於《青年與婦女》，經過一個時期，改名為《新聲》，實際上變成黨組織的機關報。本來是一個一般綜合性的刊物，1947 年改為《新聲》後，就更政治化了。

「少數派」引起的事件

記得 1942 年初日美戰爭爆發，少數派不服從大會多數決議，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國際主義者》，宣傳中日戰爭中採取「失敗主義」，還要常委批准。我們宣稱既然他們公開另辦刊物，就不屬於我們的組織，完全獨立：這是托派傳統對少數派的規章，就是公開破裂。和平後，我們出版公開刊物時，少數派也出了一個小型刊物《新旗》，不敢去登記，個別在報攤上兜銷，沒有甚麼影響。主要是在我們的關係裏傳送給地方組織，內容還是攻擊我們。當時我們以全力對外宣傳，忙碌不堪，推動各地的發展，在工人與學生中活動，根本不把他們放在心上。1947 年 6 月間，他們用「國際主義者」的名義寫信給「鬥爭派」（是 1931 年托派第一次統一大會時的名稱），而不是寫信給「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我們現在的名稱），為的是貶低我們，認為我們不代表托派的正統組織。信發給「鬥爭派」的中央委員會常委。要求雙方統一，成立協議委員會。同時，他們還寫了〈告同志書〉，我們準備討論，還沒有正式回答，他們私下找到我們的同志談話，散佈謾罵我們的話；說我們政治上不行，只要公開，要合法，甚至下禁令要封鎖我們同志和他們接觸。當時美國托派有多數派和少數派之爭，少數派要求統一，所以他們更積極起來，我們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於是上海常委和組委做了一個決議，同他們的來信一起寄發到各地支部研究討論。

接着來了第二封信，更具體化了：組織協議委員會，雙方同等數量的代表討論統一的問題，要求我們答覆。我們做了一個決議（1947 年 7

月 14 日），提出三點：（1）指出過去分裂時，少數派的政治意見，主要在抗戰問題上採取失敗主義，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立場採取妥協；後來在日美戰爭爆發之前，他們認為抗戰變質，主要敵人在本國，要首先打倒國民黨政府。而我們當時的決定是繼續抗戰，同第四國際的意見相一致。（2）他們不承認我們的組織是「中共同盟」，是第四國際承認的合法支部。他們要用相等組織的權利，完全不懂組織原則。（3）他們不遵守大會的決議，即少數服從多數；經過勸告，他們不顧一切地出版公開刊物，以致分裂。

由於過去這些歷史事實，現在的問題不是統一，是他們回到組織中來。他們是破壞民主集中制的紀律而分裂出去的；他們要回來，我們歡迎，但有三個條件：（1）對於過去的抗日戰爭，他們採取失敗主義，應該有一個檢討，重新表明一個立場；（2）他們應承認我們是「中共同盟」，是第四國際的正式支部，他們不能同我們對立統一。他們可以要求回到組織，我們可以討論，可以接受；（3）他們應該承認分裂的責任問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如果他們同意這三點，我們可以接受他們回到組織。這是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和第四國際一貫的組織態度，而提出的條件。

我們根據這一決議案，過兩天後，正式寫了一封信答覆，要他們考慮。我清楚記得他們分裂出去時，我們是怎樣誠懇勸告他們，說：「現時分裂的鑰匙完全掌握在你們手中，要知道分裂不是一種兒戲。現在萬丈深淵擺在你們面前，如果失足就要成千古恨，望你們再三考慮。」就是要他們懸崖勒馬，警告他們問題的嚴重。現在情形不同。我們提醒他們：「統一的鑰匙不在我們手裏，是在你們手中。」我們提醒他們分裂出去很容易，是他們的自由，回來有三個條件請他們考慮；如果他們同意，我們立即派人同他們接頭。

少數派裏面沒有幾個人，其中最狡猾的是王凡西，小布爾喬亞知識

分子，要出風頭，在組織裏要地位，但不願做艱苦工作，膽子又小，一有風險就不來了。他武漢回滬後，就有明顯表露。我三次去他家請他參加常委會議，他都拒絕，因有危險。他只願意寫寫文章，翻譯一點東西，交出去印刷，比較輕鬆；但不參加任何組織性的活動，連訓練班都害怕去講。編委會要出刊物，他要做主編，要寫時評。我們還是給他面子，由他寫短評。一有事變，就急急第一個表達意見，做最高思想領導，但又不行，寫提綱還是由我來寫。他不能影響一個人。對青年說話，首先就是捧場，說恭維話；因此，第一次見面，容易給他吸引，對他有好感。介紹同情者給他，他裝做名士派，對人不誠懇，見了兩三次面後，就被人看透了；所以同情朋友無人對他有好感。他接近幹部同志，從來不能教育人，結果有兩位同志，開始接近他。一個是工人張任東，另一位是廣西來的姓毛的，結果都消極了。另有一位在重慶我們支部的書記，山東人，和平之後來上海，說要見王凡西。我們說很好，去見見他們吧！王見到這位同志就大捧一場，他就跟着他走，後來也消極了。另一例子是南京金陵大學學生，看了《求真雜誌》，很興奮，到上海要為我們寫文章。我勸他先要研究，然後寫出來才有價值。他去見王凡西，把他捧上天，弄得他昏頭昏腦，加入少數派的組織。不久他發現他們淺薄，又跑出來了。其他有些同志，像鄭鏗、王國龍，都同他談過，卻不受他的影響。

總之，我們不得不採取嚴肅的立場。我們答覆後，還把通信和決議文件交給各支部討論，並且在上海開了一個幹部會議，由碧蘭主持，有很多同志發表意見。在華南（香港、廣州、中山）也開專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並通過決議，基本上意見同常委一致。結果少數派同過去一樣，沒做任何回答，又是一個詭計，不是誠心誠意同我們合作。

我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到群眾裏去，影響和吸收群眾。這才是建立新黨的基礎。少數派聲稱要建立新黨，但只辦一個秘密刊物，既不公開

宣傳，又怕到群眾中去組織他們。少數派的目標是到我們的隊伍裏來找群眾；但每次來到我們隊伍裏找到一兩個人拉出去，結果總是毀掉他們。現在這個辦法不行，一定要有原則，否則談不上統一。這樣通理的信他們不能答覆。

1947年6至7月間及後數月內，組織方面糾纏這些問題，少數派的確也拉出去幾個同志。我們過去太隨便，現在有點警覺，有同志同少數派人談話後，我們要求做報告，要知道他們講些甚麼。當然這也耗費我們的精力和時間。因此往後再不同他們打交道。

去南方觀察組織情形

1948年5月間，碧蘭妹妹的兒子明源來我家住，引起和馮炎培來往（馮是明源的叔叔）。馮從青島來滬，想同李棠合作做生意，準備去香港。他們邀我去港一行。於是買了飛機票，同他們一起動身去南方觀察組織情形。和平兩年以來，香港托派不但恢復組織且有新的發展：在紅磡船塢、太古船塢都建立了支部；在紡織業輕工業也組織了女工工會；出了一個刊物，負責人是阿陸。我又到中山，見到了王靜波，雖然沒有正式組織，也有幾個同志。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支部講了兩次話；還見到劉秀、梁顯德和李禮德等同志。從廣州乘火車到武漢，經過長沙，很想下車去看看，幾十年沒回去過——可惜是直通車，不能下車，直通武漢。

羅瑟希預知我來武漢，到車站來接我。他現在是武漢道亨銀行的分行行長。他請我住在他家裏，是公寓。他岳母本來對我們不好，現在卻以上賓招待。住了幾天，我找到武漢同志談話，知道一些情形，並解決一些問題。此時慧劍已經回到武漢，請我到他家裏，見到他的妻子。她帶我遊歷武漢名勝風景，是過去沒有機會去過的。慧劍通過羅瑟希找到陳時，是武漢名人，是碧蘭去信給羅瑟希，才把關係聯起來。

在南京，我住在彭桂秋家裏。他本來在廣西大學教書，和平後才到南京。從他那裏知道廣西托派的影響和發展，也見到一些老友。由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同志召集，我們到五湖划船，在船上談工作情形。我在南京坐了五年監獄，對南京的風景名勝根本一無所知，現在有一位同志帶我去明孝陵、中山陵、譚延闓墓等，總算一覽南京的名勝古蹟。

1948年7月間回到上海，很疲倦，馬上要準備中共同盟大會。這是戰後第一次大會，想把中共同盟改成黨。我們已經有三、四百位同志，又有一個同情網，但中國托派還沒有一個黨綱，一向是用決議案來做指針，也沒有正式黨的組織。我同夏杏芳商量，到金源錢莊在江灣的一個別墅，可以清靜寫作，就起草黨綱草案，劉家良起草組織大綱。在這黨綱草案中，我有系統地追敘政治經濟過去的教訓，以及從理論到實際怎樣鬥爭的策略問題。在8月中，各地代表來到上海，除上海外，有溫州、浙江、廣州、香港、廣西、湖北的代表，將近二十人。起初在一個小學內開會，後來感到不妥當，就遷到嚴雁賓煙紙店樓上。討論共三、四天，非常認真，通過黨綱和組織大綱，把中共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這是中國托洛茨基運動最後一次大會，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然而從此以後，整個國共內戰局勢急趨直下，到了最後決戰的階段。

成立革命共產黨

這次大會成立革命共產黨，有了黨綱和組織章程，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阮金兆（真漁）、劉毅、尹寬。選出政治局委員：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和真漁。這是托派第三次全國會議。這裏做一個回顧和結論：

托派運動從1929年到1948年整個二十年，中間不斷受挫折，剛成立就遭到大批被捕，受嚴重打擊。「九·一八」（1931年）事變後又有新成長，最主要的是吸收中共下級幹部，尤其是工人支部，但不久整個

領導層被捕。一直到 1937 年「八·一三」中日戰爭爆發後，這些同志被釋放，組織又恢復，公開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刊物和小冊子，又有新的發展。但日美戰爭以來，日軍佔領上海；以上海為中心，托派組織被打斷，三、四年內不能公開活動。直到 1945-1946 年和平後，托派才重新擡起頭來，出版兩個雜誌，在社會上發生影響，並把孤立的各地分子聯繫起來。1948 年當我到南方觀察時，去武漢、南京、廣州、香港……，看到托派運動在各地都有比較廣泛的發展。在香港有不少工人支部，上海也如此。交通大學有一支部，南京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也有支部，廣州中山大學有相當強勁的支部，常領導運動。一般說，在工人學生中有一點基礎。因此我們召開這第三次托派運動大會。正當開會時間前後，中國局勢發生急劇變化，國共內戰到了最後決戰階段。

局勢的變化，一直到 1948 年秋的情形

這裏不得不追述一下局勢的變化，一直到 1948 年秋的情形。

和平後，1946 年 1 月國共正式成立一個政治協商會議，由美國馬歇爾調解，整整一年內進行所謂和平談判；很多糾纏，同時有小規模的戰爭。中共要求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建立聯合政府，參加政權。國民黨方面並不公開拒絕，但準備一個所謂國民大會，要各黨各派參加。1946 年 11 月召開。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國民大會的代表並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是通過政治協商會議推舉的。而且國民黨把那些小黨（民社黨、國家主義派等）拉過來；支持中共的只有民主同盟。分配議員席位當然有討價還價；國民黨不讓步，結果中共不參加國民大會，國民黨的名單中共拒絕。那時周恩來已到南京，對於和談失望，就在正式召開國民大會時離開南京。中共代表團，李維漢、鄧穎超等一批人都調回延安，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的活動，只留下董必武等幾位。

1947 年 1 月杜魯門把馬歇爾調回去，和平談判就此結束了。當時為

甚麼蔣介石這樣強硬？因為 1946 年間他用全力佈置軍事力量，所有在內地的軍隊都送到光復區，佔領各大城市。而且開始要蘇聯退出滿洲大城市，讓蔣軍接收。於是蘇聯拖延到 1947 年 3 月才退出瀋陽、長春幾個大城市和本溪礦區，至於那些小城市蘇聯協助中共進佔，就是著名的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同時把日軍的武器大量讓給中共。這一工作是在 1947 年上半年完成。

這一來蔣介石下決心建立一個合法政府。1947 年 3 至 4 月間，正式選舉蔣介石為總統，成立了五院制；起初還給中共一點位置，當然中共不接受，於是準備內戰。由蔣介石進攻，在蘇北、山東南部、河南、山西等省發動攻擊，試着包圍中共游擊隊，加以消滅；一直從 1947 年下半年到 1948 年春季，變成拉鋸戰。蔣介石想運軍隊到東北，但因大連、旅順在蘇聯控制之下，只得經過京奉路和空軍運輸軍隊到東北。其次是滿洲，蘇聯把最大礦山和工廠的機器撤出，搬運到蘇聯，令國民黨政府接受這些大產業後，不能恢復生產，但又不能不維持工廠工人，對它也是很大的打擊，差不多是致命的打擊。

中共佔領的城市，四方八面組織游擊隊，包圍蔣介石軍隊；甚至軍需品、食糧要從華北和華中地區，運到東北支援龐大軍隊的開支，以及一百萬工人的生活開銷。

到了 1948 年初，蔣介石發動軍事進攻，2 至 3 月間進攻中共隊伍駐守的張家口，3 至 4 月間直攻中共政權的起源地和首都延安，從背後把它取下；這是全盤內戰的開始。6 月間，蔣政府公佈通緝毛澤東、朱德。7 月間公佈法令「剿共匪」（正是我們召開托派大會時的情勢）。到了 9 至 10 月間有兩件大事：（1）中共軍隊佔領了開封（河南省城）、濟南（山東省城）；當地駐軍（國民黨）自動投降。（2）差不多同時，9 月至 11 月間，國民黨統治區發生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即是通貨膨脹。本來 9 月前國民黨政府向美國借了一筆款子（一億五千萬美金），發行了金圓券，

以金子為本位。但發行不到一個月，10月間就貶值了，到11月間像山崩地裂一樣，每天跌很多，因此市場非常混亂。大家囤貨，發生搶貨，在南京、上海發生搶米風潮……；蔣介石派他兒子蔣經國組織鎮壓，但毫無效果。在這一大經濟危機造成的混亂下，整個國民黨政治機構和軍事機構就要崩潰，一般人民生活就像德國1923年馬克貶值的情形。中共趁此時機發動進攻。

國民黨政府經濟上完全崩潰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必須考慮全盤方針。顯然國民黨政府經濟上完全崩潰，不能維持，更有利於中共反攻；而國民黨政府必然不能抵抗，勢必被推倒。這種局勢擺在我們面前，必須採取非常措施。1948年11月間我們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由中央委員會和上海的幹部檢討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共勢必取得政權；我們從蘇聯（和東歐）得到深刻經驗，他們必定要壓迫托派；比國民黨更厲害，是要消滅托派，連肉體都要消滅。如果不預先採取非常措施，我們就無法存在。所以我提議要有一個政治方針和組織方向，在中共政權下；所有托派分子，從黨員到團員，設法加入他們的組織。加入共黨不容易，加入青年團有可能；加入工人組織及其他群眾組織，在鄉村加入農民組織……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生存，而獨立的組織活動完全不可能。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對於中共的政治措施，凡是進步的：如反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土地改革等，我們應該參加，而且更要積極。至於他們所謂「經濟合作政策」我們要很謹慎地予以批評……這就是我們採取的政治上的措施。為此我們成立一間臨時特別委員會，以上海為中心，同其他地方秘密聯繫。另一方面決定把政治局遷移到香港。在各地露頭面的同志，設法轉移到其他地區，以免受到斯派的打擊。

我們準備把政治局遷到南方。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尹寬應離

開上海；阿金已到香港。但是旅費成問題，更因情勢緊張，去廣州的船票都買不到。可幸的是王師亮幫了大忙。他本來是聯合國救濟總署的高級職員，他同李華卿來訪問我們。他是老黨員，黃埔軍校學生，離開後到菲律賓辦學校，認識不少菲律賓華僑，其中有一位名張開元，是菲律賓大商人，有相當文化水準。他到上海，接觸到王師亮，合股開了一間輪船公司，航程是上海到香港。王師亮自告奮勇要我們馬上離滬，李華卿也同意，因此把張開元介紹給我們。他給我們辦了全家的船票。我們給了一張船票給尹寬，劉家良最後走。我們乘船在 1948 年 12 月底到了廣州。未出發前，尹寬本來預定同我們一起離滬。但他當天到船上來似乎是送客那樣，拿出一封信給我，說他決定不走，而是來告別；結果他被捕坐中共監獄，死在獄中。據說，他曾寫信給陳毅，是留法同學，在法國尹寬還做過書記；但陳毅沒去睬他，他的命運就如此結束了。他不走的原因：他有一個舊式太太和一個女兒進師範學校，他想把女兒和太太遷移到上海，女兒當小學教員可以活下去，可是他忘記了中共對托派比國民黨還殘酷。

1948 年 12 月來到廣州，我們甚麼都沒有帶，全部書籍都留下來了，只帶了一些舊衣服。臨行時，同情朋友們送了一點錢，一共上千元港幣。到廣州起初住在梁顯德家裏，後來住到李禮德那裏曬台樓上，還有她的丈夫、弟弟。不久劉乃光和蓉秋也到了廣州。一大批人，大家都沒有錢，由我們供應大家吃飯，由碧蘭做菜，很辛苦。當時廣州的同志，大學生和幹部共有四、五十人，我想集合起來討論中共到來後的取向。同志們還沒有驚慌，比較鎮靜，還想發展工作，一般精神振作，有好些支部在活動。我們的女兒還有半年大學學業，在嶺南休業，學費、寄宿，也靠同志幫忙。

1949 年 3 至 4 月間，我們在廣州實在住不下去了。我先去香港，與劉乃光同行。碧蘭和大兒子玲玲暫時住李禮德的學校裏，不久也來香港。

我們住在陸續家裏，那時小兒巍巍還在漢口慧劍那裏，我們急信請慧劍把他送到香港。

我們以為可以在香港定下來，組織還在向前進展；從國內來了不少同志，從上海、廣西、中山、廣州都有同志來到，人數增加到一百人左右。我們發動了兩方面工作：（1）出版刊物，對外宣傳，出版書籍；（2）做教育工作，整理香港組織：

一、出版中文的《第四國際》：我們注視大陸局勢的演變，做了一些分析，決議案和告中共黨人書……，這些政治上的活動也反映在《第四國際》刊物裏。至於出版書籍事，本來想出版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傳》，準備翻譯，結果未成。先出版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中文版（我們已經把它的紙版同《俄國革命史》的紙版一齊從上海帶來），這裏李華卿給了資助。

二、教育方面：主要是開訓練班，需常在九龍山洞裏集會。

這個時期，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生活無着落。正好李禮德在一個銀行家家裏當家庭教師，他的兒子在香港大學讀書，需要補習中文，就介紹我做教授；每星期數次給三個學生講課，待遇每個月 250 元港幣，能夠付房錢和伙食費，算是救了急。補習到 7 月停止，幸虧女兒大學畢業來港，完全靠教書支持全家生活，勉強餬口。

在此以前，發生一件不測的事。阿金同兩位同志在印刷我們的刊物，不幸給香港警察發現抓了去，沒多久放出來，好似沒有甚麼影響。可是到了 1949 年 9 至 10 月間卻發生重大的事件：香港政府從國外郵件檢查中發現我們有兩個信箱，可收到歐洲（特別是法國）和美國的來信、文件和刊物。這是劉家良接頭的。第一個是李禮德哥哥申領的信箱，專收歐洲的來信和文件；第二個信箱是謝山的，他在一所銀行任職會計主任。劉家良同他商量，認為他收國外信件刊物不致有問題，而且謝山一口答應。起初好像沒有問題，後來香港當局發現了，一下子逮捕李禮德的哥

哥和謝山（也許事先已有線索）。結果，李禮德和她丈夫張新良，以及慧劍妻（正在他們家裏）都被捕。同時王凡西另外有通訊處，也被捕。

在這個沉重的打擊下，最糟的是我們不能在原住處留下來。當然謝山絕不會供出我們的住處，但他常來我家，一定受到跟蹤。可是搬到哪裏去呢？那時只有找馮炎培。他立即介紹我們到朋友家，離我們住處相當近，就把家具也搬去。不到兩天，我們發現有人在偵察；住處兩位太太說，在我們出去的時候，有人來問。我們知道是跟蹤搬家車，現正在偵察，還沒有動手；就決定馬上搬出去，搬到趙氏家裏。明源那時還在香港，由他把衣箱等物件帶到趙家。果然，我們離開那裏第二晚，有六名武裝巡警到這兩位太太家搜尋，她們說我們已去了廣州。過了幾天，老馮為長久計，由趙辦理，頂了一小層樓，在香港堅尼地城。這個案件越發擴大，香港政府就是要搜捕我；我已不能留在香港。於是去澳門，住了幾天，又從澳門到廣州，見到慧劍夫婦（其妻已放出來）。廣州已開始緊張起來。我回港不久，海南島被中共佔領了，廣州已快棄守了。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宣佈成立人民政府。

由於香港當局的追捕，我不能接觸同志，行動異常謹慎。當時有好些同志表示意見說：我們不能再繼續住香港，不但危險，而且給他們負擔很重，提議我們最好離開香港到國外去。那時能去的地方只有越南比較容易；本來我們想去日本，但比較困難。我們同阮金兆、劉乃光、劉家良等商量，大家一致決定我們離港出國。

離開中國，航向西方

我們積極準備離港，首先把那一層樓頂掉了，做旅費。可是在香港國民黨辦事處辦護照，要敲竹槓，把頂屋的一部份款項花去了。那時中山有一位姓劉的，是王靜波的熟友，很敬佩我們，聽說我們要離港，自動籌集一千元港幣。我說我們的旅費足夠了，這一千港幣就交給劉家

良，因此他也同時離港赴越南。

離港手續辦完後，我們召集在港同志們開了一次會議，有數十人參加，重要幹部都出席，我們做了「臨別贈言」。我的講話要點：中共推翻蔣政權的勝利已成定局了。廣州是最後國民黨的據點也快落下了。這標誌一個空前的巨變，托洛茨基運動也受到震動。我分析中共勝利的原因：（1）由於中日戰爭和世界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特殊形勢，尤其蘇聯贊同美英等協約國一條陣線上打敗希特勒，因此蘇聯能佔領東歐國家，擴大它的地域和影響，尤其對西歐世界的影響，反過來也助長了中共的威望。（2）在中國，中日戰爭消耗了國民黨的物質資源，而且和平後，國民黨的軍人、政客、官僚極端腐化橫暴，引起全體人民的反感和憤怒，在客觀上也幫助了中共。（3）蘇聯佔領了滿洲，武裝了中共的游擊隊，把原來十分原始的農村武裝隊伍很快地現代化了，形成了中共這次勝利的軍事基礎。但從基本思想和政治模式來看，中共是純粹斯大林式的政黨，全然靠農民是不能取得政權的，它的勝利並不證明思想和路線的正確，它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義思想，以及蘇聯在東歐所實行的教派主義的罪惡政策，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實施。的確，在中共的控制下，中國也可能有某些進步措施，但絕無可能徹底改造中國。往後中國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必然根據斯大林主義政策和方法進行演化，走向一個僵局。只有另一場新的革命才能解決。為了完成這一革命，托派運動，是繼承馬、恩、列和十月革命的傳統，會在全世界發揮作用，最後代替斯大林主義把世界革命導向勝利之路。因此中國的命運要提升到世界平面上來才能有望，三十年來的鬥爭的經驗，使我們有充份理由對前途表示樂觀。

最後，我說：我們是被迫暫時離開自己的戰鬥崗位，願望大家堅持信念，真誠合作，繼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我們盡力在外面幫助你們。

1950年正月中，我們離開香港，離開中國，向西方航行。我在船上

寫了一首詩，表達當時我的心意：

孤輪昂首向西行，別國離懷自慢尋。
萬頃青波相角逐，一輪紅日自沉升。
無邊宇宙深深識，易逝時光緊緊擒。
此去前程知艱險，但當奮力挽乾坤。

後記

一位中國流亡托派的火焰

——彭述之的第二度人生（1950-1983）

1950年1月末，當彭述之離開中國的那一刻，他預感到這將是永別。他了結在中國已度過的一生，現在開始第二個人生：流亡的人生。雖然不像第一個人生那樣光輝，那樣激動，那樣富有戲劇性，但也是一個飽滿的人生，是第一個人生的延續和證驗。

他沒有把這第二度人生寫成回憶錄的最後一章，也許是沒有時間，或者是沒有興趣。所以我們在此稍加敘述，以略補不足。

他五十四歲的生日（1949年11月26日）是在香港，仍在中國度過的。五十五歲的生日是在越南度過的；從1951年到1972年，是在法國度過的；然後從1973年到1983年，是在美國洛杉磯度過的。最後八十八歲的生日，是在他去世兩日之前。

1950年他離開中國的那一時刻，他是位堅實的男子，智力充足，雖然遭受到拔根式的衝擊。然而，對他來說，他的祖國是包涵全人類的一個組成分子，中國革命的命運只有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之中才有真正意義。正是由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所啟示的，這個革命自1917年在俄羅斯爆發，它必然會繼續在各處發展，雖然它被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等在歐亞大陸扭曲變形了。

彭述之是廿世紀中國革命家中的稀有者；他的愛國主義是不斷地受到堅定的國際主義的光輝照耀，這種特質構成他的全部生命。這不但足以使他能在流亡期間維持活力，而且在國外保持中國托派的火焰繼續燃着。三十多年來，他作為第四國際的領袖之

一和理論家，完成許多著作和戰士般的參與，並且為地球上人們新的覺醒有系統地不斷地探尋新的道路……。

彭述之所以能得到這樣豐富的第二個生命，我們必須着重地指出，是由於他身邊有一位同他一樣堅韌的同道路上的伴侶：陳碧蘭。她受到流亡的痛苦並不比彭述之少，他們自第二次中國革命開始及其失敗就連結在一起，又經過中共內部左派反對派（托派）的過程，他們倆更加緊密合作，一直到離開中國……。直到最後，陳碧蘭在彭述之逝世四年後在香港去世（1987年9月6日）。在這以前，她基本上完成她的回憶錄。這本回憶錄和彭述之的回憶錄相對稱，同樣動人和富有教育意義，在2010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彭述之和陳碧蘭共育三個兒女，是內戰和抗日戰爭中誕生的，一個女兒（程）映湘，1927年出生於武漢；兩個兒子出生在上海：耀光，生於1934年；耀明，生於1942年。他們三人都跟着父母親到越南，1950年1月19日從香港動身，四天後到西貢，在西貢的中國城定居下來，住在一間租下來的昂貴又窄小的房子裏。

這一家五口人，在這個法國殖民地作「寓公」，還加上另一位中國人：劉家良，他也是中國托派流亡的領導機構的一員（即彭述之、劉家良、陳碧蘭三委員），這個小組，一到達越南，馬上受到兩位越南同志的熱烈歡迎：一位是姓劉的中越混血兒，性格忠誠、熱心、勇敢；另一位是熱內，是一位法國式越南的知識分子，總之，他們都是托派。

首先應該回顧在1950年初，彭述之不得不逃離香港到越南，是為了掙脫英國皇家警察的魔手，正像在1948年末1949年初他不得不逃離上海到香港，為的是掙脫毛澤東特務的魔手，他最初的心願並不只在於免於監獄和死亡，而是為了挽救他所象徵的歷

史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領袖。他只是考慮西貢堤岸，離香港相當近，他可能繼續在此穩當地指導他的政黨。

可惜，這個打算實際上不可能實現，因為面對斯大林的國際，面對一個強詞奪理的中共，中國的第四國際支部全部失去主動。這就是彭述之在越南居留數星期後不得不發覺的現實。

事情就如此發生了。某日，劉氏和熱內告訴中國托派同志：他們收到來自過去是托派而現在投入越盟的人士的一份邀請信，請他們參加一個越南托派的會議。這位越盟人士是越盟一個軍事地帶的指揮員。這個會議便在他控制的地帶進行，受到他的保護。兩位越南托派同志認為這封邀請信是可靠的，忠實的，決定接受邀請。彭述之和陳碧蘭自認沒有理由不信任越南同志的接受邀請，劉家良即特別熱烈地同意，而且願意同他們一起去參加會議，他不顧彭述之和陳碧蘭的反對。他們認為中國同志不需要參與越南同志的事務（雖然是托派同志）；陳碧蘭是敏感的人，直覺地感到這裏面有些蹊蹺，是一個陷阱。過去她曾經多次由於直覺預感從虎口逃生。的確，她沒有想錯。這封信是一個陷阱，不但是對兩位越南同志，尤其是對劉家良來說。

這個會議在預期的條件下召開，但當它結束時，越盟的特務馬上拘捕兩位越南托派和中國托派同志，正在他們回西貢的歸途上。劉家良被捕入獄後，由於在獄中受到苦刑，不久死在獄中。熱內和劉氏可能受到較輕的對待，在一年之後，他們還活着，但此後就沒有了音訊。

中國流亡托派小組失去了劉家良，完全癱瘓了。並且失去了在國外他們的保護者，即兩位越南同志。彭述之，陳碧蘭和他們的三個兒女身處危險的孤立境地。而且最惡劣的情況是：越盟的特務確實知道他們的住處和他們的真實姓名；必然通知中共的政

治警察，……也許乘機幹一件事，令彭述之再無用武之地。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殺（1940年8月）的記憶猶在。斯大林黨徒還是斯大林黨徒……。總之，對彭述之和他一家人來說，越南不比香港安全。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只能想法找到另一個可安身的國家。哪個國家？當然是法國。因為她控制的越南到法國比較容易。而且巴黎已成為第四國際的中心，在巴黎已成立了國際書記處。

在等待逃出這個魔穴的時刻到臨，彭述之一家人只能到處約束自己。彭述之，陳碧蘭和他們的女兒，三位成年人，繼續在各自選擇的中學校裏當教員。這不但是謀生之計，而且可以獲得一部份資金，作為去馬賽的船票的準備。另一部份資金則由香港托派成員貢獻。

這個時期延長了數月，這是最不安心，最難過的日子，尤其是由於對熱帶的氣候不適應，更遇到各種小動物的襲擊。彭述之是其中最受罪的人。

終於到了解救述之的時刻。除了耀光，因沒有足夠的錢買船票，只得留下來，不久他回到香港，定居下來，遠離家人。Athos II是在法國和越南之間來回的郵船，彭述之、陳碧蘭、他們的女兒和小兒子，在1951年5月26日上船；差不多一個月以後，在1951年6月21日，船到馬賽。

船拋錨那一刻，彭述之等四人嘗到像醉酒般的感覺：嘗到自由的氣氛。這是一年多來閉塞在一個大監地的終結。本來彭述之有各種疾病纏身，頓時好似全消除了。整個航行就在自由的天空下進行。有幾次上岸參觀，尤其是在錫蘭上岸，受到幾位錫蘭在哥倫坡議會的托派成員的接待。這種寬廣的自由氣氛一直陪伴着他們到馬賽。在馬賽停留一個星期，就趁火車到巴黎，已是1951年6月底。

在巴黎神父街一家小旅店逗留上十天，又到巴黎近郊居留數天，在那裏，彭述之準備一篇關於《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報告，是給第四國際同志們的。

* * *

自從流亡法國，住在巴黎和近郊（1951年至1972/1973年），然後到美國洛杉磯（1972年至1983年）他去世時止，彭述之的私生活可以簡單一述：

在法國旅居，從物質上來說是十分艱難，甚至有時特別難受，尤其是居住問題。他和陳碧蘭、女兒和小兒子，正像其他居留法國本國或異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錢。雖然有一些友人或同志，在香港或美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慷慨相助。

在巴黎，彭述之、陳碧蘭和他們的女兒，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找廉價的家庭手工製造業的收入來餬口。當他們到巴黎時，除了俄文在莫斯科1920年代學習過以外，而現在已經淡忘了，也沒有用處，其他外國語的知識很少；英文是在中國學校裏學得的，如此而已。他們必須馬上學會法文來應付日常事務。他們必須加快英語的進步，以便和他們的同志們交換比較複雜的政治性的談話，因為他們的女兒不久就不能隨時做他們的翻譯。慢慢地，他們可以獨立地用英文應付。所以，直到1960年代開始，在這個接待他們的國家裏，他們有時會感到孤立和無助。

1968年，這一年在法國是五月風暴的高漲和沉落；在中國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假無產階級的政治反革命）帝國主義式的爆發。這一年對彭述之和陳碧蘭私人來說有特別意義，包括幸運的和悲慘的事件。不幸的事件是他們的小兒子程耀明的突然去世。他是一位年青的有天才的畫家，是1950-1960年代風行的抽象派畫家。有幸的是，由於好友和同情者的邀請，他們

旅行日本，渡過了六個月的時光。這次旅日之行，使他們暫時遠離西方，回到他們在亞洲的故土。尤其幸運的是，當他們回到法國時，竟然獲得一個適當的住處：是在巴黎近郊（Bagnolet）一間適宜的小公寓，生活條件有相當改善，正是在這幾年內，從1968年到1972年，他們的女兒及女婿（Claude Cadart）有可能和彭述之作多次的交談。這些交談成為他們編寫他的回憶錄上卷的基本資料。這一卷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1983年出版〉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資助，由法國 Gallimard 書店出版。

1972年，彭述之和陳碧蘭接到美國友人們的邀請到美國去定居。起初他們不是沒有猶豫的，永遠離開巴黎、法國和歐洲，結果他們搬到太平洋西岸，面對中國、日本、朝鮮的洛杉磯，度過他們共同人生最後的十年。在那裏，他們受到一些同志和友人的熱情接待和親切的安排。他們從沒有後悔這一決定。不但在物質上，醫藥方面，並且在心理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老少同志和同情者不斷地給予他們資助和友情。正由於此，他們能夠繼續寫作和發表重要的文章，中文方面在香港發表出版，英文著作在美國發表出版。

洛杉磯不是一個普通的城市。由高樓大廈結成的集體，周圍滿佈矮小的屋子；有色人種（其中包括華人）和白種人混合在大街小巷裏。這是一個畫境似的、有誘惑力的城市。她的天使就是來往不息的汽車，魔術般地籠罩這個太平洋上獨一無二的都市。就是在這裏，彭述之在醫院逝世，時間是1983年11月28日。他的病患是“Lung collapse”（肺潰瘍）。陳碧蘭在他去世之後，離開美國到香港，於1987年9月6日逝世。

彭述之和陳碧蘭的骨灰，由他們的女兒和女婿集合，在1998年春安葬於巴黎蒙巴那斯公墓地上。1998年3月31日舉行追悼會，

有四十餘位人士參加。追悼會舉行後，香港的一份法文和英文的雜誌“Perspectives Chinese”《中國的展望》在1998年3—4月那一期內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彭述之和陳碧蘭波動的兩個對稱的人生」。這是一篇政治性的追悼文，作者是程映湘和 Claude Cadart。我們不一定贊同彭述之的全部思想，但認為他流亡期間（1951-1983）參與公共事業和富有創造性的人生特別豐富，是值得我們讚許和羨慕的。這是中國托派流亡的火焰，是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堅強的火焰。雖然中國的斯大林黨嘗試用暴力熄滅，但，這火焰頑強地燃燒着，為世界托派的理論和實踐作出特別貢獻。

*

*

*

在1947年，毛澤東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在蘇聯的幫助下，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發動新的內戰，很少人意料到在兩年期間，這些武裝部隊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在中國以外，很少人意料到這個事變：斯大林沒有，特魯曼也沒有；在中國之內，連毛澤東本人都沒有。彭述之更沒有。自從中日戰爭結束之後，他正在不慌不忙地，用民主方式，重新組織托派，而且已經集合數百成員和更多的同情者。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1949年10月1日）一年之前。

一個世紀以來。從1840到1949年，被歐洲、美國和日本壓縮成半殖民地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多人口的國家出現在世界舞台上，而且這個龐大的國家是在完全斯大林模式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出現的。

這個事件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本身，而且遠超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不列顛帝國協商獲得的獨立（1942年）。它的另一個重要性：它的實力和影響立即延伸到東亞的某些國家，使他們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陣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傳統先進的歐洲全部覆滅。它的東部國家接受軍事化的蘇維埃模式政權；他的西半部相對地受到美國的經濟和財政的控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這個事件是大快人心的？或是可畏懼的，是奇蹟式的，或是可非議的……？總之，從任何觀點來看，都是不尋常的，而是偶然性的事件？

這個問題，第四國際的領袖們不得不提出來。在1948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會討論中就顯現出來。爭論的問題是：為甚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如1938年第四國際創立大會所祈望的，還沒有在蘇聯爆發一個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在至少歐洲一個大國發生無產階級的起義。結果是穩固、加強和普及在蘇聯斯大林的獨裁；在蘇聯以外，斯大林派政黨參與各種抗議活動（反法西斯的；反資本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法國即是一樣典型的例子。

對於這個問題，彭述之急切地要作出一個確切的回答。1948年他還在中國，然後到香港，再到越南到法國，收集了可靠的資料，一到法國，他急於把他的研究結果轉述給他的同志們：巴布洛（米歇爾·拉布第斯，希臘人）；格爾曼（恩納斯·曼德爾，比利時人）；以及當時來法國參加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的世界各國托派政黨的代表們（這個大會在巴黎近郊一處召開）。彭述之在大會開始不久，就對《中國第三次革命》作了一個〈中國現時情況的報告〉。報告長達五小時之久，由他的女兒作詳盡的翻譯。

在了解這個報告的真實意義之先，我們不得不承認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成份極少的共產黨能得到極大的勝利，令一般的托派，尤其是中國的托派（包括彭述之）陷於困惑的情況。我們必須記得，在他們看來，比如托洛茨基自1920年代末期以來不斷聲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兩次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一次是

在俄羅斯，歐洲半發達的國家，就是1917年勝利的革命；另一次是在中國，亞洲不發達的國家，即是1927年，一次失敗的革命。我們同樣地可以從第一個成功的革命以及第二次失敗的革命吸取教訓，由此斷定唯一的前途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也就是不斷革命（與孟什維克，也就是斯大林所主張的階段論相反）。而且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教訓是：從科學上假定，在「東方」國家內，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到底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革命。在這些國家內，正像在西方先進國家一樣，只有城市工人（無產階級）在先鋒隊引導之下，才能完成消滅「舊世界」的歷史使命。

彭述立1951年8月對他的第四國際同志們的報告，其重要內容可以簡述如下：

第一點，首先要承認的事：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是第三次革命，在中國發生。第一次革命，1911年，由孫中山和他的同伴們領導的，摧毀了二千餘年的帝制。第二次革命，1925-1927年，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先鋒隊領導，但因內部和外部斯大林派的錯誤政策而遭到災難性的結局。第三次革命，是毛澤東和他的同伴們領導一直到勝利，是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的真正革命，受到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歡呼和擁護。此外，雖然它還是很脆弱，這次革命包含與俄國十月革命同樣的諾言：建立一個工人國家，即使在斯大林制度下，這個革命有可能擴大增長，變形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革命。

那末，正如我們有些同志所想像的：我們應該加入這個革命向前進的隊伍（以協商方式，或者以承認錯誤的方式）。這個革命把一切事物，毫無妥協地統一在它的法令下，尤其是對中國托派橫加鎮壓。而如大家看到的是：中國工人群眾實際上差不多沒有參與由毛澤東策動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他們只是宣講式

地參入，大多數是表現迷惑，甚至疑慮的旁觀者。

這次革命的領導者是頑強的斯大林派組成的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的政黨（已經形成初步的官僚層）。它主要的支柱是貧農，受到軍事紀律的訓練，完全靠武器，而不是靠說服來完成民族革命。這個革命，在它誕生的時刻，已經是一個變態的革命。

總之，中國第三次革命發生了。它是一個雙重性的革命，一個模糊不清，不成形的，未完成的革命，這就是彭述之在 1951 年所描述的。

第二點，彭述之（以他特有的知識分子的坦白誠實）認為，一般的托派，尤其是中國的托派，有權利也有義務承認：自從托洛茨基主義存在，它的指南針不斷革命論，在中國被 1947-1949 年事變的現實質疑了。

為甚麼不斷革命論被質疑了？達到甚麼程度？托派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以便重新審定目前的實際政治總路線，以便確定未來的政治方針。

彭述之不是用哲學的觀點去判斷這個問題，而是以歷史學家的眼光來觀察事件的真實發展。這個 20 世紀中葉發生的不尋常事件：中國民族解放是在斯大林派共產黨控制下產生的，國民革命的勝利是由非無產階級的另一個社會階級所領導，而且受到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軍事組織所控制的。這個組織明顯地知道這一事實，所以在人民面前聲稱，它是代表四個階級的領導（四個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理論上稱為「新民主主義」。這個「不尋常」的事件，正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和大西洋區域終結之後，在太平洋區域和東亞結束時所產生的特殊現象的結果。

根據彭述之詳盡描述當時在中國的實際情形，中國第三次革

命的勝利是難以預測的五個原因的混合結果。第一個原因是日本因遭到原子彈攻擊而突然投降（1945年8月初），斯大林的軍隊得以佔領中國的東北部（以前的滿洲或滿洲國），沒有打一仗，因此使毛澤東控制的野戰軍地區擴張；第二個原因：在東北地區，蘇聯不但攫取日本自1931年起建立的現代化工廠，把它們撤掉，移裝到蘇聯，而且獲得被日本人放棄的大量現代化武裝設備和武器，送給毛澤東黨的游擊隊；第三個原因：毛澤東的共產黨獲得大批武器，就可能裝配遊擊隊成為現代化的軍隊，與由美國無償配備的國民黨軍隊對比對抗；第四個原因：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仍然法西斯化）達到道義上和政治上如此腐敗和癱瘓，極度不得人心，以致它的軍隊拒絕為它的統治去打仗；第五個原因：美國，即時為佔領日本，對日本治理的動員，以及本國恢復和平的負擔……，不能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

存在的現實質疑由科學論據證明了的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我們並不因此認為這種理論已經過時了，不再中用了。相反地，經過改善，這個理論的基本原則仍是適時的，可以確切地理解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在整個時期來應付斯大林黨敗壞的作為。

第三點，由於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雙重性和斯大林黨政策明顯的差距，我們中國托派和一般托派分子有義務從外面來干預「新中國」的事務（既然我們不能在內部參與日常群眾活動）。我們必須重複地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假如不馬上變成主要的發動力，推動全國性的工業化，同時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開始漸進的農業集體化，我們支持北京所採取的積極性步驟，揭露實踐中所犯的錯誤，否則中國第三次革命將會被「民族資產階級」置於死地。

依照彭述之的說法，就是在法國通稱的「批評的支持」，為的是要消除在中國和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官僚層和在資本主義國

家和「中立」國家內的斯大林化的共產黨的影響。

* * *

通過言論 [中文或英文，有或無翻譯]；個別同志間的交談，對記者的答問……通過給一般讀者可發表或已發表的文章，通過多種题目的私人通信；通過對第四國際事務方面關心和熱情的干預（即通過行動），彭述之在 1951 年到 1982 年，不倦地，同時，連續地在四個領域裏奮鬥。

在托派生存和覺醒的領域裏，經過毛澤東共產黨在大陸政治警察們的打壓和消除（在香港仍然存在一個活生生的勇敢的核心），他是這個黨自然的主要負責人。

在對於「人民中國」，她的實質上斯大林主義的領導（即使它同蘇聯老大哥發生衝突）的政治批評與對外關係的領域裏，身為中國托派的啟發者，對北京發生的事變不倦的觀察者，他同時也是中國初期（1920-1928）共產黨和初期托派（1929-1952）的著名人物；他是第四國際現存的「歷史」領袖……，他又是一位有膽識的歷史學家。

在不斷革命理論的領域裏，他根據地球上的演變，不斷修正和豐富它；觀察多方面革命的萌芽（成功的或失敗的）；探尋在發達國家或落後國家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萌發。他是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主義系列的思想家。

在內部鬥爭的領域裏，從最高層面到最低層面，由於世界二次大戰後，在亞洲和歐洲革命、半革命以及假革命的後果有利於斯大林派，使第四國際陷於政治和道義上的危機，作為托派領袖，彭述之的經驗曝光似地顯現出來。

的確，三十多年來，在四個領域內，彭述之的光焰不熄地燃燒着，照耀着前途。

第一個領域。在斯大林派眼中，托派，不管在哪裏，都是第一號敵人，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客觀的同謀者，唯有他們自稱能在地球上加以消除。毛澤東的龐大的政黨必須摧毀這個對它有害的彭述之的小政黨，從肉體到全部消除。在他幾乎把整個中國置於他的命令下，對托派的追捕，自1949年秋就開始，但不甚緊張，一直到1950年、1951年，直到1952年12月22日把全國托派一網打盡。在法國，也牽涉到彭述之：當天早晨，在巴黎十三區，彭述之在他居住一間小房間裏，周圍來往的是一般法國的越南人，有人嘗試暗殺他，結果他在千鈞一髮之際脫險，但是必須馬上搬家。在中國大陸，一直到1952年12月和1953年1月初，對托派的追捕突然變成有系統的急遽的逮捕、坐牢、殘酷的苦刑，為的是迫使承認「有罪」或「悔過」，下放到勞改營，或簡單地執行死刑。這次逮捕發生在上海、北京、廣州、重慶，以及其他地區，數百人陷入羅網。在這幾次毫無法律憑據的政治「清除」發生後，彭述之寫了一封強烈抗議的公開信（1953年4月14日，正是斯大林去世一個多月後）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在這封公開信裏（它不只是對鎮壓者來說，而且是對大陸以外，尤其是香港留下來的托派來說），他明白地區分中國托派與中國共產黨內斯大林派的一翼毛澤東派的根本不同點。

被極度摧毀重新恢復組織，在大陸的邊緣上，中國托派政黨是彭述之非常關懷的事，出版的刊物經常受到他的思想、精神和判斷的影響。

法國1968年5月運動之後，一小群香港年輕人，屬於左派的分子，以及在林彪被推進歷史垃圾場的前後，來到巴黎，吸收比他們本土更有活力的氣氛。彭述之在數星期內，集中精力和時間爭取他們為中國托派的事業努力。這是在他1972年離開法國去美

國之前。

在 1978 年末，中國覺醒的青年中的魏京生為「第五個現代化」發起的運動得到彭述之的熱烈讚賞，在他去世不久之前，他含笑地說：現在可以看到在那邊已經有民主的繼承者！也許是彭述之的幸運，他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悲劇發生六年前離開人世。

在 1979 年，鄧小平成為中國的第一號領袖。他的確將魏京生投入監獄，坐多年的牢，為的是魏京生走得太遠，而且得罪了他。但是他將一些被毛澤東無理關進監獄或流放的公民釋放，其中有數位 1952-1953 年逮捕的中國托派倖存者；有一位是鄭超麟，在 1920 年代，在法國同鄧小平相識。他原諒鄭超麟在 1929 年隨着彭述之和陳獨秀參加托派組織的錯誤。而且讓鄭超麟被選進中央政治協商會議，這是例外的。自 1979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承認有些中國托派（彭述之在內），在 1920 年和 1929 年之間，即在他們參與托派之前，曾對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它一向拒絕對一般的托派，特別是中國的托派平反，更不用說在大陸容許托派恢復活動。

第二個領域。雖然他相信全世界無產階級會團結起來走上最後的勝利，但彭述之不會忘記在等待期間，首先他是中國人，他是在第四國際內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代表，而他現在主要的作用是讓人們聽到這個先鋒隊的聲音。

最費精力的任務，無疑的是通過各種渠道，吸取有關中國的消息。而中國的現實不斷地被北京官方的宣傳和「自由世界」的謊言掩沒了。然後，立即以即時嚴格的歷史家或「戰士」的方式發表。除了「新中國」發生的事件以外，其他非中國廣大領域有關的事變也受到注視。但他最重視的是中國第三次革命內的階級關係，即工人階級對於新政權的決策的影響（是加速，或減速，

或全無），也即在中國建立工人國家的速度，以及政治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來為中國解除官僚層的束縛。

在 1950 年代初期，他所最憂慮的是毛澤東黨沒有力量阻止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本來投靠他的）暗地裏攫取政權，通過財政和經濟措施。因此，他慶幸北京不惜用強硬手段，通過「三反」和「五反」運動（1952 年），來排除這個險境。這顯示中國第三次革命已經從 1949 年開始的民主革命不斷發展到「改造」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斷革命的證驗。但是要到 1954 年末，他才放心。他宣稱，中國第三次革命是自俄國 1917 年十月革命以來世界上發生的最重要事件。

然後，他為他的同志描述和評論自 1954 年到 1982 年連續發生的「新中國」的大事變，揭露這個國家歷史的全景，固然是從托派觀點出發，但對於一般非托派人士也是有啟發性的。在我們看來，最有意義的事件是如以下敘述：

一、「新中國」的領袖們，彭述之差不多都在「英雄時代」，在他沒有加入托派之前相當熟識的。他了解他們，由於他這方面的開放的精神，他不斷地指出「新中國」的演化，客觀上同她的蘇聯大姊完全一致，原因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上的，而不全是經濟或戰略性的。特別是赫魯曉夫主義，自斯大林死後和朝鮮戰爭結束後（1953 年），從 1954 年到 1964 年，在中國共產黨內動搖了、改變了和複雜化了個人之間和團體傾向之間的力量對比；尤其是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之後（1956 年初）。正由於此，毛澤東下決心，自 1956 年開始發動瘋狂式的整風運動，鎮壓大批「不服從」的共黨知識分子；災難性的「大躍進」；更加災難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 1965 年秋發動，共經歷十一年。

彭述之並不同意赫魯曉夫所贊助的永久性的和平共處，在國

際上同階級敵人的和平共處。但他讚許他非斯大林化的事業，在蘇聯以及在其他蘇聯的小兄弟國家。他由此預見到托派期望着的「政治革命」的來臨。他的確看到在中國有相對的非毛澤東化在1956—1957年嘗試過，而且差不多成功，要不是混世魔王毛澤東在一瞬間把它扼死。這是在1957年夏。

二、在1958年，彭述之很快地了解：毛在中國發動農村人民公社，以瘋狂的宣傳，空頭的報告和示範來強迫集體生產，大規模地和高速度地發展農業和改變農民的生活，全然像斯大林在蘇聯1930年代初一樣，同一個目的，在全國在最短期間發生戲劇性的結果，尤其在糧食供應方面，他不是不知道，從長期來說，農業的集體化是大城市工業化發展的必要的補充，以便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真正的工人作主的國家。記起列寧這方面明確的教訓，特別注意保持工農之間緊密聯盟，彭述之說，農業的集體化要實現，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先有它的技術下層建築（道路、電氣、機器等）；另一個條件是要有充份時間說服極其懷疑的農民，使他們確知首先是他們在廢除私有財產、家庭和小塊土地制度方面得到許多利益。這就是他在1959年寫的一篇確切的文章的內容，寫給美國和歐洲同志們，而中文是為了「新中國」邊緣地帶的華人（香港，澳門，台灣及東南亞）。其中有些極左派的年青人，非托派分子，有些是天真，近視，或愚昧，以為只要建立一個人民公社，加上個高爐就可以走上共產主義的大道。

三、在這篇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文章裏，作者的思索不但着重無產階級先鋒隊與無產階級本身的關係，而且同其他社會階級的關係，尤其是同貧農的關係。當然，不需要強迫，也不需要催逼，而要說理，要有充份時間來解釋話題，一直到他們自願地加入革

命事業。

在階級敵人面前，彭述之可能表現強硬，但對於可能是階級同盟者，相反地，他經常表示寬大的理解；對於在「官僚層」裏一些非教派的光明正大的分子（有的以為可以從內部改善），或者脫離黨之後而不投靠資產階級分子，他的處理也是如此。

因此，我們不會驚異在同一精神驅使下，彭述之時常對斯大林派敵人，也對托派同志們提起：執掌政權最高度民主方式是「民主集中制」（這是所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機構、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以及無產階級自身，她的「蘇維埃」所應遵守的）。在「民主集中制」內，「民主」的重量和價值並不比「集中」差，而「集中」必須在同志們的腦海中和實際行動上受到「民主」的制約，才有真正意義。「官僚層」的同伴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忘記這個原則，而且決心忘記它。

四、正如他在十二年前了解「農村人民公社」的興起和「大躍進」的真實意義，彭述之很快了解「大舵手」在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義。首先是政治性的，是卑劣的政治性的。是用鐵腕奪回國家政權，它的代價是把黨撕得粉碎，因為它在1959年羞辱了它的「永遠正確」的首領，因為它不服從他的指示（1960年到1965年）。這個所謂大革命不是一個政變，而是一個暴力的大變動。變動的結果首先撤除「叛徒」劉少奇（事實上「尊重」他的對手）的職務，套上「罪犯」的鎖鏈，把他流放直到死亡。由彭述之來看，正像在1930年代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裏發動的「大清洗」。彭述之利用所有機會抗議這個事變，特別是在1967年2月25日寫給中國共產黨全黨人士的一封公開信裏，在這封措辭激烈的信件裏，他強有力地為劉少奇辯護。

對彭述之來說，劉少奇不僅是一位老友，是在莫斯科艱苦時

期以及在中國 1920 年到 1928 年一起奮鬥的同志，而且是他一直認為的真正革命家。雖然劉少奇沒有在 1929 年選擇托派，在往後又站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在彭述之眼裏，自 1949 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內，差不多總是有兩條對立的總路線，半露骨地，半透明地存在：毛澤東是超度的斯大林派；劉少奇是溫和的斯大林派。也許彭述之希望：如果由劉少奇單獨領導，中國共產黨會走另一條道路，在它的盡頭也許會出現「政治革命」的足跡……，對中國工人國家的發展，或許是可慶的事。

* * *

毛澤東真正的死亡並不是他生理上的死亡，在 1976 年 9 月 9 日發生，而是他政治的死亡，在他去世五個月之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當北京青年一代發出呼聲：拒絕毛澤東的呼聲，這就是 1976 年 4 月 5 日運動。這個事件的意義以及它所發出的信號，彭述之立即全部領受，感到興奮。此後，他有幸追隨中國及第三次革命真正的復興的不定形的，可喜的開端，照耀着 1977 年到 1989 年中國的演變（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前）。也許這些年頭會復現，伴着它們的是彭述之、陳碧蘭和許多其他人士活生生的記憶。

第三個領域。在緊跟他祖國革命的進展的同時，彭述之以第四國際的戰士以及領袖之一的身份注視在其他國家的革命，沸騰但不爆發，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卻又消沉下去……。在他看來，這些革命運動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主流中才有意義。可是，這個主流，自從列寧去世後，失敗多，勝利少，低潮比高潮多；而且繼續躊躇不前，還在探索中，彭述之和他的同志們，特別追索革命再升的起始。托洛茨基主義首先是世界偉大的遠景，對人類歷史的觀點，是直接承襲馬克思思想的。

在思想領域裏（不能以行動表現，至少在目前），他與同志

們在高處眺望，不得不發覺有三個怪狀：第一，在第一世界，在「西方」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大國家裏（日本和英屬太平洋海島在內），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主義的「形影」）還未能取得布爾喬亞的後備隊的政權，這是在馬克思預測的百年之後！第二，一個「政治革命」能夠挽救第二世界，斯大林派的世界的工人國家，使她們收回原動力的希望，正是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在1956年初一時喧耀的希望，也被放棄了，雖然這個世界繼續進展到地球的東部和南部的三大洲，在中國以外，吸取了越南、柬埔寨及古巴。第三，在第三世界多彩的宇宙內，經濟上落後的所謂「東方」，或「第三世界」，已走上反殖民主義的道路，被壓迫的國家和階級反抗洶湧。

對於這些事實，彭述之，明顯地不作出像毛澤東那樣的結論：在我們這個時代，「紅東方」正在包圍精力耗盡的「西方」，正像他在中國組織起來的農民群眾在1947和1948年包圍城市一樣，而最後在1949年完全征服。彭述之總是懷着希望和信心，西方的無產者終究會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宣佈的諾言，而到那時，只有到那時才能真正發動，像大煙火一樣，一個世界工人革命，在這革命的終結，人們進入沒有階級沒有邊境的自由世界。以常識見解，他認為，在等待這件可慶幸的事件發生前，而且促進它的發生，應該極力支持在「東方」國家內無產階級及他的已組成或正在組織的先鋒隊的事業，他不斷地提醒：在這方面如果有一個可影響的「理論」或觀念，這決不是1920年代起由孟什維克發起而由斯大林派繼承的「革命階段論」的理論，而是不斷革命論的「理論」，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發表的、1917年成功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在實踐中證驗了它的真實，而現在成為所有「東方」國家回到完全獨立的指南針。

第三世界的國家（除了第二世界，乘冷戰機遇，向第一世界搶奪過來，首先是中國）多半是國內同時存在：（1）一個越來越少的買辦資產階級而急切地發達為民族資產階級；（2）一個年青的不眾多的無產階級，而正由於直接受到歐洲、日本及美國老闆們的苛刻剝削，是特別愛國的；（3）一個眾多和悲苦的農民大眾，正在向封建社會傳統的大地主們抗爭。不斷革命論的論述者，首先是彭述之，作了以下的論述：

在現時期，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第三世界國家內的民族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不論它的數量多少，以及在布爾什維克先鋒隊的領導下，有兩個條件：在他們後面集合貧農群眾；決不把民眾的領導權讓給民族資產階級。為甚麼俄國革命在1917年10月勝利了，而後來被斯大林及他的同夥糟蹋！正因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由列寧、托洛茨基及其他領袖領導，自1917年2月起把民族革命的控制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同時集合農民的主要力量，在這個半發達、半封建、半自主的國家，正是當時的俄國。為甚麼中國的革命在1927年失敗了？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由於莫斯科來的指令而失去正確方針，不能阻止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民族資產階級奪去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權。

無產階級與它勝利的先鋒隊，一旦政權在手，就緊跟直上（那時的革命中可稱為不斷革命）完成從封建制度「滑入」民主革命的任務，而開始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滑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實現由於土地改革而成為小地主的農民漸進的走向集產制的技術改良，而由此說服他們走向集產制是他們的利益所在。

彭述之在鼓吹不斷革命論時，不是留在抽象的詞句上，而是

在文章中或發言中，對照革命的現實，無論是在第三世界的所有國家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而且總是不斷指出它們的失敗，像 1927 年在中國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非斯大林黨的先鋒隊來領導。由此，他特別指出甘地的祖國印度民族革命的不足，尤其是 1965 年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革命悲劇：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大屠殺，他不能原諒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這個悲劇的負責者之一，以他身為印尼共產黨的啟發者、議論者和保護者。

第四個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7 年在亞洲開始（日本軍隊進侵中國），第四國際在 1938 年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39 年擴大到歐洲，直到 1945 年 8 月終止。至少可以說，第四國際實際上參與極少，為甚麼？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1949）的後果從國際階級關係來看，顯示出第一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領域縮小了，正由於東歐的控制以及整個中國不屬於它，但是它的重心從衰敗的西歐進入重新復原的北美洲，鼓足新動力。斯大林派共產黨的第二世界由官僚層控制也相對增長實力：在相當擴充它的領域的範圍和人口，不但吸收了東歐全部以及中歐的一半，還吸收了全部中國大陸（連西藏在內）。無產階級似乎到處覺醒了，特別是在法國、意大利，也在中國有些少……，但他們全然是斯大林派的先鋒隊由克里姆林宮支配，似乎證明唯一走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道路只能通過階段性的革命，連第三世界也如此。這是第二個為甚麼。

對這二個為甚麼，第四國際在 1951 年第三次世界大會上回答這個問題很困難。（在這次大會上，彭述之成為主要領導人之一，而且作了一個對中國 1945 年以來現況的報告）。第四國際很自然地由兩位歐洲人掌握：希臘的巴布洛，和比利時的格爾曼。這是

從 1946 年春季開始。但它沒有克服不可避免的法國解放後發生的工作中的重新配合適應的危機：它在 1944-1945 年在巴黎成立國際書記處，在 1948-1949 年以來它所擔心和有分歧的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非常實際的問題，或者可說是策略性的：在蘇聯和美國的冷戰會突然變成熱戰（在歐洲或在亞洲，或在歐亞兩洲）應該怎樣應付，或者對於「新中國」已經表露「奇異行為」，在斯大林派內部以及在第三世界方面（在內部階級關係的雙重性，在外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雙重性，因為她同時屬於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

在托派之間已出現分歧，有些受到同斯大林派合作的路線的引誘；另一派決心宣稱繼續堅決地全然反斯大林派，同時反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巴布洛和格爾曼是屬於第一條路線，特別是格爾曼則趨於認為中國式的斯大林主義，不相同於俄國的斯大林主義，沒有它那樣惡劣。

彭述之走的是第二條路線，和許多歐洲和非歐洲的同志們在一起。

1952 年初，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剛完畢，巴布洛和格爾曼以為他們有優勢可強迫至少他們的歐洲同志接受一條路線：與各國社會黨（真正的反大西洋公約的社會黨），特別是各國斯大林派系的共產黨「兄弟們」建立一條路線，一條深入的和長久性的全面合作路線，稱為「深層的參入」。這條路線建立在三個定論上：第一、由冷戰轉變成熱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待爆發，這就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目前必須選擇我們的「陣營」；第二、在戰爭爆發之前或剛發生後，我們可能傳染（革命）的病菌（如果我們已在隊伍裏面），變動他們的方針，奪得他們的領導權；第三、「將到臨的戰爭」威脅越是明顯化，它的破壞性將越大；廣大人

民群眾會對這些政黨施加「壓力」，以使它們復興。在採取這個措施時，他們還是謹慎地只邀請歐洲同志施行深層的參入的策略，結果，巴布洛和格爾曼卻在歐洲同志和非歐洲同志中激起最大的焦躁，尤其是在美國的同志，他們認識到不是「參入」的托派分子在斯大林黨內傳佈托派的種子，而是相反的，斯大林派很快地傳染病菌給托派分子。在第四國際內的爭執強烈到分裂的程度，在1953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寫一封給「巴布洛派」的公開信（巴布洛派控制國際書記處）。這個分裂為時十年之久。

在實際上，彭述之堅強地追隨美國、法國及其他國家托派與巴布洛派的爭執，在巴黎組成一個「國際委員會」；彭述之是其中最積極的活動者之一。但是，彭述之並不接受一個他寄予熱烈期望的組織的分裂。在十年間，他不斷地同「巴布洛派」對話，嘗試指出他們的錯誤，同時嘗試說服他的友人們必須發動作出協議，重新統一運動。在1963年得到結果：重新統一。

當時，中蘇關係的危機，本來在1956-1957年孕育着，至1959-1960年間爆發，在中國出現許多「列寧主義」的文章，針對赫魯曉夫和他的同夥們的「現代修正主義」，這個形勢繼續促進許多托派（格爾曼同志在內）的幻覺，認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是與斯大林的共產主義相反的。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最後一刻，不斷地提醒他們：毛澤東主義，在實踐上、本質上與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同出一轍。

高達樂、程映湘

巴黎 2015年7至8月

彭述之著作選列

中文本

《彭述之選集》〈共四卷〉，十月書屋出版

出版日期：第一卷 1983 年；第二卷 1984 年

第三卷 1982 年；第四卷 2011 年

英文本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當權的中國共產黨》），Monad Press, New York, 1980.

Introduction to “Leon Trotsky on China”

（《托洛茨基的中國文選》）的序言

法文本

L’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

（《彭述之回憶錄》）：上卷：「中國共產黨的起飛」，

Gallimard，1983 年由程映湘和高達樂編著，法國中央科學研究中心資助出版。

《彭述之回憶錄》下卷：「中國第二次革命」及「中國托洛茨基反對派」。

日文本

彭述之選集：《消失了的中國革命》，中嶋嶺雄教授編譯，1980，新評論出版，附有彭述之年譜。

鳴謝

程映湘 (Cheng Yingxiang) 和高達樂 (Claude Cadart) 特此感謝下列的個別人士及研究機構對《彭述之回憶錄》的完成給予多方面的協助。

在法國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
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在美國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Mrs. Sherry Frumkin and Mr. Leo Frumkin
Mr. Leslie Evans
Miss Judy Tung, Mr. Alan Yi Han

在中國 (香港)

周任辛、葉向陽、蕭舟、張開